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8)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八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依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译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于1955年开始出版的。在中文版的译校过程中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字。

目 录

第八卷说明	V II—X X V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3—115
一 革命前夕的德国	5—14
二 普鲁士邦	15—24
三 德国其他各邦	25—29
四 奥地利	30—36
五 维也纳起义	37—40
六 柏林起义	41—45
七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46—50
八 波兰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	51—55
九 泛斯拉夫主义。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战争	56—60
十 巴黎起义。法兰克福议会	61—64
十一 维也纳起义	65—70
十二 对维也纳的攻击。对维也纳的背叛	71—79
十三 普鲁士制宪议会。国民议会	80—84
十四 秩序的恢复。议会和议院	85—90
十五 普鲁士的胜利	91—95
十六 国民议会和各邦政府	96—99
十七 起义	100—104
十八 小资产阶级	105—109

十九 起义的终结	110—115
卡·马克思。声明 1851年10月4日	116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旧译“拿破仑第三政变记”)	117—227
一	121—131
二	132—144
三	145—160
四	161—171
五	172—190
六	191—211
七	212—227
弗·恩格斯。英国 228—240	
I	228—236
II	237—240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 ..	241—243
弗·恩格斯。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	244—256
一	244—248
二	249—251
三	252—256
卡·马克思。致“科伦日报”编辑部的声明	257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	259—380
一	261—284
二	285—292
三	293—297
四	298—300

五	301—316
六	317—323
七 古斯塔夫和斋戒移民区	324
八	325—328
九	329—336
十	337—342
十一	343—352
十二	353—359
十三	360—375
十四	376—378
十五	379—380
卡·马克思。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	381—387
卡·马克思。宪章派	388—397
卡·马克思。选举中的舞弊	398—404
卡·马克思。选举的结果	405—411
卡·马克思。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	412—415
卡·马克思。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	416—423
卡·马克思。商业繁荣的政治后果	424—428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	429—430
卡·马克思。致“晨报”编辑的声明	431—432
卡·马克思。各个政党和政局展望	433—437
卡·马克思。建立新反对党的尝试	438—442
卡·马克思。科苏特、马志尼和路易—拿破仑	443—444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关于最近的科伦案件的 最后声明	445—458
典·恩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	449—456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457—536
一 前言	461—466
二 迪茨的档案	467—471
三 舍尔瓦尔的密谋	472—487
四 原本记录	488—517
五 “红色问答书”的附函	518—520
六 维利希—沙佩尔集团	521—529
七 判决	530—536
卡·马克思。议会。——11月26日的表决。—— 迪斯累里的预算案	537—544
卡·马克思。答科苏特的“秘书”	545—546
卡·马克思。内阁的失败	547—552
卡·马克思。衰老的政府。——联合内阁的前途及 其他	553—558
卡·马克思。政局展望。——商业繁荣。——饿死 事件	559—568
卡·马克思。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 公爵夫人和奴隶制	569—576
卡·马克思。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 英格兰银行的措施	577—584
卡·马克思。国防。——财政。——贵族的死绝。—— 政局	585—592

卡·马克思。意大利起义。——不列颠的政策	593—598
卡·马克思。弗兰茨—约瑟夫遇刺。——米兰起义。 ——不列颠的政策。——迪斯累里的演说。—— 拿破仑的遗嘱	599—608
卡·马克思。议会辩论。——僧侣和争取十小时工作 日的斗争。——饿死	609—615
卡·马克思。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 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 布顿先生	616—623
卡·马克思。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 计。——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通商条约。——“泰晤士 报”和流亡者	624—631

附 录

1850年9月15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	635—641
关于救济科伦被判罪者的呼吁书	642—643
关于救济科伦被判罪的无产阶级代表及其家属的呼吁书	644—646
注释	649—710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711—728
人名索引	729—772
期刊索引	773—776
译后记	777

插 图

最先刊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革命”杂志 的扉页	119
载有弗·恩格斯的“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 原因”一文的“寄语人民”杂志的扉页	253
卡·马克思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巴塞尔第一版 的扉页	459
卡·马克思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 1853 年波士顿 版的扉页	523

第八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1 年 8 月至 1853 年 3 月期间所写的著作。

在欧洲反动势力猖獗时期到来的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进一步从理论上总结 1848—1849 年各个革命战役的经验、保存和积蓄革命无产阶级的力量、从理论上培养无产阶级政党的干部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自己的战友勤学苦练掌握各种知识，并使他们有充分准备去迎接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新的高潮的到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进一步发展自己的革命理论具有重大的意义。当时政治经济学成了马克思的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对象。马克思在 1848 年以前把注意力放在从哲学上论证科学共产主义，在 1848—1849 年致力于政治思想的研究，而在五十至六十年代则把经济学说的研究提到首位。1850 年底马克思恢复了他早在四十年代就开始的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的研究工作。马克思希望很快就结束这项工作，但当时他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计划。这不仅由于马克思的流亡生活非常艰苦，不仅由于著作无处出版，同时也由于他对科学的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促使他批判地去研究不断出现的新的资料和文献，分析现实生活所提供的日新月异的事实和材料。从马克思在准备写作时所作的笔记可以看出，除了

研究经济科学本身而外,他还广泛研究了许多有关技术史、文化史、数学、农业化学的著作以及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使他感到兴趣的其他科学著作。马克思对任何科学领域中的每一步发展都非常注意,而且能够批判地掌握人类思想的一切新的成就。

这一时期,恩格斯的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军事科学和军事学术史。由于1848—1849年革命斗争的需要,恩格斯当时已经从事于军事问题,尤其是武装起义问题的研究。1850年11月,恩格斯迁居曼彻斯特以后,就着手对军事进行系统而认真的研究。“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46—577页)一文手稿及本卷所载的“英国”一文就是这个研究的初步成果。此后,恩格斯曾经打算写一部关于1848—1849年战争,特别是关于匈牙利革命战争的著作。恩格斯深刻地认识到武装斗争问题在未来的革命事件中必将起重大的作用,这是促使他研究军事的主要原因。

在曼彻斯特时,恩格斯除了研究军事科学以外,还研究语言及语言学问题。恩格斯精通许多种欧洲语言,1850年12月,他又着手研究俄罗斯语言及其他斯拉夫系语言。他研究一个民族的语言是同研究该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文学结合起来进行的。恩格斯研究语言不仅是出于科学的兴趣,同时也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进行的及行将进行的国际革命的实际工作的需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理论研究和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以科学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党的干部等党的政治工作结合在一起。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同维利希—沙佩尔宗派集团的斗争达到了非常尖锐的程度,这个宗派集团在1850年9月时就已经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制造分裂。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击了

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中的宗派主义分子，揭发了各流亡团体之间的倾轧以及他们策划阴谋和暴动的冒险计划，从而坚决地捍卫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原则，论证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已经到来的反动时期中所应采取的策略。

尽管这一时期要在报刊上捍卫自己的观点是很困难的，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停止写政论文章。在好几年中，他们不断在宪章派的机关刊物“寄语人民”和“人民报”上著文捍卫对于重大的政治问题的无产阶级观点，发表对当前的重大事件的评论。从1851年秋天起，一连十多年，马克思经常为当时美国的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通过撰稿，马克思得以在几乎完全没有工人报刊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战斗的政论活动，并影响社会舆论（尽管是间接地），使其有利于无产阶级政党。由于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的工作可能占去马克思的全部时间，而使他不能从事他和恩格斯认为具有首要意义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所以为该报所写的许多篇论文和通讯是应马克思的要求由恩格斯执笔的。作为本卷第一篇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论文，就是这样写成的。

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著作中，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了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前提、性质和动力。恩格斯的这些论文是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奠基人在这段革命时期中通过“新莱茵报”这个讲坛所发表的言论的总结。通过对革命教训的分析，恩格斯指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关于通过革命的道路来统一德国并对它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进行彻底的民主改革的政纲的正确性。恩格斯在他的论文中清晰地描绘出了德国革命所处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他研究了当时德国的社会经济条件，指出了这些条

件对运动的进程的影响,分析了革命的各个重要阶段以及各阶级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揭示了革命失败的原因。恩格斯的这一著作是对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卓越典范。

在这一著作中,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原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具体化。通过 1848—1849 年德国的事例,恩格斯指出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在历史上的决定性作用,分析社会的经济基础对于了解政治历史和社会思想历史的必要性,阶级斗争在对抗性社会的发展中的作用,以及革命的一个规律性:革命反映人民的迫切需要和要求,而腐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则不让这些需要和要求得到满足。恩格斯依据马克思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一深刻的思想,把革命看作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这种力量使得一个国家“五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一百年还走不完的途程”。(见本卷第 38 页)

恩格斯根据丰富的事实材料分析了德国革命的动力,发展了他和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所贯串的思想: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不能起领导作用,自由资产阶级已爬到反革命立场上去,出卖了它在反封建斗争中的必要同盟军农民的利益。这个结论不仅对德国以后的历史,而且对其他许多国家以后的历史都非常重要。弗·伊·列宁在分析 1905—1907 年俄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而坚持他所提出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这一思想时,就曾不止一次地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结论。

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用很大篇幅分析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们的作用,指出这些人,每当革命的紧要关头就表现出政治上的近视、怯懦和动摇,从而使革命遭到失败。恩格斯抨击小资产阶级

领袖们的“议会迷”，抨击他们迷信议会制度万能，而不想越出宪法的范围，不敢依靠人民，不敢依靠武装群众的支持。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最彻底的真正的战斗力量，他们“是代表整个民族的真正的和被正确理解的利益的”。（见本卷第 106 页）

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关于革命斗争的策略的总结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恩格斯要求革命的阶级和它的政党要坚决、勇敢、有自我牺牲精神、要善于实行果断的进攻。他写道：“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永远需要勇敢地面对敌人，而进攻者总是处于有利地位。”（见本卷第 82 页）弗·伊·列宁非常重视这个著作中所阐述的这一思想：“在革命中常常有这样的時候，那时不经过斗争而把阵地交给敌人，会比在斗争中遭受失败要更加使群众感到沮丧。”（“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384 页）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著作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起义学说的基础。在这一著作中第一次表述了这样一个原理：“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见本卷第 102 页），并且规定了革命政党在起义中所应遵循的一些最重要的原则。弗·伊·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起义的学说，他指出，这些原则总结了過去一切革命在武装起义方面的教训。

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非常注意德国革命中的民族问题。他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抨击了奥地利和普鲁士统治阶级所执行的民族压迫和挑拨各民族关系的政策。恩格斯坚决斥责了德国资产阶级对波兰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的民族解放运动所采取的叛变立场，并论证了德国民主派中的无产阶级派的彻底的国际主义立场——支持给这些民族以独立的要求。

恩格斯的著作也谈到了当时作为奥地利帝国组成部分的斯拉

夫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等)的民族运动问题。大家知道,在1848—1849年革命初期,当奥地利的捷克人和其他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中出现了强烈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趋势时(1848年6月的布拉格起义、农村中的群众性的反封建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些民族的斗争抱着深切的同情。而在奥地利发生的捷克人和其他斯拉夫民族运动中的民主力量被镇压下去以后,资产阶级地主右翼分子重新占了上风,哈布斯堡王朝和俄罗斯沙皇政府得以利用这些民族的民族运动来反对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因此,从来以革命的利益为准绳来看待民族问题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就改变了他们对这些民族的民族运动的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革命的利益,把反对革命的敌人、首先是反对当时作为欧洲反动势力主要支柱的沙皇制度的斗争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因此,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反对过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34—335页)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著作以及恩格斯在这以前所写的论文“匈牙利的斗争”和“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193—207页和第322—342页),除了对奥地利的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在1848—1849年具体条件下所起的客观作用的正确评价之外,也包含着一些对这些民族的历史命运的错误论断。恩格斯发挥了这样的思想:这些民族已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而存在,被较强的邻国所吞并将是它们不可避免的命运。恩格斯之所以作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由于当时他已经形成的关于弱小民族的历史命运的总的观念。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历史发展进程的基本趋势是集中,是大国的形成,因而一定会导致较大民族对小民族的吞并,英国的威尔士人,西班牙

的巴斯克人,法国的下布列塔尼人,以及领土被美国侵占的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的后裔克里奥洛人的情况就是这样。恩格斯正确地看到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集中即大国的形成这一趋势,但他没有考虑到另一种趋势——弱小民族反对民族压迫争取自身独立的斗争,以及他们力图建立自己的国家组织的愿望。随着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参加民族解放斗争,随着他们的觉悟的提高和组织性的加强,弱小民族(包括奥地利的斯拉夫民族在内)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就愈来愈具有民主和进步的性质,同时也扩大了革命斗争的战线。历史已经证明,过去是奥地利帝国组成部分的斯拉夫弱小民族,不仅有能力走上民族独立发展的道路,建立起自己的国家组织,而且加入了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的创造者的行列。

本卷所刊载的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科学共产主义的最卓越的著作之一。这一分析历史事件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的天才著作,同时也是革命政论的真正杰作。用威·李卜克内西的话来说,马克思的这一著作“把塔西佗的严肃的忿怒、尤维纳利斯的尖刻的讽刺和但丁的神圣的怒火综合在一起了”。(“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中文版第 107 页)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可以说是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9—125 页)这一著作的继续。如同在前一本著作中一样,马克思是用他所发现的社会发展规律、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阶级斗争的理论作为利器来阐明法国革命时期的历史的。

由于马克思运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所以他能在事变后立即写成的著作中对 1848 年法国革命的几个基本阶段作出经典性的分析,仔细考察了第二共和国时期阶级力量的配置,科学地深刻阐

明了 1851 年 12 月发生的路易·波拿巴反革命政变的真正原因。恩格斯写道：“他对当前活的历史的理解如此卓越，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把事变的意义洞察得如此明白，这真是无与伦比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 1954 年莫斯科中文版第 1 卷第 221 页）

马克思通过法国的具体例子，指出了作为历史的动力的阶级斗争的作用。马克思追溯了在不同的革命阶段各个政党在立场上的重大改变，揭露了这些政党的阶级本质，以及他们的活动的隐蔽的动因。马克思关于政党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关于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本阶级群众的关系的深刻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以第二共和国时期活跃于法国政治舞台上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为例，指出应该把这些或那些政党的言论和幻想同他们真正的性质严格区别开来。同时，马克思预先警告说要反对这样一种庸俗的观念：好像一个阶级的思想家本人在实际中一定要按这个阶级固有的生活方式生活。所以，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无须一定是小店主。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的是他们的同小资产阶级生活范围狭隘性相适应的理论见解，因此，他们在理论上的任务和决定也就和小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在实际中促使小资产阶级去做的一样。“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见本卷第 152 页）

对于 1851 年 12 月 2 日政变的原因的唯心主义解释，把整个问题都归之于篡位者路易·波拿巴和他的党羽的阴谋，因而也就有意无意地夸大了篡位者的个人作用。同唯心主义的解释相反，马克思认为波拿巴的政变是事件的以前进程的必然结果。他认为

这次政变是执政的资产阶级在共和国时期的一系列反革命活动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是经常进攻人民的民主权利,不断侵犯革命成果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这次政变是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的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是慑于“红色怪影”而向波拿巴派阴谋家节节让步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怯懦而动摇的政策遭到破产的合乎规律的结果。马克思指出,和十八世纪末叶的革命相反,十九世纪中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走“下坡路”的,革命的领导权落入了愈来愈右的政党手中。“二月革命的最后街垒还没有拆除,第一个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革命就已经这样开起倒车来了。”(见本卷答 145—146 页)马克思的这种思想说明了在资产阶级已经成为反人民、反革命的力量,而无产阶级的力量还不足以阻挠反革命进攻的条件下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这种情况特别明显地表现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不稳固,并且为各种复辟企图创造了条件。

马克思特别着重指出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和自相矛盾的性质,指出它是虚有其表的。第二共和国的宪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马克思说得好,这个宪法的每一节“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见本卷第 135 页)

马克思阐明了在法国建立起反革命的波拿巴制度的真正原因,对波拿巴主义的本质作了深刻的评述。这个主义的特征就是:在各个阶级之间看风转舵,国家政权貌似独立,蛊惑性地向社会各阶层呼吁,以便掩饰它的维护上层剥削分子的利益的行为。马克思揭露采取波拿巴独裁政权形式的资产阶级极端反革命分子的无耻的统治手段,指出资产阶级为了保持剥削制度,把政权拱手让给了最狂妄无耻的冒险家,听任实行军阀式的血腥镇压,利用罪犯,

采取诈骗、贿赂、露骨的煽动以及其他种种卑鄙龌龊的手段。马克思揭露了波拿巴制度的这些令人厌恶的特征，有先见之明地预言，被深刻的内部矛盾震撼着的复辟的波拿巴君主制必然会遭到灭亡。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很注意法国的农民和他们对波拿巴政变的态度。马克思一方面指出波拿巴在农民中的鼓动是有成绩的，同时也着重指出，充当路易·波拿巴的支柱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这部分农民所以拥护路易·波拿巴，是由于他们政治上的落后和闭塞，由于同城市的文明生活隔绝，由于彼此隔离的分散的小农经济的生活条件本身所造成的眼光短浅。把农民看做不过是勒索捐税的对象资产阶级制议会和立法议会所制定的政策，使农民厌弃革命，而支持路易·波拿巴。促使他们这样作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农民私有者眷恋自己的小块土地，把拿破仑王朝当作自己的传统的庇护者。马克思着重指出农民的两面性，他写道：“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过去……”（见本卷第 218 页）马克思分析了小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发展，得出结论说，随着小农经济的破产，随着高利贷资本家对它的盘剥，将有愈来愈多的农民群众摆脱“拿破仑观念”的腐蚀。农民的理智，他们的被正确理解的利益，他们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发展，——这一切必然会使农民同工人阶级采取一致的行动。马克思写道：“……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见本卷第 221 页）

马克思的这一结论是他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就已表述过的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这一思想的发展。从 1848—1849 年

革命战斗的全部经验中得出来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在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得到了更全面的论证。

关于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差别这一天才的思想，是马克思这个著作中所做的重要的理论概括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在于它的宏伟的任务：它要彻底摧毁现存制度，把现存制度从根本上加以改造。资产阶级革命总是倏忽即逝，很快就达到它的极点。而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彻底性，它经常批评自己，从来不满足于既得的成就，不怕揭露自己的错误并勇于改正错误，它不可遏止地一往直前。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国家的关系的原理，具有特别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在这里，马克思根据革命的经验教训作出了非常重要的结论，丰富了他关于国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马克思以法国的历史为例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它的特征、它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并且得出结论说：一切资产阶级革命都没有动摇还在君主专制时期就已形成的集中的军事官僚国家机器，而是使它更适合于镇压被剥削阶级。“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见本卷第 216 页）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类型的政权和国家的集中，决不能原封不动地保留这种寄生性和剥削性的镇压群众的工具。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在对付旧的国家机器方面的任务，就是要“集中自己的全部破坏力量”来对付旧的国家机器并加以摧毁。弗·伊·列宁写道：“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段出色的论述里比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该书中，国家问题还提得非常抽象，还只是最一般的概念和表述，而在这里，问题已经提得具体了，还做出了非常确

切、肯定、实际而具体的结论：过去一切革命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但是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

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5 卷第 393 页）

弗·伊·列宁着重指出，1848—1851 年革命的历史经验是马克思这一重要的结论的基础。“马克思的学说在这里也像其他任何时候一样，是由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5 卷第 394 页）

恩格斯的文章“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在内容上是和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相衔接的。在这篇文章中也揭示了在法国所以能建立起波拿巴制度的原因，它的本质和它固有的矛盾。恩格斯驳斥了想把政变的责任推到法国无产阶级身上去的资产阶级作家和新闻记者。恩格斯一方面指出，由于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在 1848 年 6 月遭到失败的工人阶级，被解除了武装，因而也就没有现实的可能性来防止波拿巴独裁政权的建立，同时他也着重指出，无产阶级对这个独裁政权采取了不调和的态度，他们要求尽快地恢复民主的自由。

收入本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流亡中的大人物”，在作者生前没有发表，这是一部抨击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首先是这一派的德国代表金克尔、卢格、海因岑、司徒卢威等人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他们还在 1848 年革命前就已开始的工作，揭露各种小资产阶级流派思想和策略。他们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捍卫无产阶级思想立场和策略立场的独立性和纯洁性，使它们不受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和整个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应该说是对于那些拚命

诬蔑和攻击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小资产阶级领袖们的一个直接的反击。

“流亡中的大人物”这部著作是出色地运用各种政治讽刺的写作方法——无情地嘲笑敌人，突出地表现所批判的现象的丑恶面——写成的，它无情地揭发了德国小市民阶层和他们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的恶行。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真正的艺术的表现力把这一伙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中的“大人物”的面貌描绘出来。他们明确指出这些人的庸俗的精神世界的空虚，哲学和政治观点的平庸和狭隘，他们所固有的在政治上的极端不稳定性，小资产者反复无常爱走极端的本性，他们时而奴颜婢膝地献媚，时而又附和和无政府主义的假革命的叫嚷。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部著作里揭开了德国小资产阶级领袖们的流亡生活的纱幕，描绘了在原则性争论的幌子下所进行的无谓争吵的令人厌恶的景象，马克思恩格斯无情斥责各种泛泛空谈、用革命的词句蛊惑人心、把政治活动变成争权夺利的场所的现象。流亡者的这种叫嚷使德国政府在国内进行逮捕和迫害有了适当的借口。小资产阶级的领袖们把伟大的革命事业贬低和庸俗化，这正合反革命势力的心意。这就是“流亡中的大人物”这部著作所得出的主要结论。

由于在德国许多工人运动活动家被逮捕，普鲁士政府策划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在1851—1852年的好几个月里，一直忙于营救被告并揭发普鲁士政府和警察当局对付共产党人的无耻手段。收入本卷的许多声明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科伦案件而在报上发表的。在这些声明以及恩格斯的“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中，特别是在马克思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一著作中，都充分揭露了这个案件是通过警察局的奸细密

探活动、伪造证据、凭空捏造等等卑鄙的手法制造出来的。这一著作在反对警察局和法庭陷害革命阶级的代表，反对它们卑鄙地迫害进步活动家方面，到现在仍旧是一部具有很大的揭发力的文献。马克思在全世界面前不仅是科伦被告的辩护人，而且是控诉人。他不仅揭发了这个案件的直接组织者的犯罪行为，而且谴责了整个警察官僚国家制度，整个腐朽的普鲁士国家体系。

马克思无情地揭露普鲁士司法当局的偏颇不公，资产阶级的“公正裁判”的阶级性。作为被告站在资产阶级法庭上的革命无产阶级手无寸铁，因此被告是事先就被定了罪的。科伦案件以及其他案件都清楚地说明，“陪审法庭是特权阶级的等级法庭，建立这种法庭的目的是为了用资产阶级良心的宽广来填补法律的空白”。（见本卷第 536 页）

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反驳了加给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所谓图谋不轨的这种莫须有的罪名。他指出，冒险主义的密谋的策略是同组织无产阶级政党和培养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真正任务不相容的。马克思以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破坏活动为例，证明了这样的策略的结果是脱离群众，给工人运动带来损害，并为警察当局的奸细活动造成有利的条件。马克思指出，与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相适应的，就是用唯意志论和主观唯心主义偷换唯物主义世界观，把所希望所想像的条件当作革命斗争的现实条件。在 1850 年 9 月 15 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马克思发言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那种号召立即进行武装起义以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冒险主义立场，他发挥了这样的思想：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和革命本身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工人阶级应该在这个过程中改造自己。“……我们对工人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

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见本卷第 465 页)

在科伦案件以及由此而来对各地无产阶级组织的破坏之后,共产主义者同盟实际上已不可能继续存在。1852 年 11 月,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同盟宣布解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作为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组织而载入史册的,这个组织的纲领性文献就是不朽的“共产党宣言”。同盟解散后,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以其他方式继续进行党的活动,团结无产阶级的队伍,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许多论文在本卷中占有很大的篇幅。这些论文的主要题目是论述英国的经济和政治状况。英国的经济给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提供了丰富材料。马克思在他写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最初几篇论文中,就已通过英国的例子指出了一系列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揭示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周期性,证明了经济危机的必然性。马克思揭穿了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者的虚假的乐观主义,他着重指出,当时在工业和商业中所出现的活跃是暂时的现象,它不能阻止劳动群众的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不能阻止失业和贫困的加剧。在“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这篇论文中,马克思论述了人口过剩问题。马克思指出,如果说在古代人口过剩是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而引起的,那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见本卷第 619 页) 马克思证明说: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迄今为止都是劳动者的受难史，要结束这种状况，劳动者就必须掌握这些至今控制着他们的力量。

“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是一篇很有意义的论文。马克思在这篇论文中指出了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的主要特征之一，即大地主残酷地剥夺农民并把他们从世代居住的土地上驱逐出去。“如果说把哪一种财产称为盗窃更确切的话，那末不列颠贵族的财产就是名副其实的盗窃。掠夺教会的财产，掠夺公社的土地，通过欺诈和消灭兼施的办法把封建的宗法的财产变为私人财产，——这就是不列颠贵族占有领地的法律根据。”（见本卷第 575 页）这篇论文中所收集的关于萨特伦德家族发财致富的历史材料，以及马克思在“论坛报”上发表的其他几篇论文中的材料，后来都被马克思利用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在“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这篇论文中，也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他指出了像犯罪行为增长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他揭露了资产阶级惩罚制度的野蛮，并批判了为这种制度辩护的资产阶级的哲学法律理论。说到康德和黑格尔的惩罚理论时，马克思指出了唯心主义哲学的特征：“……德国唯心主义只是通过神秘的形式赞同了现存社会的法律；在这里是如此，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也是如此。”（见本卷第 579 页）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证明说，消灭犯罪行为的根本手段，就是消灭必然产生犯罪行为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

马克思在“选举中的舞弊”、“选举的结果”等论文中，全面地论述了英国的政治制度，揭露了资产阶级贵族寡头政治制度的反人民的本质。他指出英国议会和剥夺大多数人民选举权的选举制度

的反民主的性质，清楚地描绘出选举中的贿赂和恐吓行为。在“商业繁荣的政治后果”、“内阁的失败”、“衰老的政府。——联合内阁的前途及其他”这几篇论文中，马克思尖锐地批评了托利党的得比—迪斯累里内阁和 1852 年底接替它的阿伯丁联合内阁的反动政策。这种政策反映了土地贵族寡头集团和资产阶级上层独揽政权的意图，他们除了向工业资产阶级作些迫不得已的让步而外，竭力阻挠国家制度方面的任何进步的改革。马克思在他一系列的通讯中指出了英国教会的反动作用。

马克思的“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各个政党和政局展望”等这组论文，道破了英国传统的两党制，指出这个制度不过是由托利党人即保守党人和辉格党人即自由党人轮流执政。马克思指明托利党是土地所有者利益的代表，辉格党是资产阶级的贵族代表。马克思一方面指出资产阶级贵族寡头的那些旧政党已开始分解，同时指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即自由贸易派在反对资产阶级贵族寡头方面的温和和不彻底性。他揭穿了自由贸易派政策的本质，即“力图剥夺人民在国家事务中的代表权，并且严格维护他们自己的特殊的阶级利益”。（见本卷第 591 页）马克思着重指出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害怕工人阶级，随时准备同贵族妥协，他写道：他们“宁愿同垂死的对手勾结，也不愿用实在的、并非表面的让步去加强日益成长的、掌握着未来的敌人”。（见本卷第 390 页）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人民的大多数，即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层，是同英国统治阶级的各个集团相对立的。马克思在他的论文中，对英国工人起来维护自己经济利益的一切较为重大的事实都作了仔细的分析，而对英国无产阶级政治积极性的每一个表现则予以特别的注意。他竭力支持以厄内斯特·琼斯为首的英国无产

阶级的优秀代表人物在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重新鼓吹宪章运动的活动。在“宪章派”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指出了宪章派提出的使英国政治制度民主化的纲领的意义，这个纲领的中心要点就是要求普选权。这篇论文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认为暴力革命是在大陆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可行的手段，但认为当时条件下的英国是一个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考虑到英国的特点——当时英国不存在发达的军事官僚机构，同时英国在欧洲是唯一的无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认为英国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和平的、议会的途径取得政权。他们认为实现这个可能性的最重要条件就是提高英国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积极性，实行普选权和彻底改革议会制度。

马克思在为“论坛报”写的文章中，对大陆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作了阐明。马克思对 1853 年 2 月反抗奥地利统治的米兰起义所作的评价，是值得注意的。马克思从这次起义中看到即将来临的新的革命危机的征兆，对参加起义的无产者的英雄主义给了应有的评价，同时也斥责了这次“即兴的革命”的鼓动者马志尼及其一伙人的密谋性策略。马克思着重指出，“任何时候革命都不能按照命令制造出来”。（见本卷第 601 页）他警告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流亡者的领袖，民族运动有被反革命的波拿巴主义集团利用的危险。马克思证明，指望路易·波拿巴帮助被压迫民族是决不可靠的，他忠告意大利爱国的革命者要更密切地联系人民，首先是联系无产阶级和农民，因为“甚至在反抗异族人的专制政治的民族起义中，阶级差别这种东西也起着作用，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能期待上层阶级的革命运动”。（见本卷第 625 页）

在本卷附录中有 1850 年 9 月 15 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会议记

录。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本卷第 465—466 页）一文中摘引了这个记录。这个记录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的冒险主义分子和宗派主义分子的斗争。从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曾不遗余力地维护同盟的团结，而同盟之所以分裂，其过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在附录中还刊载了关于救济科伦被判罪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两个呼吁书。这两个呼吁书包括了马克思代表科伦案件被判罪者救济委员会草拟的、简短的告在美国的德国工人书。这两个呼吁书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发表在美国民主派的报刊上。

*

*

*

本卷所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流亡中的大人物”没有编入全集的第一版，这篇著作于 1930 年刊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五册。“关于最近的科伦案件的最后声明”以及载于附录中的文件系第一次用俄文发表。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卡·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51年8月—1853年3月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¹

弗·恩格斯写于 1851 年 8 月—
1852 年 9 月
载于 1851 年 10 月 25 日和 28 日,
11 月 6、7、12 日和 28 日, 1852 年
2 月 27 日, 3 月 5、15、18 日和 19
日, 4 月 9、17 日和 24 日, 7 月 27
日, 8 月 19 日, 9 月 18 日, 10 月
2 日和 2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 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革命前夕的德国

革命前夕的德国

欧洲大陆革命剧的第一幕已经闭幕了。1848年大风暴以前的“过去的当权者”，又成为“现在的当权者”了。曾经一度多少受人欢迎的统治者，如临时执政者、三执政、独裁者以及尾随他们之后的成群的议员、民政委员、军事委员、地方长官、法官、将军、官佐、士兵等等，都被抛到异国，“赶到海外”，赶到英国或美国去了。他们在那里又组织起新的《in partibus infidelium》（“非现实的，在异国的”）^①政府、欧洲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国民委员会，以堂哉皇哉的文告宣布它们的成立，那些文告的庄严堂皇，并不亚于真正当权者的文告。

很难想像出还有什么失败能比欧洲大陆的革命党（更确切些说是各革命党）在全战线各个据点所遭受的失败更为惨重的了。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为了争取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英国资产阶级不是经过了四十八年、而法国资产阶级不是经过了四十年空前的斗争吗？资产阶级不正是在复辟了的帝制以为自己的地位比任何时候都巩固的时刻才最接近自己的胜利的吗？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这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

^① 直译是：“不信教国家中的”。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名义上的主教时，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

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愈来愈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所以，如果我们被打败了，我们就只有再从头干起。值得庆幸的是，在运动的第一幕闭幕之后和第二幕开幕之前，有一个大约很短的休息使我们有时间来做一件很紧要的工作：研究决定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1848年2月和3月突然爆发的运动，不是少数几个人活动的结果，而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每个国家的各个阶级对这种要求和需要的认识程度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已清楚地感觉到，——这已经是一件公认的事实。但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解释半点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就只是知道某某人不可靠这一件事，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此外，研究和说明革命震动和被镇压下去的原因，从历史的观点上说，也有极重要的意义。所有这些琐屑的个人争论和互相责备，所有这些互相矛盾的论断，说把革命之舟驶向暗礁以致使它触礁沉没的是马拉斯特，或者是赖德律—洛兰，或者是路易·勃朗，或者是临时政府的其他成员，或者是他们全体，——这一切对于远隔重洋来观察这种运动、因而不了解事件的详情细节的美国人或英国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任何一个头脑

正常的人都永远不会相信，十一个人^①（他们大多数都是庸才，既不能为大善也不能作大恶）能在三个月之内毁坏一个有三千六百万人口的民族，除非这三千六百万人辨认方向的能力和这十一个人同样缺乏。问题正在于这三千六百万原先在一定程度上暗中摸索的人怎么突然就能自己决定走什么道路，而后来他们又怎么迷了路而让他们从前的领袖暂时回到了领导地位。

因此，如果我们要向“论坛报”²的读者说明1848年德国革命所以必然发生以及它所以必然在1849年和1850年暂时遭到镇压的原因，我们就无需叙述德国发生这些事件的全部历史。将来的事变和后代的评论会判定，在这一大堆杂乱的、看来是偶然的、互不连贯而又矛盾的事实中，哪一部分将构成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解决这一任务的时候尚未到来。我们现在只限于在可能范围内加以论述，而如果我们能根据确凿的事实找出合理的原因来说明运动的主要事件和主要转折，使我们能够确定下一次、也许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的爆发将指示给德国人民的方向，那我们也就满足了。

那末，首先，革命爆发时德国处于怎样一种状况呢？

在德国，作为一切政治组织的基础的人民中的各个阶级的构成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为复杂。在英国和法国，集中在大城市，特别是集中在首都的强大富裕的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消灭了封建制度，或者至少像在英国那样，已经使它只剩下一些微不足道的残余，而德国的封建贵族却仍然保有很大一部分旧日的特权。封建土地所有制差不多到处都还居于统治地位。封建领主甚至还保有

^① 即法国临时政府的成员。——编者注

对佃户的审判权。他们虽然被剥夺了政治上的特权——对各邦君主的控制权，但他们几乎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对他们领地上的农民的那种中世纪的统治权以及不纳税的权利。封建制度在有些地区比在另一些地区更为盛行，但除了莱茵河西岸以外，它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完全被消灭。这种封建贵族在当时人数很多，一部分也很富裕，曾被公认为是国内的第一个“等级”。他们充任政府的高级官吏，军队里的军官也差不多全是他们。

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远没有英国或法国资产阶级那样富裕和集中。德国的旧式工业因蒸汽的采用和英国工业势力的迅速扩张而被摧毁了。国内其他地方所建立的、在拿破仑的大陆体系³之下开始发展起来的较为现代化的工业，既不足以补偿旧式工业的损失，也不能保证工业有足够强大的影响，以迫使那些对于非贵族的财富和力量的任何一点增强都心怀忌妒的各邦政府考虑工业的要求。法国在五十年革命和战争中胜利地经营了丝织业，而德国在这个时期却几乎完全丧失了它的旧式的麻织业。此外，德国的工业区少而分散；它们大都在内地，主要是用外国的——荷兰或比利时的——港口进行进出口贸易，所以它们与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大商港很少或毫无共同的利益；而最重要的是，它们不能建立像巴黎和里昂、伦敦和曼彻斯特那样巨大的工商业中心。造成德国工业的这种落后状态的原因很多，但是只要举出两个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第一是国家的地理位置不利，距离已经成为世界贸易要道的大西洋太远；第二是从十六世纪到现在，德国不断卷入战争，而这些战争又都是在它的国土上进行的。英国资产阶级自1688年即已享有政治统治权，法国资产阶级自1789年也已夺到了政权，但德国的资产阶级由于人数少，尤其是由于不集中，没有能够获得

这种权力。可是，自从 1815 年以来，德国资产阶级的财富不断增加，而且随着财富的增加，他们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不断增长。各邦政府虽不愿意，却也不得不至少考虑一下资产阶级的最直接的物质利益。我们甚至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各小邦宪法中给予资产阶级的每一点政治势力，在 1815—1830 年和 1832—1840 年的政治反动时期虽然都又被夺去，但资产阶级却得到了更实际的利益作为补偿。资产阶级每次政治上的失败，总是伴随着一次贸易立法上的胜利。当然，1818 年普鲁士的保护关税条例以及关税同盟的建立⁴给德国工商业者的好处要比在某一小公国的议会中对内阁阁员们表示不信任的那种不大可靠的权利大得多，他们在议会中的投票，只能使阁员们发笑而已。这样，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多和贸易的不断扩展，资产阶级很快就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发现它的最重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由于本国政治制度的妨碍而得不到满足，如国家被三十六个意图和癖好互相矛盾的君主所任意分割，封建压迫束缚着农业和与之相联系的商业；愚昧而专横的官僚统治对资产阶级的一切事务都严加监视。同时，关税同盟的扩大与巩固，交通的蒸汽化，国内市场上竞争的增长，使各邦各省的商业阶级互相接近，使它们的利益一致起来，力量集中起来了。这一情况的自然结果，就是他们全都转入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营垒中去，德国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力的第一次严重斗争获得了胜利。这个变化可以说是从 1840 年开始的，从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取得对德国资产阶级运动的领导的时候开始的。我们以后还要谈到 1840—1847 年的这个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运动。

国民的大部分是既不属于贵族，也不属于资产阶级的，他们包括城市里的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和工人，以及乡村中的农民。

在德国，由于大资本家和工业家阶级不发达，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人数很多。在较大的城市中，它几乎占居民的大多数；在较小的城市中，由于没有更富裕的竞争对手同它争夺势力，它完全居于支配地位。这个阶级在所有现代国家和现代革命运动中，都居于极重要的地位，而在德国尤其重要，在最近德国各次斗争中，它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的地位是介于较大的资本家（商人和工业家）即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或产业工人阶级之间，这种地位就决定了它的特性。它力图爬上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命运中的一点点不顺利就把这个阶级中的某些人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在封建君主制的国家里，这个阶级的生存要仰赖于宫廷和贵族的惠顾，失去这些主顾，这个阶级的大部分就要破产。在较小的城市里，守备队、地方当局、法院及其属员通常便是这个阶级繁荣的基础，没有这些，小店主、裁缝、鞋匠、木匠等就无法生存。因此，这个阶级永远摇摆在两者之间：一方面希望跻身于较富有的阶级的行列，一方面惧怕堕入无产者甚至乞丐的境地；一方面希望参加一份对公共事务的领导以保障自己的利益，一方面惟恐不合时宜地对抗行为会触怒政府，——他们的生存是操在政府手里的，因为政府可以使他们失掉最好的主顾；他们拥有的财产很少，而财产的稳固是与财产的数额成正比的，因此，这一阶级的观点是极端动摇的。它在强有力的封建或君主专制政府面前卑躬屈膝，百依百顺，但当资产阶级得势的时候，它就转到自由主义方面来；一当资产阶级获得了统治权，它就因强烈的民主主义幻想而如醉如狂，但当低于它的那个阶级——无产阶级企图展开独立的运动时，它马上就变得意气消沉，忧虑重重。我们以后将会看到，在德国，这个阶级如何在种种不同的状态中变来变去。

德国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发展比英国和法国的工人阶级落后，正像德国资产阶级比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落后一样。主人是什么样，仆人也是什么样。人数众多、强大、集中而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是与人数众多、富裕、集中而强有力的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同时发展的。在资产阶级的各个部分，尤其是其中最进步的部分即大工业家还没有获得政权并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国家以前，工人阶级运动本身就永远不会是独立的，永远不会具有纯粹无产阶级的性质。而在这以后，企业主与雇佣工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就会提到日程上来，要延缓这一冲突再也不可能了；那时，工人阶级再也不会被虚幻的希望和永不兑现的诺言所欺骗了；那时，十九世纪的重大问题——消灭无产阶级的课题，终于要十分明朗地毫无保留地提出来了。在德国，大部分雇佣工人并不是受雇于现代的工业巨头（英国的工业巨头是这个类型的最好标本），而是受雇于小手工业者，他们的全部生产制度，只是中世纪的遗迹。就像棉纺业大王与鞋匠或裁缝这些小业主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一样，繁华的现代工业中心的十分觉悟的工厂工人也根本不同于小城市里的温顺的裁缝帮工或木匠学徒，后者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方法，与五百年前很少差别。这种普遍缺乏现代生活条件、缺乏现代工业生产方法的情况，自然要伴随着差不多同样地普遍缺乏现代思想的现象；因此，无怪乎在革命刚爆发时，很大一部分工人都要求立即恢复行会和中世纪的享有特权的手工业行会了。然而，在现代生产方法占优势的工业区域的影响之下，由于交通的发达，由于许多工人迁徙不定的生活使他们的知识有了发展，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核心，这个核心关于本阶级解放的思想更加清楚得多，而且更加符合于现存的事实和历史的需要；但这些工人

只是少数。如果说资产阶级的积极运动开始于 1840 年，那末工人阶级的运动则开始于 1844 年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①的工人起义⁵。我们在下面很快就有机会来考察这一运动所经过的各个阶段。

最后，还有一个广大的小农业主阶级，农民阶级。这个阶级加上附属于它的农业工人，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但这个阶级本身又分为不同的部分。第一是富裕的农民，在德国叫做 Groß- 和 Mittelbauern (大农和中农)，这些人都拥有面积不等的大片农田，都雇用几个农业工人。对这个地位处在不纳捐税的大封建地主与小农和农业工人之间的阶级来说，最自然的政治方针当然就是同城市中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第二是小自由农，他们在莱茵省占居优势，因为这里的封建制度已经在法国大革命的有力打击之下消失了。在其他省份的某些地区也有这种独立的小农存在，在这些地方，他们赎买了从前加在他们土地上的封建义务。可是这个阶级只是名义上的自由的所有者阶级，他们的财产大都在极苛刻的条件之下抵押出去了，以致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并不是农民，而是放债的高利贷者。第三是封建佃农，他们不容易被赶出所租的土地，但他们必须永远向地主交租，或永远为地主服一定的劳役。最后是农业工人，在许多大农场中，他们的生活状况和英国这个阶级的状况完全一样，他们由生到死都是处在贫穷饥饿之中，作他们雇主的奴隶。农民中后面这三个阶级——小自由农、封建佃农和农业工人，在革命以前是从来不怎么关心政治的，但这次革命显然已经为他们开辟了一个充满光辉灿烂的前景的新的天地。革命对他们每个阶级都有利，因此可以预料，一旦运动全面展开，他

^① 即捷克。——编者注

们就会一个跟着一个参加进来。但同时，农村居民由于分散于广大地区，由于极难达到大多数意见的一致，所以他们永远不能胜利地从事独立的运动，这一点也同样是十分明显而为各个现代国家的历史所证实了的。他们需要更集中、更开化、更活动的城市居民的引导和推动。

上面对最近这次运动爆发时构成德国民族的各个最重要的阶级的概述，已经足以说明这次运动中普遍存在的不一致、不协调和显然的矛盾的大部分了。当这些如此各不相同、如此互相矛盾而又如此奇异地互相错综起来的利益发生剧烈冲突的时候，当各区各省的这些互相冲突的利益以各种不同的比例混合起来的时候，尤其重要的是，当德国没有伦敦或巴黎那样一个大的中心的时候（这种城市的各项权威性的决定，可以避免每一个地区每一次都要用斗争来重新解决同一的争论），除了斗争被分解成许多不相联系的格斗，因而耗费大量的鲜血、精力和资本而仍然得不到任何有决定意义的结果而外，还能希望得到什么呢？

德国在政治上分解成三十六个大大小小的邦，也同样要用组成这个国家、但在每个地方又各有特点的各种成分的混乱与复杂来解释。没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统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了。不错，德意志联邦曾宣称是永远不可分割的，但联邦和它的代表机关联邦议会⁶，却从来没有代表过德国的统一。德国中央集权所达到的最高点，是关税同盟的成立。北海一带的各邦也曾经因此不得不组成它们自己的关税组织⁷，而奥地利却仍然关起门来实行它自己单独的寓禁关税。这样，德国可以满意了，因为它为了自己的实际目的现在仅仅分成三个独立的大国，而不是三十六个邦。当然，1814年建立起来的俄国沙皇的无上权威，并没有

因此而有所变动。

根据我们的前提得出这些初步结论之后，下一篇文章里我们就要谈到德国人民的上述的各个阶级怎样一个跟着一个参加了运动，以及这个运动在 1848 年法国革命爆发后所具有的性质。

1851 年 9 月于伦敦

二 普鲁士邦

德国中等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从 1840 年开始。在这以前，已经有许多征象表明，这个国家的拥有资本和工业的阶级已经成熟到这样一种程度，它再不能在半封建半官僚的君主专制的压迫下继续消极忍耐了。较小的德国封建君主们，都相继向自己的臣民恩赐了或多或少带有自由主义性质的宪法，这部分地是为了保证他们自己有更大的独立以对抗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霸权，或对抗他们自己邦内贵族的势力，部分地是为了把由于维也纳会议⁸，而统一在他们治下的各个分散的地区团结成一个整体。这样做对他们自己是毫不危险的，因为，如果联邦议会——它只是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傀儡——要侵犯他们作为主权君主的独立性，他们知道，在反抗议会的命令时舆论和本邦议会会作他们的后盾；反之，如果这些邦议会的势力太大时，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运用联邦议会的权力击败一切反对派。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巴登或汉诺威的宪法制度，在这种情形下并不能推动争取政治权力的严重斗争；因此德国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对于各小邦立法议会中的琐碎的争端，一般是不加过问的，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德国两个大邦的政治和国家制度没有根本改变，任何次要的努力和胜利都是没有用处的。但同时，在这些小邦议会中却生长出一大群自由主义的律师和职业的反对派；罗泰克、韦尔凯尔、勒麦、约丹、施梯维、艾森曼

等等这类大“名人”(Volksmänner),在做了二十年喧嚷的然而总是毫无成效的反对派之后,被1848年的革命浪潮推上了权力的顶峰,而后来,他们暴露了自己的极端无能和微不足道,顷刻之间又被推翻了。这是第一批德国土产的职业政客和反对派的标本;他们用演说和文章使德国人耳熟了立宪主义的词句,并用他们的存在本身预示着这样一个时刻即将到来,那时,资产阶级将利用这些夸夸其谈的律师和教授们所惯用然而却不了解其真实含义的政治词句,并赋予它们以真正的意义。

1830年的事件⁹把整个欧洲投进了政治骚动中,德国文学也受到这种骚动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大谈其不成熟的立宪主义或更加不成熟的共和主义。在这批人中间,特别是在低等文人中间,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他们用一些能够引起公众注意的政治暗喻来弥补他们作品中才华的不足。在诗歌、小说、评论、戏剧中,在一切文学作品中,都充满所谓的“倾向”,即反政府情绪的畏首畏尾的流露。为了使1830年后在德国盛行的思想混乱达到顶点,这些政治上的反对派便同大学里没有经过很好的消化的对德国哲学的记忆以及被曲解了的法国社会主义、尤其是圣西门主义的只言片语掺混在一起;这一群散布这些杂乱思想的作家,傲慢不逊地自称为“青年德意志”或“现代派”¹⁰。后来他们曾追悔这种青年时代的罪过,但他们的文风却丝毫未见改善。

最后,当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¹¹一书中宣称君主立宪是最高的、最完善的政体时,德国哲学这个表明德国思想发展的最复杂但也最准确的指标,也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换句话说,黑格尔宣布了德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刻即将到来。他死后,他的学派没有停止在这一点上。他的门徒中最激进的一部分,一方面对一切

宗教信仰给予严酷的批评,使基督教的古老建筑根本动摇,同时又提出了德国人从未听到过的大胆的政治原则,并且企图恢复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的已故的英雄们的应有的荣誉。用来表达这些思想的晦涩的哲学语言,把作者和读者都弄得昏头昏脑,同时它也把检查官的眼睛蒙蔽了,因此“青年黑格尔派”的作家便享有其他任何一个学术部门都不能享有的出版自由。

这就是说,德国的舆论界显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些即使是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也因教育和生活状况而能够得到一些政治知识并形成某种独立政治信念的阶级中的大多数,渐渐地联合成一个反对现存制度的强大集团。在批评德国政治进步迟缓时,任何人都不应该不看到:在德国要得到对任何问题的正确认识都是困难的。在这里,一切知识的来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从贫民学校、主日学以至报纸和大学,没有官方的事先许可,什么也不能说,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发表。就以维也纳为例,维也纳居民在从事劳动和经营工业生产的能力方面在全德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论智慧、勇敢和革命魄力,他们更是远远超过别人,但他们对于自身的真正利益,却比别人更为无知,他们在革命中犯的错误也比别人更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对于最普遍的政治问题也几乎一无所知,而这乃是梅特涅政府愚民政策的成果。

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不用再解释也很清楚,政治知识为什么几乎完全被社会中那些有钱私运政治知识到国内来的阶级,尤其是利益最受现存制度侵害的阶级——工商业阶级所一手垄断了。因此,这些阶级首先联合起来反对继续保持在不同程度上伪装起来的专制政体,而他们进入反对派队伍的时刻,应该看做德国的真正革命运动的开始。

德国资产阶级宣告反对政府，可以说是从 1840 年、即从前普鲁士国王^①——1815 年神圣同盟创始者中寿命最长的一个——去世时开始的。大家知道，新王不赞成他父亲的那种主要是官僚军阀性质的专制政体。法国资产阶级在路易十六即位时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德国的资产阶级也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从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手中得到。大家一致认为旧制度已经腐朽、衰败了，应该摈弃了；老王在位时人们沉默地加以忍受的一切，现在都被大声疾呼地宣布为不能容忍的事情了。

可是，如果说路易十六——“被渴望的路易”是一个平庸的无野心的蠢才，多少自觉到自己的无能，没有一定的主见，主要是依靠受教育时取得的成规来维持统治，那末“被渴望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却完全是另一种人物。他的性格确实比路易十六更加软弱，但他却有自己的抱负、自己的见解。他涉猎了大多数科学的基本知识，因此便自以为具有足够的学识，可以对一切问题作出最正确的判断。他深信自己是第一流的演说家，在柏林没有一个商品推销员能比他更擅于卖弄聪明，更擅于辞令。而最重要的是，他有自己的主见。他憎恨而且轻视普鲁士专制政体的官僚主义，但这只是因为他的同情都属于封建主义。作为所谓历史学派（该派所信奉的是博纳德、德·梅斯特尔及其他属于第一代法兰西正统派的作家们的思想）的“柏林政治周刊”¹²的创办人和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力图尽可能充分地恢复贵族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国王是他治域中的第一个大贵族；环绕着他的首先是一班显赫的朝臣——有权势的枢密近臣、王公侯伯，其次是许多较低级的富裕贵族。他按照

^① 即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

自己的意旨统治他那些忠顺的市民和农民，作为社会各等级或阶级的无上的主宰。而各个等级或阶级都有各自的特权，它们彼此之间应该用门第的或固定不变的社会地位的几乎不可逾越的壁垒分隔开来；同时，所有这些阶级或“王国的各等级”都应该在权势方面恰好达到互相平衡，使国王能保持充分的行动自由。这就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过去准备实现而现在又在努力实现的 beau idéal (美好理想)。

不很了解理论问题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才看出了国王的真正意图。但是，国王所一心要做的和他们所需要的恰恰相反，这个事实他们却很快就看出来。新王的“辩才”刚刚因他父亲之死而得到解放，他使用无数的演说宣布他的意图；而他的每次演说、每一行动，都使他更加失掉资产阶级对他的同情。如果不是一些严酷而惊人的现实打断了他的美梦，对这种情形他还会不大在意的。可惜，浪漫主义是不很会打算盘的，而封建主义自唐·吉诃德时代起就总是失算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对于轻视金钱这种十字军后裔的最高贵的传统是承袭得太多了。在他即位时，政府组织虽然已经相当节约，但用费依然浩繁，而国库已经不太充裕。过了两年，一切节余都在朝廷宴会，国王巡狩，以及对贫困、破落而贪婪的贵族的赐赠资助等等上面用光了，正常的税收已不够宫廷和政府的开支了。于是，国王陛下很快就遭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和 1820 年法令的夹攻；1820 年的法令规定，如不得“将来的人民代议机关”的许可，任何新的公债或增税都是非法的。而这时还没有这种人民代议机关；新王甚至比他父亲更不愿意建立它；而即使他愿意建立的话，那他也不能不知道，自他即位以来，舆论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的确，资产阶级曾经一度期望新王会立刻颁布宪法，宣布出版自由，成立陪审法庭等等，总之，期望国王自己发起资产阶级获取政治权力所需要的和平革命，现在他们发觉自己错了，于是便对国王发动猛烈的攻击。在莱茵省（全普鲁士各地在不同程度上也是这样），资产阶级的不满情绪如此强烈，他们由于本身缺乏能够在报刊上代表他们意见的人才，竟同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一极端的哲学派别结成了联盟。在科伦出版的“莱茵报”¹³，便是这个联盟的果实。这个报纸虽然出版了十五个月就被查封，但可以说它是德国现代期刊的先声。这是 1842 年的事。

可怜的国王在经济上的困难，是对他那些中世纪嗜好的最尖锐的讽刺；他很快就看出，如果不向“人民代议机关”（它作为 1813 年和 1815 年那些早被遗忘的诺言的最后一点遗迹体现在 1820 年的法令中）这种普遍要求作些小小的让步，他便不能继续统治下去了。国王觉得实施这个讨厌的法令的较好的方法，是把各省议会的常任委员会召集在一起开会。各省议会是 1823 年成立的。普鲁士王国八个省的省议会的成员是：（1）上层贵族，前德意志帝国的各个皇族，它们的首脑是等级会议的当然成员；（2）骑士或下层贵族的代表；（3）城市的代表；（4）农民或小农业主阶级的代表。各个省议会都是这样组织的：在每个省议会里总是以两部分贵族占大多数。八个省的省议会都选一个委员会，现在这八个委员会都被召到柏林，以便组成一个代表会议来投票决定发行国王所渴望的公债。据说国库是充裕的，发行公债不是为了当前的需要，而是为了建筑一条国有铁路。但联合起来的委员会断然拒绝了国王的要求，声言它们不能行使人民代议机关的职权，并要求国王陛下履行他父亲在需要人民帮助反对拿破仑时许下的诺言——

实行代议制。

联合起来的委员会的会议表明, 怀有反政府情绪的已不只是资产阶级了。一部分农民已经站到资产阶级方面来; 许多贵族也宣布反对政府, 赞成代议制的要求, 因为他们本身就在自己的田庄上经营大农场, 并且买卖谷物、羊毛、酒精和亚麻, 所以也同样需要获得反对专制政体、反对官僚制度、反对封建制度复辟的保障。国王的计划完全破产了; 他不仅没有得到一文钱, 反而增加了反政府的力量。此后接着召开的各省议会会议, 更加不利于国王。所有省议会都要求改革, 要求履行 1813 年和 1815 年的诺言, 要求宪法和出版自由; 有些议会的决议措词颇为不恭, 国王在激愤之下所作的答复, 使事态更加恶化。

同时, 政府的财政困难日渐增加。有一个时期由于缩减对政府各部门的拨款, 由于通过《Seehandlung》¹⁴ (它是一个拿国家作赌注进行投机的商业机关, 很早以来就充当着国家的财政经纪人) 进行欺诈交易, 曾经维持了表面上的支付能力; 增发国家纸币也起了一些作用; 整个地说, 财政状况的秘密保守得颇为紧严。然而所有这些计谋很快就显得不够用了。于是又试行另一个计划: 设立一个银行, 其资本部分出自国家, 部分出自私人股东, 主要的管理权属于国家, 也就是说, 使政府能够大量取用这个银行的资金, 从而继续进行已经不能再通过《Seehandlung》进行的欺诈交易。但是, 很自然, 没有一个资本家愿意在这种条件下投资; 于是银行的章程必须改变, 必须保证股东的财产不受国库的侵犯, 然后才会有人认股。而当这个计划也失败之后, 除了发行公债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当然, 这就需要找到一批资本家, 他们不要求那个神秘的“将来的人民代议机关”的允许和保证就愿意出借他们的现款。于是求助

于路特希尔德,但他说,如果公债有“人民代议机关”作保,他马上就认购,否则,他就根本不打算谈这件事。

这样,一切弄钱的希望都破灭了,想避开命中注定的“人民代议机关”已经不可能了。路特希尔德拒绝贷款是 1846 年秋天的事,次年 2 月国王就把八个省议会召集到柏林,把它们组成一个统一的“联合议会”。这个议会的任务,就是完成 1820 年的法令在需要的情况下所要求做的“工作”,即表决公债和增税,此外它不应该有任何权利。它对总的立法方面的意见,只是谏议性的;它开会无定期,国王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政府喜欢让它讨论什么问题它就讨论什么问题。当然,议员们很不满足于扮演这种角色。他们一再重申他们在各省议会中提出的愿望;他们和政府的关系很快就恶化起来,而当要求他们通过发行公债(仍然说是用来建筑铁路)时,他们又一次加以拒绝。

这个表决使会议很快就结束了。愈来愈愤怒的国王解散了议会,并对议员们严加申斥;但钱还是没有到手。的确,国王是有充分理由为他的处境感到惊慌不安的,因为他看到以资产阶级为首并且把相当大一部分下层贵族和蕴积在各个下层等级中的各种各样的不满分子包括在内的自由派,决心要获得它所要求的東西。国王在联合议会开幕时的演说中宣称,他永远不会赐给现代意义的宪法,但这话等于白说;自由派坚持要求的正是现代的、反封建的代议制宪法及其一切成果——出版自由、陪审法庭等等;在他们未得到这种宪法以前,他们是分文不出的。事情很明显,不能这样长久继续下去,必须有一方让步,否则就一定要发生破裂和流血斗争。资产阶级知道它正处在革命的前夜,而且已准备进行革命。它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争取城市中工人阶级和农村中农民的支持。大

家知道, 1847 年末, 在资产阶级中间是很难找到一个出名的政治人物不冒充“社会主义者”以取得无产阶级的同情的。下面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些“社会主义者”的实际行动了。

先进的资产阶级所以急于要给自己的运动至少在表面上披上一件社会主义的外衣, 是因为德国工人阶级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从 1840 年起, 一部分曾到过法国和瑞士的德国工人多少都受到了一些当时法国工人中间流行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想的熏染。1840 年以后, 这些思想在法国愈来愈引人注目, 这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德国也成了时髦的东西, 而且从 1843 年起, 所有的报纸都絮絮不休地讨论起社会问题来了。德国很快就出现了社会主义学派, 这一学派的特点与其说是思想新颖不如说是思想含混。它的主要工作是把傅立叶派、圣西门派和其他派别的学说, 从法语翻译成晦涩的德国哲学¹⁵的语言。与这一学派完全不同的德国共产主义学派, 大致也在这个时候形成了。

1844 年发生了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 接着又发生了布拉格印花工厂工人的起义。这些被残酷镇压下去的起义, 这些不是反对政府而是反对企业主的工人起义,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进一步推动了在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饥荒的 1847 年的粮食暴动也促进了这种宣传。简单地说, 正像大部分有产阶级(大封建地主除外)团结在立宪反对派的旗帜周围一样, 大城市的工人阶级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当作自己解放的手段, 虽然在当时的出版法之下, 关于这些学说他们能够知道的只是很少一点。当时也不能希望他们对于自身的需要已经有很明确的了解; 他们只知道: 立宪派资产阶级的纲领不包含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他们的需要决不局限在立宪思想的范围之内。

当时德国没有独立的共和党。德国人不是君主立宪派，就是或多或少地比较明确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由于这些因素，最小的冲突也要引起严重的革命。当时只有上层贵族和上层文武官员是现存制度的唯一可靠的支柱；下层贵族、工商业资产阶级、各大学、各级学校的教员甚至一部分下层文武官员都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在这些人后面还有心怀不满的农民群众和大城市的无产阶级群众，他们虽然暂时赞助自由主义反对派，但已在以异常的方式议论着要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资产阶级准备推翻政府，无产阶级则准备随后再推翻资产阶级，而就在这样的時候，政府却顽固地沿着那条必然要引起冲突的道路走去。1848年初，德国已处在革命的前夜，即使没有法国二月革命的促进，这次革命也是一定要爆发的。

这个巴黎革命对于德国影响如何，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谈到。

1851年9月于伦敦

三 德国其他各邦

在前一篇文章中，我们几乎仅仅限于谈到 1840 年至 1848 年间在德国的运动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的一邦，即普鲁士邦。现在我们则应该略微考察一下同一时期德国的其他各邦。

自从 1830 年革命运动以后，各小邦完全处于联邦议会的独裁之下，也就是外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独裁之下。各邦的宪法一方面是用来抵御大邦的专横霸道，一方面是为创制宪法的君主们在群众中树立声望并把由维也纳会谈不依任何指导原则建立的特色各样的省议会统一起来。这些宪法虽然虚有其名，但在 1830 年和 1831 年的风暴时期，对各小邦君主的权力仍然是一种危险。所以它们几乎全部被废除，侥幸保存下来的则更加有名无实，只有像韦尔凯尔、罗泰克和达尔曼这帮絮絮不休的自我陶醉的人才会设想，他们在这些小邦的无力的议会里被允许表明的那种掺和着可耻的谄媚的、不值钱的反对立场，能够获得什么结果。

这些小邦里比较坚决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1840 年后很快就完全放弃了他们从前希望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这些附属小邦里发展议会制度的一切想法。当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和同它联合起来的各阶级郑重表示决心要为在普鲁士实行议会制度而斗争时，他们便立即被公认为除奥地利以外的全德国的立宪运动的领袖。现在，这已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中部德国那些后来退出法兰克福国

民议会并因他们召开单独会议的地点而被称作哥达派的立宪主义核心分子，在 1848 年以前很久就讨论过一个计划，后来，在 1849 年，他们把这个计划略加修改就提交给全德国的代表。他们力图把奥地利完全排除于德意志联邦之外，建立一个在普鲁士保护之下的新的联邦，制定新的宪法，成立新的联邦议会，把小邦归并于大邦。只要普鲁士一实现君主立宪，实行出版自由，采取不依赖俄国和奥地利的独立政策，因而使各小邦的立宪派能够真正控制各该邦的政府，上述一切便可以实现。这个计划的发明者是海得尔堡（巴登邦）的盖尔温努斯教授。这样一来，普鲁士资产阶级的解放，就预示着全德国资产阶级的解放，预示着一个对抗俄国和对抗奥地利的攻守同盟的建立，因为奥地利被看作一个十分野蛮的国家（这点我们下面就要谈到），人们对它很少了解，而所知道的一点，也不是奥地利人的什么光彩的事。因此，当时奥地利不被看作是德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各小邦里的其他社会阶级，它们都或快或慢地尾随着他们普鲁士的弟兄。小资产阶级越来越不满意他们的政府，不满意加重捐税，不满意剥夺他们那些虚幻的政治权利（他们在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专制的奴隶”相比时，是常常以这些权利自夸的）。但从他们的反对立场中，还看不出什么明确的、与大资产阶级的立宪主义不同而足以使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党派的东西。农民中间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但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这一部分人民在平静的时期，从不会提出自身的利益，不想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除非在已经实行普选制的国家。城市工业企业中的工人，已感染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毒素”。但是在除普鲁士以外的别的地方，重要城市很少，工业区更少，所以，由于缺乏活动和宣传的中心，这个阶

级的运动在各小邦是发展得极为缓慢的。

政治反对派所遇到的种种障碍，在普鲁士和各小邦都促成了宗教上的反对派，例如平行地进行活动的德国天主教和自由公理会¹⁶。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例子，说明在那些享受国教的祝福而政治问题的讨论却受到束缚的国家里，冒险的反对世俗权力的凡俗反对派，常常隐藏在更加神圣的、看来更加无意于世俗利益而一意反对精神专制的斗争后面。很多政府不许对自己的任何行动进行讨论，但它们却不敢贸然制造殉教事件和激起群众的宗教狂热。1845年，在德国的每一邦里，或者是旧罗马天主教，或者是新教，或者是两者同时，被视为该邦国家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每一邦，这两个教派中的任何一派的或所有两派的教士，都是官僚政府制度的重要因素。因此，攻击天主教或新教正统，攻击教士，就等于变相攻击政府本身。至于德国天主教派，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对德国各天主教政府的攻击，尤其是对奥地利和巴伐利亚政府的攻击；而这些政府也正是这样理解这一点的。自由公理会的信徒，反对国教的新教徒，有点像是英国和美国的一神论派¹⁷他们公开宣称反对普鲁士国王和他的宠臣、宗教和教育事务大臣艾希霍恩那种教权主义和严格的正统主义的倾向。两个新教派都曾一度得到迅速的发展，前一派发展于旧教国家，后一派发展于新教国家。它们除了起源不同而外，没有别的区别；至于教义，两派在最重要的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都认为一切已确定的教条是没有根据的。这种不确定性便是它们的真正实质。它们自称要建筑一个伟大的神殿，使所有德国人都能在这神殿的屋顶下联合起来；这样它们就用宗教的形式表达了另一种当前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思想，即统一德国的思想。可是它们自己中间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取得

一致。

上述这些教派企图发明一种适合于所有德国人的需要、习惯和趣味的特制的共同宗教以实现(至少是在宗教方面)德国的统一的这种思想的确传布很广,尤其是在各小邦中。自从德意志帝国被拿破仑灭亡¹⁸以后,要求将德国的一切 *disjecta membra* (分散的成员)联合起来的呼声,已成为对于现状不满的最普遍的表示,在各小邦尤其是这样,因为在小邦里维持宫廷、行政机关、军队等等的巨大开支,——简言之,沉重的捐税负担,——与各该邦的微小和贫弱成正比地增加着。但是,如果德国的统一得到实现的话,那末这种统一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在这一点上各党派的想法是有分歧的。不愿有严重革命震动的资产阶级,满足于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他们认为“切实可行的”东西,即要求在普鲁士立宪政府的领导下建立除奥地利之外的全德联盟。当然,既然要避免危险的风暴,当时实在也只能到此为止了。至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如果说农民也愿意过问这类事情的话),他们从来没有能够对他们后来所大声疾呼地要求的德国统一有任何明确的观念;少数的梦想家(多半是封建的反动派)希望恢复德意志帝国;一些无知的 *Soi-disant* (所谓的)激进派崇拜瑞士的政制(他们当时还没有实际了解这种政制,后来了解以后他们才十分滑稽地大失所望),主张建立联邦共和国;只有最极端的党派敢于在当时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¹⁹。这样看来,德国统一问题本身就孕育着分歧、争执,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孕育着内战。

我们可以对 1847 年末普鲁士和德国其他小邦的情况作如下的总结。资产阶级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它决定不再忍受封建官僚专制制度用来束缚他们的商业事务、工业活动和他们作为一

个阶级而进行的共同行动的枷锁；一部分农村贵族变成了只是拿到市场上出售的产品的生产者，他们由于同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同而与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很不满意，他们埋怨捐税，埋怨加于他们营业上的种种障碍，但是并没有明确的、足以保障他们在社会和国家中的地位的改革方案；农民在一些地方饱受封建的苛捐杂税的盘剥，在另一些地方则备受放债人、高利贷者和律师们的压迫；城市工人普遍不满，他们对政府和大工业资本家同样憎恨，并且深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感染。总之，反对政府的群众是由各种各样的成分组成的，它们的利益各不相同，但整个说来是受资产阶级领导，而走在资产阶级最前列的又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尤其是莱茵省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各邦政府在许多问题上不一致，彼此互不信任，尤其不信任普鲁士政府，虽然它们不得不依靠它的保护。在普鲁士，政府已遭到舆论的唾弃，甚至遭到一部分贵族的唾弃，它所依赖的军队和官僚也一天比一天更多地感染了反对政府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愈来愈受他们的影响；除了这一切之外，这个政府又确实是一文不名，除了乞求资产阶级反对派，便不能得到一分钱去弥补日渐增多的亏空。有哪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在反对现存的政府、夺取政权时曾经处于比这更有利的地位呢？

1851年9月于伦敦

四 奥 地 利

我们现在应该来看看奥地利,这个国家在 1848 年 3 月以前之不为外国人所了解,差不多正像最近同英国作战以前的中国²⁰一样。

当然,我们这里只能研究奥地利的德意志部分。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奥地利人,不属于本题范围;至于 1848 年后他们对奥地利德意志人的命运的影响,我们将在以后来谈。

梅特涅公爵的政府所遵循的两个方针是:第一,使奥地利治下的各民族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受到所有其他处于同样境地的民族的牵制;第二(这是一切君主专制的基本原则),依靠封建地主和金融巨头这两个阶级,同时使这两个阶级的权势和力量互相平衡,以便政府保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以各种封建收益作为全部收入的土地贵族,不能不支持政府,因为政府是他们对付被压迫的农奴阶级(他们靠掠夺这些农奴为生)的唯一靠山。而每当他们之中较不富裕的一部分起来反对政府的时候(例如 1846 年加里西亚的情形),梅特涅立刻就纵使这些农奴去反抗他们,因为这些农奴总是力图抓住机会来狠狠地报复他们的直接压迫者的²¹。另一方面,交易所的大资本家由于大量投资于公债,也受到梅特涅政府的束缚。奥地利在 1815 年恢复了它的全部实力,1820 年后又在意大利恢复和维持了君主专制,1810 年的破产又免除了它的一部分债务,所

以，在媾和之后，它很快就在欧洲各大金融市场重新建立了信用；而信用愈是增长，它也就愈是加紧利用这种信用。于是，欧洲的一切金融巨头都把他们的很大一部分资本投于奥地利的公债。他们全都需要维持奥地利的信用，而要维持奥地利的国家信用又总是需要新的借款，于是他们便不得不时常增加新的贷款，以维持他们过去已经投资的债券的信用。1815年以后的长期和平，以及表面上看来奥地利这样一个千年帝国不可能倾复的假象，使梅特涅政府的信用惊人地增长，甚至使它可以不依赖维也纳的银行家和证券投机商了；因为只要梅特涅还能够在法兰克福和阿姆斯特丹得到足够的资金，他当然就能心满意足地看着奥地利的资本家们在他的脚下俯首听命。而且，他们在其他方面也仰承他的鼻息。银行家、证券投机商、公用事业承包商虽然能够经常从君主专制获得大宗利润，但这是以政府对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具有几乎是无限的支配权作为交换条件的。因此，他们丝毫也不会反对政府。这样，梅特涅便有把握能够获得帝国中最有力量和最有权势的两个阶级的支持，此外他还拥有军队和官僚机构，它们组织得非常适合于为专制政府服务。奥地利的文武官员自成一个门第；他们的父辈是为奥皇服役的，他们的子孙也要如此。他们不属于那在双头鹰的羽翼下联合起来的许多民族中的任何一族；他们经常从帝国的一端迁移到另一端，从波兰到意大利，从德意志地区到特兰西瓦尼亚。他们对匈牙利人、波兰人、德意志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克罗地亚人，对一切没有“皇室贵胄”标记而具有某一民族特性的人同样轻视；他们没有民族性，或者更确切些说，正是他们构成了真正的奥地利民族。很明显，这样一个文武官员的特殊等级，在一个有才智有能力的统治者手里会是怎样一种驯顺而有力的工具。

至于居民中的其他阶级，梅特涅按照真正的 *ancien régime* (旧式) 政治家的精神，不大重视他们的支持。他对待他们只有一个政策：利用赋税从他们身上尽可能榨取更多的金钱，同时使他们保持平静。工商业资产阶级在奥地利发展很慢。多瑙河流域的商业比较不重要；奥国仅有的里雅斯特一个港埠，而这个港埠的贸易也十分有限。至于工业家，他们则利用了广泛实行的保护关税制度，这一制度在大多数场合甚至完全消除了外国的竞争；但他们所以被给予这种便利，主要是为了增加他们纳税的能力；而由于国内对工业的限制，由于行会和其他封建社团（在不妨碍政府实现它的目的和意图的情况下，它们是受到周密的保护的）的特权，这种便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抵销了。小手工业者被限制在这些中世纪行会的狭窄范围里，这种狭隘的界限使各个行业彼此不断地为争夺特权而斗争，同时它使工人阶级的各个成员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使这些强制性的联合体的构成具有一种世袭式的固定的性质。最后，农民和工人只是被当作征税的对象；他们所得到的唯一的关心，就是要尽可能使他们保持他们当时和以前他们父辈所赖以维生的那些条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切旧的、既存的、世袭的权力，都像国家的权力一样受到保护；地主对小封建佃农的权力，厂主对工厂工人的权力，手工业师傅对帮工和学徒的权力，父亲对儿子的权力，到处都受到政府的严密的保护，凡有不服从的，都像触犯法律一样，要受到奥地利司法的万能工具——笞杖的惩罚。

最后，为了把这些造成人为的安定的企图结成一个普遍的体系，给予人民的精神食粮也都经过最审慎周密的选择，而且极其吝啬。教育到处都掌握在天主教教士手里，而教士的首脑们像大封

建地主一样，是迫切需要保存现有制度的。大学都办成这个样子：它最多只能造就在种种专门知识部门可能获得比较高深造诣的专家，但无论如何不能给予在别的大学里可望受到的那种全面的自由的教育。除了匈牙利，根本没有报刊，而匈牙利的报纸在帝国一切其他地方都是违禁品。至于一般的著述，一百年以来它的发行范围不但毫未扩大，自约瑟夫二世死后反倒缩减了。在所有奥地利与文明国家接壤的地方，除了税关官员的警戒线，还有书报检查官的警戒线；不经过两次三番的详细审查，不查明它们丝毫没有沾染时代的恶毒精神，这些检查官是决不让任何一本外来书籍和报纸进入奥地利国境的。

在 1815 年后的将近三十年中，这种制度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奥地利几乎完全不为欧洲所了解，而欧洲也同样不为奥地利所了解。无论是国民各阶级的社会状况还是整个民族的状况，似乎都没有丝毫变化。不管阶级与阶级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怨仇（这种怨仇正是梅特涅统治的一个主要条件，他甚至有意加深这种怨仇，把较高的阶级作为政府一切横征暴敛的工具，使他们受到憎恶），不管人民对国家下级官吏有怎样的憎恨，但整个说来，他们对于中央政府是没有不满或很少不满的。皇帝受到崇拜，而事实似乎也证实了老弗兰茨一世的话，——他曾经怀疑这种制度能否持久，但他接着就安慰自己说：“在我和梅特涅在世的时候，它总还可以维持下去的。”

但是国内有一种徐缓的、表面上看不见的运动在进行，它使梅特涅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财富和势力都增加了。工业中采用机器和蒸汽，使奥地利（也像所有别的地方一样）社会各阶级的一切旧有关系和生活条件发生了变革；它把农奴变成

了自由民，把小土地占有者变成了工业工人；它摧毁了旧有的封建手工业行会，摧毁了许多这种行会的生存手段。新的工商业者与旧的封建机构到生发生冲突。因营业关系一天天更多旅行于外国的资产阶级，把帝国关税壁垒以外的各文明国家的神话般的情况带回国内；最后，铁路的建设加速了国内工业和精神的发展。此外，在奥地利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一个危险的部分存在，这就是匈牙利的封建宪法、议会辩论以及反政府的大批破落贵族对政府及其同盟者豪绅显贵们进行的斗争。匈牙利的议会所在地普勒斯堡^①与维也纳近在咫尺。这一切因素都促使城市资产阶级产生一种情绪，——即使不是真正反政府的情绪（因为反政府还不可能），也是一种不满情绪，一种普遍要求改革（主要是行政上的改革，不是立宪性质的改革）的情绪。也如在普鲁士一样，在这里一部分官僚与资产阶级联合了起来。在这个世袭的官吏阶层中间，约瑟夫二世的传统还没有被遗忘；政府中较开通的官员，他们自己有时也幻想各种可能的改革，如果在约瑟夫二世的进步开明的专制与梅特涅的“世袭的”专制之间决定取舍，他们是坚决选取前者的。一部分较穷的贵族也赞助资产阶级，至于国民中一向有充分理由对上层阶级不满（虽然不是直接对政府不满）的较低的阶级，他们在大多数场合是不会不赞助资产阶级的改革要求的。

大约正是在这个时候，即 1843 年或 1844 年，在德国创立了一个反映这些变化的特殊的著述部门。少数奥地利的作家、小说家、文艺批评家、蹩脚诗人——他们的才能都很平常，但都有天赋的、犹太人所特有的那种勤奋——，在莱比锡以及奥地利以外的其他

^① 斯拉夫称作：布拉的斯拉发。——编者注

德国城市落脚下来，在这些梅特涅的势力所不及的地方出版了一些论述奥地利事务的书籍和小册子。他们和他们的出版家的这桩生意大为“兴隆”。全德国都急于想了解这个“欧洲的中国”的政策秘密；奥地利人更加好奇，由于波希米亚^①边境上的大批的走私，他们也获得了这些出版物。当然，这些书中所宣泄的秘密是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的，它们的善意的作者所提供的改革计划非常天真，可以说在政治上十分纯朴。他们认为宪法和出版自由在奥地利是难以得到的东西。实行行政改革，扩大省议会权限，允许外国书报入境，稍稍放松书报检查制度，——这些忠君守法的善良的奥地利人的谦恭的要求，不过如此而已。

无论如何，要阻止奥地利与德国其他部分以及经过德国与全世界的文化交流，愈来愈成为不可能了，这种情况大大促进了反政府的舆论的发展。因此，部分奥地利人也得到了一些政治知识。于是在 1847 年末，当时盛行于全德国的政治的和政治宗教的鼓动也波及到奥地利，虽然在程度上较弱。这种鼓动在奥地利进行得较为沉寂，但它仍然找到了足以供它发生作用的革命因素。这些因素是：被封建地主或政府的横征暴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农民、农奴或封建佃农；在警察的棍棒下被迫在厂主随意规定的任何条件下做工的工厂工人；被行会条例剥夺了在自己的部门取得独立地位的任何希望的手工业帮工；在经营中处处碰到不合理的限制的商人；不断与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特权的手工业行会发生冲突、或不断与贪婪而多事的官吏发生冲突的厂主；与无知而专横的教士或愚蠢而跋扈的官员进行徒劳无益的斗争的教师、学者和有教

^① 即捷克。——编者注

养的职员。总之,没有一个阶级是满意的,因为政府有时不得不作的一些小小让步,并不由它自己出资(那样国库是负担不了的),而是靠上层贵族和教士出资进行。至于大银行家和国家证券持有人,那末意大利最近的事变、匈牙利议会中反对派的强大、以及波及整个帝国的异常的不满情绪和要求改革的呼声,自然是丝毫也不会加强他们对奥地利帝国的巩固与支付能力的信心的。

这样,奥地利也在缓慢地但确实地走向伟大的转变,而这时法国忽然爆发了事变,这个事变使逼近的暴风雨立刻倾降下来,驳倒了老弗兰茨关于大厦在他和梅特涅在世的时候还可以维持下去的断语。

1851年9月于伦敦

五 维也纳起义

1848年2月24日,路易—菲力浦被赶出巴黎,法兰西共和国宣告成立。紧接着,在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摧毁了梅特涅公爵的政权,使他可耻地逃亡国外。3月18日,柏林人民举行武装起义,经过十八小时顽强的战斗之后,满意地看到国王向他们求饶乞降。同时,在德国各小邦的首都也都爆发了猛烈程度不同但全都得到同样的胜利的骚动。如果说德国人民没有能够完成他们第一次革命,那末至少他们是真正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们不能在这里详细考察这许多次起义都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只想阐明这些起义的性质以及各个阶级对这些起义所采取的立场。

维也纳的革命可以说几乎是全体居民一致完成的。资产阶级(银行家和证券投机商除外),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工人,所有的人像一个人一样同时起来反对大家所憎恶的政府,这个政府普遍地被人憎恨,以致从前赞助它的一小撮贵族和金融巨头在它开始遭到攻击时也都隐藏起来了。梅特涅一向使资产阶级处于政治无知状态,以致从巴黎传来的关于无政府状态、社会主义和恐怖的统治的消息以及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即将展开斗争的消息,他们完全不能理解。他们由于政治上的幼稚,不是完全不了解这些消息的意义,就是以为它们是梅特涅恶意捏造的,为的是恐吓他

们，让他们再去服从他。而且，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工人作为一个阶级而行动或者为自己本身的特殊的阶级利益而斗争。他们根据过去的经验，不能设想刚刚如此热烈地联合起来推翻大家一致憎恨的政府的各阶级之间，会突然发生什么矛盾。他们看到工人在所有各点上——在宪法、陪审法庭、出版自由等等问题上——都与他们一致。于是（至少在1848年3月），资产阶级一心一意地赞助运动，而在另一方面，运动从最初起就使资产阶级（至少在理论上）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

但是，各阶级的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总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这种联合却不能持久，——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如此。一当战胜共同的敌人之后，战胜者之间就要分成不同的营垒，彼此动起武来。正是旧的复杂的社会机构中的这种迅速而剧烈的阶级对抗的发展，使革命成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正是新的党派的这种不断的产生和迅速的成长，它们一个接替一个掌握政权，使一个民族在这种剧烈的震动时期五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一百年还走不完的途程。

维也纳革命使资产阶级成为理论上的统治阶级；这就是说，它从政府那里取得的让步一定会保证它的统治，如果这些让步能够实际执行并且在一定时期保持有效的。可是，事实上这一阶级的统治权还远没有建立起来。不错，由于国民自卫军的建立使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掌握了武器，资产阶级获得了力量和权势；不错，由于成立了“安全委员会”这种由资产阶级占支配地位的、对谁都不负责的革命政府，资产阶级取得了最高的权力。但同时一部分工人也武装起来了，每当发生斗争时，他们和大学生总是承担起斗争的全部重担；约四千名装备优良、训练远比国民自卫军

要好的大学生，形成了革命武装的核心和真正力量，他们决不愿意只是充当安全委员会手里的一個工具。他们虽然承认安全委员会，甚至是它的最热烈的拥护者，可是他们成立了一种独立的而且颇不安静的团体，在大礼堂召开他们自己的会议，保持介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中间立场，以不断的骚动阻止事物回复到旧日的平常状态，而且经常迫使安全委员会执行他们的决议。另一方面，工人差不多完全失业了，不得不由国家拿钱雇用他们在公共事业中做工，而用于这方面的款项当然必须取自纳税人的腰包或维也纳市的金库。这一切自然使维也纳的小工商业者很不愉快。维也纳市的工业企业本来是为这个大国中的富豪和贵族的消费服务的，由于发生革命，由于贵族和宫廷的逃亡，这些企业自然完全停业了；商业陷于停顿，工人和大学生不断的煽惑和骚动自然不能对当时人们常说的“恢复信用”起促进作用。这样，资产阶级与不安静的大学生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很快就出现了某种冷淡，而这种冷淡所以在一个长时期中并没有转变为公开的敌对，那是由于内阁（尤其是宫廷）急欲恢复旧秩序，因而不断证明比较革命的党派的疑虑和激烈行动是有道理的，并且不断地（甚至当着资产阶级的面）使旧日的梅特涅专制借尸还魂。由于政府企图限制或完全取消某些刚刚争得的自由，于是5月15日和5月26日先后两次发生了维也纳各阶级的起义。在这两次起义中，国民自卫军或武装的资产阶级同大学生和工人的联盟又暂时得到巩固。

至于居民中的其他阶级，贵族和金融巨头们已经销声匿迹，农民则到处忙于把封建制度的残余彻底扫除。由于意大利的战争²²，也由于宫廷忙于维也纳和匈牙利问题，农民得到了充分的行动自由，在奥地利，他们在解放事业中取得的成就，比在德国任何其他

地方都大。在这之后不久，奥地利议会只好追认农民已经实际实行了的措施，不管施瓦尔岑堡公爵的政府能够恢复什么东西，它却永远不能恢复对农民的封建奴役了。而如果说奥地利在目前又比较平定了，甚至比较强有力了，这主要是因为人民的大多数即农民真正从革命中得到了利益，也因为不管业已复辟的政府侵犯了其他什么东西，农民所争得的这些实际的物质利益却没有受到侵犯。

1851年10月于伦敦

六 柏林起义

革命运动的第二个中心是柏林。从前面几篇文章所叙述的情形不难了解，为什么柏林的革命行动远没有得到维也纳革命行动中的那种差不多是所有阶级的一致赞助。在普鲁士，资产阶级早已经卷入了反政府的实际斗争；“联合议会”开会的结果是造成了破裂；资产阶级革命日益迫近；如果不是由于巴黎二月革命，这个革命在爆发之初也许会像维也纳革命一样为各阶级所一致赞助。巴黎事变促进了一切，但它是在另一旗帜下进行的，这面旗帜与普鲁士资产阶级准备进攻自己的政府时所举起的旗帜完全不同。二月革命在法国所推翻的那种政府，正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他们自己国内所要建立的。二月革命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它宣告推翻资产阶级政府，解放工人。而普鲁士资产阶级最近则受够了自己国内工人阶级的骚扰。在西里西亚起义所引起的最初恐怖过去以后，他们甚至想为自身利益来利用这些骚扰。但他们对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始终保持着足够的警觉。因此，当他们看到巴黎政府的首脑正是他们所认为的财产、秩序、宗教、家庭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的其他神圣东西的最危险的敌人的时候，他们就立刻感到自己的革命热忱大大地冷却了。他们知道必须抓紧时机，知道没有工人群众的帮助他们就要失败，可是他们的勇气失掉了。因此，在最初的一些地方性的革命发动时，他们便站

在政府方面，努力使柏林的人民保持安静，因为五天以来人民一直聚集在皇宫前讨论各种新闻，要求改变政府。而当梅特涅被推翻的消息传来、国王终于作了一些小小的让步时，资产阶级便认为革命已经完成，忙于向皇帝陛下谢恩，说他已满足了他的人民的一切愿望。可是紧接着便是军队向群众的进攻，便是街垒、战斗以及王室的溃败。于是一切都改变了。资产阶级曾经尽力想把他们排挤到后面去的工人阶级，现在被推到斗争的前列，他们进行了战斗而且获得了胜利，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对于选举权、出版自由、陪审权、集会权的限制——这些限制是资产阶级所最欢迎的，因为受到限制的只是他们下面的阶级——现在已经不能继续下去了。重演巴黎的“无政府的”场面的危险迫于眉睫。在这种危险面前，一切过去的不和都消逝了。多年来的友人和敌人为了反对胜利的工人阶级而联合起来，虽然这一阶级还并没有提出它自己的特殊要求。资产阶级和被推翻的制度的拥护者在柏林的街垒上订立了联盟。他们彼此不得不作些必要的让步，但也只限于势在必行的让步；成立了一个由联合议会中各反对派的领袖组成的内阁，为了酬答这个内阁保全王位的功绩，旧政府的一切支柱——封建贵族、官僚、军队保证支持它。这就是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先生组阁的条件。

新阁员们对于觉醒的群众非常恐惧，在他们眼里，任何能巩固已被动摇的政权的基础的手段都是好的。这些糊里糊涂的可怜虫以为旧制度复辟的一切危险都已经过去了，因此便利用整个旧的国家机器来恢复“秩序”。文武官员没有一个人被撤职，旧的管理国家的官僚制度丝毫没有变更。这些立宪的责任内阁的宝贝阁员们，甚至把那些由于他们过去的官僚暴行而被人民在最初的革命高潮

中赶跑的官员也恢复了原职。除掉阁员更换而外，普鲁士没有任何变更，甚至各主管部门的人员也都一个未动；所有那些在新擢升的统治者周围组成一个合唱队并希望分得一份权位的猎取官职的立宪派，都得到了暗示：应该等到秩序恢复安定时再来更动官员，因为现在就这样作是有危险的。

在3月18日起义以后完全陷于沮丧的国王，很快就发觉这些“自由派的”阁员需要他，正如他也同样需要他们一样。起义没有推翻王位；王位成了防范“无政府状态”的最后一个现存的屏障；因此自由派资产阶级及其现任阁员的领袖们，很愿意同国王保持最亲善的关系。国王和他周围的反动的宫廷权奸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于是便利用这种环境来阻碍内阁实行它常常打算进行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改革。

内阁首先关心的事情，是要给最近这些强制性的变更一种合法的外貌。它不顾人民群众的反对，召集了联合议会，想让议会作为人民的合法的立宪机关来通过新的议会选举法，而新选出的议会将与国王商定新的宪法。选举将是间接的——选民先选举若干复选人，复选人再选出议员。虽然遭到各种反对，这种二级选举制还是通过了。接着又要求联合议会允许发行数目相当于两千五百万美元的公债，人民党派反对，但是议会又同意了。

内阁的这些行为，促使人民的，或者像它现在自己称呼的那样，民主的政党异常迅速地发展起来。这个以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为首的党，在革命之初曾经把大多数工人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它要求和法国一样的直接的普遍的选举权，要求一院制的立法议会，要求完全和公开地承认3月18日的革命是新政府的基础。这个党的较温和的一派认为可以对这样“民主化的”君主政体表示

满意，它的较先进的一派则要求彻底建立共和国。两派都同意承认德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而立宪派和反动派对这个议会的自主权却怀着很大的恐惧，他们宣布说他们认为这个议会是太革命了。

工人阶级的独立运动被革命暂时打断了。运动的直接要求和环境不允许把无产阶级党的特殊要求提到首位。事实上，当工人独立行动的场地尚未扫清、直接的普遍的选举制尚未建立、三十六个大小邦照旧把德国分成无数小块的时候，无产阶级党除了注视对他们具有极重要意义的巴黎革命运动，以及和小资产阶级一同争取那些使他们日后能够为自身的事业进行斗争的权利以外，别的还能做些什么呢？

当时无产阶级党的政治活动不同于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或所谓的真正的民主党之处，主要只有三点：第一，对于法国的运动的评价不同，民主派攻击巴黎的极端派，而无产阶级革命者却保护他们；第二，无产阶级党宣布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而民主派中最激进的人也只敢把联邦共和国作为自己渴望的对象；第三，无产阶级党在一切场合都表现了革命的勇气和行动的决心，而这却是以小资产阶级为首并主要由他们领导的党永远不会有有的。

无产阶级的或真正革命的党只是逐渐地使工人群众摆脱了民主派的影响，而在革命初期工人是尾随在民主派之后的。但是在一定的时刻，民主派领袖们的优柔寡断和软弱怯懦终于把事情引到了尽头，而现在我们可以说，过去几年的震动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在所有工人阶级相当集中的地方，工人们都完全摆脱了民主派的影响，这种影响在 1848 年和 1849 年曾使他们犯了许多错误，

遭到种种不幸。但我们不必去作预测，这两年的事变将给我们充分的机会看到这些民主派先生们的实际行为。

普鲁士的农民，像奥地利的农民一样，曾经利用革命一下子解脱了一切封建枷锁，虽然这里的农民由于封建压迫一般说来不那么坚决，行动比较和缓。可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这里的资产阶级立即转而反对他们最早的、最不可少的同盟者——农民。同资产阶级一样害怕所谓对私有财产的侵犯的民主派，也不再支持农民；这样，在三个月的自由之后，在流血冲突和军事屠杀（尤其是在西里西亚）之后，封建制度便在昨天还在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手下恢复了。再没有比这更可耻的事实可以用来谴责他们了。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党派这样出卖自己最好的同盟者，出卖自己。不管这个资产阶级政党后来遭到怎样的侮辱与惩罚，单单由于它的这一种行为，它也完全是罪有应得的。

1851年10月于伦敦

七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读者大概还记得，我们在前六篇文章里叙述了德国的革命运动，叙述到了维也纳 3 月 13 日和柏林 3 月 18 日两次人民的伟大胜利。我们看到，在奥地利和普鲁士都建立了立宪政府，自由主义的原则，或资产阶级的原则被宣布为未来整个政策的指导方针；这两大运动中心之间唯一显著的区别是：普鲁士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以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先生这两位富商作代表，直接攫取了权柄，而奥地利的资产阶级受政治训练较少，结果是自由派官僚们掌握了政权，他们宣称自己是受资产阶级的委托来执掌大权。我们又看到，原来团结一致反对旧政府的各党派和各社会阶级如何在胜利之后、甚至在斗争进行中四分五裂；而独享胜利果实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如何立即转而反对它昨天的同盟者，如何对一切较先进的阶级或党派采取敌对态度，并且同战败的封建分子和官僚分子结成同盟。事实上，早在革命剧开演时就可以看出，自由派资产阶级只有依靠较激进的人民党派的援助，才能守任自己的阵地，抵抗那已被击败但未被消灭的封建和官僚政党；另一方面，为了对付这些较激进的群众的冲击，自由派资产阶级又需要封建贵族和官僚的援助。所以，很明显，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没有足够的力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使一切国家机构适应于他们自己的需要和理想。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内阁，不过是一个过渡阶梯，从

这里，按照事态的发展情况，国家或者将走向更高的阶段，——达到统一的共和国，或者将重新堕入旧日封建教权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制度中去。无论如何，真正的决战还在后面；三月事变只是战斗的开始。

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德国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两邦，因此维也纳或柏林的每个决定性的革命胜利，对全德国都有决定的意义。这两个城市 1848 年三月的事变的发展，也确实决定了全德国事态的进程。所以，如果不是由于这些小邦的存在而产生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的存在本身正是德国的不正常状态的最显著的证据，正是最近这次革命半途而废的证据，那末本来是无须再叙述各小邦所发生的运动，我们的确可以只来研究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情况了。这个机构如此离奇，它所处的地位如此滑稽可笑，而同时它又如此自命不凡，可以说，在历史上将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机构。这个机构就是所谓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国国民议会**。

在维也纳和柏林的人民胜利之后，自然就产生了召开全德代表会议的问题。于是这个会议就被选举出来，在法兰克福开会，与旧的联邦议会并存。人民希望德国国民议会解决一切争论的问题，执行全德意志联邦最高立法权力机关的职能。但召集这个议会的联邦议会，对于国民议会的职权毫无规定。谁也不知道它的决议是具有法律效力呢，还是需要经过联邦议会或各邦政府的批准。在这种混乱状况中，如果国民议会稍有一点魄力，它就会把联邦议会立即解散（在德国再没有一个机关比这个议会更不受欢迎了），代之以从国民议会自己的议员中选举出来的联邦政府。它就会宣布自己是德国人民的独立自主的意志的唯一合法代表，从而使自己的一切决议具有法律效力。最重要的是，它就会使自己在

国内获得一支足以粉碎各邦政府的任何反抗的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在革命初期，这一切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但要求这个议会做到这一点却是太过分了，因为它的大多数成员是自由派的律师和学究式的教授，这个议会自称是体现了德国思想和学术的真髓，而事实上它只是一个供老朽腐败的政客在全德国的眼前表现他们全部不自觉的滑稽丑态和他们思想与行动上的无能的舞台。这个老太婆议会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最轻微的人民运动也怀着恐惧，其程度超过对于全德各邦政府的所有一切反动阴谋的恐惧。它在联邦议会的监视之下开会，不仅如此，它几乎是恳求联邦议会批准它的各项决议，据说这是因为它的最初一批决议应该由这个可憎的机关发布。它不肯定自己的自主权，反而故意回避讨论任何这一类危险的问题。它不用人民的武装力量把自己围绕起来，闭眼不看各邦政府的暴行，而直接就来讨论议事日程上的问题。眼看着美因兹实行戒严，该城的居民被解除武装，这个国民议会竟不闻不问。后来它选举了奥地利的约翰大公作德国的摄政，并宣称自己的一切决议都具有法律效力。但约翰大公只是在获得了各邦政府的同意之后才荣登新位，而且授职给他的不是国民议会而是联邦议会。至于国民议会的决议的法律效力，这点从来没有被各大邦政府所承认，而国民议会自身也不坚持，因此仍然是一个悬案。总之，我们看到一种奇异的景象：一个议会宣称自己是伟大的主权的民族的唯一合法代表，但它从来没有企图也没有力量使别人承认自己的要求。这个议会中的辩论没有任何实际结果，甚至也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只不过是重复一些陈腐不堪的哲学学派和法律学派的最乏味的老生常谈；他们在这个议会中所说的，或者毋宁说是所嘟哝的每一句话，报刊上早已刊登过一千次，而且比他们说得好一千

倍。

总之，这个自称为德国新的中央政权的机构，使一切都保持原来的状态。它根本没有实现人们久已渴望的德国的统一，连一个统治德国的各邦君主（即使是最无关紧要的）也没有废除；它没有加强德国各个分散的省份之间的联系；它没有费一点力量去摧毁那隔开汉诺威和普鲁士、隔开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关税壁垒；它甚至也没有打算去废除在普鲁士到处妨碍内河航行的苛税。但是，这个议会做的越少，却喧嚷得越厉害。它建立了德国的海军——但只是在纸上；它兼并了波兰和什列斯维希；它允许德意志的奥地利对意大利作战，但在奥地利人安全退入德境时却禁止意大利人追击；它对法兰西共和国连呼万岁，并接纳了匈牙利的使节，而后者这次回去时对德国的了解无疑是比来时更加糊涂了。

在革命之初，各邦政府曾把这个议会当作一个可怕的怪物。它们估计这个议会可能采取十分专断而革命的行动，因为它的职权极不明确（当时曾认为对它的权限问题不作明确规定是必要的）。为了削弱这个可怕的影响，各邦政府曾组织了一个十分周密的阴谋；但它们是幸运胜过聪明，因为实际上这个议会替各政府办事比它们自己办得还要好些。这些阴谋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召开地方的立法议会，于是不仅各小邦召开了它们的议会，连普鲁士和奥地利也召开了制宪议会。在这些议会里，像在法兰克福议会里一样，也是自由派资产阶级或它的同盟者——自由派律师和官僚占居多数，而且这些议会的工作的进行情况也几乎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德国国民议会是一个假想的国家的议会，因为这个议会拒绝建立它自身赖以存在的首要条件——统一的德国；其次，它讨论一些它自己创造出来的假想的政府的各种假想的、永远不

能实现的措施,通过一些谁也不感到兴趣的假想的决议。而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制宪议会至少还是真正的议会,它们推翻了旧的并且任命了真正的内阁,而且至少曾一度强迫它们与之进行斗争的各邦君主实行它们的决议。它们也是怯懦的,它们也缺乏远大的见识而不能作出革命的决定;它们也背叛了人民,把政权交还给封建的、官僚的和军事的专制制度。但当时它们至少还被迫讨论了一些有关目前利益的实际问题,被迫同别的凡人一起生活在地面上;而法兰克福的吹牛家们却以在“梦想的空中王国”(《im Luftreich des Traums》)²³里遨游为无上的快乐。因此,柏林和维也纳制宪议会的辩论构成德国革命史上重要的一页,而法兰克福这群笨伯的苦心佳作,却只能使文献和古董收藏家感到兴趣。

德国人民深深感到必须消除可恨的疆上分裂状态,因为这种状态分散和抵销了民族的集体力量,他们曾一度希望至少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会奠定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但这群自作聪明的蠢人的幼稚行为很快就使全国人民的热情冷却了。在签订马尔摩休战条约方面的可耻行为(1848年9月)²⁴,使人民怒不可遏地起来反对这个议会;他们本希望它会给民族提供一个自由的活动场所,但它却无比怯懦,它只是使现在的反革命制度借以建立的各种基础恢复了它们从前的稳固。

1852年1月于伦敦

八 波兰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²⁵

从以上几篇文章中已经明显看出，除非 1848 年三月革命后紧接着再来一个新的革命，否则德国就不可避免地要恢复到这次事变以前的状态。但我们现在要略加阐述的历史课题，性质非常复杂，如果不考虑到可以称之为德国革命的国际关系的种种情况，便不能够充分了解后来的一些事件。而这些国际关系也像德国内部情形一样复杂。

大家都知道，在过去一千年中，整个德国东半部，直到易北河、萨利河和波希米亚森林^①，已经从斯拉夫族的侵略者手里夺回来了。这些地区的大部分都已日耳曼化，斯拉夫族的民族性和语言几百年以前已经完全消失；如果我们把少数完全孤立的残余（总数不到十万人，包括波美拉尼亚的卡舒布人、鲁伊日察的温德人或索布人）除外，这些地区的居民都已经是彻头彻尾的德意志人了。但在所有同旧波兰接壤的地带和捷克语系国家，在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情形就不同了。在这些地方，两个民族在每个区域都是混居杂处，城市一般地说在不同程度上属于德意志人，而农村中则是斯拉夫人占优势，虽然在农村中斯拉夫人也因德意志人势力的增强而逐渐被瓦解和排挤。

^① 即捷克森林。——编者注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自从查理大帝时代以来，德意志人就十分坚决顽强地力求征服欧洲东部，把它殖民地化，或至少文明化。封建贵族在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所进行的征服，骑士阶级在普鲁士和利沃尼亚一带所建立的封建殖民地，只是为通过德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像西欧其他国家一样，从十五世纪起德国资产阶级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作用日益增长起来）而进行的一次规模更大和更有效得多的日耳曼化计划开拓了道路。斯拉夫人，尤其是西方的斯拉夫人（波兰人和捷克人），主要是从事农业，他们从来不怎么重视工商业。因此，随着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的兴起，一切工业品的生产便落在德意志人移民的手里，这些商品与农产品的交换则被犹太人所垄断，而这些犹太人，如果说他们属于什么民族的话，那末在这些国家里他们当然是属于德意志人，而不属于斯拉夫人。整个东欧的情形都是如此，虽然程度略轻。在彼得堡、佩斯、雅西，甚至在君士坦丁堡，直到今天，手工业者、小商人、小业主都还是德意志人，而放债人、酒店老板和小贩（在这些人口稀少的国家，这种人是非常重要的）则大多数是犹太人，他们的国语是一种讹误百出的德语。边境各斯拉夫人地区的德意志人的重要性，随着城市和工商业的发达而增加，而当一切精神文化差不多都必须从德国输入时，他们的重要性就更加增大了。在德意志商人和手工业者之后，德意志牧师、教员和学者也到斯拉夫人的国土上安家立业了。最后，侵略军的铁蹄或外交方面的审慎周密的掠夺行为，也不仅仅跟随在那种由于社会发展的影响下而缓慢地但是确实地发生的民族性破坏过程的后面，而且常常走在它的前面。因此，由于把官地卖给或赐给德意志殖民者，由于奖励德意志资本家在这些混居地区建立工业企业等等以及经常对该地波兰居民采

取极端横暴的手段，西普鲁士和波兹南的大部分从第一次瓜分波兰后就日耳曼化了。

因此，近七十年来，德意志民族和波兰民族间的分界线完全改变了。1848年的革命，立即唤醒一切被压迫民族起来要求独立和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所以很自然的，波兰人也立即要求恢复他们以1772年以前旧波兰共和国的疆界为界的国家。当然，就在当时，这个疆界作为德意志民族与波兰民族的分界线也已经过时了，而此后随着日耳曼化的进展，它更是一年比一年过时了；但是当时德意志人既然曾经那么热情地宣布他们赞助波兰复国，那末，要求他们放弃他们所掠得的一部分领土作为他们同情心的真实性的第一个证据，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但另一方面，对一个从来没有一次证明它能够摆脱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状态的民族， shouldn't 把一批主要是德意志人居住的地区和完全属于德意志人的大城市让给它呢？这个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同俄国开战。那时，革命化了的各民族间的划界问题就会成为次要的问题，而主要的问题就将是确立一个对付共同敌人的安全的疆界。波兰人在东方得到广大的领土，他们在西方的要求便会比较温和而合理；其实，对他们来说，里加和米塔瓦^①也会同但泽和埃尔宾^②一样重要的。因此，德国的先进政党认为，要支持大陆上的运动，便必须对俄国开战，而且它深信，即使是部分地恢复波兰的民族独立，也必然要引起这样的战争，所以它支持波兰人。而居于统治地位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却很清楚地看到，反对俄国的民族战争将使它自身崩溃，因为这种战争一定会使更活跃、更积

① 拉脱维亚称作：叶尔加瓦。——编者注

② 波兰称作：格但斯克和埃尔布隆克。——编者注

极的人掌握政权；因此，它装出一副热心于德意志民族的扩张的样子，宣布普属波兰（波兰革命运动的主要策源地）是未来的德意志帝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热情高涨的最初几天向波兰人许下的诺言，被可耻地背弃了。在政府同意之下组成的波兰军队，被普鲁士的炮兵解散和屠杀；到1848年4月，即柏林革命后六个星期，波兰的革命运动就被镇压下去，波兰人和德意志人之间旧有的民族敌视又复活起来。为俄国专制君主立下这场大功劳的是自由派商人阁员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应当附带说明，这次对波兰的战役，是改组和鼓舞普鲁士军队的第一步，正是这支军队后来推翻了自由派政党，摧毁了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先生那样辛辛苦苦地造成的运动。“恶有恶报”，——这就是从赖德律-洛兰到尚加尔涅、从康普豪森到海瑙所有这些1848年和1849年的暴发户的共同命运。

民族问题在波希米亚也引起了一场斗争。在这个有二百万德意志人和三百万捷克语系斯拉夫人的地区，有不少伟大的历史事迹是差不多完全与捷克人先前的霸权相联系的。但自从十五世纪的胡斯战争²⁶以后，斯拉夫族的这一支脉的势力就被摧毁了。说捷克语的地区被分裂了：一部分形成了波希米亚王国，一部分形成了莫拉维亚公国，第三部分——斯洛伐克人居住的喀尔巴阡山地则归入匈牙利。从那时起，莫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就已失掉一切民族意识和民族生命力的痕迹，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他们的语言。波希米亚被德意志人的地区三面包围。德意志人在波希米亚境内做出了很大的成绩，甚至在首都布拉格，这两个民族的人数也几乎相等；而资本、商业、工业和精神文化事业则普遍掌握在德意志人手里。捷克民族的第一名卫士帕拉茨基教授，他本人就是一

个发了狂的博学的德意志人,直到今天他在说捷克话时还有错误并且还带有外国腔调。但是就像常有的情形那样,最近四百年历史上的一切事实都证明,捷克民族是个垂死的民族,1848年它曾做最后一次努力来恢复它从前的生命力,而这次努力的失败足以证明(撇开一切革命方面的考虑不谈)波希米亚此后只能作为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即使它的一部分居民在几百年之内继续说非德国的语言。

1852年2月于伦敦

九 泛斯拉夫主义。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战争

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又一个斯拉夫族的分散的成员,他们受匈牙利人的影响,就像波希米亚人受德意志人的影响一样),是欧洲大陆上所谓“泛斯拉夫主义”的发源地。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都没有强大到足以作为独立的民族而存在。这两个民族都因种种历史原因(这些原因必然使它们为更强大的民族所并吞)的作用而渐渐瓦解,它们要想恢复一定的独立性,只有和其他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波兰人有二千二百万,俄罗斯人有四千五百万,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人有八百万;为什么不把这八千万斯拉夫人组成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把侵入神圣的斯拉夫族领土的不速之客,土耳其人、匈牙利人、尤其是那可恨而又不可缺少的 Niemetz 即德意志人驱逐出去或消灭掉呢?于是,就从几个斯拉夫族的历史科学的癖好者的书斋里发起了这样一个荒唐的、反历史的运动,公然想使文明的西方从属于野蛮的东方,城市从属于乡村,商业、工业和文化从属于斯拉夫农奴的原始农业。但在这种荒唐的理论之后,还站着**俄罗斯帝国**这一可怕的事实;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它那想把整个欧洲变成斯拉夫种族、尤其是这个种族的唯一强有力的部分即俄罗斯人的领土的野心;这个帝国虽有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个首都,但在被俄国每个农民看做是他们的宗教和国家的真正京

都的“沙皇之城”(君士坦丁堡,俄文为察尔格勒,即沙皇城)还没有成为俄国皇帝的真正的驻节地的时候,这个帝国就始终不能安定下来;过去一百五十年以来,这个帝国在它所进行的每次战争中不仅从未失掉领土,而且总是获得领土。俄罗斯的政策是用种种阴谋手段支持新发明的泛斯拉夫主义理论(这种理论的发明是最适合于俄罗斯政策的目的的),这在中欧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因此捷克和克罗地亚的泛斯拉夫主义者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直接为俄国的利益服务;他们为了一个独立民族的幻影而出卖了革命事业,而这个独立民族的命运至多也不过同俄国统治下的波兰民族的命运一样。而在这方面,波兰人应该受到赞扬,因为波兰人从来没有真正陷入这个泛斯拉夫主义的圈套;至于少数贵族变成了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者,那是由于他们知道,他们在俄国统治下所受的损失,要比他们在自己的农奴起义时所受的损失轻微一些。

后来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在布拉格召开了一个斯拉夫夫人代表大会²⁷,筹备成立一个斯拉夫人大同盟。即使没有奥地利军队的干涉,这个大会也一定要失败的。几种斯拉夫语言的不同,就像英语、德语和瑞典语的不同一样;因此在会议开始以后,竟没有一种共同的斯拉夫语言是所有参加讨论的人都懂得的。曾经试用法语,但大多数人也不懂法语,于是,这些可怜的热心于斯拉夫主义的人,这些唯一的共同感情就是对德意志人的共同仇恨的人,最后却不得不用与会人都懂得的唯一语言——可恨的德语来表达意见!但正在这个时候,在布拉格也召开了另外一个斯拉夫夫人代表大会,参加这个大会的是加里西亚人的枪骑兵、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人的掷弹兵、捷克人的炮兵和重骑兵,而这个真正的武装的斯拉夫人大会在文迪施格雷茨的指挥之下,不到二十四小时就把假想

的斯拉夫人霸权的奠基者们驱逐出城，并把他们赶得东逃西散了。

奥地利制宪议会中的捷克、莫拉维亚、达尔马威亚的代表和一部分波兰的代表(贵族)，在议会中对德意志代表作了有系统的斗争。德意志人和一部分波兰人(破产的贵族)在这个议会中是革命进步势力的主要支持者。对他们采取反对态度的大多数斯拉夫族代表，并不满足于这样公开表露自己整个运动的反动倾向，他们竟无耻地同驱散了他们的布拉格会议的奥地利政府暗中勾结。他们的这种卑鄙的行为也得到了报答。在1848年十月起义(归根到底正是这次起义使他们在制宪议会中获得了多数)时斯拉夫代表支持政府，而在这之后，现在这个几乎全体议员都是斯拉夫人的议会，也像布拉格代表大会一样被奥地利军队驱散了，这些泛斯拉夫主义者还被警告说，如果他们再有所动作，就要把他们关进监狱。他们得到的只是这样一个结果：斯拉夫的民族性现在到处都被奥地利的中央集权所摧毁，而这是他们的幻想和愚蠢所应得的。

如果匈牙利和德国的边境存在任何疑问，那也一定要引起争端。但是，幸而没有引起争端的口实，两个民族的利益密切相连，他们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奥地利政府和泛斯拉夫主义的狂想。相互的善意谅解一刻也没有发生破绽。但是意大利的革命至少使德国的一部分陷入了自相残杀的战斗，而在这里我们必须指明一个事实(这个事实足以说明梅特涅的统治多么严重地阻碍了社会意识的发展)，1848年前六个月曾经在维也纳参加街垒战斗的人又满腔热情地参加了与意大利爱国者作战的队伍。不过，这种可悲的思想混乱并没有继续多久。

最后，还曾经为了争夺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而与丹麦交战。这两个地方在民族、语言和感情方面无疑都是德意志的，而从军

事、海运和商业方面说，德国也需要它们。这两地的居民在过去三年中曾经顽强地反对丹麦人的入侵。此外，根据条约他们也有这种权利。三月革命使它们与丹麦人公开冲突起来，德国援助了它们。可是，虽然在波兰，在意大利，在波希米亚，以及后来在匈牙利，战事进行得十分激烈，但在这个唯一得人心的、唯一革命的（至少部分是革命的）战争中，却让军队毫无意义地来回行军，甚至容许外国进行外交干涉，结果，尽管作了许多次英勇的战斗，而得到的却是十分可怜的结局。德国政府在这次战争中抓住一切机会出卖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革命军队，故意让丹麦人在这支军队被分散或分开的时候把它消灭。德意志人志愿兵也遭到同样的待遇。

但当德国的名字遭到普遍的憎恨时，德国各立宪派和自由派的政府却拍手称快。它们把波兰人和捷克人的运动镇压下去了。它们到处重新挑起旧日的民族仇恨，这种仇恨直到今天还使德意志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彼此间不能有任何谅解和共同行动。它们使人民习惯于内战和军队镇压的场面。普鲁士军队在波兰，奥地利军队在布拉格都又恢复了自信。当满怀着过分的爱国激情（即海涅所谓《die patriotische Überkraft》²⁸）的、热心革命但目光短浅的青年被派到什列斯维希和伦巴第去在敌人的霰弹下送死的时候，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正规军这些有效的工具，却得到机会利用战胜外人的功绩来重新赢得人心。但是我们要再说一遍：这些被自由派加强起来当作反对较激进的党派的工具的军队，刚一稍稍恢复它们的自信和纪律，便掉转枪口反对自由派本身，而把政权交还给了旧制度的代表人物。当拉德茨基在阿迪杰河畔他的军营中接到维也纳的“责任阁员们”的第一批命令时，他大喊道：“这些阁员是些什么人？他们并不是奥地利政府！奥地利现在就只存在于

我的军营中；我和我的军队就是奥地利；等将来我们把意大利人打败，我们就要为皇帝夺回帝国！”老拉德茨基是对的。但维也纳的没有头脑的“责任”阁员们却没有注意他。

1852年2月于伦敦

十 巴黎起义。法兰克福议会

早在 1848 年 4 月初,在整个欧洲大陆革命的浪潮已经被社会的那些从最初的胜利中获得利益的阶级同战胜者立即缔结的联盟所阻止了。在法国,小资产阶级和共和派资产阶级,同保皇派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在德国和意大利,胜利的资产阶级急忙乞求封建贵族、政府官僚和军队帮助他们对付人民群众和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保守的和反革命的政党,很快又获得了优势。在英国,发动得不适时和准备得不充分的人民示威(4月10日),使从事运动的党派²⁹遭到了彻底的决定性的失败。在法国,两次与此类似的运动(4月16日和5月15日)也同样被击败了³⁰。在意大利,“炮弹国王”^①在5月15日一举而恢复了政权³¹。在德国,各个新的资产阶级政府和它们的制宪议会都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虽然在维也纳,多事的5月15日使人民获得了胜利,不过这毕竟是一个次要的事变,它可以说是人民的力量最后一次胜利的闪耀。在匈牙利,运动看来是转入了完全合法的平静的轨道,至于波兰的运动,我们在前面一篇文章中已经提到,它刚刚萌芽就被普鲁士的刺刀镇压下去了。但是这一切并没有确定事态的最后结局,各革命政党在各国失去的每一寸土地,只是使他们更加团结自己

① 即斐迪南二世。——编者注

的队伍，准备去进行决定性的斗争。

决定性的斗争已经临近了。它只能在法国爆发；因为在英国没有参加革命战斗而德国仍然四分五裂的时候，法国由于国家的独立、文明和中央集权，是唯一能够给周围各国以有力推动的国家。所以，当 1848 年 6 月 23 日巴黎的流血斗争开始的时候，接二连三的电报和信件使欧洲愈来愈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事实：这次斗争是在工人群众和得到军队援助的巴黎居民的其他阶级之间进行的；战斗继续了好几天，其激烈程度是现代内战史上空前未有的，但双方都没有得到明显的胜利；这时候，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这是一次伟大的决战，如果起义胜利，整个欧洲大陆就要掀起新的革命浪潮；如果起义失败，反革命统治就会至少暂时恢复。

巴黎的无产者被击败了，他们被屠戮，被摧毁，而且打击十分沉重，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复元。在整个欧洲，新旧保守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都立即肆无忌惮地抬起头来，这说明他们对这次事变的重要性了解得十分清楚。他们到处迫害报刊，限制集会结社权，以任何一个小城镇发生的细小事件作为借口来解除人民的武装，宣布戒严，并用卡芬雅克传授给他们的新的策略和手段训练军队。此外，二月革命以后，大城市里的人民起义是不可战胜的这种说法第一次被证明是一种幻想；军队的荣誉恢复了；以前经常在重大的巷战中失败的队伍，现在也重新获得了信心，相信自己也能胜任这样的战争了。

在巴黎工人的这次失败之后，德国的旧封建官僚政党便开始积极行动并制订明确的计划，甚至要把他们暂时的同盟者资产阶级也远远甩开，重新恢复三月事变以前德国的状态。军队又成为这个国家中的决定力量，而军队已不属于资产阶级而属于他们自

己了。甚至在普鲁士，那里一部分下级军官在 1848 年以前十分倾向于立宪制度，革命在军队中引起的混乱也使这些稳健的年轻人像从前一样忠于职守了。只要普通士兵对于长官们稍微随便一点，长官就会立刻感到纪律和绝对服从的必要。被击败的贵族和官僚们现在开始看到他们的出路。空前团结的军队，由于在镇压小规模起义和对外战争中得到胜利而趾高气扬，他们也很想取得法国士兵刚刚得到的大胜利，——只要使这个军队不断和人民发生小冲突，一旦决定性的时刻到来，它就能够以强有力的一击粉碎革命党人，并把资产阶级议员们的傲慢不逊一扫而光。而进行这样一次决定性的打击的时刻很快就到来了。

关于那些有时令人感到新奇而大半却令人感到厌烦的议会辩论，以及德国各党派夏季所忙碌从事的地方性斗争，我们就不谈了。只需要说明一点：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护者虽然在议会里取得多次胜利，但没有一次得到过任何实际效果，他们普遍感到，他们介于两个极端党派之间的地位一天天变得更不稳固了；因此，他们不得不今天力求同反动派联盟，明天又向较民主的党派讨好。这种不断的摇摆使舆论对他们完全失去了信仰，而按照事态发展的趋向来看，他们的遭受轻蔑，暂时主要是有利于官僚和封建主们。

到了秋初，各政党间的关系已极其尖锐而紧张，决战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民主的革命的群众同军队的最初格斗发生在法兰克福。虽然这次冲突并不十分重要，但是军队却是第一次在这里取得对起义的显著优势，而这产生了很大的精神上的效果。普鲁士根据十分明显的理由允许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所建立的架空的政府同丹麦签订和约，这个和约不但把什列斯维希的德意志人交给丹麦人蹂躏，而且也完全否认了丹麦战争的那些公认的、多少带有

革命性的原则。法兰克福议会以两三票的多数否决了这个和约。在这次投票之后演出了一出内阁危机的滑稽剧，而三天以后议会重新审查了自己的决议，实际上取消了这个决议而承认了和约。这种可耻的行为激起了人民的愤怒。人民筑起了街垒，但法兰克福已经调来了足够的军队，经过六小时的战斗，起义便被镇压下去了。这次事件在德国其他地方（巴登、科伦）引起的类似的但是比较不重要的骚动，也同样被镇压下去了。

这次前哨战给反革命政党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好处：完全由人民选举出来（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唯一政府——法兰克福帝国政府，也像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一样，在人民心目中失掉了任何威信。这个政府和这个议会都不得不用军队的刺刀来反对人民表明自己的意志。它们已名誉扫地，虽然它们以前多少还能得到一点尊敬，但这次的忘本行为和这种依赖反人民的各邦政府及其军队的作法，却使帝国的摄政，使他的阁员们和议员们此后都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摆设。我们不久就会看到，最先是奥地利，接着是普鲁士，后来是各小邦，都怎样轻蔑地对待这群无能梦想家所发出的每一道命令、每一项要求、每一次委派。

现在我们应该来谈谈法国六月战斗在德国所引起的强有力的反响，来谈谈对德国有决定意义的——就像巴黎无产阶级的斗争对法国那样——事变。我们是指1848年10月维也纳的起义和随之而来的对维也纳的攻击。但这次斗争的意义十分重大，说明对这次事件的进程发生比较直接影响的种种情况需要占“论坛报”很大篇幅，因此我们不得不专门用一篇文章来加以阐述。

1852年2月于伦敦

十一 维也纳起义

现在我们来谈谈一个有决定意义的事变，这次事变对于德国的革命意义正像巴黎的六月起义一样，它使优势一下子转到了反革命政党方面去。这次事变就是 1848 年 10 月的维也纳起义。

3 月 13 日革命胜利以后维也纳各阶级的地位如何，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也看到，德意志的奥地利的运动如何同非德意志的奥地利各省的事变互相交错在一起，以及后者如何阻碍前者。所以，我们现在只要简短地叙述一下引起德意志奥地利的这次最后的、最勇猛的起义的原因就可以了。

作为梅特涅统治的主要的非正式的支柱的上层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三月事变后仍然保持了对政府的决定性影响，这是因为他们不仅利用了宫廷、军队和官僚，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利用了资产阶级中间迅速传播开来的对“无政府状态”的恐怖。他们很快就大胆地放出了一些试探气球，这就是：出版法、奇妙的贵族宪法和以旧日的“等级”区分为基础的选举法³²。由怯懦无能的半自由派官僚组成的所谓宪制内阁，5 月 14 日竟敢直接攻击群众的革命组织，解散了国民自卫军代表和大学生军团代表的中央委员会（这个团体是专门为了监督政府并且在必要时动员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反对它而组织的）。但这种行动激起了 5 月 15 日的起义，政府被迫承认了上述委员会，取消了宪法和选举法，并且把全权授予由大选产

生的制宪议会来起草新的根本法。这一切都由第二天的圣论确认了。但是在内阁中派有代表的反动政党，不久就促使他们的“自由派”同僚再度向人民的胜利发动进攻。大学生军团是从事运动的党派的堡垒，是经常的鼓动的中心，正因为如此，它就为较温和的维也纳市民所厌恶。5月26日，内阁下令把它解散了。如果只要一部分国民自卫军来执行这个命令，这次打击也许能够成功，但是政府连国民自卫军也不相信，它调动了正规军队，于是国民自卫军立即倒戈和大学生军团联合起来，从而破坏了内阁的计划。

但是皇帝^①和他的宫廷早在5月16日就离开维也纳逃到音斯布鲁克去了。这里四周是狂热的提罗耳人，这些人由于看到撒丁—伦巴第的军队有入侵的危险，他们对皇室的忠心重新激荡起来；这里有拉德茨基的军队驻在附近，他们同音斯布鲁克的距离在大炮的射程之内。反动政党仗着这一切，便把这里当作自己的避难所，在这里它可以摆脱任何监督和注视，毫无危险地集结它被击溃的力量，把它的阴谋之网重行修补，撒布全国。和拉德茨基、耶拉契奇、文迪施格雷茨以及各省行政组织中可信赖的人们之间的联系恢复了，和斯拉夫族领袖们之间的阴谋活动开始了；这就是说，反革命的宫廷权奸掌握了真正的力量，而维也纳的无能的阁员们却得以在与革命群众不断的冲突中，在关于将要来到的制宪议会的辩论中消耗着他们短暂而低微的声誉。因此，对首都的革命运动暂时听之任之的政策，在法国那样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中会使从事运动的政党变得无比强大，而在奥地利这样一个五光十色的政治结合体里则是重新调动反动力量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

^① 即斐迪南一世。——编者注

维也纳的资产阶级以为，在宫廷连续遭到三次失败之后，在有了由大选产生的制宪议会以后，皇党已经不再是一个可怕的敌人了，于是就愈来愈陷入厌倦和冷漠，老是呼吁秩序和安静；在猛烈的动荡和由此产生的工商业混乱之后，这个阶级充满了这样的情绪。奥地利首都的工业，几乎完全是生产奢侈品，而对奢侈品的需求，自从革命发生和宫廷逃亡以后，当然是大大缩小了。要求恢复正常的治理制度和宫廷还都（这二者都被指望会带来商业的重新繁荣），现在已成为资产阶级的普遍呼声。7月间制宪议会的召开被当作革命时代的终结而受到热烈的欢迎。宫廷的归来也受到同样的欢迎；而宫廷在拉德茨基在意大利获胜和多布尔霍夫反动内阁上台之后，感到自己已经足以抵挡住人民的浪潮，同时它认为也需要回到维也纳以完成它同在议会中占多数的斯拉夫议员策划的阴谋。当制宪议会讨论把农民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并且免除他们为贵族作强迫劳动的法律的时候，宫廷耍了一个巧妙的手腕。8月19日，有人要皇帝去检阅国民自卫军，皇室、廷臣和将军们竞相恭维这些武装的市民，这些市民看到他们被公开承认为国家的决定性力量也就洋洋得意起来。紧接着发布了一道由内阁中唯一有声望的阁员施瓦策先生签署的命令，取消国家一向发给失业者的补助金。诡计成功了。工人举行了示威；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宣称拥护他们的阁员的命令；他们向“无政府主义者”进攻，他们像猛虎一样扑向手无寸铁、毫未抵抗的工人，他们在8月23日那天屠杀了许多工人。革命的战斗力量的团结和威力就这样被摧毁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在维也纳也演成了流血的搏斗，反革命的宫廷权奸则看到，它可以进行致命打击的日子已经临近了。

匈牙利的事态使反革命的宫廷权奸很快就找到借口公开宣布他们行动中所要遵循的原则。10月5日官方的“维也纳日报”发表一道皇帝敕令(敕令没有一个匈牙利责任内阁副署),宣布解散匈牙利议会并且任命克罗地亚的统治者耶拉契奇作该国的文武总督;耶拉契奇是南方斯拉夫反动派的一个领袖,他曾经公开反对匈牙利的合法政权。同时,维也纳的部队奉令出动,加入支持耶拉契奇政权的军队。可是,这么一来马脚就过于明显地露出来了;每一个维也纳人都觉得,向匈牙利开战,就等于向立宪制度的原则开战。这个原则在这个敕令中已经遭到蹂躏,因为皇帝企图不经责任内阁员的副署就使自己的命令发生法律效力。10月6日,人民、大学生军团和维也纳的国民自卫军举行了群众起义,阻止军队的出发。一些掷弹兵转到人民方面来;人民的武装力量和军队发生了短时间的搏斗;陆军大臣拉图尔被人民杀死,到晚间人民取得了胜利。这时在施土尔威森堡^①被佩尔采尔击败的耶拉契奇,逃到了维也纳附近的德意志奥地利的领土上。本应开去援助他的维也纳卫戍部队,现在也对他采取显然敌对和戒备的态度;皇帝和宫廷再次逃亡,这次是逃到半斯拉夫人的领土奥里缪茨^②去了。

宫廷在奥里缪茨的处境和它从前在音斯布鲁克时的处境完全不同了。它现在已经能够直接进攻革命了。它周围是成群流入奥里缪茨的制宪议会的斯拉夫族议员,以及帝国各个部分的斯拉夫族热心家。在他们看来,这次战争将是一个斯拉夫人复兴的战争,是一个歼灭浸入他们认为是斯拉夫人领土的两个入侵者——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的战争。布拉格的征服者,现在集结在维也

① 匈牙利称作:塞克希费黑伐尔。——编者注

② 捷克称作:奥洛摩茨。——编者注

纳四周的军队的司令官文迪施格雷茨，一下子变成了斯拉夫民族英雄。他的军队迅速地从各方面集中。从波希米亚、莫拉维亚、施梯里亚、上奥地利和意大利，一团一团的军队开往维也纳，与耶拉契奇的队伍和原来的维也纳卫戍部队会合。这样，到10月末就集结了六万多人，他们立刻从四面八方把帝国的首都包围起来，到10月30日，他们已经推进到可以作决定性的攻击了。

这时，笼罩着维也纳的是混乱和束手无策。刚刚获得胜利的资产阶级，又对“无政府主义的”工人阶级抱从前那种不信任的态度了。工人们也还清楚地记得六个星期以前武装的资产阶级对待他们的态度，记得整个资产阶级的摇摆不定的政策，因此不愿意指望他们去保卫维也纳城，而要求自己取得武器，成立自己的军事组织。热望与横暴的帝制作斗争的大学生军团，完全不能了解两个阶级彼此隔膜的真正原因，或者说完全不能了解当前局势的需要。群众和领导者的头脑里都是混乱一团。议会中残余的德意志族议员和几个给他们的奥里缪茨的朋友作侦探的斯拉夫族议员（几个革命的波兰议员除外）是经常开会的。但是他们并不采取坚决的行动，却把时间消耗在能不能在不越出宪法惯例的范围内抵抗帝国军队这种无聊的辩论上。差不多全部由维也纳各民主团体的代表组成的安全委员会虽然决心抵抗，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多数是市民、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这些人永远不允许采取坚决果敢的行动。大学生军团的委员会虽然通过了一些英勇的决议，但它完全没有领导的能力。不受信任、没有武装、也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还很少解脱旧制度加于他们的精神奴役状态，觉悟还很差，他们不是真正觉悟到，而只是本能地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适合于他们的政策。他们只能在喧嚷的示威中表现自己；不能指望

他们去克服当时的种种困难。但是只要能得到武器，他们是准备战斗到底的，在德国革命时期他们一向都是这样。

这就是维也纳当时的情形。在城外是经过整顿的奥地利军队，他们由于拉德茨基在意大利的胜利而大受鼓舞，他们的人数共有六七万，武装和组织都很良好，尽管指挥不很好，但至少总还有指挥者。在城内却是一片充满阶级矛盾的混乱和涣散状态；国民自卫军有一部分决定根本不打，一部分犹豫不决，只有一小部分准备行动；无产阶级群众数量虽然很大，但是没有领袖，没有受过一点政治训练，他们容易无缘无故地激怒，也容易慌乱，一切流言蜚语都能影响他们；他们决心战斗，但是没有武装（至少开始是没有的），而当最后被带去打仗的时候，也是武装不全，组织很差；议会束手无策，在火差不多已经烧着他们头上的屋顶的时候，他们还在讨论一些琐屑的理论；领导委员会既无精神，又无魄力。一切情形都和3月和5月的那些日子不同了，那时反革命营垒中充满混乱，唯一有组织的力量是革命所创造的力量。这样一场斗争的结局如何，几乎是不问可知的；即使还有什么疑问，那末10月30、31日和11月1日的事变也已经作出解答了。

1852年3月于伦敦

十二

对维也纳的攻击。对维也纳的背叛

当最后文迪施格雷茨集中起来的军队开始攻击维也纳的时候，能够动员起来进行防御的力量是很不够的。国民自卫军只有一部分可以调到战壕中去。不错，无产阶级的自卫军最后终于仓促组成了，但由于决定这样来利用这一部分人数最多、最勇敢、最坚决的人民的时刻已经太迟，所以这支队伍未能充分学会掌握武器使用和得到最基本的训练，因而也就不能胜利地抗击敌人。因此，人数有三四千名、训练有素、纪律也相当好的勇敢热情的大学生军团，从军事观点来说便成为能够胜任自己职务的唯一的一支部队了。但他们（连少数可靠的国民自卫军和一群紊乱的武装起来的无产者也算在内）和文迪施格雷茨的人数众多的正规军比较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这里更不要说耶拉契奇的土匪队伍了，他们由于生活习惯，是十分擅长于那种为争夺一幢房屋一条胡同而进行的军事行动的。文迪施格雷茨肆无忌惮地动用了许许多多装备完善的大炮，而起义者除了几门陈旧不堪、装配不好、使用不灵的旧炮而外，还有什么呢？

危险越迫近，维也纳城内越混乱。直到最后一刻，议会还没有决定向驻扎在离首都几哩的、佩尔采尔的匈牙利军队求援。安全委员会通过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决议，它也像武装的人民群众一样，随着各种互相矛盾的谣言的起伏而情绪时高时低。只有一件事是全

体都同意的——尊重财产；而这种尊重在当时的情况下达到了可以说是十分滑稽可笑的程度。在确定防御计划方面却做得很少。如果说当时还有人能挽救维也纳的话，那末贝姆便是唯一的一个，他是一个本籍斯拉夫族的、几乎没有人知道的外国人；而由于大家对他不信任，他决定不再担负这个任务。如果他继续担负下去，他也许要被当作一个叛徒而遭到私刑拷打。起义者的指挥官梅森豪泽作为小说家的才能远远超过他作为军官（甚至是下级军官）的才能，因此他根本不适合担任这个工作；可是，在八个月的革命斗争之后，人民的政党并没有从自己的队伍中或别的地方培养出或发现一个比他更能干的军事人才。战斗就这样开始了。维也纳人既十分缺少防御手段，又非常缺乏军事训练和组织，但他们还是作了最英勇的抵抗。贝姆担任指挥官时所发布的命令——“坚守阵地到最后一人”，在很多地方都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的。但是，毕竟还是实力占了上风。帝国炮兵在近郊的长而宽的大道上，在主要的交通线上把重重的街垒都扫除了；到战斗的第二天晚上，克罗地亚人便占领了旧城斜堤对面的一排房屋。匈牙利军队的无力而零乱的攻击完全被击退了；在停火的间歇时刻，旧城里的队伍有的投降了，有的踌躇动摇，陷于混乱，剩下来的大学生军团在构筑新的工事，而帝国军队就在这时候攻入城内，趁着城内的一片混乱占领了旧城。

这次胜利的直接后果就是种种暴行和许多人被依军法处死，就是进入维也纳的斯拉夫族强盗队伍的各种骇人听闻的无耻兽行；这些事大家知道得太清楚了，用不着在这里详细叙述。这次胜利的间接后果，即维也纳革命的失败使德国事态发生的完全新的转化，我们下面再谈。关于对维也纳的攻击，还有两点需要谈一谈。

这个首都的人民有两个同盟者：匈牙利人和德意志人民。在这考验的时刻他们在哪里呢？

我们已经看到，维也纳人以刚解放的人民的全部慷慨胸怀挺身起来捍卫的事业，虽然归根到底也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但首先是和主要是匈牙利人的事业。他们不让奥地利军队开去进攻匈牙利，而宁愿自己首当其冲地承受这些军队的最凶猛的攻击。当他们这样高尚地挺身而出援助他们的同盟者的时候，击败了耶拉契奇的匈牙利人却把耶拉契奇赶到了维也纳，用他们的胜利增强了准备进攻维也纳的兵力。在这种情形下，匈牙利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应该是毫不延迟地以一切可供使用的兵力去援助维也纳——不是援助维也纳议会，也不是援助安全委员会或维也纳的其他官方团体，而是援助**维也纳革命**。即使匈牙利全然忘记了维也纳的第一次战斗是为了匈牙利，那末，为了它自己的安全，它也不应该忘记维也纳是维护匈牙利独立的唯一屏障，如果维也纳陷落，便没有什么东西足以阻止帝国军队向匈牙利进攻了。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弄清匈牙利人为他们在维也纳被包围和被攻击时按兵不动作辩护的种种借口，这些借口就是：他们自己的战斗力量不足，维也纳议会或其他官方团体都拒绝向他们求援，他们必须恪守宪法立场而避免和德国中央政权发生纠纷。关于匈牙利军队实力不足一层，事实是这样：在维也纳革命和耶拉契奇到来以后最初几天，完全可以不需要什么正规军队，因为当时奥地利的正规军还远远没有集中起来；如果在第一次击败耶拉契奇后乘胜作勇猛无情的追击，那末单是在施土尔威森堡作战的人民自卫团的力量也足以和维也纳人会合，而使奥地利军队的集中迟延半年。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在没有获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

规则；而且我们可以断然地说，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佩尔采尔在和维也纳人会合以前是不应该停止行动的。事情当然是有些危险，但有谁打胜仗而不曾冒一点危险呢？当四十万维也纳人把要去征服一千二百万匈牙利人的军队吸引来攻击他们自己的时候，难道他们就不冒一点危险吗？在奥地利的力量集结起来以前采取的观望态度，以及后来在施韦哈特举行的软弱无力的示威（结果自然是遭到了不光彩的失败），——这种军事错误比坚决向维也纳进军、追击耶拉契奇的溃散了的匪军，招致了更大的危险。

可是，据说匈牙利人不经官方机关的同意就这样进兵，便是侵犯德国领土，便要 and 法兰克福的中央政权发生纠纷，最重要的是，这就意味着匈牙利人背弃了合法的和立宪的政策，而这一政策据说正是他们的运动的力量所在。可是要知道，维也纳的官方机关不过是形同虚设！奋起为匈牙利而战的难道是议会或什么民主委员会吗？不是维也纳的人民（而且只有他们）拿起武器为匈牙利的独立而首当其冲地作第一次战斗的吗？问题不是必须支援维也纳的这个或那个官方机关，所有这些机关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是会而且很快就会被推翻的；问题在于革命的高涨，在于人民运动的不断发展，而只有这些才能保障匈牙利不被侵略。当维也纳和整个德意志奥地利仍是匈牙利人反抗共同敌人的同盟者的时候，考虑革命运动以后将采取怎样的形式的问题，是维也纳人而不是匈牙利人的事情。但是我们要问：匈牙利政府这样坚持要取得某种所谓合法的认可，不正是追求一种颇为可疑的合法性的第一个明显的征兆吗？这种追求虽然没有能够挽救匈牙利，但后来至少在英国资产阶级的公众面前倒产生了不坏的印象。

至于借口说可能和法兰克福的德国中央政权发生冲突，这也

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法兰克福的当权者事实上已被维也纳反革命的胜利所推翻了，而即使革命能在那里得到为击败它的敌人所必需的帮助，这些当权者也会同样被推翻的。最后一个重大理由是，匈牙利不能离开合法的和立宪的立场；这种说法也许会得到英国的自由贸易派的满口称赞，但历史永远不会承认这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假如维也纳人在3月13日和10月6日都坚持“合法的和立宪的”手段，那末那种“合法的和立宪的”运动的命运，以及所有那些第一次使匈牙利为文明世界所注意的光荣战斗的结局又会怎样呢？匈牙利人在1848年和1949年始终坚持的（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合法的和立宪的立场，正是维也纳人民在3月13日用极端不合法的和非立宪的起义给他们争取到的。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考察匈牙利的革命史，但我们应该指出，只用合法手段去反抗这种循规蹈矩报以嘲笑敌人，那是完全不适当的；如果不是这种被戈尔盖利用来反对匈牙利政府本身的、对合法性的不断的追求，戈尔盖的军队也就不会服从它的统帅，因而也就不会出现维拉戈什的那种可耻的不幸的下场了³³。而当1848年10月最后几天匈牙利人为挽救其名誉终于渡过莱达河的时候，那不是和直接的坚决的攻击一样不合法吗？

大家知道，我们对匈牙利没有一点不友好的情感。在斗争中我们是维护它的；我们完全有权利说，我们的报纸——“新莱茵报”³⁴，对于在德国宣传匈牙利人的事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报纸做得都要多。它阐释了马扎尔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斗争的性质，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匈牙利战争的文章，这些论文得到了这样的荣誉，差不多一切后来出版的关于这一问题的书籍都抄袭它们，连匈牙利本国人和“目击者”的作品也不例外。我们甚至现在也还认为，

在欧洲大陆将来的任何震动中，匈牙利仍然是德国的必需的和天然的同盟者。但我们一向对于我们本国人是很严厉的，所以我们也有权利直率地批评我们的邻居。其次，如果我们以历史学家的公正态度记述事实，我们就必须说，在这个事例中，维也纳人民是豪迈而英勇的，他们不仅比顾虑重重的匈牙利政府高尚得多，而且也比它有远见得多。而同时我们作为德国人，还可以说，我们不愿意拿维也纳人——我们的同胞的那种自发的、独力进行的起义和英勇的抵抗来同匈牙利战争中一切烜赫的胜利和辉煌的战斗相交换；正是这些维也纳人使匈牙利有时间去组织军队，从而去完成这些伟大的业绩。

维也纳的第二个同盟者是德国人民。但他们到处都被卷入了维也纳人所参加的同样的斗争。法兰克福、巴登和科伦都刚刚遭到失败并被解除武装。在柏林和布勒斯劳^①，人民和军队双方都剑拔弩张，战事一触即发。运动的每一个地方中心的情况也都是这样。到处问题都争执不下，只有靠武力来解决。保持德国过去的分裂和涣散状态的不幸后果，现在才第一次被痛切地感到。各邦、各省和各城市的各种不同的问题，在实质上是一样的；但它们在各个地方表现的形式不同，情况不同，在各个地方成熟的程度也不同。因此就发生了这种情形：虽然每个地方都感到了维也纳事变的决定性意义，但没有一个地方能够作一次可以帮助维也纳人的重要的打击，或牵制住敌人的力量；这样，能够帮助他们的就只有法兰克福的议会和中央政权了。各方面都向它们呼吁；但它们做了什么呢？

^①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法兰克福议会和由于它同旧联邦议会的私通而产生的私生子——所谓的中央政权，因维也纳的运动而暴露了它们的彻头彻尾的无能。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这个可鄙的议会早就丧失了它的纯贞，它可以说是少年老成，它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各种胡扯瞎讲和媚妓式的八面玲珑的伎俩。议会最初曾对德国的强盛、复兴和统一满怀梦想和幻想，可是现在只剩下一套到处重复的条顿人的动听言词了，此外还剩下的就是每个议员都坚信他个人十分重要而公众则诚实可欺。最初的质朴被抛弃了；德国人民的代表变成了一些讲求实际的人，就是说，他们深信，他们做的愈少，说的愈多，他们作为德国命运的裁决者的地位就愈安全。这并不是说他们认为他们的许多会议是多余的；完全相反。但他们已经看出，一切真正重大的问题，对于他们都是禁地，他们离得愈远愈好。于是他们像一群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学者一样，以骄傲而勤恳的态度（他们后来的命运正是这种勤恳的报酬）讨论在文明世界的一切地方都早已解决了的理论条文，或者讨论一些永远得不到实际结果的显微镜下的实际问题。这样，议会就成了一所朗卡斯特学校³⁵，议员们在这里互相教授，因而这个议会对他们都有重大意义，而他们都相信，这个议会贡献之大甚至超过了德国人民对它的希望，他们认为，谁要是再无耻地要求它达到什么成果，谁就是祖国的叛徒。

当维也纳起义爆发时，这个议会曾就这个问题作了许多质问、辩论、建议和修正，这些东西当然没有一点结果。中央政权准备加以干涉。它派了两个委员——过去的自由党人韦尔凯尔先生以及莫斯累先生到维也纳去。同这两位德国统一的游侠骑士的英勇事迹和令人惊异的冒险行为比较起来，唐·吉珂德和桑科·判扎的旅行实在可以算是真正的奥德赛了。他们不敢到维也纳去。文迪

施格雷茨恫吓他们，愚蠢的皇帝不理解他们，内阁阁员施塔迪昂公然无礼地愚弄他们。他们的公文和报告也许是法兰克福记录中可以在德国文献里占一席之地的唯一的一部分；这是一部卓越的、道地的讽刺小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它的政府的耻辱的永久纪念物。

国民议会的左派也派了两个委员——弗吕贝尔先生和罗伯特·勃鲁姆先生——到维也纳去，以维持他们在那里的声望。当危机临近的时候，勃鲁姆正确地断定，德国革命的大会战将在这里进行，并且毫不迟疑地决心为此而献出自己的头颅。弗吕贝尔却相反，他以为他的职责是保全自己，好去担当他在法兰克福的重要职务。勃鲁姆被认为是法兰克福议会里最善于雄辩的人才之一，他当然是最得人心的。他的辩才在任何一个富有经验的议会里都是不合乎要求的；因为他太喜欢德国非国教派传教士的那种空洞的高谈阔论，而他的论据既缺乏哲学的锐敏，又缺乏实际的事例。在政治上他属于“温和的民主派”，这是一个相当暧昧的派别，但正是这种在原则问题上的模棱两可，受到许多人的喜爱。虽然如此，但罗伯特·勃鲁姆却具有真正的平民的天性（虽然已经有点脱去平民气了），在决定性的关头，他的平民的本能和平民的气魄就战胜他的模棱两可以及由此造成的动摇不定的政治信念和见解。在这种时刻，他的才干远远超过了 he 平日的水平。

因此，他一到维也纳便看出他的国家的命运要在这里决定，而不是在法兰克福那些堂而皇之的辩论中决定。他立刻下了决心，抛弃了一切退却思想，挑起指挥革命军的担子，行动异常冷静而果断。正是他使维也纳城的陷落迟延了一个长时期，并且烧毁了多瑙河上的塔波尔桥，使该城的一面没有受到攻击。大家都知道，在维

也纳被攻陷以后他就被捕，被军事法庭处死了。他英勇地牺牲了。而法兰克福议会虽然吓得发抖，却装出一副泰然的态度接受了这种血腥的侮辱。它通过了一个决议，就其措词的缓和和委婉来说，与其说是对奥地利的诅咒，不如说是对被害的殉难者坟墓的侮辱。但是，难道能够指望这个卑劣的议会会对它的一个议员——尤其是一个左派领袖——的被杀害表示愤怒吗？

1852年3月于伦敦

十三 普鲁士制宪议会。国民议会

维也纳于 11 月 1 日陷落，同月 9 日柏林制宪议会被解散，这说明维也纳事变怎样立刻助长了全德国反革命党派的气焰和力量。

关于 1848 年夏季普鲁士的事变，不久之前我们已经叙述过了。制宪议会，或者更确切些说，“为了与国王商定宪法而选出的议会”，以及它的由资产阶级代表构成的多数，害怕人民中较积极的成分而同宫廷勾结起来进行种种阴谋，因此它早已失去众望了。他们承认了，或者毋宁说恢复了令人憎恨的各种封建特权，因而出卖了农民的自由和利益。他们既没有能够拟定宪法，也没有能够对总的立法作任何改进。他们差不多只是忙于琐碎的理喻定义、纯粹的形式问题和宪法的仪式问题。事实上，这个议会与其说是一个能够代表人民的任何一点利益的机关，不如说是一个供议员们学习议会 *savoir vivre*（礼仪）的学校。而且，议会中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多数，优势差不多总是取决于动摇的“中间派”，这一派以它忽左忽右的摇摆，起初推翻了康普豪森内阁，后来又恢复了奥尔斯瓦特—汉泽曼内阁。但当自由派在这里也像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坐失时机的时候，宫廷却把它在贵族、最落后的农民以及在军队和官僚中的力量，重新组织起来。在汉泽曼倒台以后，建立了一个由官僚和军官、由一切顽固的反动派组成的内阁，而这个内阁却装

出一副样子，好像它准备考虑议会的要求。议会所持的变通原则是“重要的是措施而不是人”，它使自己大受愚弄，竟对这个内阁鼓掌称赞；这样，它当然就看不到这个内阁几乎公开地在收集和组织反革命势力的事实。最后，维也纳的陷落发出了信号；国王把阁员都撤了职，用以现任的内阁首相曼托伊费尔为首的“办事人物”代替了他们。于是梦中的议会才突然惊醒，意识到大难临头。它通过了一个不信任内阁案，但是对此的回答是立刻来了一道命令，责令议会从柏林，从这个在发生冲突时议会在这里可以指望得到群众的支持的地方，迁到勃兰登堡——一个完全处在政府控制之下的小城镇。但议会宣称，除非它本身同意，它既不能推延会期，也不能迁移或解散。这时候，弗兰格尔将军统率近四万大军进入柏林。市政当局和国民自卫军军官会议决定不予抵抗。于是，制宪议会和它的后盾——自由派资产阶级听任联合起来的反动党派占据了一切重要阵地，并从他们手里夺去了几乎所有的防御手段，在这以后，就开始演出了一场“消极合法抵抗”的大喜剧，而他们本来是想把这次抵抗变成对汉普敦和美国人在独立战争期间最初行动³⁶的光荣模仿的。柏林宣布了戒严，但仍然平静无事；政府解散了国民自卫军，它规规矩矩地缴了械。在两个星期中，议会被军队从一个开会地点赶到另一个地点，到处都被军队所驱散，而议员们却要求市民保持镇静。最后政府宣布把议会解散，它才通过一项决议，宣布征税是非法的，议员们奔走全国，组织抗税。但他们发现，他们选择这种手段是个大错误。在令人忐忑不安几个星期之后，以及政府对反对派采取了严厉手段之后，所有的人都不愿再拒绝纳税以取悦于一个甚至连自卫的勇气都没有的已死的议会了。

是 1848 年 11 月初进行武装抵抗已经太迟了，还是相反：一部

分军队在遇到严重反抗时会转到议会方面来因而使事态的结局有利于议会，——这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永远需要勇敢地面对敌人，而进攻者总是处于有利地位。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在决定性的关头，不计成败地孤注一掷是十分必要的。历史上没有一次胜利的革命不证明这个原理的正确。1848年11月，普鲁士革命的决定性关头来到了，正式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普鲁士制宪议会，不但没有坚决地面对敌人，反而节节后退；进攻就更谈不上了，因为它连自卫都宁肯放弃。在弗兰格尔率领四万大军叩打柏林大门的决定性关头，出乎他和他的军官的意料，他看到的不是布满街垒的街道和变成枪眼的窗口，而是敞开的城门，街道上唯一的障碍物是和平的柏林市民，他们欣赏着自己同他开的这次玩笑——他们把自己手脚全都捆绑起来而听任那些惊异不止的士兵的处置。不错，如果议会和人民抵抗，也许会被击败；柏林也许会遭到炮击，也许会有千百人死亡，而仍然不能阻止王党的最后胜利。但这并不能作为他们立刻缴械乞降的理由。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1848年6月巴黎的失败和10月维也纳的失败，在使这两个城市人民的头脑革命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是2月和3月的胜利所不可比拟的。也许，制宪议会和柏林的人民会遭到和上述两个城市同样的命运，但那时他们虽败犹荣，他们会在活着的人的心里留下一种复仇的渴望，而在革命时期，这种渴望乃是从事坚决激烈的行动的最有力的刺激之一。当然，在一切斗争中，应战的人都有被击败的危险，但这难道能作为不抽刀应战就承认战败、甘受奴役的理由吗？

在革命中，占有决定性阵地而不迫使敌人进攻以试其身手就

把这种阵地丢弃的人，永远应该被视为叛徒。

普鲁士国王解散制宪议会的同一道敕令也宣布了新的宪法，这个宪法是以议会的一个委员会所拟订的草案作为基础的；不过，它在某几点上扩大了国王的权限，而在另外几点上使议会的权力大成问题。根据这个宪法建立了两个议院，这两个议院应该在短期内开会，以便使宪法得到审查和批准。

几乎用不着再问：当普鲁士的立宪派进行“合法而和平的”斗争的时候，德国国民议会究竟在什么地方。像通常在法兰克福所见的情形一样，它忙于通过一些很温和的决议，谴责普鲁士政府的行动，而称赞“全体人民消极地、合法地和一致地抵抗暴力的壮观”。中央政府派委员到柏林去调解内阁和议会间的纠纷，但他们遭到了他们的前任在奥里缪茨所遭受的同样命运——被客气地送出来了。国民议会的左派即所谓激进派，也派遣了他们的委员，这些委员在看到柏林议会完全无用并承认自己也同样无用之后，便回到法兰克福去报告自己的成绩，并证实柏林人的令人称道的和平行为。不仅如此，当中央政府的一个委员巴塞尔曼先生报告说，因为近来常看见各种各样粗野的人物在柏林街头徘徊，而在一切无政府主义运动发生之前总是有这类人物（后来这种人物就被称为“巴塞尔曼式的人物”）出现，所以普鲁士内阁最近所采取的严厉手段并非毫无理由的时候，这些可敬的左派议员和革命的坚决捍卫者便马上起来，发誓证明这个报告不符合实际情况！因此，在两个月当中，已经明显地证明了法兰克福议会的完全无能。再没有比这更清楚地证明这个机构是完全不能胜任它的职务，证明它甚至连自己的任务究竟是什么也毫不理解了。革命的命运在维也纳和柏林都已被决定了，而在这两个首都里解决最重要最迫切的

问题时都好像根本不知道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存在似的，单只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这个机构不过是个由一群轻信笨伯组成的辩论俱乐部。这些人让各邦政府把自己当作议会傀儡，拿来给各小邦和小城市的小店主和小手工业者开心，因为政府认为暂时有必要转移一下这一部分人的视线。这种作法需要作多久，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这个议会的所有的“卓越”人物中，任何一个人都丝毫没有感觉到人家要他扮演的是什么角色，甚至直到今天，法兰克福俱乐部的旧日的成员们也还原封未动地保留着他们所特有的历史感觉器官。

1852年3月于伦敦

十四 秩序的恢复。议会和议院

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利用 1849 年的最初几个月来扩大 1848 年 10 月和 11 月的战果。自从维也纳被占领以后，奥地利的议会就在莫拉维亚的一个叫做克累姆西尔^①的小镇上继续其有名无实的存在。斯拉夫族的议员和选派他们的人曾经充当奥地利政府用来摆脱完全无能为力的状态的主要工具，现在在这里，他们背叛欧洲革命的行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政府一经恢复了力量，便用极端轻蔑的态度来对待议会和构成它的多数的斯拉夫族议员；当帝国军队的最初的胜利已经预示匈牙利战争将很快结束的时候，政府便在 3 月 4 日解散了议会，议员们也被武力驱散了。这时斯拉夫人才终于看到他们是受了愚弄，于是他们大声疾呼：“我们要到法兰克福去继续我们在这里已经不能进行的反对派活动！”但这时已经太迟了，而他们除了或者安分守己或者参加无能的法兰克福议会以外再没有别的出路，单是这个事实也足以表明他们是完全无可奈何了。

德国的斯拉夫人恢复独立的民族生存的尝试，现在而且多半是永远地就这样完结了。有许多民族的零星残余，它们的民族性和政治生命力早已熄灭，因此它们在近一千年来总是不得不尾随在

^① 捷克称作：克罗梅尔日伊希。——编者注

一个更强大的民族即他们的征服者的后面，就像过去威尔士人在英国，巴斯克人在西班牙，下布列塔尼人在法国一样，也像今天西属或法属克里奥洛人在最近被英美族占领的北美洲那些地方一样。这些垂死的民族，如捷克人、克伦地人、达尔马威亚人等等，都力图利用 1848 年的普遍混乱恢复他们在公元八百年时的政治 status quo (状况)。过去一千年的历史应该已经告诉他们，这样开倒车是不行的；虽然易北河和萨利河以东的全部领土确曾一度被斯拉夫血统的民族所占据，但这个事实只能证明德意志族征服、并吞和同化它的古老的东方邻人的历史趋势以及它的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这个事实还证明，德意志人并吞其他民族的趋势过去一向是，现在也还是西欧文明传播到东欧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只有当德意志化的过程进行到那些能够作为独立民族生存的团结一致的大民族（匈牙利人是这种民族，在某种程度上波兰人也是这种民族）的边界时，这种趋势才会停止；因此，这些垂死的民族的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让它们强邻完成这种瓦解和并吞它们的过程。当然，这对曾经把一部分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鼓动起来的泛斯拉夫主义梦想家的民族野心来说，并不是一种很惬意的前途；但是他们怎么能够希望历史为了让少数虚弱的人称心而倒退一千年呢？这些人在他们居住的所有地方到处都是和德意志人混居杂处并且为后者所包围，他们几乎从不能记忆的时候起除了德语以外就再没有别的语言以适应文化的需要，而且他们甚至缺乏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众多的人数和整片的领土。因此，泛斯拉夫主义（在德国和匈牙利的斯拉夫人区域，它掩盖着所有的无数的小民族力求恢复独立的企图）的浪潮到处都与欧洲的革命运动相冲突，同时，斯拉夫人虽然很想扮演自由战士的角色，实际上却

总是(除了波兰的一部分民主派之外)站在专制主义和反动势力的一边。在德国、匈牙利是这样,甚至在土耳其某些地方也是这样。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叛徒,是奥地利政府的各种阴谋的赞助者和主要支持者,在所有革命的民族的心目中,他们是罪人。虽然仅仅由于过分无知,许多斯拉夫人没有参加泛斯拉夫运动的领袖们所制造的关于民族问题的琐屑的纷争,但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在布拉格这个半德意志的城市里,成群的狂热的斯拉夫人曾经一再高呼:“宁受俄罗斯的鞭笞也不要德意志的自由!”在他们1848年的尝试初次遭到失败以后,在奥地利政府给了他们教训以后,下次遇有机会他们大概不会再这样做了。但如果他们再一次准备以类似的借口去和反革命势力联合起来,那末德国的职责就很明显了。没有一个处于革命状态并卷入了对外战争的国家,能够容忍一个万第^①处在自己的心腹之中。

至于奥皇^②在解散议会的同时所颁布的宪法,我们没有必要再谈它,因为它从未生效,现在则已完全废除了。从1849年3月4日起,奥地利已经彻头彻尾地恢复了专制制度。

在普鲁士,议院曾在2月开会,审查和批准国王所颁布的新宪章。它们开了差不多六个星期的会,它们对政府的态度十分谦卑恭顺,但它们当时还没有充分的决心完全遵照国王和他的大臣们的愿望办事。因此,时机一到它们就被解散了。

于是,奥地利和普鲁士都暂时摆脱了议会监督的束缚。奥普

① 万第——法国西部省名。在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和十九世纪初,这里是贵族和僧侣在英国支持下所组织的富农和中农反动叛乱的场所。因此“万第”一词便成为表示富农反革命活动策源地的通称。——译者注

② 即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编者注

两邦政府现在已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并且能够在一切需要的场合使用这种权力。奥地利利用它对付匈牙利和意大利，普鲁士用它对付德意志。因为普鲁士也准备进行一次战役来恢复各小邦的“秩序”。

现在，在德国的两个巨大的运动中心维也纳和柏林，反革命占了上风，只是在较小各邦里斗争的结局还没有完全决定，虽然在那里力量的对比也日渐不利于革命方面。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这些小邦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里找到了共同中心。虽然这个所谓的国民议会的反动性质早已十分明显，连法兰克福的人民也都武装起来反对它，但是它的来源却多少带一点革命性。1月间它曾经采取过一反常态的革命立场；它的权限从未确定，但它却终于能够作出了一项决议——虽然较大各邦从未承认这个决议——说它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在这种情形下，在君主立宪派看到复辟了的专制派已经夺取了它的阵地的時候，差不多全德国的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自然都把他们的最后希望寄托在这个议会的多数派身上，而小资产阶级代表，民主派的核心，在日渐困难的境遇中团结在这个议会的少数派周围，这个少数派的确是民主派在议会中最后的完整的阵容。另一方面，较大各邦的政府，尤其是普鲁士的内阁，日渐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不正常的民选机关和德国已经复辟的君主制度是不能相容的，而它们所以没有要求立刻把它解散，那只是因为时机未到，也因为普鲁士还希望先利用一下它去达到沽名钓誉的目的。

同时，这个可怜的议会本身也一天比一天更加混乱。在维也纳和柏林，它派去的代表和委员都遭到极端的轻蔑；它的一个议员^①在维也纳被当作一个普通造反者处以死刑，虽然他具有议员

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它的法令到处都没有人理睬。如果说较大各邦还曾经提到这些法令，那只是在抗议书中提到，它们在这些抗议书中否认议会有权通过它们的政府必须执行的法律和决定。代表这个议会的中央执行机关，几乎和全德各邦的内阁都发生了外交争辩，而不管国民议会和中央政府如何努力，它们都没有能够使奥地利和普鲁士说明它们的意图、计划和要求究竟是什么。最后，议会终于开始清楚地看到，至少是看到了这样一点：它已失去了一切权力：它本身也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掌握中；如果它真打算给德国制定全联邦宪法，它就必须立刻认真地开始做起来。许多动摇的议员也都清楚地看到，他们被各邦政府大大地愚弄了一番。但他们既然处在这样软弱无力的地位，现在他们又能作些什么呢？唯一能挽救他们的办法是迅速而坚决地转向人民方面，但就是采取这个步骤，成功的希望也是很渺茫的。其次，从这么一群软弱无能、优柔寡断、目光短浅、自满自足的人中间，即从那些在各种互相矛盾的谣言和外交照会的一片不绝的嘈杂声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的时候不停地重复说，他们是德国最优秀、最伟大、最英明的人物，只有他们才能拯救德国并从这些话里寻求唯一安慰和支持的人中间，能找出真正的人才吗？在这些一年的议会生活已把他们弄成道地的白痴的可怜家伙中间，能找到可以作出迅速明确的决定的人吗？至于行动坚决果断的人，那就更不用说了！

奥地利政府终于丢掉了假面具。在3月4日颁布的宪法中，它宣称奥地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君主国，财政、关税系统和军事组织完全统一；这样便抹去了德意志省份和非德意志省份之间的一

① 即罗伯特·勃鲁姆。——编者注

切界线和差别。它这样宣布,是与法兰克福议会已经通过的决议和已经通过的草拟中的联邦宪法的条文相抵触的。这是奥地利对议会的挑战,而可怜的议会除了应战而外,再没有别的路可走。它应战时还大嚷大叫了一番,但奥地利很明白它自己的力量,也很了解议会毫无能力,所以对这些叫嚷根本置之不理。而这个可敬的德国人民的代议机关(它是这样称呼自己的)为了报复奥地利对它的这种侮辱,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而只好自缚手足,跪倒在普鲁士政府面前。说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它向之屈膝跪拜的,正是它曾经谴责他们违背宪法和敌视民意并坚持加以撤换而没有成功的那些阁员。这种可耻的行径和后来发生的悲喜剧事件的详情,将是我们下一篇文章的内容。

1852年4月于伦敦

十五 普鲁士的胜利

我们现在来讲德国革命史的最后一章：国民议会与各邦政府尤其是普鲁士政府的冲突，德国南部和西部的起义及其最后为普鲁士所镇压。

我们已经看到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实际行动了。我们已经看到，奥地利如何践踏它，普鲁士如何侮辱它，各小邦如何不服从它，它自己的无能的中央“政府”又如何愚弄它，而这个中央政府本身又如何被全国各邦的每个君主所愚弄。到最后，这个软弱、动摇、渺小的立法机关终于感到事态的严重了。它被迫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统一德国这个崇高思想的实现受到了威胁。”而这就恰恰等于说，法兰克福议会以及它做过的和要做的一切，看来很快都要成为泡影了。因此它以最认真的态度开始工作，以便尽快地完成它的杰作——“帝国宪法”。

但是这里产生了一个难题。执行机关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是一个执行委员会么？不行；英明的议会考虑到：那样就要把德国弄成一个共和国了。是“总统”么？那也要产生同样的结果。这就是说，必须恢复旧日的皇帝之尊了。但是皇帝总是要由一个君主来充任的，究竟谁该做皇帝呢？自然不能是罗伊森—格累茨—什雷茨—罗宾斯坦—艾贝斯道弗的公爵以至巴伐利亚国王这些 *dii minorum*

gentium^①，这是奥地利和普鲁士都不能容忍的。只有奥地利的或普鲁士的才行。但这二者怎样取舍呢？毫无疑问，如果环境更好的话，如果不是奥地利政府斩断戈尔迪之结^②因而使议会解脱了麻烦的话，这个崇高的议会可能直到今天还在开会，还在讨论这个重要的左右为难的问题而得不到结论。

奥地利十分清楚，一旦它把它的一切省份驯伏，而重新以一个强大的欧洲大国出现在欧洲的时候，政治引力定律自然就要使德国其他部分跟着它走，而不需要借助于法兰克福议会授与它的皇冠所带来的威信。奥地利自从扔掉那个毫无实际意义的德皇皇冠以后，它已经更加强盛得多了，行动也更加自由得多了。那个皇冠只是妨碍了它实行独立的政策，而并没有在德国国内国外给它增加一点点力量。如果奥地利不能在意大利和匈牙利保持它的阵地，那么它在德国的权威也会完全丧失，它的势力将化为乌有，它永远也不要再想拿回它还在全盛时期就已失去的皇冠。因此，奥地利立刻宣称它根本反对恢复皇权，而明确地要求恢复联邦议会——即被 1815 年的各个条约提到和承认的唯一的德国中央政府。它在 1849 年 3 月 4 日颁布的宪法，则明确宣布奥地利是个不可分割的、中央集权的和独立的君主国，它甚至与法兰克福议会所要改组的那个德国也毫不相干。

这种公开宣战使得法兰克福的圣人们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得把奥地利槟除于德国之外，而把德国的其余部分建成一个东罗

① 直译是：小神；转意是：二流人物。——编者注

② 古希腊传说，弗里吉亚国王戈尔迪用乱结把轭系在马卓的轭上，牢固不可解，声言能解此结者，得以统治整个亚洲，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拔剑斩开此结。“斩断戈尔迪之结”一语的转意就是以大刀阔斧的方法解决复杂的问题。——译者注

马帝国——“小德意志”；把它那相当粗陋的皇袍加在普鲁士国王陛下的肩上。应该提到，这是六至八年前德国南部和中部的一群自由主义空论家们所提倡的那种旧的计划的复活，这些人把上述有失体面的状况视为天赐的良机，因为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可以把旧日的幻想重新提出作为拯救祖国的“最新的一着”。

因此，1849年2月和3月间，议会结束了关于帝国宪法以及权利宣言和帝国选举法的讨论，同时不得不在许多地方作了十分矛盾的让步——时而向保守派或者更确切些说向反动派让步，时而又向议会中较进步的派别让步。很明显，从前属于右派和右翼中间派（保守派和反动派）的议会领导权，现在逐步地（虽然是徐缓地）转到议会中的左派或民主派方面来了。议会中奥地利代表的颇为暧昧的立场（虽然这个议会把他们的国家摒除于德国之外，但他们仍然被邀参加开会和进行表决），也促使议会中的均势遭到破坏；因此早在2月底，左翼中间派和左派就常常由于奥地利代表的支持而居于多数地位了，虽然有的时候保守的奥地利代表好像开玩笑似的忽然又投右派的票，使优势又倒向另一边。他们使议会这样忽左忽右，其目的是想让它为人所轻视，但这是完全用不着的，因为人民群众早已认识到法兰克福所做的一切纯粹是空洞无益的东西了。不难了解，在当时这种左右摇摆的情形下拟定的宪法，究竟是怎样一种东西了。

议会中的左派（他们自信是革命德国的精华和骄傲），完全陶醉于依靠一些受奥地利专制制度的唆使并为它服务的奥地利政客的好意（更确切些说是恶意）而取得的一些微小的胜利。每当一种稍稍接近于他们自己的那些毫不明确的原则的主张以一种用顺势疗法冲淡了的形式获得法兰克福议会的某种批准时，这些民主派

就宣称他们已经挽救了国家和人民。这些可怜的蠢人，在他们的整个是十分黯淡的一生中，绝少遇到胜利一类的事情，以致他们真正相信以两三票的多数通过了他们那种琐屑的修正案，就会改变整个欧洲的面貌。自他们从事立法事业之初，他们就比议会中任何其他派别更深地感染了**议会迷**这样一种不治之症，这种症候使它的不幸的患者充满了一种庄严的信念，似乎整个世界，它的历史和它的未来，都要由这个很荣幸地得到他们作为议员的代议机关的多数票来支配和决定；他们深信，他们议院四壁以外发生的所有一切——战争、革命、建筑铁道、整批的新的大陆的殖民地化、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中美洲运河的开凿、俄罗斯的军队以及其他多少可以影响人类命运的事情——同完全取决于目前正受到他们这个可敬的议会的关注的重要问题的解决的那些无可比拟的事件比较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于是，议会中的民主派只是因为他们成功地在“帝国宪法”里偷偷夹带了他们的几种方案，便认为自己有义务首先对它加以支持，虽然这个宪法的每一重要条款都和他们自己所常常宣扬的原则正相矛盾。最后，当这个畸形的作品的主要作者们把这个作品抛弃，把它遗赠给民主派的时候，后者就接受了这份遗产，并且坚持这个**君主制**的宪法，甚至反对那些在**当时**主张民主派自己的**共和主义**原则的人。

但是应该承认，这里的矛盾不过是表面的。帝国宪法的不明确、自相矛盾和不成熟，正是反映了这些民主派先生们的政治思想的不成熟、混乱和自相矛盾。如果说他们自己所说的话和所写的文章——既然他们一般都有能力写作——还不能充分证明这一点，那末他们的行为就是充分的证据。因为对头脑正常的人说来，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

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而这些德国民主英雄们的行动,是足以充分说明他们自己的,这我们以后就可以看到。不管怎样,帝国宪法及其一切附属物和装饰品是完全被通过了,3月28日,普鲁士国王在二百四十八票弃权和二百位议员缺席的情况下以二百九十票当选为德国(奥地利除外)皇帝。这真是历史的一个绝大的讽刺:在1848年3月18日革命后三天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惊愕的柏林的街道上演出了一出帝王的滑稽剧37(当时的情形如果是在别处发生,他也许会被认为触犯了缅因州的禁酒令),而恰好在一年之后,这个令人厌恶的滑稽剧却被一个虚构的全德代表会议所批准。德国革命的结果就是这样!

1852年7月于伦敦

十六 国民议会和各邦政府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把普鲁士国王选为德国(奥地利除外)皇帝以后,便派遣一个代表团到柏林去授予他皇冠,然后就宣告休会。4月3日弗里德里希·威廉接见了代表们。他告诉他们说,虽然他接受人民代表投票所赋予他的凌驾于德国其他各邦君主之上的权利,但在他还没有确信其余各邦君主承认他的统治权和承认赋予他这些权利的帝国宪法以前,他是不能接受皇冠的。他接着说,考虑这个宪法是否可以予以批准,这是德国各邦政府要做的事。最后他说,做皇帝也好,不做皇帝也好,他时刻都准备着以武力打击内部或外来的敌人。我们将会看到,他以使国民议会十分吃惊的方式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法兰克福的圣人们经过一番深刻的外交研究之后,终于得出结论说,作这种答复就等于拒绝皇冠。于是他们(在4月12日)作出一项决议:帝国宪法是国家的法律,必须加以遵守。但是,由于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他们就选举了一个三十人的委员会,要它就如何才能实施这个宪法提出建议。

这个决议就是法兰克福议会和德国各邦政府之间现在已爆发的冲突的信号。

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立即宣布拥护新的法兰克福宪法。他们不能再等待“终结革命”的时刻了。在奥地利和普鲁士,

由于武力的干涉，革命当时已经终结。上述各阶级本想选择一个较和平的方式来执行这个任务，但他们没有得到机会。事情既然已经做了，只得妥协一下，——这就是他们立即采取的并坚决执行了的决定。在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的较小各邦，资产阶级早已局限于那种最合他们心意的、表面上轰轰烈烈但由于没有实力而毫无成效的议会鼓动。这样一来，德国每一个邦都好像得到了一种新的、据说能使它们今后走上和平立宪发展道路的确定的形式。只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关于德意志联邦的新的政治组织的问题。人们认为这个唯一的、看来还包含着危机的问题必须立刻加以解决。于是资产阶级就对法兰克福议会施加压力，要它尽快制订宪法；于是大小资产阶级都决心接受并赞助这个宪法（不管它是怎样一种东西），以便立即造成一个稳定的局面。总之，要求制定帝国宪法的运动一开始就是从一种反动的情感中产生的，并且是从那些早已厌倦革命的阶级中产生的。

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未来的德国宪法的首要的基本原则，在 1848 年春天和夏天即革命的最初几个月就已经通过了；当时，人民运动还处在高潮时期。那时通过的决议虽然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反动的，但在经历了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的暴虐行为之后，现在看起来它们却是非常有自由主义甚至民主主义精神的了。衡量它们的标准变了。法兰克福议会如果勾消这些它曾经通过的决议，而根据在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的刀剑的威逼下制定的那些宪法的模样去仿造一个帝国宪法，那它就等于在道德上自杀。而且，我们已经说过，议会中多数派的地位已经掉换，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势力不断增大。因此，帝国宪法的特色是：它不仅在表面上完全出自民意，同时，虽然它充满了矛盾，却仍然是全德国最富于自由主

义精神的宪法。它的最大缺点在于它只是一纸空文，它的条文没有实力作为后盾。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民主派即小资产阶级群众抱住帝国宪法不放，也是很自然的事。这一阶级的要求，一向是比自由派的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更进一步的；它曾经表现出比较强硬的态度，常常以武力对抗相要挟，经常慷慨地宣称它为争取自由不惜鲜血和生命；但是许多事实证明，一到危急关头它就不见了，而在遭到彻底失败的第二天，他却觉得再舒服也没有了，这时虽然一切都失掉了，但他至少可以自慰的是：无论如何事情总算已经做了。所以，当大银行家、大工厂主和大商人对法兰克福宪法的拥护比较慎重，只愿意简单地对它表示赞成的时候，紧挨在他们下面的阶级——我们的勇敢的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却堂而皇之地出面，像往常一样地宣称，他们宁愿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让帝国宪法遭到破灭。

得到这两派——君主立宪派资产阶级和多少带有民主主义倾向的小资产阶级——支持的、要求立即实施帝国宪法的运动进展很快，它在几个邦的议会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表现。普鲁士、汉诺威、萨克森、巴登和维尔腾堡的议院都宣称赞成这个宪法。各邦政府和法兰克福议会之间的斗争尖锐化了。

可是，各邦政府迅速行动起来了。普鲁士的两院被解散了，这是违宪的，因为它们还要审查和批准普鲁士宪法；政府故意在柏林激起了骚动；过了一天，即4月28日，普鲁士内阁发布了一个通告，声称帝国宪法是一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的文件，德国各邦政府必须重新予以审查和加以清洗。普鲁士就这样不客气地否认了法兰克福的圣人们常常夸耀而从未真正实现过的自主的制宪权。于是召集了一个各邦君主的大会³⁸（它是旧联邦议会的复活）来讨

论已被宣布为法律的宪法。同时，普鲁士把军队集中于离法兰克福只有三天路程的克罗茨纳赫，并且建议各小邦效法它的榜样，在各该邦的议院赞助法兰克福议会时立即予以解散。汉诺威和萨克森马上照着普鲁士的榜样做了。

显然，斗争的结局只有靠武力来决定了。各邦政府的敌对态度和人民中的骚动，一天比一天更加明显。具有民主情绪的市民到处力图影响军队，在南德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到处举行群众大会，会上通过决议准备在必要时以武力支持帝国宪法和国民议会。科伦为此召开了一个莱茵普鲁士各市议会代表的会议。在普法尔茨、在贝尔格区、在富尔达、在纽伦堡、在奥顿瓦尔德，农民成群地集会，情绪十分激昂。这时，法国的制宪议会解散了，各地都在激烈的骚动中准备新的选举；而在德国的东部边境，匈牙利人通过连续不断的光辉的胜利在不到一个月的期间把奥地利的侵略浪潮从蒂萨河压回到莱达河，每天都有进占维也纳的可能。总之，人民的想像到处都达到了最高点，而各邦政府的挑衅政策也一天天更加露骨，暴力冲突是必不可免了，只有怯懦的低能儿才会相信斗争可以和平解决。但正是这种怯懦和低能在法兰克福议会里得到了最广泛的表现。

1852年7月于伦敦

十七 起义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德国各邦政府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冲突，终于在 1849 年 5 月初爆发为公开的敌对行动。被奥地利政府召回的奥地利议员，除了其中的少数左派或民主派议员外，已经离开议会回去了。大多数保守派议员看到事态的动向，甚至不等他们各自的政府提出要求就是出了议会。因此，即令撇开前几篇文章中所指出的足以加强左派势力的种种原因不谈，仅只右派议员的离职，就足以使议会里以前的少数转变为多数了。以前从未梦想到会获得这种好运的新的多数派，过去曾经利用自己的反对派地位尽情揭发旧多数派及其帝国政府的软弱、犹豫和怠惰，现在**他们自己**突然来代替这个旧多数派的地位了。现在要**他们**表明他们能做出怎样的事业来了。**他们**的活动自然应该是有魄力、决心而充满生气的。**他们**，德国的精华，很快就能够推动老朽的帝国摄政和它的动摇的阁员们前进，如果做不到的话，他们就要（谁敢怀疑这一点！）以人民主权的力量废除这个无能的政府，用一个精干的、不屈不挠的执行机关代替它，这个机关一定能挽救德国。可怜的家伙们！**他们**的统治——如果没有一个人服从也能称为统治的话——和他们的前任的统治比较起来，是更加荒唐可笑的。

新的多数派宣称，不顾一切障碍，帝国宪法必须实行，并且必须立即实行；7 月 15 日人民要选举新议院的议员，而这个议院 8

月 22 日就要在法兰克福开会。这是向未承认帝国宪法的各邦政府——首先是占德国总人口四分之三以上的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公开宣战；各邦立即接受了这种宣战。普鲁士和巴伐利亚也召回了由它们境内派往法兰克福的代表，并加紧它们反对国民议会的军事准备。另一方面，议会以外的民主派拥护帝国宪法和国民议会的示威，也一天比一天更加激烈，工人群众在激进党派领导之下，也决心拿起武器捍卫这个事业。这虽然不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但是使德国摆脱旧的君主制枷锁至少使有可能稍微接近于实现他们的目的。于是人民和政府到处为此而剑拔弩张；冲突是不可避免了；地雷已经装好，一点火星就可以使它爆炸。萨克森议院的解散、普鲁士后备军的召集、各邦政府对帝国宪法的公开反对就是这种火星。火星落下了，于是整个德国马上燃起了熊熊的大火。德勒斯顿的人民在 5 月 4 日胜利地占领了该城，驱逐了国王^①；同时一切邻近的地区都派遣援军帮助起义者。在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里亚，后备军拒绝开拔，占领了兵工厂，武装起来捍卫帝国宪法。在普法尔茨，人民逮捕了巴伐利亚的政府官吏，夺取了公款，组织了一个保卫委员会，委员会宣布该省受国民议会的保护。在维尔腾堡，人民强迫国王^②承认了帝国宪法。在巴登，军队和人民联合起来逼使大公^③逃亡，并建立了临时政府。在德国其他地方，只要国民议会发出决定信号，人民就武装起来听它指挥。

虽然国民议会过去的历史不大光彩，现在它的处境却出乎意

① 即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编者注

② 即威廉一世。——编者注

③ 即列奥波特。——编者注

料的好。西半部的德国已经拿起武器来捍卫议会；军队到处都发生动摇，在较小各邦，军队明显地站在运动方面。匈牙利人胜利的挺进已使奥地利精疲力竭，俄罗斯——德国各邦政府的后台则正在以全副精力帮助奥地利对抗马扎尔军队。只有普鲁士尚待制服；由于该邦存在着对革命的同情，达到这一目的毫无疑问是可能的。总之，一切都取决于议会的行动了。

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被忽视，那末忽视它们的政党就会遭到灭亡。这些规则是从各政党的性质和在这种情况下所要对待的环境的性质中产生的逻辑推论，它们是如此浅显明白，1848年的短时期的经验已经使德国人十分熟悉它们了。第一，不要玩弄起义，除非你有充分的准备来应付因此而招致的后果。起义是一种带有若干极不确定的数的方程式，这些不确定的数的值每天都可能变化。敌人的战斗力量在组织、训练和传统的威望方面都占居优势；如果起义者不能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他们就要被击溃和被消灭。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者第一次胜利的行动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军队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总之，要按照至今人们所知道的一位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 *de l' audace, de l' audace, encore de l' audace!* (勇敢, 勇敢, 再勇敢!) 这句话去行动。

那末，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要想避免威胁着它的灭亡的命运，它应当怎么办呢？首先要把局势弄清，并且要认识到，现在除了无条件地向各邦政府屈服或者毫不动摇地坚决实行武装起义以外别无选择的余地。其次，它要公开承认一切已经爆发的起义，并号召各处的人民武装保卫国民代议机关，宣布一切敢于反对有主权的人民（他们的委任者便代表他们）的君主、阁员以及其他人不受法律保护。第三，要立即废除德意志帝国摄政，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活跃的、**毫不退缩**的执行机关；召集起义的武装力量到法兰克福来直接保护它，从而给起义的扩展一个合法的借口；要把它所指挥的一切战斗力量组织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总之，要迅速而坚决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巩固自己的阵地，削弱敌人的阵地。

法兰克福议会里善良的民主派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这些可敬的先生们不满足于他们听任事变自然发展的态度，更进而以反对行动来扼杀一切正在准备中的起义运动。例如，卡尔·福格特先生在纽偷堡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让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里亚的起义被镇压下去而不予任何援助，只是在事后对普鲁士政府的残酷暴行作了感伤的抗议。他们和南德的起义暗中保持着外交关系，但从未以公开承认的方式来支持这些起义。他们知道，帝国摄政是站在各邦政府方面的，但他们却呼吁他（后者对这一点毫不理睬）去反对这些政府的阴谋。帝国的阁员即旧日的保守派，每次开会都嘲笑这个无能的议会，而它也就容忍了这些嘲笑。当西里西亚的议员、“新莱茵报”编辑之一的威廉·沃尔弗，要求议会宣布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公正地指出帝国摄政是帝国第一个和最大的叛徒时，他却被这些激愤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全场一致地哄下台去了！简单说来，他们继续清谈、抗议、发宣言，但

一直没有行动的勇气或意识；各邦政府派来的敌军日渐逼近，而他们自己的执行者（帝国摄政）却忙于和各邦君主密谋尽快地消灭他们。这时，这个可耻的议会连最后一点威信也失去了；那些起来保护它的起义者也不再关心它的命运了。最后，当它那可耻的末日到来时（我们以后将要讲到），它就不被任何人注意地、不光彩地消逝了。

1852年8月于伦敦

十八 小资产阶级

在前一篇文章中，我们指出了德国各邦政府和法兰克福议会之间的斗争，终于达到如此激烈的程度，在5月初几天德国很大一部分地区都爆发了公开的起义：首先在德勒斯顿，接着在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在莱茵普鲁士的部分地区，最后在巴登。

在这一切场合，起义者**真正的战斗**的力量，是首先拿起武器与军队作战的**城市工人**。一部分最穷苦的农村居民，即雇农和小农，一般是在冲突爆发后参加了工人的队伍。资本家阶级以下的一切阶级的青年，大多数至少曾一度参加了起义的队伍，但这一群颇为混杂的青年人，一到事态的严重时刻，便很快减少了。例如大学生，这些“知识的代表者”（他们喜欢这样称呼自己）就首先丢掉他们的旗帜，除非他们由于被授予官衔而留下来，但是对于这种职务，他们当然很少具备必要的才能。

工人阶级参加了这次起义，正像他们也会参加其他起义一样，——只要这种起义能清除他们在取得政治统治和实行社会革命道路上的一些障碍，或至少可以迫使那些势力较大而勇气较小的社会阶级采取一种比他们以前所采取的更坚决更革命的方针。工人阶级拿起武器时已清楚地认识到，从直接目的来说，这次起义并不是它自己的斗争；但它仍然执行了对它来说是唯一正确的策略：决不让任何以它为垫脚石的阶级（像1848年资产阶级所做过

的)巩固其阶级统治,除非这一阶级至少给工人阶级提供一个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斗争的自由场地。在任何情况下,工人阶级都力图使事情达到危机状态,这一危机不是使整个民族坚决果断地走上革命道路,就是使革命前的 status quo (状况)尽量恢复,从而使新的革命不可避免。在这两种场合,工人阶级都是代表整个民族的真正的和被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因为它尽量加速革命的进程,而这个革命对于文明欧洲的任何一个旧社会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没有这个革命,文明欧洲的任何一个旧社会都体想较安稳较正常地继续发展它的力量。

至于参加这次起义的农村居民,他们大半是这样投入革命派的怀抱的:一部分是由于捐税过重,一部分是由于压在他们身上的封建义务过重。他们本身没有任何主动性,总是尾随在举行起义的其他阶级的后面,在工人与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之间左右摇摆。他们站在哪一边几乎总是由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地位决定的。雇农通常是和城市工人结合起来;小农民私有者则倾向于和小资产阶级携手。

这个小资产阶级(它的重大作用和影响,我们已经几次提到过了),可以被认为是 1849 年五月起义的领导阶级。因为,在这一次,运动的中心没有一个是德国的大城市,所以小资产阶级(它在中小城市里经常是占优势的)便能够掌握运动的领导权。而且,我们已经知道,这次维护帝国宪法和德国议会权利的斗争,正是同这个阶级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在一切起义地区所组织的临时政府中占大多数的都是这一阶级的人,因此,从它们活动的范围就正可以判断,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究竟能够做些什么。我们将要看到,它除了使托付给它的运动遭到失败而外,什么也不能做。

长于吹牛的小资产阶级，在行动上十分无能，而且不敢作任何冒险。商业交易和信贷业务的细小规模，深深地影响到这个阶级的性格，使它缺乏魄力和进取心，所以它的政治活动也自然具有这些特点。而事实上，小资产阶级是用漂亮的言词和吹嘘它要完成什么功绩来鼓励起义的；一当起义完全违背它的愿望而爆发起来，它就急于攫取权力；但它使用这种权力只是为了毁灭起义的成果。每当一个地方的武装冲突到了危急关头，小资产阶级就十分害怕所造成的、对他们是危险的局势：害怕接受了他们的浮夸的号召而认真武装起来的人民，害怕已经落在他们手里的政权，尤其是害怕他们被迫采取的政策会给他们自己、给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的财产带来的后果。人们不是希望他们真的像他们常说的那样，为了起义，可以不惜牺牲“生命财产”吗？他们在起义时不是不得不担任官方职务，因而在失败时就有失去自己的资本的危险吗？而在起义胜利时，作为他们的战斗主力的胜利的无产阶级不是就一定把他们赶下台来并根本改变他们的政策吗？这样，小资产阶级就被种种互相矛盾的危险团团包围，它除了让一切都听天由命之外，再也不知道如何使用它的权力了；因此，它当然也就失去了取得胜利的小小的希望，而把起义完全断送了。小资产阶级的策略，更确切些说，小资产阶级的毫无策略，到处都是一样，所以 1849 年 5 月德国各个地方的起义，也都是由一个模子铸出来的。

在德勒斯顿，巷战继续了四天之久。德勒斯顿的小资产阶级，“市自卫军”，不仅没有参加斗争，反而在许多场合支持军队镇压起义者的行动。起义群众差不多又完全是周围工业区的工人们。他们找到了一个能干的、头脑冷静的指挥者——俄国的流亡者米哈

伊尔·巴枯宁,后来他被俘了,现在被囚禁在匈牙利蒙卡奇^①监牢里。由于人数众多的普鲁士军队的干涉,这次起义被粉碎了。

在莱茵普鲁士,只发生了一些不大的搏斗。因为所有的大城市都是被许多炮台所控制的堡垒,起义者只能进行一些小的战斗。大批的军队一集中,武装反抗就终止了。

在普法尔茨和巴登则相反,起义者占领了一个富饶的省份和整个的邦。金钱、武器、兵士、军需品这里应有尽有。正规军的士兵们本身就参加了起义队伍;在巴登他们甚至是起义的先锋。萨克森和莱茵普鲁士的起义作了自我牺牲,使南德得到了时间来组织运动。一省范围内的地方起义,还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有利的条件。巴黎也有爆发革命的可能;匈牙利人已兵临维也纳城下;在德国中部各邦,不仅人民,连军队也都坚决赞助起义,一等有适当机会就公开加入起义。可是落在小资产阶级手里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遭到毁灭。小资产阶级的统治者,尤其是在巴登(以布伦坦诺先生为首),无论如何也忘不了他们篡夺“合法的”君主即大公的地位和特权,是一种叛逆行为。他们坐在阁员的安乐椅里深感内咎。能够希望这些懦夫有什么作为呢?他们不仅对起义放任自流,使它分散行动因而毫无结果,并且还竭力磨去运动的锋芒,使它软弱无力,从而摧毁这个运动。由于一批深谋远虑的政客即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英雄们的热诚支持,他们做到了这一点;这些英雄们当真相信他们自己是在“拯救祖国”,因而让布伦坦诺这样一些比较圆滑的人牵着他们的鼻子走。

至于军事方面,过去还从没有见到过比巴登总指挥济格尔(他

^① 乌克兰称作:木卡切沃。——编者注

过去是正规军的中尉)所指挥的更粗率、更蠢笨的战斗行动。一切都杂乱无章,一切有利时机都放过了,一切宝贵的时刻都浪费在考虑一些巨大而不能实现的计划上,到最后,当能干的波兰人梅洛斯拉夫斯基担任指挥的时候,军队已经是组织涣散、迭遭败北、士气沮丧、给养恶劣,这样对抗着四倍于他们的敌人。梅洛斯拉夫斯基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在瓦格霍伊泽尔作了虽未胜利但很光荣的一战,进行了一次机智巧妙的退却,在拉施塔特城下作了最后一次绝望的战斗便辞职了。由于起义军是由老练的士兵和新召入伍的士兵混合组成的,所以在这次战争中,也像在所有其他起义战争中一样,革命军队虽然在很多场合表现得英勇顽强,但同时也有许多次表现了士兵所不应有的、常常是不可理解的惊慌失措。但是,尽管有这种种不可避免的缺陷,这支军队至少有一点是可以对自己表示满意的,这就是:它让敌人看到,四倍的兵力还是不足以把它击溃,十万正规军与两万起义者接触时,他们在军事上不能不对这两万人怀着巨大的敬意,就像他们面对的是拿破仑的老近卫军一样。

起义在5月爆发;1849年7月中旬它完全被镇压下去。第一次德国革命就此完结了。

十九 起义的终结

当德国的南部和西部举行公开起义的时候，当各邦政府费了十多个星期的时间——从德勒斯顿的军事行动开始到拉施塔特投降——来扑灭第一次德国革命的这最后一团火焰的时候，国民议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它的退场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法兰克福的这个高级机关，由于各邦政府对它的尊严进行放肆的攻击，由于它自己所创立的中央政权的软弱和背叛性的怠惰，由于拥护它的小资产阶级和追求更革命的最终目的的工人阶级的纷纷起义而陷于惊慌失措的状态。悲观和失望完全支配了它的谈员们；事变立刻采取了如此明确而肯定的转变，几天之内，这些博学的立法者对他们的真正力量和势力所作的一场好梦就完全破灭了。保守派得到各自政府的示意，早已退出了这个除非向各个合法政权挑战今后便不能够再存在下去的议会。慌乱一团的自由派认为事情已无可挽救，他们也把议员的职务扔掉了。这些可敬的先生们成百地开了小差。议员最初有八九百人，但是这个数目急速地减少，以致法定人数只好规定为一百五十人，而几天之后又改为一百人。但是甚至这个法定人数也很难达到，虽然全体民主派都还留在议会里。

剩下的议员该做什么是十分明显的了。他们只有公开而坚决地站在起义方面，给予起义以合法性所能赋予它的一切力量，这样

他们自己也就能立刻得到一支军队来保护自己。他们应该要求中央政权立即使一切军事行动停止,如果这个政权既不能也不愿这样做(这是预先就可以看得到的),就立即废除它而代之以一个更有力量的政府。如果不能把起义部队调到法兰克福(在最初各邦政府对斗争缺乏准备、还处在犹豫不决状态的时候,这一点并不难做到),那末议会可以不失时机地迁移到起义区域的中心地点去。这一切如果在5月中或5月底以前立刻坚决地实行,起义和国民议会就还有取胜的希望。

但是谁也不能指望德国小市民阶级的代表会采取这样坚决的行动。这些抱负不凡的政治家一点也不能抛开他们的幻想。那些已经失去他们对议会的力量和不可侵犯性的不幸信念的议员们,已经溜之大吉,要让剩下的民主派放弃他们整整一年来所怀抱的对于权力和虚荣的梦想又很不容易。他们忠实于他们以前所采取的方针,百般回避坚决的行动,直到最后失去了一切胜利的希望,甚至一切光荣地失败的希望。他们进行了一些纯粹表面上的无事忙的活动(这种活动的毫无效果和它的虚张声势,只有使人觉得既可怜又可笑),他们继续向对他们毫不理睬的帝国摄政和公开同敌人联合起来的阁员发布决议、文告和请求。而最后,当施特里高^①的威廉·沃尔弗,“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整个议会中唯一的真正革命者宣称,如果他们严肃对待他们所说的话,他们就应该结束空谈,立刻宣布德国最大的叛徒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时,这些议会绅士们积蓄已久的义愤,一下子全都爆发出来了,而其来势之猛,连政府一再凌辱他们的时候也从没有看到过。当然按理也应该如

^① 波兰称作:斯特舍哥姆。——编者注

比,因为沃尔弗的提议是圣保罗教堂³⁹四壁之内说出的第一句通达情理的话;因为他所要求的正是必须做的,而话又说得那末直截了当,一针见血,所以不能不使那班多情善感的人感到侮辱,这些人只有在不坚决这一点上是坚决的,他们怯于行动,而且下了永久不变的决心:什么都不做——这就是应该做的。每一句像闪电一样照亮了蒙蔽他们的头脑而他们自己又有意地加以保持的迷雾的话,每一个能把他们引出他们要尽可能在里面多呆一些时候的迷宫的建议,每一种对于实际情况的清楚的见解,当然都是对这个自主的议会的尊严的冒犯。

当法兰克福的可敬的议员先生们的地位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虽然他们提出了种种决议、申诉、质问和宣言),他们就很快退却了,但不是到起义地区去,因为采取这一步骤未免太胆大了。他们到了斯图加特,那里的维尔腾堡邦政府保持着观望的中立态度。在这里,他们终于废黜了帝国摄政,从他们自己中间选举了一个五人摄政。这个摄政立刻通过了义务兵役法,并按规定手续通告德国各邦政府。议会的这些真正敌人被命令去征兵保卫议会!于是便创造了——当然是在纸上——一支保卫国民议会的军队。师、旅、团、炮兵连,一切都被规定好和安排好了。所缺乏的只是实在的东西,因为这支军队当然从来没有出世。

还有最后一条出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国民议会面前。怀有民主主义精神的人民,从全国各地派来代表团请求议会的指挥,并催促它采取坚决的行动。人民知道维尔腾堡政府的真正意向,恳求国民议会强迫这个政府公开而积极地参加各邻邦的起义。但力气是白费了。国民议会迁到斯图加特,就完全听维尔腾堡政府的摆布了。议员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便压制人民中间的骚动。这样他

们便丧失了他们还可以保持的最后一点点影响。他们获得了应得的轻蔑；维尔腾堡政府在普鲁士和帝国摄政的逼迫下结束了这出民主的滑稽剧：在1849年6月18日封闭了议会开会的大厅，命令摄政的成员离开该邦。

于是他们去到巴登，去参加起义者的阵营，但现在他们在那里已经是无用的东西了。没有一个人理睬他们。可是摄政仍然以有自主权的德国人民的名义在继续努力拯救祖国。它企图获得外国列强的承认，对一切愿意领取护照的人都发给护照。它不断发表宣言，派委员到维尔腾堡那些它曾经拒绝及时地予以积极支援的地区去发动起义；这一切当然没有成功。现在我们手边有一篇报告原文，是这些委员之一律斯勒先生（埃尔斯^①的议员）寄给摄政的，它的内容很能说明问题。报告注明1849年6月30日于斯图加特。律斯勒先生在描写了六位委员募集资金毫无收获的奇遇之后，举了一大堆理由说明他为什么一直没有到达指定的地点，接着又就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之间可能发生的纷争及其可能引起的后果发表了深谋远虑的见解。他详细地考察了这一切以后，却得出结论说，仍然没有什么可指望的。其次他提议由可靠人员组成驿站式的机构以传达消息，并建立谍报机构以侦查维尔腾堡内阁的意向和军队的调动情形。这封信没有寄到收信人手里，因为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摄政”已完全搬到“外交部门”即瑞士去了。当可怜的律斯勒先生正在为一个衰败王国的可怕内阁的意向而绞脑汁的时候，十万个普鲁士的、巴伐利亚的和黑森的兵士，已经在拉施塔特城下的最后一战中把整个事情解决了。

^① 波兰称作：奥列斯尼察。——编者注

德国的议会就这样消失了，德国革命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创造物也随之消失了。议会的召开是对德国确曾有过革命这一事实的第一次法律确认；这个议会一直存在到这第一次现代的德国革命完结的日子。在资本家阶级的影响下由分裂涣散的农村居民（它的大多数刚刚从封建制度的黑暗中觉醒过来）选举出来的这个议会，它的作用是把 1820—1848 年间一切有名的大人物统统集中在政治舞台上，然后又把他们彻底葬送。这里集中了资产阶级自由派所有的知名人士。资产阶级期待奇迹，但是却给自己和自己的代表挣来了耻辱。工商业资本家阶级在德国遭受的失败，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惨重。最初他们在德国各邦被打败，被击溃，被逐出官场，后来在德国的中央议会里遭到痛击，遭到侮辱和嘲笑。政治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不管是采取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的形式），在德国永远不可能实现了。

德国议会在其存在的后期，使 1848 年 3 月以来领导公开反对派的那一帮人，那些代表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的利益并部分地代表农民的利益 of 民主派，遭到永久的耻辱。这一阶级在 1849 年 5 月和 6 月，曾得到机会来表现它在德国组织一个稳定的政府的能力。我们已经看到它遭到了怎样的失败；它的失败与其说是由于环境不利，不如说是由于它在革命开始以来的一切重要运动中一贯表现出明显的怯懦；它遭到这种失败是由于它在政治上也表现了同样的短见、畏缩和动摇，这些正是它的商业活动的特点。1849 年 5 月，它已经由于这种行为而失去了欧洲所有起义的真正战斗力量——工人阶级的信任。可是当时它还有取得胜利的机会。德国的议会在反动派和自由派退出以后，完全在它掌握之中。农民也都赞助它。只要它认清事态，坚决勇敢地行动起来，各小邦三分

之二的军队，普鲁士三分之一的军队，普鲁士后备军或自卫团的大多数，都准备和它一致行动。但领导这一阶级的政客们，并不比追随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更有远见。他们比自由派更加盲目，更热衷于他们有意保持着的幻想，更易受欺骗，更缺乏正视事实的能力。他们的政治作用也降到零度以下了。但是由于事实上他们还没有实现他们那些陈腐的原则，所以在十分有利的环境下，他们本来还能够再活跃一个短时期；但是，最后的这一点希望也被**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剥夺了，正像他们的法兰西“纯民主派”伙伴们一样。

德国西南部起义的失败和德国议会的解散，结束了第一次德国革命的历史。最后，我们还需要看一下获得胜利的反革命联盟的成员们。这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来谈⁴⁰。

1852年9月24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 声 明

在奥格斯堡“总汇报”⁴¹上发表的一篇标有“科伦 9 月 26 日”字样的郑重其事的通讯中，竟然荒谬地把我的名字同倍克男爵夫人的名字以及科伦的逮捕⁴²连在一起，竟说什么我曾经托付倍克男爵夫人以某种政治机密，而这些机密后来通过某种途径为政府所获悉。我同倍克男爵夫人只见过两次面，两次见面都有第三者在场。在两次会面时，都只谈到了向我约稿的事，而对于约稿我不得不加以拒绝，因为它是以我同德国报纸保持着某种联系这个完全错误的假定为根据的。在这件事情结束以后，直到我听说这位夫人突然死亡时为止，我没有再听到过她的消息。至于每天都同倍克夫人见面的那些德国流亡者，我始终没有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朋友，正如我没有把奥格斯堡“总汇报”的科伦通讯员或者在伦敦的那些把流亡变成一种营业或官职的德国“大”人物当作自己的朋友一样。我从来就认为德国报纸上那些形形色色的卑鄙、荒谬而且拙劣的谣言是不值一驳的，不管它们是从伦敦直接制造出来的，还是从伦敦策划出来的。而我这一次所以破例加以驳斥，只是因为奥格斯堡“总汇报”的科伦通讯员竟企图把虚构的所谓我同倍克男爵夫人谈话时的不慎当做在科伦、德勒斯顿等地进行逮捕的**根据**。

卡尔·马克思

1851 年 10 月 4 日于伦敦

载于 1851 年 10 月 9 日

原文是德文

“科伦日报”第 242 号

俄文译自“科伦日报”

卡·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⁴³

卡·马克思写于 1851 年 12 月—
1852 年 3 月
1852 年作为“革命”杂志第 1 期
在纽约出版
署名: 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德文
俄文根据 1869 年版本译的,
并与 1852 年和 1885 年版本
校对过

卡·马克思

Die Revolution,

Eine Zeitschrift in zwanglosen Heften.

Herausgegeben von

J. Weydemeyer.

Erstes Heft

Der 18te Brumaire des Louis Napoleon

von

Karl Marx.

Neu-Herr.

Erstausgabe: Deut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von Schmidt und Fritsch
William-Street Nr. 191.

1852.

最先刊載“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一书的“革命”杂志的扉頁

最先刊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一书的“革命”杂志的扉页

—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侄儿代替伯父。在雾月十八日⁴⁴事变再版的那些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易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时而勉强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就像一个刚学会外国语的人总是要在心里把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外国语言翻成本国语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

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出它们中间的显著的差别。卡米尔·德穆兰、丹东、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拿破仑这些英雄人物，和旧的法国革命时的党派和人民群众一样，都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一些人粉碎了封建制度的某基础，割去了长在这个基础上的封建头脑；另一个人在法国内部创造了一些条件，从而才保证有可能发展自由竞争，经营分成小块的地产，利用解除了桎梏的民族工业生产力，而他在法国境外则到处破坏各种封建的形式，为的是要给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创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一切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图斯、格拉古、普卜利科拉、护民官、元老以及凯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冷静务实的资产阶级社会把萨伊、库辛、鲁瓦埃—科拉尔、本扎曼·孔斯坦和基佐当作自己真正的解释者和代言人；它的真正统帅坐在营业所的办公桌后面，它的政治首领是肥头大耳的路易十八。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轻守护过它的摇篮。但是，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例如，在一百年前，在另一发展阶段上，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当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当英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实现时，洛克就排挤了哈巴谷^①。

由此可见,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像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迴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起来。

在 1848—1851 年间,只有旧革命的幽灵在游荡,从改穿了老巴伊的服装的 *républicain en gants jaunes* (戴着柔皮手套的共和党人) 马拉斯特起,直到用已死的拿破仑的铁面具把自己的鄙陋可厌的面貌掩盖起来的冒险家止。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而为了要消除这方面的一切疑问,于是就使那些早已成为古董的旧的日期、旧的纪年、旧的名称、旧的布告以及好像早已腐朽的旧宪兵复活起来。一个民族的感觉,就好像贝德勒姆⁴⁵ 那里的一个癫狂的英国人的感觉一样,这个英国人把自己设想成古代法老的同代人,他每天悲痛地埋怨繁重的矿工劳动,因为他要在地下监狱般的埃塞俄比亚的金矿里辛苦劳动,借着系在他自己头上的一盏暗淡油灯的灯光,在一些手持长鞭的奴隶监视人的监督下劳动;矿洞口站着一群乱哄哄的野蛮兵士,他们既不了解劳役囚人,相互之间也不了解,因为大家讲着不同的语言。疯癫的英国人叹道:“我这个生来自由的不列颠人被迫忍受这一切,为的是要替古代法老找金子。”“为的是要替波拿巴家族还债,”——法兰西民族叹道。这个英国人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总不能撇开找金子这种顽固的念头。法国人在从事于革命的时候,总不能摆脱对拿破仑的追念,12月10日的选举⁴⁶ 就证明了这点。由于害怕革命的危险,他们曾经

① 是圣经中的一个先知;见旧约全书“哈巴谷书”。——编者注

退回去追求埃及的肉锅⁴⁷，1851年12月2日事件便是对于这一点的报复。他们所得到的不只是一幅对老拿破仑的漫画，他们得到的是漫画化的老拿破仑本身，是在十九世纪中叶所应当出现的老拿破仑。

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十九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

二月革命对于旧社会是一个突然袭击，是一个**意外事件**，而人民则把这个突然的**打击**宣布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壮举，认为它开辟了一个新纪元。12月2日，二月革命被狡猾的骗子所葬送，结果，被消灭的不是君主制度本身，而是一世纪以来的斗争从君主制度方面夺取来的自由主义的让步。结果，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的内容，而只是**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极端原始的统治。1851年12月的 coup de tête (轻率行为) 报复了1848年2月的 coup de main (勇敢打击)。来得容易，失去也容易。然而这两个事变之间的时间并不是白过了的。在1848—1851年期间，法国社会获得了(按革命的、因而是速成的方式)一些教训和经验，这些教训和经验在正常的即所谓按部就班地发展的进程中，本来应该在二月革命以前预先获得，以便使这次革命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事变，而不只是一种表面的动荡。看起来仿佛社会现在忽然落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还只是在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为保证现代革命能具有严重性质所绝对必

需的形势、关系和条件。

资产阶级革命，例如十八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像十九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Hic Rhodus, hic salta!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⁴⁸

但是，每个多少会观察的人，即使他没有逐步研究过法国事变发展的进程，也不免要预感到，这次革命必将遭受前所未闻的屈辱。只要听一听民主派先生们当时那种自鸣得意的胜利叫嚣就够了，这些先生们曾经互相祝贺，满以为1852年5月第二个星期日⁴⁹一定会带来良好的结果。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在他们头脑中成了一种固定观念，成了一个教条，正如基督徒脑子里的基督再临和千年王国到来一样。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以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想像中驱除了敌人就算打败了敌人；他总是对自己的未来以及自己打算建树、但现在还言之过早的功绩信口吹嘘，因而失去对现实的一切感觉。这些英雄是想以彼此表示同情和

结成一个特别集团，来驳倒关于他们显然庸碌无能的意见，他们收拾起自己的家私，预先拿起自己的桂冠，准备把他们的 *in partibus*（不存在的）共和国（这些共和国的政府人员已由他们毫不挑剔地在暗中论定了）拿到交易所里去贴现。12月2日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他们。人民在意气消沉的时代总是乐意聆听叫得最响亮的呼喊者们的喊声来压抑自己内心的惊愕，这一次他们也许已经了解到：鹅叫声能够拯救卡皮托里的那种时代是已经过去了。

宪法、国民议会、保皇党派、蓝色的和红色的共和党人、非洲的英雄、讲坛的雷鸣声、报刊的闪电、整个著作界、政治声望和学者的名誉、民法和刑法、*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自由、平等、博爱）以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有这一切，都好像一片幻影在一个人的咒文面前消失不见了，而这个人连他的敌人也不认为他是一个魔法师。普选权还保持了一刹那，好像仅仅是为着在全世界面前亲笔写下自己的遗嘱，并以人民自己的名义宣布：“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要死亡。”⁵⁰

像法国人那样说他们的民族遭受了偷袭，那是不够的。民族和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穿哑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罢了。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作了俘虏呢。

现在我们来把法国革命从1848年2月24日到1851年12月所经过的阶段大致总结一下。

总共有以下三个明显的主要时期：**二月时期；共和国建立时期，或制宪国民议会时期**（从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28日⁵¹）；**宪制共和国时期，或立法国民议会时期**（从1849年5月28

日到1851年12月2日)。

第一个时期，从1848年2月24日到5月4日，即路易—菲力浦被推翻起到制宪议会开幕之日止(这是本来意义上的**二月时期**)，这个时期可以称为革命的**序幕**。这个时期的性质，正式表现于这一时期仓卒建立的政府自己宣布自己是**临时性的**。在这个时期所采取、试行和发表的一切，都像政府一样，一概宣布自己只是**临时性的**。无论什么人和什么机构，都不敢承认自己有权长期存在，有权真正有所作为。所有一切准备了或决定了革命分子——王朝反对派⁵²、共和派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的小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工人，所有这些分子都在二月政府中临时取得了位置。

不这样也不可能。二月事变原先的目的只是要争得选举制度的改革，以求扩大有产阶级内部享有政治特权者的范围和推翻金融贵族独占的统治。但是，当事变已演进到引起实际冲突，当人民已投入街垒斗争，当国民自卫军采取消极等待的态度、军队不进行认真抵抗而王室已经逃走的时候，成立共和国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每个政党都按自己的观点去解释共和国。手持武器夺得了共和国的无产阶级，在共和国上面盖上了自己的印记，并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这样就拟定了现代革命的总的內容，这个內容和在当时的情况与条件下、在群众已达到的发展阶段上用现成材料所能立刻、直接实现的一切都是极为矛盾的。另一方面，其余一切曾经促进二月革命取得胜利分子，都因在政府里获得最好的位置而心满意足了。正因为如此，所以任何其他时期都没有当时那样错综复杂：浮夸的空话同实际上的犹豫不决和束手无策相混杂，热烈谋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陈规的顽固积习相混杂，整个社会

表面上的协调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相混杂。当巴黎无产阶级还陶醉于在它眼前展开的伟大前途并且认真地埋头讨论各种社会问题时,旧的社会力量却在集结,联合,醒悟过来,并获得了国内群众的意外支持,即获得了那些在七月王朝这个障碍物被推翻后立刻跃上政治舞台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的意外支持。

第二个时期——从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底——这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创立、奠定的时期**。紧跟在二月事变之后,不仅王朝反对派被共和派弄得惊慌失措,共和派被社会主义者弄得惊慌失措,而且全法国都被巴黎弄得惊慌失措了。由全国选出而于1848年5月4日开幕的国民议会,是代表国家的。这个议会是对二月事变的奢望所提出的活的抗议,并且是要把革命的结果降低到资产阶级的水平。巴黎无产阶级一下子就看出了这个国民议会的性质,所以他们在国民议会开幕后不几天,即在5月15日,就曾经企图用强力停止其存在,把它解散,将民族反动精神所借以威胁他们的这个机体重新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但是这个企图没有成功。大家知道:5月15日事变的结果,不过是使布朗基及其同道者,即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袖们,在我们所考察的整个周期中退出社会舞台罢了。

继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之后,只能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说,以前是由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国王的招牌下进行统治,今后将由全体资产阶级借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巴黎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是必须终止的狂妄空想。对制宪国民议会的这个声明,巴黎无产阶级回答以**六月起义**,这是欧洲各国内战史上最巨大的一次事变。结果获得胜利的仍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当时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方面的有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等

阶层、小资产者、军队、组成别动队的流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牧师和农村居民。而站在巴黎无产阶级方面的却只有它自己。资产阶级共和国胜利以后，起义者被屠杀的有三千多人，未经审问就被放逐的有一万五千人。无产阶级从这次失败后，就退到革命舞台的后台去了。每当运动好像又进入高潮时，无产阶级就企图再向前推进，可是这些企图愈来愈软弱，成效也愈来愈小。每当无产阶级上面的某个社会阶层进入革命动荡时，无产阶级就跟它缔结同盟，从而分享了各个政党依次遭受到的失败。但是，这些相继而来的打击，随着它们触及的社会面的扩大，也愈来愈弱了。无产阶级在议会和报刊方面的一些比较杰出的领袖，相继被捕判罪，代替他们的是些愈益模棱两可的人物。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条的实验，醉心于成立交换银行和工人团体，换句话说，醉心于这样一些形式的运动，即放弃利用旧世界本身内的一切强大手段来变革旧世界的思想，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生存的有限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当六月事变中与无产阶级为敌的一切阶级还没有像无产阶级本身一样倒下的时候，无产阶级大概既不能使本身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的伟大，也不能从重新缔结的联盟中获得新的力量。但是，无产阶级至少是带着不愧进行过世界历史性的伟大斗争的光荣而失败的；不仅法国，并且整个欧洲都被六月的地震所惊动，而各个上层阶级后来的失败所付的代价却如此便宜，以致得胜的党派只有公然无耻地加以夸张，才可以把这些失败说成是事变。同时，失败的政党离开无产阶级愈远，这些失败就愈是可耻。

六月起义者的失败，固然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奠基和建立准备和扫清了基地，但同时它也表明，欧洲的问题并不是“共和国还

是君主国”的争论，而是别的问题。这次失败揭示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它表明，在那些阶级划分比较发达、具有现代生产条件、具有那通过百年来的工作而使一切传统观念都融化于其中的精神意识的旧文明国家里，**共和国一般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革命改造的政治形式**，而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保守形式**，例如，像北美合众国那样；在那里，虽然已有阶级存在，但它们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它们在不断的运动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组成部分，并且彼此互换着自己的组成部分；在那里，现代的生产资料不仅不和经常人口过剩的现象相结合，反而弥补了头脑和人手方面的相对缺乏；最后，在那里，应该开辟新世界的物质生产所具有的狂热而充满青春活力的进展，没有给予人们时间或机会来结束旧的幽灵世界。

在六月的日子里，一切阶级和党派都团结成一个**维护秩序的党**来反对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党**。它们从“**社会之敌**”手里“救出了”社会。它们选择了旧社会的格言“**财产，家庭，宗教，秩序**”作为自己的军队的口令，并用“汝将以此获胜！”这句话激励反革命十字军。从这时起，那些曾经团结在这个旗号下反对过六月起义者的政党中的任何政党只要企图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守住革命的战场，它就要被“**财产，家庭，宗教，秩序！**”这一口号所战胜。每当统治者集团范围缩小时，每当比较狭小的利益压倒比较广大的利益时，社会就得救了。任何最单纯的资产阶级财政改革的要求、任何最平凡的自由主义的要求、任何最表面的共和主义的要求、任何最浅薄的民主主义的要求，都同时被当作“**谋害社会的行为**”加以惩罚，当作“**社会主义**”加以指责。最后，连那些“**宗教和秩序**”的最高祭司自己也被踢出他们的皮蒂娅的三

脚祭坛，半夜里被拖下床，关进囚车，投入监狱或流放；他们的神殿被拆毁，他们的嘴被封住，他们的笔被打断，他们的法律被撕毁，这一切都是为了宗教，财产，家庭和秩序。一群群酩酊大醉的兵士对那些站在自己的阳台上的资产者即秩序的狂信者开枪射击，褻渎他们的家庭圣地，炮击他们的房屋以取乐，这一切都是为了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最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败类组成为**维护秩序的神圣队伍**，而主人公克拉普林斯基⁵³就以“**社会救主**”的资格进入了土伊勒里宫。

二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被打断的话题上来。

六月事变以后的制宪国民议会的历史，是资产阶级中的共和派统治和瓦解的历史，这个派别是以三色旗的共和党人、纯粹的共和党人、政治的共和党人、形式的共和党人等等称呼闻名的。

这个派别在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度下是正式的共和主义反对派，因而是当时政界中一个公认的构成部分。议院中有它的代表，在报界它也有相当大的势力。它在巴黎的机关报“国民报”⁵⁴，和“辩论日报”⁵⁵一样地算是受人尊敬的。它的性质和它在立宪君主制度下的这个地位也是相称的。它并不是一个因有某些重大的共同利益而紧密团结、因有特殊生产条件而独树一帜的资产阶级集团。它是由一些抱有共和主义思想的资产者——作家、律师、军官和官吏组成的一个派系，这个派系之所以有影响，是由于全国对路易—菲力浦个人的反感，由于对第一共和国的怀念，由于一小群幻想家的共和主义信仰，而主要是由于法国人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对于维也纳条约和对于同英国联盟的憎恶，这个派别是始终予以鼓励的。在路易—菲力浦的统治下，“国民报”的很大一部分拥护者都是因为它鼓吹这种隐蔽的帝国主义思想而获得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后来在共和国时期，这种帝国主义思想就能以路易·波拿巴为代表，作为一个胜利的竞争者来同“国民报”本身对立。“国民报”也和其余一切资产阶级反对派一样，曾经对金

融贵族作过斗争。反对预算案的论争在当时的法国是同反对金融贵族的斗争完全相吻合的，这个论争既然保证有可能博得非常便宜的声望，并吸取非常丰富的材料来写清教徒式的 leading articles (社论)，因而是不能不大受利用的。工业资产阶级感激“国民报”，是因为它奴颜婢膝地拥护法国的保护关税制度，而它维护这个制度又多半是出于民族的动机，而不是出于政治经济上的动机。整个资产阶级感激它，则是因为它恶毒地诽谤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此外，“国民报”派是纯粹的共和派，就是说，它要求把资产阶级统治的形式由君主国改为共和国，首先是要求保证自己能在这个统治中占优势。对于这一政治变革的条件，它的认识极其模糊。但有一点它看得十分清楚(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末期的改革运动的宴会上，这一点已很明显地表露出来了)，这就是它在民主派小资产者中间，特别是在革命无产阶级中间是不受欢迎的。这些纯粹的共和党人(真是名副其实)本来已经完全准备好在开始时满足奥尔良公爵夫人的摄政，恰好这时爆发了二月革命，因而他们那些最有名的代表人物都在临时政府里获得了位置。他们当然是一开始就受到资产阶级的信任并在制宪国民议会中占了多数。临时政府中的社会主义分子马上被排挤出国民议会开幕后成立的执行委员会；“国民报”派利用六月起义的爆发解散了执行委员会，从而清除了它的最切近的对手，即小资产阶级的或民主主义的共和党人(赖德律—洛兰等人)。卡芬雅克，这个指挥了六月屠杀事件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将军，获得了一种独裁的权力，代替了执行委员会。“国民报”的前任总编辑马拉斯特，成了制宪国民议会的常任议长；政府各部部长以及其他一切重要职位，都由纯粹的共和党人占据了。

这样,实际情况超过了早就自命为七月王朝的合法继承人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最大胆的想望。但是,这个派别取得统治权并不是像它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所幻想的那样,就是说,并不是通过资产阶级举行反对国王的自由主义叛乱,而是由于无产阶级对资本举行了被霰弹镇压下去的起义。资产阶级认为**最革命**的事件,实际上却是**最反革命**的事件。果实落到了资产阶级脚下,但它不是从生活的树上落下来,而是从认识的树上落下来的。

资产阶级共和派独占的统治,只是从1848年6月24日起存在到12月10日止。这种统治的总结就是**拟定共和主义宪法和宣布巴黎戒严**。

新的宪法实质上不过是1830年宪章⁵⁶的共和主义化的版本。七月王朝的过高的选举资格限制,甚至把资产阶级本身的一大部分人也排出于政治权力之外,这是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存在不相容的。二月革命立刻取消了这种选举资格限制而宣布了直接、普遍的选举权。资产阶级共和派不能把这一事件一笔勾销。他们只得补充了一个限制条款,规定选民必须是在选区居住六个月的。旧有的行政、地方自治、司法和军队等等组织,仍然原封不动;宪法上规定的某些变更,只涉及目录而没有涉及内容,只涉及名称而没有涉及事物。

人身、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和信教等等的自由(1848年各种自由权的必然总汇),都穿上宪法制服而成为不可侵犯的了。这些自由中的每一种都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然而总是加上一个附带条件,说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是无限制的,而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种个人自由彼此之间以及同公共安全协调起来。例如:“公民有权成立

团体,有权和平地、非武装地集会,有权进行请愿并且通过报刊或用其他任何方法发表意见。对于这些权利的享受,除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限制外,不受其他限制。”(法国宪法第Ⅱ章第8条)“教育是自由的。教育的自由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并在国家的最高监督下享用之。”(同上,第9条)“每一公民的住所是不可侵犯的。这种不可侵犯性只有在遵守法定手续的条件下才能被破坏。”(同上,第3条)如此等等。所以,宪法要经常援引未来的构成法;这些构成法应当详细地解释这些附带条件并且调整这些无限制的自由权利的享用,使它们既不致互相抵触,也不致同公共安全相抵触。后来,这种构成法由秩序之友制定出来,所有这些自由都加以调整,结果,资产阶级可以不受其他阶级的同等权利的任何妨碍而享受这些自由。至于资产阶级完全禁止“他人”享受这些自由,或是允许“他人”在一定条件下(每一个条件都是警察的陷阱)享受这些自由,那末这都是仅仅为了保证“公共安全”,也就是为了保证资产阶级的安全,宪法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后来两方面都有充分权利援引宪法:一方面是废除了所有这些自由的秩序之友,另一方面是要求恢复所有这些自由的民主党人。宪法的每一节本身都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所以,当自由这个名字还备受尊重,而只是对它的真正实现设下了——当然是根据合法的理由——种种障碍时,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的现实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

然而,用这么巧妙的方法弄成不可侵犯的这个宪法,如同阿基里斯一样,有一个致命弱点,只是这个弱点不是在脚踵上,而是在头顶上罢了,或者不如说是在全部建筑物顶端的两个头脑上:一个

是**立法议会**，另一个是**总统**。只要把宪法浏览一遍，就可以看出：只有那些确定总统对立法议会的关系的条文，才是绝对的、肯定的、没有矛盾的、不容丝毫曲解的。要知道，这里所谈的问题，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可靠地位。按照宪法第 45—70 条规定，国民议会可以用合乎宪法的办法排除总统，而总统要排除国民议会却只能用违背宪法的办法，即只有取消宪法本身。可见，这里宪法本身是在号召以暴力来消灭自己。宪法不仅像 1830 年的宪章那样尊崇分权制，而且把这种分权制扩大到矛盾重重的地步。基佐曾经把立法权和行政权在议会内的争吵称为**宪法力量的赌博**，依据 1848 年的宪法，这种赌博一直是孤注一掷的。一方面是由普选产生并享有连选连任权的七百五十名人民代表构成一个不受监督、不可解散、不可分割的国民议会，它拥有无限的立法权力，最终决定宣战、媾和及商约等问题，独揽大赦权，因自己不间断地召开会议而经常站在政治舞台最前面。另一方面是具有王权的一切特性的总统，他有权不经国民议会而任免自己的内阁部长，他掌握行政权的一切手段，他可以分封一切官职，从而在法国操纵着至少有一百五十万人的命运，因为正好有这么多的人在物质生活上依赖于五十万各级官吏和各级军官。他统率一切武装力量。他享有赦免个别罪犯、解散国民自卫军部队以及——经国务会议同意——罢免由公民自己选出的省委员会、县委员会、市镇委员会的特权。同外国缔结条约时，它具有倡议和领导的作用。国民议会永远留在舞台上，是公众日常批评的对象，而总统却在极乐的地上过着隐居的生活，不过他眼前和心里老是有宪法第 45 条在提醒他：《frère il faut mourir !》⁵⁷你的权力在你当选的第四年，在美丽的 5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要完结了！那时你的威严就要完蛋了，这

出戏是不会再演的,如果你负有债务,你就及时用宪法规定给你的六十万法郎的薪俸一律偿清,不然你就不免要在美丽的5月的第二个星期一进入克利希⁵⁸!这样,宪法就把实际权力授给了总统,而力求为国民议会保证精神上的权力。可是,不用说,法律条文不可能创造精神上的权力,宪法就在这方面也是自己否定自己,因为它规定总统由所有的法国人直接投票选举。全法国的选票是分散在七百五十个国民议会议员之间,可是在这里它们就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每一个议员不过是某个政党、某个城市、某个地方的代表,甚至只是表示必须选出一个人来凑足七百五十个议员,并不去特别注意事情本身和被选举者本人,可是**总统**是由全国人民所选出,选举总统是行使主权的人民每四年运用一次的王牌。民选的国民议会和国民只有形而上学的联系,而民选的总统却是亲自和国民发生联系。国民议会的各个议员的确反映着国民精神的多种多样的方面,而总统却是国民精神的化身。和国民议会比较起来,总统是一种神权的体现者:他是人民恩赐的统治者。

海的女神西蒂斯曾经预言阿基里斯要在盛年夭折。像阿基里斯一样有个致命弱点的宪法,也像阿基里斯一样预感到它命该早死。根本用不着西蒂斯离开海洋向共和国的创建人即纯粹的共和派泄露这个秘密;这些共和派只要从自己的理想共和国的高空云层间俯瞰一下罪孽的尘世,就可以看到:他们愈是接近于完成他们那个伟大的立法艺术创作,保皇派、波拿巴派、民主派和共产主义者的倔强逞性以及他们自己的不孚众望的程度,也就与日俱增。他们力图用立宪的狡猾手腕,用宪法第111条来欺骗命运,根据这条规定,任何**修改宪法**的提案都必须经过每次相距一个月的三次讨论,至少必须由四分之三票数通过,而且参加表决的至少必须有

五百个议员。可是这只是为了要在他们已经事先预察到自己将来成为议会少数派时保持自己势力的一种无力的尝试，这种势力现在当他们还在议会中占多数并且握有一切政府权力手段时，就已经一天天地从他们的软弱的手中滑出去了。

最后，在一个特别滑稽的条文中，宪法把自己托付给“全体法国人民和每一个法国人的警惕性和爱国心”，而在前面的一条中，它已经把有“警惕性”和“爱国心”的法国人托付给它故意发明出来的最高法院（《haute cour》）所实行的温柔的刑事监护了。

1848年的宪法就是这样。它在1851年12月2日不是被人头撞倒，而只是被一顶帽子碰倒了；诚然，这顶帽子是拿破仑的三角帽。

当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国民议会内忙于虚构、讨论和表决这个宪法时，卡芬雅克却在国民议会外把巴黎控制在戒严状态中。巴黎戒严是制宪议会分娩共和国时的产前阵痛中的助产婆。如果说后来宪法被刺刀葬送了，那末不要忘记，在它还在母胎中时刺刀（是指向人民的）就保护过它，而且它是在刺刀帮助下出世的。“正直的共和派”的祖先们曾经拿着他们的象征即三色旗走遍了全欧洲。“正直的共和派”自己也作出了一种发明，这种发明自己给自己开拓了通向整个大陆的道路，但是它又抱着永不熄灭的爱情回到法国，直到它终于在法国的半数的省里取得公民权为止。这一发明就是戒严。这是一项卓越的发明，每当法国革命进程处于危机关头，它就要被周期地加以运用。但是，既然兵营和露营是这样周期地重重压在法国社会头上，以便压制这个社会的意识并制服这个社会；既然马刀和毛瑟枪周期地受命进行审判和管理，进行监护和检查，执行警察和更夫职务；既然胡子和军服周期地被宣布为社

会的最高智慧和指导者，那末兵营和露营、马刀和毛瑟枪、胡子和军服又怎么能不终于得出一个结论说：最好是宣布自己的制度是最高形式，并使资产阶级社会根本不必关心自治问题，从而一劳永逸地拯救社会！兵营和露营、马刀和毛瑟枪、胡子和军服必然要产生这种想法，尤其是因为它们在这种场合下可以希望自己所建树的更高的功劳得到更多的现金报酬，而当它们按某一派资产阶级的命令实行周期戒严和暂时拯救社会的时候，它们除了几个人的死伤和资产者的一些假笑之外，是很少获得实际利益的。为什么军队不可以终于搞出一次对它自己有利益有好处的戒严，同时把资产者的钱包也搜查一下呢？而且还不应忘记（我们顺便提一提），贝尔纳上校，即在卡芬雅克时期未经审判就把一万五千名起义者放逐的那位军事委员会主席，现在又是巴黎各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了。

如果说“正直的”纯粹的共和派宣布巴黎戒严，从而创设了后来 1851 年 12 月 2 日的御用军所赖以成长的苗床，那末同时属于他们的还有另一种功绩：在路易—菲力浦时期他们还点燃民族情感，而现在，当他们掌握了国家的一切权力的时候，他们却向国外列强跪拜，不去解放意大利，反而让奥地利人和那不勒斯人⁵⁹再一次来奴役意大利。路易·波拿巴在 1848 年 12 月 10 日当选为总统，结束了卡芬雅克的独裁和制宪议会。

宪法第 44 条说：“曾经丧失过法国公民资格的人不能充当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只丧失过法国公民资格，不只当过英国的特别警察，而且是一个已经归化了的瑞士人⁶⁰。

关于 12 月 10 日选举的意义，我在另一个地方⁶¹已经详细谈

过，这里就不再谈了。这里只须指出，12月10日的选举是曾经不得不支付了二月革命的费用**的农民反对国内其他各个阶级的表现，是农村反对城市的表现**。这次选举得到军队方面的巨大同情，因为军队从“国民报”派的共和党人那里既没有取得光荣，也没有领到附加军饷；这次选举还受到大资产阶级方面的巨大同情，大资产阶级欢迎波拿巴是把他作为恢复君主制度的一个跳板；选举也受到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的巨大同情，他们欢迎波拿巴是把他作为对卡芬雅克的一种惩罚。下边我还要更详细地谈谈农民对法国革命的态度。

从1848年12月20日到1849年5月制宪议会解散这个时期，包括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灭亡的历史。资产阶级共和派为资产阶级建立了共和国，把革命无产阶级赶下台，一时堵住了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嘴，以后自己也就被资产阶级群众所排斥，这些人有充分权利把共和国据为**自己的私有的财产**。可是这批资产阶级群众是**保皇派**，其中有一部分（即大土地所有者）曾经在复辟时期居于统治地位，因而是**正统派**；另一部分（即金融巨头和大工业家）曾经在七月王朝时期居于统治地位，因而是**奥尔良派**。军队、大学、教会、律师、学院和报界的高官显贵，都分属于上述两派，虽然所占比例各不相同。这两部分资产阶级都把这个既不叫作波旁、也不叫作**奥尔良**、而是叫作**资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当作它们能够**共同进行统治的国家形式**。六月起义已经把他们联合成“秩序党”，现在应该是把还在国民议会中占有地位的一帮资产阶级共和派排斥出去的时候了。这些纯粹的共和派曾经极其残暴地滥用武力对付人民，而现在，当需要捍卫他们自己的共和主义和自己的立法权力以对抗行政权力和保皇党人时，他们却极其怯懦地、畏缩地、沮丧地、软

弱无力地放弃了斗争。我用不着在这里叙述他们解体的可耻历史。他们不是灭亡了，而是无形消失了。他们已经最终演完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在往后的时期中，不论在议会内或议会外，他们都仅仅表现为过去的影子，每当问题涉及到共和国的名称，每当革命冲突有下降到最低水平的危险时，这些影子便又复活起来。顺便指出，把自己的名称交给这个派别的“国民报”，在后来一个时期就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去了。

在结束这一时期之前，我们还应该回顾一下两种力量，这两种力量从 1848 年 12 月 20 日起到制宪议会结束时止是并居在一起的，而且在 1851 年 12 月 2 日那天，其中的一种力量消灭了另一种力量。我所指的一方是路易·波拿巴，另一方是联合的保皇党，即秩序党，大资产阶级的党。波拿巴就任总统后立即组织了以奥迪隆·巴罗为首（请注意，即以议会资产阶级的最自由主义的一派的老领袖为首）的秩序党内阁。巴罗先生终于获得了 1830 年以来他朝思暮想的内阁职位，并且是内阁总理的职位。然而这个位置并不是像他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所幻想的那样得到的，不是以议会反对派的最先进领袖的身分得到的，而是以他的一切劲敌即耶稣会派和正统派的同盟者的身分得到的，而且他的任务是把议会送进坟墓。他终于把新娘迎来举行婚礼，然而只是在新娘被污辱以后才迎来的。波拿巴本人好像是完全退隐了。代他行动的是秩序党。

在内阁第一次会议上就决定派出远征军去罗马，并且商定要瞒着国民议会来安排这件事，而经费却要假造口实向国民议会索取。这样，内阁就开始以欺骗国民议会和暗中勾结外国专制国家的办法来对付革命的罗马共和国了。波拿巴也用同样的方法和同样的手段准备了反对保皇党立法议会及其立宪共和国的 12 月 2 日

政变。不要忘记，在 1848 年 12 月 20 日组成波拿巴内阁的那个政党，又是 1851 年 12 月 2 日的国民立法议会中的多数。

8 月间制宪议会曾经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在未制定并公布一套补充宪法的构成法以前，它不解散。1849 年 1 月 6 日，秩序党通过议员拉托建议议会不要去搞什么构成法，最好是通过一项关于解散自己的决议。这时，不仅是以奥迪隆·巴罗先生为首的内阁，而且国民议会中的全体保皇党议员，都以命令口吻对国民议会说：为了恢复信用，为了巩固秩序，为了终止不确定的暂时状态而建立完全确定的状态，必须解散国民议会；议会妨碍新政府进行有效的工作，它只是由于执迷不悟才企图延长自己的生命；它已经使全国感到厌恶了。波拿巴把这一切攻击立法权的说法都记在心里，熟读了这些说法，并在 1851 年 12 月 2 日向议会保皇派证明，他确实从他们那里学得了一些东西。他把他们自己的口号拿来反对他们。

巴罗内阁和秩序党往前更进了一步。他们在全法国掀起了向国民议会请愿的运动，殷勤地请求国民议会隐退。这样，他们就把无组织的人民群众引入反对国民议会、反对依照宪法手续组织起来的民意表现的斗争。他们教会波拿巴从诉诸议会转而诉诸人民。1849 年 1 月 29 日那天，制宪议会终于不得不解决关于自行解散的问题了。这一天，军队占据了国民议会举行会议的场所；总揽国民自卫军和常备军指挥大权的秩序党将军尚加尔涅，就像是在会战前夕一样在巴黎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而联合起来的保皇党人威胁议会说，如果它不表示让步，就将使用暴力。国民议会果然表示愿意让步，但商定再苟延一个短短的时期。1 月 29 日是什么呢，岂不是 1851 年 12 月 2 日那样的 coup d'état (政变) 吗？不过这

次是由保皇党人协同波拿巴反对共和派国民议会罢了。保皇党老爷们没有看到或是不愿意看到，波拿巴利用 1849 年 1 月 29 日事变，迫使一部分军队在土伊勒里宫前受他检阅；他贪婪地抓住这个公然诉诸武力来反对议会的初次尝试，为的是提醒大家想起卡利古拉⁶²的故事。他们当然只看见了他们的尚加尔涅。

特别推动秩序党使用暴力去缩短制宪议会生命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些补充宪法的所谓**构成法**——教育法、信教法等等。联合的保皇党人认为极其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制定这些法律，而不是让那些疑虑重重的共和党人去制定。可是，在这些所谓构成法中，还有一个关于共和国总统的责任的法律。1851 年立法议会正从事于制定这个法律，波拿巴就以 12 月 2 日的 coup（打击）防止了这一 coup。联合的保皇党人在 1851 年冬季议会运动时期，是多么希望有一个现成的总统责任法，并且是由疑虑重重的、敌对的共和派议会制成的总统责任法啊！

当制宪议会在 1849 年 1 月 29 日自己毁坏了它的最后的武器以后，巴罗内阁和秩序之友便对它进行了无情的迫害。他们不放过一个机会来贬低它，强迫这个软弱无力的和对自己绝望的议会通过一些使它失去最后一点社会尊敬的法律。波拿巴沉溺于自己的顽固的拿破仑观念，竟公开利用议会权力的这种贬低。例如，当国民议会 1849 年 5 月 8 日谴责内阁让乌迪诺将军占领契维塔未克基亚，并命令罗马远征军回到它原来的目标时⁶³，当天晚上波拿巴就在“通报”上发表了致乌迪诺的一封信，祝贺这位将军建树了英雄的功绩，并且和那些卖弄笔墨的议员相反，装出一副宽大为怀的袒护军队的姿态。保皇党人对此加以讥笑。他们相信他们一定能愚弄他。最后，当制宪议会议长马拉斯特偶尔怀疑到国民议会的

安全,根据宪法责令一个上校率领所部开来保护国民议会时,那个上校却以军纪为借口而拒绝调动,并建议马拉斯特去跟尚加尔涅交涉,但尚加尔涅也拒绝了马拉斯特的要求,并且刻毒地说,他不喜欢 *baïonnettes intelligentes* (能思想的刺刀)。1851年11月,联合的保皇党人在他们准备同波拿巴开始作决定性的斗争时,曾经企图在他们的所谓**议会总务官法案**⁶⁴中规定国民议会议长能直接调动军队的原则。他们的一位将军勒夫洛签署了这个法案。但是,尚加尔涅白白地投票赞成这一法案,梯也尔也白白地赞扬了已故制宪议会的有远见的智慧。**陆军部长圣阿尔诺**像尚加尔涅回答马拉斯特一样回答了他,他的回答还博得了山岳派的鼓掌!

当**秩序党**还只是内阁而不是国民议会的时候,它就这样玷污了**议会制度**。而当1851年12月2日政变把议会制度逐出法国的时候,它就叫喊起来了!

我们祝议会制度一路平安!

三

立法国民议会于 1849 年 5 月 28 日开会,到 1851 年 12 月 2 日被解散。这一期间是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存在时期。

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立宪派统治以后是吉伦特派的统治;吉伦特派统治以后是雅各宾派的统治。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

1848 年革命的情形却刚刚相反。当时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属物。后者背叛了它,并使它在 4 月 16 日、5 月 15 日和 6 月的日子里遭受了失败。民主派又全靠资产阶级共和派双肩的支持。资产阶级共和派还没有感到自己站稳脚跟,它就把这个麻烦的伙伴抛弃,自己又去依靠秩序党双肩的支持。但秩序党耸了耸肩膀,抛开资产阶级共和派,自己赶忙站到武装力量的双肩上去;它还一直以为它是坐在武装力量的肩膀上,却忽然有一天发现肩膀已经变成了刺刀。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挤着它向前的党派而向前伏在挤着它后退的党派身上。无怪乎它们在这种可笑的姿势中失去平衡,并且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鬼脸,奇怪地跳几下,就倒下去了。革命就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二月革命的最后街垒还没有拆除,第一个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革命就已经这样开

起倒车来了。

我们所谈的这个时期，包含着各种惊人的矛盾的最复杂的混合，立宪派公开组织阴谋反对宪法，革命派公开承认自己拥护立宪；国民议会想左右一切，却总是按议会方式进行活动；山岳派以忍耐为天职，并以预言未来的胜利来补偿现在的失败；保皇派扮演着共和国 *patres conscripti* (参议员) 的角色，为环境所迫，不得不在国外支持他们所依附的互相敌对的王朝，而在法国内部却支持他们所憎恨的共和国；行政权把自己的软弱当作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招来的轻蔑看作自己的威信；共和国不过是两个王朝——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最卑鄙的方面在帝国的招牌下的结合；联盟以各自分离作为基础；斗争是以不把斗争贯彻到底作为根本的规律；无谓的煽动，是为了安宁；最隆重地宣扬安宁，是为了革命；有热情而无真理；有真理而无热情；有英雄而无功绩；有历史而无事变；发展的唯一动力仿佛是日历，它仿佛只是同一的紧张和松弛状态的不断反复；对立形势周期地达到高度尖锐化，好像只是为了钝化和缓和，但始终不能得到解决；一方面是装腔作势的努力和害怕世界灭亡的市侩恐怖心理，另一方面却是救世主们醉心于极小气的倾轧手段和宫廷斗争的小丑姿态，他们这种无忧无虑的作法使人想起的不是末日的审判，而是弗伦特运动^①时期的情景；全法国的全部官方天才，在一个人的狡猾的愚钝前面甘拜下风；国民共同意志每次经过普选来表现时，都在群众利益的顽固的敌人身上得到适当的表现，一直到最后它在一个骗子的固执的意志上得到了

① 是指十七世纪中叶在法国发生的反对王权的运动。当时的贵族统治阶级把它称为“弗伦特运动”。弗伦特是一种被禁用的投石器，也是捣乱或破坏秩序的代用语。——编者注

表现。如果历史上曾经有一页是被涂抹得灰色而又灰色的话，那就正是这一页。人物和事变仿佛有些颠倒的施莱米尔——没有肉体的影子⁶⁵。革命自己麻痹自己的体现者，而把热情的强力完全赋予自己的敌人。如果说，反革命派不停地召唤来的“红色怪影”终于出现，那末它出现时就不是戴着无政府主义的弗利基亚帽，而是穿着秩序的制服、红色的军裤。

我们已经看到，波拿巴在 1848 年 12 月 20 日就职时所组成的内阁，是秩序党的内阁，即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联合内阁。这个或多或少用强力缩短了共和主义制宪议会寿命的巴罗—法卢内阁，直到制宪议会死后还在执掌政权。联合保皇党人的将军尚加尔涅继续执掌着正规军第一师和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最高统帅权。最后，普选保证秩序党在立法议会中取得极大多数的席位。在立法议会中，路易—菲利浦的众议院议员和贵族院议员，已同一群神圣的正统主义者汇合起来了，对于这些正统主义者说来，国民的大量的选票变成了政治舞台的入场券。波拿巴派的议员人数太少，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议会党团。他们只不过是秩序党的一个 *mauvaise queue* (可怜的附属物)。这样，秩序党就掌握了政府权力、军队和立法机关，一句话，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在精神上是靠着把它的统治炫示为民意表现的普选、靠着反革命势力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同时获得的胜利而加强起来的。

从来还没有一个政党拥有这样强有力的手段和在这样良好的征兆下开始斗争。

罹难的纯粹的共和派在立法国民议会中只剩下一个以非洲的将军卡芬雅克、拉摩里西尔和贝多为首的、由五十人组成的集团。大的反对党是山岳党——这是社会民主派给自己取的议会名

称。在国民议会七百五十个席位中，它占有两百多个，所以它至少是和秩序党三个派别中任何一派同等强大的。它和整个保皇派联盟相比之下所占的相对少数地位，好像是由于特殊情况而趋于平衡了。不仅各省的选举表明山岳党在农村居民中获得很多拥护者，而且差不多全体巴黎议员都是属于山岳党的；军队以选出三个下级军官来表明它的民主主义信念，而山岳党的首领赖德律-洛兰（与秩序党的一切代表不同）是由五个省的选民投票抬上了议员地位的。这样，在1849年5月28日，山岳党（在保皇党内部，以及在整个秩序党和波拿巴中间必然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看来是完全可望获得成功的。可是，两星期以后，它竟失掉了一切，包括声誉在内。

在我们继续叙述议会的历史以前，为着避免在估计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代的总的性质时通常易犯的错误，需要作几点说明。在民主派看来，无论在制宪国民议会时期或在立法国民议会时期，问题都不过是在于共和党人和保皇党人之间的斗争。他们把运动本身概括为一个词儿：“反动”——黑夜，这时所有的猫都是灰的，而他们也可以滔滔不绝地倾泻出他们的更夫的老生常谈。当然，初看起来，秩序党好像是各种保皇派集团的结合体，这些集团不仅互相倾轧，以便把自己的王位追求者捧上王位，把对方的王位追求者排挤掉，而且它们一致对“共和国”表示仇恨，一致对“共和国”进行斗争。和这些保皇派的阴谋家相反，山岳党好像是“共和国”的保护人。秩序党似乎是永远忙于“反动”，而这种“反动”（完全像在普鲁士一样）是反对出版、结社等等，并且（又像在普鲁士一样）是以官僚、宪兵和法庭进行粗暴的警察干涉的方式实现的。“山岳党”同样毫不停息地忙于抵抗这种攻击，忙于保护“永恒的人权”，好像近一百五十年以来每个所谓的人民政党所多多少少做过的那样。可是，

只要更仔细地分析一下情况和各个政党，这种遮蔽着阶级斗争和这个时期特有容貌的假象就消失了。

我们已经说过，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是秩序党中的两个巨大集团。什么东西使这两个集团依附于它们的王位追求者并使它们互相分离呢？难道只是百合花^①和三色旗，波旁王室和奥尔良王室，各种色彩的保皇主义或是它们的保皇主义信仰吗？在波旁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大地产**连同它的僧侣和仆从；在奥尔良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金融贵族、大工业、大商业**，即**资本**和它的随从者——**律师、教授和健谈家**。正统王朝不过是地主世袭权力的政治表现，而七月王朝则不过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篡夺权力的政治表现。所以，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生存的物质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间的竞争。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有谁否认呢？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如果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这两个集团中每一个集团，都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它们对两个不同王朝的眷恋，那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却刚刚相反，正是它们利益的对立才使得这两个王朝

① 百合花是波旁王朝的象征。——译者注

不能结合为一。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行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同处于共和国中并提出同样的要求。如果一方不管另一方力求**复辟它自家的王朝**，那末这只是表明，由**资产阶级分化出的两大集团**（地产和金融资本），都力图恢复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使对方处于从属地位。我们谈论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是因为大地产虽然还摆着封建主义的资格，抱着高贵门第的高傲态度，但是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下已经完全资产阶级化了。例如，英国的托利党人曾长期认为，他们是热中于王权、教会和旧日的英国宪法，直到危急的关头才被迫承认，他们仅仅是热中于**地租**。

联合的保皇党人在报刊上，在爱姆斯，在克勒蒙特⁶⁶，在议会之外，总是互相倾轧。在幕后，他们又穿起他们旧时的奥尔良派的和正统派的制服，进行他们的旧时的比武。但是在公开的舞台上，在正式演出时，在扮演一个巨大的议会政党的角色时，他们对自己的可敬的王朝只是敬而远之，in infinitum（无止境地）推迟君主制的复辟。他们在从事自己的真正事业时是以**秩序党**的姿态出现，即举着**社会的**旗帜，而不是举着**政治的**旗帜；是作为资产阶级世界秩序的代表者，而不是作为出游公主的骑士；是作为和其他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而不是作为和共和党人相对立的保皇党人。作为秩序党，他们也比先前任何时候，比复辟时期或七月王朝时期，享有更加无限和更加稳固地统治其他社会阶级的权力。这样的权力只有在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下才可能存在，因为只有在这种国家形式下，法国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才能互相结合起来，从而把自己的阶

级的统治提到日程上来,以代替这一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集团的统治。如果他们以秩序党身分痛骂共和制,并不掩盖他们对共和制的憎恶,那末这就不仅是由于保皇主义的回忆了。本能告诉他们,共和制虽然完成了他们的政治统治,同时却破坏着这一统治的社会基础,因为他们现在必须面对各个被奴役的阶级并且直接和它们斗争,不能用王冠作掩护,不能用相互之间以及和王权之间的次要斗争来转移全国的视线了。由于感觉到自己软弱无力,他们才不得不在他们阶级统治的完备的条件面前退缩下来,力图返回到那些不大完备、不大发达、因而危险也较少的阶级统治的形式上去。相反地,每当联合的保皇党人和敌视他们的王位追求者即波拿巴发生冲突时,每当他们担心行政权力危害他们的议会的万能力时,每当他们因此必须把自己统治的政治合法性提到首位时,他们就不是以保皇党人的身分出面,而是以共和党人的身分出面,从奥尔良派的梯也尔起直到正统派的贝利耶止都是如此:前者曾向国民议会担保说,关于共和国的问题,他们的意见最少分歧;后者缠着三色头巾,以演说家的姿态,在1851年12月2日代表共和国向集合在第十区市政厅前面的人民群众发表演说。的确,有一阵讥笑的回声响应着他:Henri V! Henri V! (亨利五世!亨利五世!)

和资产阶级的联合相对抗的,是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联合,即所谓**社会民主派**。1848年六月事变以后,小资产阶级发觉自己受了骗,它的物质利益受了损失,而那些应当保证它有可能捍卫这种利益的民主保障,也受到了反革命的威胁。因此,它就和工人接近起来。另一方面,它在议会中的代表,即**山岳党**,在资产阶级共和派专政时期被排挤到后台去了,在制宪议会存在的后半期中,因为同波拿巴及保皇派阁员们进行了斗争,又重新获得了已失去

的声望。山岳党和社会主义的领袖们结成了同盟。1849年2月在宴会上庆祝了和解，制定了共同纲领，设立了共同的选举委员会，提出了共同的候选人。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已失去革命的锋芒而获得了民主主义的色彩，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失去了纯政治的形式而获得了社会主义的色彩。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由这种联合产生出来的新**山岳党**所包含的成员，除了几个工人阶级出身的配角和几个社会主义的宗派分子外，还是和旧山岳党所包含的成员一样，不过是人数多一点罢了。但是，逐渐地它就随着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一同变化了。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无论他们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颜色是淡是浓，其实质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然而也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超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当山岳党为了共和国和所谓的人权不断同秩序党作斗争时，共和国或人权并不是它的最终目的，正像一支将被缴械的军队进行反抗和投入战斗时并不只是为了保留自己的武器一样。

国民议会刚一开幕，秩序党就向山岳党挑战。资产阶级这时已感到必须击破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正如他们在一年以前感到必须击破革命无产阶级一样。不过这次敌方的情况已是另一个样子了。无产阶级党的力量是在街上，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却在国民议会中。因此必须趁时间和情势还没有把这种力量巩固起来的时候，就把它从国民议会引诱到街上，使它自己摧毁它在议会中的力量。山岳党便纵马飞奔到陷阱中去了。

把山岳党引入陷阱的诱饵是法军炮轰罗马。这次炮轰违反了宪法第 V 条⁶⁷，因为该条禁止法兰西共和国使用自己的兵力侵犯他国人民的自由。此外，宪法第 54 条还禁止行政机构不经国民议会同意宣布战争，而制宪议会在 5 月 8 日的决议中曾指责远征罗马的举动。赖德律-洛兰以此为根据在 1849 年 6 月 11 日对波拿巴和他的部长们提出弹劾案。他被梯也尔的刻毒的讥刺所激怒，威胁说将用一切手段，甚至将使用武力来保卫宪法。山岳党全体一致起立，重申这个使用武力的号召。6 月 12 日，国民议会否决了弹劾案，于是山岳党就退出了议会。6 月 13 日的事变大家都知道：一部分山岳党人发表宣言，宣布波拿巴和他的部长们“处在宪法之外”；民主派的国民自卫军徒手举行示威游行，遇到尚加尔涅的军队就逃散了，如此等等。一部分山岳党人逃到国外，另一部分被交付布尔日最高法院审讯，余下的山岳党人则像小学生一样，按照议会规则受到国民议会议长的琐碎的监督。巴黎重又宣布戒严，

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民主派部分被解散了。山岳党在议会中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在巴黎的力量就这样被消灭了。

6月13日事变时成了工人流血起义的信号的里昂,也和邻近的五个省同时宣布了戒严。戒严状态一直继续到现在。

山岳党大多数背叛了自己的先锋队,拒绝在它的宣言上签名。报刊也临阵脱逃了;只有两家报纸敢于登载这个宣言。小资产者背叛了自己的代表:国民自卫军没有露面,即使在某处露了面,也只是阻挠街垒的堆筑。代表们欺骗了小资产者:军队中的假同盟者根本没有露过面。最后,民主派不但没有从无产阶级中去汲取力量,反而把自己的懦弱传染给无产阶级,并且正如民主党人一切伟大行动中常有的情形那样,领袖们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人民”背叛了他们,人民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领袖欺骗了他们。

很少看到什么事情比山岳党当前的进军喧嚣得更厉害;很少看到谈论什么事情像现在吹嘘民主派必然胜利这样自信、这样迫不及待。显然,民主党人是相信使耶利哥城的墙壁应声倒塌的喇叭声音的力量的。每当他们站在专制制度的墙壁面前时,他们就力图重复这个奇迹。如果山岳党真想在议会中获得胜利,它就不应该号召使用武力。如果它在议会中号召使用武力,它就不应该在街头上采取议会式的行动。如果它认真考虑过和平示威,那末它没有预先看到示威将受到武力的干涉,就很愚蠢了。如果它想过实际的战斗,那末放下战斗所必需的武器,就是件怪事了。可是问题在于,小资产者和他们的民主派代表人物提出革命威胁,不过是企图吓唬一下敌人罢了。当他们错误地走入死胡同里面时,当他们跑得太远,以致不得不把他们的威胁付诸实行时,他们就采取模棱两可的

态度,尽力避免采取可能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急于寻找失败的口实。一旦情况严重到必须实地战斗时,宣战的震耳欲聋的前奏曲就变成怯懦的唠叨;演员不再认真表演了,戏也就停止了,像吹胀了的氢气球一样,针一刺就破灭了。

没有一个政党像民主党这样夸大自己的力量,也没有一个政党像民主党这样轻率地错误估计局势。当一部分军队投票赞成山岳党的时候,山岳党就认为,军队会举行起义来拥护它。而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根据这样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在军队看来只有一个意思,即革命家站在罗马士兵方面反对法国士兵。另一方面,人们对1848年的六月事变的记忆还太新鲜,以至无产阶级对国民自卫军深恶痛绝,秘密团体的领袖们对民主派的领袖们表示很不信任。要消除这些矛盾,必须有受到威胁的重大的共同利益出现。宪法某一抽象条文的破坏,并不能激起这种利益。如民主党人自己所说,难道宪法不是已经被人破坏了许多次吗?难道最流行的报纸不是已经责骂宪法是反革命一手造成的吗?但是,民主党人代表小资产阶级,即代表两个阶级的利益同时削弱的那个**过渡阶级**,所以他认为自己完全是站在阶级对抗之上。民主党人认为,和他们对立的是一个**特权阶级**,但他们和全国所有其他阶层一起构成了**人民**。他们所维护的都是**人民的权利**;他们所关心的都是**人民的利益**。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在临近斗争时考察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和状况。他们不必过分仔细地估量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只要发出一个信号,**人民**就会用它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冲向**压迫者**。可是,如果事实表明民主党人的利益并不使人关心,他们的力量是软弱无力,那末这就应该归罪于危险的诡辩家,他们把**统一的人民**分成了各个敌对的阵营,或者是由于军队太残忍,太盲目,因而而不

能把民主党人的纯正目的当作自己的利益，再不然就是由于执行中的某种细节使全部事情垮了台，最后，或者是某种意外的偶然事件使事情没有成功。不管怎样，民主党人逃出最可耻的失败时总是洁白无瑕，正像他进入这种失败时是纯洁无辜一样；他摆脱失败时信心更加坚定了，他以为他一定会胜利，以为不是他自己和他的党应该放弃旧的观点，相反地，是情势应该来适应他。

因此，不应当以为人数大大削减、备受挫折并被新的议会规则所侮辱的山岳党是太不幸了。虽然 6 月 13 日的事变排挤了它的领袖，但是这一天又给第二流的“能者们”腾出了位置，这个新地位使得他们得意忘形。虽然他们在议会中软弱无力的情况已经无可怀疑，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有权把他们的行动局限于道义上的愤怒和虚张声势的言论了。虽然秩序党把他们这些最后正式代表革命的人物看作无政府状态一切可怕现象的体现者，但是他们在实际上已能够表现得更平庸、更温和了。关于 6 月 13 日的失败，他们意味深长地安慰自己说：“只要他们敢动一动普选权，只要敢动一下！我们就会向他们显出我们的本事来！*Nous verrons!*（走着瞧吧！）”

至于那些逃到国外的山岳党人，那末这里就只须指出：赖德律—洛兰在不过两星期的时间内就把他所领导的强大政党不可挽回地断送了，在这以后，他竟觉得自己负有使命 *in partibus*（在国外）组织一个法国政府；他这个远离行动舞台的人物，似乎将随着革命水平的下降，随着官方法国的官方人物变得愈益矮小而愈益高大起来；在 1852 年的应届选举中，他能以共和派竞选人的资格出面；他不断向瓦拉几亚的人民和其他地方的人民发出通告，威胁说要以他自己和他的同盟者的轰轰烈烈的行动来对付大陆上的专

制暴君。蒲鲁东曾向这班老爷们说过：《Vous n'êtes que des blagueurs!》（“你们就是会空谈！”）他这样说难道没有一点道理吗？

6月13日，秩序党不仅击破了山岳党的势力，同时还执行了**宪法应服从国民议会多数派的决议的原则**。它对共和国的理解是：在共和国里，资产阶级通过议会形式实现统治，它不像在君主国里那样既要受行政机构否决权的限制，又要受行政机构解散议会的权力的限制。根据梯也尔所下的定义，**议会制共和国就是这样**。可是，如果说资产阶级在6月13日保证自己在议会范围内取得了无限的权力，那末它把议会中最孚众望的议员排除出去，岂不是严重地削弱了议会对付行政权力和人民的力量，因而使议会本身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吗？它既然毫不客气地把许多议员交付法庭审判，也就是废弃了它本身的议会不可侵犯性。它迫使山岳党议员遵守的那个屈辱性的规则，大大提高了共和国总统的地位，因而也就大大贬低了每一个人民代表。它指责为保护宪法而举行的起义是图谋颠覆社会的无政府行动，也就是自己剥夺了自己在遭受行政权力违犯宪法的侵犯时诉诸起义的机会。历史真能捉弄人！1851年12月2日，秩序党痛哭流涕、但徒劳无益地向人民推荐了一位抵御波拿巴而保护宪法的将军**乌迪诺**，这位将军曾按照波拿巴的命令炮轰了罗马，因而成为6月13日护宪骚动的直接原因。6月13日的另一个英雄**维埃伊拉**，曾经率领一帮属于金融贵族的国民自卫军毫不知耻地在民主报社内胡作非为，因而受到国民议会讲坛上的称赞；这个维埃伊拉竟参加了波拿巴的阴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国民议会在生死关头失掉了国民自卫军方面的任何援助。

6月13日的事变还有另一种意思。山岳党曾力求把波拿巴交

付法庭审判。所以，山岳党的失败也就是波拿巴的直接胜利，也就是波拿巴个人对他那些民主派敌人的胜利。秩序党赢得了这个胜利，而波拿巴只要把这次胜利写在自己的账簿上就行了。他这样做了。6月14日，巴黎各处墙壁上张贴了一个布告，据布告所说，总统好像并没有参与这一切，好像他也并不愿意，只是为事变所迫才离开他的僧院式的隐居生活，他以被人误会的善人口吻抱怨敌人对他的诽谤，他仿佛把他个人和秩序的事业等同起来，实际上却是把秩序的事业和他个人等同起来。此外，虽然国民议会后来批准了罗马的远征，但这次远征是由波拿巴发起的。波拿巴恢复了祭司撒母耳在梵蒂冈的权力以后，便可以指望以大卫王的姿态进入土伊勒里宫⁶⁸。他已把把僧侣拉到自己方面来了。

我们已经说过，6月13日的骚动只是局限于和平的游行示威。所以，在对付这次骚动的斗争中，是谈不上什么军事勋业的。然而，在这个很少有英雄人物和事变的时期，秩序党就把这个不流血的战斗变成了第二个奥斯特利茨^①。讲坛和报纸都称赞军队，说它是秩序用来对抗那些反映无政府状态的软弱无力的人民群众的一种力量，而尚加尔涅则被称颂为“社会中坚”——这个骗局，最后连他自己也信以为真了。这时，那些仿佛是形迹可疑的军队，都被悄悄地调出了巴黎；那些在选举中表露出浓厚的民主倾向的团队，都从法国调往阿尔及利亚去了；士兵中不安分的分子，都被送入了惩罚营；最后，报刊渐渐和兵营完全隔绝，而兵营渐渐和市民社会完全隔绝了。

在这里我们已经谈到了法国国民自卫军历史上的决定性的转

^① 奥斯特利茨是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拉夫科城的旧称。1805年12月2日拿破仑第一在这里击败了俄奥联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译者注

折点。1830年，国民自卫军决定了复辟的垮台。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如果国民自卫军和军队一致行动，每次暴动都要遭到失败。当国民自卫军在1848年的二月事变中对起义采取消极的态度，而对路易—菲力浦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时，路易—菲力浦就认为自己一定要完蛋，而事情果然也就是这样。于是就确立了这样一种信念：革命没有国民自卫军便不能胜利，而军队受到国民自卫军的反对就必然失败。这是军队对市民万能的一种迷信。在1848年六月事变中，当全部国民自卫军协同正规军镇压了起义的时候，这种迷信更加牢固了。从波拿巴就任总统时起，由于违反宪法地把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和正规军第一师的指挥权统一在尚加尔涅一人身上，国民自卫军的作用才稍稍降低了一些。

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在这里好像成了最高军事统帅的标志，同样，国民自卫军本身也带有只是正规军的附属物的性质了。最后，在6月13日国民自卫军已经被粉碎：不仅是由于从这一天起它在法国全国各地都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被解散，直到它只剩了一些碎屑为止。6月13日的示威游行首先是国民自卫军中民主派部分的示威游行。固然，他们用来和军队对抗的，不是自己的武器，而只是自己的军装；可是，护身符就在于这个军装。军队知道，这种军装和其他任何军装一样，是一块破毛料。魅力消失了。1848年六月事变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国民自卫军为代表同军队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1849年6月13日，资产阶级在军队的帮助下驱散了小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1851年12月2日，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也已经不存在了，当波拿巴后来签署解散国民自卫军的法令时，他只是确认了既成的事实。资产阶级就这样自己毁坏了自已对抗军队的最后一个武器，但是自从小资产阶级已不像一

个忠顺的臣仆一样地支持它而像一个反叛者一样地反对它的时候，它就已经应该毁坏这个武器了。一般说来，资产阶级一当自己成为专制者的时候，它就不得不亲手把自己用来对付专制制度的一切防御手段尽行毁坏。

这时候，秩序党却在庆祝政权重新回到它手里（1848年它失掉了这个政权，好像只是为了1849年它摆脱一切羁绊的时候重新把它收回来），它对共和国和宪法横加侮辱，咒骂未来、现在和过去的一切革命，甚至连它自己的领袖所完成的革命都包括在内，最后还颁布了箝制报刊言论、消灭结社自由和把戒严状态规定为正常制度的法律。接着，国民议会从8月中旬到10月中旬停止了开会，任命了休会期间的常任委员会。在休会期间，正统派和爱姆斯一起进行阴谋活动，奥尔良派和克勒蒙特一起进行阴谋活动，波拿巴借皇帝式的巡游来进行阴谋活动，而各省议会则在为修改宪法召开的会议上施展阴谋，这是国民议会定期休会时期照例发生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只有在它们具有事变的性质时，我才较为详细地予以论述。不过这里还应该指当，国民议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退出舞台，只留下路易·波拿巴这一个——虽然是一个可怜的——人物在众目共睹之下占居共和国首脑的地位，国民议会的这种举动是失策的，而这时秩序党却分解为各个具有彼此敌对的复辟欲望的保皇派构成部分来使公众感到难为情。每当这种休会期间议会的喧闹声趋于沉寂而议会的身体消融到国民里去的时候，就显然可以看出，这个共和国为要显出自己的真面目来，只缺少一件东西——使议会的休会继续不断，并把共和国的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 *Infanterie, Cavalerie, Artillerie!*（步兵，骑兵，炮兵！）

四

1849年10月中旬，国民议会复会。11月1日，波拿巴送给议会一个咨文，说巴罗—法卢内阁已经免职，新内阁已经组成，这使议会大为震惊。就是驱逐一个仆人也不会比波拿巴驱逐自己的内阁阁员那样更加蛮横无礼。预定要向国民议会踢去的一脚，先踢到巴罗和他的同僚身上了。

我们已经说过，巴罗内阁是由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组成的。这是秩序党的内阁。波拿巴需要这个内阁，是为了要解散共和派的制宪议会，实现对罗马的远征，并摧毁民主派的力量。那时他好像躲到这个内阁背后，把政府权力让给了秩序党，戴上了路易—菲力浦时期报纸的责任发行人常戴的朴质的假面具，即 *homme de paille*（冒名顶替者）通常戴的假面具。现在他把假面具丢掉了，因为这个面具已不是一个使他能够隐藏自己的面容的薄纱，而是已变成一个妨碍他显示出自己的本来面目的铁制面具了。他任命巴罗内阁，是要借秩序党的名义驱散共和派的国民议会；他解散这个内阁，是宣布他自己的名字和这个秩序党的国民议会无关。

要解散巴罗内阁是不乏正当借口的。巴罗内阁在对待共和国总统这个和国民议会并存的权力时，甚至连必须遵守的礼节都忽视了。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波拿巴发表了致埃德加尔·奈的信，其中好像是指责教皇^①的非自由主义行动，正像他曾撇开制宪议

^① 即庇护九世。——编者注

会发表了称赞乌迪诺进攻罗马共和国的信一样。当国民议会批准远征罗马的拨款时，表面的自由派维克多·雨果提起了这封信的问题。秩序党在表示轻蔑和怀疑的叫声下，根本埋葬了认为波拿巴的狂妄举动可能有什么政治意义的念头。内阁阁员没有一个人出来替波拿巴应战。又一次，巴罗以他特有的空洞的热情，在讲坛上愤愤不平地讲到据他说是在总统亲信人物中进行的“可憎的阴谋”。最后，内阁从国民议会中为奥尔良公爵夫人争得了寡妇抚恤金，坚决拒绝向国民议会提出增加总统薪俸的议案。在波拿巴身上，帝位追求者和破产冒险家的身分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认定自己负有使命恢复帝国，同时他又认定，法国人民负有使命替他偿清债务。

巴罗—法卢内阁是波拿巴所成立的第一个同时又是最后一个**议会制内阁**。所以，这个内阁的解散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随着这个内阁的解散，秩序党就不可挽回地丧失了为维持议会制度所必需的支柱——对行政权力的领导。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行政权力支配着五十万以上的官吏，也就是经常和绝对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人；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它那些最重大的生活表现起，直到最微小的生活表现止，从它的最一般的生存形式起，直到个人的生活止；在这里，这个寄生机体由于非常的集权制而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并且极其敏捷、极其灵活，同时现实的社会机体却又是极无自动性、极其软弱、极不固定；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十分明显，国民议会如果不简化国家管理，不尽可能缩减庞大的官员，不让市民社会和舆论界创立本身的、不依靠政府权力的机关，那末它一旦失掉分配阁员位置的权限，同时也就失掉任何实际影响了。但是，法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

益是和保持这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器分不开的。它在这里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并且以薪俸形式来补充它用利润、利息、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又迫使它每天都要加强压制，即每天都要增加国家政权的经费和人员，同时又不断地进行反对社会舆论的战争，在不能把独立的社会运动机关根本割掉时，由于对它们猜疑而加以摧残和麻痹。这样，法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就迫使它一方面要根本破坏一切议会权力、包括它自己的议会权力的存在条件，另一方面则使得与它相敌对的行政权力成为不可克制的权力。

新内阁叫做奥普尔内阁。这并不是说奥普尔将军得到了内阁总理的职位。自从巴罗免职时起，波拿巴甚至废除了这个职位，因为事实上这个职位使共和国总统成为在法律上毫不足道的立宪君主，这个立宪君主没有王位和王冠，没有王笏和宝剑，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权，没有世袭的最高国家权位，而最坏的是没有皇室费。奥普尔内阁里只有一个人拥有议员头衔，这就是高利贷者**富尔德**，他是金融贵族中恶名昭彰的一个。财政部长的位置就落到他手上。只要看看巴黎交易所的行市表，就可以看出，从1849年11月1日起，法国的证券是随着波拿巴的股票涨跌而涨跌的。这样波拿巴既在交易所中找到了同盟者，同时又以任命卡尔利埃为巴黎警察局长而把警察抓到自己手里。

可是，内阁更迭的后果，只有在事变继续发展的进程中才能显露出来。波拿巴暂时只向前进了一步，好像是为了更清楚地表明自己被抛到后面去了。他送了一份粗卤的咨文以后，接着就极为卑屈地表示听命于国民议会。每当内阁阁员们敢于怯生生地试图把他个人的奇奇怪怪的想法制定成法案的时候，他们好像只是迫

于本身地位勉强执行他们事先已确信不会有什么效果的滑稽性的委托。每当波拿巴在内阁阁员们背后泄露出他的意图并玩弄他的《idées napoléoniennes》⁶⁹的时候，他的内阁阁员就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表示不同意他的主张。看来好像他说出篡夺权位的欲望，只是为了使他的敌人们的幸灾乐祸的笑声不致沉寂下去。他扮演了一个不被赏识而被全世界当作傻瓜的天才角色。他从来还没有像这个时期这样遭到一切阶级的深刻的轻蔑。资产阶级从来还没有有这样绝对地统治过，从来还没有这样高傲地夸示过自己的统治地位。

我的任务不是在这里叙述资产阶级立法活动的历史，它的立法活动在这个时期只限于制定两个法律：一个是恢复葡萄酒税的法律，另一个是废除无神思想的教育法。资产阶级虽使法国人在葡萄酒的消费上感到困难，同时却慷慨地用纯正生活的清水款待了他们。资产阶级以葡萄酒税宣布了旧时的可恨税制的不可侵犯性，同时又力图以教育法使人民群众保存他们能够容忍这一税制的旧时的心境。有人感到奇怪，为什么奥尔良派，自由派资产者（这些伏尔泰主义和折衷派哲学的老信徒们）竟把指导法国人的精神的工作，委托给他们的世仇耶稣会派去担任。可是，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在王位追求者这个问题上虽然有分歧，但是他们双方都懂得，他们的共同统治要求把两个时期的压迫手段结合起来，七月王朝时期的奴役手段必须用复辟王朝时期的奴役手段来补充和加强。

农民的一切希望都落了空，他们一方面比任何时候都苦于粮价低落，另一方面又苦于赋税和抵押债务日益加重，于是他们在各省开始骚动起来。他们所得到的答复是迫害学校教师，使他们服从于僧侣，迫害地方长官，使他们服从于行政官，最后是施行控制一切人的侦探制度。在巴黎和各大城市，反动派本身具有自己时代的

特征,挑衅行为多于压制。在乡村中,反动派卑鄙龌龊,琐碎小气,可恶可厌,一句话,就是宪兵。显然,受过牧师制度熏染的三年宪兵制度,对愚昧的群众的腐蚀该是多么深。

虽然秩序党在国民议会讲坛上热情奔放,大发议论反对少数派,但是它的言词始终是单音节的,正如基督徒只应该说“是”和“否”一样!不论是讲坛上或报刊上的言论,都很单调,和预先知道答案的谜语一样平淡无味。不管是谈请愿权还是葡萄酒税,不管是谈出版自由还是贸易自由,不管是谈俱乐部还是市政机构,也不管是谈保障人身自由还是决定国家预算,发出的口号总是一样,题目总是一个,判词总是早已准备妥贴而且总是一成不变地说:“**社会主义!**”甚至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教育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财政改革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在已有运河的地方建筑铁路也是**社会主义**,用木棍抵御刀剑的袭击也是**社会主义**。

这并不只是一句空话、一种时髦或一种党派斗争手腕。资产阶级正确地了解到,它为反对封建制度而锻造出来的各种武器都倒过来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创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转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文明了,它创造的所有的神都离弃了它。它了解到,一切所谓的市民自由和进步机关,都侵犯它的**阶级统治**,并且既威胁它的社会基础,又威胁它的政治上层,因此这些东西就成了“**社会主义的**”了。在这种威胁和这种侵犯中,它正确地看出了社会主义的秘密,所以它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和趋势的评价,就比所谓的社会主义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更正确些,而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因此也就不能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对它一味表示反对——不管它是在为人类的痛苦感伤地哭泣,不管它是在宣扬基督的千年王国和博爱,也

不管它是在用人道主义态度漫谈精神、教育和自由，或是在空泛地臆造一切阶级的协调和幸福的制度。资产阶级只是没有了解到一点：如果推论下去，那末它自己的议会制度，它的整个政治统治，现在也应该被普遍指责为社会主义的东西了。当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没有充分组织起来，还没有获得自己的纯粹的政治表现时，其他各个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关系也不能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在它有所表现的地方，它也不能采取那种使一切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转化为反对资本的斗争的危险形式。既然资产阶级认为任何一种社会生活表现都危害“安宁”，那末它又怎能希望在社会上层保持不安宁的制度，即保持自己那个——照它的一位发言人的说法——生存在斗争中并且靠斗争生存的议会制度呢？靠辩论生存的议会制度怎能禁止辩论呢？既然这里每种利益、每种社会措施都变成一般的思想，并被当作一种思想来解释，那末在这种条件下怎么能把某种利益、某种措施当作一种高出思维的东西而强使人们把它当作信条来接受呢？发言人在讲坛上的斗争，引起了报界的低级作家的斗争；议会中的辩论会必然要由沙龙和酒馆中的辩论会来补充；议员们经常诉诸民意，就使民意有理由在请愿书中表示自己的真正的意见。既然议会制度将一切事情交给大多数决定，那末议会以外的大多数又怎能不想也作决定呢？既然你们站在国家的顶峰上拉提琴，那末你们又怎能因为站在下面的人们跳舞而惊奇呢？

总之，既然资产阶级把它从前当作“自由主义”颂扬的东西指责为“社会主义”，那它就是承认它本身的利益迫使它逃避自身统治的危险；要恢复国内的安宁，首先必须使它的资产阶级议会安静

下来；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会权力，就应该摧毁它的政治权力；只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政治上同其他阶级一样低下，个别资产者才能继续剥削其他阶级，安逸地享受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的福利；要挽救它的钱包，必须把它头上的王冠摘下，而把保护它的剑像达摩克利斯的剑一样地悬在它自己的头上。

在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方面，国民议会表现得非常无能，例如1850年冬季开始的关于修筑巴黎—阿维尼翁铁路问题的讨论，直到1851年12月2日还没有结果。只要国民议会不从事压迫，不进行反动活动，它就患了不可救药的不孕之症。

当波拿巴的内阁一部分倡议制定符合秩序党精神的法律，一部分又在加强实施这些法律时的苛刻性的时候，波拿巴本人却企图以一些幼稚荒唐的提案来博得声望，强调自己对于国民议会的敌意，并暗示有某种神秘的宝藏，只是由于环境的阻碍暂时还不能把财宝显示给法国人民。这类提案中包括了给下级军官每天增加四个苏的津贴的建议，以及为工人创设“荣誉贷款银行”的法案。金钱的馈赠和金钱的借贷，这就是他希图用以诱惑群众的远景。馈赠和贷款，这就是显贵的和卑贱的流氓无产阶级的全部财政艺术。波拿巴所善于运用的妙诀只此而已。从来还没有一个王位追求者像他这样庸俗地利用群众的庸俗习气来进行投机勾当。

国民议会眼看着波拿巴这样明明白白地企图靠损害它的利益来博取声望，眼看着这个被债主鞭挞而又毫无值得珍惜的声誉的冒险家愈来愈可能干出某种极冒险的勾当，曾不止一次地表示狂怒。秩序党和总统之间的分歧已经带有危险性质，一个出乎意料的事件又迫使总统怀着忏悔的心情重新投入秩序党的怀抱。我们指的是1850年3月10日的补缺选举。这次选举是为了填补6月13

日事变后被监禁或驱逐出国的议员所空下来的席位的。巴黎只选了社会民主派的候选人，并且绝大部分选票都投给了参加过1848年六月起义的德弗洛特。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巴黎小资产阶级，就这样报复了1849年6月13日的失败。看来，小资产阶级在危急关头离开战场，只是为了要在顺利的情况下以更大的战斗力量和更勇敢的战斗口号重新进入战场。看来有一种情况更加重了这次选举胜利的危险性。巴黎的军队投票选举了六月起义的一个参加者来对抗波拿巴的内阁阁员拉伊特，而在各省，大部分人都投了山岳党人的票，山岳党人在这里（虽然不如在巴黎那样绝对地）也比敌人占了优势。

波拿巴突然看到自己又面对着革命了。和1849年1月29日及1849年6月13日一样，1850年3月10日他又躲到秩序党背后去了。他屈服了，他怯懦地请罪，表示决心遵照议会多数人的意旨来组织任何一个内阁，他甚至恳求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首领们（梯也尔、贝利耶、布洛利和摩莱），一句话，就是恳求所谓的城官们⁷⁰亲自掌握政权。秩序党未能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它不但没有大胆地握取这个政权，甚至也没有强迫波拿巴恢复他在11月1日所解散的内阁；它满足于用自己的宽恕羞辱了波拿巴，并使**巴罗什**先生加入了奥普尔内阁。这个巴罗什作布尔日最高法院的检察官时，曾疯狂地攻击过5月15日事件中的革命者和6月13日事件中的民主派，两次都指控他们危害国民议会。以后，波拿巴的任何一个内阁阁员，都没有比巴罗什更多地侮辱过国民议会，而在1851年12月2日以后，他又得到了参议院副议长这个官高禄厚的职位。他把痰吐在革命者的汤中，为的是让波拿巴能够把它喝掉。

社会民主派似乎只是在寻找借口再度使自己的胜利成为问题，并削弱这一胜利的意义。巴黎新选出的议员之一维达尔，同时在斯特拉斯堡也当选了。他被说服放弃巴黎的委任状而接受了斯特拉斯堡的委任状。这样，民主派就没有把自己在选举中的胜利变成最终的胜利，从而激起秩序党立刻在议会中进行斗争，它没有迫使敌人在人民热情高昂和军队情绪良好的时机出来斗争，反而在3月和4月间用新的竞选运动把巴黎弄得疲惫不堪，使人民的激昂的感情在这一新的临时竞选把戏中消耗掉，使革命的精神满足于宪制的成就，把革命精力浪费于细小的攻讦、空洞的宣言和运动的表面，让资产阶级有时间恢复知觉和采取措施，最后以4月补缺选举的感伤主义的注释（欧仁·苏当选）减弱了3月选举的意义。一句话，社会民主派和3月10日开了一个愚人节的玩笑。

议会中的多数了解自己对方的弱点。秩序党的十七个城官（因为波拿巴让秩序党领导和负责攻击）制定了新选举法，法案的报告人是要求这种荣誉的福适先生。5月8日，福适提出了一个法案，其内容是要废除普选权，并规定选举人必须在他们所在的选区内居住三年，工人在选区的居住年限应由他们的雇主作证来加以确定。

民主派在宪制选举斗争时期曾满怀着革命的激情，当现在应该拿起武器来证明自己的选举胜利的重大意义的时候，他们却以宪制精神鼓吹秩序，宣扬庄严的宁静（*calme majestueux*）和合法行为，也就是盲目地服从自封为法律的反革命势力的意志。在辩论的时候，山岳党力图羞辱秩序党，以一个遵守法制的正直庸人的冷漠态度来对抗它的革命热情，严厉责备它的革命行为从而把它置于死地。甚至新当选的议员们也极力想以自己的谨慎而有礼的举

动来向大家证明：责骂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把他们的当选解释成革命的胜利，是多么地不公正。5月31日，新选举法通过了。山岳党把抗议书塞进总统的衣袋里就心满意足了。继选举法之后又通过了一个彻底消灭革命报刊的新出版法⁷¹。革命报刊遭到这种厄运是应该的。在这一摧残以后，革命最前缘的边哨就只剩下“国民报”和“新闻报”⁷²这两个资产阶级的报纸了。

我们已经看到，民主派的领袖们在3月和4月间曾竭力把巴黎人民拖入虚构的斗争，正如他们在5月8日以后竭力阻止巴黎人民进行实际的斗争一样。此外，还不应当忘记，1850年是少有的工商业繁荣的年头，所以当时巴黎的无产阶级有充分就业的机会。可是1850年5月31日的选举法根本剥夺了无产阶级参政的权利，甚至断绝了他们接近战场的机会。这个法律使工人回复到他们在二月革命以前所处的毫无权利的地位。在这些事变的时刻，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民主派的领袖去掌握，为了一时的安逸而忘记了自己阶级的革命利益，他们放弃了作为致胜力量的光荣，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并且表明，1848年6月的失败使他们长期丧失了战斗能力，最近的历史进程也要撇开他们而向前发展。至于在6月13日曾大嚷大叫“只要他们敢动一动普选权，只要敢动一下！”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现在他们却自慰说：反革命给他们的打击根本不是打击，而5月31日的法律也根本不是法律。在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每个法国人都将一手拿着选票，一手拿着利剑来到投票站。他们用这样的预言来安慰自己。最后，军队为了1850年3月和4月的选举而受到上级的处罚，正如他们曾经为了1849年5月28日的选举而受到处罚一样。可是这次军队坚决地对自己说：“第三次我们再不会上革命的当了！”

1850年5月31日的法律，是资产阶级的 coup d'état (政变)。资产阶级过去所有各次对革命的胜利，都只具有临时的性质。只要现届国民议会一退出舞台，这些胜利就成为问题了。这些胜利是以新的普选中的偶然情况为转移的，而自从1848年以来，选举的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资产阶级的实际权力愈强大，它对人民群众的精神统治权力就愈弱。普选权在3月10日断然表明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就以取消普选权进行了报复。所以，5月31日的法律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必然表现。另一方面，按宪法规定，共和国总统的当选至少要有二百万票才算有效。如果总统候选人中没有一个人获得这个最低限度的票数，国民议会就有权从得票最多的三个候选人中选出一个来当总统。当制宪议会制定这个法律的时候，选民册中共有一千万选民。所以，按照这个法律，只要取得占选民总数五分之一的票数，总统当选就算有效了。5月31日的法律至少从选民册中勾销了三百万个选民，这样就把选民人数减低到七百万人，但是当选总统需要获得二百万选票的法定最低限额却依然保留着。这样一来，法定的最低限额就从总选票的五分之一几乎提高到三分之一。换句话说，这个法律用尽一切办法把总统选举从人民手里暗中转到国民议会手里。总之，秩序党就好像是加倍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权力，因为它已经用5月31日的选举法把国民会议员的选举和共和国总统的选举转交给社会的保守部分了。

五

革命危机刚一过去，普选权刚一废止，国民议会和波拿巴之间的斗争就重新爆发了。

宪法规定发给波拿巴的薪俸是每年六十万法郎。他就任总统后不到半年功夫，就把这个数额增加了一倍。奥迪隆·巴罗要制宪议会每年补发六十万法郎作为所谓交际费。在6月13日以后，波拿巴也曾提出过同样的要求，可是巴罗这次并没有听从。现在，在5月31日以后，波拿巴立即利用有利的时机，通过他的内阁阁员们向国民议会要求每年发给三百万法郎的文官费。长期的流浪生活使这个冒险家极为敏感，他能探知可能向资产者勒索金钱的时机。他采取了十足的欺诈手段。国民议会在他的协助和同意下污辱了人民的主权。他威胁说，如果国民议会不松开钱袋，不以每年三百万法郎来买他的沉默，他就要把国民议会的犯罪行为报告给人民。国民议会剥夺了三百万法国人的选举权，他要求把每一个在政治上被弄得毫无价值的法国人换成一个实价的法郎，总额是三百万法郎。他是由六百万人选举出来的，他要求赔偿他在事后被剥夺掉的票数。国民议会的委员会拒绝了他这种厚颜无耻的要求。于是波拿巴派的报纸就来进行威胁。国民议会能不能在它根本彻底和国民群众决裂的时候又同共和国总统决裂呢？国民议会虽然否决了每年的文官费，同时却通过了一次增发二百一十六万法郎的决定。国民议会既已答应给钱，同时又以自己的烦恼表明自己的让

步是出于不得已，因而就暴露了加倍的软弱。波拿巴为什么需要这笔款子，我们往后就可以看到。在废除普选权后紧接着发生的令人丧气的尾声中，波拿巴对于篡夺权力的议会的口吻已经从3月和4月危机时期的恭顺平和变成了挑战式的骄横，而国民议会在这次事件后却休会三个月，从8月11日到11月11日。它在休会期间留下了一个由二十八个人组成的常任委员会，其中没有一个波拿巴分子，但是有几个温和的共和派。1849年的常任委员会完全是由秩序党和波拿巴分子组成的。但是，那时是秩序党以革命的经常反对者自命，现在则是议会制共和国以总统的经常反对者自命了。5月31日的法律通过后，秩序党所必须考虑的只是这个敌手了。

1850年11月国民议会复会的时候，情况是这样：看来，过去国民议会和总统之间的一些小小的冲突势必要转化为两个权力间的大规模的战斗，转化为两个权力间不可避免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了。

和1849年间一样，这次议会休会期间，秩序党又分解成了各个派别，其中每一派都忙于自己的复辟阴谋，这种阴谋因路易-菲力浦之死而更加活跃起来。正统派的国王亨利五世，甚至任命了一个组织完备的内阁驻在巴黎，其中有几个常任委员会委员参加。因此，波拿巴也有理由巡游法国各省，并按照他所幸临的每个城市的情绪，或多或少公开地吐露自己的复辟计划，为自己张罗选票。波拿巴的这次巡游，被大型的官方报纸——“通报”⁷³和小型的、波拿巴的私人通报捧作胜利的游行，在这次巡游期间，到处都有十二月十日会的会员们随驾陪行。这个团体在1849年就成立了。它名义上是个慈善团体，实际上是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一些秘密团体，每一个团体都由波拿巴的走狗们领导，总领导人是一个波拿

巴派的将军。在这个团体里，除了一些来历不明和生计可疑的破落放荡者之外，除了资产阶级可憎的败类中的冒险分子之外，还有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拣破烂的、磨刀的、镀锡匠、叫化子，一句话，就是随着时势浮沉流荡而被法国人称作 *la bohème*（浪荡游民）的那个五颜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波拿巴把这些跟他同类的分子组成十二月十日会即“慈善会”的核心，因为这个团体的所有的成员都和波拿巴一样感到自己是需要靠国内的劳动群众来周济。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只有在这些流氓无产者身上才能找到他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作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级，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这就是 *sans phrase*（不加掩饰的）波拿巴。他这个老奸巨滑的痞子，把各国人民的历史生活和这种生活所演出的一切悲剧，都看作最鄙俗的喜剧，看作专以华丽的服装、词藻和姿势掩盖最鄙陋的污秽行为的化装跳舞会。例如，在进攻斯特拉斯堡时，一只受过训练的瑞士兀鹰就扮演了拿破仑之鹰的角色。当他在布伦登陆时，他给几个伦敦仆役穿上了法国军装，于是他们就俨然成了军队⁷⁴。在他的十二月十日会中，有一万个游手好闲分子应该装作人民，正像聂克·波顿应该扮演狮子⁷⁵一样。当资产阶级毫不违反法国演剧格式的迂腐规则，十分严肃地表演最纯粹的喜剧时，当它一半被骗一半信服自己表演得庄严堂皇时，一个把喜剧仅仅看作喜剧的冒险家当然是要获得胜利的。只有当他战胜了盛装的敌人，并且认真演起自己的皇帝角色，在拿破仑的假面具下装作真正的拿破仑以后，他才会成为他自己的世界观的牺牲品，成为

一个再也不把世界历史看作喜剧而是把自己的喜剧看作世界历史的认真的丑角。十二月十日会是波拿巴特有的一种党派战斗力量；它对于波拿巴的意义，正如国家工厂对于社会主义工人，别动队对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意义一样。在他巡游期间，十二月十日会的会员们成群地聚集在沿途各火车站上，装作迎驾的群众，并表示人民的热情，高叫《Vive l'Empereur!》（“皇帝万岁！”），侮辱和殴打共和党人，——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在警察保护下干出来的。当他回到巴黎时，这些人就充当了前卫，防止或驱散敌对性的示威游行。十二月十日会属于他，它是他创造出来的，是完全出自他自己的主意。在其他一切方面，他硬加在自己身上的东西，都是由于情势关系落到他手中的；他所作的一切，都不过是情势替他作好或者是他模仿别人的行为罢了。他公开地对资产者大打其关于秩序、宗教、家庭、财产的官腔，暗地里却依靠着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⁷⁶一流人的团体，依靠着无秩序、卖淫和偷窃的团体，这是波拿巴的本色，而十二月十日会的历史便是他本人的历史。有一次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有几个秩序党议员曾挨了十二月十日会会员的木棍。不仅如此，负责国民议会保卫事宜的警卫专员伊雍，曾根据一个名叫阿勒的人的口供向常任委员会报告，说十二月十日会的一个支部决定暗杀尚加尔涅将军和国民议会议长杜班，并且已经指定了凶手。可以想像，杜班先生该是多么惊恐。看来，议会对十二月十日会的调查，即对波拿巴秘密内幕的揭发，是不可避免的了。可是，在国民议会即将开会的时候，波拿巴却预有戒备地解散了自己的这个团体，不过这种解散当然只是在纸面上，因为1851年末，警察局长卡尔利埃在一个详尽的报告书中还白费气力地劝他把十二月十日会真正解散。

当波拿巴还未能把国家军队变成十二月十日会时，十二月十日会仍然是他的私人军队。波拿巴在国民议会休会不久就在这方面作了初次的尝试，而且用的是他从国民议会手中索取来的钱。他是一个宿命论者，相信有某种最高力量是人们特别是军人们所抵抗不住的。而首先被他列入这种力量的就是雪茄烟和香槟酒，冷盘禽肉和蒜腊肠。所以他一开始就在爱丽舍宫的大厅里用雪茄烟、香槟酒、冷盘禽肉和蒜腊肠款待了军官和军士。10月3日他在圣摩尔阅兵时，又对军队采用了这种办法；10月10日他在萨托里总阅兵时，又更大规模地重复了这种办法。伯父回忆亚历山大大帝远征亚洲的故事，侄儿就回忆巴克斯在同一地方征伐的故事。不错，亚历山大大帝是半神，而巴克斯却是真神，并且是十二月十日会的庇护神。

10月3日检阅后，常任委员会曾把陆军部长奥普尔召来质问。后者保证这类违犯纪律的事情不再发生。大家知道，波拿巴怎样在10月10日履行了奥普尔的诺言。这两次阅兵都是由巴黎军队总司令尚加尔涅担任指挥的。这个尚加尔涅既是常任委员会的委员，又是国民自卫军的司令官；既是1月29日和6月13日的“救星”，又是“社会中坚”；既是秩序党的总统候选人，又是两个王朝的意中的蒙克；他以前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是陆军部长的部属，一向公开嘲笑共和国宪法，以模棱两可的高傲的庇护态度追逐着波拿巴。现在他却热烈地拥护军纪，反对陆军部长；拥护宪法，反对波拿巴了。当10月10日有一部分骑兵高呼《Vive Napoléon! Vivent les saucissons!》（“拿破仑万岁！腊肠万岁！”）时，尚加尔涅竟安排得至少是他的朋友诺马耶率领去受检阅的步兵严守沉默。在波拿巴的怂勇下，陆军部长为了惩罚诺马耶将军，以任命他为第十四

和第十五师团的司令官为借口，解除了他在巴黎的职位。诺马耶拒绝调换职务，因而被迫辞职。尚加尔涅于 11 月 2 日发布命令，禁止军队在军伍中呼喊任何政治口号和进行示威。爱丽舍方面的报纸⁷⁷攻击尚加尔涅；秩序党的报纸攻击波拿巴；常任委员会接连不断地召开秘密会议，会上一再提议宣布祖国处于危急状态；军队好像已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有两个敌对的参谋部，一个在波拿巴的官邸爱丽舍宫，另一个在尚加尔涅的官邸土伊勒里宫。国民议会的开会看来是不免要发出战斗的信号了。法国公众对波拿巴和尚加尔涅间这次纠纷的评判，和一位英国记者对这种情况的评论相同，这位记者写道：

“法国的政治女仆们正在用旧扫帚扫除革命的灼热熔岩，而她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又互相争吵得不可开交。”

这时，波拿巴急忙免除了陆军部长奥普尔的职务，随即把他派到阿尔及利亚去，任命施拉姆将军继任陆军部长。11 月 12 日波拿巴向国民议会送去了一篇美国式的冗长咨文，其中充满了琐事，渗透着秩序的臭味，渴望调和，表示服从宪法，谈论到所有一切，只是没有讲到当前的 *questions brûlantes*（紧急问题）。他好像是顺便指出，根据宪法的真义，军队的指挥权完全属于总统。这篇咨文是以下面一段极其庄严的词句结尾的：

“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 我一个人身受誓言约束，我将谨守这个誓言所给我划定的狭隘界限…… 至于我个人，我是人民选出的，我的权力完全是人民赋予的，我将永远服从人民的合法表示的意志。如果你们在本届会期中决定要修正宪法，制宪议会就会调整行政权力的地位。否则人民将于 1852 年庄严地宣布自己的决定。可是不论将来的决定如何，我们总应该有这样一个共同的了解：一个伟大民族的命运永远不会由热情、意外事故或暴力来主宰…… 我首先注意的问题不是谁将在 1852 年治理法国，而是要运用

我所能支配的时间使这个过渡时期不发生风波和乱子。我对诸位是开诚布公的。望你们以信任来回答我的诚意，以襄助来回答我的善念，其余的一切上帝会来照顾。”

资产阶级惯用的有礼貌的、伪善而温和的、庸俗慈善的腔调，在十二月十日会的专制魔王兼圣摩尔和萨托里的野餐英雄的口中，暴露了它那最深长的含义。

关于这种内心剖白应该受到什么样的信任的问题，秩序党的城官们一刻也没有弄错。誓言他们早已听厌了，他们自己的人们中间就有许多政治上违背誓言的老手和巧匠；不过关于军队的那一段话，他们倒没有听漏。他们愤懑地发觉：这个咨文非常烦琐地列举了最近颁布的各种法律，但是故意不提最重要的法律——选举法；不仅如此，在拒绝修改宪法时，这个咨文把 1852 年的总统选举委诸人民。选举法是拴在秩序党脚上的沉重赘物，妨碍他们行动，当然更妨碍他们冲击！此外，波拿巴以正式解散十二月十日会和免除奥普尔的陆军部长职务的手法，亲手把替罪的羔羊献到祖国的祭坛上。他把预期发生冲突的最尖锐的争端排除了。最后，秩序党自己也胆怯地竭力回避、缓和并抹杀和行政权力发生的决定性的冲突。由于害怕失去在和革命进行斗争中所获得的一切，它让敌手攫取了它所获得的果实。“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秩序党从 2 月^①起就开始对革命这样叫喊；现在波拿巴在他的咨文中又对秩序党这样叫喊。“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波拿巴采取了图谋篡夺权位的行为，但是当秩序党因为这种行为而吵吵嚷嚷并且神经过敏地加以解释的时候，它就成了造成“不安宁”的罪人。只要没有人

^① 1848 年 2 月。——编者注

谈到萨托里的腊肠，这腊肠是根本不会说话的。“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所以波拿巴要求让他安安静静地干他的事情，而议会党却已经被双重的恐惧所麻痹：一怕重新引起革命的不安宁状态，二怕自己在本阶级即资产阶级眼中成为造成不安宁的罪人。既然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所以秩序党也就不敢用“战争”来回答波拿巴咨文中的“和平”了。一般人曾期待在国民议会开会时必将大吵大闹，结果是大失所望。反对派议员要求常任委员会交出它关于十月事件的记录，但这个要求被多数否决了。国民议会根本规避一切可能激动人心的辩论。国民议会在1850年11月和12月的工作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直到12月底，才开始发生了一些关于议会个别特权问题的小冲突。自从资产阶级以废止普选权暂时避开了阶级斗争的时候起，运动范围就缩小了，变成专为两个权力间的特权问题发生的小小的口角了。

有一位议员，名叫摩干，因负债被法庭判罪。司法部长鲁艾在回答法院院长的询问时宣称，应当不再拘什么仪式径直下令把负债者拘捕起来。于是摩干就被投入债务监狱。国民议会知道这种破坏议员的不可侵犯权的消息时，大为愤懑。它不仅决定立即释放被捕者，而且当晚就通过自己的法警用强力把他从克利希监狱里放出来了。可是，在另一方面，为了要证明自己信仰私有制的神圣性，并且为了将来在必要时能够把讨厌的山岳党人安置到现成的地方去，国民议会又宣布说：在事先取得它的同意时，拘捕负债的议员是容许的。国民议会忘记宣布总统也可以因负债被捕入狱。国民议会把自己议员的不可侵犯权的最后一点影子都消灭无余了。

上面已经讲过，警卫专员伊雍根据一个名叫阿勒的人的供词，告发了十二月十日会的一个支部阴谋暗杀杜班和尚加尔涅两人的行为。因此，议会总务官在第一次会议上就提议成立一个特别议会警察队，由国民议会本身的预算中的经费维持，完全不受警察局长管辖。内务部长巴罗什提出了抗议，说这是一种侵害他的职权的行为。结果双方达成了可怜的妥协，规定议会警卫专员应由议会预算中的经费维持并由议会总务官任免，但是事先必须取得内务部长的同意。这时，政府已对阿勒提起诉讼，因而很容易就把阿勒的供词宣布为凭空捏造，检察官的发言把杜班、尚加尔涅、伊雍和整个国民议会嘲笑了一顿。然后，12月29日，巴罗什部长又写信给杜班，要求把伊雍免职。国民议会常任委员会决定伊雍留任原职，可是国民议会被自己在摩干案件中所采取的暴力行为所吓倒，它习惯于在每次给行政权力打击后受到它的两个打击，因此没有批准这个决定。国民议会为酬答伊雍的忠诚尽职而免了伊雍的职，因而剥夺了自己所享有的议会特权，但这种特权对它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当时它所要对付的那个人，不是一个夜间决定白天要干什么的人，而是一个白天作决定却在夜间采取行动的人。

我们已经看到，国民议会在11月和12月间，总是极力避免和拒绝在重大的、迫切的问题上和行政权力进行斗争。现在我们却看到，它不得不为了最微不足道的理由投入战斗。在处理摩干案件时，它原则上已经允许逮捕负债的议员，不过又保证自己能够把这个原则只运用于可恶的议员身上，为了这种可耻的特权和司法部长发生了争执。国民议会没有利用关于有人准备谋杀杜班和尚加尔涅两人的消息要求追查十二月十日会的活动，并在法国和欧洲面前彻底揭穿波拿巴，使大家都能明白看出他是巴黎流氓无产阶

级的首领，它竟把冲突归结为在警卫专员应由谁任免的问题上跟内务部长的争吵。这样，我们就看到，秩序党在这个时期内始终都因自己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而不得不把自己反对行政权力的斗争变成关于权限问题的很小的纠纷，变成吹毛求疵、无谓争讼以及关于界限问题的争论等空嚷，把一些空洞的形式问题变成了自己的活动的内容。当斗争具有原则意义，当行政权力真正名誉扫地，当国民议会的事业将成为国民的事业的时候，秩序党却不敢战斗，因为它如果这样做，就会对全国发出一种发动的信号，而发动国民正是它最害怕的事情。因此，在这种场合，它总是否决山岳党的提案而转入日常议程。当秩序党已经放弃了大规模的斗争之后，行政权力就静待时机，以便有可能当斗争只具有可说是议会性的局部的兴趣时，借一个很小的无关紧要的理由重新开始这种斗争。那时秩序党就发泄出满怀的愤怒，那时它就拉开后台的布幕，揭开总统的假面具，宣布共和国处境危急，然而那时它的热情令人感到荒唐，斗争的理由是一种虚伪的口实或根本不值得斗争的东西。议会的风暴原来不过是一杯水中的风暴，斗争不过是阴谋，冲突不过是吵架。各革命阶级都幸灾乐祸地观望着国民议会受屈辱，因为他们对国民议会的议会特权表示关心，正如国民议会对社会自由表示关心一样；同时，议会外的资产阶级却不了解，为什么议会内的资产阶级居然把时间浪费在这样琐碎的纠纷上，为什么它竟这样无聊地跟总统进行竞争，从而危害安宁。当大家都在等候战争的时候进行媾和，而当大家都以为和约已经缔结的时候却又开始进攻，这种策略把它弄迷糊了。

12月20日，巴斯噶·杜普拉就发行金条彩票一事向内务部长提出质问。这彩票是“来自爱丽舍园的女儿”⁷⁸。波拿巴和他的亲

信把她献给人世，而警察局长卡尔利埃则把她置于自己的正式保护之下，虽然法国的法律除了以救济为目的的彩票外是禁止发行任何其他彩票的。彩票发行了七百万张，每张一法郎，而所得纯利润据说是用来遣送巴黎的游民到加利福尼亚去。一方面是为了用黄金梦来排除巴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梦想，用可望中头彩的诱人幻景来驱除空论式的劳动权。自然，巴黎的工人们没有认出加利福尼亚的耀眼的金条就是从他们口袋里骗去的无光彩的法郎。无论如何，这种彩票不过是一种骗局而已。妄想不离开巴黎就能发现加利福尼亚金矿的游民，正是波拿巴本人和他那些负债累累的侍从。国民议会同意给他的三百万法郎已经用光，无论如何总得重新填满空虚的钱库。波拿巴为建立所谓的 *cités ouvrières* (工人村) 曾向全国募集捐款，并且他自己在认捐名册上第一个认捐了一大笔款子，但他只是徒劳了一番。冷酷的资产者抱着不信任的态度等待他付出认捐的款子；而这笔款子自然是没有付出，于是利用社会主义空中楼阁进行的投机把戏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金条的成效较大。波拿巴和他的同谋者并不满足于把七百万法郎中扣除奖金以后的一部分纯收益装进自己的腰包，他们还制造了大批假彩票，同一个号码的彩票发出了十张、十五张以至二十张，——这真是十二月十日会的金融手段呵！这里，国民议会所碰到的不是名义上的共和国总统，而是真正的、活生生的波拿巴。这里，国民议会可以在他犯罪——不是违反宪法，而是违反 *Code pénal* (刑法典)——的地点把他当场捉住。如果说国民议会以转入日常议程回答了杜普拉的质问：那末，它这样做不只是因为日拉丹提议要国民议会宣布自己“满意”于提醒秩序党人想起他们自己的一贯的贪污行为。资产者，尤其是被提升成国家人物的资产者，总是用理论上的浮夸来弥

补自己的实践上的卑下。资产者身为国家人物时，也和他相对立的国家权力一样，就俨然成为至高无上之物，因而对他作斗争时，也只能采取高尚的庄严的方式。

波拿巴是一个浪荡人，是一个骄横的流氓无产者，他比资产阶级的骗子有一个长处，这就是他能用下流手段进行斗争。现在，在国民议会亲手帮助他顺利地走过了军人宴会、阅兵、十二月十日会以及违犯 Code pénal（刑法典）等处很容易滑倒的地点以后，他已经看到，他可以由伪装的防御转为进攻的时刻已经到了。当时司法部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财政部长所遭到的那些小小的失败，即国民议会借以表示它的唠叨不满的失败，很少使波拿巴感到不安。他不仅阻止了部长们辞职，从而阻止了承认行政权力服从议会。他现在已经能完成他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就已经开始做的事情，即军权和议会分立的事情：他把尚加尔涅免职了。

爱丽舍方面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个 5 月间似乎是向第一师团颁发的命令（因而是出自尚加尔涅的命令），劝告军官们在叛乱时不要宽容自己队伍中的叛徒，要立刻将他们枪毙，并且不要按国民议会的要求派遣军队。1851 年 1 月 3 日，内阁因这一命令受到了质问。为了调查这一事件，内阁起初要求的限期是三个月，继则一星期，最后仅仅是二十四小时。国民议会要求立即予以解释。尚加尔涅站起来声明说：这种命令从未下过。他并且补充说：他随时都准备执行国民议会的要求；遇有冲突发生时，国民议会可以信赖他。国民议会以狂热的鼓掌欢迎他的声明，并对他投了信任票。国民议会既委身于一个将军的私人保护之下，也就是放弃了权力，宣告自己的软弱和军队的万能；但是这位将军弄错了，因为他居然想把他从波拿巴那里暂时领用的权力交付给国民议会去反对同一个

波拿巴,并且盼望从这个议会,从他这个需要保护的被托管者获得保护。可是尚加尔涅相信资产阶级在1849年1月29日赋予他的那种神秘力量。他以为自己是和其他两个国家权力相鼎立的第三个权力。他所遭遇到的命运,也和当代其他的英雄,更正确些说,和当代的圣者们所遭遇到的命运一样,这些人物的伟大只在于他们的党派故意替他们宣扬,而到局势要求他们创造奇迹时,他们就显得平庸无奇了。一般说来,不信神是这些假英雄和真圣者的死敌。因此他们往往对那些冷酷无情的讽刺者和讥笑者表示高尚的道义的愤懑。

当晚,内阁阁员们被召请到爱丽舍宫去。波拿巴坚持要撤换尚加尔涅,五个阁员拒绝署名。“通报”宣布内阁危机,而秩序党的报纸则以组织由尚加尔涅指挥的议会军队相威胁。根据宪法,秩序党是有权这样作的。它只要把尚加尔涅选为国民议会议长,并调来任何数量的军队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就够了。由于尚加尔涅实际上还统率着军队和巴黎国民自卫军,并且正等待和军队一起被召去援救国民议会,所以秩序党是可以更加放心地这样做的。波拿巴派的报纸甚至还不否认国民议会直接调动军队的权利,提出这种法律上的问题在当前局势下是不会有有什么成效的。当时军队将听从国民议会调遣,这是十分清楚的,要知道,波拿巴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才在巴黎找到两位将军(巴拉盖·狄利埃和圣让·丹热利)愿意在把尚加尔涅撤职的命令上签名。但是秩序党本身是否能在自己的队伍中和议会里找到通过这种决定所必需的票数,就很有问题了,要知道,过了一个星期就有二百八十六个议员脱离了秩序党,而且山岳党甚至在1851年12月,在最后的决定性的时刻还否决了这样的提议。不过,城官们这时也许还能发动他们党内的群

众去建立丰功伟绩，即藏身于枪林之后，并利用投到它阵营中的军队的帮助。可是，城官老爷们并没有这样作，1月6日晚上他们到爱丽舍宫去，希望用外交手段和论据规劝波拿巴放弃把尚加尔涅撤职的决定。劝谁就是认谁作主。波拿巴由于城官们的这种企图而增加了勇气，1月12日他任命了新内阁，旧内阁的首领富尔德和巴罗什两人继续留任。圣让·丹热利当了陆军部长。“通报”刊载了把尚加尔涅撤职的命令，他的职权划分给指挥第一师团的巴拉盖·狄利埃和指挥国民自卫军的佩罗了。“社会中坚”辞职了，这一事实虽然并没有使一块瓦片从屋顶上掉下来，但是使交易所的股票牌价上涨了。

秩序党既然推开了由尚加尔涅作代表表示愿意听它指挥的军队，因而把这个军队永不复返地让给了总统，这就表明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统治的能力。议会内阁已经不存在了。秩序党现在既已丧失了控制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权力，那末它还剩下什么强制手段来同时保持议会用以统治人民的篡夺来的权力和议会用以防止总统侵犯的宪法上的权力呢？什么也没有了。它现在只好求助于一些无力的原则，这些原则就连它自己也经常看作只是责成第三者遵守而使自己能更加从容行动的一般规则。我们所研究的时期，即秩序党和行政权斗争的时期的前一部分，就以尚加尔涅辞职和军权落入波拿巴之手所结束。现在，两个权力间的战争已经正式宣布并且已在公开进行，不过是在秩序党既失去武器又失去士兵以后罢了。国民议会已经没有内阁，没有军队，没有人民，没有社会舆论支持，从5月31日通过选举法起就不再是有主权的国民的代表者了，它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它一无所有，逐渐变成了一个旧法国的议会⁷⁹，它让政府去行动，自己则满足于 *post festum*

(在事后)发出唠叨的抗议。

秩序党以狂怒迎接了新的内阁。贝多将军提醒大家记住常任委员会在议会休会期间的温和态度,记住它由于过分慎重而拒绝把自己的议事记录公布出来。这时内务部长自己也坚持公布这些记录,因为这些记录现在当然已像死水一样没有任何味道,它暴露不出任何新的事实,对于厌倦的公众也不会有任何影响了。根据雷缪扎的建议,国民议会退回到自己的办公厅,任命了一个“非常措施委员会”。巴黎不越出自己平常生活的常轨一步,尤其是因为这时贸易繁荣,工业企业照常工作,粮价低廉,食品储备丰富,储蓄银行每天都收到新存款。议会所喧嚷的所谓“非常措施”,不过是在1月18日通过了对内阁的不信任案罢了,而关于尚加尔涅将军连提都没有提到。秩序党不得不这样来规定自己的不信任案,是为了保证自己取得共和党人的票数,因为在内阁的一切措施中共和党人只赞成尚加尔涅免职一项,而秩序党实际上也不能非难其余的措施,因为这些措施是它自己迫使内阁采取的。

1月18日的不信任案以四百一十五票对二百八十六票通过,就是说,只是由于极端派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同纯粹共和党人和山岳党人的**联合**才得以通过。这就证明,秩序党不只失去了内阁,不只失去了军队,而且在自己和波拿巴的冲突中失去了自己的独立的议会多数;由于热狂地倾向妥协,由于害怕斗争,由于软弱,由于眷恋亲切的国家薪俸,由于指望获得阁员的空缺(如奥迪隆·巴罗),由于那种经常使平庸的资产者为某种个人动机而牺牲本阶级的总的利益的庸俗的利己主义,一部分议员已经从秩序党阵营中开了小差。波拿巴派的议员们从最初起就只是在对革命进行斗争时才依附于秩序党。天主教党的首领蒙塔郎贝尔在那时已经把他

个人的势力投到波拿巴方面，因为他已不相信议会党的生命力了。最后，这个党的首领们，奥尔良派的梯也尔和正统派的贝利耶，不得不公开宣称自己是共和派，不得不承认说，虽然他们的心是保皇派，而头却是共和派，议会制共和国是整个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唯一可能的形式。一句话，他们不得不在资产阶级眼前把他们在议会背后继续努力从事的复辟计谋咒骂为危险而无谓的阴谋。

1月18日的不信任案是对内阁的打击，而不是对总统的打击。可是撤换尚加尔涅的并不是内阁，而是总统。秩序党不应当向波拿巴本人问罪吗？不应当以他的复辟欲望作为罪名吗？可是，这种复辟欲望只不过是补充了秩序党自己的复辟欲望罢了。不应当以他在阅兵和十二月十日会中的阴谋活动作为罪名吗？可是秩序党早已把这些问题埋葬在一堆日常议程事项下面了。不应当以他撤换了1月29日和6月13日的英雄，即撤换了1850年5月曾威胁要在有叛乱发生时就四处放火烧光巴黎的那个人作为罪名吗？可是秩序党的山岳党同盟者和卡芬雅克甚至不让它对倒台的“社会中坚”正式表示同情。秩序党自己不能否认总统拥有由宪法赋予他的撤换将军的权力。秩序党之所以气愤，只是因为总统居然把自己由宪法赋予的权力当作反对议会的手段。可是，秩序党自己岂不是不断地（特别是在废除普选权时）把它的议会特权当作违反宪法的手段吗？因此，秩序党只好严格地把自己管束在议会范围以内。1848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议会迷**，染有这种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失去一切理智、一切记忆，失去对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只有这种议会迷才可以说明，为什么秩序党在它已亲手消灭了议会势力的一切条件并在它反对其他阶级的斗争中不得不消灭了这些条件之

后，仍然把它的议会胜利看作胜利，并且以为打击了总统的内阁阁员也就是打击了总统本人。这样，秩序党只是让总统又得到一次机会在全国面前重新凌辱国民议会罢了。1月20日，“通报”报道说，内阁全体辞职已被批准。波拿巴以议会里已经没有一个党派占居多数（这点已由1月18日的投票，即山岳党和保皇党联合产生的果实所证明），而新的多数又尚待形成作为借口，任命了一个所谓的过渡内阁，其中没有一个人是议会议员，全都是些毫不知名的和微不足道的人物，这是个纯粹由一些听差和司书组成的内阁。秩序党现在可以把自己的精力花费在跟这些傀儡打交道上面了；而行政权力则不再认为自己在国民议会中要有什么认真的发言人了。波拿巴的内阁阁员愈是成为单纯的哑配角，波拿巴就愈是明显地把全部行政权力集中在他一人身上，愈容易利用行政权力来达到个人目的。

为了报复，秩序党和山岳党联合在一起否决了给予总统一百八十万法郎补助金的提案，这个提案是由十二月十日会的首领命令他的听差阁员们提出来的。这一次，问题是由不过一百零二票的多数投票决定的，由此可见，秩序党从1月18日以来又丧失了二十七票；它的解体又进了一步。同时，为了使人不致对它和山岳党联合的用意发生丝毫怀疑，它甚至不愿对一百八十九名山岳党人所署名提出的关于大赦政治犯的议案展开讨论。只要那个叫做伐伊斯的内务部长出来声明说，安宁只是表面的安宁，有人在加紧进行秘密鼓动，到处都有人组织秘密团体，民主报纸又准备重新出版，从各省传来不利的消息，日内瓦的流亡者正在主持一个通过里昂遍及法国南部全境的阴谋活动，法国处于工商业危机的前夜，鲁贝市的厂主们缩短了工作时间，贝耳岛⁸⁰的囚犯已经骚动起来

——只要伐伊斯这么一个人唤来红色怪影，秩序党不经讨论就立刻否决了这个提案，而这个提案将使国民议会获得极大的声望，并迫使波拿巴重新投入它的怀抱。秩序党本来不应当被行政权力所描绘的新骚动的远景吓住，而应当让阶级斗争有些活动余地，以便把行政权力控制在从属于自己的地位。可是，秩序党没有感觉到自己有能力担负这种玩火的任务。

可是，所谓的过渡内阁却一直勉强维持到4月中旬。波拿巴不断地以组织新内阁的把戏来疲劳和愚弄国民议会。他时而表示要组织一个有拉马丁和比约参加的共和党内阁，时而表示要组织不免要有奥迪隆·巴罗（凡是需要有个易于愚弄的蠢才时他就一定要出现）参加的议会内阁；时而又表示要组织一个有瓦提梅尼尔和贝诺瓦·达济参加的正统派内阁，时而又表示要组织一个有马尔维尔参加的奥尔良派内阁。波拿巴用这种方法挑拨秩序党各派互相攻讦，并以共和党内阁的出现以及因此必然会使普选权恢复的远景来恫吓整个秩序党，同时他又竭力让资产阶级相信，他组织议会内阁的真诚努力总是遭到保皇派集团的不调和态度的打击。而资产阶级呢，日益逼近的普遍商业危机愈是给社会主义在城市中招募信徒，而低落得招致破产的粮价愈是给社会主义在农村中招募信徒，它就愈加响亮地要求“强有力的政府”，愈加认为使法国陷于“没有行政”的状态是不可宽恕的。商业萧条日益加重，失业者显著增多，巴黎至少有一万工人没有饭吃，在卢昂、牟尔豪森^①、里昂、鲁贝、土哥英、圣亚田、埃尔伯夫等地，无数的工厂停了工。在这种情况下，波拿巴就敢于在4月11日恢复了1月18日的内

^① 即牟罗兹。——编者注

阁，除了把鲁艾、富尔德、巴罗什及其他先生们保留不动而外，还添进了莱昂·福适先生，这个福适先生曾因散发伪造的电讯而被制宪议会在最后几天一致（除五个兼任内阁阁员的议员外）投了不信任票。这样，国民议会在1月18日取得了对内阁的胜利而且三个月中和波拿巴进行斗争，只不过是到了4月11日让富尔德和巴罗什能够把清教徒福适当作第三者接受到自己的内阁同盟中去而已。

1849年11月，波拿巴满足于**非议会**的内阁，1851年1月他满足于**超议会**的内阁，而到4月11日，他已经觉得有充分的力量来组织一个**反议会**的内阁了，这一内阁把两个议会——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即共和派议会和保皇派议会所表示的不信任协调地结合在自己身上。内阁的这种演变，是测定议会生命体温下降的温度计。这种体温到4月底已经降得非常之低，甚至培尔西尼能够在私人谈话中建议尚加尔涅投到总统方面去。他向尚加尔涅保证：波拿巴认为国民议会的势力已经彻底消灭，并且已经拟定了预备在 coup d'état（政变）后发表的宣言，这个 coup d'état 是已经经过了深思熟虑，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又延迟下来的。尚加尔涅把这个死刑的判决告诉了秩序党的首领们。但是谁会相信臭虫咬人能致人于死命呢？议会虽然已经虚弱无力，完全瓦解，奄奄一息，但是它毕竟还不能使自己把它和十二月十日会的小丑一般的头子的决斗看作一种不同于和臭虫的决斗。然而波拿巴像阿革西拉乌斯回答国王亚奇斯那样回答了秩序党：“你把我看作蚂蚁，但是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狮子的”⁸¹。

六

秩序党在徒劳无益地力图保持军权和夺回已经丧失的对于行政权力的最高领导权时，不得不去跟山岳党和纯粹共和党人进行联合，这就确凿地证明，秩序党已经失去了独立的**议会多数**。仅仅是日历的力量、时钟的指针，在5月28日发出了秩序党彻底瓦解的信号。5月28日是国民议会生命的最后一个年头的开始。国民议会现在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原封不动地保存宪法呢，还是把它加以修改。但是，修改宪法就不只是要在资产阶级统治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统治之间，在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无政府状态之间，在议会制共和国和波拿巴之间进行选择，而且是要在奥尔良王朝和波旁王朝之间进行选择！这样，在议会内部就出现了一个引起争吵的原因，秩序党内利益彼此矛盾的各个敌对派别将围绕着它展开公开的斗争。秩序党是各种不同社会成分的结合体。修改宪法的问题造成了一种政治热度，它使这个结合体重又分解为它原来的各个构成部分。

波拿巴派关心修改宪法的原因很简单。他们首先想废除禁止再度选举波拿巴和延长他的权力期限的第45条。共和派的立场也很简单。他们无条件地反对任何修改，认为修改宪法是反对共和国的周密的阴谋。既然他们在国民议会中拥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依照宪法又必须要有四分之三**的票数赞成**才能合法地决定修改宪法和召集修改宪法的专门会议，所以他们只要计算一下自

己的票数，就可相信自己必获胜利了。他们当时确实是相信自己一定要胜利的。

和这些明显的立场相反，秩序党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中。如果它拒绝修改宪法，它就会使现存的制度受到威胁，因为这样就会使波拿巴只有使用暴力一个出路，并且会使法国在 1852 年 5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这个决定时刻听任革命的无政府状态摆布，那时，总统是失去了权力的总统，议会早已没有权力的议会，人民则是企图重新争得权力的人民。如果它按照宪法途径投票支持修改宪法，那末它知道它的表决是枉然的，因为按照宪法规定，它的表决一定会被共和派的否决所推翻。如果它违背宪法而宣布说只要有简单多数通过就够了，那末它就只有在完全服从行政权力的条件下才能希望制服革命；这样它就把宪法、宪法的修改和它本身一并交给波拿巴掌握了。为延长总统权力而作的局部的修改，将为波拿巴帝制主义的篡夺权力开辟道路。缩短共和国寿命而作的全面的修改，又必然会引起各个王朝的要求之间的冲突，因为波旁王朝复辟的条件和奥尔良王朝复辟的条件不仅各不相同，而且是互相排斥的。

议会制共和国已不仅是法国资产阶级中的两派（正统派与奥尔良派，即大地产与工业）能够平分秋色地进行统治的中立地盘。它并且是他们共同进行统治的必要条件，是它们的共同阶级利益借以支配资产阶级各派的要求和社会其他一切阶级的唯一的国家形式。作为保皇派，他们又重新陷入他们旧有的对抗状态，卷入地产和金钱争夺霸权的斗争，而这种对抗状态的最高表现，这种对抗状态的化身，就是他们各自的国王，他们各自的王朝。正因为如此，所以秩序党总是反对**波旁王族返国**。

奥尔良派的议员克雷通，在 1849 年、1850 年和 1851 年曾周期地建议废除放逐王族的法令。议会也按同样的周期表演了保皇派集会顽强地阻挡其被逐国王返国的场面。理直三世在杀死亨利六世以前曾对他说，他太好了，这个尘世容纳不了他，他的位置在天上。保皇派认为法国太坏了，不能把被放逐的国王归还给它。情势迫使他们成为共和派并屡次批准把国王逐出法国的人民的决定。

修改宪法（而这个问题由情势所迫又非讨论不可）不仅会使共和国成为问题，而且会使资产阶级两派的共同统治成为问题；不仅会使君主国有恢复的可能，而且会复活曾在君主国中轮流占有特权地位的那些利益间的竞争，复活资产阶级两派间争夺霸权的斗争。秩序党的外交家们希望以两个王朝的结合，即以各个保皇派和它们的王室的所谓融合来中止这一斗争。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真正融合便是议会制共和国，在这一共和国中，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双方的色彩都脱落了，各种形态的资产者都消溶为一般的资产者，消溶为资产者这个类属了。现在奥尔良派应当变成正统派，正统派应当变成奥尔良派。体现着他们的互相对抗的君主国，应当成为他们彼此统一的化身；他们互相排斥的派别利益的表现，应当成为他们的共同的阶级利益的表现；君主国应当完成只有把两个君主国都废除了的共和国才能完成和已经完成的任务。这就是秩序党的术士们绞尽脑汁制造出来的哲人石。仿佛正统派的君主国可能在什么时候变成工业资产者的君主国，或是资产阶级的君主国可能在什么时候变成世袭土地贵族的君主国一样。仿佛地产和工业能够在**一顶王冠**下面和平共居一样，可是王冠只能落到一个人头上——不是落到哥哥头上，就是落到弟弟头上。仿佛在地产还没有

决心自动变成工业财产以前，工业可以和地产和解一样。如果亨利五世明天逝世，巴黎伯爵仍然不会成为正统派的国王，除非他不再作奥尔良派的国王。但是，从事融合的哲人随着宪法修改问题被提到首位而喊得愈益响亮起来，把“国民议会报”变成自己的正式的机关日报，并且直到现在（1852年2月）还在努力活动——这些哲人认为一切困难都是由于两个王朝派的对抗和竞争。于是，想使奥尔良王室和亨利五世和解的企图，从路易-菲力浦逝世时就已经开始，但这种企图也像只是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在会议休息时、在后台进行的其他一切王朝阴谋一样，与其说是郑重的事情，不如说是对旧日迷信的卖弄风情，这种企图现在已经变成一种隆重的表演，秩序党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把它当作票友戏演出，而是把它当作公开上演的戏了。信使不断从巴黎奔到威尼斯⁸²，再从威尼斯奔到克勒蒙特，又从克勒蒙特奔回巴黎。尚博尔伯爵发表了一个宣言，他在这个宣言中“靠他全家人的支持”，宣布“国民的”、而不是他自己的复辟。奥尔良派的萨尔万迪跪倒在亨利五世脚下，正统派的首领贝利耶、贝诺瓦·达济和圣蒲利斯特等跑到克勒蒙特去劝说奥尔良王室，但是徒劳无功。主张融合者在太晚的时候才觉察到，资产阶级两派的利益虽然在家族利益即两个王室的利益的形态中日益尖锐，但是它们并不会因此更少地互相排斥，也不会因此更多地互相谦让。假定亨利五世承认巴黎伯爵是他的继承人（这是主张融合者在最好的场合所能指望的唯一成就），那末奥尔良王室除了因亨利五世没有后嗣本来就一定能够获得的东西外，并不会得到别的权利，可是它会因此丧失它从七月革命获得的一切权利。奥尔良王室将放弃自己旧日的要求，放弃它在差不多一百年的斗争中从波旁王室长系手里夺得的一切权利，它将要

为了宗族的特权而放弃自己的历史特权，即现代君主国的特权。所以，融合无非就是奥尔良王室的自愿退让，为了正统派放弃自己的权利，忏悔地从一种国教后退到另一种国教，从新教后退到天主教。这种后退可能给予奥尔良王室的甚至不是它所失去的王位，而只是它诞生时所占据的王位的一个阶梯。旧日的奥尔良派阁员、基佐、杜沙特尔等人，也赶快跑到克勒蒙特那里去即早筹划融合事业，实际上他们只是表现了七月革命后的醉后的头痛，表现了对资产阶级王权和资产者的王权的失望，表现了对正统派的迷信，把它作为防止无政府状态的最后的护符。他们自命为奥尔良王室和波旁王室之间的调停者，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奥尔良派的变节分子，而茹安维尔亲王就是把他们当作这种人来看待的。然而，奥尔良派富有生命力的、好战的那部分人，如梯也尔、巴兹等，却因此更容易使路易-菲力浦家族确信，既然君主制的任何直接的复辟都要以两个王朝的融合为前提，而任何这样的融合又都要以奥尔良王室放弃自己的权利为前提，那末，暂且承认共和国，等到事变允许把总统的安乐椅变成王位时再说，这样作是和他们家族的传统完全相适合的。起初有人散布谣言说茹安维尔要当共和国总统的候选人，公众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了，过了几个月，到九月间，在宪法修改案已被否决以后，这个候选人就被公开宣布了。

这样一来，保皇派要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融合的企图，不仅遭到了失败，而且还破坏了他们在议会中的融合，破坏了把他们联合起来的共和国形式，把秩序党又分解成原来的各个构成部分。但是，克勒蒙特和威尼斯之间愈是疏远，它们之间的关系愈是近于决裂，有利于茹安维尔的煽动愈是加紧，波拿巴的内阁阁员福适和正统派之间的谈判，也就愈加热烈，愈加认真了。

秩序党的解体还不止于它分解成各个基本构成部分。这两个巨大派别中的每一派，又都继续分解下去。看来，好像先前在两大营垒中每一个营垒（不论是正统派或奥尔良派）内部曾经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一切旧有色彩，如同干纤毛虫碰到了水一样，又都重新活起来了。看来，他们又重新获得了充分的生命力，能够形成具有互相对立的独立利益的各个派别了。正统派在梦想他们又回到土伊勒里宫和马松阁之间进行争吵、维莱尔和波林尼雅克之间进行争吵的时代⁸³。奥尔良派又重新经历了基佐、摩莱、布洛利、梯也尔和奥迪隆·巴罗之间比武的黄金时代。

秩序党中有一部分人赞成修改宪法，可是对于修改的范围，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在这一部分人中，有贝利耶和法卢一方所领导和拉罗什雅克兰一方所领导的正统派，有摩莱、布洛利、蒙塔郎贝尔和奥迪隆·巴罗领导的那些在斗争中疲倦了的奥尔良派；这一部分人和波拿巴派方面的议员一致提出了如下一个含义广泛而不明确的建议：

“下面署名的议员建议把宪法加以修改，目的在于把完全实现国民主权的可能性还给国民。”

可是，这些议员又通过自己的报告人托克维尔一致声称：国民议会无权建议**废除共和国**，这个权力只能属于为修改宪法而召集的议会。此外，他们声称，宪法只能在“合法的”基础上，就是说，只有在按照宪法规定的四分之三的大多数票赞成修改时才能修改。经过六天的激烈讨论之后，7月19日，宪法修改案果然被否决了。赞成修改的有四百四十六票，反对修改的有二百七十八票。极端的奥尔良派梯也尔、尚加尔涅等人在表决时和共和派及山岳派采取了一致行动。

这样，议会的多数表示反对宪法，而宪法本身却表示拥护议会的少数，拥护必须执行议会少数决议的原则。可是，秩序党在 1850 年 5 月 31 日和 1849 年 6 月 13 日岂不都曾经把议会多数置于宪法之上吗？它以前的全部政策岂不都是以宪法条文服从议会多数决定为基础的吗？它不是曾经让民主派以迷信旧约的态度去对待法律的字眼，并因为这种迷信而处罚了民主派吗？可是目前，修改宪法无非就是要延长总统掌权的期限，而延长宪法的寿命无非就是要罢免波拿巴。议会表示拥护波拿巴，但是宪法表示反对议会。所以，当波拿巴撕毁宪法时，他的行动是合乎议会精神的，而当他解散议会时，他的行动又是合乎宪法精神的。

议会宣布了宪法，同时也就是宣布议会本身的统治是处在“多数之外”；议会以自己的决议废除了宪法，延长了总统掌权的期限，同时也就是宣布说，当它本身还继续存在时，宪法既不能死亡，总统的权力也不能生存。它未来的掘墓人已经站在门前了。当议会正忙于讨论修改宪法的问题时，波拿巴撤销了表现得不坚决的巴拉盖·狄利埃将军第一师团指挥官的职务，任命马尼扬将军继任该职，这位将军是里昂的胜利者，十二月事变的英雄，波拿巴的爪牙之一，早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就由于布伦远征事件因拥护波拿巴而多多少少地出了丑。

秩序党关于修改宪法的决定表明，它既不能统治，又不能服从；既不能生，又不能死；既不能和共和国调和，又不能把共和国推翻；既不能捍卫宪法不受侵犯，又不能废除宪法；既不能和总统合作，又不能和总统决裂。它究竟是期待谁来解决一切矛盾呢？期待日历，期待事变的进程。它不再控制事变。这样，它就把自己交给事变支配，交给这样一种力量支配，对于这种力量，它在反对人

民的斗争中已经一步一步地让出了各种权力，直至它自己在这种力量面前变得毫无权力为止。为了使行政权力的首脑能够更顺利地定出对付它的战斗计划，加强自己的进攻手段，选择自己的工具和巩固自己的阵地，秩序党就在这个紧急关头决定退出舞台，使议会从8月10日到11月4日休会三个月。

不仅议会政党分裂为原来的两大集团，不仅其中的每一个集团又各自再行分裂，而且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议会外的秩序党也分裂了。资产阶级的演说家和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刊，一句话，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资产阶级自己，代表者和被代表者，都互相疏远了，都不再互相了解了。

外省的正统派，由于眼界狭小和过分热情，责备他们的议会领袖贝利耶和法卢投奔波拿巴阵营和背叛了亨利五世。他们的百合花的头脑只相信造孽行为，不相信外交手腕。

商业资产阶级和它的政治家之间的分裂，更加不可挽救，更具有决定的意义。正统派责备自己的政治家背弃了原则，而商业资产阶级却正好相反，责备自己的政治家忠实于已经变得无用的原则。前面我已经指出，自从富尔德加入内阁以来，那一部分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握有绝大部分权力的商业资产阶级，即**金融贵族**，已经变成波拿巴派了。富尔德不仅在交易所中维护波拿巴的利益，而且也在波拿巴面前维护交易所的利益。关于金融贵族的**态度**，最好是从他们的欧洲机关刊物即伦敦的“**经济学家**”⁸⁴杂志中引一段话来说明。这个杂志在1851年2月1日那一期上发表了如下的巴黎通讯：

“现在各方面都有人声明法国首先要求安宁。总统在他致立法议会的咨文中声明了这一点；国民讲台上也有人响应了这一点；报纸上再三重复说到

这一点；教堂的教坛上也宣扬这一点；国家证券对于最小的危害安宁的事件的敏感以及它们在行政权力每次胜利时的稳定，也证明这一点。”

“经济学家”杂志在 1851 年 11 月 29 日那一期上以自己的名义宣称：

“在欧洲所有的证券交易所中，总统现在已被公认为秩序的卫士。”

可见金融贵族指责秩序党对行政权力进行的议会斗争是**破坏秩序**，而把总统每次对它那些看来是自己的代表们的胜利当作**秩序的胜利**来欢呼。这里所说的金融贵族，应当了解为不只是那些巨大的国债经纪人和国家证券投机者，这些人的利益当然是和国家权力的利益相吻合的。全部现代金融业，全部银行业，都是和国家信贷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有一部分银行资本必然要投入容易兑现的国家有息证券。银行存款，即交给银行并由银行在商人和工业家之间分配的资本，有一部分是从国家债权人的红利中得来的。既然在一切时代国家政权的稳定对整个金融市场和这种金融市场的牧师们来说是摩西和先知，那末现在，当任何洪水都有把旧的国家连同旧的国债一并从地面上冲去的危险时，又怎能不是这样呢？

狂热地渴望秩序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因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行政权力发生争吵而感到烦恼。梯也尔、昂格勒斯、圣贝夫等人在 1 月 18 日因尚加尔涅辞职事件投票以后，也受到选民们（而且正是工业区的选民）的公开谴责，特别是他们跟山岳党成立联盟的行为被斥为背叛秩序。如果说，像我们所已经看到的，秩序党和总统的斗争不过是些言过其实的嘲弄和琐屑无聊的攻讦，而这些行为是不配受到好的待遇的，那末，另一方面，对这部分要求自己的代表们顺从地把军权从自己的议会手中奉送给冒险的王位追求者去

掌握的资产阶级，就连那些曾为它的利益而采用过的攻讦手段也不值得采取了。这部分资产阶级表明：为了保持他们的公共利益、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政治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是有碍于他们私人的事情的，因而只是使他们感到痛苦和烦恼。

当波拿巴巡游各地时，外省城市的资产阶级显贵、市政官员、商业法庭的法官等等，到处都几乎毫无例外地以极卑屈的态度迎接他，甚至当他在第戎无情地攻击国民议会，特别是攻击秩序党的时候，也是这样欢迎他。

当商业情况良好的时候（1851年初还是这样），商业资产阶级狂暴地反对任何议会斗争，生怕这种斗争会使商业吃亏。当商业情况不好的时候（从1851年2月底起已成为经常现象了），商业资产阶级就抱怨议会斗争是商业停滞的原因，并要求为了活跃商业停止这种斗争。关于修改宪法的讨论恰好发生在这种不好的时期。既然当时问题是关于现存国家制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资产阶级就更有理由要求它的代表们终止这种痛苦的过渡状态，同时又保持现状。这里面没有任何矛盾。它所了解的终止过渡状态，正是延长过渡状态，将最后的解决拖延到遥远的将来。保持现状只能有两种方法：一是延长波拿巴掌权的期限，一是让波拿巴按照宪法辞职，选出卡芬雅克来。一部分资产阶级倾向于后一种解决方法，可是他们除了叫他们的代表对这个迫切的问题保持沉默，不去触动以外，就提不出更好的建议。他们以为，如果他们的代表不出来讲话，波拿巴就不会行动了。他们希望有一个为了不使人看见而把头藏起来的鸵鸟的议会。另一部分资产阶级希望让已经坐在总统位子上的波拿巴留任总统，一切照旧不变。他们感到愤慨的，是他们的议会不愿意公开违背宪法和率直地放弃权力。

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从8月25日起召开的各省委员会(大资产阶级的地方代议机关),几乎一致表示赞成修改宪法,即反对议会,拥护波拿巴。

资产阶级对于自己的著作界的代表和自己的报纸所表现的愤怒,比它跟**议会代表**们的破裂更为明显。只要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稍微抨击一下波拿巴篡夺权力的欲望,只要报刊企图保护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不受行政权力侵害,资产阶级法庭就判处数额异常巨大的罚款和不光彩的监禁,这种情况不仅使法国,而且使整个欧洲都感到惊愕。

前面我已经指出,**议会内的秩序党**由于叫嚣需要安宁而陷自身于无所作为的境地,它在反对其他社会阶级的斗争中亲手取消了自己的政治制度即议会制度的一切条件,并且宣布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同资产阶级的安全和生存是不相容的,而**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却对总统奴颜婢膝,诋毁议会,粗野地对待自己的报刊,从而促使波拿巴压制和消灭资产阶级中讲话和写文章的分子,即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纸,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它能够在不受限制的强硬的政府保护下安心地从事他们私人的事情。它毫不含糊地声明说,它渴望摆脱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以便摆脱和这种统治地位相连的麻烦和危险。

这个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甚至对于为它本阶级的统治而进行的单纯的议会斗争和文字斗争,也曾表示激愤,并且出卖了这一斗争的领袖人物;但是现在它却敢于在事后责备无产阶级没有为它这个资产阶级进行流血斗争,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个资产阶级时刻都为最狭小最卑鄙的私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全阶级的利益即政治利益,并且要求自己的代表人物也作同样的牺牲;但现在它

却哀叫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而牺牲了它这个资产阶级的理想的政治利益。它装得好像是个好心肠的人，被社会主义者引入歧途的无产阶级不了解他，并且在紧要关头抛弃了他。它的这种哀叫在整个资产阶级世界中得到了反响。自然，这里我不是指德国那些小政客和浅学之辈。我指的是“经济学家”杂志一类的东西，这个杂志在1851年11月29日，即政变前四天还宣布波拿巴是“秩序的卫士”，而梯也尔和贝利耶是“无政府主义者”，在1851年12月27日，在波拿巴驯服了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之后，它又大叫大喊，说什么“无知的、没有教养的、愚蠢的无产阶级群众”背叛了“社会中等和上等阶层的才能、知识、纪律、精神影响、智力源泉和道德威望”。其实，愚蠢、无知和卑鄙的一群，正是资产阶级本身。

的确，法国在1851年是遭受了一次小小的商业危机。2月底，输出比1850年减少了一些；3月，商业衰落，工厂相继关闭；4月，各工业省的情况好像和二月事变后一样令人失望；5月，情况还没有好转；6月28日，法兰西银行还是以存款数量大增和贴现数量大减表明了生产的停滞；直到10月中旬，情况才逐渐好转。法国资产阶级把这种商业停滞说成是纯粹由于政治原因，由于议会和行政权力间的斗争，由于临时的治理形式的不稳定，由于1852年5月第二个星期日的可怕远景。我并不否认所有这些情况都对巴黎和各省的某些工业部门的衰落有影响。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政治局势的影响只是局部的，而且是很微小的。对于这一点的最好的证明，就是商业开始好转正是在10月中旬，恰好是在政治局势恶化、政治的地平线上笼罩着乌云、每分钟都可能从爱丽舍宫打来霹雳的时候。虽然法国的资产者所具有的“才能、知识、洞察力和智力源

泉”越不出他自己的鼻尖,但是他在伦敦工业展览会⁸⁵整个会期内总能用鼻子触到自己的商业情况不利的原因吧。当法国工厂相继关闭的时候,英国爆发了商业破产。如果说法国在4月和6月两个月达到顶点的是工业恐慌,那末英国在4月和5月两个月间达到顶点的则是商业恐慌。无论是在法国或英国,毛织业和丝织业的情况都很不妙。虽然英国的棉织工厂还在继续生产,但是它们所获得的利润已不像1849年和1850年那样大了。不同点只在于法国发生的是工业危机,而英国发生的则是商业危机;法国是工厂相继关闭,而英国则是生产扩大,不过是在不如前几年那样顺利的条件下扩大罢了;在法国,情况最糟的是输出,在英国是输入。其共同原因(当然不应在法国政治地平线的范围内去寻找)是显而易见的。1849年和1850年是物质繁荣和过度生产程度最高的年度,这种过度生产的结果直到1851年才显露出来。这年年初,过度生产因工业展览会即将举行而特别加重了。除此以外,还有下面一些特殊情况:起初是1850年和1851年的棉花歉收,然后是人们确信棉花的收成会比预期的好,棉价起初是上涨,后来突然降低,——一句话,就是棉价涨跌不定。生丝产量至少在法国是低于中等产量。最后是毛织业自1848年以来飞速发展,使得羊毛的生产跟不上去,而羊毛的价格比毛织品的价格高得非常不相称。这样,在上述三个世界性工业部门所需的原料方面,就包含有引起商业停滞的三重原因。而且除了这些特殊情况以外,1851年的表面上的危机,无非是在过度生产与过度投机还未用尽所有力量疯狂地跑过工业循环的最后阶段并重新回到自己的出发点——即回到**普遍的商业危机**去以前,在工业循环中经常和它们相伴而生的一种暂时停顿。在商业史上的这种间隙时期中,英国发生了商业的

破产，而法国却是工业本身陷于停顿，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法国工业已经经受不住英国的竞争而被排挤出所有的市场，另一方面是由于法国工业是生产奢侈品的工业，它对商业方面的任何停滞都特别敏感。这样一来，法国除了受普遍危机的影响之外，还经受自己本国的商业危机，这种商业危机为世界市场一般情况所决定和制约的程度，比它受法国地方情况决定和制约的程度要大得多。这里不妨把英国资产者的推断拿来和法国资产者的偏见对比一下。利物浦的一家巨大的商行在 1851 年度的商业总结报告中写道：

“很少有哪一年像过去这一年这样辜负起初对它所寄托的希望了。这一年不但没有大家一致预期的大繁荣，反而成了最近二十五年来最令人沮丧的年头。这自然只是对商业阶级，而不是对工业阶级而言。可是，在这年年初，无疑是有足够的根据使我们预期会有相反的情形：商品贮藏很少，资本充足，食品价格低廉，丰收在望；在欧洲大陆有不受任何破坏的和平，在本国又没有任何政治上或财政上的困难，——的确，看来商业是完全可以展翅高飞的……这一不幸的结果究竟应归罪于什么呢？我们以为应归罪于输入与输出的**贸易额过分庞大**。如果我们的商人自己不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较狭小的范围内，那末，除了三年一度的恐慌以外，什么东西也不会使我们保持均衡。”

现在我们想像一下法国资产者在这种商业恐慌中的情形：他那患着商业狂热病的头脑每天都被这样一些东西所折磨、搅扰和震聋了耳朵，这就是关于政变和恢复普选权的种种谣传、议会和行政权力的斗争、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攻讦、法国南部共产主义的密谋活动、涅夫勒省和舍尔省臆想的农民起义、各个总统候选人的自吹自擂、报纸上各种大肆宣扬的口号、共和派要以武力保护宪法和普选权的威胁、流亡 in partibus (国外) 的英雄们预告 1852 年 5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将是世界末日的文告，——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资产阶级在这种融合、修改、延期、宪法、秘密活动、联合、亡命、篡权和革命等难以形容的喧嚣的混乱中弄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就疯狂地向自己的议会制共和国喊道：“没有终结的恐怖，还不如令人恐怖的终结！”

波拿巴懂得这种喊声。由于债权人急躁难耐的情绪日益增长，他的理解力更加敏锐了，这些债权人觉得，太阳每一落山，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天即 1852 年 5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愈益接近了，天上星辰的运动就表示反对他们的地上期票有兑现的效力。债权人变成了真正的占星家了。国民议会使波拿巴丧失了靠宪法来延长其掌权期限的希望，茹安维尔亲王的候选人资格已不允许再犹豫动摇了。

如果说有过什么事变在它尚未到来时老早就把自己的影子先投射过来的话，那末这就是波拿巴的政变了。波拿巴早在 1849 年 1 月 29 日，即在他当选刚过一个月的时候，就已向尚加尔涅提出了这种建议。关于政变的政策，他自己的内阁总理奥迪隆·巴罗在 1849 年夏天以隐蔽的方式谈到过，而梯也尔在 1850 年冬天公开地谈到过。1851 年 5 月，培尔西尼曾经再度企图取得尚加尔涅对于政变的赞助，而“国民议会通报”⁸⁶公布了这些谈判。每逢议会发生风波时，波拿巴派的报纸就以政变相威胁；危机愈是接近，它们的声调就愈放肆。在波拿巴每夜和时髦的男女骗子举行的狂宴上，一到午夜，当豪饮使他们畅谈起来并激起他们的幻想时，政变总是指定在第二天早晨举行。剑拔出来，酒杯相碰，议员被抛出窗外，皇袍加在波拿巴身上，而一到早晨，幽灵便又消失，吃惊的巴黎从直率的修女和不慎重的武士们的口里才知道它又度过了一次危险。在 9 月和 10 月两个月间，关于 coup d'état (政变) 的谣传

一刻也没有停息过。影子像彩色的照像底片一样已蒙上了各种色彩。只要翻一翻 9 月和 10 月两个月份的欧洲报纸,就可以找到这类情况的报道:“巴黎到处流传着政变的谣言。听说首都今天夜间就要被军队占领,而明天早晨就会有解散国民议会、宣布塞纳省戒严、恢复普选权并向人民呼吁的法令出现。听说波拿巴正在寻找阁员来执行这些非法的法令。”这些报道总是不变地以“延期”一语结束。政变始终是波拿巴的固定不移的观念。他是抱着这个观念重回法国的。他为此观念所控制,以致经常流露于言谈之间。他十分软弱,因此经常放弃自己的观念。巴黎人十分习惯于像对待幽灵一样地对待这个政变的影子,以致最后当这个政变有肉有血地出现时,巴黎人还不愿意相信它。可见,政变之所以成功,根本不是由于十二月十日会的头子严守秘密和国民议会惊慌失措。这个政变是不管波拿巴怎样随便泄露秘密,以及在国民议会完全知悉内情的条件下成功的,因为这是先前的事变进程的必然而且不可避免的结果。

10 月 10 日,波拿巴向内阁阁员们宣布他决定恢复普选权;10 月 16 日内阁阁员辞职;10 月 26 日巴黎知道了托利尼内阁组成的消息,同时,警察局长卡尔利埃已由莫帕代替,而第一师师长马尼扬已把最可靠的团队调到了首都。11 月 4 日国民议会宣布复会。国民议会除了把它已学过的课程按简单扼要的提纲复习一遍并表明它只是在死后才被埋葬之外,是别无他事可作了。

国民议会在和行政权力斗争时所失掉的第一个阵地就是内阁。国民议会不得不以完全承认纯系虚构的托利尼内阁而庄严地承认这个损失。当日罗先生以新内阁名义向常任委员会作自我介绍时,常任委员会报之以嘲笑。这么一个软弱的内阁竟敢来执行

像恢复普选权这样强硬的措施!可是,全部问题正是在于什么事情也不要通过议会去做,一切事情都要和议会背道而驰地做。

国民议会在它复会的当天就接到了波拿巴的咨文,在咨文中他要求恢复普选权和废除 1850 年 5 月 31 日的法律。当天他的部长们就提出了这种内容的法令。国民议会立即否决了部长们关于必须立即颁布这个法令的建议,而法律本身在 11 月 13 日以三百五十五票对三百四十八票被否决了。这样,议会就再度撕毁了自己的委任状,又一次证实它已从自由选出的人民代议机关变成了一个阶级的篡权议会,再度承认它自己割断了连结议会头部和国民身体的肌肉。

如果说行政权力建议恢复普选权是表示从呼吁国民议会转向呼吁人民,那末立法权力通过议会总务官提出法案就是表示从呼吁人民转向呼吁军队了。国民议会是想通过这个法案来确立自己直接调动军队的权力,确立自己创建议会的权力。国民议会就这样一方面指定军队来充当自己和人民之间、自己和波拿巴之间的仲裁者,承认军队是国家的决定性力量,另一方面它也不得不肯定,它自己早已放弃统率这种力量的要求了。它不是立刻调动军队而是把自己调动军队的权利当成讨论的题目,这就暴露了它对于自己的力量的怀疑。它否决了议会总务官提出的法案,于是就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软弱无力。这个法案因为只得到一百零八票的少数而失败了:山岳党决定了它的命运。当时山岳党所处的地位就像布利丹的驴子^①一样,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不是要在两袋干草之间决

① 十四世纪法国经院哲学家布利丹在论述意志自由问题时曾讲了一个驴子的故事:一头驴子在两个完全相同的草堆之间,无法进行选择,结果只好饿死。——译者注

定哪一方诱惑力更大,而是要在两顿棒打之间决定哪一方打得更痛。一怕尚加尔涅,二怕波拿巴:老实说,这种处境决不是英雄好汉的处境。

11月18日,有人对秩序党本身提出的市议会选举法提出了一个修正案,规定市议会选举人在选区内居住的期限不是三年,而是一年。这个修正案被仅仅一票的多数否决了,但是立刻就发现这一票是计算错了。秩序党由于分裂成各个敌对的派别,早就丧失了自己的独立的议会多数。这时它表明,议会内根本没有什么多数可言了。国民议会丧失了通过决定的能力。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已经没有任何联结的力量使其相互结合在一起了,它已经断了气,它已经死了。

最后,在大难临头的前几天内,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又一次庄严地证实自己已与议会内的资产阶级决裂。梯也尔这个议会英雄特别严重地患了议会迷的不治之症,他在议会死后还协同国务会议想出了一个新的议会阴谋把戏——制定责任法,把总统牢牢地约束在宪法范围之内。波拿巴在9月15日巴黎的新的集市大厅举行奠基典礼时,简直像马赞尼洛那样有力地把那些爱跑市场的太太和卖鱼女人迷惑了一番(不错,一个卖鱼女人的实际力量等于十七个城官);在议会总务官提出法案之后,他曾使他在爱丽舍宫设宴招待的那些尉官们喜出望外,同样,这时,11月25日,他又把聚会在马戏场想从他手中领取伦敦工业展览会奖章的工业资产阶级吸引过来了。现在我把“辩论日报”上他的演说中最典型的一段话摘录如下:

“这样出乎意料的成绩使我有权再说一遍,如果法兰西共和国有可能关心自己的实际利益和改组自己的机构,而不是一再容忍蛊惑者和君主主义幻

想所惹起的骚扰事件的损失，那末法兰西共和国该是多么伟大啊。（看厅里到处响起雷鸣似的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君主主义的幻想妨碍任何进步和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结果是没有进步，只有斗争。我们看到，从前热烈拥护国王的权威和特权的人，现在如何以国民公会的精神行动，只求削弱从普选中产生的权力。（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我们看到，从前吃革命的苦头最多和最怨恨革命的人，现在怎样煽动新的革命，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束缚国民的意志…… 我保证你们将来能得到安宁”等等，等等。（“好！好！”暴风雨般的叫好声）

工业资产阶级就这样卑屈地鼓掌欢迎了 12 月 2 日的政变，欢迎了议会的灭亡，欢迎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毁灭和波拿巴的独裁。12 月 4 日轰隆的炮击声报答了 11 月 25 日轰隆的鼓掌声，而鼓掌鼓得最起劲的萨兰德鲁兹先生的房子挨炮弹也最多。

克伦威尔在解散长期议会时独自一人进入了会场，从口袋里拿出表来，为的是不要让议会比他所指定的期限多存在一分钟，接着就以愉快的幽默的嘲笑把每一个议会议员赶出会场。拿破仑虽然比他的原型要小一点，但他毕竟在雾月 18 日跑到立法议会去向它宣读了（固然是以断断续续的声调）它的死刑判决书。第二个波拿巴所拥有的行政权无论和克伦威尔或拿破仑所拥有的比起来都完全不同，他不是在世界史册中，而是在十二月十日会的史册中，在刑事法庭的史册中为自己寻找榜样。他从法兰西银行窃取了二千五百万法郎，用一百万法郎收买了马尼扬将军，用十五个法郎加烧酒收买一个士兵，他偷偷地、像夜间的贼一样去跟自己的同谋者相会，命令他们闯入最危险的议会首领们的住宅，把卡芬雅克、拉摩里西尔、勒夫洛、尚加尔涅、沙尔腊斯、梯也尔、巴兹等人从床上拖下来押进监狱，用军队占领巴黎各重要据点和议会大厦，第二天一早就在首都各处张贴告示，宣告国民议会和国务会议已被解散，

普选权已经恢复，塞纳省宣布戒严。稍后，他就在“通报”上登出了一个伪造的文件，说什么在他周围已聚集了许多议会权威人士，他们已组成一个非常的国务会议。

议会里剩下的人，主要是正统派和奥尔良派，集合在第十区市政厅内开会，在再三高呼“共和国万岁！”的情况下通过决议罢免波拿巴，毫无成效地向站在市政厅门前张望的人群呼吁，直到最后被非洲猎兵押送到多尔塞兵营，然后又装进囚车从那里送进马萨、阿姆和文森等地的监狱。秩序党、立法议会和二月革命的结局就是如此。

在作结论之前，我们且把二月革命的历史作个简括的概述。

I . **第一个时期**，从 1848 年 2 月 24 日起到 5 月 4 日止。二月时期。序幕。普遍联欢的喜剧。

II . **第二个时期**，共和国成立和立宪国民议会时期。

(1) 从 1848 年 5 月 4 日起到 6 月 25 日止。一切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无产阶级在六月事变中遭受失败。

(2) 从 1848 年 6 月 25 日起到 12 月 10 日止。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专政。起草宪法。宣布巴黎戒严。资产阶级专政因 12 月 10 日波拿巴当选为总统而废除。

(3) 从 1848 年 12 月 20 日起到 1849 年 5 月 28 日止。立宪议会会对波拿巴以及和波拿巴联合起来的秩序党进行斗争。立宪议会灭亡。共和派资产阶级遭受失败。

III . **第三个时期**，立宪共和国和立法国民议会时期。

(1) 从 1849 年 5 月 28 日起到 6 月 13 止。小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波拿巴进行斗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遭受失败。

(2) 从 1849 年 6 月 13 日起到 1850 年 5 月 31 日止。秩序党

实行议会专政。秩序党以废除普选权而完成自己的统治，但失去议会内阁。

(3)从 1850 年 5 月 31 日起到 1851 年 12 月 2 日止。议会资产阶级和波拿巴进行斗争。

(a)从 1850 年 5 月 31 日起到 1851 年 1 月 12 日止。议会失去军队总指挥权。

(b)从 1851 年 1 月 12 日起到 4 月 11 日止。议会在企图重新支配行政权力时遭到失败。秩序党失去独立的议会多数。秩序党和共和派及山岳党联合。

(c)从 1851 年 4 月 11 日起到 10 月 9 日止。企图修改宪法，使两个王朝派合并并延长总统掌权的期限。秩序党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资产阶级议会和资产阶级报刊同资产阶级群众最后决裂。

(d)从 1851 年 10 月 9 日起到 12 月 2 日止。议会和行政权力公开决裂。议会处于垂死状态，它被自己的阶级、军队以及其余各阶级所抛弃而复灭。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复灭。波拿巴获得胜利。帝制复辟的拙劣可笑的翻版。

七

社会共和国在二月革命开始的时候是作为一个词句、作为一个预言出现的。1848年六月事变时，它被窒息于巴黎无产阶级的血泊中，但是在戏剧的下几幕中，它又常常像幽灵似地出现。民主共和国登上了舞台。它在1849年6月13日和它那四散奔逃的小资者一同消失了，但是它在逃走时却随身散发了自吹自擂的广告。议会制共和国同资产阶级一起占据了全部舞台，尽量扩展，但是1851年12月2日事件在联合起来的保皇党人的“共和国万岁！”的惊慌叫喊声中把它埋葬了。

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劳动无产阶级的统治，结果是把政权送给了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为首的流氓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没有让法国从害怕红色无政府状态的未来灾祸中苏醒过来，12月4日，当那些为烧酒所鼓舞的秩序军队根据波拿巴的命令对蒙马特尔林荫道上和意大利林荫道上的凭窗眺望的显贵资产者射击的时候，波拿巴就把这一未来灾祸给资产阶级兑现了。资产阶级曾把马刀奉为神，结果是受到马刀的统治。资产阶级消灭了革命的报刊，结果是它自己的报刊被消灭了。它把人民的集会置于警察监视之下，结果是它自己的沙龙遭到了警察的监视。它解散了民主派的国民自卫军，结果是它自己的国民自卫军也被解散了。它实行了戒严，结果是戒严实行起来对付它了。它用军事委员会代替了陪审法庭，结果是它自己的陪审法庭被军事委员会所代替。它把国民学校置

于教士的支配之下，结果是教士支配起它自己的学校来了。它不进行审判就流放囚犯，结果是它自己未经审判就被流放了。它以国家权力镇压社会的任何运动，结果是国家权力镇压起它自己的社会的任何运动来了。它因偏爱自己的钱袋而反对自己的政治家和作家，结果是它的政治家和作家被排除了，但是它的钱袋也在它的口被封死和笔被折断后被抢劫了。资产阶级曾不倦地像圣阿尔谢尼对基督徒那样向革命叫喊说：“Fuge, tace, quiesce! ——快跑，住嘴，安静！”，结果是波拿巴也向资产阶级叫喊道：“Fuge, tace, quiesce! ——快跑，住嘴，安静！”

法国资产阶级早已把拿破仑的《Dans cinquante ans, l'Europe sera républicaine ou cosaque》（“五十年后，欧洲是共和制的欧洲还是哥萨克式的欧洲”）这个二难推论给解决了。它以《république cosaque》（“哥萨克式的共和国”）解决了这个二难推论。无需乎瑟西的魔法就把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杰作变成一个畸形怪物了。这个共和国除了外表的体面之外，什么也没有丧失。今天的法国^①是在议会制共和国中就具有了现成的形态的。只要刺刀一戳，水泡就破了，怪物就出现在眼前。

为什么巴黎无产阶级在12月2日后没有举行起义呢？

当时资产阶级的倾复还只见之于法令，而法令还没有被执行。无产阶级的任何重大起义立刻又会使资产阶级活跃起来，会使它和军队协调起来，这样将为工人造成第二个六月的失败。

12月4日，资产者和小店主唆使无产阶级起来战斗。当天晚上，国民自卫军的几个联队答应拿着武器穿着军装到战场上来。因

^① 指1851年政变后的法国。——编者注

为资产者和小店主已经得知波拿巴在 12 月 2 日的一个命令中废除了秘密投票，命令他们在官方的选举名册上把“赞成”或“反对”写在他们的名字旁边。12 月 4 日的抵抗吓坏了波拿巴。夜间他就下令在巴黎各处张贴了广告，宣布恢复秘密投票。资产者和小店主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次日早晨留在家里的正是小店主和资产者。

12 月 1 日深夜，波拿巴以突然的袭击使巴黎的无产阶级失掉了它的领袖，失掉了街垒战斗的指挥者。无产阶级成了没有指挥官的军队，由于 1848 年六月事变、1849 年六月事变和 1850 年五月事变的记忆犹新，它丝毫不愿意在山岳党的旗帜下作战，所以就听凭自己的先锋队即秘密团体去挽救巴黎的起义的荣誉，这种荣誉已被资产阶级如此恭顺地交给士兵们去蹂躏，以致波拿巴后来能够用一个刻薄的理由解除了国民自卫军的武装：他担心无政府主义者滥用它的武器来反对它自己！

《C' est le triomphe complet et définitif du socialisme!》（“这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而彻底的胜利！”）——基佐曾这样评论 12 月 2 日的政变。但是，如果说议会制共和国的倾复包含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萌芽，那末这一事实的直接的具体结果就是波拿巴对议会的胜利，行政权力对立法权力的胜利，不用词句掩饰的力量对词句的力量的胜利。在议会中，国民将自己的普遍意志提升成为法律，即将统治阶级的法律提升成为国民的普遍意志。在行政权力的面前，国民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意志，而服从于他人意志的指挥，服从于权威。和立法权力相反，行政权力所表现的是国民受人统治而不是国民自治。这样，法国逃脱整个阶级的专制，好像只是为了服从于一个人的专制，并且是服从于一个没有任何权威的个人

的权威。斗争的结局，好像是一切阶级都同样软弱无力和同样沉默地跪倒在枪托之前了。

然而革命是彻底的。它还在经历着苦难的考验。它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1851年12月2日以前，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前一半预备工作，现在它在完成另一半。它先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为的是能够推翻这个权力。现在，当它已达到这一步时，它就使行政权力臻于完备，使它表现为最纯粹的形式，使它孤立，使它成为和自己对立的唯一的对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这个权力。而当革命完成自己这后半一半准备工作的时候，欧洲就会站起来欢呼说：掘得好，老田鼠⁸⁷！

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五十万人的官吏队伍和五十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土地所有者的和城市的领主特权转化为国家权力的同样众多的属性；封建的显贵人物转化为领取薪俸的官吏；互相交错的中世纪领主权力的五颜六色的图谱（像一堆货样一样）转化为确切规定的国家权力的图案，这里盛行的分工和集中就像工厂里的一样。第一次法国革命所抱的目的是破坏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权力以造成全国的公民的统一，它必需把专制君主制所已经开始的事情——中央集权加以发展，但是它同时也就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属性和帮手的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并没有增添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这种分工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分工愈益造成新的利益集团，即造成国家管理的新

对象,而愈益扩大起来。每一种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为一个最高的普遍的利益来与社会相对立,都从社会成员自己行动的范围中划分出来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从某一村镇的桥梁、校舍和公共财产起,直到法国的铁路、国有财产和国立大学止。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它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用高压手段而外,还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和集中化。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那些争夺统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

但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官僚不过是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进行准备的手段。在复辟时期,在路易—菲利浦统治时期,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官僚虽力求达到个人专制,但它终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東西。和市民社会比起来,国家机器已经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它现在竟能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一个从外国来的、被喝醉了的士兵拥为领袖的冒险家做首脑,而这些士兵是他用烧酒和腊肠收买过来的,并且他还要不断地用腊肠来讨好他们。由此便产生了怯懦的绝望和难以表述的屈辱情感,这种屈辱压住法国的胸膛,不让它自由呼吸。法国觉得自己似乎是被凌辱了。

虽然如此,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

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被农民选中的不是服从资产阶级议会的那个波拿巴,而是驱散了资产阶级

议会的那个波拿巴。城市在三年中成功地曲解了 12 月 10 日选举的意义和辜负了农民对恢复帝国的希望。1848 年 12 月 10 日的选举只是在 1851 年 12 月 2 日的政变中才得到了真实的表现。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式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

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

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失去的福利送还他们。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冒充这个人的人,而他冒充为这个人,只是因为他——根据 Code Napoléon (拿破仑法典)中的一条:《La recherche de la paternité est interdite》(“不许寻究父方”)——取名为拿破仑。经过了二十年的流浪生活和许多荒唐冒险行径之后,预言终于实现了,这个人成了法国人的皇帝。侄儿的固定观念实现了,因为这个观念是和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固定观念一致的。

但是,也许有人会反驳我说:在半个法国不是发生过农民起义吗?军队不是围攻过农民吗?农民不是大批被捕,大批被流放吗?

从路易十四那时起,法国还没有看到过农民“因蛊惑人心的活动”而遭到这样的迫害。

但是,要很好地了解我的意思。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并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块土地并赐给他们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现代的万第⁸⁸。

议会制共和国的三年的严酷统治,使一部分法国农民摆脱了对于拿破仑的幻想,并使他们(虽然还只是表面上)革命化了;可是,每当他们发动起来的时候,资产阶级就用暴力把他们打回去。

在议会制共和国下，法国农民的意识中发生了新思想和传统的斗争；这一过程是在教师和教士的不断斗争的形式下进行的，结果总是资产阶级压服了教师。农民第一次力图对政府的行动采取独立的态度；这表现在地方长官和行政官之间的不断冲突上，结果总是资产阶级撤换了地方长官。最后，法国各地农民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曾起来反对他们自己的产物，即军队，结果总是资产阶级用宣布戒严和死刑惩罚了他们。这个资产阶级现在却公然叫喊什么群众愚钝，说这些 vile multitude (可鄙的群氓) 愚钝，仿佛这些群众把它出卖给波拿巴了。它自己曾以暴力加强了农民阶级对帝国的信赖，它曾热心地把构成这种农民信仰的出生地的状态保留下来。当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在群众刚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

在 coup d'état (政变) 以后发生的各次起义中，一部分法国农民拿起武器抗议他们自己在 1848 年 12 月 10 日的投票表决。1848 年以来的经验教训，使他们学聪明了。但是他们已经投身于历史的地狱，历史迫使他们履行诺言，而大多数农民当时还十分糊涂，以致恰恰是在最红的各省中农村居民公开投波拿巴的票。按照他们的意见，国民议会妨碍了波拿巴的活动。波拿巴只是现在才打破了城市加之于乡村意志的桎梏。有些地方，农民甚至荒唐地幻想在波拿巴身旁建立一个国民公会。

第一次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后，拿破仑巩固和调整了某些条件，保证农民能够自由无阻地利用他们刚得到的法国土地并满足其强烈的私有欲。可是法国农民现在贫困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地产的分散，即被拿破仑在法国固定下来的所有制形式。这正是使法国封建农民成为小块土

地的所有主,而使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只经过两代就足以产生这样不可避免的结果: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在十九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在这个世纪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穷化的法律了。而这个法律正是第二个波拿巴必须维护的《*idées napoléoniennes*》(“拿破仑观念”)中的第一个观念。如果他和农民一样,还有一个错觉,以为农民破产的原因不应在这种小块土地的所有制中去探求,而应在这种土地所有制以外,在一些次要情况的影响中去探求,那末,他的实验一碰上生产关系,就会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

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发展根本改变了农民对社会其他阶级的关系。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农村地产的零星分散状态补充了城市中的自由竞争和正在兴起的大工业。农民阶级是对刚被推翻的土地贵族的普遍抗议。小块土地所有制在法国土地上扎下的根剥夺了封建制度的一切营养物。小块土地的界线成为资产阶级抵抗其旧日统治者的一切攻击的自然堡垒。但是在十九世纪内,封建领主已由城市高利贷者所代替;土地上的封建义务已由抵押制所代替;贵族的地产已由资产阶级的资本所代替。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土地耕作者自己随便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法国土地所负担的抵押债务每年从法国农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国全部公债每年债息的总额。受到资本这样奴役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而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招致这样的奴役)使法国的一大半国民变成了原始人。一千六百万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居住在洞穴中,大部分的洞穴只有一个小窗,有的有两个小窗,最好的也只有三个小窗。而

窗户之于住房，正如五官之于脑袋一样。资产阶级制度在本世纪初曾让国家守卫新产生的小块土地，并且尽量加以赞扬，现在却变成了吸血鬼来吸吮它的心血和脑髓并把它投入资本的炼金炉中去。Code Napoléon（拿破仑法典）现在至多也不过是一个执行法庭判决、查封财产和强制拍卖的法典。在法国，除了官方计算的四百万（包括儿童等等）乞丐、流浪者、犯人和妓女之外，还有五百万人濒于死亡，他们或者是居住在本地农村里，或者是带着他们的破烂和孩子到处流浪，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一句话，农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相协调，而是和它们不可调和地相对立了。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可是，**强有力的和不受限制的政府**（这是第二个拿破仑应该实现的第二个《idée napoléonienne》（“拿破仑观念”））应该用强力来保卫这种“物质的”制度。的确，这种《ordre matériel》（“物质制度”）正是波拿巴反对造反农民的一切文告中的主要用语。

小块土地除了肩负资本加于它的抵押债务外，还肩负着**赋税**的重担。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同一个概念。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国范围内一切关系和个人的齐一的水平。所以，它也就使得有可能从一个最高的中心对这个划一的整体各个部分发生同等的作用。它消灭人民群众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所以它也就引起这一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到处入侵。最后，它造成没有职业的过剩的人口，使他们无论在农村或城市都找不到容身之地，因此他们钻营官职，

把官职当作一种值得尊敬的施舍，迫使增设官职。拿破仑借助于他用刺刀开辟的新市场，借助于对大陆的掠夺，连本带利一并偿还了他强制征收的赋税。拿破仑的赋税曾是刺激农民发展副业的手段，而现在赋税却使这些副业失去最后的资源，失去抵御贫困化的最后的可能性。至于大群富贵豪华的官僚，这更是最适合第二个波拿巴心意的一种《idée napoléonienne》了。既然波拿巴不得不创造一个和社会各真实阶级并列的人为等级，而对这个等级说来，保存他的统治制度又如同饭碗问题一样地迫切，那末，事情又怎能不是这样呢？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的最初的财政措施之一就是把曾经被降低的官吏薪俸提高到原来的水平，并添设了领干薪的新官职。

另一个《idée napoléonienne》是作为政府工具的**教士**的统治。可是，如果说刚刚出现的小块土地由于它和社会相协调，由于它处在依赖自然力的地位并且对保护它的最高权力采取顺从态度，因而自然是相信宗教的，那末，债台高筑而和社会及政权脱离并且被迫越出自己的有限范围的小块土地自然要变成反宗教的了。苍天是刚才获得的小块土地的不坏的附加物，何况它还创造着天气；可是一到有人硬要把苍天当作小块土地的代表品的时候，它就成为一种嘲弄了。那时，教士就成为地上警察的涂了圣油的警犬——这也是一种《idée napoléonienne》。对罗马的征讨下一次将在法国内部进行，不过它的意义和蒙塔郎贝尔先生所想的刚刚相反罢了。

最后，《idée napoléonienne》登峰造极的一点，就是**军队**占压倒的优势。军队是小农的 point d'honneur（光荣），因为军队把小农造成保护自己新得的财产免受外敌侵犯的英雄，颂扬他们刚获得

的民族统一，掠夺世界并使之革命化。军服是他们的大礼服，战争是他们的诗篇，在想像中扩大和完整起来的小块土地是他们的祖国，而爱国主义是私有感的理想形态。可是，现在法国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所要对付的敌人，已不是哥萨克，而是法警和税吏了。小块土地已不是躺在所谓的祖国中，而是存放在抵押账簿中了。军队本身已不再是农民青年的精华，而是农民流氓无产阶级的败类了。军队大部分都是招募来的新兵，都是些替手，正如第二个波拿巴本人只是一个招募来的人物，只是拿破仑的替手一样。现在军队是在执行宪兵职务围捕农民时树立英雄业绩的；所以，如果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的体系中的内在矛盾迫使他到法国境外去用兵，那末军队在干了几桩强盗勾当后就不是获得光荣，而是遭到痛打了。

这样，我们就看到：一切《idée napoléonienne》（“拿破仑观念”）都是不发达的、青春年少的小块土地所抱的观念；对于已经衰老的小块土地说来，这些观念是荒谬的，它们只是它临死挣扎时的幻觉，是变成了空话的词句，是变成了幽灵的魂魄。但是，为了使法国国民大众解脱传统的束缚，为了使国家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对立以纯粹的形态表现出来，一出模仿帝国的滑稽剧是必要的。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剧的解体，建立在它上面的国家建筑物将倒塌下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只能在和封建制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⁸⁹。

12月20日和21日大选的谜，要从法国农民的状况中找到解答，这次大选把第二个波拿巴推上西奈山，并不是为了让他去接受法律，而是为了让他去颁布法律。

显然，资产阶级现在除了投票选举波拿巴之外，是再没有别的

出路了。当严正的宗教家在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⁹⁰上诉说教皇生活淫乱并悲叹必须改革风化时，红衣主教比埃尔·德·阿伊向他们大声喝道：“现在只有魔鬼还能拯救天主教会，而你们却要求天使！”法国资产阶级在政变后也同样高声嚷道：现在只有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还能拯救资产阶级社会！只有盗贼还能拯救财产；只有违背誓言还能拯救宗教；只有私生子还能拯救家庭；只有混乱还能拯救秩序！

波拿巴作为一种已经成为独立力量的行政权力，自命为负有保障“资产阶级秩序”的使命。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秩序的力量是中等阶级。所以他就自命为中等阶级的代表人物，并颁布了相应的法令。可是另一方面，他之所以能够有点作为，只是因为他摧毁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摧毁这个中等阶级的政治力量。所以他又自命为中等阶级的政治力量和著作力量的敌人。可是，既然他保护中等阶级的物质力量，因而也就不免要使这个阶级的政治力量重新出现。因此必须保护原因并在结果出现的地方把结果消灭掉。但是，原因和结果总不免有某些混淆，因为原因和结果在相互作用中不断丧失自己的特征。于是就有抹掉界限的新法令出现。同时波拿巴认为自己 and 资产阶级不同，他自命为农民和一般人民的代表，想使人民中的下层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得到幸福。于是就有一些预先抄袭“真正的社会主义者”⁹¹的贤明政治的新法令出现。但是波拿巴首先觉得自己是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代表，因为他本人、他的亲信、他的政府和他的军队都属于这个阶级，而这个阶级首先关心的是自己能生活得舒服，是从国库中汲取加利福尼亚的彩票利益。于是他就以颁布法令、撇开法令和违反法令来证实他真不愧为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

这个人所负的这种充满矛盾的使命，就可以说明他的政府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行动，这个政府摸索前进，时而设法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设法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和它作对。他这个政府在实际行动上表现的犹豫，和他从伯父的法令上盲目抄袭来的那种政府法令的明快果断的作风形成一种十分可笑的对照。

工业和商业，即中等阶级的事业，应该在强有力的政府下像温室中的花卉一样繁荣。于是就让出了无数的铁路承租权。但是波拿巴派的流氓无产阶级是要发财致富的。于是就有预先知悉铁路租让秘密的人在交易所中进行投机。但是建筑铁路的资本又没有。于是就强令银行以铁路股票作抵押来发放贷款。但是银行应该由波拿巴本人来经营，——因此就应该优待银行。于是银行就免除了公布每周结算的义务，它和政府订立了极占便宜的契约。人民应该有工作。于是就举办公共工程。但是公共工程增加人民的税负。因此必须使食利者的收入由五厘利息改为四厘半利息，以此来减低税额。但是给资产阶级吃苦药丸要加厚糖衣；因此 en detail (零买) 酒喝的人民的葡萄酒税增加了一倍，而 en gros (大批买) 酒喝的中等阶级的酒税却减低了一半。现有的工人团体被解散了，可是政府又保证将来团体定会获得奇迹。必须帮助农民。于是就建立了加重农民负债并加速财产集中的抵押银行。但是这些银行必须利用来从被没收的奥尔良王室财产中榨取金钱。可是没有一个资本家同意后面这个在法令中没有规定的条件，结果土地抵押银行也就始终只是一纸法令了，如此等等。

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取得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正如吉

兹公爵在弗伦特党时期由于曾把自己的一切财产变成他的党徒欠他的债务而被称为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一样，波拿巴也想做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把法国所有的财产和所有的劳动都变成欠他个人的债务。他想窃取整个法国，以便将它再赠给法国，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以便能够用法国钱再来购买法国，因为他作为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就不得不收买应归他所有的东西。于是所有一切国家机关、参议院、国务会议、立法团、荣誉军团勋章、士兵奖章、洗衣房、公共工程、铁路、没有士兵的国民自卫军参谋部以及被没收的奥尔良王室财产，都成了买卖对象。军队和政府机器中的每一个位置，都成了收买的手段。然而在这种先把法国攫取过来，然后再把它交给法国自己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东西还是在流通时流到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和会员的腰包里去的利息。莫尔尼先生的情妇伯爵夫人勒·，对没收奥尔良王室财产一事曾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C' est le premier vol de l' aigle》（“这是鹰的最初的飞翔”）^①，这句俏皮话，对于这只无宁说是乌鸦的鹰的每一次飞翔都可以适用。一个意大利的卡尔特斯派僧人曾对一个夸耀地计算自己还可以受用多年的财产的守财奴说过：《Tu fai conto sopra i beni, bisogna prima far il conto sopra gli anni》（“你总是计算你的财产，但你最好是先计算一下你的年岁吧”）。波拿巴和他的信徒每天都对自己说这句话。为了不致算错年月，他们把每分钟都计算进去。钻进宫廷，钻进内阁，钻进行政机关和军队的上层去的是一群连其中最好的一个也来历不明的流氓，是一群吵吵嚷嚷的、声名狼藉的、贪婪的浪荡者。他们穿着华丽的衣服，装出俨如苏路克高官

^① 《vol》一语有两个意思：“飞翔”和“盗窃”。

显宦那样可笑的庄严的样子。如果我们注意到，**维隆—克勒维尔**^①是十二月十日会的道德守护者，**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是它的思想家，那末，我们对这个社的上层人物就能有个清楚的概念了。基佐主持内阁的时候，曾在一家地方小报上利用这个格朗尼埃作为攻击王朝反对派的工具，并且通常都给他如下的好评：《C'est le roi des droles》，“这是丑角之王”。如果把路易·波拿巴的朝廷及其朋党拿来跟摄政时期⁹²或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的朝廷相提并论，那是不公正的。因为“法国已不止一次地有过姘妇的政府，但是从来还没有过面首的政府”^②。

波拿巴既被他的处境的自相矛盾的要求所折磨，并且他作为一个魔术师不得不以日新月异的意外花样吸引观众把他看作拿破仑的替身，换句话说，就是不得不每天举行小型的政变，于是他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陷于全盘混乱状态，侵犯一切在1848年革命中看来是不可侵犯的东西，使一些人对革命表示冷淡而使另一些人奋起进行革命，以奠定秩序为名而造成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同时又使整个国家机器失去圣光，亵犯它，使它成为可厌而又可笑的东西。他模仿礼拜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的仪式⁹³在巴黎布置礼拜拿破仑皇袍的仪式。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汪东圆柱顶上被推下来。

① 巴尔扎克在其长篇小说“表妹培蒂”中，把克勒维尔描绘为最淫乱的巴黎庸人，这个克勒维尔是以“立宪主义者报”报社主人维隆博士为模特儿描摹出来的。

② 这是德·日拉丹夫人的话。

弗·恩格斯 英 国⁹⁴

I

英国辉格党人的运气大为不佳。帕麦斯顿还没有来得及因为“没有使英国在欧洲大陆上得到一个同盟者，一个朋友”而被撤职，由于撤职一事而引起的第一件丑闻还没有平息，整个报界就又掀起了战争的叫器，并因此而公布了一大堆有关陆军和海军部门管理不善的事例，而这些事例足以毁掉几个部。

从 1846 年以来，各式各样的军事权威都把国家的注意力引向一旦同法国发生战争英国被侵犯的可能性这个问题上。但是在当时这种战争的危险性是微乎其微的，所以这些首先无事张皇的人的那种唐·吉珂德式的姿态只能令人可笑。特别突出的是赫德将军，当时，他经常呼吁国家要加强国防，因而落了个不很光彩的名声。当然，在这里也不应当忘记，老威灵顿曾同样认为现有的岸防工事是非常不够的。

不过路易一拿破仑的政变突然使这些争论具有了新的意义。约翰牛立即感到，法国的军事独裁，即对拿破仑第一执政时期的拙劣的模仿，很可能使法国投入战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国企图对滑铁卢的失败采取报复行动是完全可能的。英国武装力量近年来

的英雄功绩不是十分辉煌的：在开普兰地区卡弗尔人接连不断地获得胜利，甚至英军在奴隶海岸登陆的尝试，—— 尽管他们使用了欧洲的战术和火炮—— 也被手无寸铁的黑人粉碎了，这些黑人使敌人受到了极其沉重的打击⁹⁵。假如英国军队不得不同经历过阿尔及利亚战争锻炼的可怕得多的“非洲人”⁹⁶发生冲突，那他们会得到什么下场呢？像路易·波拿巴这样的不知廉耻的冒险家，谁敢担保他不会在一个早晨不通过枯燥的宣战手续，就率领十至十二只满载军队的蒸汽舰在许多艘战列舰的护送下突然出现在英国海岸并向伦敦进军呢？

情况确实很严重。政府立刻下令在南部沿海和东南沿海的各大港口的入口处构筑新的炮台。但是公众对这件事情也是认真的，并且采取了那种快要使政府感到极不愉快的做法。人们首先调查了现有武装力量的情况，结果发现，在这个时候，即使根本不防守爱尔兰，那末能够用来保卫大不列颠的最多不过两万五千个兵士和三十六门马拉的火炮；至于海军，目前各港口没有一艘较大的军舰是准备好启碇去阻击登陆的。人们发现，英国兵的装备使他们的运动性受到极大的限制，而且根本不实用，这点在同卡弗尔人作战时已经得到证明；同时还发现他们的武器根本不能和欧洲其他军队的武器相比，任何一个英国兵的枪都简直无法同普鲁士的针发枪或法国猎兵的步枪相比。在海军军需部里曾经发现营私舞弊和玩忽职守的现象非常严重，而所有这一切也被那些无事张皇的人和各式各样追求地位的人难以想像地加以夸大。

这件事似乎将首先触犯英国贵族、食利者和资产者，因为法国人的入侵和可能的占领将使他们首先遭殃。然而不要忘记，英国独立地发展，这里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充分发展了的矛盾通

过斗争得到缓慢的然而彻底的解决，这对于欧洲的整体发展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即使英国这种独特的按部就班的发展有时也会成为大陆上在个别时候获得胜利的革命者的暂时障碍（如1848年和更早些的1793年），然而从根本上来说，它所具有的革命内容却远远超过大陆上所有那些一时的震荡所具有的革命内容的总和。当对欧洲的侵占使法国大革命遭到失败的时候，英国通过蒸汽机使社会革命化了，夺得了世界市场，愈来愈把所有那些从历史上看已经衰落的阶级从政权中排挤出去，从而为工业资本家和工业工人之间的大决战打下基础。拿破仑曾企图将十五万人的军队从布伦调到福克斯顿并在共和国军老兵的援助下去占领英国，结果没有成功。这一情况对欧洲的整体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在复辟时期，当时大陆交给了被贝朗热恰如其分地描绘过的那些正统主义的微不足道的小人⁹⁷，而在英国，由于坎宁内阁已经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内阁，因而在老牌的反动的托利党内第一次发生了巨大的分裂，并且开始了对英国宪法的逐渐破坏，这种破坏活动从坎宁开始，后来又由皮尔继续，至今仍未终止，它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导致整个腐朽建筑物的轰然倒塌。这种对旧的英国制度的破坏和这种破坏所赖以发生的、由大工业引起的英国社会的不断革命化，都在不声不响地进行着，而不管当时在大陆上得胜的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并且这种发展虽然缓慢，但却可靠，从来没有后退过一步。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的失败⁹⁸是一次非常性的失败，是对外国政治影响的坚决的排斥。推动英国发展的强大力量，不是大陆上的政治动荡，而是普遍的商业危机，是威胁着每个人生存的直接物质打击。而现在，当工业资产阶级从政权中最后地排除所有传统阶级，从而表明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

之间进行决战的日子迫近的那些无可争辩的迹象日益明显的时候,如果这个发展受到阻碍,或是英国被 12 月 2 日的掠夺成性的御用军所征服,哪怕是暂时地征服,那也会给欧洲的整体运动带来最悲惨的后果。只有在英国,工业才达到了囊括整个民族利益和各阶级全部生活条件的规模,但是工业一方面包括工业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又包括工业无产阶级,而民族中所有其他组成部分日益聚集在这两个相互对立的阶级的周围。所以,在工业中只存在着是工业资本家还是工业工人占统治地位的问题,而且正是在工业中(只要在某个地方已经有了它的话),有着能够促使现代形式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的土壤,在这种土壤上工业无产阶级一方面具有夺取政权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具有使他能够进行完满的社会革命和彻底地消灭阶级矛盾的物质手段,即生产力。显然,整个欧洲的无产阶级政党所最关切的问题就是:英国的这种将导致两个工业阶级的矛盾走向极端尖锐化和导致被压迫阶级最终战胜统治阶级的发展方向,不要因受到外国的压迫而改变;这种发展的动力不要受到削弱;决战的时刻不要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但是入侵的可能性如何呢?

首先,大不列颠是一个不包括爱尔兰时拥有二千二百万居民而包括爱尔兰时则有二千九百万居民的国家,像这样的国家不是通过突然的袭击所能占领的。那些无事张皇的人举出迦太基为例,说迦太基的舰队和陆军都分散在最远的领地,而迦太基的两次失败都是罗马人突然袭击的结果⁹⁹。但是,关于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完全改变这一点姑且不谈,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人所以能在非洲登陆,只是因为在这以前迦太基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精锐部队已被消灭,迦太基的舰队已被赶出了地中海,所以突然袭击决

不是突然袭击，而是一个庄严的军事行动，正是这次行动，才十分自然地结束了延续很久的而在很长时期中终究是罗马占优势的战争。而第三次布匿战争未必能算作战争，这不过是一次最强的一方以十倍优势的力量对最弱的另一方的征服，就像拿破仑并吞威尼斯共和国一样¹⁰⁰。但是，现在法国已不是 1797 年时代的法国，而英国也不同于当年衰退的威尼斯。

拿破仑曾经认为占领英国至少需要十五万人。在那时虽然英国能顶用的士兵比现在多得多，但是它的人口和工业资源都少得很。因此，不管目前英国人拥有的力量怎样薄弱，然而要想占领英国，至少还需要同过去一样多的人。只要看一下地图就可以知道，任何一个在英国登陆的侵略军至少需要推进到提斯河、太恩河或者甚至推进到特威德河；它如果停留在比较近的地区，那末各工业区的全部资源仍然是在防御者的手里，而它为了对付后者不断增加的力量，就不得不去占领从军事观点来看好处很小并且使它的力量过于分散的那些阵地。在上面提到的几条河以南的地区，即英格兰本身，共有一千六百万居民。然而为了保证交通线，为了围攻和占领岸防要塞以及防止必然发生的民族起义，需要很大数量的兵力，以至他们能够在苏格兰边界采取积极行动的兵力就非常少了。因此，为了占领英格兰，镇压国内的起义，并且在苏格兰和爱尔兰进行正规战争，假如只有不到十五万人的军队，即使是在最好的指挥下，也是不可设想的。

假定能够用征召新兵和巧妙集中的办法把十五万人迅速集结在法国北部沿海的某一个地点，这至少也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内，英国可以一方面抽调塔霍舰队¹⁰¹和附近其他各停泊场的蒸汽舰，另一方面可以使那些停泊在各港口的、曾被拆除了

武器装备的舰船进入战斗准备,这样就能够在拉芒什海峡集中相当可观的一批海军兵力;再过一个月,全部蒸汽舰和一部分帆力舰将从大西洋各停泊场以及从马尔他岛和直布罗陀开来。因此,登陆部队必须一次登陆完毕,或者,至少也要分几大批登陆,因为登陆部队同法国的联系迟早要被切断。每次至少需要渡过五万人,这样,全军三次就可以渡完。同时,运送军队只能使用有限的几艘军舰,或者根本不能使用军舰,因为这些军舰必须对付英国舰队的攻击。法国不可能在六个星期内在拉芒什海峡的本国港口内集中足以运送五万人及其所必需的火炮和弹药的运输工具,即使扣留中立的船只,也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但是远征每推迟一天,都会给英国带来新的优势,因为英国唯一需要的就是集中舰队和训练新兵的时间。

但是,如果说考虑到英国的舰队就不应该把十五万人的登陆部队分成三批以上登陆,那末任何一个严肃的军事家考虑到英国的陆军,也就不敢率领五万人以下的军队在英国登陆。我们已经看到,甚至在对入侵有利的情况下,英国人也仍然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如果认为英国人在这段时间内不会组织起一支在敌人援军赶到以前就能毫不费力地把这支五万人的前卫部队赶到海里去的陆军,那对他们是太不了解了。必须考虑到,军队只能在瑟堡和布伦之间上船,而登陆只能在威特岛和杜弗之间进行,也就是说只能在沿海地区进行,而这一地区的任何一个地方距离伦敦都很近,只要行军顺利,四天之内即可完成这段距离。必须考虑到,上船和登陆取决于风向和潮水;英国舰队将在拉芒什海峡中进行抵抗;第一批登陆和第二批登陆之间大约要相隔八天到十天的时间,无论如何不能少于四天,因为绝大部分的军队是要靠帆船来运送,

而且这些军队必须在瑟堡和布伦之间的整个沿海地区集中；要知道“布伦兵营”¹⁰²也不是立即就能建立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不能一次至少运送七八万人，法国人恐怕是不敢贸然行动的，为此，还是需要弄到运输工具，而这又需要时间。但是远征每延迟一个星期都会使英国的防御手段得到增长，而且比敌人的运输工具和海战手段增长得更快，所以这就使侵犯者处于愈来愈不利的地位；事情很快就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即除非他们一次就把十五万人运送过去，否则他们就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并且这十五万人即使过去了，也会遇到强烈的抵抗，如果不续派十万人左右的预备队，最后也必遭歼灭。

总而言之，利用突然袭击是不能侵占英国的。假如为了侵占英国而把整个大陆联合起来，那末仅仅是制造和获得运输工具就需要整整一年的时间，而英国却不需要这样长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本国沿海地区的防御工事；可以集中起一支海军，其力量将超过大陆各国的所有舰队力量的总和，从而使它们的联合成为不可能；最后，还可以组织起一支陆军，它将使任何敌人不可能在英国土地上停留下来。

正是现在，英国人的民族感比 1815 年以后的任何时候都要强烈，而遭受侵略的严重危险会使这种民族感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况且，大不列颠的居民并不像人们所描述的那样是毫无军事素质的；当然大城市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大陆上的这些阶级比较起来是很不善于使用火器的，因此也不太适于进行内战。但是总的来说，英国居民在不小的程度上是有尚武精神的，而且在他们当中有非常适合于当兵的人。没有哪一个地方有这么多的猎人和偷猎者，即受过一半训练的轻步兵和猎手；有四五万

名从事机器生产的机械师和工人，他们受到的训练比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精选出来的同样数量的人都要良好，所以更适于在修械所工作，在炮兵部队和工兵部队服役。紧靠苏格兰边界的地区几乎完全不适于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这一带地形的特点是岗峦起伏，因而非常适合进行小规模战争。如果说，游击战迄今只是在人口比较稀少的国家里取得成功，那末，英国在遭受严重袭击的情况下将会证明：在人口非常稠密的地区，例如在几乎到处是房屋毗连的郎卡郡和西约克郡，游击战能够获得更大的效果。

至于说为了掠夺富有的港口城市和破坏仓库等而进行的突然袭击，显然，在目前英国完全有可能遭到这样的袭击。关于防御工事甚至不值得一提。只要斯比特海德海峡没有军舰，就能平安无事地进抵南安普顿港湾的入口处，派遣足够数量的军队登陆，以便从南安普顿任意索取赔款。看来，乌里治目前同样有可能被占领和破坏，但却需要使用较大的力量。保卫利物浦的只是一个拥有十八门铁制的没有瞄准装置的海军炮的可怜的炮队，炮队的勤务由八个或十个炮手和半个连的步兵担负。但是，除布莱顿以外，英国的所有沿海城市都位于海湾的里面或者是河流入海口的上游，而且都有浅滩和暗礁作为天然的工事，而这些浅滩和暗礁又只有当地的领港员才熟悉。谁要是企图在没有领港员引导的情况下在这些狭窄的、通常只有涨潮时大船才能通过的海峡中开辟道路，那末，他就要冒得不偿失的危险，这样的远征一旦遇到某种抵抗和一些事先预料不到的微小的阻碍，就会遭到像 1849 年丹麦远征埃克恩弗尔德¹⁰³时的悲惨结局。相反，假如有一两万人乘蒸汽舰迅速地在某一个乡村地区登陆，对一些小的外省城市进行短时间的然而肯定会有一点积极后果的掠夺性的远征，那当然是很容易实现的，因为

现在对这种远征是绝对无法阻止的。

但是只要塔霍舰队、北美分舰队以及一部分在巴西和非洲之间追捕那些贩运奴隶的船只的蒸汽舰奉命返回英国，同时使停泊在各军港的、曾被拆除武器装备的舰船都进入战斗准备，那末所有这些忧虑就会自行消失了。这样就足以防止突然袭击，推迟任何一个更严重的侵犯尝试，从而使英国有时间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

但是惶恐的心理会产生一些良好的后果，它将使英国改变那种可笑的政策：在地中海保持有八百门舰炮，在大西洋有一千门，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各有三百门，而在国内却没有一艘军舰保卫沿海地带；就是说，改变那种当国内极需军队的时候却同黑人和卡弗尔人进行无休止的、不光彩的战争的政策。拙劣、笨重和各方面都很陈旧的装备，以及陈旧的武器；陆军和海军部门的极端严重的玩忽职守；在这些部门中达到了危险程度的任人唯亲的风气、贪污受贿和营私舞弊的行为，——这一切缺点都将得到不同程度的克服。最后，工业资产阶级将摆脱对和平大会与和平协会的偏爱，由于这种偏爱，工业资产阶级遭到了应得的嘲笑，它的政治进步以及英国的整个发展受到了如此巨大的损害。如果战争终于爆发的话，那末，根据众所周知的、现时正在大放异彩的全世界历史的讽刺来看，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科布顿和布莱特两位先生必将以和平协会会员¹⁰⁴和不久将来的大臣的双重身分发动一次很可能以整个大陆为对象的激烈的战争。

1852年1月23日于曼彻斯特

II

议会会议定于2月3日即下星期二召开。关于议会首先要辩论的三个主要问题,我们已经简要地说过了其中的两个¹⁰⁵:帕麦斯顿的撤职问题和对法战争中的防御手段问题。剩下的就是第三个问题,也就是对英国的发展极其重要的问题——选举改革问题。

一开始就会由罗素提出的新改革法案,还将使我们有充分的机会来详细地考察英国选举改革的普遍意义。现在,当关于这个法案还只是听到一些流言和对流言的解释的时候,我们只能指出,在这整个问题中,首要的一点就是那些反动的或顽固的阶级,即土地贵族、食利者、证券投机商、殖民地的土地占有者、船主和一部分商人和银行家将在多大的程度上保持他们的权力,以及他们要把哪一部分权力让给站在所有进步阶级和革命阶级前列的工业资产阶级。关于无产阶级在这里暂时还谈不到。

“每日新闻”¹⁰⁶——工业资产阶级在伦敦的机关报和关于这类问题的最好来源——报道了关于辉格党内阁准备的新改革法案的一些消息。根据这个报道,预定的改革触及到现行的英国选举制度的三个方面。

从前,每一个议员必须拥有至少获得三百英镑收入的地产才具备进入议会的资格。在很多情况下,这个限制条件差不多总是通过假买地产和假造契约的办法被回避过去了。它对工业资产阶级说来早已失效了;现在这个条件应该完全取消。要求取消这个条件

是无产阶级的人民宪章¹⁰⁷的“六点”中的一点，我们很想看看官方怎样来承认这六点（整个这六点带有完全资产阶级的性质，在美国都已实现）中的一点。

迄今为止选举制度是这样规定的：按照英国的旧习惯，一部分议员由郡选派，另一部分议员则由城市选派。想在郡里选举的人，必须拥有每年获得两英镑收入的独立自主的地产（freehold property），或者拥有每年获得五十英镑收入的租佃地产。可是在城市里却不同，凡是租住房屋交付十英镑房租和交纳相应比例数目的济贫税的人，都有选民资格。由于这种制度，在选派议员的那些城市里，大批的小商人和手工作坊主，也就是整个小资产阶级都享有选举权，而在郡的选举中，绝大部分的选民则是从属于贵族的 tenants at will，也就是那些每年都可能被解除租契从而完全依附于土地占有者老爷们的租佃者。去年洛克·金先生建议，把在城市里实行的房客缴纳十英镑租金这一条也推广到郡里，这个建议在当时人数很少的下院里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成，而反对的只是那些大臣们。据说，罗素现在建议把郡的租金要求降低到十英镑，而城市降为五英镑，这一措施将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那时在城市里，无产阶级中收入较多的那一部分人将会立即获得选举权，这样一来，在一些大城市就很可能使宪章派的代表当选，而在中小城市里工业资产阶级将会获得许多新的选票和议席。在郡里，没有选派自己代表参加议会的地方小城市的所有中小资产者都会立即获得选举权；他们通常会构成绝大多数，对现在在郡里占统治地位的某些贵族家族来说，他们人数众多而且又有比较独立的地位，因此他们能够制止这些贵族至今在选举中还采用的恐怖手段。这些地方小城市的小资产者本来就越来越处于工业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

现在，他们将会把很大一部分的郡交给工业资产阶级。

直到现在，各个选区在地区大小和重要性上是非常悬殊的；代表名额无论同居民的数目还是同选民的数目都完全不相称。在某个地方，一百或二百名选民能推选那么些代表，而在另一个地方，六千至一万一千名选民也是推选那么些代表。特别是在城市中这种差别更加悬殊；而选民不多的小城市恰恰就是这个或那个大土地占有者进行最丑恶的收买贿赂（例如圣奥尔本斯）或者是实行绝对选举独裁的集中点。根据“每日新闻”报道的材料，有八个最小的城市选区应当被剥夺今后推选自己代表的权利，可是其余的选举议员的小城市，将会同另外一些相邻的至今只在郡里才有代表的地方小城市联合起来，这样一来，选民数目就会大大增加。这是模仿苏格兰早在同英格兰联合（1707年）时起就开始实行的城市组合制度。无论这种措施多么不彻底，工业资产阶级也会指望通过它来加强它的政治势力，其证明就是，工业资产阶级很久以来就认为选区的平等化同议会改革的所有其他问题比较起来具有特殊的意义。此外，根据报道，伦敦和郎卡郡这两个工业资产阶级的主要中心将在议会中获得更多的代表名额。

如果罗素真的打算提出这类的法案，那末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这件事对这位小人物来说的确是很了不起的。显然，他对皮尔的桂冠羡慕不已，他要表现一次“勇敢”。诚然这种勇敢将伴随着英国辉格党人所固有的胆怯怕事、谨小慎微和顾虑重重的表现，并且在目前英国社会舆论的情况下，除了罗素本人和他的同僚——辉格党人而外，没有人会认为这是勇敢。但是在一切犹豫、动摇、怀疑之后，在上次会议结束以来一直全力以赴地企图寻找立足点而又屡遭失败以后，大概不能期待这位小小的勋爵提出比上述建议更

多的东西了，当然假定他在星期二之前还提不出新的主张的话。

不用说，工业资产阶级所要求的要多得多。它要求 household suffrage，即凡是占用一幢房子或其一部分并因此而交纳市政税的户主的选举权；它也要求秘密投票和完全重新划分选区，以保证同样数目的选民和同样数目的财产有相等的代表名额。它将顽强地、长期地和内阁进行讨价还价，并从内阁方面得到每一个可能得到的让步之后，才会出售对内阁的支持。我们的英国工业家们都是些老练的商人，大概他们要按最高的价格出售自己的一票的。

但是，现在就已经可以看出，甚至像前面谈到的内阁提出的最低限度的选举改革，除了加强工业资产阶级的权力而外，不会得到其他的结果。现在，工业资产阶级已经在实际上统治着英国，为了使它的最高统治权在政治上也得到承认，它正在朝这个方向飞速前进。无产阶级为争取自身利益而对工业资产阶级进行的独立斗争只有在后者的政治统治权确立之后才能开始，但是无论如何它也会从这次选举改革中得到一些利益。这个利益到底会有多大，完全取决于选举改革的辩论和最后通过是在商业危机爆发之前进行，还是一直拖延到商业危机的到来；因为无产阶级暂且只能在伟大的决定性时刻才作为一支积极力量走上前台，正如古代悲剧中的命运之神一样。

1852年1月30日于曼彻斯特

弗·恩格斯写于1852年1月23日和30日
载于1927年“马克思主义年鉴”第4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¹⁰⁸

亲爱的先生！

大陆上最后残留的一些独立报刊也都被查封了，因此揭露在欧洲的这个地区所发生的一切违法和迫害行为这样一个光荣的义务，就落到英国报刊身上了。所以，请允许我通过贵报向公众报告一件事实，这件事实表明，普鲁士的法官和路易—拿破仑的政治奴仆们完全是不相上下的。

您知道，假如在恰当的时机搞一个经过周密策划的阴谋，那将是一种多么有价值的 *moyen de gouvernement* (统治方法)。普鲁士政府在去年年初很需要搞这样一个阴谋，好让议会变得比较驯服一些。为此目的，逮捕了許多人，动用了全德国的警察，但是结果他们一无所获；经过种种侦查之后，警察当局最后只能把少数几个人关进科伦监狱，硬说他们是一个遍于各地的革命组织的领袖。在这几个人中首先包括同新闻界有联系的两位先生：贝克尔博士和毕尔格尔斯博士；还有从事医务工作的丹尼尔斯博士、雅科比博士和克莱因博士，其中的两个人是很好地履行了济贫所医生的艰苦职责的；此外还有一个大化学企业的领导人、因自己在化学方面的科学成就而驰名全国的奥托先生。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有罪，所以，人们每天都以为他们会得到释放。但是，就在他们被拘禁

的期间，颁布了一个“纪律法”，这个法律使政府有权通过非常简便的手续解除任何一个不称政府心意的审判官员的职务。这个法律的实施可以说立即影响到当时已经拖延很久而迟迟未决的、上面提到的那几位先生的案件的进程。不仅把他们关进了单人牢房，不仅禁止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朋友之间的任何来往（甚至是书信来往），不许他们读书和写作（在普鲁士，这一切甚至对重犯在判决之前也是不禁止的），而且改变了整个诉讼程序的方向。Chambre du Conseil（高等法院）（您知道，在我们科伦是根据 Code Napoléon（拿破仑法典）进行审判的）立即同意确认他们的犯罪构成，并且把材料提交检察院，即由法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其职能相当于英国的大陪审团¹⁰⁹。我请您特别注意这个委员会所作的史无前例的决定。在这个决定里有下列一段实在令人吃惊的话，现在我们把这段话逐字逐句地翻译如下：

“鉴于没有提出可靠的材料，因而也未能确定犯罪构成，所以**没有理由提起公诉**（您当然会以为，由此得出的必然结论应该是下令释放被拘禁者了吧？完全不是！）^①，因此，全部记录和文件发还侦查员，重新进行侦查。”

这就是说，在十个月的拘禁期间，尽管警察当局花了很大力气，王国检察官也费尽心机，却没有能够造成一点点犯罪构成，而在此之后，全部程序却要从头再来一遍，也许，再经过一年的侦查，案件会第三次交还给侦查员吧。

这样令人不能容忍的违法行为是事出有因的，政府现在正在准备成立一个由最忠顺的分子组成的最高法庭。政府在陪审法庭上必然会遭到失败，所以它必须拖延对这个案件的最后审理，直到

^①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 〉内的话或标点符号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译者注

能够把它移交给新的法庭，而这个新的法庭当然是会对国王百依百顺，而使被告毫无保障的。

如果普鲁士政府仿照路易·波拿巴的办法，立即根据国王的命令对犯人进行判决，那岂不是显得更加诚实得多吗？

亲爱的先生，我永远是您的最顺从的仆人

普鲁士人^①

1852年1月29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913年斯图加特版第1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① 这个署名是马克思的，信的正文则是恩格斯写的。——编者注

弗·恩格斯 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 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

一

自去年 12 月 2 日以来，大走红运的、肆无忌惮的赌徒路易一拿破仑·波拿巴引起了只有外国政治、至少是欧洲政治所能激起的全部兴趣。“他在打什么主意？他准备打仗吗？和谁打？他打算侵入英国吗？”在所有议论欧洲事态的场合都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

是的，的确发生了一些令人吃惊的事情：一个意外地登上伟大共和国的执政首脑的宝座的名气不大的冒险家，一夜之间就占领了首都最重要的据点，像清除垃圾似的清除了议会，两天之内就把首都的起义镇压下去，两个星期就平息了地方上的骚乱，经过徒有其名的选举迫使全体人民接受他的统治，并立即制定了一个使他能够独揽国家大权的宪法。自从灭亡了的罗马帝国的御用军军团把帝国拿到市场上拍卖给出价最高者的那个时候起，还没有一个民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蒙受过这样的耻辱。所以，英国资产阶级报刊，从“泰晤士报”到“每周快讯”¹¹⁰，从 12 月份起就没有放过任何一次机会来表露它们对这个军事独裁者、毁灭本国自由的叛徒、摧残出版事业的刽子手等等的义愤。

然而，在给路易一拿破仑以罪有应得的最大的鄙视的同时，我们认为工人阶级的机关报¹¹¹不应该加入这个骂街式的合唱。这个合唱队的参加者——交易商的报刊、棉纺大王的报刊、土地贵族的报刊——在进行不堪入耳的谩骂方面互不相让，力图超过对方。而对这些绅士们不妨提醒一下事情的真实情况。他们是有充分理由叫嚷的，因为路易一拿破仑所有从别人那里抢去的东西，都不是从工人阶级那里，而是从那些由上述报刊代表它们在英国的利益的阶级那里抢去的。这并不是说，路易一拿破仑甘心于不掠夺工人阶级，不从工人阶级那里抢去他所想要的一切。问题是，去年12月的时候，在法国工人阶级身上已经没有什么可抢的了，因为1848年6月的大失败之后，在资产阶级议会统治的三年半期间，凡是能够从工人阶级那里抢去的东西，他们都已经抢走了。的确，在12月2日前夕，工人阶级手里还留下什么可抢的东西呢！选举权吗？——1850年的五月选举法已经剥夺了工人阶级的这项权利。集会权吗？——这项权利很久之前就已经被社会上的“可靠的”和“善良的”阶级所垄断了。出版自由吗？——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报刊已经被淹没在起义者即伟大的六月战斗的参加者的血泊之中，此后这个报刊的影子虽然还残存过一个时期，但是在国民议会后来的每一次会议都重新加以修改和完善的禁口律¹¹²的压迫下，它早已消失了。他们的武器吗？——已经利用一切借口把所有的工人从国民自卫军中清除出去，从而使武器只掌握在社会上的富裕阶级的手里。

可见，到不久前的 coup d'état (政变) 时，工人阶级在政治权利方面可失去的东西已经极少，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了。而另一方面，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这时却拥有全部政治权力。报刊、

集会权、携带武器权、选举权、议会都属于它们。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土地占有者和国家有价证券持有者，经过三十年的斗争之后，终于在共和国的政体中找到了中立的场地。对这个阶级来说，在几小时之内就被抢走所有这一切，而且政治地位立即被降得非常低，就像他们过去对付工人那样，这的确是很痛苦的。这就是英国“有声望的”报刊所以对路易一拿破仑的卑鄙的违法行为勃然大怒的原因。当同样的来自执政当局或是来自议会的卑鄙行为是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时候，这些行为很自然地被认为是完全合法的，可是，一当这样的政策扩展到“上等人”头上，扩展到“民族智慧之精华”的头上的时候，那就大不相同了，每一个自由的卫道者都大嚷大叫地出来维护“原则”了。

总之，12月2日的斗争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和军队的代表路易一拿破仑之间进行的。路易一拿破仑是了解这一点的，因为在12月4日的战斗中，他曾经向军队下令主要向“衣着阔绰的先生们”开枪。这场出色的巷战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了；只对关闭的窗户和没有武器的资产者放了几排枪，巴黎资产阶级的任何反抗企图就完全被制止了。

另一方面，虽然在工人阶级手中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剥夺的直接的政治权利，但是这次事情对工人阶级决不是毫无利害关系的。首先，它失去了1852年5月可能得到的一次大好机会：那时，一切国家政权机关将同时任满，那时，它将在1848年6月之后第一次可以指望得到一个广阔的斗争场所。其次，既然它力图获得政治统治权，它就不能允许在没有它以最高仲裁人——强使互相斗争的双方把自己的意志作为法律来接受的仲裁人——的资格来干预双方之间的纠纷的情况下用暴力改变政权。因此，工人阶级必

须抓住这个机会向两种互相敌对的力量表明，在战场上还有第三种力量，虽然这种力量暂时被排除出官方的和议会的竞争舞台，但它仍然时刻准备着，一旦活动场所转到它的范围内——转到街头，它就会立即出场。但是，不要忘记，即使在这种场合，无产阶级党仍然会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进行斗争。假如无产阶级党起来反对篡位者，那它实质上岂不是为恢复那个已经表明是它的死敌的议会及其专政效劳？而假如无产阶级党立即宣布它是革命政府的支持者，那岂不会吓坏资产阶级——事实上这种事情在地方上已经发生，——以致于促使它同路易—拿破仑和军队结成同盟？此外，还应当记得，革命工人阶级当中的基本力量和精华，有的已经在六月起义中被残杀，有的则在六月事件之后在数不清的种种借口下被流放或者被关进监狱。最后，还存在这样一种因素，它本身就向拿破仑保证使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都保持中立，这个因素就是**工业和商业的情况非常良好**，而英国人十分清楚：如果能够充分保证工人们有工可做并能得到较高的劳动报酬，那就不会发生骚动，更不要说革命了。

现在，在英国人们都说，法国人变成了老太婆，否则他们不会忍受这样的待遇。我很同意这样一种说法——法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在目前是应该得到这样漂亮的绰号的。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法国人在他们的见解和行为方面是比其他任何一个文明的民族更容易受胜利的影响的。一当这个国家中的事变的进程具有一定的方向，他们就会毫不抗拒地遵循着这个方向走去，一直到在这条道路上达到极限为止。1848年六月的失败使法国并且通过法国使整个大陆具有这样一个反革命的方向。现在建立起来的拿破仑帝国不过是近三年来反革命势力的一连串胜利的顶峰。可以预料，一

且法国站到斜坡上，它就会往下滚，一直滚到底为止。它离底究竟还有多远，这还很难说，但是，它是在非常迅速地向它接近，这是每个人都看得清的。而假如法国过去的历史不被法国人民未来的行动所推翻的话，那末我们就有把握地预料，愈向下滚，它的后果就愈会出人意料和令人吃惊。在我们的时代，事件以惊人的速度一个跟着一个地发生，从前一个民族需要整整一个世纪才能完成的事情，现在只要几年就能轻易地完成。旧帝国维持了十四年；而这个以最拙劣的形式恢复起来的艺术品，如果它能够维持十四个月，那就算是帝国雄鹰的大幸了。以后会怎样呢？

二

乍看起来,好像现在路易一拿破仑是作为一个绝对的主宰统治着法国,好像除了他本人的权力之外,唯一的权力就是那些把他团团包围起来的宫廷阴谋家(他们为了独占这位法国独裁者的宠爱和垄断对他的影响而互相倾轧)的权力了。但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路易一拿破仑胜利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他是依靠同他的名字相联系的传统才得以在一个短时期内保持住**法国社会中相互斗争的阶级之间的均势**。因为,虽然表面上处于以军事专制作后盾的戒严状态(法国现在正处于这种戒严状态的笼罩下),社会上各个阶级之间的斗争事实上仍在继续进行,而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这场最近四年来使用火药和炮弹进行的斗争,现在只是采取了另外一种形式。像连年的战争会使甚至是最强大的国家精疲力竭一样,近几年的公开的流血斗争已经使各个阶级疲惫不堪,使他们的**军事力量**处于暂时的衰竭状态。但是,阶级之间的战争的进行,并不取决于是否采取真正的军事行动,它并不是永远都需要用街垒和刺刀来进行的;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而我们还没有听说,自假拿破仑神圣降临之日起,法国居民中间已经不存在大土地占有者和农业工人或 métayers (分成制佃农),大高利贷者和负债累累的小农,资本家和工人。

法国各个阶级的情况是:二月革命永远地推翻了大银行家和交易所商人的政权;在他们垮台之后,城市居民中其余的每个阶级

都有过一个出头的时期：首先是第一次革命骚动时期的工人阶级，其次是赖德律-洛兰时期的小资产阶级共和派，再其次是卡芬雅克时期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最后是前国民议会时期的联合的保皇派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当中没有一个阶级能够牢固地掌握住在它手中存在一时的政权。而后来当正统保皇派或土地贵族同奥尔良保皇派或金融贵族之间重新发生分裂的时候，政权看来又要不可避免地从我手中滑落，而再一次转到工人阶级手中了。当时，本来是可以指望工人阶级这一次会好好地利用政权的。但是在法国还有另外一个强大的阶级，说它强大并非因为它的成员拥有大量的个人财产，而是因为它的人数众多以及它本身的需求。这个阶级就是负债累累的小农。它至少占法国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三。像所有农村居民一样，这个阶级行动迟钝，而且也很不容易接受外来的影响；他们抱住自己的旧传统不放，不相信一切来自城市的党派的使徒所宣传的深奥道理；他们回想起过去的生活倒是自由自在，回想起皇帝在位时他们没有负债而且生活还比较富裕，因此他们就通过普选权把执政的权力交给了皇帝的侄子。社会民主党的积极鼓动，更重要的是路易-拿破仑的措施在农民当中引起的失望情绪，促使这个阶级的一部分人转到红党的队伍中来了。但是，这个阶级的大部分人仍然固执旧的传统，他们断言，如果说路易-拿破仑还没有表现出他就是人们所期待于他的那个救世主，那是由于国民议会的罪过，是由于它捆住了他的手脚。这个本人就是一个标准的、身居高位的上流社会的大骗子，而在自己周围又环绕着一群上流社会的大骗子的路易-拿破仑，除了大部分农民之外，还得到一部分最堕落最腐化的城市居民的拥护。他把这些为数众多的分子组成了一个领取津贴的组织，名字叫做十二月十日会。就这样，

依靠农民(在选举的时候),依靠一群被利用来专门摇旗呐喊的败类,依靠一支随时准备推翻由议会清谈家组成的政府的军队,同时装出一副工人阶级意志的表达者的姿态,——通过这一切,他就能够安详地等待时机,趁资产阶级议会内讧的机会行动起来,对那些经过四年的流血斗争之后全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建立自己的巩固统治权的阶级实行比较绝对的统治。他在去年12月2日就是这样行动起来的。

所以,路易一拿破仑的统治并没有结束阶级之间的战争。他的统治只是使那种有时表明了这一个或那个阶级夺取或保住政权的企图的流血冲突暂时停止。这些阶级当中没有一个阶级有足够的力量去发动一次可望取得胜利的新的战斗。阶级之间存在着分裂这件事本身,暂时帮助了拿破仑实现他的计划。他解散了资产阶级议会,摧毁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难道不应该为此而高兴吗?的确,能够希望无产者去为曾经是他们的死敌的国民议会而战吗?但是,路易一拿破仑的篡位行为同时也威胁着各个阶级的共同战场和工人阶级的最后一个有利的阵地——共和国;而一当工人起来保卫共和国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为了打击整个社会的敌人——工人阶级——而同刚刚把他们排挤走的人联合起来。在巴黎和在地方上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因此军队也就轻而易举地战胜了相互斗争和相互敌对的阶级;而在取得这个胜利之后,就利用对帝国有好感的千百万农民的投票,依靠官方一手包办的选举,建立起一个好像是近乎符合整个法国的愿望的路易一拿破仑的统治。

但是,即使是在目前,阶级斗争和阶级利益仍然是路易一拿破仑的每一个重要措施的背景,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篇文章中就可以看到。

三

我们再说一遍：路易—拿破仑所以能取得政权，是因为最近四年来法国社会各个阶级之间进行的公开的战争，使这些阶级精疲力竭，削弱了每个阶级的战斗力；而他所以能取得政权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上述这种情况下，这些阶级之间的斗争只能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方式进行（至少暂时是如此），即通过竞争、工会组织以及其他各种和平斗争的手段进行，——在英国，一百年来各个阶级就是利用这些手段互相对抗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互相斗争的阶级都希望（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有一个所谓强有力的政府，它能够镇压和制止一切小规模、地方性的、零散爆发起来的公开战争，这些战争得不到任何结果，而只会破坏新形式的斗争的发展，延迟为新的决战积蓄力量的过程。这种情况多少可以说明法国人普遍顺从现在的政府这样一个无容争辩的事实。究竟要到什么时候，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都能重新积蓄起足够的力量和具有充分的自信，能够出来公开为自己要求对法国的专政呢？这当然谁也无法断定。但是由于现今事变的迅速发展，这两个阶级当中的任何一个阶级都有可能突然出现在战场上，这样，阶级反对阶级的斗争在街头重新爆发的时间，就可能比根据双方相对的或绝对的力量所能预料的要早得多。因为，如果法国的革命政党即工人阶级政党一定要等待 1848 年 2 月时的力量对比重新出现，那末它势必要在上十年的时间中俯首听命，安分守己，——当然它不会这样做。

Vol. II.] Saturday, March 27, 1852. [No. 48.

NOTES

TO

THE PEOPLE.

BY

ERNEST JONES,

OF THE MIDDLE TEMPLE, BARRISTER AT LAW,

Author of the Wood Spirit, Lord Lindsay, My Life, History of the Working Classes, Confessions of a King, Recollections of a Student, The New World, Beldigon Church, Painter of Florence, Canterbury versus Rome, &c., &c.

PRICE TWOPENCE.

CONTENTS:

The Parish - Artisan	=	=	525	Lakers Grievances	=	=	527
Current Notes	=	=	525	THE CHARTER MOVEMENT	=	=	527
Women's Wrong	=	=	525	Continental Notes	=	=	528

London:

J. PAVEY, 47, HOLYWELL STREET

1852.

Green & Co., Printers, 27, Great Street, Holborn.

Read in this Number "Continental Notes."

Read in this Number "Current Notes, No. 1."

Read in this Number "Charter Reports, 1."

載有弗·恩格斯的“去年十二月法國無產者相對消極的
真正原因”一文的“寄語人民”雜誌的扉頁

载有弗·恩格斯的“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
真正原因”一文的“寄语人民”杂志的扉页

同时,像路易一拿破仑政府这样的政府,也必然(这一点我们以后还会不止一次地看到)把自己和法国引向最终必须用巨大的革命爆发来加以解决的那种困难境地。我们不谈战争的可能性或者是其他可能发生或不能发生的事件;我们只想谈谈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之必将到来,就像早晨太阳必将升起一样。这就是商业和工业的普遍震动。1846年和1847年工商业的不景气和农业的歉收引起了1848年的革命。十之八九,1853年全世界的工业和商业将经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深刻的震动,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长久地处于混乱状态¹¹³。有谁能够预料由路易一拿破仑驾驶的大船十分牢固,足以抵挡得住必将爆发的风暴呢?

但我们还是就拿这只低能的雄鹰在他胜利的日子里所处的状况来谈吧。支持他的是军队、僧侣和农民。反对他的意图的是资产阶级(包括大土地所有者)和社会主义者即革命的工人。在他成为政府的首脑以后,他不仅必须立即保持住那些帮他取得政权的集团,而且要把那些过去一直反对他的人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或者至少也要尽可能让这些入安于新的秩序。至于军队、僧侣、政府官吏以及很久以来他就已经纠集在自己周围的那帮追名逐利的阴谋家:所需要的只是直接贿赂、现金以及公开抢劫国家的财产。我们已经看到路易一拿破仑如何敏捷地支付现金,或是把他的朋友们安插到最能使他们暴富起来的肥缺。就拿戴莫尔尼来说吧:他在上任的时候还是个满身债务的穷光蛋,而过了四个星期之后他已经十分得意了,他不仅还清了债,而且还大大捞了一把,其数目甚至连贝尔格莱夫广场¹¹⁴一带的人也都认为相当可观!但是对待农民,对待大土地所有者,对待国家有价证券持有者,对待银行家、工业家、船主、商人、小资产者,以及对待当代最严重的问题——工人

问题,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虽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强迫所有的人沉默,但是各个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的对立依然如故,——尽管能够宣扬这个不愉快的事实的报刊、议会和会议讲坛都已经不存在;因此,政府要做任何有利于一个阶级的事,都必然触犯另一个阶级的利益。路易一拿破仑做任何事,到处都会遇到“谁来付款?”这样一个问题。由于这个问题而被推翻的政府的数目,比所有其他问题——民军问题、改革问题等等——加起来还要多。尽管路易一拿破仑强制他的前任路易一菲利浦支付了这笔款项的很大一部分¹¹⁵,但是剩下要支付的还有很多。

以后我们还要考察法国社会各个不同阶级的状况,弄清楚现政府是否有办法改进这种状况。同时,我们还要考察这个政府为此目的做了什么尝试,以及将来大概还会做些什么尝试,这样我们就可以收集到一些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就能对那个目前正在尽力玷污拿破仑的名字的人的现状和命运作出正确的结论。

弗·恩格斯写于 1852 年 2 月—4 月初
载于 1852 年 2 月 21 日、3 月 27 日和
4 月 10 日“寄语人民”第 43、48 和 50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寄语人民”

卡·马克思 致“科伦日报”编辑部的声明

“科伦日报”¹¹⁶第 51 号发表的巴黎 2 月 25 日的一篇通讯的作者就所谓德法密谋¹¹⁷写了下面一段话：

“有些被告已经潜逃，其中有个名叫阿·迈尔的人，据说是马克思及其同伙的代理人……”

这种不仅给我增添了“同伙”而且增添了“代理人”的说的欺骗性从下列事实就可以看出。阿·迈尔是卡·沙佩尔先生和前普鲁士陆军中尉维利希的一个密友，他曾在他们领导的流亡者委员会¹¹⁸中当会计师。关于这个同我毫不相干的人离开伦敦一事，我只是从我的一个日内瓦的朋友的来信中才得知的。我的朋友告诉我，有一个名叫阿·迈尔的人以最荒谬的指责对我进行攻击。最后我从法国报纸上了解到这个阿·迈尔原是一位“政界人物”。

卡尔·马克思

1852 年 3 月 3 日于伦敦

载于 1852 年 3 月 6 日
“科伦日报”第 5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科伦日报”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流亡中的大人物¹¹⁹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于

1852年5—6月

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第一次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

1930年版第5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歌颂吧，永垂不朽的灵魂，为有罪的人的
赎罪”¹²⁰……通过哥特弗利德·金克尔。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生于四十年前。他的生活在“哥特弗利德·金克尔。毫无虚构的真实情况。传略”这本由阿道夫·施特罗特曼出版（1850年汉堡霍夫曼和康佩出版社版，八开本）¹²¹的自传中已有描述。

哥特弗利德是民主主义的济格瓦特时期¹²²的英雄，这个时期在德国产生了无限的爱国主义的苦闷和泪如泉涌的悲伤。哥特弗利德就是以平庸的抒情的济格瓦特的姿态初露头角的。

他的日记又长又乱（他的世俗生活就是带着这样的特点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他的表白也同样杂乱无章，这一切都应归功于使徒施特罗特曼，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位使徒的“七拼八凑的叙述”。

波恩 1834年2月—9月

“年轻的哥特弗利德和他的朋友保尔·泽勒尔一同研读福音神学，他以勤勉和虔诚博得了他的著名教师（扎克、尼茨施和布列克）的尊重。”（第5页）

一开始我们便看到他“显然是沉溺于深思”（第4页），他“悲伤而忧郁”（第5页），完全像一个 *grand homme en herbe*（未来的伟人）所应该表现的那样。“哥特弗利德的褐色的、闪烁着忧郁的火光的眼睛注视着”几个“穿棕色燕尾服和浅蓝色外套的”大学生，他

立刻感觉到，这些大学生“力图用外表的华丽来掩饰内心的空虚”（第6页）。他感到道义上的愤慨是因为他“拥护黑格尔和马尔海奈凯”，而这些大学生竟骂马尔海奈凯是“蠢才”。后来，当这位候补神学家为了继续求学而到柏林去，并且要亲自求教于马尔海奈凯的时候，他在日记中针对马尔海奈凯抄下了下列的文学名言（第61页）：

“我说，徒爱空想的那是蠢人，
那犹如一匹着了魔的畜生，
不管周围都有牧场美好青青，
却在干枯的荒原上四处找寻。”¹²³

不过，哥特弗利德在这里忘记了麦菲斯托费尔用来取笑渴求知识的学生的另一句名言：

“你尽管蔑视理智，蔑视科学！”¹²⁴

整整这一个有教益的大学生事件只是一个序幕，是为了给世界未来的解放者一个机会来作如下的表白（第6页）。

于是哥特弗利德说：

“假如没有战争，这一代是始终不会灭亡的……只有十分有力的手段才能帮助我们这个衰微的时代！”

而他的朋友回答道：

“你是新洪水中的挪亚，但又比他更胜一筹。”

由此可见，浅蓝色的外套使哥特弗利德蒸蒸日上，甚至可以宣布自己是“新洪水中的挪亚”了。他的朋友对这一点提出了下列的评语，这个评语可以作为传记的题词：

“我和父亲时常暗笑你偏爱模糊的概念！”

在一个美丽的灵魂的所有这一切表白中，只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不断重复出现，那就是金克尔早在胎儿时期就已经是一个伟人了。一切平凡的人身上所发生的最平凡的事情，在他那里都成了意义深重的事件。每个候补神学家比金克尔更有意思地经历过的那些不值一提的痛苦和欢乐，在德国任何神学院学生宿舍中和任何教会法庭中屡见不鲜的跟小市民环境的冲突，在这里都成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严重事件，而浸沉在人间苦痛之中的哥特弗利德总是要趁这些机会表演一场喜剧。

友人保尔的家要离开波恩回维尔腾堡去。哥特弗利德便把这件事按下述方式搬上了舞台。哥特弗利德爱保尔的妹妹，并且声明连这一次他“已经爱过两次了”。但是这次的爱情不是寻常的爱情，而是“对上帝的热烈而真诚的崇敬”（第 13 页）。哥特弗利德和友人保尔一起登上了龙岩，并在这个具有浪漫色彩的背景的衬托下迸发出下面的颂歌：

“别了，友谊，我将认救世主为兄弟！别了，爱情，信仰将是我的未婚妻！别了，你的爱恋之情，我将和成千成万正直的人结合在一起！去吧，我的年轻的心，学会单独和你的上帝在一起，和他战斗，直到你战胜他，直到他赋予你新的名字，除了得到它的人以外谁也不知道的圣以色列这个名字！你好，壮丽的初升的太阳，我的觉醒的灵魂的影象！”（第 17 页）

这样，和朋友的离别成了哥特弗利德狂热地颂赞自己的灵魂良机。但是这还不够，朋友也应该同声齐唱。在这个热烈地倾吐胸怀的时刻，哥特弗利德讲话时“声音激昂，容光焕发”，他“忘记有朋友在场”，“他的眼光闪烁着喜悦”，“他的呼声充满了狂喜”，如此等等（第 17 页）。一句话，就像旧约全书中先知以利亚的出现一样。

“保尔以忠实的眼光带着忧郁的微笑看着他，并说道：‘在你的胸中跳动着一颗比我更勇敢的心，你，当然，将胜过我，但允许我在远离你的地方仍然做你的朋友。’哥特弗利德高兴地握住向他伸出的手，重新肯定了旧有的同盟。”（第 18 页）

在高山上的改变形象这一场戏里，哥特弗利德达到了他所想达到的目的。友人保尔不久前还嘲笑“哥特弗利德偏爱模糊的概念”，现在却对“圣以色列”这个名字佩服得五体投地，承认哥特弗利德的高超和未来的伟大。哥特弗利德欣喜若狂，随即友好宽厚地重新肯定了旧有的同盟。

* * *

布景换了。金克尔的母亲，上加塞尔的牧师金克尔的妻子的生日。家庭的节庆也成了炫耀的机会，“可敬的母亲像救世主的母亲一样，也叫马利亚”（第 20 页）。毫无疑问，这就是预示着哥特弗利德也要做世界的救主和赎罪者。这么一来，在传记的头二十页内，通过一些不值一提的事件，神学系的大学生便先后被描绘成**挪亚**、**圣以色列**、**以利亚**以至**基督**了。

* * *

实际上什么经历也没有的哥特弗利德，在生活的过程中自然要不断地挖掘他的内心的感受。他作为传教士的儿子和未来的神学家所特有的虔敬主义，是同他的天生的精神上的软弱和矫揉造作地故作忙碌的行为完全相适应的。我们知道，他的母亲和姐姐都虔信宗教，哥特弗利德也充分意识到自己是有罪的。这种虔诚的赎罪观同普通大学生的“快乐的富于生趣的消遣”发生了冲突，而从他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使命来看，这种冲突在他身上便成了宗教和诗意的斗争；上加塞尔牧师的儿子和一伙同学一起喝下的一

杯啤酒也变成了体现浮士德的两个灵魂搏斗的极不幸的一杯。从对虔诚的家庭生活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母亲马利亚”如何反对“哥特弗利德向往剧院的罪恶心意”（第 28 页），这种被认为是未来诗人的征兆的意味深长的两面性，实际上只是表明哥特弗利德对演员的矫揉造作的偏爱而已。后来他的姐姐约翰娜被说成是一个虔诚的悍妇，据说有一次她打了一个五岁的女孩一记耳光，因为那个女孩子在教堂中不专心。我们在书末发现，正是这位约翰娜姐姐最激烈地反对哥特弗利德同莫克尔小姐的婚事，否则宣扬这一页家庭丑史便是不可理解的了。

哥特弗利德在泽尔舍德作了“一次关于枯萎中的麦种的宏伟的讲道”，这也被当作一个重大事件。

* * *

泽勒尔一家和“心爱的爱利莎”终于起程了。我们看到，哥特弗利德“热烈地握着姑娘的手”并深情地低声对她说：“爱利莎，再见了！别的话我不敢多说。”在这一段有趣的情节以后，接着便是第一声济格瓦特式的叹息：

“毁灭了！”“默默无言！”“柔肠寸断！”“灼热的额头！”“深沉的叹息！”“剧痛浸透了他的脑髓”等等。（第 37 页）

这样，这一整场摹仿先知以利亚的表演，就成了演给“朋友保尔”和自己看的一场纯粹的喜剧。保尔也重新出现在舞台上，向孤独而悲痛的济格瓦特低声耳语：“这一吻给我的哥特弗利德。”（第 38 页）

哥特弗利德又高兴起来了。

“只有当我配得上我的亲爱的人并有了名望的时候，我才再和她相见，我的这个决心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定。”（第 38 页）

就是在为爱情而苦闷的时候，他也没有停止思考未来的名望和预先向人炫示桂冠。哥特弗利德运用这一插曲，是为了以难以想像的浮夸把他的恋爱故事记载在纸上，以便世界不致失掉他那些只存在于日记本上的感情。不过，这场戏的主要效果还没有达到。忠实的保尔不得不请他的打算征服世界的导师注意这种情况，如果爱丽莎停止了前进，而他继续不断地发展，那时，爱丽莎也许就不再能使他满意了。

哥特弗利德却庄重地说：“呵，不会的！这朵天上的花朵刚要开放便散发出如此浓郁的芳香。当……男性力量的炎夏的日光打开了内心的花瓣的时候，又将会怎样呵！”（第40页）

保尔不得不对这种不恰当的比喻提出反驳，说理性上的理由不能使诗人信服。

“哥特弗利德微笑着回答道：‘您的全部智慧就像我们的可爱的疯狂一样，毕竟不能使您摆脱命运的波折。’”（第40页）

对着自己微笑的纳尔苏修斯¹²⁵，一幅多么动人的画面！笨拙的候选者突然装扮成可爱的狂人，保尔变成了这位大人物所喜爱的瓦格纳¹²⁶，而这位大人物“微笑着”，“他甚至温柔而友爱地微笑着”。效果达到了。

* * *

哥特弗利德终于离开了波恩。在波恩，他在学识上达到了高峰，他对此做了如下的总结：

“可惜，我同黑格尔派离得愈来愈远了；成为一个唯理论者，这是我最衷心的愿望，但是我同时又是超自然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而必要时甚至还是一个虔敬主义者。”（第45页）

这幅自画像是任何东西都不必再增添了。

柏林 1834年10月—1853年8月

哥特弗利德脱离了贫乏的家庭生活和大学生活，来到了柏林。但是我们看不到这个大城市（至少和波恩比较起来）的生活情况对他发生任何影响，也看不到他参加当时的学术运动的任何迹象。哥特弗利德的日记中记载的，只是他同新的 *compagnon d'aventure*（冒险伙伴），巴门的胡果·杜恩韦克共同感受的内心激动，以及可怜的神学家的一些小小的不愉快，金钱上的窘困，破旧的燕尾服，评论员的身分等等。他的生活和都市的社会生活完全没有任何联系，只是在施略辛的家庭的圈子里打转。在这个家庭里，杜恩韦克泰然自若地充作**沃尔弗拉姆^①大师**，而哥特弗利德则充作**斯特拉斯堡的哥特弗利德大师**（第67页）。爱利莎的形象在他的心中渐渐暗淡下去；哥特弗利德又迷恋于玛丽·施略辛小姐了；他不幸得悉爱利莎同他人订婚的消息，最后他概述了他在柏林“**模糊地思念那个本来应该完全属于他的女人**”时的心情和想法。

但是，没有得到不可缺少的戏剧性效果，决不能离开柏林。

“在他离开柏林之前，老魏斯（导演）又一次把他带进剧院。这位殷勤的老人指着陈列德国剧作家的半身像的人厅里的几个空着的壁龛，并意味深长地说道：

‘还有空着的位置！’

这时，一种奇异的感觉控制了这个人。”

哥特弗利德非常泰然自若地接受了这个老滑稽演员所作的“未来的永垂不朽”这种过分的夸奖；为普拉顿的孽徒哥特弗利德预备的这个位置的确还空着。

^① 即沃尔弗拉姆·冯·埃申巴赫。——编者注

波恩 1835 年秋—1837 年秋

“他经常动摇于艺术、生活和科学之间，这三方面他都研究，但是没有固定的意向，他希望在他决定不下从事哪一门的情况下在每一方面都尽可能多地知道一些，得到一些，甚至创造一些。”（第 89 页）

哥特弗利德意识到自己是个犹豫不决的学识肤浅的人，于是他回到波恩。感觉到自己的学识肤浅自然并不妨碍他去考取学位并担任波恩大学的讲师。

“无论是夏米索，或是克纳普都不顾在他们出版的年鉴¹²⁷上发表他投去的诗篇，这件事使他非常烦恼。”（第 99 页）

这就是大人物想在社会舞台上显露头角的初次尝试，而他在个人的生活圈子里一直是凭吹嘘他的未来的伟大度日的。从这时起他便最终成为大学生文艺小组中颇成问题的当地名人，直到他在巴登遭到射击负了轻伤而一举成为德国小市民的英雄为止。

“在金克尔的胸中逐渐激起对永久和忠实的爱情的苦闷，这种苦闷是任何工作都无法排除的。”（第 103 页）

这种苦闷的第一个牺牲品，是一个叫敏娜的姑娘。哥特弗利德和敏娜演起戏来，为了玩花样，有时他竟扮作慈悲的马哈德伐¹²⁸，要这位姑娘把他当作神来崇拜，而他则关切姑娘的健康。

“如果关于她的状况金克尔能够欺骗自己的话，那末他是会爱她的；不过他的爱情只能加速这朵凋萎中的玫瑰的死亡。敏娜是第一个能够了解他的姑娘；不过她会成为他的第二个希姑葩^①，她生下的不是孩子而是火炬，双亲的火焰会通过孩子烧毁自己的房屋，就像柏里亚的特洛伊城被烧毁一样。但是

① 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特洛伊国王柏里亚的妻子，伟大英雄赫克托尔的母亲。——译者注

他不能离开她，他为她柔肠寸断，他的痛苦不是由于爱情，而是由于同情。”

这位非凡的英雄（他的爱情，如丘必特的目光那样，能致人于死命），其实不过是个庸俗的、经常忙于装扮自己的花花公子，他在选择未婚妻时最初总是想把自己扮成一个多情郎。此外，他所谓的病状以及它对可能出世的孩子们的后果等那些令人作呕的议论，变成了一种卑鄙的打算，因为他并没有断绝这种关系，而是在这种关系中寻求内心的充分的自我满足；只是在这种关系使他有机会去演一出新的情节剧的时候，他才割断了它。

哥特弗利德到他的一个刚死了儿子的舅父家去。在可怕的半夜里，就在灵旁，他和他的表妹爱利莎第二小姐表演了一场很富于贝里尼的歌剧风味的戏：“在遗骸旁”和她订了婚约，第二天早晨便顺利地舅父接纳为未来的女婿。

“他也时常想到敏娜，想到他必将重新见到她的时刻，那时她已永远地失去了他；但是他并不害怕这个时刻，因为她不能向一颗早已交给了别人的心提出任何要求。”（第 117 页）

订立新的婚约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同敏娜的关系导向使“义务和热情”发生矛盾的戏剧性的冲突。这个冲突是通过极端庸俗的卑鄙行为实现的；体面的小市民竟然自认为敏娜对他那“已经交给了别人”的心提出要求是不合法的。虽然这种怯懦的自我欺骗是靠事后捏造“交心”的日期来维持的，但是这种情况当然不会使有德行的大人物感到丝毫困窘。

于是哥特弗利德在耐人寻味的必要情况下，伤害了“可怜的伟大的心”。

“停了一会哥特弗利德继续说：‘同时我感到应当请求您的宽恕，亲爱的

敏娜，也许我在您面前是有罪的…… 敏娜，昨天我那样亲切地伸给您的这只手，再也没有自由了，我已经订婚了！”（第 123 页）

不过这位传奇式的候补神学家很谨慎，他告诉她订婚是在他“那样亲切地”向她伸出手之后的几小时以后发生的。

“天啊！…… 敏娜，您能原谅我吗？”（同上）

“我是个男子，应该忠于自己的义务，我不应该爱您！但是我并没有欺骗您。”（第 124 页）

在这个事后增添的道义上的义务出现之后，就该去作令人难以想像的事——有成效地颠倒整个关系了：仿佛不是敏娜宽恕他，而是道德高尚的伪善者宽恕被欺骗的敏娜。于是抱着这个目的又去捏造了一套：敏娜“会从运处怀恨他”，由于这个假想，最后又添上了一段道德说教：

“我愿意原谅您，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可以预先就相信我会宽恕您。而现在要永别了！我的义务在召唤我，我不得不离开您了。”于是他缓步走出了凉亭…… 从这一刻起哥特弗利德便感到自己是不幸的。”（第 124 页）

喜剧演员和臆想的情人变成了伪善者，以假惺惺的宽恕一切的姿态脱了身。济格瓦特通过臆造的恋爱纠纷，顺利地达到了能够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不幸的人的目的。

真相终于大白，原来这一切捏造的恋爱波折，只是哥特弗利德的一幅矫揉造作的自画像。整个事情的过程是这样：幻想将来要永垂不朽的伪善者，把旧约全书中的故事同施皮斯、克劳伦和克拉麦尔式的时髦的“流动图书馆”幻想揉合在一起，并且陶醉于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浪漫的英雄人物。

“他在翻书的时候，偶然发现了诺瓦利斯的‘奥夫特丁根’¹²⁹，后者还在一年前就时常鼓舞他去从事诗的创作。当他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時候，他就同几

个同学成立了一个名叫‘条顿’的小组，小组成员给自己规定的目的是一起学习德国历史和文学，他当时用的笔名就是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现在他才明白了这个名字的意义。他感到自己就是瓦特堡下面的可爱的小城里的那个亨利希，对‘蓝色花朵’的思念不可抗拒地攫住了他。但是，不管他怎样质问他的心，敏娜和他的未婚妻都决不是那童话中的闪闪发光的花朵。他陷入了幻想，如饥如渴地继续读下去，光怪陆离的世界围住了他，最后，他哭着倒在沙发上，思念着‘蓝色花朵’。”

在这里，哥特弗利德泄露了他用来掩饰自己的全部浪漫的谎言；爱伪装，力图穿上别人的盛装，这就是他的真正的“内在本质”。他从前把自己称为斯特拉斯堡的哥特弗利德，现在又装扮成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而他寻找的根本不是“蓝色花朵”，而是会把他认作这种角色的女人。最后，他终于在一个和他共同演出了一出符合他们的理想的喜剧的女人身上，找到了这种“蓝色花朵”，虽然这花朵已经有点枯萎了。

这一套伪造的浪漫故事，这种对古老传说和冒险故事的拙劣可笑的摹制品（哥特弗利德的天资不足，这是他从别人那里抄袭来的），所有这些感情上的幻觉，即同玛丽、敏娜、爱丽莎第一和爱丽莎第二的毫无根据的冲突，竟使他以为他已经达到了歌德的感受这样的高度。歌德在狂烈地恋爱之后，突然去意大利，并在那里写他的“哀歌”，同样，哥特弗利德在陶醉于臆想的恋爱之后，认为现在也应该旅行到罗马去。歌德已预感到哥特弗利德：

“连鲸鱼身上也有虱子，
我怎能摆脱它们的骚扰？”¹³⁰

意大利 1837年10月—1838年3月

哥特弗利德在日记中连篇累牍地描绘了从波恩到科布伦茨的

旅程,这是罗马之行的开始。

新的时期开始了,和前一时期的结束完全一样,即把别人的遭遇和感受全套用到自己身上。哥特弗利德在轮船上想起了“霍夫曼的出色的刻画”,这位作家“使他的约翰奈斯·瓦赫特师傅在刚刚经历了极大的痛苦之后创造出具有高度艺术水平的作品”¹³¹。为了证实这种“出色的刻画”的属实性,哥特弗利德在经历了因敏娜而引起的“极大的痛苦”之后,便终日一心“想着那早已考虑成熟的悲剧”。(第 140 页)

在金克尔从科布伦茨到罗马的旅途中,发生了如下的事件:

“他的未婚妻的情浓意深的来信(他经常收到,通常是立刻回信)驱散了阴郁的思想。”(第 144 页)

“对美丽的爱利莎的爱情,在年轻人的思念的胸中深深地扎下了根。”(第 146 页)

* * *

在罗马发生了如下的事件:

“抵达罗马以后,金克尔在那里看到了未婚妻的来信,这使他更加爱她,而敏娜的形象便愈来愈退居次要地位。他的心暗暗告诉他,爱利莎能够使他幸福,他非常兴奋地沉溺于这种感觉……只是现在他才学会了爱。”(第 151 页)

于是,他从前只是“由于同情”才爱恋的敏娜又重新出现在他的感情的舞台上。至于同爱利莎的关系,他幻想爱利莎能使他幸福,而不是他给她幸福。而在幻想“蓝色花朵”时,他早就预言过,无论是爱利莎或是敏娜,都不可能成为这个使他充满了强烈诗兴的童话中的花朵的化身。他胸中重新激荡起对这两个姑娘的感情,是为了编排新的冲突:

旅程,这是罗马之行的开始。

新的时期开始了,和前一时期的结束完全一样,即把别人的遭遇和感受全套用到自己身上。哥特弗利德在轮船上想起了“霍夫曼的出色的刻画”,这位作家“使他的约翰奈斯·瓦赫特师傅在刚刚经历了极大的痛苦之后创造出具有高度艺术水平的作品”¹³¹。为了证实这种“出色的刻画”的属实性,哥特弗利德在经历了因敏娜而引起的“极大的痛苦”之后,便终日一心“想着那早已考虑成熟的悲剧”。(第 140 页)

在金克尔从科布伦茨到罗马的旅途中,发生了如下的事件:

“他的未婚妻的情浓意深的来信(他经常收到,通常是立刻回信)驱散了阴郁的思想。”(第 144 页)

“对美丽的爱利莎的爱情,在年轻人的思念的胸中深深地扎下了根。”(第 146 页)

* * *

在罗马发生了如下的事件:

“抵达罗马以后,金克尔在那里看到了未婚妻的来信,这使他更加爱她,而敏娜的形象便愈来愈退居次要地位。他的心暗暗告诉他,爱利莎能够使他幸福,他非常兴奋地沉溺于这种感觉……只是现在他才学会了爱。”(第 151 页)

于是,他从前只是“由于同情”才爱恋的敏娜又重新出现在他的感情的舞台上。至于同爱利莎的关系,他幻想爱利莎能使他幸福,而不是他给她幸福。而在幻想“蓝色花朵”时,他早就预言过,无论是爱利莎或是敏娜,都不可能成为这个使他充满了强烈诗兴的童话中的花朵的化身。他胸中重新激荡起对这两个姑娘的感情,是为了编排新的冲突:

在他当然地预先高度享受了“将遍布全球的未来的荣誉”以后，便露出了市侩伪君子的卑鄙的嘴脸。他估计，也许将来爱利莎的陷入贫困的孩子会来求助于伟大的诗人，而“他倒并不想过早地回避这件事”。为什么？因为爱利莎“宁要乘马”而不要哥特弗利德经常幻想的“未来的荣誉”，因为她为了“世俗的幸福”而摈弃了他希望在其中扮演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的那出滑稽的喜剧。老黑格尔早就正确地指出，高尚的意识总是转变成卑鄙的意识¹³³。

波恩 1838年夏—1843年夏
(阴谋和爱情)

哥特弗利德在意大利歪曲地模仿了歌德之后，决定回国后表演席勒的“阴谋和爱情”。

虽然哥特弗利德的心灵因世界悲哀而受到难堪的折磨和煎熬，他的身体却“比任何时候都好”（第167页）。他打算“通过著作使自己在文学界成名”（第169页），不过，后来当“著作”并没有能使他在文学界成名的时候，这并没有妨碍他不靠著作而给自己争得更廉价的名望。

哥特弗利德经常因追求“女人”而感到的“模糊的苦恼”表现在对婚约的朝订暮改上。订婚是强者和“未来的”高超的智者力图征服和束缚住所爱的人的标准的方式。当他一发现那使他得以扮演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的蓝色花朵的时候，诗人那种温柔的、模糊的感伤的幻想便凝结成候补者的非常明朗的思想：用“义务”的纽结来补充那理想的心灵上的亲和力。这种一见面便^ua tort et ^ua travers（不加选择地）追求同所有的雏菊和百合花订婚的庸俗行

为，使哥特弗利德为了证明他的“诗人的伟大的痛苦”而不停地倾吐衷肠时所装出的那副矫揉造作的姿态变得更加令人作呕。

因此，从意大利回来以后，哥特弗利德当然又应该“订婚”了。这一次是他的姐姐，即其虔诚的宗教狂热早被哥特弗利德用感叹词在日记里永久记载的那个约翰娜，直接给他指明了使他苦闷的对象。

“比格霍耳德恰巧在这几天宣布他同金克尔小姐订婚，而比任何时候都缠得更紧地干涉弟弟的恋爱事件的约翰娜，由于种种原因和家庭方面的考虑（这些最好不谈），希望哥特弗利德也同她的未婚夫的妹妹索菲亚·比格霍耳德小姐结婚。”（第 172 页）“金克尔”——不言而喻——“应该无条件地爱慕那位温顺的姑娘…… 那是个可爱的纯洁的姑娘”（第 173 页）。“金克尔以非常的柔情”——这是不言而喻的——“获得了她的双手”，“只要”——这是不言而喻的——“他在生活上有一个可靠的地位并且能够使她的未婚妻”——这又是不言而喻的——“有一个教授的或牧师的和睦家庭，幸福的双亲就会高高兴兴地立刻把她许配给他”。

充满热情的候补者在每次冒险中表现出来的对结婚的向往，这一次以下面的优美诗句洋溢在纸面上：

“我什么也不需要，
只要那白白的小手。”

其余的一切，眼睛、嘴唇、鬃发，他都认为是“空虚的东西”。

“这一切我都不需要，
只要那白白的小手！”（第 174 页）

遵照“比任何时候都缠得更紧的姐姐约翰娜”的命令，并且由于经常使他心痒的对“小手”的爱慕，他同索菲亚·比格霍耳德小姐结下了私情，他把这种私情同时叫做“深刻的、牢固的和平静的”爱情（第 175 页），‘在这新的爱情中宗教的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 176 页)

事情是这样：在哥特弗利德的恋爱故事中宗教的因素经常同浪漫的和戏剧的因素互相交替。当哥特弗利德没有能够通过戏剧的效果在新的济格瓦特式的境况中显示自己的时候，他便求助于宗教的感情，以便赋予平庸的故事以比较高尚的意义。济格瓦特变成了虔诚的荣克—施梯林¹³⁴，上帝赋予了后者非凡的力量，三个妻子都死在他的男性的怀抱中，而他还能再同新的情人“结婚”。

* * *

最后，我们就要谈到这个充满事件的生命中的极不幸的灾难，即施梯林同那个和马蒂约离了婚的女人约翰娜·莫克尔相识一事。哥特弗利德在她身上找到了女性的金克尔，他的幻想的 alter ego (第二个“我”)，只是更坚强，更聪明，更清醒，并由于年龄大而已经摆脱了初期的幻想。

莫克尔和金克尔的共同之点是两人都没有得到世界的承认。她有令人讨厌的庸俗的面貌；她的第一次的婚姻是“不幸的”。她有音乐才能，但是还不足以用她的作品或演奏技巧来博得声誉。在柏林，她曾经企图模仿蓓蒂娜^①的过了时的稚气，但是遭到了完全的失败。她的经验使她的性格变得残酷了。她和金克尔一样，曾经喜爱装腔作势和无限夸张地赋予自己生活中的平凡事件以“崇高的”性质，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对爱情的迫切“需要”（施特罗特曼的话）比起用诗歌大谈爱情的需要来是愈来愈强烈了。金克尔在这方面的女性的东西，在她那里成了男性的东西。因此，这样的女人自然很高兴同金克尔表演一出未被承认的美丽的灵魂的喜剧，直到

① 即阿尔宁。——编者注

互相满足为止，就是说，把济格瓦特认作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并让他把她当作“蓝色花朵”。

金克尔刚刚通过姐姐的帮助顺利地进行了第三次或者已是第四次的订婚，现在立刻又被莫克尔引入了爱情的迷宫。

哥特弗利德置身在“团体的浪潮”（第 190 页）里，即在德国大学城里的一个不大的教授小组（或者叫做“特权小组”）里，这些小组只能在基督教德意志的候补者的生活中开辟新的纪元。莫克尔唱着歌，并且陶醉在掌声里。哥特弗利德被安置在她的座位旁边，于是便演出了下面这场戏。

“哥特弗利德说：‘当你在大家的啧啧称赞下张开天才的双翼在快乐世界的上空飞翔的时候，你大概感到心旷神怡吧。’莫克尔激动地反驳道：‘那是您的感觉。我听说您有非常好的诗才；也许您也会受到极口赞扬……那时我将问您，您幸福吗，如果您不……’‘如果我不？……’——哥特弗利德在她停顿下来的时候问她。”（第 188 页）

笨拙的多情善感的候补者上钩了。

在这以后，莫克尔告诉他说，不久前她

“听了她关于基督受难的传道，她想，这个漂亮的青年真正弃绝了尘世，他甚至唤醒了她胸中的因心灵中纯朴的梦想而引起的轻微痛楚，这种梦想从前是由那已失去的信仰之声所唤起的。”（第 189 页）

哥特弗利德被这一段恭维话弄得“神魂颠倒”（第 189 页）了。他异常高兴地“确信莫克尔是不幸的”（同上）。他立刻决定“以自己耶稣基督拯救世界的热烈的、感人的信仰”，“重新赢得……这个痛苦的人的心灵”（同上）。因为莫克尔是天主教徒，所以关系是在要“为全能的上帝效劳”就必须赢得人的心灵这个臆造的借口下建立起来的，这是一出莫克尔也参加演出的喜剧。

*

*

*

“在 1840 年间金克尔也被任命为科伦福音公会的牧师助手，他开始每星期日早晨到那里去讲道。”(第 193 页)

传记作者的这个说明提醒我们谈一谈金克尔在神学中的立场问题。“在 1840 年间”，批判已经最无情地分析了基督教的内容，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科学的……^①同国家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在这个时期，金克尔当了传教士。但是他既没有正统派的毅力，又缺乏客观地理解神学的能力，他^à la (正如) 克鲁马赫尔一样，是通过多情善感的空谈同基督教勾搭上的，他把基督描绘成“朋友和老师”，企图抛弃基督教在形式上的一切“丑陋的东西”，并且用好听的空话来偷换它的内容。用形式偷换内容、用空话偷换思想这套手法在德国造就了整整一批牧师空谈家，他们自然是要把民主当作自己最后的避难所。讲神学有时总还需要有一些哪怕是表面的学问，讲民主则相反，好听的空话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在这里，毫无内容的响亮的空谈，nullité sonore (空谈) 完全代替了对问题的见解和看法。金克尔研究神学不过是从基督教教义中摘录一些感伤的东西，采取克劳伦的方式加以阐述，在他的演说和著作中，显示出这种牧师饶舌的典范，这种饶舌有时也被叫做“散文诗”，而且他可笑地企图以此来证明他有“诗才”。不过，他创作诗的目的[不]^②是要种植真正的月桂树，而是要栽培毒莓来装饰他那平凡的小径。他想用方便的形式而不想在本质上解决冲突，这种性格上的软弱也在他的大学讲师的位置上表现出来了。他“模仿大学生”的举止，来回避同职业上的旧的学究气作斗争，于是，讲师变成了大学生，而大学生则上升为大学讲师。这一派里出现了整

① 下面的字是“运动”、“批判”，在原稿中已被划去。——编者注

② 这里原稿被弄坏了。——编者注

整一代的施特罗特曼们、叔尔茨们以及同他们类似的人物，这些人归根到底只能在民主的怀抱里说他们的漂亮的空话，研究他们的学问，完成他们的无足轻重的“崇高使命”。

* * *

新的恋爱关系现在具有了关于小公鸡、小母鸡^①和小鸡蛋的小故事的性质。

1840年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一方面，黑格尔哲学对于神学和政治的批判的运用使科学革命化；另一方面，随着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登位开始了资产阶级的运动，而资产阶级的立宪要求在当时还是十分激进的。那时写作模糊的“政治诗歌”的现象逐渐消失，而定期刊物具有强大革命力量这种新气象出现了。

哥特弗利德这时候做了些什么呢？莫克尔同他一起创办了“小金虫，文人雅士的杂志”和“小金虫协会”。这个刊物

“唯一的宗旨就是为亲密友好的小集团每周举行一次欢畅的和快乐的晚会，并使参加者能够把自己的作品供爱好艺术的善意的批评家们评断”。（第219页）

“小金虫协会”的真正宗旨是要解决蓝色花朵之谜。集会是在莫克尔家中举行的，在从事美文学的平庸的大学生圈子里，莫克尔当然要被捧为“女王”（第210页），金克尔则被捧为“大臣”（第255页）。这两个未被承认的美丽的灵魂可以在“小金虫协会”里自得其乐，以补偿“无情的人世给予他们的不公正的待遇”（第296页）。他们可以在他们所选择的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和蓝色花朵的角色中互相满足对方的需要，而扮演他人成了自己的第二天性的哥

① 原文中是俏皮话：《Hinkel》（“小公鸡”）和《Gockel》（“小母鸡”）同金克尔和莫克尔的发音相似。——编者注

特弗利德应该感到幸福了，因为他终于创立了真正的“业余剧团”（第 254 页）。这一出可笑的喜剧本身同时成了实际行动的序幕：

“这些晚会也给了他到莫克尔双亲家中去拜访莫克尔的机会。”（第 212 页）

在这里我们要补充一点，“小金虫协会”是哥丁根的“林苑协会”¹³⁵的摹制品，不同的只是后者标志着德国文学中的一个发展时期，而“小金虫协会”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地方性的拙劣可笑的摹制品。作为辩护士的传记作者自己承认，如塞巴斯提安·隆加尔特、利奥·哈赛、卡·阿·施伦巴赫等等这些“忠实的小金虫”（第 254 页）都是些平凡、庸俗、懒惰和头脑空虚的大学生。（第 211 和 298 页）

*

*

*

哥特弗利德自然立刻就把他的未婚妻同莫克尔“在心里作了比较”（第 221 页），不过“关于结婚和订婚的问题，暂时还没有时间来作无谓的思考（其实，他是惯于这样做的）”（第 219 页）。他就像布利丹的驴子一样，左两堆干草之间犹豫不决。但是饱经世故和比较讲求实际的莫克尔却“明显地促进了看不见的联系”（第 225 页）；她决定促成这个“机缘或天赐良缘”。（第 229 页）

“有一天，哥特弗利德在通常因为有课而不能去看莫克尔的时候到她那里去。他轻轻地走到她的房门前，听到了哀怨的歌声。他注意地听着：

‘有你在旁，我就像
沐浴在朝霞里……’
‘多么痛苦，
唉，你却不知！’

长长的、悲哀的音调结束了她的歌声，并慢慢地消失在空气中。”（第 230 和 231 页）

哥特弗利德悄悄地（他自以为如此）溜回家里，他认为这一情节非常有意思，便开始写起要死要活的十四行诗，把莫克尔比作罗累莱¹³⁶（第 233 页）。为了躲避罗累莱和保持对索菲亚·比格霍耳德小姐的忠实，他打算在维斯巴登找一个教师的席位，但是被回绝了。除了上述机缘以外，还有另一个命定的机缘，这一次算是定局了。不仅“太阳转过了室女座”（第 236 页），而且哥特弗利德同莫克尔乘着“小船在莱茵河里”荡漾，一般从旁驶过的轮船掀翻了小船，哥特弗利德抱着莫克尔游到了岸边。

“当他紧抱着被救者游近岸边时，他第一次意识到，只有这个女人才能给他幸福。”（第 238 页）

这一次哥特弗利德终于不是想像地，而是实在地经历了小说“亲和力”¹³⁷中的一幕。这一下问题解决了。他同索菲亚·比格霍耳德解除了婚约。

*

*

*

爱情之后便是阴谋。牧师恩格斯代表教会监察公署告诉哥特弗利德，说他是新教牧师，不能同离了婚的女人，况且还是个天主教徒结婚。哥特弗利德引用了不可剥夺的人权，慷慨激昂地提出了以下几点：

1. “他同那位女士在‘希尔策居姆普欣’饭店里喝咖啡这件事并没有什么罪过。”（第 249 页）

2. “问题还没有决定，因为他到现在为止既没有公开声明，他打算同这位女士结婚，也没有说没有这个打算。”（第 251 页）

3. “至于信仰问题，那末还不知道将来会怎样。”（第 250 页）

“现在请您到我家里喝一杯咖啡。”（第 251 页）

哥特弗利德说完了这句话，便同无法拒绝邀请的恩格斯牧师一起离开了舞台。哥特弗利德善于这样威严而温和地解决同现存条件发生的冲突。

* * *

“小金虫协会”必然对哥特弗利德发生什么影响，我们举下面这一段话来加以说明：

“1841年6月29日。这一天隆重地庆祝‘小金虫协会’成立一周年。”(第253页)“关于谁应当受奖的问题，得出了一致的决定。哥特弗利德谦恭地跪在女王的面前，女王把当然的桂冠戴在他的灼热的头上，这时夕阳的炽热的光辉照耀在诗人的容光焕发的脸上。”(第285页)

在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隆重地接受了想像的诗人荣誉之后，蓝色花朵就赶忙表示了自己的感情和愿望。在这个晚上，莫克尔演唱了由她自己配曲的“小金虫协会”会歌，歌词的结尾概述了“协会”的全部宗旨：

“我们得出的教训是什么？

小金虫，飞吧！

谁老了谁就找不到伴侣，

因此，不要作过多的考虑！

小金虫，飞吧！”

天真的传记作者说，“这里所包含的许婚的意思，完全是一时之兴”(第255页)。哥特弗利德懂得这个意图，“但是并不想过早地放弃”两年之内继续在“小金虫协会”里接受人们加给他的桂冠和对他的崇拜和吹捧。1843年5月22日，他和莫克尔结婚了，在这以前，莫克尔(尽管她不信教)根据下面这个荒谬的借口信仰了新教：“新教与其说是以某些信条为基础，不如说是以伦理概念为基

础。”(第 315 页)

“又得出一个教训：
蓝色花朵和信仰格格不入！”

* * *

哥特弗利德是在使她从不信教转向新教的借口下同她结合的。但是现在莫克尔要读施特劳斯的“耶稣传”¹³⁸，因而又变得不信教了，

“他痛心她随她沿着怀疑的小径走向否定的深渊。他同她一起给自己开辟走向新哲学迷宫的道路。”(第 308 页)

因此，他的走向否定并不是由于在当时已经对群众发生了影响的哲学的发展，而是由于偶然的高兴。

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知道他究竟从这个哲学迷宫里得到了什么：

“我倒愿意看一看，这个从康德到费尔巴哈的巨大的浪潮会不会把我抛向**泛神论**!!”(同上)

好像这个浪潮不是恰巧超出泛神论的范围，好像费尔巴哈就是德国哲学的最新成就！

日记里接着说道：“我的生活的基石并不是历史的认识，而是不可动摇的体系，神学的核心也不是教会的历史，而是教义。”(同上)

好像德国哲学恰巧没有把不可动摇的体系溶化在历史的认识里，恰巧没有把教义的核心溶化在教会的历史中！这些自白十分明显地暴露出这位民主主义者的全部反革命性，对这位民主主义者说来，运动本身只是达到某些不容辩驳的永久真理即腐朽的静止点的一种手段。

根据哥特弗利德上述的辩护的流水账本,读者可以自己判断他的整个思想发展状况和这位多愁善感、装腔作势的神学家身上究竟有什么革命因素。

二

金克尔的生活的第一幕就这样结束了，在二月革命发生以前，他生活中没有什么值得提及的事情。科塔的出版社在不付稿酬的条件下出版了他的诗集；但是大部分诗集都堆积在仓库里，直到作者在巴登受伤为止，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给了他以诗人的声望，并为他的作品开辟了市场。

但是，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实传记作者没有提到。金克尔自己承认，他最大的愿望是至死也要当一个剧院的老经理。他的理想人物是一个叫艾森胡特的巡回演出的丑角演员，这个人带着他的戏班子沿莱茵河来回旅行，最后发了疯。

哥特弗利德除了在波恩发表充满牧师的雄辩的讲演之外，有时也在科伦举办神学和美学方面的富于艺术的演出。当二月革命爆发时，他用以下的预言结束了这些演出：

“从巴黎传来的战斗的雷声对德国和整个欧洲大陆来说标志着一个美好的新时代的开始。在暴风雨之后，接着便幸福地吹起自由的和风；从此开始了一个伟大的幸福的时代——君主立宪的时代。”

君主立宪政体把金克尔提升为副教授，来答谢他的这番恭维。但是，这个承认并不能使 *grand homme en herbe*（未来的伟人）感到满意。看来，君主立宪政体决不急于让“他的荣誉遍布全球”。此外，新的政治诗给弗莱里格拉特带来的桂冠，使曾经受到“小金虫”们褒奖的诗人坐立不安。于是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便来

了一个向左转,先成为立宪民主派,然后又成为共和民主派(honnête et modéré(循规蹈矩的和温和的))。他很想当议员,但是在5月的选举中他既没有能到柏林去也没有能到法兰克福去。然而他不顾这些最初的失败,继续争取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说,他花了不少力气。起先他很明智沉着,只在本地的小地区内活动。他创办了“波恩报”,一种以民主派的无谓空谈和愚昧无知能够拯救祖国这种幼稚可笑的想法著称的地方小报。他把“小金虫协会”提高到民主派大学生俱乐部的水平,从这个俱乐部里不久便出现了一群这样的学生,他们向波恩地区的所有居民传播老师的荣誉,并把金克尔教授先生硬塞给每一个集会。他自己在娱乐场同食品杂货店老板大谈其政治,同正直的手工业者友好地握手,甚至在京德尼希和泽尔舍德的农民中宣扬他热爱自由。但是他特别同情可敬的手工业者阶层。他同他们一起,为手工业的衰落,为自由竞争的惨重后果,为现代的资本和机器的统治而痛哭流涕。他同他们一起制定了恢复行会制度和消灭交易所投机的计划,为了完成他所想的这一切,他在“手工业,救救自己吧!”¹³⁹这本小册子中阐述了他在娱乐场同小业主们谈话的结果。

为了使人一眼看清金克尔先生的位置究竟应该摆在哪里,他这部著作具有怎样的如法兰克福^①所具有的全民意义,他把这部著作献给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经济委员会的三十位委员”。

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对手工业者阶层的“美”的探求,使他立刻得出结论:“手工业者阶层目前完全分裂了。”(第5页)分裂就在于:有一些手工业者“去食品杂货店老板和官吏的娱乐场”(了

^① 此处法兰克福是指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译者注

不起的成就!),而其他的人则没有去;有一些手工业者受到了教育,而另一些没有。虽然有这种分裂,但作者仍然看到了有利的征象:在可爱的祖国,各地都成立了手工业者协会和举行了手工业者会议,并且到处都在进行改善手工业者阶层的状况的宣传(请回忆一下1848年的“文克布莱希哀歌”¹⁴⁰)。为了对这个有益的运动贡献一份力量,他出了个好主意,陈述了他的拯救纲领。

首先,作者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通过限制来消除自由竞争的弊病,而又决不根本取消自由竞争。在这个问题上他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立法应当防止没有学得足够的手艺和达到必要的熟练程度的青年成为师傅。”(第20页)

“每个师傅只能有一个学徒。”(第29页)

“学习手艺也必须经过考试。”(第30页)

“考试时考生将随之学习的师傅必须在场。”(第31页)

“为了保证必要的熟练程度,我们要求立法规定,今后凡不满二十五岁的人都不得当师傅。”(第42页)

“为了保证学得足够的手艺,我们要求今后每一个新的师傅都要经过考试,而且是当众考试。”(第43页)“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考试要完全免费。”(第44页)“一个居住在农村里的同行师傅也要经过”(第55页)这种考试。

朋友哥特弗利德自己干着挨户叫卖政治的勾当,却希望把“流动的或挨户叫卖”其他普通商品的生意人当作不正当的生意人加以取缔。(第60页)

“手工业品的生产者在营业中力图使自己赢利,而使他的被欺骗的贷款人受到损失。就像一切含糊的东西用外国名字来表示一样,这种行为也用外国名字来表示,这就叫破产。为此,他便很快地把自己的成品抛向邻近的地区,并立刻把它们卖给出高价的人。”(第64页)这种甩卖行为“是一种不老实的行为,是我们的可爱的邻居——商业阶层灌输到手工业者的园地里来

的”，这种行为必须加以取缔（朋友哥特弗利德，连根铲除祸害和立即取缔破产，不是更干脆得多吗？）。

“赶集当然是另一回事。”（第 65 页）“在这种情况下立法应当让各个地方召开专门讨论市集问题的全体公民会议来处理，由多数（！）去决定保存还是取缔固定市集。”（第 68 页）

哥特弗利德后来转到手工业和机器劳动之间的关系这个复杂的“争论问题”，并且提出了下面的原则：

“让每一个出售成品的人只有他能亲手制造出来的商品。”（第 80 页）“因为机器和手工业分离，所以二者都走向了衰落，并脱离了正道。”（第 84 页）

他想通过手工业者（如该城市的装订工人）成立协会和共同购置机器的办法把手工业和机器结合起来。

“因为他们将只是为了自己，只是为了完成定货而利用机器，他们的生产费用就能够少于拥有工厂的商人。”（第 85 页）“资本可以用协会来摧毁”（第 84 页）（而协会可以用资本来摧毁）。

后来，他又把自己关于波恩的联合起来的有执照的装订工人“拥有画线机、平整机和切纸板机”（第 86 页）的思想扩大到关于“机器所”的思想。

“有关行业的联合起来的行会师傅的协会应当在各地设立同小商人的工厂相仿的企业，这些企业只为当地的师傅制造定货，不接受其他雇主的任何定货。”（第 86 页）这种机器所的特点是：只是“在开初需要经营商业”（同上）。“陶醉于”这种想法的哥特弗利德高声叫道：“同这种想法一样新颖的任何想法，在实现之前，都需要非常平静和实际地加以考虑，直至考虑到最微小的细节。”他号召“每一种手工业都独自为自己作这样的考虑。”（第 87、88 页）

这里又扯到了关于反对来自利用囚犯劳动的国家的竞争的论战、关于罪犯流放地（“建设一个人道的西伯利亚”第 102 页）的回

忆,以及对军事部门的“所谓手工业连和手工业委员会”的抨击。不言而喻,手工业者阶层所担负的军事重担应当减轻,为此,国家必须按照高于自己所能生产的价格向手工业者订购炮弹。

“这样,竞争问题就不再存在了。”(第 109 页)

哥特弗利德然后转而谈到了第二个基本论点,这就是国家应当给手工业阶层以物质援助。哥特弗利德完全是从官吏的观点来看待国家,他坚持这样的意见:最容易帮助手工业者的是由国库贷款建立手工业局、储金互助会等等。至于国库应当从哪里得到这笔资金,这里当然没有加以研究,因为这是问题的“不漂亮的”方面。

最后,我们的神学家当然不能不重新扮演道德宣教者,不能不指教手工业者阶层,告诉他们怎样才能帮助自己。起初是“抱怨长期借款和扣款”(第 136 页),并且要求手工业者凭良心回答这样的问题:“我的朋友,你是否坚持你所做的每一种活都取同样的和不变的报酬?”(第 132 页)关于这件事,他特别警告手工业者不要向“有钱的英国人”要过高的价钱。哥特弗利德英明地解决了这个难题:“每年的结算是一切祸害的根源。”(第 139 页)然后是埋怨手工业者的妻子不该热衷于打扮和手工业者本人不该老惦着喝酒(第 140 页及以下各页)。

手工业阶层能够用来改善本身情况的手段是:“行会、互助保险会、手工业者仲裁法庭”(第 146 页),以及工人教育协会(第 153 页)。这种教育协会的最新成就是:

“歌唱和朗诵终于架起了一座通往戏剧表演和手工业者剧场的桥梁,必须把这种剧场始终看做这些美学意图的最终目的。只有当劳动阶级重新学会登台表演的时候,对他们的艺术教育才告完成。”(第 174、175 页)

这样一来，哥特弗利德便顺利地把手工业者变成了喜剧演员，从而又把问题归结为自身。

但是这种讨好波恩手工业者的行会要求的把戏产生了实际的效果。朋友哥特弗利德由于发誓要帮助恢复行会，因而被选为代表波恩出席钦定的第二议院¹⁴¹的议员。“从这一瞬间起哥特弗利德感到自己”幸福了。

他立刻动身前往柏林，由于他认为政府打算把第二议院建立成经过核准的立法者的永久“行会”，他准备永久居住在那里，并决定叫妻子和孩子到他那里去。但是第二议院被解散了，哥特弗利德在享受了为时不久的当议员的乐趣之后，伤心失望地回到了莫克尔的身边。

此后不久，政府和法兰克福议会之间爆发了冲突，接着德国南部和莱茵河畔也掀起了运动。祖国在召唤，哥特弗利德响应了它的号召。在济克堡有后备军的军械库，而且济克堡同波恩一样，是哥特弗利德最经常地播种自由的地方。因此，他同他的朋友退职少尉安内克联合起来号召他们所有的追随者向济克堡进军。集合地点在吊桥。本来应当来一百多人。但是等了很久以后，哥特弗利德数了一下他的好汉们，还不到三十人，而且其中（这是“小金虫协会”的洗不尽的耻辱）总共只有三个大学生！虽然如此，哥特弗利德仍然同他们这一小部分人勇敢地过了莱茵河，直赴济克堡。夜漆黑，下着雨。突然勇士们的背后传来了马蹄声。勇士们躲在路旁，枪骑兵的巡逻队从他们身旁飞驰而过。有几个卑鄙的坏蛋泄露了秘密：当局已有准备，无法进军了，于是只好退回。这一夜哥特弗利德所感到的刺心的痛苦，只有他以前当克纳普和夏米索拒绝把他的初期诗作收进他们的缪斯年鉴时所感受的痛苦

可以相比拟。

这一切事情发生以后，他已经不能再留在波恩了。可是，难道普法尔茨不是他进行活动的广阔的场地吗？他动身前往凯则尔斯劳顿，因为必须给他一项职务，所以便在军事局里给了他一个高俸的闲差（据说是委托他管理海军事务¹⁴²）。他照例是在当地的农民中挨户叫卖自由和人民福利来赚取面包，听说，在某些反动地区他的生意做得并不顺利。虽然有这些小小的不幸，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哥特弗利德肩负行囊精神饱满地在大路上走着，从那时起，所有的报纸都按这一不变的特征来描写他。

但是，普法尔茨的运动很快就结束了，金克尔又重新出现在卡尔斯卢厄，不过肩上背的已不是行囊而是火枪，从此火枪又成了他的不变的特征。据说，这枝火枪非常漂亮，枪柄和枪托是用桃花心木做的。无论如何，这是一枝很美的、富于艺术性的火枪。美中不足的是，朋友哥特弗利德既不会装弹，不会瞄准，不会射击，也不懂步法。因此，有一个朋友问他：他为什么要去战斗，哥特弗利德反驳道：“不战斗干什么，我不能回波恩去，可是我必须活下去！”

于是，哥特弗利德加入了战斗者的行列，加入了侠义的维利希的部队。哥特弗利德的许多战友竭力要我们相信，从这时起，他分担了这支队伍所遭遇到的一切命运，他很谦虚，像个普通的志愿兵，不论是在顺利的时候，或是在困难的时候，他都和蔼可亲，不过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为掉队者预备的马车上度过的。在拉施塔特¹⁴³，这位真理和正义的真正保卫者不得不经受了后来使他在全德国人民的赞叹声中成为纯洁无瑕的受难者的考验。这一事件的详细情形到现在还没有确实查明，可以相信的只是，志愿部队在散兵战中迷了路，这时从侧翼向他们射来了几枪，一颗流弹轻轻地擦

过了我们的哥特弗利德的头；他大叫一声“我被打死了！”便倒在地上。虽然他并没有被打死，但是已不能同其余的人一起撤退了；他被护送到一个农民的家里，在那里他向黑林山的纯朴的居民请求道：“救救我吧，我是著名的金克尔！”最后，他碰上了普鲁士人，于是便当了巴比伦的俘虏。

三

从被俘的时候起便开始了金克尔生活中的新时期，这个时期同时也开辟了德国小市民阶层发展史上的新时代。“小金虫协会”一听到金克尔被俘，便立刻写信给所有的德国报纸，说伟大的诗人金克尔面临着被战地法庭判处枪决的危险，德国人民，尤其是有教养的阶层，而特别是太太小姐们，应当竭尽全力来拯救被俘的诗人的生命。据说，他自己这时写了一首诗，诗中把自己同“他的朋友和导师基督”相比，关于自己他说：我的血是为你们流的。从这时起竖琴成了他的标志。于是，德国突然知道了金克尔是一个诗人，一个伟大的诗人。从这一瞬间起，大批德国小市民和风流自赏的庸人们一时也都参加了我们的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主演的关于蓝色花朵的喜剧的演出。

这时普鲁士人已经把他交付军事法庭。这使他有机会在经过长了长时期的间歇以后第一次重新向他的听众发表令人感动得流泪的演说，就像他在科伦当牧师助手时成功地做过的一样（莫克尔可以作证），而且科伦也注定了不久就要重新欣赏他在这个舞台上的辉煌成就。他在军事法庭上发表了辩护词，由于他的一位朋友的不识分寸，这一辩护词后来不幸被柏林“晚邮报”传到了广大的公众的耳里。在这个辩护词中金克尔“抗议”

“把我的行为同革命不幸最后沾上了的污垢和淤泥（我知道这一点）相提并论。”¹⁴⁴

金克尔发表了这一高度革命的辩护词之后,被判处二十年的要塞监禁;不过后来又恩准改为普通监禁。他被转解到了瑙加特^①,据说他在那里曾经被迫纺羊毛,因此,他的标志先是行囊,后是火枪,再后是竖琴,而从现在起则变成了纺车。以后我们将看到,他怎样带着新标志钱袋横渡重洋。

与此同时,在德国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众所周知的天生有美丽的灵魂的德国小市民,由于1849年的沉重打击而对他们的最甜蜜的幻想完全失望了。他们的任何一个希望都没有实现,在青年们的沸腾的心里甚至对祖国的命运发生了怀疑。所有的人都灰心丧气,到处都在渴求民主主义的基督,真实的或想像的殉难者,因为他会像羔羊一样温顺地以自己的受难承担起小市民世界的罪过,他的痛苦会最清楚地体现出一切庸人的脆弱的而缠绵的苦闷。以莫克尔为首的“小金虫协会”准备来满足这一在各地都已经酝酿成熟的要求。的确,除了被俘的坐在纺车旁的西番莲金克尔之外,除了这个泪水和激情的永不枯竭的泉源,这个传道者、美学教授、议员、政治流动商贩、火枪手、新出现的诗人和剧院老经理的结合体之外,还有谁更适于表演这出伟大的蒙难喜剧呢?金克尔是时代的英雄,而他也正是作为时代的英雄立刻被德国庸人所接受的。所有的报纸都充满被俘的诗人的逸事、特写、诗篇、回忆。他在狱中的苦难被无限地夸大,描绘得像神话一样;报纸每月至少要报道一次他的头发变成了灰白色;在所有的市民俱乐部里和一切晚会上,人们都是带着沉痛的心情回想起他。有教养的阶层中的少女因他的诗篇而感伤叹息,体会过热恋之苦的老处女在祖

^① 波兰称作:诺伏加特。——编者注

国各个城市里为他的男性力量的逐渐消失而痛哭。而参加运动的其他一切普通的牺牲者、被枪杀者、阵亡者、被俘者，在这个唯一的牺牲羔羊面前，在这个征服了男女庸人的心的大丈夫面前都销声匿迹了，人们仅仅为他而泪如雨下，不过，就是他一个人也已经可以给这些泪水以应有的报答了。总之，那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的济格瓦特时期，丝毫不比上一世纪的文学中的济格瓦特时期逊色；而济格瓦特—金克尔从来也没有感到还有什么比扮演这个角色更好了，在这个角色中，他之所以伟大并不是由于他所做的那一切，而是由于他所没有做的那一切，他所以伟大并不是由于坚强和反抗，而是由于软弱和恭顺，在这一角色中他的唯一任务是有礼貌、有感情地忍受下去。饱经世故的莫克尔善于从公众的这种软心肠中攫取实利，并且立刻展开了最积极的经营活动。她着手重新出版哥特弗利德的一切已经发表过和没有发表过的突然身价百倍、风行一时的作品，并且在公众中广泛地替这些作品吹嘘。她趁机呈献出她自己从昆虫世界里得来的经验，例如“萤火虫的历史”。为了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钱，她允许“小金虫”施特罗特曼应公众的要求公布哥特弗利德日记中最隐秘的表白。她组织了各种捐款，表现出无可置疑的经营者的机灵和极大的坚忍精神，把有教养的人们的软心肠变成了硬塔勒^①。同时她还感到满意的是能够

“每天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看到德国最伟大的人物，例如阿道夫·施塔尔。”

这种济格瓦特狂在科伦陪审法庭开庭时达到了顶点，在法庭上哥特弗利德于1850年春天作了访问演出。这里举行了关于图

^① 旧德国货币，相当于三马克。——译者注

谋攻打济克堡的审判，因此金克尔被押解到了科伦。由于在本传略中哥特弗利德的日记摘要占了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在这里引用一位目击者的日记片断也是完全恰当的。

“金克尔的妻子在监狱中访问了他。她通过铁栏用诗句向他问候，而他，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则以六步韵诗作了回答。然后两人相对而跪，站在那里的典狱吏，一个老军曹，弄不清他是不是要和这两个疯子或喜剧演员打交道。后来检察长问他，他们在会面时说了些什么，狱吏回答说，虽然他们讲的是德语，但是他连一句也听不懂。关于这一点金克尔夫人好像说过，不应当任命一个在文学和艺术方面毫无教养的人充当狱吏。”

在陪审员面前，金克尔完全扮演成引人流泪的角色，“少年维特之烦恼”¹⁴⁵时代中济格瓦特时期的文学家。

“‘法官先生，陪审员先生……我的孩子们的勿忘我花一般的眼睛……莱茵河的碧绿的水……再没有什么比同无产者握手更有失尊严的了……囚犯的苍白的嘴唇……故乡的新鲜空气’以及其他胡话，这一整篇著名的辩护词就是如此，公众们、陪审员们、检察官们、甚至宪兵们听了这篇辩护词都流出了悲伤的眼泪，于是法庭在一片叹息和呻吟声中一致通过宣判无罪。金克尔当然是一个可爱的好人，但是在其余的方面，他是宗教、政治、文学的回忆的令人嫌腻的混合体。”

很明显，在这段话里，作者实在是忍耐不住了。

所幸的是这个痛苦的时期很快就因金克尔被解救出施潘道监狱这件富于浪漫色彩的事情而告终。在这个解救事件中重演了狮心理查和布朗德尔的故事¹⁴⁶，不过在这里，坐在监狱里的是布朗德尔，而狮心则在庭院里演奏手摇风琴，而且布朗德尔不过是一个平庸的蹩脚诗人，而狮心实质上是个像兔子一样的胆小鬼。狮心就是“小金虫协会”里的大学生叔尔茨，一个野心大而能力小的阴谋家，不过他这点能力已足够来了解“德国的拉马丁”了。金克尔得救后

不久,大学生叔尔茨便在巴黎发表声明说,他清楚,受他利用的金克尔当然不是 *lumen mundi* (世界的灯塔),正是他叔尔茨,而不是别人,肩负着担任未来的德意志共和国总统的使命。这个人,一个曾被“哥特弗利德的褐色的、闪烁着忧郁的火光的眼睛”注视过的“穿棕色燕尾服和浅蓝色外套的”大学生,的确是靠牺牲一个可怜的狱卒而救出了金克尔。这个狱卒现在正因此而坐了牢,不过他怀着一种崇高的感情:他是为争取……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自由而牺牲的受难者!

四

在伦敦我们又看到了金克尔，这一次，由于坐牢的光荣和德国小市民阶层的多泪，他成了德国最伟大的人物。朋友哥特弗利德意识到自己的崇高的使命，很善于利用一切有利的时机。富于浪漫色彩的得救事件在国内又激起了人们对金克尔的狂热的迷恋，这种迷恋只要非常巧妙地引上所需的道路，就会产生出实际的成果。同时，这个世界城市给著名的英雄开辟了重新博得荣誉的新的广阔场所。他很清楚：他一定会成为当代的红人。为此，他暂时放弃了一切政治活动，把自己关在家中，首先关心的是重新留起胡子，因为一个先知是不能没有胡子的。然后，他访问了狄更斯、英国自由派报纸的编辑部、伦敦西蒂区的德国商人，主要是访问了该地的风流自赏的犹太人。他是所有人的理想人物：在一些人眼中是诗人，一些人眼中是不折不扣的爱国者，一些人眼中是美学教授，一些人眼中是基督，一些人眼中是庄严的受难者奥德赛，但是在所有的人的眼中，他都是温柔的、灵巧的、好心的和仁慈的哥特弗利德。他一直到狄更斯在“家常话”里颂扬他和“新闻画报”¹⁴⁷上刊登了他的像片时才安静下来。他使少数几个也在异乡感受到金克尔的烦恼的在伦敦的德国人活动起来，好像是为了要他们邀请他去作关于现代剧的讲演，并且把讲演会的门票整叠整叠地分发到德国商人的家里去。他不耻于四处奔走，刊登夸大其词的广告，进行诈骗，到处纠缠，对这些公众卑躬屈节。可是，大功到底

告成了。哥特弗利德心满意足地陶醉于自己的荣耀，在水晶宫¹⁴⁸的大镜子里欣赏自己的映像，可以说，他感到非常舒适。

他的讲演得到了承认（见“宇宙”¹⁴⁹）。

“宇宙”。金克尔的讲演

“当我有一次看到德布勒的幻灯片时，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想法：能否用‘语言’来创作这样乱七八糟的作品，能否讲述幻灯片？当批判者一开口就不得不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批判的自由就像颤动的弦上发出的一个逐渐停息的音符的逐渐消失的声音那样，在产生激动的反响的通了电流的神经里颤动，这当然是很不愉快的事。因此，我宁愿放弃对科学的无感觉作枯燥无味的、学究式的分析，而不愿放弃德国流亡者的迷人的缪斯在我的感觉里的思想游戏中产生的共鸣。一个响亮的、创造性的、建设性的、逐渐形成的‘字眼’——‘现代思想’构成这一金克尔式的基调，它的和音的这种反响。人类对这一思想的‘判断’力从一堆混乱的虚伪传统中引伸出了真理，并把它当作不可侵犯的公共财产置于智力发达的、思想合乎逻辑的少数人的保护之下，这少数人使真理脱离了有信仰的愚昧而走向无信仰的博学。博学的无信仰肩负着诋毁由虔信宗教的错觉产生的神秘主义，铲除陷于偏见的传统习惯的势力，利用怀疑，这个不停地工作着的哲学断头台来砍掉威信的头并且通过革命使人民走出神权政治的迷雾，迈向花朵盛开的民主主义的原野。《废话》顽强地、热心地学习人类的以及人们本身的编年史，这是一切变革参加者的极伟大的任务，而这一点是被驱逐的反叛的诗人非常清楚的，他在前三个星期的每星期一晚上在资产阶级公众面前讲述现代戏剧史时，展示了自己的《dissolving views》（“幻灯片”）。”

“一个工人”

仅仅从“共鸣的范围”、“逐渐消失的声音”、“和音”和“通了电流的神经”这几个用语来判断，大家都会确信，这个工人就是金克尔的最亲近的亲人莫克尔。

然而，就是这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孤芳自赏的时期也不是一定能永久地维持下去。现存世界秩序的审判日、民主的末

日审判、光荣的 1852 年 5 月¹⁵⁰一天天临近了。为了全副武装地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哥特弗利德·金克尔重新披上政治的狮子皮，同“流亡者”重新取得了联系。

在这里我们来谈一下伦敦的“流亡者”，这是一堆由法兰克福议会、柏林国民议会和下院的前议员，巴登战役中的英雄，表演了帝国宪法¹⁵¹这出喜剧的泰斗们，没有读者的作家，民主俱乐部里和代表大会上的空谈家，第十流的报刊作家等等人物组成的混合物。

1848 年德国的大人物们已经站在可耻的结局的边缘，而“暴君”的胜利却挽救了他们，把他们扔到了国外，使他们变成了受难者和圣徒。反革命救了他们。大陆上的政治发展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引到了伦敦，于是伦敦便成了他们的欧洲中心。不言而喻，在这种形势下，这些世界的解放者必须干出点什么事情，发动点什么事情，好使公众日复一日地重新想起他们的存在。必须以任何代价来防止产生这种印象：似乎世界历史不靠这些巨人的帮助也能前进。这堆人类渣滓愈是没有能力（由于自身的无能，也由于现存的条件）完成任何实际工作，他们就愈是需要热烈地从事不切实际的、毫无益处的活动，这种活动的参加者总是非常夸张地宣布想像的活动情况、想像的政党、想像的战斗和想像的利益。这些废物愈是没有能力真正唤起新的革命，他们就愈是不得不只在想像中考虑这个未来的可能性，老早就分好了位置，并且预尝了当权的滋味。这种充满豪言壮语的热烈活动的结果，是组织了大人物称号的互助保险会和未来的政府职位的互助保障会。

五

建立这种“组织”的初次尝试早在1850年春天就作过了。那时伦敦各处都散发了用极其夸张的笔调写成的“告德国民民主派的通告草案。草稿”和“致领袖们的附函”。这个通告和附函的内容是号召建立统一的民主的教会。最近目的是：建立德国流亡者事务中央局¹⁵²来共同管理流亡者的事务，在伦敦建立印刷所，团结一切派别反对共同的敌人。这样一来，流亡者就应当重新成为国内运动的领导中心，流亡者的组织就应当为广泛的民主派组织奠定基础。没有资金的卓越人物应当作为中央局的委员从德国人民所付的税款中取得报酬。由于“德国流亡者不仅没有一个出色的英雄，而且更糟糕的是缺乏共同的**资本**”，实行这种课税就尤其显得恰当。同时也毫不隐讳，现有的匈牙利、波兰和法国的委员会是这个“组织”的榜样，而且整个文件中透露出对这些占有较有利的地位的卓越的同盟者的羡慕。

这个通告是鲁道夫·施拉姆和古斯塔夫·司徒卢威两位先生合写的，在他们两人背后还隐藏着那时住在奥斯坦德的以通讯委员身分出现的光辉形象阿尔诺德·卢格先生。

鲁道夫·施拉姆先生是个喜欢争吵的、夸夸其谈的、极其荒唐的傀儡，他把“拉摩的侄子”中的一段话：“我宁愿做个厚颜无耻的空谈家，而不愿做默默无闻的人”¹⁵³当作生活中的座右铭。康普豪森先生在权盛时期是很乐意授与年轻豪放的克雷弗尔得人以重要

职位的,如果这样提升一个普通的见习法官并不有失体面的话。由于官僚制度的体面,施拉姆先生只有操民主派的生涯这一条路可走。在这个舞台上,他有一次真的当了柏林民主俱乐部的主席,后来在几个左翼议员的帮助下当选为代表施特里高^①出席柏林国民议会的议员。在这里平时非常爱讲话的施拉姆却默不作声,但是又经常发牢骚。在制宪议会被解散以后,这个人民的民主派活动家写了一本关于君主立宪的小册子,但是仍然没有重新当选。后来,在布伦坦诺执政时期,他在巴登出现了一个短时间,并且在那里,在“坚决前进俱乐部”¹⁵⁴里认识了司徒卢威。来到伦敦以后,他宣布要脱离一切政治活动,因此,立刻发出了上述的通告。官运不佳的施拉姆先生由于家庭的关系而设想自己是流亡者中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人物,并且真的相当成功地装扮成激进资产者的模拟品。

古斯塔夫·司徒卢威也是流亡者中比较重要的人物。他的令人想起山羊皮的脸,他的凸出的、狡猾而有点愚蠢的眼睛,他的微微发光的秃头,他的斯拉夫—加尔梅克人的特征,立刻显示出他是个不平常的人,而他的沙哑的喉音、充满感情的慷慨激昂的演说和妄自尊大的模样更加深了这种印象。可是,老实说,应该指出,由于目前对每个人来说要出风头都是愈来愈困难了,我们的古斯塔夫,为了在同胞中显得出类拔萃,就不择手段地时而充当预言家,时而充当投机家,时而充当修脚师,把最离奇古怪的工作变成自己的主要职业,甚至宣传各式各样的荒唐无稽的思想。因此,他虽然在俄国出生,却突然热中于争取德国自由的斗争,这是他在派驻联邦议

^① 波兰称作:斯特舍哥姆。——编者注

会¹⁵⁵的俄国大使馆中担任了一个编制外的职务并写了一本维护联邦议会的小册子之后的事情。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头盖骨是人类标准的头盖骨，所以他开始沉醉于骨相学，并且从此只信任那些头盖骨预先经他摸过和研究过的人。此外，他停止了肉食，开始宣传只进素食的福音。他也是气候的预言者，吸烟的热烈反对者，并积极地为德国天主教¹⁵⁶的道德原则及水疗法作宣传。由于他对一切实证知识深恶痛绝，他当然热中于自由大学的思想，在这些大学里应当取消普通四系的课程¹⁵⁷，教授骨相学、面相术、手相术和关亡术。他所以非常顽强地想成为伟大的作家，自然正是由于他的著作的风格完全不同于一切可以称为风格的东西。

早在四十年代初，古斯塔夫便创办了“德国旁观者”¹⁵⁸，这是他在曼海姆出版的一张小报，他握有这张小报的特许权，而这张小报就像一个固执的思想一样，和他形影不离。此外，他在那时就已经发现，被他奉为新旧约的两本书，即罗泰克的“世界史”和罗泰克同韦尔凯尔合著的“政治科学词典”¹⁵⁹，已不再符合时代的精神，需要出版新的、民主主义的版本。古斯塔夫便立即着手从事这一加工工作，预先以“政治科学原理”¹⁶⁰为名出版了一个片断；这个工作成了“1848年以来最刻不容缓事情，因为已故的罗泰克没有运用近年来的经验”。

与此同时，一次跟一次地爆发了三次巴登的“人民起义”，古斯塔夫亲自对这三次成为整个现代世界运动的中心点的起义作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描述¹⁶¹。在黑克尔起义之后，他立刻遭到了驱逐，而当他的报纸“德国旁观者”刚刚得以复刊的时候，他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原来，“德国旁观者”的曼海姆出版者另外找了一个主编，继续出版了该报。真正的“德国旁观者”和自命的“德国旁观者”斗争

得非常激烈，甚至弄得两家报纸都垮了台。不过，古斯达夫却为此拟定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宪法，按照该宪法，德国应该分成二十四个国家，每个共和国都有自己的总统和两院。宪法上还附有精确地划分了领土的详细地图。

1848年9月爆发了第二次起义，在这次起义里我们的古斯达夫一身兼扮了凯撒和苏格拉底这两个角色。他利用了他为了向黑林山脉的农民确切证明吸烟有害而重新来到德国土地上的这段时间。在寥拉赫他出版了一张标题为“政府机关报。德意志自由国家。自由、富强、教化”¹⁶²的通报。可是，这张报纸登载了下列指令：

“第一条。取消瑞士进口货的百分之十的附加税。第二条。责成税务局长克利斯提安·弥勒执行本决定。”

他的忠实的阿马利亚分担了他的全部苦难，后来还用浪漫主义的笔调对它们作了生动的描绘。此外，她主持了被俘宪兵的宣誓典礼，即给每一个宣誓效忠于德意志自由国家的人别上红色的袖章，然后拥抱他。可惜，古斯达夫和阿马利亚被俘了，并且被困于牢狱，在那里，古斯达夫并没有泄气，他立即开始继续按共和主义的精神改写罗泰克的“世界史”，直到第三次起义恢复了自由时为止。那时，古斯达夫成了真正的临时政府的委员，从那时起在他的其余的固执的思想中又加进了对临时政府的狂热。他一担任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便立刻把委托他管的部门的事务弄得一团糟，并且推荐“叛徒”迈尔霍弗为陆军部长（见戈克“从……回顾……”1850年巴黎版¹⁶³）。后来他妄想充当外交部长，并且取得六万弗洛林归自己支配。布伦坦诺先生不久重又解除了我们的古斯达夫的权力重担，于是古斯达夫便在“坚决前进俱乐部”里担任了反对派的领袖。他特别热中于反对布伦坦诺实行那些他早先曾经支持

过的措施。虽然这个俱乐部被解散了，古斯达夫也不得不流亡到普法尔茨，但是祸中有福，当然的“德国旁观者”重新又在哈尔特河畔的纽施塔特出版了唯一的一号，这补偿了古斯达夫所遭受的许多不应遭受的痛苦。还可以自慰的是在上巴登一个偏僻的小地方的补充选举中，他被选为巴登制宪议会的议员，因此他有了以官方人士的身分回到巴登的可能。在这个议会中使古斯达夫大出风头的只有三个在夫赖堡提出的提案：(1)6月28日：宣布一切想同敌人举行谈判的人都是叛徒；(2)6月30日：任命新的临时政府，以司徒卢威为全权委员；(3)前面这个提案被否决后，在同一天：由于拉施塔特战役的失利，继续反攻已成为无益的事，应当拯救上巴登的居民免遭战争的灾祸，为此必须预先发给每个官兵十天的薪饷，而制宪议会的议员则发给十天的薪金和旅费，然后吹着军号，打着战鼓开往瑞士。在这个提案也被否决以后，古斯达夫独自潜入了瑞士，然而却被詹姆斯·法济的棍棒从那儿打了出来，于是便来到了伦敦，在这里他宣布了新的发现，即**人类六大祸害**。这六大祸害是：君主、贵族、僧侣、官僚、常备军、钱袋和臭虫。古斯达夫的另一发现是：钱袋是路易-菲利浦的发明，从这个发现中可以看出他是以什么样的精神来改写已故的罗泰克的著作的。古斯达夫现在开始在“德意志伦敦报”¹⁶⁴（前不伦瑞克公爵的报纸）上宣传这六大祸害，为此而得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酬金，因而也就感激万分地屈服于公爵阁下的检查了。这就是古斯达夫对待第一个祸害——君主的态度。至于他对第二个祸害——贵族的态度，那末我们的富于宗教道义感的共和党人在给自己定制的名片上是自称为“司徒卢威男爵”的。如果说他没有能够如此友好地对待其他几个祸害，那末这并不是他的过错。后来，古斯达夫利用在伦敦的闲

暇编制共和国历书，在历书中圣徒的名字被有坚定信仰的人的名字所代替，特别是经常代之以“古斯塔夫”和“阿马利亚”这两个辉煌的名字，月份所用的名称是按法兰西共和国历书仿制的德文名称，并且还有许多对大家都有利的共同地方。但是，在伦敦，恢复“德国旁观者”和“坚决前进俱乐部”以及成立临时政府等心爱的固执的思想又重新出现了。这些思想得到了施拉姆的完全的赞同，因此便产生了通告。

这个同盟的第三个成员——伟大的阿尔诺德·卢格，由于他的面貌令人想起那始终在期待着取得文官职位的骑兵班长而在其他一切流亡者中显得超群出众。决不能说，这位骑士由于外表特别好看而与众不同。巴黎的熟人通常把他的波美拉尼亚—斯拉夫人的脸型叫做貂的小脸 (figure de fouine)。阿尔诺德·卢格，吕根岛的一个农民的儿子，因参加蛊惑者的阴谋¹⁶⁵而在普鲁士的监牢里坐了七年的受难者，一当他知道，只要浏览一下黑格尔的“哲学全书”¹⁶⁶，就不用学习其他一切科学时，他便不假思索地投入了黑格尔哲学的怀抱。此外，他遵守着这样的原则（这个原则他曾在一部短篇小说中阐述过，并极力想在他的朋友中间推行，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怜虫海尔维格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在婚姻中就应当实现自己，因此，还在青年时代他便通过结婚给自己奠定了“实体基础”。

他靠他的黑格尔词句和“实体基础”充当了德国哲学的看门人，而作为德国哲学的看门人，他便有责任在“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¹⁶⁷上通报初露头角的名人，并且称颂他们；他趁这个机会在著作方面十分巧妙地利用了他们。可惜，不久哲学上的无政府时期便来到了，在这个时期，已不再有公认的科学之王，施特劳斯、布·鲍威尔、费尔巴哈彼此相斗，各式各样的彼此格格不入的人们开始

把简单明了的经典学说弄得糊里糊涂。这时我们的卢格茫然若失，不知所从；他那些本来就是毫无联系的黑格尔范畴，现在更是乱成一团了，于是他突然因强大的运动产生了强烈的苦闷，在这个运动中，思考和写作已不再是那样重要了。

在“哈雷年鉴”上，卢格扮演了已故的出版者尼古拉在过去的“柏林月刊”¹⁶⁸上所扮演的角色。和他一样，卢格也把出版别人的著作并从中攫取物质利益和表露自己的智慧的写作材料看做自己的主要使命。但是，对这种抄袭他的撰稿人的文章的行为，对这种一直达到必然的最终结果的写作消化过程，我们的卢格比他的前辈更善于赋以更加巨大得多的意义。在这方面卢格并不是德国启蒙运动的看门人，而是现代德国哲学的尼古拉，而且他善于把他的才智方面的天生的平庸隐藏在思辨的措词的浓密的荆棘之后。和尼古拉一样，他所以也勇敢地反对浪漫主义精神，正好是因为黑格尔在“美学”中用批判的方式，而海涅在“浪漫主义学派”中用文学的方式早已给它送了终¹⁶⁹。但是，和黑格尔不同，他和尼古拉一致认为，作为浪漫主义精神的敌人，他以为自己有权把庸夫俗子，首先是他本人这样的庸俗人物推崇为最完美的理想人物。为了这个目的，也为了在他自己的领域内战胜敌人，卢格也作起诗来，这些诗枯燥无味得胜过任何一个荷兰人的最高成就，但卢格却把它们当作挑战书，傲慢地向浪漫主义者的脸上扔去。

不过，我们的波美拉尼亚的思想家实际上也不是非常满意黑格尔哲学的。虽然他也能看出矛盾，但是他没有能力解决矛盾，而且对辩证法抱有非常明显的反感。因此，在他的教条主义的头脑里最大的矛盾都能和平共处，而他的本来就极端笨拙的思维再没有比在这个混乱的社会里更自在的了。有时，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他按自己的方式同时消化两个不同作者的两篇文章，并把它们融合成一篇新的著作，但是并没有发觉这两篇文章的观点完全相反。他经常陷入矛盾，但是他能靠这种方法来摆脱矛盾：在理论家面前，他把自己的思维方面的弱点装扮成实际的思想方式，而在实践家面前就刚刚相反，把自己的实践方面的无能和有始无终装扮成理论思想上的最高成就，并且最终地宣布，正是这种对无法解决的矛盾的束手无策，正是这种对一切时髦词句的内容不加批判的胡乱的信任才能算是“信仰”。

在进一步观察我们的萨克森的摩里茨（卢格喜欢在小圈子里这样称呼自己）后来的生活中的波折之前，我们先谈一下他早在办“年鉴”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的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热中于发表宣言**。一当有人想出一个新的观点，而卢格看出了这个观点有一些前途的时候，他便发出宣言。因为从来没有人责备他应当对某一原始思想负责，所以这样的宣言总是使他便于把某种新东西当作自己的东西（用多少有些夸张的方式）来加以捍卫，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尝试组织政党、派别、“群众”，他们都将拥护他，并且他在其中也可以执行骑兵班长的职责。后来，我们看到，卢格把这种制作宣言、公告和布告的工作做得简直完善得无以复加。

他的第二个特点是与众不同的**勤奋**，阿尔诺德的这种勤奋是无与伦比的。因为他不爱多从事科学研究，或者，如他所说的，“从一个图书馆抄到另一个图书馆”，所以他宁愿“从活的生活中吸取”，即每天晚上将头脑里所想的一切、一切“奇闻”、新思想和其他在白天听到、读到和得到的消息无比认真地记载下来。然后看需要把这一切用作研究这样一个课题的材料，这个课题卢格每天都是像对待大小便那样认真地加以研究的。因此，他的崇拜者常说，他

苦于无法控制写作。关于他在每天的写作劳动的产品里谈的是什么问题，这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他给一切问题都加上了绝对适用于一切东西的奇妙的风格调料，就像英国人喜欢在鱼里、鸡里、肉饼里及其他一切食物里都加上他们的“索耶的调味品”或瓦瑞克郡的调味品一样。而这种每天的风格上的腹泻卢格偏要称之为“优美动人的形式”，并且以此作为自命为“艺术家”的充分理由。

虽然卢格很满意他那德国哲学的看门人的地位，但内心深处仍然非常苦恼。他一本厚书也还没有写成，因此每天都在妒忌布鲁诺·鲍威尔这个幸运儿，后者还在青年时代就已经出版了十八本大部头的著作。为了消除这种不公平现象，卢格把同一篇文章用三个不同的标题登载在同一本书里，然后把同一本书用不同的开本出版。这样一来，便出现了阿尔诺德·卢格的全集，到现在为止，作者每天早晨都要在自己的书房里逐卷地翻阅这些精装的书本，心满意足地连连说道：“布鲁诺·鲍威尔连信仰都没有呢！”

虽然阿尔诺德从来不懂黑格尔哲学，然而他本身倒是黑格尔范畴之一的体现者。他千真万确地就是“正直意识”的化身，当他在“精神现象学”¹⁷⁰里（不过他是丝毫不理解这本书的）高兴地发现，“正直意识”能使自身永久快乐的时候，他更加确信这一点了。这种“正直意识”把庸人的一切卑鄙奸诈的癖性和习惯都掩藏在硬装出来的诚实后面。它可以允许自己做出各种卑鄙的事情，因为它知道，它是由于正直才卑鄙的。愚蠢本身变成了优点，因为愚蠢是信仰坚定的确实证据。他靠了确信内心的坦率而保持着一切不可告人的思想，“正直意识”愈是想进行某种欺骗或干卑鄙的勾当，它就愈能够表现得纯朴和可信。小市民的一切卑鄙习性蒙上一层正直的意图的光彩，就变成了他的美德，丑恶的利己主义装扮成好像

是自我牺牲的样子而出现，怯懦被描绘成最大的勇敢，卑鄙变成了高尚，而粗鲁放纵的举止被说成是坦率和心情畅快的表现。一条把哲学中、民主中，首先是空话中的一切矛盾奇妙地混合在一起的阴沟，一个一身集中了一切道德上的缺陷、一切卑鄙下贱的品质、既狡猾又愚蠢、既贪婪又迟钝、既奴性十足又傲慢不逊、既虚伪又像一个被解放的农奴、像一个村夫一样地朴实的人，庸人和空想家，无神论者和空话的信仰者，绝对的不学无术者兼绝对的哲学家，这就是我们的阿尔诺德·卢格，黑格尔早在1806年就这样预言过了。

“德国年鉴”被封后，卢格便带着家眷乘上特制的马车搬到巴黎去了。他的不幸的命运使他在那里结识了海涅，而后者却把他当作“把黑格尔著作译成波美拉尼亚文”的人来加以欢迎。海涅问他，普鲁茨是不是他的笔名，对此卢格诚恳地表示了异议。但是海涅总是无法改变我们的阿尔诺德就是普鲁茨的诗的作者这个观念。同时海涅很快就发觉，卢格虽然没有天才，可是很成功地装成了一个有坚强性格的人，因此，我们的朋友阿尔诺德引起了诗人关于阿塔·特洛尔¹⁷¹的想法。虽然阿·卢格没有写出伟大的作品来给他的旅居巴黎树立纪念碑，但是海涅为他完成了这一工作，这还是应该归功于他的。为了对此表示感谢，诗人献给了他一首著名的墓志铭：

“阿塔·特洛尔，一只跳舞的熊，
作为一个丈夫，他色情，虔诚，壮实；
受到了时代精神的奸污，
这个原始森林的短裤汉；

舞跳得很坏，
然而挺着绒毛蓬松的胸脯，自鸣得意；

有时，他也散发着恶臭，
没有天才，可是倒有性格！”

在巴黎，我们的阿尔诺德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他和共产主义者来往，并开始“在《德法年鉴》¹⁷²上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而这些文章的内容和他在前言中的主张是完全相对立的。奥格斯堡的“总汇报”使他注意到这件倒霉事，不过他以理智地退隐承受了这个不幸。

为了弥补不善于社交这个天生的缺陷，我们的卢格学会了随意重述几个他称之为“奇闻”的有趣的故事。长年利用这些“奇闻”的习惯，竟使得一切事件、情况和关系对他来说都逐渐地变成了愉快的或不愉快的、好的或坏的、重要的或不重要的、有趣的或枯燥无味的奇闻。巴黎的浮华、无数的新印象、社会主义、政治、皇宫¹⁷³、便宜的牡蛎，这一切竟把这个可怜虫征服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在他的头脑里堆起了一堆永远存在的和难以消除的奇闻，而巴黎则成了他取之不尽的奇闻库。至于他自己，竟也做出了这样的奇事，竟想用锯末来替无产者做衣裳；而他平常对工业上的奇闻就颇有癖好，但总是无法为实现这些奇闻找到股东。

当法国把政治上多少有点名气的德国人驱逐出境的时候，卢格以 *savant sérieux* (大学者) 的身分向杜沙特尔部长作了自我介绍，因而摆脱了这种命运。也许，他在这里是指保尔·德·科克的“拜月者”中的“学者”，这位学者称自己为学者的理由是，他会按特殊方式把软木塞射到空中去¹⁷⁴。

此后不久，阿尔诺德就到瑞士去了，他在那里遇见了前荷兰下级军官、科伦地方的作家和普鲁士小税吏卡·海因岑。两人不久便结成了莫逆之交。海因岑跟卢格学哲学，卢格则跟海因岑学政治。

从这时起卢格产生了一个迫切的要求，即只在德国运动中的更加不学无术的人面前以 *par excellence* (道地的) 哲学家的姿态出现。可是在这方面命运使他每况愈下，最后只有一些属于“光明之友”¹⁷⁵派的僧侣(杜朗)、德国天主教神甫(隆格)和芬尼·列伐尔特才认为他是哲学家。与此同时，德国哲学中的无政府状态日益增强。施蒂纳的“唯一者”¹⁷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这一切自封的新思想，使卢格的头脑混乱到难以忍受的地步。必须下决心采取某种重大的步骤了。于是，卢格在**人道主义**的庇护下得救了，德国的一切糊涂虫，从罗伊希林到海德，都是用这种词句来掩盖他们的狼狽相的。这种词句尤其适合时宜的是，费尔巴哈刚刚“重新发现了人”，阿尔诺德就拚命抓住了它，甚至到现在还不肯放弃。但是，阿尔诺德在瑞士还有一个更加无比重要的发现，即“‘我’通过在公众面前的**再次出现**把自己表现为**有性格的人**”。从这时起，在阿尔诺德的面前展开了一片新的活动原野。他把最厚颜无耻的放肆和纠缠提高为原则。卢格必须参与一切，到处出面干涉。一只母鸡要生个蛋，如果不由卢格对这一“事件的合理性加以审查”¹⁷⁷，那也不行。无论如何都必须同随便哪一家地方报纸保持联系，因为在报纸上可以完成“再次出现”。给报纸写的任何一篇文章他都得冠上自己的名字并在里面尽可能地谈他自己，否则他就不写。这个“再次出现”的原则必须运用在每一篇文章上，每篇文章都先是以书信的形式在欧洲的和(从海因岑迁居纽约时起)美洲的报纸上发表，然后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最后再一次在全集里发表。

我们的卢格这样武装起来以后，可以回到莱比锡去叫那里的人们明确地承认他是个“**有性格的人**”了。可是，他在这里找到的也不尽是玫瑰花。他的老朋友，出版家维干德很成功地代替他充当了

尼古拉的角色，因为连一个空职位也没有，卢格陷入了忧郁的沉思：一切“奇闻”都已毫无用处。突然，德国革命爆发了。

在这次革命中我们的阿尔诺德出乎意料之外地得救了。强大的运动终于爆发了，在这个运动中，就连最迟钝的人也能顺顺当地随着大流走，因此，卢格立刻奔赴柏林，企图在那里混水摸鱼。因为那里刚刚爆发革命，所以他认为建议改革是最合时宜的。他用这个名字¹⁷⁸创办了一张小报。革命前出版的巴黎的“改革报”¹⁷⁹是法国的一张最平庸、最无知和最枯燥无味的报纸。柏林的“改革报”证明，它甚至可以超过它的巴黎的榜样；甚至在“理性的首都”也可以毫无愧色地把这样难以想像的报纸呈献给德国公众。卢格的不善辞令的特点似乎是最可靠地保障了隐藏在这种不善辞令后面的那些思想的深刻内容，根据这个理由，阿尔诺德被选为布勒斯劳^①出席法兰克福议会的代表。在那里，他立刻找到机会以民主派左翼编辑的身分带着荒谬的宣言出现。在其余的方面，他只是用欧洲各国人民代表会议的宣言这种幻想来表现自己，他热心地附和大家的关于普鲁士融合于德意志的愿望。后来，回到柏林以后，他却要求德意志融合于普鲁士，而法兰克福则融合于柏林，而最后，当他想起来要当萨克森的贵族的时候，他又要求德意志和普鲁士都融合于德勒斯顿了。

他的议会活动并没有给他带来桂冠，相反地，他自己的那一帮人由于看出他的迟钝和无能，而对他大失所望。同时，他的“改革报”的业务也每况愈下，于是他认为，只有亲自回到柏林才能扭转这种局面。作为“正直意识”的他，自然为自己的离去找到了具有

①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高度政治意义的借口，他并且还建议整个左翼同他一起退出议会。这当然没有成功，于是卢格就一个人回到了柏林。在柏林，他发现按照“德骚的榜样”（他这样称呼小的典型的民主立宪国家），最能解决当前的冲突。后来，在**维也纳**被围的时候，他草拟了新的**宣言**，号召**弗兰格尔**将军起来捍卫维也纳，反对文迪施格雷茨。他以签了字的宣言已经排印好了为借口，使这个唯一的文件获得了民主派代表会议¹⁸⁰的批准。最后，当柏林也被围以后，卢格先生就到曼托伊费尔那儿去，向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改革报”的建议，可是这些建议都遭到了拒绝。曼托伊费尔对他表示，再也没有比“改革报”更好的反对派报纸了，“新普鲁士报”¹⁸¹要危险得多等等，天真的卢格连忙得意洋洋地把这句话传播到德国各地。同时，阿尔诺德醉心于**消极抵抗**¹⁸²，并且自己实行起来了，他把报纸、编辑及其他一切都交给命运去摆布，急忙溜之大吉。显然，积极逃跑是消极抵抗的最彻底的形式。反革命进攻了，卢格头也不回地从柏林逃到了伦敦。

在德勒斯顿爆发五月起义的时候，阿尔诺德同他的朋友奥托·维干德和市议会一起成了莱比锡运动的领袖。他和他的这些同事一起发表了告德勒斯顿人的强有力的**宣言**，请他们勇敢地战斗，因为在莱比锡有卢格、维干德和本市的父老们守卫着，而守卫者也受着上帝的保护。但是这个宣言刚一发表，我们的勇敢的阿尔诺德便急忙离开，到卡尔斯卢厄去了。

在卡尔斯卢厄他也并不感到安全，虽然巴登人驻扎在尼喀河畔，而形势也还远没有发展到采取军事行动的地步。他请求布伦坦诺派他到巴黎去做大使。布伦坦诺开了他一个玩笑，让他做了十二小时的大使，而在第二天早晨正好在卢格准备起程的时候从他那

里骗回了委任状。但是卢格还是同真正受到任命的布伦坦诺政府的代表——许茨和布林德——一起到巴黎去了，他的举止非常奇特，甚至连他自己过去的编辑奥本海姆也认为必须在官方的报纸“卡尔斯卢厄日报”¹⁸³上宣布，卢格先生完全不是作为官方人士到巴黎来，而是完全“由自己负责”。有一次，当许茨和布林德带着他去见赖德律—洛兰的时候，卢格突然中断了外交上的谈话，开始当着法国人的面痛骂德国人，弄得他的同伴手足无措、窘迫不堪地退了出来。6月13日来到了，这一天大大地震动了我们的阿尔诺德，他简直连什么理由都没有提出便逃跑了，并且一直到踏上了伦敦这块自由的大不列颠的土地时才又镇静下来。后来，在提到这次逃跑的时候，他把自己比作狄摩西尼。

在伦敦，卢格先是企图宣布自己是巴登临时政府的大使。后来他又企图以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的资格钻进英国新闻界，可是到处碰壁，原因是英国人过于唯物，无法理解德国的哲学。此外，当人们问起他的作品时，卢格只好以叹息来回答，与此同时布鲁诺·鲍威尔的形象又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来了。因为，就拿他的全集来说，也不过是一些重印过许多次的小册子！甚至连小册子也不是，而只是一些印成小册子的报刊文章，实际上甚至连报刊文章也不是，而只是从读过的书中摘录下来的一些杂乱无章的片段而已。必须重新做点什么，于是卢格给“先驱”写了两篇文章¹⁸⁴，在文章里他以描写德国民主派为借口，宣布“人道主义”在德国现在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它的代表人物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阿尔诺德·卢格，即（1）“当代的宗教”、（2）“民主和社会主义”、（3）“哲学和革命”这几本著作的作者。这三本到现在还无法在任何一个书店里找到的杰出的作品自然只是卢格的某些旧文

章的还没有发表的新标题而已。与此同时，阿尔诺德又开始了他每天的功课，把“晨报”¹⁸⁵转载自“科伦日报”的一些文章重新译成德文，这对他本身颇有教益，对德国公众也有利，只是使勃律盖曼先生大吃了一惊。

他一无所成地回到了奥斯坦德，在那里他找到了为准备充当德国流亡者中最聪明的糊涂虫^①所必需的闲暇。

正如古斯塔夫提倡素食，哥特弗利德提倡德国小资产阶级庸人的感情一样，阿尔诺德提倡德国小资产阶级庸人的理性，或者说得确切些，是提倡这种人的无理性。和阿尔诺德·文克里特¹⁸⁶一样，他也没有发现自由的道路，他自身就是“自由”的阴沟^②。在德国革命中，卢格就像路角上的一块写着“这里准许小便”的招牌那样惹人注意。

但是，最后还是让我们回到我们的通告和附函上来吧。通告没有得到预期的反应，成立民主的统一的教会的初步尝试也毫无结果。后来，施拉姆和古斯塔夫声明说，毛病只是出在卢格既不会讲法语，也不会写德文。但是，大人物们立刻又重新行动起来了。

Che ciascun oltra moda era possente,

Come udirete nel canto seguente.

(一人是另一人的奇妙的力量，

详细情节，请听下一首歌曲。)③

① 俏皮话：德语中《Konfusius》（“糊涂虫”）和 Konfuzius（孔夫子）发音相同。——编者注

② 俏皮话：德语中《Gasse der Freiheit》（“自由的道路”）和 Gosse der Freiheit（“自由的阴沟”）只有《a》和《o》一个字母之差。——编者注

③ 博雅多“恋爱中的罗兰”。——编者注

六

罗多芒特—海因岑¹⁸⁷和古斯塔夫同时从瑞士来到了伦敦。几年来一直靠威胁要在德国铲除“暴君”为生的卡尔·海因岑，在二月革命爆发后竟充满了前所未闻的勇气，决定重新踏上德国的土地，到了舒斯特岛，以后又转往瑞士。在那里，在安全的日内瓦，他又开始攻击“暴君和压迫者”，并利用机会宣布，“科苏特是个伟人，但是他忘掉了雷汞”。由于厌恶流血，海因岑成了革命的炼金术士。他幻想一种爆炸物，能在一眨眼之间彻底消灭整个欧洲反动势力，而使用这种爆炸物的人连一个手指也不会烧伤。他特别厌恶在弹雨下“散步”，讨厌普通的作战方法，因为使用这种作战方法，信仰是不能防御枪弹的。在布伦坦诺先生执政时期，他甚至冒险作了去卡尔斯卢厄的革命旅行。由于在那里他没有得到预期的对他的伟大功绩的奖励，他最初是决定去主编“叛徒”布伦坦诺的官方通报^①的。但是，当普鲁士人开始进攻的时候，他声明，他海因岑决“不打算”为了叛徒布伦坦诺而“让人杀死”，并借口要组织精锐部队（在这个部队里政治信仰和军事组织将相互补充，换句话说，即军人的怯懦将被认作政治上的勇敢），要不断地追求这种模范的志愿部队，他退却了，一直到重新回到瑞士的故土为止。“索菲亚从默麦尔到萨克森的旅行”¹⁸⁸看来比罗多芒特的革命进军更富于血腥

^① 即“卡尔斯卢厄日报”。——编者注

味。到瑞士后，他声明，德国已经再没有什么人了，真正的雷汞还没有发现，战争不是靠革命信仰来进行，而是用普通的方法、用火药和铅弹来进行的，现在他将开始使瑞士革命化，因为他认为德国已经丢失了。在纯朴的被隔离的瑞士，由于当地讲的是完全走了样的语言，罗多芒特倒可以被认为是德国作家，甚至是危险的人物了。他达到了他所希望的目的。他遭到了驱逐，并由瑞士联邦出资将他送到了伦敦。罗多芒特—海因岑没有直接参加欧洲的革命，但是毫无疑问，他曾经为革命大大奔忙了一阵。当二月革命爆发的时候，他为了赶去帮助祖国，在纽约举行了“支援革命的捐款”，并且好容易到达了瑞士边境。当三月革命在德国各邦遭到惨败的时候，他靠了瑞士联邦委员会的资助从瑞士迁移到了拉芒什海峡的彼岸。他很满意既能向革命征收款项作进攻之用，又能向反革命要钱作退却之用。

在意大利的骑士叙事诗中常常出现威武的魁伟的巨人；他们的武器是又粗又大的木棍，但是在格斗的时候，尽管他们野蛮地乱打，大声地吼叫，但总是打不着敌人，而只能打着周围的树木。海因岑先生就是政治著作中的这样的阿里欧斯托的巨人。他生就一副粗壮结实的体格，他把这一点看做他应当成为伟大人物的标志。这副笨重的体格影响到他的全部写作活动，他的写作活动也是粗笨不堪的。他的敌人总是很矮小的，是连他的足踝也够不到的侏儒，他甚至要把身子弯到膝盖才能从上面看到他们。然而，当需要行动的时候，《uomo membruto》（“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却在著作中或法庭上寻找救星。因此，他一安全地踏上了英国的土地，便写了一篇关于精神勇敢的文章。而在纽约我们的巨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经常挨一个叫李希特尔先生的人的毒打，以至原先只对后者处

以少许罚金的治安法官，终于注意到他的行动带有目的性，判决侏儒李希特尔先生因殴打而赔偿二百美元。

在这个一切都健康的巨大身躯上自然附有**健康的人的思想**，海因岑先生深信，他是最富有这种思想的。按照这个健康的人的思想的要求，海因岑先生这个天生的天才什么也不学习，在文学和科学方面一无所知。由于健康的人的思想（他把这种思想也叫做“他特有的洞察力”，并根据这种思想向科苏特担保，“他已经深入到思想的极限”），他学习只是靠道听途说或是靠报纸，因此他总是落后于时代，总是穿着几年前就已经被著作界抛弃了的服装来炫耀自己，而新的现代服装他还怎么也穿不惯，他把它们说成是不道德的和无用的东西。但是，他对他已经掌握了的东西却坚信不移，而且这对他来说变成了一种一向如此的、不言而喻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应当赞同它，只有心怀恶意的、愚蠢的或是喜欢诡辩的人才不想理解它。如此结实的体格，如此健康的人的思想当然也应当具有坚定的端正的**信仰**，并且它们完全应当使对这些信仰的愚蠢的信任达到极限。在这方面海因岑是做得最出色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依靠信仰，拿信仰和每个论据相对抗，而对一切不理解他或是他所不理解的人，他干脆都把他们说成是没有任何信仰、由于存心不良和心怀恶意而否认像白昼一样明白的事物的人。他呼唤他的缪斯——愤慨——来反对阿利曼¹⁸⁹的这些可鄙的信徒：他咒骂，他叫喊，他自吹自擂，他教训人，他吐沫飞溅地做着简直令人啼笑皆非的空洞说教。他表明，谩骂式的文学如果被一个既不如白尔尼那样机智又缺乏白尔尼那样的文学教养的人拿来运用，会弄成什么样子。他的风格也和他的缪斯一样，永远是童话里的“袋子里的小棍子！”¹⁹⁰，但是，这里是一根极普通的小棍子，就是它的结

节也不奇特,而且也没有刺。只有当他遇到某种科学上的东西的时候,他才立刻踌躇起来。他的情况就像比林格斯盖特¹⁹¹的女鱼贩子一样,有一次奥康奈尔同这个女商贩发生了争吵,奥康奈尔一个劲儿地骂她:“你自己才是这样,你还要更坏,你这个等腰三角形,你这个平行六面体!”,这样就骂得她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从海因岑先生过去的经历中,应该指出,他在荷兰殖民地上虽不曾做到将军,但是做到了下级军官。由于受此屈辱,后来他总是批评荷兰人,说他们是没有信仰的民族。以后,我们又在科伦看到他做了小税吏,他用这个身分写了一个喜剧,在这个喜剧中他的健康的人的思想竟枉费心机地想嘲弄黑格尔的哲学¹⁹²。他在“科伦日报”末版的地方闲话栏内感到非常自在,在那里他妄自尊大地议论科伦的俱乐部(科伦的所有伟人都是从这个机构里产生出来的)里发生的口角。他本人的不幸,以及他的父亲林务官海因岑同上司发生冲突时所遭遇的不幸,就像健康的人的思想在各种微不足道的私人冲突中的一般经历一样,在他看来都具有世界事件的性质。他在“普鲁士的官僚制度”一书中描述了这些不幸,这本书比费奈迭的书¹⁹³还要糟糕得多,书中除小官吏对上司的抱怨外,毫无其他内容。这本书把他牵进了关于出版问题的案子。虽然他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不过是受六个月的监禁,可是他竟感到有杀头的危险,因此逃到布鲁塞尔去了。他在那里要求普鲁士政府不仅保证他能自由通行,而且为他完全废除法国的诉讼程序,并把他交付审理普通犯罪案件的陪审法庭¹⁹⁴;普鲁士政府颁布了逮捕他的命令;他以普鲁士政府的“逮捕令”一文作了答复¹⁹⁵;可是,在这篇文章里,他宣传精神反抗和君主立宪,而把革命者说成没有道德的和狡猾的人。他从布鲁塞尔转到了瑞士。在那里,如上所述,他会见了

朋友阿尔诺德，并且除了他的哲学以外，还向他学会了非常有用的发财致富的方法。正如阿尔诺德在论战中力图掌握对手的观点一样，海因岑在咒骂中也开始掌握他所反对的新思想。他还没有来得及成为无神论者，便怀着改宗者的热忱和激情，立刻向可怜的老福伦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因为后者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在晚年无缘无故地也成为无神论者。他现在直接接触到的瑞士联邦共和国使他的健康的人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以至他现在就希望在德国也实行这样的联邦共和制。但是健康的人的思想也使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革命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海因岑成了革命家。他开始兜售小册子，在这些小册子中他以瑞士乡下佬的最粗鲁的语调鼓吹立刻投入“战斗”，并以死亡来威胁所有的君主，世上的一切灾祸的根源。他打算在德国成立一些委员会来募集出版和推销这些小册子的资金，趁机不客气地进行大规模的勒索——在这一笔生意中，属于他那一派的人先是被利用，然后是挨一顿臭骂。这方面的情况伊茨施太因老头可以作详细的说明。这些小册子在周游全国的德国酒商中为海因岑博得了很大的荣誉，这些酒商到处都把他吹嘘成勇敢的“斗士”。

他从瑞士转到了美洲；在这里他虽然靠了瑞士乡下佬的风格而被认为是个真正的诗人，然而在短短的时间内便断送了纽约的“快邮报”¹⁹⁶。

二月革命后，他回到了欧洲，给“曼海姆晚报”¹⁹⁷写了几篇关于伟人海因岑到来的报道，出版了一本攻击拉马丁的小册子¹⁹⁸，来报复拉马丁和整个政府轻视他、对他的在美洲的德国人代表的委任状置之不理的行为。他不想回普鲁士，因为，虽然发生了三月革命和宣布了大赦，但是他认为他在那里仍然有杀头的危险。人民应当

召唤他。而事实并不如此，所以他打算缺席当选为代表汉堡出席法兰克福议会的议员，他的理由是：既然他不是一个好演说家，那末他就会更积极地投票。但是他失败了。

巴登起义结束后，他来到了伦敦，他极其愤怒地批评青年人，因为革命前和革命后的大人物都由于这些青年人而被忘却，也被这些青年人自己所忘却。他永远只是 *l'homme de la veille* 或 *l'homme du lendemain* (昨天的人或明天的人)，却从来不是 *l'homme du jour* (今天的人)，特别不是 *de la journée* (坚决行动的日子的人)，因为真正的雷汞还没有发现，必须寻找同反动派斗争的新工具。因此，他要求牺牲二百万人，以便他能够以独裁者的身分踏过深及踝骨的鲜血(当然是别人流的)。实际上这只是为了出丑。反动派曾出钱把他送到伦敦，现在他们应当用放逐出英国的办法再把他免费送到纽约。可是，他的企图并没有实现，而只是惹得法国激进派报纸把他叫做蠢货，说他要求牺牲二百万人，只是因为他从来不拿自身去冒险。但是为了冠冕堂皇地了解这件事情，他……在前不伦瑞克公爵的“德意志伦敦报”上发表了她的杀气腾腾的、充满了血腥味的文章，——当然是为了现钱。

古斯达夫和海因岑老早就互相敬仰的。海因岑把古斯达夫说成圣贤，而古斯达夫则把海因岑说成斗士。海因岑几乎等不到欧洲革命结束，就来结束“民主派德国流亡者之间的致命的纠纷”，并重新开始他的3月以前的工作。他“提出了德国革命政党的纲领，作为自己的建议和草案以供讨论”。这个纲领引人注意的是：它发明了一个特殊的部，“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其他任何部门，它负责建立公共的运动场、格斗场(不是在弹雨下)和公园”；其次是它命令“取消男子的优先权，尤其是在婚姻上的优先权”(特别是在战时采

用突击策略的时候。见克劳塞维茨)。其实,这个纲领不过是海因岑给古斯达夫的一纸外交照会:根本没有人注意它。这个纲领非但没有加强团结,反而引起了这两只阉鸡之间的立即破裂。海因岑要求为“革命的过渡时期”任命一个唯一的独裁者,这个独裁者一定要是普鲁士人,同时为了避免误会,他补充道:“士兵不能当独裁者”。而古斯达夫则相反,要求三头独裁,其中除他以外,至少还应当有两个巴登人。此外,古斯达夫还以为他已经发现,海因岑在急忙公布的纲领里窃取了他的某种“观点”。这样,这第二次团结的尝试就破产了,而根本未被世人承认的海因岑,又回去过他的隐居生活,一直到他发现英国的土地使他再不能忍受而在1850年秋天到纽约去为止。

七 古斯达夫和斋戒移民区

不知疲倦的古斯达夫在他再一次打算和弗里德里希·博布钦、哈贝克、奥斯渥特、罗森勃鲁姆、康海姆、格隆尼希和其他“杰出的”人物共同成立流亡者中央委员会的企图遭到失败以后，就到约克郡去了。在这里，奇妙的花园应当百花盛开，而满园争艳的也不是阿耳契娜¹⁹⁹花园里的邪恶，而是美德。一个很幽默的英国老头，讨厌我们的古斯达夫的理论，他抓住了他的话柄，在约克郡给了他几摩尔根沼泽地，附上一个必须执行的条件即要他在那里建立“斋戒移民区”，在这个移民区里严禁吃肉、吸烟和喝酒，只允许素食，每个移民每天早晨都必须读一章司徒卢威关于国家法的著作，以代替祈祷。此外，移民区还必须自力更生。古斯达夫带了他的阿马利亚、黄口小儿士瓦本人施瑙费尔和其他几个战友顺从地出发了，并且建立了“斋戒移民区”。关于这个移民区能说的只是：在那里，不是一片“繁荣安乐”的气象，而尽是教化和烦恼与消瘦的无限“自由”。就这样，在一个美丽的早晨，我们的古斯达夫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阴谋。他的伙伴们没有像他那样的反刍的习惯，他们厌恶素食，因而决定背着他们宰掉唯一的一头老奶牛，而这头奶牛的牛奶却是“斋戒移民区”的主要收入来源。古斯达夫对于如此恶意地对待一个同类的行为惊骇异常，痛哭流涕，他愤怒地宣布，移民区解散了，而既然他这次仍然无法在伦敦恢复“德国旁观者”或者建立某种“临时政府”，于是他决定去当一个湿的教友派信徒²⁰⁰。

八

决不适于奥斯坦德的隐居生活并向往着“再次出现”于公众面前的阿尔诺德听到了古斯达夫的不幸的消息。他立刻决定赶回英国，踏着古斯达夫的肩爬上欧洲民主派五巨头之一的地位。事情是这样：当时由马志尼、赖德律—洛兰和达拉什成立了欧洲中央委员会²⁰¹，其首脑是马志尼。卢格嗅到了这里还有一个空位。马志尼固然可以把由他自己一手造成了将军的恩斯特·豪格任命为他的“流亡者”²⁰²的德国撰稿人，但是，即使从面子来考虑，他也不可能让这个毫无名声的人充当他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我们的卢格知道，古斯达夫还在瑞士就认识了马志尼。他自己虽然也认识赖德律—洛兰，但是可惜他不认识自己。于是，阿尔诺德在布莱顿住了下来，开始时好和同情纯朴的古斯达夫，答应和他一起在伦敦创办“德国旁观者”，甚至由他出钱来共同经营罗泰克—韦尔凯尔的政治科学辞典的民主派版本。同时，他把我们的古斯达夫作为大人物和撰稿人介绍给一家德国地方报纸，这些报纸他按照自己的原则总是把它们放在手边的（这一次命运落到了“光明之友”派教士杜朗的“不来梅每日纪事”²⁰³的身上）。彼此互赖互助。古斯达夫把阿尔诺德介绍给马志尼。因为阿尔诺德讲的是别人完全不懂的法语，所以没有人能妨碍他以大人物的姿态，尤其是以德国“思想家”的姿态自荐于马志尼。饱经世故的意大利狂热者第一眼就看出了阿尔诺德是他所需要的人，是一个 *homme sans conséquence*（无关紧

要的人)他可以在他的反罗马教皇的训谕上以德国人的名义签名。于是,阿尔诺德·卢格便成了欧洲民主派中央这辆马车的第五个轮子。当一个亚尔萨斯人问赖德律,他怎么会产生同这种《bête》(“蠢货”)联合的念头,赖德律刻薄地回答道:《C'est l'homme de Mazzini》(“他是马志尼的人”)。当有人问马志尼,为什么他要和赖德律这个毫无思想的人联合的时候,老滑头回答道:《C'est précisément pourquoi je l'ai pris.》(“这正是我选中他的原因。”)马志尼本人有充分理由摆脱开有思想的人。而阿尔诺德·卢格却感到他已经超过了自己的理想人物,有时甚至把布鲁诺·鲍威尔也忘记了。

当他必须签署马志尼的第一个宣言的时候,他忧郁地想起了他在哈雷反对利奥教授和在瑞士反对福伦老头的时刻,前一次他还是神圣三位一体的学说的信徒,而后一次则是人道主义的无神论者了。而这一次却要同马志尼一起反对君主,保卫上帝。这时,我们的阿尔诺德的哲学良心已经由于他同称他为哲学家的杜朗及其他教士的交往而大大地堕落了。最近,我们的阿尔诺德已完全无法摆脱某种宗教上的弱点,此外,他的“正直意识”又在对他悄悄地说:“签名吧,阿尔诺德! Paris vaut bien une messe (为巴黎作弥撒是值得的)²⁰⁴。决不能 in partibus (在异国的)欧洲临时政府中白白地充当无关紧要的委员!想想吧,阿尔诺德!每两星期在宣言上签一次名,而且是作为《membre du parlement allemand》(“德国议会议员”)置身于欧洲最伟大的人物的集团里!”于是阿尔诺德汗流浹背地签了名。他喃喃自语道:“真是奇妙的怪事! Ce n'est que le premier pas qui coute (万事开头难)。”他在头天晚上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后面这句话。然而,对阿尔诺德的考

验还没有完结。欧洲中央委员会向欧洲、法国人、意大利人、西里西亚的波兰人、瓦拉几亚人发表了一系列的宣言以后，现在轮到德国了，好在这时正好爆发了布隆采尔城下的大战²⁰⁵。马志尼在草稿中攻击了德国人缺乏世界主义精神，尤其是攻击他们没有必要傲慢地对待意大利的腊肠商、流浪乐师、糖果点心商、玩土拨鼠者和捕鼠器贩卖商。阿尔诺德虽受此羞辱，却什么都一口承认下来。他甚至声明，同意将提罗耳省的意大利语部分和伊斯的利亚半岛让给马志尼。但是这还不够。不仅必须忠告德意志民族，而且还应当给它的软弱的一面以影响。阿尔诺德这次受命发表本人的意见，因为他代表了德意志部分。这时他的感受就像应考的约卜西²⁰⁶一样。他沉思地搔着后脑勺，经过长久的考虑后，含糊地说：“从塔西佗时代起，德意志的弹唱诗人用低沉的声音唱着歌，冬天里在所有的山上生起篝火，以便烤脚。”

马志尼微笑地说：“弹唱诗人、低沉的声音和所有的山上的篝火！这对德意志的自由并无帮助！”于是，弹唱诗人、低沉的声音、山上的篝火和德意志的自由都被当作给德意志民族的小费而收入了宣言²⁰⁷。阿尔诺德·卢格自己也很奇怪，居然通过了考试，并且第一次懂得，管理世界并不需要有多少智慧。从此，他比任何时候都更鄙视还在青年时代就已经写出十八部巨著的布鲁诺·鲍威尔了。

当阿尔诺德在欧洲中央委员会的仆从座位上这样为马志尼签署反对君主保卫上帝的好战宣言的时候，和平运动在科布顿的领导下不但席卷了英国，甚至越过了德意志海，这才使骗子手美国佬艾利修·巴里特和科布顿、尧普、日拉丹以及印第安人卡—基—加—基—瓦—瓦—贝—塔得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和平代表大

会²⁰⁸。我们的阿尔诺德也手痒痒的,很想趁这个机会实现他的“再次出现”,并以自己的名义发表宣言。因此,他自命为这个法兰克福会议的通讯委员,并且向那里寄去了乱得一塌糊涂的和平宣言,这篇宣言是他用他的思辨的波美拉尼亚文照科布顿的演说改写成的。有几个德国人向阿尔诺德指出,他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好战立场同他的教友派信徒的和平宣言之间有矛盾。对此他通常是这样予以反驳:“这里是存在着矛盾的。这就是辩证法。我在年轻时研究过黑格尔。”而“正直意识”则这样安慰他:马志尼不懂德文,因此很容易蒙混他。

刚刚在赫尔登岸的哈罗·哈林对他的庇护也预示了阿尔诺德同马志尼的关系有巩固的希望。哈罗·哈林以一个新的、非常出色的人物登上了舞台。

九

1849—1852年的民主派流亡者的伟大戏剧的序幕，还在十八年前就已经揭开了，这个序幕就是1830—1831年的蛊惑民心的流亡者。虽然这样长的时间已经足以把这首批流亡者中的很大一部分从舞台上清除出去，然而还是有几个可尊敬的残余人物存留下来了。他们对世界历史的进程及其本身活动的结果泰然处之，他们继续操着鼓动家的行业，拟定包罗万象的计划，成立临时政府和向左右散发宣言。显然，这些经验丰富的骗子在通晓事务方面比新的一代不知要高明多少倍。由十八年来玩弄阴谋、勾结、诡计、宣言、欺骗和个人突出的实践经验所获得的这套办事本领，使马志尼先生在掌握了三个在这方面缺乏经验的傀儡之后，有勇气和信心宣布自己就是欧洲民主派的中央委员会。

谁也没有像我们的朋友哈罗·哈林那样由于时势而处于成为典型流亡者鼓动家的更有利的地位。而他也确实成了我们的一切流亡中的大人物——所有的阿尔诺德们、古斯达夫们和哥特弗利德们多少是有意识地并且多少是成功地竭力加以摹仿的榜样；他们也许能做到（如果不发生任何对此不利的情况的话）和他平起平坐，但是未必能够高他一筹。

哈罗像凯撒一样自己描写了自己的功勋（1852年于伦敦）²⁰⁹。他生于“金弗里亚半岛”^①，属于有先见的北弗里西安人种，这个人

^① 即日德兰半岛的古称。——编者注

种通过克雷门特博士证明了，世界上一切伟大民族都起源于它。“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力求“用行动来证明他对各族人民的事业的忠诚”，因而于 1821 年出发前往希腊。显然，从青年时代起，朋友哈罗就认为，他负有前往一切发生了任何骚乱的地方的使命。后来，他

“由于奇妙的命运而来到了专制制度的发源地，直接靠近了沙皇，而在波兰的时候，仔细观察了君主立宪的伪善的性质”。

因此，还在波兰时哈罗就已经为自由而战了。但是，“华沙陷落后的欧洲历史上的危机使他陷入了深思”，而这次深思却使他产生了关于“国籍民主”的思想：他立刻把这一思想“发表在 1832 年 3 月于斯特拉斯堡出版的‘各族人民’这本著作里”。关于这一著作必须指出，人们差点在汉巴赫大典²¹⁰上引用了它。与此同时，他发表了他的“共和主义的诗篇：‘血滴’、‘扫罗王的历史，或君主政体’、‘大人物之声。论德国的统一’”，并主编在斯特拉斯堡出版的杂志“德意志”²¹¹。所有这些著作，甚至他的一切未来的著作，突然幸运地于 1831 年 11 月 4 日遭到了联邦议会的禁止。这正是光荣的战士所缺少的，现在他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同时戴上了受难者的花冠。于是，他可以高呼：

“我的著作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且在人民的心中引起了深刻的反应。它们大部分是免费奉送的。其中有几部的收入甚至不能抵销出版费的开支。”

但是新的荣誉等待着他。还在 1831 年 11 月，韦尔凯尔先生就在一封长信里，枉费心地企图“说服他走向立宪主义的垂直的地平线”。以后，在 1832 年 1 月，普鲁士在国外的著名的代理人马尔滕先生到他那里去，建议他为普鲁士服务。两次推崇居然都是来自敌人方面！可以说，马尔滕的建议“无意中”唤起了他的

“两个希望：复活斯堪的那维亚国际这个观念，来对抗这种王朝的背叛行为”，并且“从这时起至少是已被遗忘了一百年的‘斯堪的那维亚’这个词已经复活了”。

这样，来自南日德兰半岛的、不清楚自己是德国人还是丹麦人的、我们的北弗里西安人至少得到了一个幻想的国籍，而由此所得到的第一个结果却是：汉巴赫人不想同他打交道了。

通过这些事件，哈罗的地位有了保障。争取希腊和波兰自由的老战士，“国籍民主”的发明者，重新发现了“‘斯堪的那维亚’这个词”的人，由于联邦议会的禁令而得到公认的诗人，思想家和新闻工作者，受难者和立宪主义者、专制政体拥护者和共和主义者竞相争夺的、连敌人也尊敬的伟大人物，加上又是一个头脑空虚和糊涂得足以相信自己伟大的伟大人物，——他还有什么不幸呢？但是，随着荣誉的增高，哈罗作为一个严格的人，对自己的要求也增高了。应当写一部巨著，以引人入胜的和通俗的形式、用艺术的笔调来综合关于自由的伟大学说、国籍民主的思想，以及在他心目中正在觉醒的青年欧洲的一切高尚的爱好自由的愿望。这样的著作只有头等的诗人和思想家才写得出来，而能够成为这样的诗人和思想家的也只有哈罗。于是便出现了“戏剧集‘人民’”的头三部，“而总共则有十二部，其中有一部是用丹麦文写的”，作者为这一著作贡献出自己生命中的整整十年。可惜，这十二部书中有十一部“至今还只是些手稿”。

然而，同缪斯的甜蜜的交往维持得并不很久。

“1832—1833年冬天，运动在德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在法兰克福的悲剧性的混乱中遭到了失败。当时我受委托在4月6日深夜占领克尔要塞(?)。人和武器都已经准备好了。”

可惜，这一切都毫无结果，哈罗也不得不离开，而到法国内地去，在那里他写成了他的“一个人的话”。已经准备好向萨瓦进军的波兰人召唤他从那里到瑞士去。在那里，他成了“他们的司令部的同盟者”，还写了两部戏剧集“人民”，并且在日内瓦认识了马志尼。然后，这一帮由波兰、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瑞士的冒险家组成的硫磺党²¹²在高贵的拉莫里诺的率领下，向萨瓦进行了有名的侵犯²¹³。在这次进军中，我们的哈罗感到了“自己的生命和毅力的价值”。但是，因为其他自由战士都像哈罗一样感到了“自己的生命的价值”，而对于自己的“毅力”并未抱任何幻想，所以结果很糟，这一伙人回到瑞士的时候，已经土崩瓦解，东逃西散了。

为了使这群流亡的骑士充分认识到他们对于暴君是多么可怕，仅仅这一次进军是不够的。当七月革命的回声还在法国、德国或意大利以个别起义的形式显示出来的时候，当还有人拥护我们的流亡的英雄的时候，他们感到自己只是行动起来的全体群众中的一分子，虽然是多多少少享有特权的领导分子，但终归还是一分子。随着这些起义的力量的逐渐消失，随着广大的群众即“懦夫”、“漠不关心的人”、“缺乏信仰的人”日益嫌弃起义的把戏（Putschs — chwindelei），而我们的骑士也感到自己愈来愈孤单，于是他们的妄自尊大也就开始滋长起来了。既然整个欧洲都变得那样怯懦、愚蠢和自私自利，那末，在他们自己看来，忠于事业的人的出现是多么必要！这些人像献身者一样胸怀仇视暴君的神圣火焰，并为未来的更勇敢的下一代保存了伟大时代的美德和对自由的热爱的传统。如果连他们也背叛了事业，那末暴君就要永远得救了。于是，像1848年的民主派一样，他们在每一次的失败中都吸取了新的必胜的信心，并且日益变成生活资料大成问题的游侠唐·吉珂德。采

取了这样的立场，他们就可以创立他们的最伟大的功绩，即成立“青年欧洲”²¹⁴了，这个同盟的由马志尼拟定的关于团结友爱的宣言，于1834年4月15日在伯尔尼签署。哈罗以下面的身分参加了这个同盟，这就是

“中央委员会的发起人，被授予公民权的‘青年德意志’和‘青年意大利’的成员，同时又是斯堪的那维亚支脉的代表”，他“直到今天还代表”这一脉。

团结友爱宣言签署的日子，对于我们的哈罗来说，成了伟大世纪的开端：纪年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往前计算和往后倒算的，就像过去一直是从基督降生日开始一样。这个日子标志着他生活中的顶点。他是 *in partibus*（在异国的）欧洲几头独裁中的一头，虽然他并没有名闻世界，但总还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人物之一。在他后面，除了他的无数尚未出版的著作、几个在瑞士的德国手工业者和一打堕落的政治骗子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但是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断言，各族人民都和他站在一起。这就是一切大人物的特点：当代并不承认他们，而正因为如此，未来是属于他们的。而这个未来，我们的哈罗已清清楚楚地带在自己的背包里了，这个背包就是团结友爱宣言。

可是从这时起，哈罗开始倒霉了。他遭到的第一个打击是：“青年德意志”于1836年脱离了“青年欧洲”。但是德国因此而受到了惩罚，也就是由于这一脱离，“1848年春天，德国对于民族运动毫无准备”，所以一切事情的结局都是如此地可悲。

但是这时出现的共产主义使我们的哈罗感到更为沉痛。在这里，我们听说，共产主义的发明者不是别人，而是

“柏林来的老脸厚皮的约翰奈斯·弥勒，1831年在阿尔坦堡出版的关于

普鲁士政治的非常有趣的小册子的作者”，他到英国去了，在那里他“除了每天早晨在斯密斯菲尔德市场上照料猪以外，没有任何事情可做”。

共产主义流行病很快在法国和瑞士的德国手工业者中间传播开来，而且它已经成了我们的哈罗的最危险的敌人，因为他的著作的唯一的销售市场因此封闭了。这就是“共产主义者的间接的书报检查”，可怜的哈罗直到现在还遭到这种苦难，而且正如他忧郁地承认的，我在的苦难甚至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沉重，“他的戏剧‘王朝’的命运也证实了这一点”。

这种“共产主义者的间接的书报检查”甚至把我们的哈罗赶出了欧洲，他到了里约热内卢（1840年），在那里他曾充当了一个时期的艺术家。他“忠实地遵循着时代的精神”，在那里出版了

“斯基的那维亚之诗”（两千册），这部作品，从这时起由于在水手中流行而成了海洋上的作品”。

但是可惜，“由于对‘青年欧洲’的毫不苟且的责任感”，他很快又回到了欧洲，

“他连忙到伦敦去看马志尼，并且在那里很快就看出了共产主义对欧洲人民事业的危险性”。

新的功勋等待着他。邦迪埃拉兄弟已作好了远征意大利的准备²¹⁵。为了支援他们的这一事业和向专制制度进攻，哈罗

“又回到了南美，预备同加里波第共同为了人民的未来，用暴力协助南美合众国的成立”。

然而，专制君主识破了他的意图，于是哈罗便急忙躲了起来。他到纽约去了。

“在海洋上航行的时候，我展开了频繁的脑力活动，除了其他作品之外写

成了属于戏剧集‘人民’的‘思想的权力’，这部作品到现在同样地还只是一份手稿。”

他随身带着一个臆想的地方组织《Humanidad》（“人类”）的委任状从南美到达了纽约。

二月革命的消息鼓舞了他，他用法文写了“苏醒了法国”一书，而在启碇去欧洲的时候

“我又一次把自己对祖国的爱永记在诗集‘斯堪的那维亚’中的几首诗里”。

他到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在这里，他发现

“离开了二十七年后，国际法、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概念被弄得无比混乱，这些概念就像腐烂的稻草一样乱七八糟地堆在党派的暴怒和民族的仇恨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里”。

但是这并不奇怪，因为

“从1831年起，我的政治著作，以及我的一切意愿和活动，在祖国的这些边疆地区便不被人们所知”。

奥古斯滕堡党²¹⁶十八年来一直以 *conspiration du silence*（沉默的阴谋）来窒息他。为了摆脱这个不幸，他带了军刀，拿着一支步枪、四支手枪、六把匕首，来号召成立志愿部队；但是这一切都徒劳无益。作了各种冒险之后，他最后在赫尔上了岸。在那里，他急忙公布了两封信，一封是给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的，另一封是给斯堪的那维亚人和德国人的，而且据说也给伦敦的两个共产主义者寄去了一张字条，内容是：

“我代表一万五千个挪威工人向你们伸出友谊之手！”

虽然发出了这一奇怪的通知，但是由于过去的团结友爱宣言，

他很快又成了欧洲中央委员会的谦逊的伙伴，同时又是

“太晤士河畔的格累夫森德的守夜人和佣人，在那里，在我被怀疑弄虚作假之前，我要用九种不同语言为不久前成立的经纪商行寻找商船船长，这至少是哲学家约翰奈斯·弥勒在照料猪的时候所没有遇到过的事”。

哈罗把他的充满了丰功伟绩的生活总结如下：

“除了诗歌以外，很容易算出，我献给民主运动的德文著作有一万八千册以上（按照汉堡的行市，每册价格从十先令到三马克，总价值约二万五千马克），没有一次收入能抵销出版费的支出，更不用说，我根本就没有从这里面得到任何收入来维持我的生活。”

关于我们的来自南日德兰的拉曼彻的蛊惑人心的探险家的冒险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在希腊和巴西，在维斯拉河和拉普拉塔河，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纽约，在伦敦和瑞士，忽然成了“青年欧洲”的代表，忽然成了南美的《Humanidad》（“人类”）的代表，忽然成了艺术家，忽然成了守夜人和佣人，忽然又是推销自己的著作的书商；今天在西里西亚的波兰人中间，明天在南美人中间，后天又在商船船长中间；他得不到承认，被人一脚踢开，孤独一身，默默无闻，但是又到处都以自由的游侠姿态出现，深深地蔑视一般市民的行业，——我们的英雄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情况下，始终是个以妄自尊大和自命不凡著称的糊涂虫。他不顾整个世界，总是滔滔不绝地说话、写作和发表文章，把自己说成 1831 年以来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主要车轮。

十

阿尔诺德虽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但是仍然没有达到他辛勤劳动的目的。由于马志尼的恩宠，他成了德国的代表，因此他一方面至少应当得到德国流亡者对这一称号的确认，另一方面应当把承认他的领导的人们拿出来给中央委员会看。固然，他断定在德国他“背后有一部分轮廓鲜明的人民”，但是，当马志尼和赖德律在卢格脸上只看到前面一部分的时候，这后面的一部分根本无法引起他们的信任。一句话，阿尔诺德必须在流亡者中间给自己制造“轮廓鲜明的”尾巴。

这时，哥特弗利德·金克尔来到了伦敦，和他一起来的，或者不如说紧跟着他来的还有许多被驱逐的人，一部分来自法国，一部分来自瑞士和比利时，这就是叔尔茨、施特罗特曼、奥本海姆、席梅尔普芬尼希、泰霍夫等等。这些新来的人，其中有一部分已在瑞士受过建立临时政府的训练，他们给伦敦流亡者的生活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而对我们的阿尔诺德来说，这真是前所未有的好时机。同时，海因岑在纽约重新当上了“快邮报”的主编，因此，阿尔诺德现在已有可能除了在不来梅的小报^①上以外，还在大洋的彼岸实现他的“再次出现”。如果阿尔诺德有一天找到了自己的施特罗特曼的话，那末这个施特罗特曼一定会认为 1851 年头几个月的

^① 即“不来梅每日纪事”。——编者注

“快邮报”全是不可估价资料。阿尔诺德在排出他那丰富的文学排泄物时所表现的那种无限庸俗的空谈，那种愚蠢、无耻和纯粹像蚂蚁般的勤勉以及妄自尊大，简直是令人难以想像。海因岑把阿尔诺德描绘得俨然是欧洲的一股强大的力量，阿尔诺德则把他的海因岑看作美国报界的贤哲！他告诉他欧洲外交的秘密，特别是流亡者的世界历史中每天的最新变化；有时，为了向美国公众报道伟大的阿尔诺德的某些《fashionable movements》（“举世闻名的举动”），他以伦敦和巴黎的匿名的通讯者的身分出现。

“阿尔诺德·卢格又一次使共产主义者陷入了困境。”——“阿·卢格昨天（巴黎的来讯，但日期出卖了狡猾的老笨伯）作了从布莱顿到伦敦的散步。”还有：“阿尔诺德·卢格写信给卡尔·海因岑说：‘亲爱的朋友和编辑……马志尼向你致意……赖德律—洛兰允许你翻译他的论6月13日的文章’”如此等等。

关于这一点，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中说道：

“我在卢格的信中（在“快邮报”上）看到，海因岑向卢格（秘密地）大肆吹嘘他的报纸在美国的重要性，而卢格对他则以欧洲强国的政府自居。只要卢格给海因岑报道了一个重要的新闻，他总不放过机会附带说，可以让合众国的其他报纸转载这一新闻。好像它们都认为这一消息很有价值，都在等待卢格的允许似的。顺便说说，虽然有卢格先生的话和许诺，但是我还一次也没有看见这些重要新闻在什么地方转载过。”

卢格老大爷利用这张小报，就像利用“不来梅每日纪事”一样，也是为了用下面这类阿谀奉承的话来罗致新到的流亡者：现在这里有天才诗人和爱国者金克尔，伟大的作家施特罗特曼，如此可爱、如此勇敢的青年人叔尔茨，此外还有许多杰出的革命统帅等等。

同时，为了和马志尼的委员会相对立，成立了平民的欧洲委员会，委员会的拥护者是“流亡者下层”和属于欧洲各民族的全部流

亡的下等人。当布隆采尔城下发生战斗的时候，他们发表了宣言，在宣言上签署的有下面这些杰出的德国人：格贝尔特、迈尔、迪茨、谢特奈尔、沙佩尔、维利希。这个用非常独特的法文写成的文件把下面的消息当做最新的新闻报道说：暴君们的神圣同盟这时（1850年11月10日）已武装了一百三十三万士兵，在他们后面还有七十万武装起来的君主政体的仆役作为后备，“德国的报纸和委员会本身的联系”使它有可能知道华沙代表会议²¹⁷的旨在屠杀欧洲一切共和党人的秘密计划。因此，宣言最后必不可免地号召武装起来。这个宣言（收到这份宣言的“祖国报”²¹⁸给它一个外号，把它叫做法农—卡佩隆—古泰宣言）遭到了反革命报刊的残酷无情的嘲笑。“祖国报”称它为

“dii minorum gentium（二流伟人的）宣言”，写得毫无色彩，毫无风格，只是戴了几朵《serpents》（“蛇”）、《sicaires》（“雇佣的凶手”）和《égor-gements》（“血腥的屠杀”）这类可怜的雄辩之花。

“比利时独立报”²¹⁹报道说，它的起草人都是些《soldats les plus obscurs de la démocratie》（“民主派中的无名小卒”），并且说，虽然该报所持的是保守派方向，但这些可怜虫把宣言送给它在伦敦的记者。他们极其渴望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但是该报为了给以惩罚，恰巧不想刊载这些签名。这些骑士尽管向反动派讨好，但是仍然无法使人承认他们是阴谋家和危险人物。

这一新的竞争机构促使阿尔诺德加强他的活动。因此，他企图和司徒卢威、金克尔、施拉姆、布赫尔等人共同创办一张名叫“人民之友”（《V olksfreund》）的报纸，或者，如果古斯达夫坚持的话，那就叫“德国旁观者”。但是事业遭到了失败，一部分原因是其余的伙伴反对阿尔诺德作保护人，一部分原因是“多情善感的”哥特弗利

德要求稿费付现款,可是阿尔诺德坚持汉泽曼的观点:在金钱问题上没有感伤派的地位²²⁰。阿尔诺德做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专门的目的,这就是向读者协会——由工资优厚的工人和小资产者组成的德国钟表工人俱乐部勒索钱财。但是,就连这件事也没有成功。

但是,不久又有了阿尔诺德“再次出现”的新机会。赖德律和他的法国流亡者中的追随者,不能白白地放过2月24日(1851年)而不举行庆祝欧洲各民族的“团结友爱纪念会”,不过出席的只有法国人和德国人。马志尼没有来,寄来一封信表示谦意。哥特弗利德出席了纪念会,但是盛怒而回,因为他的无声无息的出现并没有引起预期的奇妙的效果。阿尔诺德的遭遇是惨痛的:他的朋友赖德律装做不认识他;而他走上讲台后,竟惊慌失措到这样一种程度,连得到他的上峰同意的法文演讲稿也没有掏出来,只是用德语含糊地讲了几句话,之后又叫了一句:《À la restauration de la révolution!》(“为恢复革命而斗争!”),便在大家都很不满的情况下急急忙忙地走开了。

同一天,在上述竞争委员会的旗帜下举行了反宴会。路易·勃朗恼恨马志尼—赖德律的委员会一开始没有吸收他参加,因而加入了平民流亡者队伍,并声明“必须也消灭天才的贵族!”流亡者下层全到齐了。宴会由侠义的维利希主持。大厅里挂满了锦旗,墙上赫然排列着伟大的人民活动家的名字:加里波第和科苏特之间是瓦尔德克,布朗基和卡贝之间是雅科比,巴尔贝斯和罗伯斯比尔之间是罗伯特·勃鲁姆。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路易·勃朗尖声尖气地宣读了他的老应声虫,即未来的社会共和国的贵族、1848年在卢森堡宫里开会的代表们²²¹的献词。维利希宣读了来自瑞士的献词,这个献词上的签名有一部分是用虚假的借口骗取到的,由于不知

分寸地公布了这些名字，在献词上签名的人后来大批地遭到了放逐。德国没有寄来献词。然后便是演讲。尽管充满了无限的团结友爱的感情，但是在每个人的脸上都现出了无聊的神情。

这个宴会引出了一件大有教益的丑事，这件丑事就像平民流亡者的欧洲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英雄业绩一样，被反革命报纸拿来大肆宣扬。最稀奇的是，在这个宴会上有一个叫做巴特米的人当着路易·勃朗的面宣读了对**布朗基**的夸张的颂词。但是不久真相就大白了。“祖国报”发表了布朗基应特别的请求而从贝尔—耳岛监狱中寄出来的献词²²²。在献词中布朗基尖锐而公正地抨击了1848年临时政府中的所有的委员，尤其是路易·勃朗先生。“祖国报”故作惊讶地问道，为什么这个献词没有在宴会上宣读。路易·勃朗立刻在“**泰晤士报**”上声明，布朗基是卑鄙的阴谋家，他根本没有给纪念会筹备委员会寄来这样的献词。委员会方面以勃朗、维利希、朗道夫、沙佩尔、巴特米和维迪尔诸先生为代表同时给“祖国报”送去一个声明，说委员会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个献词。但是“祖国报”在它向转寄献词原文给它的布朗基的妹夫安都昂先生查明实际情况以前，并没有发表这一声明。它把安都昂先生的回答发表在纪念会筹备委员会的声明下面，安都昂在回答中说，他把献词寄给了声明的签署人之一，即巴特米，并收到了他的关于献词已收到的通知。这以后，巴特米先生不得不声明，他撒了谎，他确实收到了献词，但是认为献词写得不恰当而把它压下了，并没有将此事通知委员会。但是，不幸还在这以前，声明签署人之一，前法国上尉维迪尔，没有通知巴特米便写了一封信给“祖国报”，在信中他声明说，军人的荣誉感和对真理的向往迫使他承认，他和路易·勃朗、维利希及其他在委员会

的第一个声明上签了名的人都撒了谎。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是六个而是十三个。他们都看到了布朗基的献词，大家讨论了这个献词，经过了长久的辩论之后，以七票对六票的多数决定不宣读这个献词。维迪尔是投票赞成宣读的六个委员中的一个。

当“祖国报”在收到了维迪尔的信之后又收到巴特米先生的声明时，它的得意是可想而知的。它发表这一声明时加上了下面的“前言”：

“我们常常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而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在蛊惑者的身上什么东西更发达一些，是吹牛还是愚蠢？我们收到的从伦敦来的第四封信，使我们更难回答这个问题了。这些可怜虫在那里有多少呵！他们是这样迫切地渴望写作和看到他们的名字被登载在反动的报纸上，甚至甘心蒙受无穷的耻辱和自卑自贱。公众的嘲笑和愤慨同他们有何相干——只要‘辩论日报’、‘国民议会报’、‘祖国报’刊载他们的作文练习就行了。为了得到这种幸福，这个世界主义的民主派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由于对写作的同情心，我们因此刊载了‘公民’巴特米的下面这封信，这封信是一个新的、我们希望也是最后的证据，它证明著名的布朗基献词是真实的。他们起初全都否认这个献词的存在，而现在却为了争着确证这个献词的存在而互相辱骂以至撕打起来了。”

十一

“真正发展的力量”（用我们的阿尔诺德的“通体美丽的”话来谈），是在下面。2月24日卢格在国外给自己出了丑，又连累了德国流亡者。少数还想同他一起工作的流亡者感到失去了信心和得不到支持。阿尔诺德把一切都归罪于流亡者中间的纠纷，并且比从前更坚决地主张团结起来。他已经出了丑，却还在渴望获得新的机会再一次给自己出丑。

因此，维也纳三月革命周年纪念日就被用来组织一次德国人的宴会。狭义的维利希拒绝参加，因为他属于“公民”路易·勃朗，不能同属于“公民”赖德律的“公民”卢格一起工作。前议员赖辛巴赫、施拉姆、布赫尔等人也避免接近阿尔诺德。因此，出席的有（除了不发言的客人以外）马志尼、卢格、司徒卢威、陶森瑙、豪格、隆格、金克尔，他们都发表了演说。

卢格的演说“愚蠢透顶”，就连他的朋友也这么说。但是出席宴会的德国公众还要忍受更大的苦难。陶森瑙的小丑戏、司徒卢威的呻吟、豪格的空谈，隆格的哭诉弄得大部分听众等不到听善于词令的耶利米—金克尔²²³准备在最后上点心时发表的演说，都纷纷溜走了。哥特弗利德以受难者的身分，“代表受难者”，并且为了受难者向所有的人，“从争取宪法的普通战士到红色共和党人”，发表了悲伤的调和词。他们全都照共和党人的样子悲切地呻吟，在个别场合下，如金克尔，甚至仿照红色共和党人的样子呻吟，同

时他们全都带着惊羨的心情五体投地地拜倒于英国宪法之前，——“纪事晨报”²²⁴在第二天早上就提醒他们注意这种矛盾。

但是，在同一天晚上，卢格仍然达到了自己想望的目的，这可以从发表的宣言中看出，我们现在把宣言中最精彩的地方摘引如下：

告德国人！

“祖国的弟兄们和朋友们！我们，下面的签名人，现在，在你们吩咐之前，成立了德国事务委员会（什么样的委员会都是一样）。

“欧洲民主派的中央委员会给我们派来了阿尔诺德·卢格，巴登的革命派来了古斯塔夫·司徒卢威，维也纳的革命派来了恩斯特·豪格，宗教运动派来了约翰奈斯·隆格，监狱送来了哥特弗利德·金克尔。我们建议社会民主派的工人们给我们派来自己的代表。

“德国的弟兄们！事变夺去了你们的自由……我们知道，你们不能永远放弃你们的自由；至于说到我们，我们是不惜用一切手段（不论是成立委员会或发表宣言，这是阿尔诺德可以证明的）来加速恢复自由的。

“当我们……当我们支持马志尼的公债并为它作担保的时候，当我们……当我们……成立各国人民的神圣的同盟来对抗他们的压迫者的非神圣的同盟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你们衷心希望做的事情……自由在人类的世界论坛的法庭面前对暴君们进行了伟大的审判（在阿尔诺德当检察长时，“暴君们”可以安心地睡觉）……火灾、谋杀、破坏、饥饿和破产不久就会成为德国的普遍命运。

“请你们把目光从德国转向法国，法国全国正燃烧着怒火，比任何时候都一致要求自由（见鬼，谁能预见到12月2日！²²⁵）。请看看匈牙利，甚至克罗地亚人也站到了自由的一边（多亏“德国旁观者”和卢格发明的由锯末制造的衣服）。并且请相信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这一点，——波兰是永垂不朽的（这已由达拉什先生秘密的托付给他们了）。

“力量对力量——这就是公正，而公正的时刻就快到了。而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来争取成立比预备议会更有效的（啊哈！）临时政府和比国民议会更强有

力的人民政权〈关于这些先生们想用彼此哄骗的办法来争取些什么东西，请看下面〉。

“我们要特别向你们介绍我们在财政和报刊方面的草案〈强大的临时政府的第一号和第二号指令——责令税务局长克利斯提安·弥勒执行本决定〉。它们主要地只是提供实际的利益。广大的社会人士都十分清楚地知道，每认购一次意大利公债就是对我们的委员会和我们的事业的直接的帮助，而目前你们能够给我们的实际援助主要是**加强资金的来源**。我们会把钱变成**社会舆论和社会力量**〈阿尔诺德来从事这种变化！〉……我们告诉你们：**请认购一千万法郎——我们就将解放大陆！**

“德国人，请记住……〈你们用低沉的声音唱着歌，在山上生起篝火〉请把你们的想法告诉我们〈这在目前非常需要，几乎同需要金钱一样〉，请把你们的钱袋给我们〈请别忘记了这一点！〉，请你们伸出手来！我们期待着，你们的热心将随着你们的被压迫的增强而增强，并且在决定性的时刻，你们的及时的支援将充分加强委员会的力量〈否则委员会就不得不借助于烧酒了，这是违背古斯达夫的良心的〉。

“**责成全体民主派传播我们的宣言**〈其余的工作由税务局长克利斯提安·弥勒去做〉。

“德国事务委员会：**阿尔诺德·卢格，古斯达夫·司徒卢威，
恩斯特·豪格，约翰奈斯·隆格，哥特弗
利德·金克尔**

1851年3月13日于伦敦。”

我们的读者认识哥特弗利德，认识古斯达夫；阿尔诺德的“再次出现”也十分频繁地一再重复着。因此，剩下的只有两位“有效的临时政府”的成员还需要加以介绍。

约翰奈斯·隆格（或者如他喜欢在密友中自称的那样，就称作约翰）自然没有写成启示录²²⁶。他身上并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这是个庸俗的、平凡的、像水一样、或者说得确切一点、像洗涤用的温水一样淡而无味的人。大家知道，约翰奈斯所以成为有名的人物，是因为他不愿让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²²⁷充当自己的庇护者，虽然

无论谁充当约翰奈斯的庇护者都是一样。当约翰奈斯出现时，老保路斯惋惜黑格尔已死，因为后者现在当然已经不能把他叫做肤浅的人，而已故的克鲁格却很高兴自己已死，因而避免了负有深谋远虑者之名的危险。约翰奈斯属于在历史上经常碰到的这样一些人，这些人在某个运动发生和壮大后几个世纪，还硬把这件事当作最新的新闻，以最枯燥无味的方式向庸人和八岁的孩童述说这一运动的内容。当然不能长久靠这种行业为生，我们的约翰奈斯在德国很快就陷入了一天比一天难堪的境地。他的从德国假文明中流出来的平淡无味的水已经再也没有人要了，于是约翰奈斯来到了英国，在那里，我们看到他以加瓦齐神父的竞争者的身分从事活动，但是并无特殊成绩。这个无能的、单调的、枯燥无味的乡村神甫在热情充沛、演技精湛的意大利修道士面前当然显得逊色了，而英国人开始打起赌来，赌注很大，争论的问题是，这个令人讨厌的约翰奈斯是不是就是那个把如此庄重的德意志民族导向运动的人。但是，阿尔诺德·卢格安慰着他，阿尔诺德·卢格发现我们的约翰奈斯的德国天主教同自己的无神论有显著的血缘上的相同之处。

路德维希·冯·豪克，前奥地利皇家工兵上尉，后来，在1848年，是在维也纳拟定的宪法的起草人之一，以后是维也纳国民自卫军的营长，他在10月30日以雄狮般的勇猛守卫着城市的大门，抵抗皇帝的军队，只是在一切都已经丧失以后才离开了岗位。这以后他逃到了匈牙利，在特兰西瓦尼亚参加了贝姆的军队，在军队里由于勇敢而升到总参谋部的上校之职。戈尔盖在维拉戈什城下投降²²⁸之后，路德维希·豪克被俘，并且英勇地被绞死于奥地利人在匈牙利设立的绞架之下。奥地利人由于经常遭到失败而怀着复仇

之心，并因俄国人的使他们无法忍受的庇护而恼恨得发狂，因而在匈牙利设立了无数的绞架。我们的豪格在伦敦长时期地被认为就是在匈牙利战役中闻名的、被绞死的军官豪克。现在，似乎已经确定，他并不是已故的豪克。正如罗马陷落后他必须同意马志尼把他提升为将军一样，他现在也不能拒绝阿尔诺德把他变成维也纳革命的代表人物和强大的临时政府的成员。后来他在音乐的伴奏下，从地质学观点出发作了关于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宇宙演化论的经济基础的优美的演讲。在流亡者中间，这个忧郁的人以愚蠢的小牲畜或者如法国人所说的 *la bonne bête* 这个外号闻名。

阿尔诺德把自己的愿望看得高于一切。宣言、强大的临时政府、一千万法郎的公债，加上一张类似周刊的小报，由豪格将军主编，名称叫得很谦逊：“宇宙”。

宣言没有任何结果，谁也不去读它，“宇宙”出到第 3 期便憔悴而死；钱没有收到；强大的临时政府分裂成了本身的几个组成部分。

在“宇宙”上首先登载了关于金克尔的演讲的广告、关于可尊敬的维利希为什列斯维希—雷尔施坦的流亡者募集捐款的广告和关于哥林盖尔的啤酒店的广告。此外，它还刊载了阿尔诺德的讽刺文章。老丑角给自己捏造了一个好客的朋友，一个在德国的叫做弥勒的人，而自己则以一个德国族长的身分出现。弥勒对于在报纸上读到的关于英国的好客盛举的一切都感到惊奇，并且表示担心，这种“奢侈享乐的生活”会妨碍族长管理“国家事务”。不过，随他去吧，因为族长回到德国后将会因忙于国家事务而不得不拒绝弥勒的款待。在结尾，弥勒感叹地说：“就是说，被邀请到温莎去的并不是叛徒拉多维茨，而是马志尼、赖德律—罗兰、公民维利希、金

克尔和您自己(阿尔诺德·卢格)!”不过,如果说“宇宙”出到第3期就长眠了,那无论如何不是由于不善于做推销工作之故,——他们在英国的一切群众大会上把报纸塞给演讲人,请他们代为介绍,因为它捍卫的正是他们的原则。

关于号召认购一千万公债的呼吁书还没有登出,突然谣传伦敦西蒂区有人正在按捐款签名单为司徒卢威(连同阿马利亚)赴美收集捐款。

“当委员会决定出版一张德文周刊,并委托豪格为主编的时候,司徒卢威因自己想当主编并给小报起名‘德国旁观者’,故提出了抗议并决定赴美。”

纽约“德意志快邮报”报道的消息就是这样。该报没有提到(而海因岑对此有自己的理由),马志尼已把不伦瑞克公爵的“德意志伦敦报”撰稿人司徒卢威的名字从德国委员会的名单中一笔勾销了。古斯塔夫立刻把自己的“德国旁观者”移植到纽约的土地上去。但是不久便从大洋彼岸传来了紧急情报:“古斯塔夫的‘旁观者’完蛋了。”照古斯塔夫所说这完全不是由于缺少订户,也不是由于他没有闲空写文章,而仅仅是由于有支付能力的订户不多的缘故。但是因为现在按民主方式加工罗泰克的“世界史”已不能再拖延下去(而这一工作早在十五年前就开始了),因此,他,古斯塔夫要用“世界史”的形式,而不是用“德国旁观者”的形式付给订户以他时许下的文章页数,但是,他不得不请求先付预订款,而这个请求在目前情况下是不应该归罪于他的。当古斯塔夫在大洋此岸的时候,海因岑宣称,他同卢格是欧洲最伟大的人物。但是,他还没有到达彼岸,他们之间就拚命地吵起来了。古斯塔夫写道:

“海因岑于6月6日在卡尔斯卢厄看到人们把大炮推出来,他就夹在女人中间逃到斯特拉斯堡去了。”

海因岑则称古斯达夫为“女卜者”。

“宇宙”正好是当阿尔诺德在信奉正统派的海因岑的报纸上为它大肆吹嘘的时候毁灭了，而强大的临时政府则恰好是在罗多芒特—海因岑对它宣布“军人的服从”的时候停止了存在。海因岑在和平时期偏爱军事，这是很出名的。

“在司徒卢威离去后不久，金克尔也退出了委员会，于是委员会便停止了工作。”（纽约“德意志快邮报”第 23 号）

因此，“强大的临时政府”就只剩下了卢格、隆格和豪格三位先生。甚至阿尔诺德也已经明白，这样三个人不但不能创造新世界，而且什么也创造不了；同时，无论怎样重新布置、改组和组合，这三个人总是政府以后成立各种委员会的核心。但是，这个不倦的人还不愿承认，他的计划失败了；对他来说，全部问题仅仅在于做点什么事情；这能使他像个忙于深奥的政治计谋的人，而首先是使他有理由摆出要人的样子对一切作出判断，实现“再次出现”和醉心于洋洋得意的空谈。

至于哥特弗利德，那末他为 respectable City—merchants（伦敦西蒂区的可敬的大商人）做的戏剧性的演讲丝毫也未能使他丢脸。另一方面，十分明显，3 月 13 日的宣言所追求的只有一个目的，这就是巩固阿尔诺德先生在欧洲中央委员会中篡夺到的地位。哥特弗利德本人以后一定看出了这一点，但是承认这一点对他丝毫也没有好处。于是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宣言公布后不久，dama acerba（严厉的太太）莫克尔便在“科伦日报”上登载了如下的声明：她的丈夫根本就没有在宣言上签名，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公债，并且已经退出了刚刚成立的委员会。对此阿尔诺德在纽约“快邮报”上是是非非地说，金克尔由于生病的确没有在宣言上签名，然

而他是赞成宣言的；宣言的草案是在他的房间里拟定的，他还转寄了一部分到德国去，而他退出委员会是因为选出的主席不是他而是豪格将军。阿尔诺德在作此声明时尖锐地攻击了“绝对的受难者”、“民主派的贝凯拉特”金克尔的虚荣心，并且对约翰娜·金克尔太太也表示怀疑，因为为她效劳的是“科伦日报”这种被禁止的报纸。

可是阿尔诺德撒下的种子并不是落到了多石的土地上。“美丽的灵魂”哥特弗利德决定用巧计胜过对手，并且把革命的财宝攫为自己一人所有。约翰娜还没有来得及在“科伦日报”上否认这件令人可笑的事，我们的哥特弗利德就已经在大洋彼岸的报纸上独自出面号召认购公债，并且还说，应当把金钱寄给“享有最大信任”的人。除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外，还有谁能是这样的人呢？他要求先交纳五百英镑作为印制革命纸币之用。卢格立刻在“快邮报”上宣布，他，卢格，是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财务员，在他那里可以得到马志尼的已经准备好的纸币。因此，对于想丧失五百英镑的人来说，取得现成的纸币无论如何总比拿还不存在的东西来投机要聪明得多。而罗多芒特—海因岑则喊叫道，如果金克尔先生不放弃自己的计谋，那就要公开宣布他是“革命的敌人”。于是哥特弗利德在“快邮报”的直接对手“纽约国家报”²²⁹上发表了回击的文章。这样，在大西洋彼岸已经在采取一切形式进行战争，而在此岸还在交换犹大之吻。

但是，哥特弗利德自己很快就觉察到，由于他不客气地以自己的名义宣布推销国民公债，多少总有点伤了民主派道德高尚的庸人们的面子。为了纠正这一错误，他现在想出了一个解释：

“这个为了推销德国国民公债而发出的号召交款的宣言根本不是他发表

的，很可能是他的在美国的过分热心的朋友为此利用了他的名字。”

这个说明引出了维斯博士在纽约“快邮报”上发表的以下的回答：

“大家知道，这个号召为德国公债进行宣传的宣言是**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寄给我并且**迫切地请求**我在所有的德文报纸上发表的。谁要是对此表示怀疑，我可以把这封信给他看。如果这个声明确实是金克尔发表的，那末为了他的荣誉，他应当公开放弃这个声明，并且公布我同他的来往信件，以便向当事人声明，我同这件事毫无关系，根本谈不到‘过分热心’。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金克尔就必须把这个声明的可敬的作者公开叫作不怀好意的诬蔑者，或者，如果这样会发生误解，就叫作轻率的和无耻的空谈家。我自己这方面不能相信金克尔会做出这样空前的背信弃义的事。维斯博士。”（纽约“德意志快邮周报”）

哥特弗利德该怎么办呢？他又抬出了 *aspra donzella*（严厉的太太），他声明说，“轻率的和无耻的空谈家”是莫克尔；他断定，他的夫人是背着他在进行公债的事情。无庸争辩，这个策略是非常“美”的。

因为我们的哥特弗利德像芦苇一样柔软，他随着人民感情的风向（按照他所认为的），忽而出现在前面，忽而躲在后面，忽而着手一项事业，忽而又把它抛弃。他一面让唯美主义的资产阶级在伦敦为他这个革命的受难者举行公开的庆祝会，同时却背着这个资产阶级同以维利希为代表的流亡者下层进行被禁止的交往。他的生活同他在波恩时的俭朴比起来，可算是豪华了，但是他往圣路易斯写信，说他生活得像一个“穷人的代表”所应该的那样。总之，他遵照规定的礼仪对待资产阶级，同时又毕恭毕敬地奉承无产阶级。但是，作为一个想像力大大盖过了理智之声的人，他不可能不表现出一个暴发户的粗暴和狂妄，这使得不少迂腐的道德高尚的流亡

中的大人物离开了他。他在“宇宙”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工业展览会的文章是他的最富于代表性的写照。最使他惊讶的是挂在水晶宫里的一面大镜子。对他来说，客观世界已化为镜子，而主观世界则化为句子。好像是为了展示一切事物的美的一面，他对一切事物卖弄风骚^①，并且随着需要的不同而把这种卖弄叫做诗，叫做牺牲，或者叫做宗教。老实说，他需要这一切只是为了卖弄自己。可是，当想像直接变成说谎，夸张直接变成庸俗的时候，他便没有力量使丑的一面不在实际中暴露出来。不过可以预先告诉我们的哥特弗利德，既然他已经落到古斯达夫和阿尔诺德这些经验丰富的小丑手里，那他就只好丢掉自己的狮子皮了。

① 俏皮话：德语中《schöne Seite》的意思是“美的一面”《schöntun》的意思是“卖弄风骚”。——编者注

十二

工业展览会在流亡者的生活中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在整个夏季中德国的庸人们像潮水一般地涌到了伦敦；德国庸人在巨大的、喧闹的水晶宫里，以及在更加巨大得多的、各种各样的隆隆声、嘈杂声和喊叫声乱成一片的伦敦感到很不舒服；他们汗流浹背地完成了在必须参观展览会和其他值得观看的东西这方面的一天的繁重劳动之后，便到谢特奈尔的“哈瑙”饭店或到哥林盖尔的“星星”饭店里去休息，在这里那才是杯中乐融融，烟雾腾腾起，一片酒店政治的气氛。在这里，“整个祖国都聚到一起”，何况还可以免费观看德国最伟大的人物。他们也坐在这里，有议会议员、议院代表、统帅、1848年到1849年这段美好时期里的俱乐部演说家，他们像一切其他普通人那样吞云吐雾，日复一日地 *coram publico*（在全体人民面前）神气十足地议论着祖国的最高利益。在这里，德国小市民，只要不吝惜几瓶极廉价的酒，那就能详细地得知欧洲各国内阁的最秘密的会议上所发生的一切。在这里可以非常准确地得知什么时候“开始冲击”。于是人们便一瓶又一瓶地冲击起来，然后各派意见的拥护者虽然已经摇摇晃晃，站立不稳，但是带着他们已为拯救祖国尽了一份力量这种令人鼓舞的意识纷纷回家去了。流亡者在有支付能力的庸人大批拥到伦敦的这段时期里比任何时候都喝得多，而花费则比任何时候都少。

流亡者的真正的组织就是这个在锡仑—谢特奈尔²³⁰的庇护下

设在朗—爱克街上的靠了展览会而极其兴隆的**酒店组织**。真正的中央委员会经常在这里开会。其他一切委员会、组织、党的小组都纯粹是这个真正德国的寄生性酒馆常客组织的唬人幌子和爱国主义小摆设。

这时，流亡者又得到了以新来者梅因、孚赫、济格尔、戈克、菲克勒尔等等先生为代表的增援部队。

梅因，这个因错误而生下来就没有刺的小刺猬，早就被歌德用**潘辛涅**的名字描绘如下：

“在文学中，就像在社会上一样，常常能遇到这样一些矮小的、可笑的、长得滚圆的人物，他们天赋某种才能，和人们纠缠不清，因为每一个人都能随便地从高处看他们，所以他们可以让人随便地寻开心。而这些人就从中获得许多好处：他们生活着，活动着，他们的名字被人称道，老是受人们的款待。如果他们遭到失败，他们也不惊惶不安，而是把失败看作个别的情况，并且等待将来获得最大的成功。在法国的文学世界里，潘辛涅便是这样的人物。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无论怎样捉弄他，无论引诱他去做什么，无论怎样欺骗他，甚至他的悲惨的死亡（他在西班牙淹死）也不能减弱他的生命所产生的滑稽可笑印象，正如焰火筒决不会由于噼噼啪啪响了一阵以后嘣的一声爆炸开来而获得什么意义一样。”²³¹

相反地，当代的作家们谈到他时这样说：**爱德华·梅因**属于那些“坚定的”、代表柏林的智慧的人物，同德国其他地方普遍存在的愚蠢正相反。他同他的朋友繆格、克莱因、察贝尔、布尔等人也在柏林成立了“梅因的甲虫协会”。每一个梅因的甲虫都坐在自己的独特的小叶子上，而爱德华·梅因则坐在曼海姆的一张晚报上^①，他在这张小叶子上每星期以极大的努力生产绿色的通讯员幼虫。

① 即“曼海姆晚报”。这句话里的“小叶子”和“小报”原文是双关语：德语中 Blättchen 一字，既有“小叶子”之意，又有“小报”之意。——译者注

这个梅因甲虫在 1845 年甚至行将主编一本月刊；人们从各方面给他寄来了文章，出版者等待着，但是整个事业一下全垮了，因为爱德华在经过了八个月以后，混身冷汗地声明他写不出刊物的广告。因为我们的爱德华对待自己的一切幼稚行为都很认真，所以在柏林三月革命后，他以一个对待运动严肃认真的人而出了名。在伦敦他同孚赫一起参加了由一个二十年前略懂德文的老太婆主编和审查的“伦敦新闻画报”德文版的工作，但是被当作不能胜任工作的人而解除了职务，因为他顽固地非要把自己早在十年前就已在柏林发表过的一篇深奥的关于雕刻的文章排进这本杂志。当金克尔的流亡者们后来任命他为秘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是个实际的 *bomme d'état* (国家活动家)，并且在石印的通告里宣布他已获得“稳固的观点”。在他去世之后，在这个梅因甲虫的遗产中将会发现许多为预定的著作写好的标题。

梅因在编辑工作和秘书工作中的同事**奥本海姆**同他有不可分的联系。关于奥本海姆，有人说他好像根本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一个寓言中的人物；即好像是寂寞女神以犹太首饰匠儿子的形象出现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当伏尔泰写《*Tous les genres sont bons excepté le genre ennuyeux*》（“除了枯燥无味，一切风格都好”）^①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已预感到我们的亨利希·伯恩哈特·奥本海姆的出现。我们宁愿把奥本海姆当做作家，而不愿把他看做演说家。你可以不看他的作品，但是要想回避他的演说，*c'est impossible*（那是不可能的）。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转生说也许是正确的，但是亨利希·伯恩哈特·奥本海姆在前几个世纪中所用的

^① 伏尔泰喜剧“浪子”的序言。——编者注

名字确实无法确定了，因为无论在哪一个世纪里都从来没有一个人是以令人厌恶的空谈而出名的。他的生活体现在三个辉煌的时期中，这就是阿尔诺德·卢格的编辑、布伦坦诺的编辑、金克尔的编辑。

这一伙人中的第三个是尤利乌斯·孚赫先生。他属于柏林移民区中那些善于以巨大的进取心发挥自己的小小的才能的胡格诺教徒之列。他最初是以自由贸易派别的旗手华斯托²³²的角色登上社会活动的舞台，而他扮演这个角色是被汉堡商人雇来进行宣传的。在革命风潮时期他们允许他打着气势汹汹的无政府主义招牌鼓吹贸易自由。当这样做已不合时宜的时候，他便被揭开了，于是他同梅因一起开始主编柏林的“晚邮报”。他在国家应当根本消灭并且应当实行无政府主义的借口下，在这里避开了反对现存政府的危险立场，而当后来该报由于没有钱交纳保证金而停办的时候，“新普鲁士报”对于民主派中唯一称得上作家的孚赫的命运表示了惋惜。同“新普鲁士报”的这种亲热关系不久便达到了非常密切的程度，以至我们的孚赫竟开始在伦敦为这家报纸写起通讯来了。孚赫参加流亡者的政治活动并不太长久。他对自由贸易的迷恋使他明白，他的使命是从事企业活动，他热切地恢复了这一活动，他在这方面所完成的工作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过，——他根据非常完善的活动标尺制定了他的文章的价目表。由于“布勒斯劳报”的不知分寸，这个文件已为广大公众所知。

同这个柏林智慧的三星相对立的是南德永恒信念的三星，即济格尔、菲克勒尔和戈克。

弗兰茨·济格尔，如他的朋友戈克所描绘的，是个

“个子不大、没有胡须、一切都同拿破仑相似的人”；他，按照同一个戈克

的说法,是个“英雄”,“未来的人”,“首先是个天才的、天赋创造精神的、不倦地忙于新计划的人”。

在我们之间有人说,济格尔将军是巴登的一个自信而又野心勃勃的年轻的尉官。他从法国革命的战役史中看到,由一个少尉一跃而成为总司令,这完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于是从这个时候起,这个没有胡须的人便下定决心:弗兰茨·济格尔总有一天要成为某个革命军队的总司令。他由于名字相同而在军队中博得的声望^①和1849年的巴登起义帮助他实现了他的愿望。他在尼喀河畔进行的战斗以及在黑林山没有进行的战斗都出了名,而他的退往瑞士甚至他的敌人也认为是适时的和正确的策略。他的军事计划证明他通晓革命战争的历史。为了忠实于革命的传统,不考虑敌人、也不注意作战线和退却道路以及其他这类小事的英雄济格尔,忠实地从莫罗在当时选择的一个阵地转到另一个阵地,尽管如此,如果说,他没有能在所有的细节上都模仿莫罗的进军,如果说,他不是帕拉迪兹,而是在埃格里绍渡过莱茵河,那末应当说这是由于敌人的眼光短浅,不善于估计这种非常科学的机动行为。济格尔在自己的命令和指令中表现出他是个传教士,他在这些命令和指令中表现出固然比拿破仑更缺乏文采,然而比拿破仑更充满信心。后来,他制定了各兵种的革命军官手册;我们可以从这本手册中举出下面这样一段重要的话:

“按照章程,革命军官必须备有:一顶帽子(除便帽外),一把带鞘的军刀,一条黑红黄三色的骆驼绒腰带,两副黑色皮手套,两套军服,一件斗篷,一条呢裤,一条领带,两双皮靴或鞋,一个十二英寸长、十英寸高、四英寸厚的黑皮

^① 见本卷第377—378页。——编者注

旅行袋，六件衬衣，三条衬裤，八双长袜，六块手帕，两条面巾，一副刮脸和洗脸用具，一副文具，一块规定式样的石板，一把刷子，一本野战勤务章程。”

约瑟夫·菲克勒尔（按照他的朋友戈克的描绘）是

“诚实的、坚定的、不屈不挠的人民活动家的榜样，这个人曾经把上巴登和湖滨边区的所有的居民都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并由于多年的斗争和苦难而博得了差不多同布伦坦诺一样的声誉。”

和一个诚实的、坚定的和不屈不挠的人民活动家的身分很相称，约瑟夫·菲克勒尔有一张胖得滚圆的脸、一根粗胖的脖子和一个同样肥胖的大肚子。关于他过去的的生活，人们只知道他是靠十五世纪的一件艺术雕刻品和几件同君士坦士宗教会议²³³有某种关系的圣物过活的，他让旅行者和外国的艺术爱好者出钱观赏这些珍品，并且把各种“古董”卖给他们，而这些东西，就像菲克勒尔自己洋洋得意地说的那样，都是他“仿照古董的样式”重新制造的。

他在革命时期的唯一的功绩是：第一，他在预备议会²³⁴的会议结束后被马提下令逮捕，第二，他于1849年6月在施图加特被勒麦下令逮捕。由于这两次被捕，他幸运地避免了给自己丢丑的危险。后来维尔腾堡的民主派为他交纳了一千古尔登的保证金，而菲克勒尔却隐姓埋名地到土尔高去了，他就这样销声匿迹，使保证人感到非常痛心。不可否认，他在“湖滨小报”上成功地用油墨表现了湖滨农民思想和感情。此外，他看到他的朋友卢格的情况，便抱定这样一种见解：长期的学习会使人变得愚蠢，因此他预先警告他的朋友戈克，不要到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去。

阿曼杜斯·戈克，从他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是个可爱的人^①，他

① 俏皮话：A mandus（阿曼杜斯）一字有“愉快的”“可爱的”意思。——编者注

“的确不是个出色的演说家，然而是个诚实的公民，他的谦逊和高尚的行为使他到处都有朋友”（“西美周刊”）。

戈克因行为高尚而成了巴登临时政府的成员，但是他自己承认，在政府里他丝毫也不能反对布伦坦诺，并且由于谦逊而给自己加上一个独裁者先生的称号。谁都不否认，他当财政部长时所取得的成就是很微小的。由于谦逊，他在已经宣布向瑞士总退却的前一天宣布在多瑙埃申根成立“社会民主共和国”。由于谦逊，他后来宣称（在1852年向雅努斯—海因岑²³⁵），12月2日巴黎无产阶级所以遭到失败，是因为他们没有他那种巴登—法兰西的和法兰西式的南德所固有的民主派的洞察力。谁想找到进一步证实戈克的谦逊和“戈克派”的存在的证据，那他可以到他本人所著的“回顾巴登革命……”1850年巴黎版中去找。他谦逊的最高表现要算是他在辛辛那提的公众集会上谈到的下面这件事情：

“巴登革命失败后有些可敬的人到苏黎世来看他，并对他说，参加巴登革命的有德国各个种族的人，所以必须把巴登革命看做全德的事件，正如罗马革命是全意大利的革命一样。他是坚持到底的活动家，所以他应当成为德国的马志尼。由于谦逊，他拒绝了。”

为什么？一个曾经是“独裁者先生”而且又是“拿破仑”—济格勒的挚友的人，是可以也“成为德国的马志尼”的。

由于这些人，以及和他们类似但不如他们那样杰出的活动家们的到来，流亡者就算是 *au grand complet*（会齐了），他们可以开始进行伟大的战斗了，关于这些战斗，读者可以从下面这支歌中看到。

十三

Chi mi dar^{te} à la voce e le parole,
 E un proferir magnanimo e profondo!
 Che mai cosa piu fiera sotto il sole
 Non fu veduta in tutto quanto il mondo;
 L' altre battaglie fur rose e viole,
 Al raccontar di questa mi confondo;
 Perchè il valor, e' l pregio della terra
 A fronte son condotti in questa guerra.
 (Bojardo.Orlando innam.Canto 27.)

谁使这架小小的竖琴发出响声？
 那是我汲取振奋人心的词汇的泉源，
 为的是我能够用鲜明的色彩，
 来描画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战斗。
 同命运注定要我歌唱的这次战斗相比，
 一切以往的战斗都只是大宴会上的花朵：
 因为一切有不可“思议的勇敢精神”的人，
 都在这次光荣的战斗中拔剑相斗。^①

由于这些最后的 fashionable arrivals (新到的名人) 充实了流亡者的队伍，流亡者必须努力大规模地“组织起来”，使自己具有一个最终的形式时刻来到了。可以设想，这种努力将引起新的和激烈的敌对行动。在大洋彼岸的报纸上展开的笔战现在已达到了最高潮。个人之间的争吵，互相倾轧，玩弄诡计，无节制地自吹自

① 博雅多“恋爱中的罗兰”第二十七首歌。——编者注

播，——大人物们的全部力量都投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中去了。但是流亡者却因此获得了一些东西，这就是存在于世界历史之外的自己本身的历史，同公众的政治并存的自己这个小圈子内的政治。从彼此攻击中，流亡者甚至感觉到了彼此的重要性。因为在所有这些追求和奋斗的后面都隐藏着对民主派的资产，对这只圣杯²³⁶的盘算，所以先验的竞争，关于红胡子皇帝^①的胡须的争论立刻就成了小丑们的毫不出色的竞赛。谁要想根据原始材料研究这一塌老鼠与青蛙之战²³⁷，那他可以在纽约“快邮报”、“纽约德文报”、“德意志总汇报”、“国家报”、巴尔的摩的“通讯员”、“警钟报”及其他美国德文报纸上找到一切必需的文件。但是，这种卖弄虚构的同盟和臆想的阴谋的把戏，这一切流亡者的吵嚷并不是没有引起某些严重的后果。它给了政府以它所希望的借口，使它得以在德国逮捕许多人，在全国各地镇压一切运动，并且利用伦敦的可怜的草人（就像利用吓唬鸦雀的草人一样）来吓唬德国的小市民。这些流亡的英雄们对于现状决没有任何危险，他们热烈希望的只有一件事——使德国国内呈现出一片死寂的沉静，好让他们的声音在这片死寂的沉静中显得更响亮；使公众的觉悟水平极度地降低，好让甚至像他们这样的人也可以成为出类拔萃的伟人。

新到的南德的正直人物们同哪一方都没有联系，因而在伦敦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他们可以充当各种集团的调停人的角色，同时可以把所有的流亡者像一个合唱队似的集合在一些杰出人物的周围。他们的高度发达的责任感要他们不要放弃这种机会。但是他们同时看到，在这方面同他们完全团结一致的赖德律—洛

① 红胡子是德皇弗里德里希一世的绰号。——译者注

兰已经坐上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安乐椅。对于他们这些法国的近邻来说，重要的是得到法国临时政府的承认，即承认他们是德国的临时统治者。对济格尔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让赖德律保障他的总司令的职位。但是，只有越过阿尔诺德才能走向赖德律。况且，阿尔诺德所戴的坚强性格的假面具那时还使他们敬仰，而且他还应当作为哲学上的北极光照耀他们南德的黄昏。因此，他们首先去向**卢格**请求援助。

站在另一方面的首先是**金克尔**及其亲密的周围人物——叔尔茨、施特罗特曼、席梅尔普芬尼希、泰霍夫等等，然后是以**赖辛巴赫**为首的前议会议员和议院代表，以及作为文学代表人物的梅因和奥本海姆，最后是维利希和他的义勇军，但后者已成泡影。在这里，角色的分配如下：作为西番莲的金克尔代表全体德国庸人；作为伯爵的赖辛巴赫代表资产阶级；而作为维利希的维利希则代表无产阶级。

关于奥古斯特·**维利希**，首先应当说明的是，古斯达夫总是因他的尖头盖骨而暗中不信任他，在这种头盖骨里面，自负这个过分发达的凸出部分压倒了一切脑力。有一个德国庸人在伦敦的一家啤酒店里看到前尉官维利希的时候，惊恐地抓起自己的帽子逃跑了，他边跑边喊道：“我的上帝，这个人多么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为了增强这种相似的气氛，维利希在革命前不久，做了一个时期的木匠。后来，在巴登—普法尔茨战役中他当了游击队的领袖。

游击队的领袖，这个古意大利佣兵队长的后代，在现代战争中，尤其是在德国，是一种特殊现象。游击队的领袖习惯于独立行动，是反对任何最高总司令的。他的游击队员只服从他，而他也完

全依赖于他们。因此，纪律在志愿部队里有极其特殊的性质：看情况而定，有时它严格到野蛮的程度，有时（而这是经常的）则极端松懈。游击队的领袖不能够总是摆出一副发号施令的面孔，他经常必须迎合他的游击队员，以实惠来讨好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一般的军人品质在这里并没有多大用处，为了使下属服从，必需用其他的品质来巩固勇敢。如果领袖没有高贵的出身，那他必需具有哪怕是高尚的意识，而这种意识又必须补充以阴谋、诡计和隐蔽的卑鄙行为。这样就不仅能博得自己的士兵的好感，而且也能收买居民的心，欺骗敌人，同时还被认为，特别是被敌人认为是个卓越的人物。但是，有了这一切还不足以掌握志愿部队，因为他们大部分或者一开始就是由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或者是很快就变得和流氓无产阶级一样了。为了掌握志愿部队，需要有一种最高的观念。因此，志愿部队的领袖必需具有某些固定观念的精华，他必需是有原则的人，经常意识到自己负有解放世界的使命。他应当向队伍传教，在同每一个士兵作个别谈话时经常进行有教徒的宣传，从而把这个最高观念灌输给他的士兵，并使整个部队就此变成自己的精神上的儿女。如果这个最高观念具有思辨的、坚强的性质，并且超过一般的理智的水平，如果它具有某些黑格尔的特色，正如维利森将军企图灌输给普鲁士军队的那种观念²³⁸一样，那就更好了。因此，使每一个游击队员具有高尚的意识，整个部队的行动就因此而获得思辨的神通，这使他们高高地超越于一般的缺乏头脑的勇敢之上；而这样的部队所以能获得荣誉，与其说是靠了它的成绩，不如说是靠了它的救世主的使命。如果使每一个战士都宣誓，说他们决心同他们为之而战的事业同归于尽，宁愿高唱着圣歌直到最后一个被杀死在边境上的最后一棵苹果树下，那末部队就能够

更加坚强。这样的部队和这样的领袖如果同普通的世俗的军队交往,自然一定会感到自己受了侮辱,并且一旦有适当的机会就一定要竭力争取脱离军队,或者立刻使自己摆脱无信仰者的团体;他们最痛恨大规模的军事联合和大规模的战争,因为在这时靠最高尚的感悟来支持的阴谋行为,如果忽视军事艺术的一般规则,就会毫无作用。因此,游击队的领袖应当是个道地的十字军骑士:他应当一身兼扮隐士彼得和穷汉瓦尔特两个角色。他应当用自己的德行来对付他的五光十色的部队的放荡的生活方式。谁也不敢把他灌醉,而他自己必须宁可避开众人,偷偷地,哪怕是在晚上躲在被子里抱着酒瓶痛饮。如果他由于人类的弱点,在饱尝了人世的幸福之后,超过规定的时间,到深夜里才回到兵营,那末他就永远不要走大门,而宁肯绕个弯,越墙进去,以便不要把任何人诱入歧途。对于女人的魔力他应当表示冷淡,但是,如果他偶尔让一个裁缝的帮工在自己的床上休息,就像克伦威尔对待自己的下级军官那样,那他就会给人以良好的印象;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决不当成为过分的禁欲主义者。因为在 *cavaliere della ventura* (探险的骑士) 的后面站着他的部队的、主要是靠征用和免费住宿勉强度日的 *cavaliere del dente* (吃饭的骑士),而穷汉瓦尔特总是不得不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仅仅由于这一点,隐士彼得就必须经常出面来进行准备好的安慰,说采取这种不愉快的办法,纯粹是为了拯救祖国,因而也是为了受难者本身的利益。

游击队的领袖在战时所表现的这一切品质也表现在平时,诚然,这些品质发生了某些不十分好的变化。首先他应后为新的部队保存核心,并经常派出招募新兵的下级军官。这个主要是由志愿部队的残余和平民流亡者组成的核心,在兵营中的生活或者由

政府维持(例如在伯桑松时)²³⁹,或者用其他的方法维持。兵营中的生活应当用观念来使它神圣化;这要通过兵营共产主义来实现,由于实行兵营共产主义,对一般非军人活动的卑视获得了最崇高的意义。但是,由于这种共产主义兵营已不再受军事条例的约束,而只是服从于精神上的权威和自我牺牲精神的训条,所以偶尔因共同的金库而打架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有时,拳头也会落到精神上的权威的头上。如果哪里附近有手工业者协会,那末这里就可以用来作为替酗酒的部队补招新兵的据点,并且给手工业者描绘将来的放荡生活和游击队冒险活动的远景,以补偿他们现在所做的沉重的劳动。此外,有时可以做到使手工业者协会出钱供养部队,因为这样的兵营对于无产阶级的未来具有高度的原则性的意义。不论在兵营里,或者在协会里,说教和在个人交往中的古老的不拘礼节的作风都不是没有影响的。游击队员就是在平时也不应失去他所绝对必需的不可动摇的信念,而且,正如他在战时在每次失败以后总是预告明天将获得胜利一样,现在他也经常宣告,这至迟再过两星期就“会开始”,这一点在精神上是无疑的,在哲学上是必需的。因为他经常必须面对着敌人,因为高尚的人总有无耻的人反对,所以他在后者中间将发现对自己的明显的敌意,并且确信,无耻的人光是由于痛恨他应得的声望就会打算毒害他或刺死他;因此,他总是在枕头底下放一柄长刀。游击队的领袖在战时如果不想像他被居民奉为偶像,就不可能获得任何胜利,同样,在平时就是在没有实际的政治联系的情况下,他也不断地设想或想像着这些联系,而这有时会造成惊人的骗局。征用和免费住宿方面的才能又以愉快的寄生生活的形式重新表现出来。反之,我们的罗兰的严格的道德上的禁欲主义,像一切高尚的和伟大的行为一样,

在和平时期受到了严重的考验。博雅多在第二十四首歌中唱道：

特平在谈到布拉瓦伯爵时说，
他的一生在童贞中度过，
谁愿意相信就相信吧，先生们！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后来布拉瓦伯爵由于美丽的安吉利卡的眼睛而失去了理智，而阿斯托尔弗不得不在月亮上寻找这个理智，就像洛多维科·阿里欧斯托先生令人神往地描写的那样²⁴⁰。但是，我们的现代的罗兰竟把自己同诗人本人混淆起来，诗人在讲到自己时说他也因恋爱而失去了理智，并且用嘴唇和手在他的安吉利卡的胸怀里找回理智，可是发生了这样的事：他所得到的的是被赶出了大门。

在政治上，游击队的领袖要表现出他在进行小战斗的各种方法上的无与伦比的经验。他按照“游击队员”这个字的本意，从一个派别转到另一个派别^①。小小的阴谋活动、可鄙的规避行为、不时的撒谎、以道义上的愤慨为借口而干出来的阴险的勾当在他那里都表现为高尚意识的自然标志，他对自己的使命及他的言论和行为的最高意义满怀信心，他坚决地宣布：“我从来也不说谎！”固定观念成了伪装起来的背信弃义行为的富丽堂皇的屏障，并且使缺乏任何观念的蠢笨流亡者们认为，他，这个有固定观念的人，不过是个傻瓜而已，——而对这样一个饱经世故的出色人物来说，这正是所需要的。

唐·吉诃德和桑科·判札的二位一体，既热爱粮袋又热爱固定观念的、对漫游骑士的免费膳食和他们的光荣同样感到振奋的、

① 双关语：德语中《Parteigänger》有“游击队员”之意，也有“任何一个党派的信徒”之意。——编者注

以坚强性格的假面具来掩盖自己的欺骗行为的、进行小战斗和搞小阴谋活动的英雄，这就是维利希。他的真正的未来是在格兰德河大草原上。

关于上述两批流亡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戈克先生在给纽约“德意志快邮报”编辑部的信中作了如下的说明：

“他们（南德人）决定同其余的派别联合起来，以便恢复奄奄一息的中央委员会的声望。但是，实现这个良好意图的希望很渺小。金克尔继续在搞阴谋活动；他同他的拯救者、他的传记作者和几个普鲁士军官组成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当秘密行动，逐渐扩大，尽量把民主派的钱弄到手，然后就以强大的金克尔派的身分突然公开出现。这样做既不诚实，又不公平，也不合理。”

济格尔先生在给同一家报纸的信中把南德分子在这些联合企图中的“诚实”想法表露如下：

“如果说，我们少数几个有正直想法的人也局部地进行了秘密活动，那末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抵御金克尔和他的同谋者的卑鄙的阴谋活动和勒索行为，并且向他们证明，他们并不是为了主宰一切而诞生的。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强使金克尔出席有许多人参加的大会，在那里我们要向他和他的（照他的说法）亲密的政治上的朋友们证明，并不是一切发光的東西都是金子。首先让乐器（叔尔茨），然后是让奏乐者（金克尔）去见它的魔吧。”（1851年9月24日“纽约德文周报”）

在南德分子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卢格的“理智”，而在北德分子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金克尔的“感情”，只要根据这一点就可以判断，这两个互相咒骂，互相称之为“南德人”和“北德人”的集团的成分是多么奇特了。

为了了解下一个伟大的战斗，必须谈一下这两个震动世界的派别的外交手腕。

阿尔诺德（以及他的伙伴们）首先关心的是组织“不公开的俱

乐部”，它的公开的表面的目的是“进行革命活动”。他所特别喜爱的“德国事务委员会”应当从这个俱乐部里产生，而卢格本人则应当被推为这个委员会的代表参加欧洲中央委员会。阿尔诺德从1850年夏天起就已经在不断地追求这个目的。他希望在南德人中“找到理想的中国分子，在他们之中他可以毫不客气地作为统治者主宰一切”。因此，成立正式的流亡者组织、组织各种委员会就构成了阿尔诺德及其同盟者的政策中的必要因素。

从金克尔及其同伴这方面来说，他们应当竭力设法不让卢格在欧洲中央委员会中篡夺到的地位有合法化的可能。金克尔发表的号召预先签名认购五百英镑的宣言得到了回答，他收到了一份从新奥尔良来的寄钱给他的通知，根据这一点，他就同维利希、席梅尔普芬尼希、赖辛巴赫、泰霍夫、叔尔茨以及其他等人一起组成了秘密的财务委员会。他们这样想：如果我们有了钱，流亡者就会拥护我们；如果流亡者拥护我们，那末我们也将成为德国的统治者。因此，他们首先必须让流亡者群众忙于参加各种单纯是为了讨论形式问题而召开的会议，但是用一切办法阻挠成立正式的组织，使不超出“未形成的团体”的范围，尤其是不让组织任何委员会，这样就可以妨碍敌对的派别，阻挠他们的活动，而自己则在他们背后耍手腕。

这两个派别（即“有名的活动家们”）共同的特点是力图欺哄流亡者群众，不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最终目的，只是把他们当作幌子，然后，一旦目的达到，就把他们抛弃掉。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民主派的马基雅弗利们、达来朗们和梅特涅们是怎样互相攻击的。

第一场。1851年7月14日。“同金克尔进行的关于共同出场

的私人协商失败”之后，卢格、戈克、济格尔、菲克勒尔、隆格就邀请所有派别的有名的活动家都来参加7月14日在菲克勒尔处召开的会议。有二十六人出席。菲克勒尔提议组织德国流亡者的“不公开的小组”并且从小组中分出“工人委员会，来协助达到革命的目的”。提案主要是遭到金克尔和他的约六个信徒的反对。经过了許多小时的热烈争论之后，菲克勒尔的提案通过了（十六票对十票）。金克尔和少数派声明，他们再不能参加这个计谋，并且离开了会场。

第二场。7月20日。上述的多数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同盟，在新加入者中间有菲克勒尔介绍的**陶森瑙**。

就像隆格是德国民主派的路德，金克尔是它的梅兰希通一样，陶森瑙先生是它的**阿伯拉罕—圣克拉**。西塞罗的两个肠卜者不可能互相对视而不发笑²⁴¹。陶森瑙先生也不可能对着镜子中自己的严肃表情而不哈哈大笑。如果说，卢格曾经获得巴登人对他的敬仰，那末命运报复了他，给他派来了一个令他敬仰的奥地利人陶森瑙。

根据戈克和陶森瑙的建议，会议延期了，延期的目的是设法再一次同金克尔派达成协议。

第三场。7月27日。会议在克朗邦饭店举行。“有名的”流亡者 *au grand complet*（全都到齐了）。金克尔派也出席了，但不是为了来参加已经成立的同盟。相反地，他们坚持“组织**不包括**工人委员会和**没有任何明确目的**的‘公开的辩论俱乐部’”。叔尔茨在这整个议会程序中扮演了年轻的金克尔的导师的角色，他提出了以下的建议：

“本团体应以**德国流亡者俱乐部**为名宣布自己为非公开的政治同盟。新成员应从德国流亡者中，根据同盟成员的建议，由多数票通过吸收之。”

提案一致通过。俱乐部决定每星期五集会一次。

“这个提案的通过引起了全场的鼓掌和欢呼：‘德意志共和国万岁!!!’由于全体一致通过，每个人都感到，他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并为革命作了件有益的事情。”（戈克，1851年8月20日“快邮周报”）

爱德华·梅因因这个胜利而欣喜若狂，他在自己的石印通告中欢呼道：

“现在全体流亡者组成了一支统一的紧密团结的队伍，连布赫尔也参加了，只有怙恶不悛的马克思集团除外。”

梅因的这些话也可以在柏林的石印的政府通告^①中看到。

于是，在全体表现了互相谦让的情况下，在为庆祝德意志共和国而发出的“乌拉”欢呼声中，伟大的流亡者俱乐部诞生了，它将举行非常令人振奋的会议，并且将在金克尔赴美几星期以后就皆大欢喜地解了体。不过，这并不妨碍它直到今天仍在美国作为健在的机构而发生作用。

第四场。8月1日。在克朗邦饭店举行第二次会议。

“很遗憾，我现在必须报告：我们把希望寄托在这个俱乐部的胜利上是犯了错误。”（戈克，8月27日“快邮周报”）

金克尔不经多数人预先通过便把六个普鲁士流亡者和六个工业展览会的普鲁士参观者引进了俱乐部。**达姆**^②（主席，前巴登制

① “普鲁士石印通讯”。——编者注

② 达姆在这里！

谁在这里？达姆！

谁？

达姆，达姆，难道你不知道达姆？

宪议会主席)对这种等于叛国的破坏章程的行为表示惊奇。金克尔声明说:

“俱乐部只是一个公开的松弛的团体,它除了提供人们互相认识和举行任何人都可以来听的座谈的机会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因此,最好是尽量让外面的拜访者参加本团体。”

大学生叔尔茨连忙来补救他的教授的愚蠢行为,提出一个关于准许拜访者参加的修正案。修正案通过了。阿伯拉罕·圣克拉—陶森瑙站了起来,并严肃地提出了下面两个严肃的提案:

(1)“选举一个委员会(臭名昭著的委员会),它每周要提出关于当前政治、特别是德国的当前政治的准确报告;这些报告应当归入同盟的档案,在必要的时候应当公开发表;(2)选举一个委员会(臭名昭著的委员会),把反动派的奴仆们在过去三年中对民主派的拥护者干出来的以及现在还在干的违法行为和残暴行为的尽可能详细的材料记载到同盟的档案中”。

坚决反对这个提案的有

赖辛巴赫:“在这两个看样子似乎不错的提案里他看到了可疑的见不得人的用意和想法,这就是想通过选举这些委员会的办法来赋予本团体以他和他的朋友们所不希望的正式的性质。”

席梅尔普芬尼希和叔尔茨:“这样的委员会可以攫取到一种具有秘密性质的职能,因而可以逐渐导致形成正式的委员会。”

梅因:“我所希望的是言论,而不是行动。”

如戈克所断定的,多数人似乎都倾向于通过这两个提案。于是马基雅弗利—叔尔茨便提议延期表决。阿伯拉罕·圣克拉—陶森瑙由于天真而同意了这个提案。金克尔认为,

“表决应当延期,到下一次会议再举行,主要原因是,今天晚上他那一派看来是处于少数地位,因此他和他的朋友们不能认为在这种情形下举行的表决是‘结合他们的良心’的。”

问题转到下一次会议讨论。

第五场。8月8日。在克朗邦饭店举行第三次会议。讨论陶森瑙的提案。金克尔和维利希违反协议，带来了“流亡者下层，le menu peuple（平民），以便在这一次结合自己的良心。”叔尔茨提出一个关于志愿报告当前政治问题的修正案，于是，经过了预先的商议，立刻就有人自愿宣读这些报告：梅因谈普鲁士，叔尔茨谈法国，奥本海姆谈英国，金克尔谈美国和未来（因为他的最近的将来是在美国）。陶森瑙的提案被放到了一边。他令人感动地声明说，他愿意牺牲他的正义的愤怒，把它献给祖国，他愿意留在同盟者的圈子里。但是卢格—菲克勒尔派立刻摆出一副受了骗的美丽的灵魂的愤怒姿态。

插曲。金克尔终于从新奥尔良收到了一百六十个英镑，这笔钱，金克尔必须在其他有名人物的参与下，为了革命的利益把它变为能赢利的资本。本来就已经被上一次的表决结果刺痛了的卢格—菲克勒尔派知道了这件事。决不能再浪费一分钟，必须行动起来。于是便形成了一个用“鼓动者协会”的名字为自己的停滞的和污浊的存在装璜门面的新的流亡者泥潭。它的成员是陶森瑙、弗兰克、戈克、济格尔、黑尔特勒、隆格、豪格、菲克勒尔、卢格。协会立刻在英国报纸上发表声明，

“它的建立并不是为了辩论，而主要是为了活动，它将不是致力于 words（言），而是致力于 works（行），并且首先要建议志同道合的人提供现金。鼓动者协会把执行权托付给陶森瑙，并任命他自己的对外的全权代表和通讯员；同时，它承认卢格在欧洲中央委员会里的地位（帝国摄政者的地位），也承认他过去的活动，承认他代表具有真正德意志精神的德国人民。”

在这个新的联合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个原始的集团，即卢格

—隆格—豪格集团。这样，阿尔诺德在经过了多年的奋斗和努力之后，终于达到了他所想望的目的：他被承认为民主派中央这辆马车的第五个轮子，并且在自己的背后有了由整整八个人组成的“一部分轮廓鲜明的（可惜太鲜明了）人民”。但是连这一点满足也被破坏了，因为就在他被承认的同时也被间接免去了职务，而且他只是在粗汉菲克勒尔提出的条件下被承认的，根据这个条件卢格必须从现在起就停止“写作和在世界上传播自己的胡话”。粗暴无礼的菲克勒尔认为阿尔诺德的作品中只有那些他本人没有读过也用不着去读的作品，才是“值得注意的”。

第六场。8月22日，克朗邦饭店。首先便是叔尔茨的“外交上的杰作”（见戈克）：建议由属于各派的六人组成全体流亡者委员会，并吸收维利希的手工业者协会的已成立的流亡者委员会的五个成员加入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金克尔—维利希派将总是处于多数的地位）。建议通过了。选举也举行了，但是“国家”中由卢格统治的那一部分的成员拒绝参加选举，因此，这个外交上的杰作便破产了。此外，过了四天维利希就退出了早就只在名义上存在的手工业者的流亡者委员会，因为表现出极端不恭的“流亡者下层”的多次叛乱使这个委员会的解体早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由此可见，关于这个流亡者委员会的事情究竟有多少，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有人对鼓动者协会的公开出场提出质问。有人建议要流亡者俱乐部同鼓动者协会脱离一切关系，并且要公开宣布不同意它的全部活动。在场的“鼓动者”——戈克和小济格尔（也就是老济格尔，见下面^①）遭到了疯狂的攻击。鲁道夫·施拉姆宣布，他的老朋友卢

^① 见本卷第377—378页。——编者注

格是马志尼的奴仆和“老牌的肮脏的造谣中伤者”。布鲁士斯，你也在内！^①戈克不是以伟大的演说家的身分，而是以一个正直的公民的身分进行反驳，并且无情地攻击两面派的、优柔寡断而阴险的、牧师般地慷慨激昂的金克尔：

“不让那些希望工作的人有机会参加工作，这是不可原谅的！但是这些人显然只要求表面上的、无所作为的联合，为的是在这种幌子下使这个集团能够达到某种目的。”

当戈克谈到鼓动者协会在英国报纸上发表的公开声明的时候，金克尔庄严地站了起来，并庄重地说，他

“已经控制了整个美国新闻界，并且已经采取措施，要法国新闻界也服从他的影响”。

真正的德国派的提案通过了，并且引起“鼓动者”提出了声明，说他们的协会会员再也不能留在流亡者俱乐部里了。

于是，流亡者俱乐部和鼓动者协会之间发生了可怕的分裂，在整个现代世界历史上形成了一道裂口。最有趣的是，这两个流亡者的产物实际上只存在到它们之间发生分裂时为止，而现在它们好像只存在于考尔巴赫的异教徒灵魂之战²⁴²中，而这场战斗到今天还在美国的德文报刊上以及在各种会议上继续进行着，并且看样子将继续进行到世纪末。

不承认任何纪律的施拉姆也攻击起维利希来了，他断定，流亡者俱乐部同这个骑士联合是丢了脸，这件事使整个会议更加骚乱了。主席——这一次是胆怯的梅因——绝望了，已经几次失去了对会议的控制。而在讨论鼓动者协会的问题时，由于它的会员的退

^① 凯撒被刺后发现他的好友布鲁士斯也是谋刺者之一时，对布鲁士斯说的话。（见“莎士比亚戏剧集”作家出版社版第7集第55页）——译者注

场，混乱已达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在叫喊、喧嚷、鼓噪、威胁、狂哮声中，这个有教益的会议开到了深夜两点，最后主人熄灭了煤气灯，使愤怒的敌对者陷入一片漆黑，并且以恐怖结束了这场拯救祖国的事业。

在8月底侠义的维利希和多情善感的金克尔企图从内部来炸毁鼓动者协会。他们向诚实的菲克勒尔提出了如下的建议：

“他，菲克勒尔应当同他们以及他们的亲密的政治上的朋友们一起组成财务委员会以支配新奥尔良寄来的钱。这个委员会将一直存在到能够召集革命本身的正式的财务委员会时为止；但是，如果接受这个建议，那就是同意解散一切存在到那时的德国的革命团体和鼓动团体。”

正直的菲克勒尔被这个“钦定的、秘密的、不负责任的委员会”激怒了，

他喊叫道：“仅仅是一个财务委员会怎么能把一切革命政党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不论是现在收到的或是过去收到的钱都不能成为要求民主派中各个意见不同的派别牺牲自己的独立的理由。”

这样，这个叫人开小差的企图非但没有引起预期的解散，反而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因此，陶森瑙可以宣布，两个强大的派别——“流亡者”和“鼓动者”之间的破裂已成为无可挽救的了。

十四

为了表明“鼓动者”和“流亡者”之间的战争是以多么融洽的方式进行的，我们从美国的德文报纸上引用几个片断。

“鼓动者”

卢格宣布，金克尔是“普鲁士亲王的代理人”。

另一个“鼓动者”发现，流亡者俱乐部中的杰出的成员似乎是：

“除牧师金克尔外，还有三个普鲁士尉官、两个来自柏林的平庸的作家和一个大学生。”

济格尔写道：

“不可否认，维利希获得了几个信徒。当然，既然在三年的时间内不断向人们说教并且只说他们爱听的话，那末只有非常愚蠢的人，才不能把这些人变成自己的信徒。金克尔一伙力图把维利希的这些信徒拉到自己这方面来。维利希的信徒和金克尔的信徒便开始勾搭起来了。”

第四个“鼓动者”宣布，金克尔的追随者都是“偶像崇拜者”。

陶森瑙对流亡者俱乐部作了如下的说明：

“在爱好和平的假面具下坚持分立的利益，为了获得多数一贯进行欺骗，不知名的大人物以党派的领袖和组织者的身分出现，企图钦定秘密的财务委员会和玩弄各种幕后的阴谋诡计（不管它们在那里被叫做什么），**不成熟的政治家们**总是想通过这些手法来在流亡中支配祖国的命运，可是一旦爆发革命，这类讲究虚荣的计划就都烟消云散了。”

最后，罗多芒特—海因岑宣布，卢格、戈克、菲克勒尔和济格尔是他个人所认识的在英国的唯一值得尊重的流亡者。流亡者俱乐部的会员都是“利己主义者、保皇党人和共产党人”。金克尔是“不可救药的爱慕虚荣的蠢才和夸夸其谈的显贵”；梅因、奥本海姆、维利希等等都是他海因岑“只有把身子弯到膝盖骨才能看清的小人物，他们甚至还没有长到卢格的踝骨那样高”。（1851年纽约“快邮报”“纽约德文报”“警钟报”等等）

“流亡者”

“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悬在空中的、还没有开始工作就自命为全权代表的钦定委员会？它既不是由任何人选出的，也不询问一下它想代表的人，他们是否愿意让这些人来做他们的代表？”——“凡是知道卢格的人都晓得，发表宣言是他的不可救药的毛病。”——“在议会里，卢格甚至还不如特利尔的拉沃或西蒙有影响。”——“凡是需要行动的革命毅力、组织工作、镇静或沉默的地方，卢格就成了危险人物，因为他既不能闭口不说，又无法停笔不写，而且总希望代表整个世界。卢格同马志尼和赖德律—洛兰结交，这翻译成卢格的话，就是向所有报刊发出通知：‘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结成了兄弟般的革命联盟。’”——“这种妄自尊大的钦定委员会的做法、这种自夸的无所作为，促使卢格的最亲近和最明智的朋友，如奥本海姆、梅因、施拉姆，为了共同的活动而同其他人建立联系。”——“站在卢格背后的不是一部分轮廓鲜明的人民，而是一个轮廓鲜明的宁静的书呆子。”

“每天都有好几百人询问，这个陶森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谁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有个维也纳人偶尔相信，他是为了把维也纳民主派的坏的一面公布于世而经常责难它的反动性的维也纳民主派中的一个。但是这应由这个维也纳人负责。无论如何，这个大人物是不知名的；但是他究竟是不是个大人物，还不得而知。”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把其余一切都看做不成熟的政治家的可尊敬的人物，究竟是些什么人。这里有总司令济格尔。如果你问历史的缪斯，这个平平无奇的微不足道的人怎样达到总司令的地位，那她就会陷于极端狼狈的

境地。济格尔只是他弟弟的哥哥。他的弟弟由于发表尖锐的反政府的言论而成为有声望的军官，不过，他的这些言论是由于经常为了最平常的腐化行为便遭到逮捕而引起的。年轻的济格尔认为这是在革命高潮中的最初的混乱时期宣布自己是总司令和陆军部长的充分理由。在不止一次地证明自己具有优良品质的巴登炮兵队里，有足够的较成熟的和真正的军官，在他们面前，年轻的、毫无经验的尉官济格尔不能不感到惶恐不安，而且，当他们必须服从这个无名的、既缺乏经验又缺乏才能的年轻人的时候，他们感到相当的气愤。但是这里有布伦坦诺，他十分愚蠢，又蓄意叛变，因而可以做出任何必然毁灭革命的事情…… 济格尔在整个巴登战役中表现了极端的无能…… 无论如何，值得注视的是，在拉施塔特城下和在黑林山脉中，济格尔把共和国军队的英勇的士兵们交给命运去随意摆布，不给他们派出他答应派去的增援部队，而同时他自己却带着菲尔施坦堡公爵的肩章，坐着他的轻便马车在苏黎世城里环游，并且还以引人注意的失败的统帅的角色自我炫耀。这位成熟的政治家的众所周知的伟大就是如此，他由于可以自认以往有英勇的业绩，所以又一次把自己任命为鼓动者协会的总司令。我们这位伟大的熟人，弟弟的哥哥就是如此。”

“的确可笑，当这些人（如鼓动者协会的会员们）责难别人不彻底的时候，他们自己却是些政治上的零，无论如何，既不是整个什么，又不是半个什么。”——“个人野心，这就是隐藏在他们的原则基础后面的东西。”——“鼓动者协会作为一个协会只具有私人的意义，就像一个什么文艺小组或台球房一样，因此，它没有任何理由要求承认它，也没有任何权利颁发委任状。”——“你们自己抽签决定的！外行应当成为内行，为的是让他们自己来判断，你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巴尔的摩“通讯员”）

应当承认，这些先生们彼此都很了解，又几乎都达到了了解自己的地步。

十五

这时，“流亡者”的秘密的财务委员会选出了管理委员会，由金克尔、维利希和赖辛巴赫组成，并且决定认真地从事发行德国公债。大学生叔尔茨，正如 1851 年底的纽约“快邮报”、“纽约德文报”和巴尔的摩“通讯员”所报道的那样，被派到法国、比利时和瑞士去，并且开始在那里寻找一切过去的、已被遗忘的和销声匿迹的议会议员、帝国摄政、议院代表和其他有名的人物，直到已故的拉沃，争取他们为公债作保证。这些已被遗忘的倒霉的人便急忙为这一事业作保证。要知道，如果说为公债作保证到底还有什么意思的话，那末这就像互相保证 in partibus（在异国的）政府职位一样，而金克尔、维利希和赖辛巴赫等先生就这样为自己的将来的前途取得了保证。而在瑞士无可慰借地苟延残喘的、可敬的、道德高尚的人物们，对于“组织”和保障职位热中到这样一种程度，甚至老早就在他们中间根据资历按秩序分配了未来的政府职务，而在决定第一号、第二号和第三号职位归谁时，总要吵得不亦乐乎。一句话，大学生叔尔茨回来时口袋里是带着保证书的，于是伙伴们便开始了工作。固然，几天以前，金克尔在同“鼓动者”进行的又一次的会商中曾答应不以“流亡者”的名义单方面进行公债的事情；但是正因为如此，他才带了保证人的名单及赖辛巴赫和维利希的全权委托书离开了，好像是为了要在英国北部作他的美学演讲，而实际上是为了从利物浦横渡大洋到纽约去，就像帕威法耳²⁴³那样到美

国去寻找**圣杯**，即民主派的金银财宝。

于是开始了动听的、神奇的、夸张的、从未听说过的、真正的和充满冒险情节的关于“流亡者”和“鼓动者”在大洋两岸进行得更加激烈和更加顽强的伟大战斗的故事，——关于哥特弗利德为了同科苏特竞争而进行的十字军征讨的故事，关于他怎样在经受了千辛万苦和难以形容的考验之后终于带着装在旅行袋里的圣杯回到了故乡的故事。

Or, bei signori, io vi lascio al presente,
E se voi tornerete in questo loco,
Dirò questa battaglia dov' io lasso
Ch'un'altra non fu mai di tal fracasso.

(Bijardo, canto 26)

现在，先生们，我要离开你们了；
如果你们再到这里来的话，
我将告诉你们战斗的喧嚷和叫嚣，
这个战斗是没有任何战斗可以与之相比的。^①

① 博雅多“恋爱中的罗丝”第二十六首歌。——编者注

NEW-YORK DAILY TRIBUNE.

VOL. XII. NO. 2540 NEW-YORK, SATURDAY, AUGUST 21, 1852. PRICE TWO CENTS.

卡·马克思 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²⁴⁴

1852年8月6日星期五于伦敦

不列颠议会大选的结果已经揭晓了。关于这个结果，我将在下一篇文章^①中更详细地加以分析。

在竞选运动中，互相攻击或者互相支持的有哪些党派呢？

有托利党、辉格党、自由派保守党人（皮尔派），par excellence（最道地的）自由贸易派（曼彻斯特学派²⁴⁵的信徒、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派），最后，还有宪章派。

辉格党、自由贸易派和皮尔派联合起来反对托利党。真正的竞选斗争就是在这个联盟和托利党之间展开的。至于宪章派，他们是既反对辉格党、皮尔派和自由贸易派，也反对托利党的，也就是说，他们反对的是整个官方英国。

大不列颠的政党在合众国是大家都相当熟悉的。因此，这里只要把每个政党的显著特点略提几笔就够了。

托利党在1846年以前以旧英国传统的卫道者闻名。人们说，他们把英国宪法奉为世界第八奇迹；他们是 *laudatores temporis acti*（往事的赞美者），是王位、高教会派²⁴⁶以及不列颠臣民的特权

① 见本卷第405—411页。——编者注

和自由的狂热的拥护者。在不祥的 1846 年谷物法废除时²⁴⁷，托利党人叫苦连天，这就证明了他们正是地租的狂热的拥护者，同时也揭露了他们之所以对旧英国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恋恋不舍的秘密。原来，这些制度正是最适合于大土地所有制的，他们（土地贵族）一直依靠这些制度统治着英国，而且直到现在还企图以此保持自己的统治。1846 年赤裸裸地暴露了构成托利党的现实基础的物质的阶级利益。1846 年从托利党身上撕下了一直用来掩盖它的阶级利益的那张为传统所尊崇的狮子皮。1846 年使托利党变成了保护关税派。“托利党”是个神圣的名字，“保护关税派”则是个凡俗的称呼；“托利党”听起来是政治上的战斗的呐喊，“保护关税派”听起来却是经济上的绝望的哀鸣；“托利党”似乎标志着一种思想、一种原则，“保护关税派”则代表着物质利益。这些保护关税派所保护的是什么呢？是他们自己的收入，是他们自己的地租。可见，托利党人归根到底是和其他资产者一样的资产者；难道世界上还有不保护自己钱袋的资产者吗？托利党人和其他资产者的区别，也就等于地租和工商业利润的区别。地租是保守的，利润是进步的；地租是民族性的，利润是世界性的；地租信奉国教，利润则是天生的非国教徒。1846 年废除谷物法，只是承认了一并既成的事实，承认英国市民社会的成分中早已发生的变化，这就是：土地占有的利益服从于金融集团的利益，地产服从于商业，农业服从于工业，乡村服从于城市。当英国农村和城市人口的比例已经是一比三的时候，还怎么能够不肯定上述事实呢？托利党实力的物质基础就是地租。地租是由食物的价格来调节的，而食物的价格又是靠谷物法人为地保持在高度水平上的。谷物法的废除降低了食物的价格，食物价格的降低又使地租下降，而随着地租的下降，托

利党的政治力量所依靠的实力也就被破坏了。

现在托利党人企图干些什么呢？他们企图保持住已经丧失了社会基础的政治权力。他们用什么方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除了**反革命**，即国家对社会的反动以外，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他们力图用强力保持那些从城市人口超过乡村人口两倍时起就已注定要复灭的制度和政治权力。这种企图必然要以托利党人的失败而告终；它一定会加速和加剧英国的社会发展，造成危机。

托利党人在租佃农场主中间争取拥护者，这些农场主或者还习惯于把地主看做自己天然的尊长，或者在经济上依赖地主，或者还不懂得农场主与地主之间利益的共同点并不比债务人与高利贷者之间利益的共同点更多。托利党人还得到那些关心殖民利益、关心航海利益的集团以及国教信徒，一句话，得到所有那些认为必须反对现代工厂工业发展所引起的必然后果和它所酝酿的社会革命以保护自己利益的分子的拥护和支持。

托利党的世仇是**辉格党**，一个与美国的辉格党²⁴⁸除了名称以外毫无共同之处的政党。

英国的辉格党人在政治博物学上属于这么一个种类，像所有的两栖类一样，他们的生活很轻松，但要加以描写却很困难。我们还是像他们的敌人那样，称他们为在野的托利党人呢？还是像大陆上的作家们所爱做的那样，把他们看做一定的**人民原则**的维护者呢？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陷入像辉格党的历史学家库克先生所陷入的那种窘境，这位先生在他的“政党史”²⁴⁹中非常 naïveté（天真）地宣称，虽然辉格党所依据的确是一些“自由的、道德的和开明的原则”，但是，非常遗憾，在辉格党存在的一个半世纪以上的时期内，每当它执政的时候，总是有些什么东西妨碍它实现这些原则。这

就是说，连辉格党自己的历史家也承认，辉格党的实际行为同它所宣布的“自由的、开明的原则”完全是两回事。因此，这个党很像一个酒鬼，在市长面前坚称他在原则上是拥护戒酒的，但是每逢礼拜天他总是完全偶然地喝得酩酊大醉。

现在我们还是不要去管辉格党人的原则吧；我们根据历史事实可以更好地判断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我们要看的是他们的所做所为，而不是他们曾经有过什么样的信仰，以及希望别人怎样来看待他们的作用。

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一样，也是大不列颠的大土地占有者。不仅如此，辉格党的核心正是由英国最古老、最富有和最傲慢的土地占有者构成的。

他们和托利党人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辉格党人是资产阶级的，即工商业中等阶级的**贵族代表**。由于资产阶级把执政的垄断权和国家官职的独占权让给了辉格党这一贵族寡头，后者就向资产阶级做了一切已由社会和政治发展进程表明是**必然的和急迫的**让步，并且帮助资产阶级实现这些让步。一点不多也一点不少。而每当辉格党人采取这种迫不得已的措施时，他们就大声疾呼，说这样一来历史进步已经达到了极限，整个社会发展已经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然后他们就“紧紧贴在”这个“顶点”²⁵⁰上。辉格党人要比托利党人易于忍受地租收入减少之苦，因为他们自己是不列颠帝国收入的得天独厚的管理人。只要他们还把政权的垄断看成自己的世袭财产，他们就可以放弃谷物法为他们造成的垄断。自从1688年“光荣革命”²⁵¹以来，除了若干次短期的中断（主要是由于第一次法国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反动），执掌国务的一直是辉格党。谁要是回忆一下这一段英国历史，他就会发现：力图保持自己世袭

的寡头政权乃是辉格主义的唯一特征。至于除此以外辉格党有时也加以维护的那些利益和原则，并不是它自己的，而是工商业阶级的发展即资产阶级的的发展强加于它的。就像 1688 年以后辉格党和当时拥有极大权势的金融巨头联合起来一样，在 1846 年我们看到它又和工业巨头联合在一起。辉格党对 1831 年改革法案²⁵²的实行没有尽多大力量，正像它对 1846 年自由贸易法案的实行也没有尽多大力量一样。这两个改良运动——政治的也好，商业的也好——都是资产阶级的运动。一当这两个运动中的任何一个发展到不可遏止的地步，一当它同时变为把托利党从政府职位赶走的最可靠手段，辉格党便上台执政，并把同政权有关的那一部分胜利果实据为己有。1831 年辉格党人把政治方面的改革刚好进行到不致使资产阶级过分不满的程度；1846 年以后他们又把自己的自由贸易措施限制到能替土地贵族挽救尽可能多的特权的方面。他们每一次都急忙拉住运动，以便阻止运动继续发展，同时恢复自己的地位。

非常明显，一旦土地贵族再也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来保持自己的地位，再也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来争夺政权，一句话，当托利党彻底垮台的时候，英国历史上也就不会再有辉格党的地位了。既然贵族已经消灭，那些反对这个贵族的资产阶级贵族代表还有什么用处呢？

大家知道，在中世纪，当城市开始兴起时，德国的皇帝曾经给这些城市委派了帝国总督——《advocati》——以保护它们不受周围贵族阶级的攻击。但是当城市由于人口和财富的增长而十分强大，完全独立，不仅能打退贵族的进攻，而且还能向贵族进攻时，它们就立刻把那些高贵的总督——advocati 赶走了。

辉格党对于不列颠资产阶级来说就是这种 *advocati*，而一旦托利党丧失对土地的垄断，辉格党也就会立刻丧失对政权的垄断。随着资产阶级的独立性和力量的增长，辉格党也就由一个政党退化为一个集团。

很清楚，英国辉格党只能是这样一种令人厌恶的、各色各样的分子的混合物，其中有拥护马尔萨斯的封建主义者，抱着封建偏见的大富商，失却荣誉感的贵族，无力经营产业的资产者，满嘴进步词句的保守分子，狂热迷恋保守主义的进步分子，一点一滴地贩卖改良的掮客，各式各样裙带关系的庇护人，营私舞弊的老手，以及宗教中的伪善者和政治上的伪君子。英国人民群众一向以富有健全的审美感著称。他们对一切杂七杂八和模棱两可的东西，对蝙蝠和罗素的政党都抱着本能的嫌恶。英国的人民群众，城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和托利党一样仇恨“大富商”，也和资产阶级一样仇恨贵族。而对辉格党，人民恨的则是两种人：贵族和资产阶级，即压迫他们的地主和剥削他们的金融巨头。人民恨的是辉格党所代表的寡头政权，它一百多年来统治着英国，不让人民管理自己的事情。

皮尔派（自由派保守党人）不是一个政党，他们不过是对一位政党活动家，对已故的罗伯特·皮尔爵士的一种纪念而已。但是，英国人是过于讲求实利的民族，他们认为纪念除了用来编写挽歌是没有什么别的用处的。而现在，当英国人民已在全国各地为已故的罗伯特·皮尔爵士建立起青铜的和大理石的纪念碑时，他们更加认为没有格莱安、格莱斯顿、卡德威尔等这样一些活的皮尔纪念碑也未尝不可了。所谓的皮尔派，不过是罗伯特·皮尔为自己训练的一帮幕僚而已。而由于这批幕僚为数甚多，所以他们也就一时忘

掉了他们背后是没有任何人马的。这就是说，皮尔派就是过去的皮尔的拥护者，目前他们还没有决定归附哪一个政党。而这种犹豫不决，显然是不能成为建立独立政党的充分根据的。

剩下的还有自由贸易派和宪章派。关于他们，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简略地加以说明。

卡·马克思写于 1852 年 8 月 2 日
载于 1852 年 8 月 21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3540 号和 1852 年 10 月
2 日“人民报”第 22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并根据“人民报”校对过

The People's Paper,

THE CHAMPION OF
POLITICAL JUSTICE AND UNIVERSAL RIGHT.

NO. 223

LOHDOX, SATURDAY, OCTOBER 9 1852.

Price pouspes

卡·马克思 宪章派

1852年8月10日星期二于伦敦

托利党、辉格党、皮尔派，——总之，所有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分析过的党派，或多或少都属于旧的时代，而自由贸易派（曼彻斯特学派的信徒、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派）则是现代英国社会的正式代表者，即统治着世界市场的英国的代表者。他们是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资产阶级的党派，是竭力想把自己的社会势力也变成政治势力并把最后一批傲慢的封建社会仆役铲除的工业资本的党派。领导这个党派的是英国资产阶级中最积极最坚决的部分——工厂主。他们力求使资产阶级取得不受任何限制、不加任何掩饰的统治，力求使人们公开地正式地承认全社会应服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服从那些管理这种生产的人的统治。他们所理解的贸易自由就是让资本畅行无阻地运动，摆脱一切政治的民族的和宗教的束缚。土地应该成为市场的商品并按照贸易的一般规律来经营。应该有纺纱业和棉织业工厂主，也应该有食品业工厂主，而贵族地主却不应该再有。简言之，就是不允许有任何其他政治的或社会的限制、规章和垄断存在，除非它们来源于“政治经济学的永恒规律”，即来源于制约着资本的生产和分配的那些条件。表

达这个党派反对英国旧制度——这是社会发展中的过了时的、行将告移的阶段的产物——的斗争的实质的，是下面这个口号：**生产尽量便宜，消除生产中一切 faux frais**（即生产的一切多余的、非必需的费用）。这个口号不仅是向个人提出的，而主要地是向**全民族**提出的。

王权连同它的“穷奢极侈的生活”、宫廷、王室费以及侍从人员难道不是生产的 faux frais 吗？没有王权，民族一样能够生产和交换产品，所以，要打倒王位！贵族的薪高而清闲的职位，上院，——这是些什么呢？生产的 Faux frais。庞大常备军呢？生产 faux frais。殖民地呢？生产的 faux frais。同教会连同它通过掠夺和募化而掌握的财富呢？生产的 Faux frais。还是让神甫们互相自由竞争吧，让每个人愿意给他们多少钱就给他们多少吧。庞大臃肿的英国司法机构以及它的大法官法庭²⁵³是什么呢？生产的 Faux frais。民族之间的战争呢？生产的 Faux frais。英国如果能同别的民族和平相处，就能够以更少的代价来剥削它们。

可以看出，对这些不列颠资产阶级的先进战士即曼彻斯特学派的信徒们说来，旧英国的每一种制度，从机器生产的角度来看，都是昂贵而且无益的，它的唯一的作用就是阻碍民族以最低的生产费用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以及自由地交换自己的产品。他们最终的要求必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处在自由竞争的无限的统治之下，只是在总的方面留下一个为整个资产阶级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行政权，以便在对内对外政策上保障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并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而就连这个最低限度的行政权也必须组织得尽可能合理而经济。在别的国家这样的政党就会叫做**民主党**。但它不能不是革命

的，而且它或多或少有意识地追求的最终目的是，彻底消灭作为贵族国家的旧英国。然而，它最近的目的却是实现议会改革，议会改革会使进行这种革命所必需的立法权转到它的手里。

但是不列颠的资产者不像法国人那样容易激动。虽然他们也力求实现议会改革，他们却不会为此而进行一次二月革命。相反地，在 1846 年由于废除谷物法而取得了土地贵族的巨大胜利以后，他们就满足于从这一胜利中获得的物质利益，并不想同时从这一胜利中得出必然的政治和经济结论，这样也就使辉格党得以恢复它对行政权的继承性垄断。在整个 1846—1852 年期间，他们由于高喊“伟大的原则，实际的（应读作：渺小的）行动！”这样的口号而受到人们的嘲笑。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在每一次强大的运动中，他们都不得不求助于工人阶级。但是，如果说贵族是他们垂死的对手，那末工人阶级却是他们新生的敌人，因此他们宁愿同垂死的对手勾结，也不愿用实在的、并非表面的让步去加强日益成长的、掌握着未来的敌人。所以，他们极力避免同贵族发生任何暴力冲突。但是历史必然性和托利党人都在推着他们向前走。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完成自己的使命，把旧英国、把过去的英国彻底破坏；而一旦他们成为政权的唯一执掌者，一旦政治统治和经济实力都集中在他们手中，因而对资本的斗争不再同对现政府的斗争割裂开来，那时就会爆发英国的社会革命。

现在我们来谈谈宪章派这个不列颠工人阶级的具有政治积极性的部分。他们为之而斗争的宪章里的六条，所包括的内容不外是对普选权的要求，以及使普选权不致成为工人阶级的空想的那些条件，这就是：实行秘密投票、规定议员支薪、每年举行大选。但是普选权就等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因为在英国，无产阶级占

人口的绝大多数,在长期的、虽然是隐蔽的内战过程中,无产阶级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而且甚至在农业地区也不再有机农,而只有地主、资本主义企业主(农场主)和雇佣工人。因此,在英国,普选权的实行,和大陆上任何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称号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

在这里,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关于宪章派的复兴和改组,我下次再谈。现在我只讲讲不久前的选举。

一个男子要想享有不列颠议会选举权,如果是在城市选区,他就得有除缴纳济贫捐外收入不少于十英镑的房产;如果是在各郡,那他必须是一个每年收入不少于四十先令的自由农²⁵⁴,或者是一个每年交纳不少于五十英镑地租的土地租佃者。单单从这一点,就可以得出结论:宪章派在刚刚结束的选举斗争中能够正式参加活动的只是极少数的人。但是为了说明他们在实际上怎样参加了这次选举斗争,我应该把英国选举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再提一提,这就是:

候选人提名日[Nomination day]和选举结果揭晓日[Declaration day]的区别!举手表决和投票表决的区别!

当候选人在选举日出面向人民发表公开演说的时候,他们第一步要经过举手表决选举。每一个人都有权举手,不管他是选民还是非选民。多数人举手赞成的人,选举主持者就宣布他经举手表决(暂时)当选。可是好景不常。举手表决的选举只不过是一种仪式,是对“有主权的人民”的形式上的礼貌;一旦特权受到威胁,这种礼貌马上就不要了。例如,如果享有选举特权的人们的候选人在举手表决中落选,这些候选人就会要求投票表决;而

投票表决则只有享有特权的选民阶层才能参加，只有在投票表决中获得多数选票的人才算是合法的当选者。第一次举手表决的选举只不过是暂时给予社会舆论的一种表面上的补偿，以便在下一步更加有力地向它证明它的软弱无力。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种举手表决的选举，这种危险的形式做法，其目的只是要把普选权弄得令人感到滑稽可笑，只是同“老百姓”开个天真的贵族式的玩笑（军务大臣贝雷斯福德少校就是这样说的）。但是这样想是错误的。一切德意志民族最初所共有的古代习俗所以能够作为传统延续到十九世纪，只是因为它不必承担很大的费用和 risk，就能给不列颠的阶级议会披上一件人民性的外衣。统治阶级从这种习俗得到的好处就是，人民群众总是在不同程度上热情地把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作为自己的民族利益来加以维护。只是当资产阶级开始在辉格党和托利党这两个正式政党采取独立的立场时，工人群众才开始在候选人提名日独立地行动。然而举手表决和投票表决之间、候选人提名日和选举结果揭晓日之间的对立，从来没有像在最近这次 1852 年选举中表现得这样明显，从来没有这样尖锐地表现为敌对原则之间的冲突，从来没有具有这样的威胁力，这样遍及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请看这是什么样的对立！谁在举手表决时被提名为候选人，他就会在投票表决时落选。谁在投票表决中获得多数选票，他就会饱尝人民的烂苹果和砖头。完全依照法律手续当选的议员不得不首先好好地考虑作为议员的肉体的“我”的安全。一边是人民的大多数，另一边是占全人口十二分之一、占全国成年男性居民五分之一的人。一边是热情，另一边是贿赂。一边是一些抛弃了自己的特点的党派：坚持保守观点的自由派，宣讲自由主义思想的

保守派；另一边是宣告自己的存在和捍卫自己的事业的人民。一边是一架只能在原地不停地打转，一步也不能前进的破烂机器，是所有的正式党派互相磨擦、互相倾轧、逐渐把对方碾得粉碎这样一个无益的过程；另一边是奋勇前进的国民群众，他们将消除这种原地打转的状态，打碎这架官方的机器。

我不打算详细叙述候选人提名同投票表决之间的对立、竞选运动期间工人阶级的声势浩大的示威同统治阶级的偷偷摸摸的竞选手法之间的对立在全国各地的表现。在所有的选区中，我只举一个集中表现出这种对立的选区即哈里法克斯的选举为例。在这里，互相竞争的候选人有爱德华兹（托利党）、查理·伍德爵士（前辉格党内阁财政大臣，格雷伯爵的女婿）、弗兰克·克罗斯利（曼彻斯特派），最后还有厄内斯特·琼斯，他是一个最有才干、最彻底、最坚决的宪章派。哈里法克斯是个工业城市，所以在那里托利党的希望不大。曼彻斯特派克罗斯利同辉格党人联合在一起。所以，激烈的斗争只是在伍德和琼斯之间、在辉格党人和宪章派之间展开的。

“查理·伍德爵士发表了历时约半小时的演说，开头和后半段都被广大听众的不满的喊声吵得根本听不清。据一个坐在他近旁的记者报道，他的演说的全部内容只不过是罗列已经实行的自由贸易派措施，攻击得比勋爵政府和吹嘘‘国家和民族的空前繁荣！’（喊声：“听啊！听啊！”）他连一个新的有助于改革的措施都没有提出来，只是用暗示的口吻稍稍提到约翰·罗素勋爵的选举法改革法案”²⁵⁵。

因为你们不会在伦敦任何一家属于统治阶级的大型报纸上找到厄内斯特·琼斯的演说，所以，下面我就从中作一些比较详尽的摘录。

“厄内斯特·琼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说：

‘选民和非选民们！你们到这里来庆祝一个庄严隆重的节日。宪法今天在理论上承认普选权，也许只不过为了明天在实践中把它抛弃……今天站在你们面前的有两种制度的代表，你们必须决定要哪一种制度的代表来统治你们七年。七年——这是整整一小段生命啊！……我请你们在这七年的大门前停一停，让这几年今天在你们的眼前缓慢地平静地走一趟吧。你们两万人今天采取的决定，也许就是为了让五百个人明天违反你们的意志！（喊声：“听啊！听啊！”）我已经说过，站在你们面前的是两种制度的代表。不错，在我的左边有辉格党人、托利党人和富有的企业主，但是实质上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富有的企业主说：要贱买贵卖。托利党人说：要买得贵，卖得更贵。对于工人说来他们是一模一样。但是这第一种制度现在是占上风的，虽然它的根子已经因大众赤贫的脓疮而糜烂。这个制度是靠同国外的竞争生存的。而我可以断言，在贱买贵卖的制度下，在依靠同国外的竞争的制度下，工人阶级和小企业主阶级的破产还要继续下去。为什么？劳动是一切财富的创造者。哪怕是长一粒粮食，织一码布，都要人去劳动。可是在这个国家里，工人没有任何独立的营生。劳动是以雇佣方式出卖的商品，劳动是市场上买卖的对象；既然劳动创造一切财富，所以首先必须购买劳动。“要买得便宜，要买得便宜！”劳动在最廉价的市场上被购买。而跟着来的是：“要卖得贵，要卖得贵！”卖什么？**劳动产品**。卖给谁？卖给外国——这是不言而喻的！——也卖给**工人自己**，因为工人既然不是自己劳动的主人，就不能享有劳动的第一批果实。“要贱买贵卖！”你们喜欢这种事情吗？“要贱买贵卖！”买工人的劳动要贱，把工人自己劳动的产品卖给工人要贵！这种交易的原则就是一定要让人吃亏。企业主以便宜的价钱购买劳动，他又出卖产品并必然从中获得利润。他把产品卖给工人自己，结果，企业主同被雇佣者之间的每一次买卖，都是企业主的有意的欺骗行为。这样，劳动由于不断的亏损而愈来愈降低，资本则由于经常的欺骗而愈来愈提高。但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制度还不仅仅限于这些。它依靠着同国外的竞争，而这就意味着我们得破坏其他国家的商业，正像已经在本国破坏了劳动一样。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关税高的国家必须比关税低的国家卖得便宜。但是外国的竞争总是不断增长的，因之价格也就总是不断降低。因此，在英国工资就要不断下降。怎样使工资下降呢？通过**过剩的劳动**。这种劳动的过剩又是怎样造成的呢？通过对土地的垄断，把超过工厂需要的人手赶向工厂；通过对机器的垄断，把这些人手赶到街头；通过使用女

工, 夺走男工手中的织布梭; 通过使用童工又把女工从织布机上排挤下来。企业主站在这种由活人堆成的过剩劳动的基础上, 脚下踩着破碎的心灵, 大声喊道: “会饿死的! 您愿意做工? 有一点总比根本没有强啊!” 于是备受折磨的群众就如获至宝地抓住这个机会, 同意企业主提出的条件。(有人高喊: “听啊! 听啊!”) 对于工人来说, 这一制度所产生的结果就是这样。而这对你们选民们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这对国内商业, 对小商人, 对济贫捐, 对一切捐税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外国竞争的任何一点加强都会相应地使国内价格进一步下降。劳动价格的任何下降都必须以过剩劳动的增加作为基础, 而过剩劳动的增加又是靠扩大机器生产达到的。我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 这对你们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我左边的这位自由主义的曼彻斯特派采用了一项新的发明, 把对他说来已成为多余的三百人抛到了街头。小商人们! 这样你们就失掉了三百个买主。济贫捐缴纳者们! 这三百人就成了新的贫民。(人们向演说者高声喝采) 但是请注意, 邪恶还不仅仅限于这些! 这三百个人首先会使那些还在同一生产部门中工作者的人的工资降低。企业主说: “从现在起我降低你们的工资。” 工人们反对。于是企业主就补充说: “你们没有看见我刚刚赶到街头去的这三百人吗? 要是你们高兴的话, 你们尽可以同他们调换一下位置, 只要让他们回来, 他们是愿意接受任何条件的, 因为他们快要饿死了。” 工人们感到, 事情的确是这样, 于是他们的反抗也就垮了。喂, 你这个自由主义的曼彻斯特派, 政治上的伪君子啊! 在听我们讲话的这些人面前, 你现在怎样回答我? 但是, 邪恶还不仅仅限于这些。失掉了自己本来职业的人要到其他部门去谋生, 这就会大大增加过剩劳动和降低工资。今天工资很低的职业, 过去曾经是工资很高的, 而今天工资高的在不久的将来工资也会降低。这样, 工人阶级的购买力就一天一天地缩小, 国内商业也将随之而萧条下去。商人们, 要记住这一点! 你们的买主愈来愈穷, 你们的利润愈来愈少, 而要你们救济的贫民将愈来愈多, 你们必须缴纳的济贫捐以及其他捐税的数目将愈来愈大。你们的收入降低, 你们的支出增加。你们收入得更少了, 花费得更多了。你们喜欢这种制度吗? 有钱的工厂主和地主把济贫捐以及其他捐税的全部担子都转嫁到你们身上。你们中等阶级成了为富翁们补偿捐税支出的工具。他们制造出了为他们创造财富的贫困, 而硬要你们为他们亲手制造的这种贫困负担代价。地主逃避了这种负担, 因为他们享有特权; 工厂

主逃避了这种负担，他们从工人的工资方面得到补偿，而这又会影响你们。你们喜欢这种制度吗？我左边的这些先生所维护的就是这种制度。至于我自己向你们提出的意见是什么呢？我向你们指出了邪恶。这已经说明了一些问题。但是我还想做得更多一些。我在这里还要指出正义何在，并加以证明。’（热烈鼓掌）”

接着厄内斯特·琼斯就开始阐述自己对政治经济改革的观点，然后又继续说道：

“‘选民和非选民们！我刚才向你们讲述了几项社会政治措施，现在我也像在1847年做过的一样，呼吁立刻实行这些措施。但是，因为我力求扩大你们的自由，结果他们夺去了我的自由。（喊声：“听啊！听啊！”）因为我努力为你们所有的人建立自由之宫，他们就把我丢进了刑事犯的牢房。这里在我左边就坐着一位看管过我的狱官。（听众对坐在左边的人发出一片激烈的长时间的责难声）因为我要大声疾呼地保卫真理，我就被责令闭口。我被关在狱中达两年又一个星期之久，住在单人牢房里，受到最严厉的隔离管束，不但不给我纸笔墨水，反而强迫我撕乱麻……不错，（演说人转向查理·伍德爵士）在两年又一个星期的期间内，你们是战胜者，可见现在我的出头之日到了！我要唤醒在场的英国人心中的复仇之神。（场内爆发热烈的掌声）听吧！你们难道没有感到，在这广大群众的每一动作中复仇之神都在振动他的翅膀吗！（场内再次爆发经久不息的掌声）……有人会说这不是社会的事情。不，这正是社会的事情！（喊声：“对呀！对呀！”）……我所以说这是社会的事情，是因为不同情被捕者的妻子的这个人，也绝不会同情工人的妻子。不同情被监禁者的儿女的这个人，也绝不会同情雇佣奴隶的儿女。（掌声和喊声：“对呀！对呀！”）他过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他今天的许诺也推翻不了这一点。是谁投票赞成爱尔兰非常法，赞成禁口律法案，赞成压制爱尔兰的报刊？辉格党人！就是这个人！打倒他！是谁十五次投票反对休谟关于扩大选举权的提案，反对洛克·金关于各郡选区的提案，反对尤尔特关于短期议会的提案，反对贝克莱关于秘密投票的提案？辉格党人！就是这个人！打倒他！是谁投票反对释放弗罗斯特、威廉斯和琼斯？辉格党人！就是这个人！打倒他！是谁投票反对调查在殖民地的暴行，包庇华德和托林顿，包庇伊奥尼亚群岛

和锡兰的暴君？辉格党人！就是这个人！打倒他！是谁反对减少收入一万二千英镑的剑桥公爵的薪俸，反对陆海军费的任何削减，反对废除窗口税？是谁四十八次投票反对缩减一切其他的捐税（其中也包括减少他们自己的薪俸）？辉格党人！就是这个人！打倒他！是谁投票反对废除纸张税和广告税，反对废除知识税？辉格党人！就是这个人！打倒他！是谁投票赞成增设一批主教职位和教区，赞成给予梅努特学院津贴，反对削减这类津贴，反对免除非国教徒²⁵⁶的教会税？辉格党人！就是这个人！打倒他！是谁投票反对对食品掺假的事件作任何调查？辉格党人！就是这个人！打倒他！是谁投票反对降低食糖的关税和取消麦曲税？辉格党人！就是这个人！打倒他！是谁投票反对缩短面包师的夜班工作时间，反对调查针织工厂工人的状况，反对对工人住宅的卫生检查，反对禁止未成年工人早上六时以前上工，反对由教区给贫苦孕妇以救济，反对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辉格党人！就是这个人！打倒他！以上帝和人道的名义打倒他！哈里法克斯的公民们！英国公民们！两个制度摆在你们面前，现在你们来加以抉择吧！’（简直无法描写这个演说、特别是演说的最后一部分所引起的热烈反应。广大的听众都聚精会神地倾听每一句话，演说每一停顿，立刻就像滚滚波涛一样响起了对辉格党代表和阶级统治的愤慨之声。总之，这是一个令人经久难忘的场面。在举手表决的时候，赞成查理·伍德爵士的只有很少几个主要是被收买或者被吓倒的人。几乎全部与会者都在难以描绘的热情和欢呼中高举双手赞成厄内斯特·琼斯。）

市长宣布厄内斯特·琼斯先生和亨利·爱德华兹先生经举手表决当选。于是，查理·伍德爵士和罗斯利先生随即要求投票表决。”

事情的结局正如琼斯所预言的那样：他以两万票被提名为候选人，但是辉格党人查理·伍德爵士和曼彻斯特派罗斯利却以五百票被选入议会。

卡·马克思写于 1852 年 8 月 2 日
载于 1852 年 8 月 25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3543 号，并摘要载于
1852 年 10 月 9 日“人民报”第 23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并根据“人民报”校对过

卡·马克思 选举中的舞弊

1852年8月20日星期五于伦敦

上届下院解散以前，议员们决定给自己的继任者尽量制造困难，阻挠他们进入议会。他们通过了一条严峻的法律，禁止行贿、舞弊、恫吓和一切选举中的诈骗行为。

他们拟定了一大串详尽的和琐碎得难以想像的问题，根据上述法律，这些问题可以向呈交选举抗议书者提出，也可以向当选的议员提出。可以要求他们宣誓说明：他们的代理人是谁，他们和代理人的联系如何。可以向他们提出问题并要求加以说明：不仅就他们所知，甚至就他们“推测、估计和猜想”，在选举中他们自己花了多少钱，或者别人替他们花了多少钱——经他们同意的或者没有经他们同意的。一句话，任何一个议员，只要稍微怀疑也许有人曾为了他而违犯法律，他就无法经住这种奇异的考验^①而不犯违誓罪。

总之，即使新的立法者也像僧侣对待三十九信条²⁵⁷那样自由地——只相信其中几条，却在全部信条上签名——对待这个法律，

① “考验”原文为 Ordeal，原意是古代条顿族所实行的一种裁判法——令受裁判者将手插入烈火或沸水中，或服毒药，倘若不受伤或不中毒，便算无罪；此外，同原告举行决斗而获胜也算无罪。——译者注

在这种条件下，这个法律中也仍然有足够的条款使新的议会成为曾经代表三个王国发表演说并为它们制定法律的历届议会中最清白的一届。但是，我们只要把这个法律和在这个法律通过之后紧接着进行的大选对比一下，就会看出这个法律使托利党获得了无可争辩的光荣：在他们执政期间，理论上宣布了最纯洁的选举，而在实践中却发生了最大规模的选举舞弊。

“新的选举正在进行，其间演出了从过去托利党人的垄断以来的空前未有的**行贿、舞弊、暴行、酗酒和谋杀**的活剧。我们听说有些荷枪实弹的士兵抓住自由派选民，强迫他们在地主的监视下违背自己的信念投票；如果人民对被迫害的选民表示同情，这些士兵就冷酷地瞄准这些人开枪，他们大批地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指六里桥、克勒尔郡和里美黎克的事件）。也许有人会说：这都发生在爱尔兰啊！不错，可是在英格兰托利党人利用警察去捣毁对手的讲坛；他们派遣成群的匪徒和打手到街上去拦截和吓唬自由派选民；他们开设了道地的酒窟；他们不惜巨资进行收买，例如在得比就是这样；几乎在每一个竞选的地方，他们都不断恫吓选民。”

上面是厄内斯特·琼斯的“人民报”²⁵⁸描写的情形。听了宪章派这个周报的报道以后，现在我们来听听同宪章派敌对的政党的周刊——工业资产阶级最稳健、最理智、最温和的刊物，伦敦的“经济学家”怎样说吧。

“我们确信并且可以肯定地说，这次大选中发生的**舞弊和恫吓**，出现的**谄媚、狂热和放肆**，都是以往的类似情况所不及的。据说，这次选举中行贿的规模比往年大得多……最近这次选举中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恫吓和非法影响选民的手段超过了最大胆的想像……大摆酒宴，玩弄卑劣的阴谋，大规模地行贿，野蛮地恐吓选民，诬蔑候选人的声誉，蹂躏正直的选民，收买和侮辱软弱的选民，光天化日之下露骨地无耻地进行造谣、陷害、诽谤，亵渎神圣的语言，诋毁高尚的名声，——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东西集合在一起，我们就会在一大堆肉体被践踏、灵魂受折磨的牺牲者面前感到毛骨悚然；而新议会就是在这些牺牲者的坟墓顶上建立起来的。”

恫吓和舞弊是司空见惯的方式。首先是政府方面直接施加压力。例如，在得比，有一个选举代理人在行贿时被当场抓住，从他身上搜出了军务大臣贝雷斯福德少校的一封信，这位少校借给他一笔钱作竞选费用，要他凭信到一家商行去支取。“普尔公报”公布了由一个海军基地司令官签署的海军部给预备役军官的通告，要他们执政府提名的候选人的票。此外，还直接使用了武力，在科克、拜尔法斯特和里美黎克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在里美黎克打死了八个人）。地主威胁佃户，如果佃户不和他们投一样的票，就要把他们从土地上赶走；得比勋爵的地产管理人在这方面给他们的同行做出了榜样。店主遭到失去主顾的威胁，工人遭到解雇的威胁；到处都使用了把选民灌醉的办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除了使用这些世俗的舞弊方法外，托利党还采用了宗教的手段。女王颁布了禁止天主教举行游行仪式的告谕，借以煽起宗教狂热和宗教仇恨；到处都是“打倒天主教徒！”的喊声。斯托克波尔特的骚动²⁵⁹就是这个告谕造成的一个后果。当然，爱尔兰的神甫也用类似的武器回敬了敌人。

在选举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只是一个皇家法律顾问就已经收到二十五个地区递来的抗议书，要求由于选举中的行贿和恫吓事件而宣布议会选举无效。在得比、考克茅斯、巴恩斯特珀耳、哈里季、坎特布里、亚马斯、威克菲尔德、波士顿、哈得兹菲尔德、温莎及其他许多地区都提出了类似的反对当选的议员的抗议书，并筹集了相当的诉讼费用。可以肯定，即使在事态的发展对议会中拥护得比政府的议员非常有利的情况下，他们也至少会有八个到十个人由于这些抗议书而被取消议员资格。

当然，行贿、舞弊和恫吓的主要场所自然是农业地区和贵族统

治下的城镇。在通过 1831 年的改革法案时，辉格党曾费尽心机把这些地区尽可能多地保存下来。大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工业地区的选区，由于情况特殊，是非常不适于采用这些手段的。

举行大选的日子，在英国向来是狂饮滥醉的酒神节，是照例的政治信仰交易的结账期，是酒店老板生意最兴隆的日子。有一家英国杂志^①这样说：“这种定期举行的农神节每一次都长久地留下伤风败俗的痕迹。”这是很自然的。这是道地的古罗马的农神节。在这个节日里，主人变成了奴隶，奴隶变成了主人。可是如果奴隶只当一天主人，那末这一天粗野的本能就会统治一切。主人就是统治阶级的或统治阶级中某些集团的达官显贵，扮演奴隶角色的就是这些阶级的大批享有选举特权的人，他们周围则有成千上万个没有选举权的人，后者的唯一使命就是充当单纯的配角；这些人的口头支持或举手赞成向来都是很需要的，——即使只是为了获得戏剧效果。如果回溯一下英国百余年来选举史，那末产生的问题就不会是英国历届议会为什么这样糟糕，反而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它们为什么居然还能成为它们过去的那个样子，并且还能模模糊糊地多少反映出一些英国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同样，反对代议制的人在发现下面的事实时想必也会感到惊奇：只凭抽象的多数、只凭票数的偶然对比来决定一切的立法机关，有时却能按照形势的要求作出决定和解决问题，——至少在其全盛时期是如此。任何时候，单从票数的对比，即使借助于最牵强的逻辑推理，也不能得出表决必然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相反，议员的一定的对比的必然性，却是由当前的情况自然而然产生的。英国选举中

^① 即“经济学家”。——编者注

传统的行贿，不正是表现互相竞争的政党之间力量对比的一种粗野而露骨的特殊形式吗？这些政党在其他场合以寻常的方式采用的影响和统治的手段，在选举的这几天中则以特殊的方式，以相当离奇的形式实行着。而这两种不同情况却有一个共同的前提：互相竞争的政党的候选人代表着全体选民的利益，而这些有特权的选民又代表着没有选举权的群众的利益，或者更确切些说，这些没有选举权的群众还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德尔斐的女巫必须被一种气体迷倒，才能得到神谕；不列颠人民必须用杜松子酒和黑啤酒把自己灌醉，才能找到带来神谕的立法使者。至于到哪里去找这些使者，那是不说自明的。

从工商业中等阶级即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正式的政党与辉格党和托利党平起平坐的时候起，特别是从 1831 年改革法案通过的时候起，各个阶级和政党彼此间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产者对耗费颇大的竞选手段，对大选的这些 *faux frais*（非生产费用）丝毫不感到兴趣。他们认为，同土地贵族竞争，利用一般的道德手段要比个人出钱来得便宜。另一方面，他们意识到他们代表着普遍的在现代社会中占主要地位的利益的。因此他们能够要求选民本着全民的利益、而不本着个人或地方的利益行事。用来影响选民的陈旧手段愈是（由于选民的成分本身）主要地成为土地贵族的武器，而为资产阶级所不能使用，资产阶级也就愈是坚持上述的要求。因此，资产阶级就为建立在道德原则基础上的选举而斗争，并且强迫议会通过根据这种精神制定的法律，其中每一项法律都是用来抵御土地贵族的地方势力的。的确，从 1831 年起，贿赂行为采取了比较文明比较隐蔽的形式，大选也在较为平静的状态下进行了。现在，人民群众总算是不再做应声虫了，过去他们或多

或少热心地参与了那些抽签决定胜负的官场英雄们的斗争，当议会偶像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像克里特岛上的库列特在丘比特诞生时一样痛饮狂欢²⁶⁰，并因热烈地参加对这些偶像的歌颂而获得相当的酬金和款待。现在，宪章派则成群结队，来势汹汹，团团围住了要演出官方的竞选斗争的场所，并且用充满怀疑的目光仔细地监视着场上的一举一动。在这种条件下，1852年这样的选举不能不引起公愤。甚至保守党的机关报“泰晤士报”也破天荒第一次替普选权说了几句话，而不列颠的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则异口同声地喊道：改革的敌人给改革的拥护者提供了最好的论据；在现存的阶级制度下的选举就是这个样子！在这种选举制度下产生的下院就是这个样子！

要了解最近这次选举中所采用的这一套行贿、舞弊、恫吓手段的真正性质，必须注意到同样也在这一方面起作用的一个情况。

如果看一下 1831 年以来的各次大选，那就会发现，占国内人口大多数的没有选举权的居民对享有特权的选民圈施加的压力愈大，资产阶级要求扩大这个圈子的呼声和工人阶级要求彻底消灭这个圈子的呼声愈高，真正参加投票的选民也就愈来愈少，因而，选民圈也就愈来愈缩小。这在最近这次选举中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

我们就拿伦敦做例子来看吧。在西蒂区，有 26728 个选民，参加投票的只有 10000 人。在哈姆雷特塔区，登记的选民有 23534 人，参加投票的只有 12000 人。在芬斯贝里，20025 个选民中投票的还不到一半。在竞选斗争最剧烈的利物浦，17433 名登记的选民中投票的只有 13000 人。

这些例子已经足够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享有选举特权的

选民对选举的冷淡。而这种冷淡又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选民圈已经过时了，这些选民对于自己的政治生活失去了任何兴趣。但这决不是说，选民们对任何政治都抱淡漠态度；他们只是对结果多半不是帮助托利党赶走辉格党就是帮助辉格党战胜托利党的这样一种政治抱淡漠态度。选民们本能地感觉到，这个或那个问题的决定已不再取决于议会，也不再取决于议会选举。谷物法是谁废除的呢？当然，不是选出主张保护关税的议会的那些选民，更不是主张保护关税的议会本身；谷物法仅仅是并且纯粹是由于外来的压力才废除的。现在，甚至大部分选民自己也已经相信这种外来压力，相信除了投票以外的其他影响议会的手段了。他们把直到现在还存在的合法投票方式看做是一种过了时的仪式；要是有一天议会开始抗拒外来压力并强迫国民接受按这一狭隘的选民圈的意旨制定的法律，那他们就会加入到对这个整个过时的制度的总冲击中来。

因此，托利党人使用贿赂和恫吓手段，只不过是想像拚命挽救那个已不能有什么积极作为的、在选举中再也不能起决定作用和选出真正国民的议会的垂死的选民圈而已。结果怎样呢？旧议会解散了，因为在它快要完结的时候，它已经分裂成一个个互相使对方不能有丝毫作为的派别集团了。新议会开始时的情形则同旧议会完结时一样。它一生长下来就陷于瘫痪状态。

卡·马克思写于 1852 年 8 月 16 日前后

载于 1852 年 9 月 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552 号和 1852 年 10 月 16 日“人民报”第 24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并根据“人民报”校对过

卡·马克思 选举的结果

1852年8月27日星期五于伦敦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最近这次大选的结果。

如果我们把辉格党、自由贸易派和皮尔派合在一起总称之为“反对党”而把它们同托利党相对立，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关于新议会的统计资料，清楚地反映出我们在过去的一篇文章^①中已经指出的那种巨大的对立，即**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对立。

在**英格兰**，城市选出了一百零四名内阁的拥护者和二百一十五名反对党的拥护者，而各郡则选出了一百零九名内阁的拥护者，反对党的代表只有三十二名。从作为托利党的堡垒的各郡中，应当除去最富庶和影响最大的地方——约克郡的西区、南郎卡郡、密多塞克斯、东萨雷等；把派遣代表参加议会的城市除开不算，这些地方包括了居住在各郡的一千万居民中的四百万人。

在**威尔士**，如果把城市的选举和农村的选举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到，选举结果恰恰相反。这里的城市选出了十名反对党的拥护者和三名内阁的拥护者，而各郡则选出了十一名内阁的拥护者和三名反对党的代表。

^① 见本卷第400页。——编者注

在**苏格兰**，这种对立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城市中当选的有二十五名反对党的代表，而没有一个内阁的拥护者。各郡则选出了十四名内阁的拥护者和十三名反对党的代表。

在**爱尔兰**，对比关系不同于大不列颠。爱尔兰的民族政党在农村地区有很大势力，这里的居民更直接地受天主教僧侣的影响，而在北方城市中占优势的是英格兰人和新教徒。所以在这里农村是反对党的真正的中心，虽然在现行的选举制度下，这一点不能够清楚地显示出来。在爱尔兰，城市选出了十四名内阁的拥护者和二十五名反对党的代表，各郡则选出了二十四名内阁的拥护者和三十五名反对党的代表。

如果你们要问，究竟哪个政党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那末应当说：所有政党合在一起战胜了托利党，因为后者很明显地获得少数，尽管它使用了收买、恐吓和政府的压力等等手段。根据最精确的材料，共选出了二百九十名内阁的拥护者，三百三十七名自由派，或者说三百三十七名联合反对党的代表，以及二十七名动摇分子。即使把这二十七名动摇分子算作是内阁的拥护者，自由派仍然保持二十票的优势。可是，托利党人本来是指望获得多数的，他们希望至少获得三百三十六票。即使不谈这个在数字对比上失利的问题，托利党人也已经在竞选中遭到了失败，因为他们的领袖被迫放弃了自己的保护关税原则。在得比的二百九十个拥护者之中，有二十个表示根本反对任何保护关税政策，而在其余的人中间，大多数人——包括迪斯累里本人在内——都反对谷物法。

得比勋爵在他提交议会的咨文中断言，只有在绝大多数人赞成的情况下，他才改变英国的贸易政策。他远没有想到他自己可能成为少数派。但是，虽然选举的结果完全不符合托利党人的乐

观的愿望，这种结果对托利党人来说仍然要比反对党所期望的好得多。

没有一个政党比辉格党遭到更惨重的失败，而且这恰好是在这个党的力量最集中的地方——这里所谈的就是它的上一任的大臣们。辉格党的群众一方面同自由贸易派混在一起，另一方面同皮尔派混在一起。英国辉格主义的真正的重要原则集中地体现在辉格党的官方上层人物身上。不错，伦敦西蒂区重新选举了上届辉格党内阁的首脑约翰·罗素勋爵，但是，在1847年伦敦西蒂区的选举中，马斯特曼先生（托利党人）曾经比约翰·罗素勋爵少得四百一十五票，而在1852年他却比罗素勋爵多得八百一十九票，成为第一名当选人。上届辉格党政府的十一个成员失去了议会的席位，这十一个人是：财政部部务委员威·基·克雷格爵士、财政部部务委员理·孟·贝留、检察长戴·邓达斯爵士、内务大臣乔·格雷爵士、爱尔兰首席检察官约翰·哈奇尔、财政部秘书长乔·康瓦尔·路易斯、军械总长秘书克·爱·佩吉特勋爵、海军部秘书长约翰·派克、爱尔兰事务大臣威·索麦维尔爵士、海军部部务委员斯图亚特海军上将，此外，还应当把下院委员会²⁶¹主席贝尔纳先生算上。一句话，自从改革法案公布以来，辉格党人还没有遭到过这样的失败。

皮尔派在上届议会中所占的数目就已经很少，而由于他们的名额进一步减少，他们已经成为一个更加微不足道的集团；他们的许多最有影响的领袖都失去了自己的席位，例如：卡德威尔和尤尔特（两人都是利物浦的）、格林（朗卡斯特）、马洪勋爵（哈特福）、朗德尔·帕麦尔（普利茅斯）等等。卡德威尔的失败引起了最强烈的反应，这不仅由于他曾代表过的城市具有重大的意义，并且由于他

同已故的罗·皮尔爵士的私人关系。要知道，他同马洪勋爵都是皮尔爵士的遗嘱保管人。卡德威尔遭到失败的原因是他拥护废除航海法令²⁶²和不同意“打倒天主教徒！”的口号。而在利物浦，国教信徒给了选举以很大的影响。

关于这一点，自由贸易派的一个机关刊物^①说：“这个只会做生意的、贪得无厌的团体，很少有时间去培养宗教情感；因此它必须依靠僧侣，变为僧侣手中的工具。”

此外，和曼彻斯特的选民不同，利物浦的选民不是普通“人”，而是“有身分的人”；而维护宗教上的旧的正统观念，是对有身分的人的首要的要求。

最后，自由贸易派在这次竞选中也有几个最有声望的人落选。例如，在布莱得弗德，最老的自由贸易派宣传家和政论家之一汤普逊上校（绰号“老母鹅”）遭到了失败；在奥尔丹，自由贸易派的一个最有名的鼓动家和最有辩才的演说家威·约·福克斯遭到了失败；甚至连布莱特和基卜生本人也仅仅以微弱的多数在该党的堡垒曼彻斯特战胜了自己的对手辉格党人。不言而喻，在现行的选举制度下，曼彻斯特派是不指望也不能指望在议会中占多数的。但是，许多年来他们吹嘘说，只要一旦辉格党被打倒，托利党重新执政，他们就会展开大规模的鼓动并完成英雄的业绩；现在情况却不是这样，在不久以前的竞选中我们又看到他们谦恭地同辉格党携手合作，单单这一点就已经表明了他们道义上的失败。

但是，尽管没有一个正式的政党获得胜利，甚至相反地，它们每一个都遭到了失败，而英国国民却可以从以下的事实得到安慰：

① 即“经济学家”。——编者注

这一次不是某一个政党，而是一种职业——律师在议会中取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有力的代表权。下院有一百多名议员是律师；看来，这个数字不论对于希望自己的事业在议会中获得成功的政党来说，还是对于企图根据国民的同意作出决定的议会来说，都不是一个吉兆。

上面援引的数字对比毫无疑问地说明，整个反对党与托利党相比获得了否定的多数。如果它采取联合行动，那末它在议会召开的最初几天就能把内阁推翻。但是它没有能力组织自己的巩固的政府。为此必须重新解散议会而举行新的大选；然而新的大选又只会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必须重新解散议会。要摆脱这种兜圈子的状况，就必须进行议会改革。但是腐朽的政党和新的议会宁肯要托利党统治，也不愿采取这样英勇的步骤。

如果单独地来考察每一个政党，那末托利党人虽然同联合起来的反对党相比是少数，但他们仍然是议会中最有力量的政党。况且，他们巩固地占有最重要的国家职务，依靠着一支训练良好的、紧密团结的和相当统一的军队；最后，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如果这一次遭到失败，他们的比赛就会永远结束。而与它相对峙的是一个由四支军队组成的联盟，每一支军队都由一个特殊的长官来率领，这个联盟是由利益、原则、回忆和欲望各不相同的一些集团构成的一个不稳定的混合物，这些集团反对把议会纪律宣布为最高原则，它们以嫉妒的目光注视着它们当中任何别的集团提出的要求。

显然，各个反对党集团之间在议会中的对比同它们在国家中的力量对比是完全不符合的。例如，辉格党在议会中日益成为反对党的一个人数最多的部分，其余的集团都以它为核心，集结在它的周围。使这种情况变得更加危险的是，这个经常把自己想像为管理

国家的首脑的政党,更加关心得更多的是如何回避自己的同盟者的要求,而不是如何打败共同的敌人。反对党的第二个集团皮尔派,共有三十八个代表;它的首领是詹·格莱安爵士、悉·赫伯特和格莱斯顿。詹·格莱安爵士依靠同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结成联盟来进行投机活动。他本人过于强烈地追求首相的职位,因而丝毫不愿意帮助辉格党人重新获得他们旧日的管理国家的垄断权。另一方面,许多皮尔分子赞同托利党人的保守观点,自由派只能在贸易政策问题上指望得到他们的经常的支持。

一家自由派的报纸写道:“在许多其他问题上,要使自己的措施具有某种形式以保证得到绝大多数的支持,这对大臣们来说并非难事。”

par excellence (最道地的)自由贸易派的力量比上届议会中更强了;他们现在拥有一百一十三名代表。同托利党人的斗争将使他们更前进一步,超过辉格党人的稳健政策认为适当的界限。

最后,还有一个拥有大约六十三名代表的“爱尔兰旅”,虽然它自从“丹王”^①死后就没有获得什么成就,但是它的人数却完全可以左右力量的对比;除了对得比的憎恨以外,它同不列颠的反对党毫无共同之处。在不列颠议会中,它代表爱尔兰反对英格兰。在比较长期的运动中没有一个议会政党能够有把握地指望它的支持。

现在我们把上面所作的分析做一个简单的总括:虽然与托利党人相对抗的是一个否定的多数,但是没有一个党能够代替它而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托利党人的失败必然会引起议会改革;他们拥有一支紧密团结的、统一的、训练良好的军队,并且占据着最重要的国家职位;反对党是四个各不相同的集团的堆积物,而联合

^① 即丹尼尔·奥康奈尔。——编者注

起来的军队打起仗来往往打不好并且缺乏机动性；加之，否定的多数仅仅占二三十票的优势，占议会四分之一的一百七十三名议员都是由新人构成的，他们胆怯地避开一切威胁他们的东西，即一切可能使他们丧失用高价买到的议员席位的東西。综上所述，我们必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托利党是有力量的，如果说这种力量不足以取得胜利，那末却足以把事情引向危机。看来，它已经决心这样作。伦敦所有的日报和周刊都流露出对于这种危机的恐惧，因为它会使整个英国官场的面貌革命化。“泰晤士报”、“纪事晨报”、“每日新闻”、“旁观者”、“观察家”都惊慌失措，议论纷纷。它们最希望的是能通过发表激烈的言论说服托利党辞职，并想以此防止危机。但是，不论是激烈的言论还是善意的不满，都不能使它们逃避冲突。

卡·马克思写于 1852 年 8 月 16 日前后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2 年 9 月 1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558 号和 1852 年 10 月 23 日“人民报”第 25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并根据“人民报”校对过

署名：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
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
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

1852年9月28日星期二于伦敦

下面我报道几件确凿的事实，这些事实是关于意大利和匈牙利流亡者的活动的。

不久前，匈牙利将军费特尔受科苏特和马志尼之托，带着一位美国画家的护照游遍了整个意大利。一位经常演出的匈牙利女歌唱家费伦齐女士和他同行。因此他得以深入上层官方人士之间，而马志尼交给他的信又使他得以出入秘密团体。他游遍了全国各地，从都灵和热那亚经米兰到罗马和那不勒斯。不久前他回到了英国，并做了一个使民主派的首脑马志尼先生大为震惊的旅行报告。费特尔报告的主要点是说意大利已完全陷入了**实利主义泥坑**：丝织品、植物油和其他土产品的贸易急剧扩展，已成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事情，资产阶级（马志尼对它抱有很大的希望）念念不忘地仔细盘算着革命所造成的损失，热切希望通过精心经营来弥补这些损失，因此根本不可能设想，**革命运动会在意大利首先爆发**。费特尔在这个文件里说，在法国的火山口没有再喷出火焰之前，意大利这个国家里不可能爆发任何起义，何况那部分 *par excellence*（最道地的）革命居民由于长期遭受迫害和计划经常被破坏，现在已经

消沉下来，而主要的是没有群众的支持。

马志尼根据费特尔的这个报告，把法国厉声乱骂了一通，于是 *volens nolens*（不管愿意不愿意），只好重新让古老的巴比伦^①领先了。

但是，这些先生决定再同法国结成联盟，他们开始同（你们猜同谁？）路易·波拿巴先生进行谈判。

经马志尼同意，科苏特把一个叫基什的人派往巴黎同波拿巴分子建立联系。基什从前曾和日罗姆·波拿巴的儿子们相识。现在他经常逍遥自在地出入于巴黎的咖啡馆和其他类似的场所，老是在比埃尔·波拿巴跟前转来转去，对他大加恭维，并不断向科苏特发送堂而皇之的报告。这样看来，匈牙利的解放从今以后毫无疑问是要靠路易一拿破仑和科苏特的合营公司了。革命者的首脑同“暴君”结成了生死同盟。

还在这一切事件发生之前，波兰人列列韦尔老头和正教神甫塔杰乌什·哥若夫斯基代表所谓波兰的“集中”²⁶³来到了伦敦，把起义的计划给科苏特和马志尼看，波拿巴的协助自然是该计划的决定条件。他们在伦敦有一个密友，即兰茨科隆斯基伯爵，这位伯爵同时又是俄国皇帝的密探，而他们所提出的计划，十分荣幸地已经过圣彼得堡的预先审查和修正了。这位兰茨科隆斯基伯爵目前正在巴黎，一面监视基什，一面好到奥斯坦德去接受圣彼得堡发来的新指示。

基什从巴黎给科苏特提出了各式各样的保证，这些保证放在神话集里倒是很合适的；但是由于法国的神话般的状况，这些保证

^① 指巴黎。——译者注

也可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据说科苏特收到了路易·拿破仑邀请他到巴黎去的一封亲笔信。科苏特似乎把这封信的副本散发到匈牙利全国各地去了。他好像已经在这个国家里为总起义做好了一切准备。参加密谋活动的甚至有皇家的官吏。科苏特希望在10月间起事。

以上我只是几乎逐句转述了我从别人那儿听来的一切。如果你们现在问我对这一切的看法怎样，那末我认为路易·波拿巴是想一箭双雕。他在竭力骗取科苏特和马志尼的信任，然后好把他们出卖给奥地利人，以此作为奥地利人同意他攫取法国皇冠的交换条件。此外，他估计，只要大家一知道科苏特和马志尼同他进行了谈判或建立了某种关系，他们在革命党人之中就会威信扫地。另外，由于他的即位遇到了专制强国的激烈反对，像他这样一个冒险家也是完全有可能（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同密谋叛乱者结合在一起去碰碰运气的。

至于说到意大利，路易·波拿巴是在梦想把伦巴第和威尼斯并入自己的领土，而把那不勒斯转给他的堂兄缪拉特。马志尼先生的前途真是不错啊！

既然我又谈起了意大利，就请允许我再告诉你们一个消息。意大利最近几次争取自由斗争的女英雄之一维斯康蒂伯爵夫人不久前曾在伦敦同帕麦斯顿勋爵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勋爵阁下告诉她说，他希望在年底以前成为英国政府的首脑，那时欧洲很快就能得到改造；尤其是意大利不能再继续忍受奥地利的蹂躏，因为用铅弹和火药长期统治一个国家是决不可能的。帕麦斯顿说，他指望法国在所有这些方面能成为他的盟友。如果爆发总起义，无论如何他希望伦巴第立即并入皮蒙特，而伦巴第宣布为共和国的问题，则完

全留待将来去决定了。

我相信老奸巨滑的帕麦斯顿是让强烈的幻想给迷住了，特别是他不了解，即便他在议会党徒之间还享有一点威望，但是他在全国范围内是毫无威信。

卡·马克思写于 1852 年 9 月 28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2 年 10 月 1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590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
迫近的商业危机

1852年10月15日星期五于伦敦

商业大臣汉利先生不久以前向他的一伙朋友，在班伯里的制曲厂聚会的农场主们宣布说：贫困现象由于某些原因而减轻了，但是这决不是由于贸易自由，而首先是由于爱尔兰的饥荒，海外黄金的发现，爱尔兰居民的大批外迁以及由此引起的对英国船舶的更大需求等等。所以，我们应当承认，“饥荒”是对付贫困的特效药，正如砒霜对付老鼠一样。

伦敦的“经济学家”说：

“至少，托利党人不得不承认现今的繁荣和它的必然结果——习艺所的荒废。”

“经济学家”接着试图向表示怀疑的商业大臣证明，习艺所的荒废纯粹是贸易自由的作用的结果，只要贸易自由得到充分的发展，习艺所也许就会从不列颠的土地上完全消失。然而很遗憾，“经济学家”的统计根本没有证明人们希望通过它来证明的东西。

大家都了解，现代工商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历时五年到七年的周期性的循环，以经常的连续性经过各种不同的阶段——沉寂，然后是若干好转，信心渐增，活跃，繁荣，狂热发展，过度扩

张，崩溃，压缩，停滞，衰竭，最后，又是沉寂。

谈完这点之后，我们再来谈“经济学家”的统计。

1834年，济贫费的数额达6317255英镑，到1837年，这个数字降到最小限度，只有4044741英镑。后来，这个数字又逐年增加，至1843年增加到5208027英镑。在1844、1845和1846年，又降到4954204英镑，但是在1847和1848年又有增长，1848年达到6180764英镑，几乎达到1834年实行新济贫法²⁶⁴之前的水平。在1849、1850、1851和1852年，这个数字又降到4724619英镑。但是1834—1837年这段时间是繁荣时期，1838—1842年是危机和停滞时期，1843—1846年是繁荣时期，1847—1848年是危机和停滞时期，1849—1852年又是繁荣时期。

那末，这种统计说明了什么？它至多不过证明那个陈腐的同义反复：不列颠的贫困现象随着停滞和繁荣时期的更替而加剧和减轻，这不取决于贸易自由或保护关税政策。此外，我们甚至发现，在自由贸易时代的1852年，济贫费的总额比保护关税时代的1837年多679878英镑，尽管有爱尔兰的饥荒、澳大利亚的“自然金块”和川流不息的移民。

英国的另外一家自由贸易派报纸企图证明，贸易自由使出口额增加，而出口额的增加又促进繁荣；繁荣的结果必然使贫困现象减轻，以至于最终消失。它援引下面的数字作为论据。有劳动能力但又需要靠教区的救济来维持生活的人数如下：

1849年1月1日在590个济贫区——201644人

1850年1月1日在606个济贫区——181159人

1851年1月1日在606个济贫区——154525人

把这个表同出口的统计作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不列颠和爱

尔兰的产品出口额是：

1848年	48946395 英镑
1849年	58910883 英镑
1850年	65756032 英镑

这个表说明什么呢？由于出口额增加了 9964488 英镑，1849 年有 20000 多人摆脱了贫困；由于出口额进一步增加了 6845149 英镑，1850 年又有 26634 人得到了生路。因此，如果我们假定贸易自由能够彻底消除工业循环和与之相联系的盛衰交替现象，那末，在现在的制度下要使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穷人摆脱贫困就必须使对外贸易额每年再增加 50000000 英镑，即几乎增加百分之百。这些神志清醒的资产阶级统计学家竟敢侈谈“空想主义者”。——其实没有比这些资产阶级乐观主义者更大的空想主义者了。

我手头有济贫委员会公布的几份文件。诚然，这些文件表明，从 1848 到 1851 年贫民的数目有所减少。但是，同时从这些文件中也可以看出，从 1841 到 1844 年这段时间，贫民的平均数是 1431571，而在 1845 到 1848 年这段时间的平均数是 1600257。1850 年在习艺所内和习艺所外受到救济的贫民有 1809308 名，1851 年有 1600329 名，即比 1845—1848 年的平均数略有增加。现在把这些数字同人口调查所提供的人口数对照一下，我们就会发现 1841—1848 年每 1000 个居民中有 89 个贫民，而在 1851 年有 90 个贫民。由此可见，与 1841—1848 年的平均数字相比，实际上贫困现象是加剧了，尽管有自由贸易、饥荒、繁荣，尽管有澳大利亚的自然金块和川流不息的移民。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罪犯的人数也增加了。只要看一看医学杂志“手术刀”就足以使人相信，食物掺假和食物掺毒一直是同贸易

自由平行发展的。在伦敦每周都由于“手术刀”揭露新的秘密而引起新的恐慌。这家杂志成立了一个由医生、化学家等等组成的完备的调查委员会来检验在伦敦销售的食物。在这个委员会的报告中经常公布咖啡、茶、醋、胡椒、酸辣菜等掺毒的情况——可以说所有这些食品都掺上了毒。

显然，资产阶级贸易政策的两个方面，即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都同样地无力消除那些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基础的必然的和自然的结果的现象。100万贫民在不列颠的习艺所里混日子的情况，正如在英格兰银行存有1800万到2000万英镑的黄金一样，也是与不列颠的繁荣密切相连的。

这一点是应当永远肯定的，而资产阶级的幻想家却不然，他们一方面把只不过是工商业循环中的每个繁荣时期所必然伴随的东西看作贸易自由的结果，另一方面指望从资产阶级的繁荣中得到这种繁荣所不可能给予的东西。虽然应当永远肯定这一点，但毕竟还要确认，1852年是英国所经历过的那些特别繁荣的年代中的一。国家收入的数额——虽然废除了窗口税，——关于航海的报告，出口商品的清单，金融市场的牌价，而首先是工业区的空前活跃，都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对于十九世纪初以来的商业史哪怕有最粗浅的了解也足以使每个人相信，工商业循环进入狂热发展阶段的时候已经逼近了，紧跟着这个阶段而来的是交易所业务的过度扩张和崩溃阶段。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者叫嚷说：“绝非如此，交易所的投机买卖在过去任何一个繁荣时期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无足轻重。我们现在的繁荣是以具有直接效用的商品生产为基础的；这些商品在 market 上一经出现，很快就会销售一空，这样便保证生产者获得相当的利

润,并且刺激他们进一步实行扩大再生产。”

换句话说,现在的繁荣的特点是:现有的剩余资本已经直接集中到,并且还在继续集中到工业生产中去。根据工厂总监莱昂纳德·霍纳先生最近的报告,1851年,仅仅棉纺织厂的设备能力就增加了3717马力。他列举了一大串正在建设中的工厂的名字。在这个地方正在建设一个150马力的纺纱厂,那个地方正在建设一个拥有600台织布机的生产花布的织布厂,另一个地方又在建设一个拥有6万纱锭、620马力的纺纱厂,还有一个地方正在建设一个拥有200马力的纺纱厂和一个拥有300马力的织布厂等等。而最大的一个生产驼绒和各种衣料的工厂正在布莱得弗德(约克郡)附近兴建起来。

“据计算,为泰特斯·索耳特先生建造的那个工厂占地6英亩,从这一点可以判断这个工厂的规模大小。主厂房将是一座巨大的、建筑式样非常奇特的石头建筑物,它有一个长达540英尺的大厅;机器设备将包括最新的结构,这些结构的优点已经得到公认。费尔贝恩兄弟将在曼彻斯特建造一批预计有1200马力的蒸汽发动机来开动这许多机器。仅一个煤气工厂,按其规模来说不亚于一个小城市的煤气工厂;这个工厂将按照怀特的碳氢化合物系统进行建设,估计将花费4000英镑。据统计,需要5000个喷嘴,这些喷嘴每天要消耗10万立方英尺煤气。除了这个大规模的工厂以外,索耳特先生要在这个工厂附近为工人建筑700所住宅。”²⁶⁵

从大量的投资直接用于工业生产这件事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危机不会到来了吗?绝对不是。相反地,这次危机比1847年的危机将要可怕得多。1847年的危机在贸易和金融方面要比在工业方面更为严重。而在这次危机中遭受最猛烈的打击的将是工业区。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同样是由工业过度生产所直接引起的1838—1842年这个空前的停滞时期。剩余资本愈是向工业生产集

中，而不分散到贸易和金融的各个途径去，危机对于工人群众和资产阶级的骨干力量的影响也就愈加广泛、持久和直接。如果在危机到来时充斥市场的全部商品立即变成沉重的累赘，那末这对于大批扩建和新建的工厂来说将更加沉重好几倍，因为这些工厂已经装备到能够开工生产的程度，而立即开工生产对这些工厂来说乃是生命攸关的问题。任何时候，只要资本放弃了它的通常的商业流通途径，就会产生混乱，这种混乱甚至会钻进英格兰银行的拱门。当巨大的金额变成那些或者在危机开始时才投入生产，或者部分地需要先追加流动资本才能开始工作的工厂、机器等等固定资本时，*saue qui peut*（能自救的人，自救吧）这样的呼声也就必然喊得更高。

我从“印度之友”中引用了另外一个可以说明日益迫近的危机的性质的事实。根据它所公布的 1852 年加尔各答的商业材料来看，1851 年加尔各答进口的棉织品和各种棉纱的价值是 4074000 卢比，几乎占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二。今年这种进口的总额还要增加。而且这还不包括关于孟买、马德拉斯和新嘉坡进口的资料。但是，1847 年的危机已经向我们显示了对印贸易的这些方面，所以现在没有人能对这种向“我们的印度帝国”的输入额占总额三分之二的工业繁荣的最终结局抱有丝毫的怀疑。

关于将紧跟着现在的繁荣时期到来的那个崩溃时期的特点，我们所能说的就是这些。许多征兆，特别是英格兰银行中的黄金盈余以及促使金块急剧流入的那些特殊情况，都预示这个崩溃将在 1853 年到来。

目前在英格兰银行的地下室中储存着 21353000 英镑的金块。有人试图用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的黄金采掘的过剩来解释这种

黄金流入的情况。但是，只要略微看一看事实，我们就会相信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的增加，实际上只意味着其他商品进口的减少，换句话说，意味着出口大大超过进口。事实正是如此，最近的贸易报告指出，大麻、糖、茶、烟草、酒、羊毛、谷物、油类、可可、面粉、靛蓝、皮革、马铃薯、熏肉、猪肉、黄油、干酪、火腿、猪油、大米，以及欧洲大陆和英属印度的几乎全部产品的进口都大大减少了。1850年和1851年，进口额显然是过大了。这种情况，再加上大陆上由于歉收而引起的谷物价格的上涨，就造成了缩减进口的趋势。只有棉花和亚麻的进口增加了。

这种出超的情况也说明为什么外汇牌价有利于英国。另一方面，由于出超部分得到了黄金输入的补偿，因此，相当大一部分英国资本闲置起来，从而扩大了银行的准备金。银行和个人都在想方设法为这些白白闲置的资本寻找出路。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借贷资本充裕而利率低的原因。头等期票的贴现率是1.75%到2%。但是从任何关于商业史的著作中，例如从图克的“价格史”²⁶⁶中，都可以看出，英格兰银行地下室中的金块的大量储存、出口超过进口、有利的外汇牌价、借贷资本的充裕和低利率等等征兆汇合起来，总是意味着工商业循环的这样一个阶段的到来，那时繁荣转为狂热发展，那时开始明显地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方面是进口额过大，而另一方面是围绕着诱人的肥皂泡进行肆无忌惮的投机买卖。但是这个狂热发展阶段也只不过是崩溃时期的先声。狂热发展是繁荣的最高点；它当然不会造成危机，但是它会促使危机的到来。

我很清楚地知道，英国官方的经济预言家会把这种观点看作

是异端邪说。但是，自从著名的财政大臣“繁荣的罗宾逊”^①在 1825 年危机的前夜召开的议会会议开幕时预言将有空前的持久的繁荣那个时代起，这些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者哪怕有一次预测或预言过危机吗？相反地，没有一次繁荣时期，他们不利用机会断言：这一次不会有坏的一面了，这一次战胜了严酷的**命运**。而在危机到来的时候，他们就作出一副无罪的样子，用训诫的、庸俗的说教来攻击商业家和工业家，说他们缺乏先见之明和没有谨慎从事。

关于暂时的工商业繁荣所造成的那些特殊的政治情况，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加以论述。

卡·马克思写于 1852 年 10 月 12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2 年 11 月 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601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① 弗·约·罗宾逊，葛德里奇子爵。——编者注

卡·马克思 商业繁荣的政治后果

1852年10月19日星期二于伦敦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描述了目前英国工商业的状况；现在我们来看看这种状况所引起的政治后果。

预期的工商业危机的到来，会使不可避免的反对托利党人的斗争带有更激烈和更革命的性质。相反地，现在的繁荣在当前是这个党的最好的同盟。诚然，这个同盟者不允许他们恢复他们自己已经放弃了谷物法，但是的确巩固了他们的政权并帮助他们实现社会反动，如果这种反动不遇到什么阻碍，就一定会为他们争得根本的阶级利益，因为从一开始这种反动就是为了物质的阶级利益而实行的。迪斯累里并没有宣布任何谷物法，而是为了负担过重的租佃农场主的利益宣布重新分配税收负担。为什么租佃农场主的负担过重呢？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还必须交纳像在保护关税政策时期那么多的租金，而保护关税政策时期的谷物价格却一去不复返了。同时贵族也不想降低自己土地的地租，但是它想实行一种新的税收形式，借以补偿农场主向贵族多交纳的那部分税金。

我再重复一遍：当前的商业繁荣有利于托利党的反动。为什么？

“劳埃德氏新闻周报”²⁶⁷抱怨说：“爱国主义甚至可以栖身于餐柜之中，只要它能在那里找到饮食。因此，自由贸易现在是得比伯爵的支柱；他高卧在用科布顿和皮尔采集的玫瑰花铺成的床榻上。”

人民群众有足够的工作，并且生活也比较有保障，当然贫民（他们的存在与不列颠的繁荣是不可分的）除外；因此在目前人民是不大听信政治鼓动的。但是，得比勋爵的诡计首先得到资产阶级投身于强大的工业生产过程的那种狂热的帮助，这个过程是：开办工厂，设计机器，制造船只，生产棉纱和棉制品、毛织品，充实库存，出售商品，交换，出口，进口，以及其他各种多少有益的事；但是他们从事这些事情的目的总不外是发财致富。在生意兴隆的时候，资产阶级清楚地知道这样幸运的时机将愈来愈少、愈来愈难遇到，所以它所渴求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希望并且一定要弄到钱，弄到尽可能多的钱，除了钱它什么也不需要。资产阶级让自己的 *ex professo*（职业）政治家监督托利党。但是这些政治家（请看约瑟夫·休谟在“赫尔报”²⁶⁸发表的信）完全正当地抱怨说，他们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很难进行活动，正如人的机体在没有大气压力的情况下很难进行活动一样。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不能够摆脱那种不愉快的预感：在最高当权派当中正发生某种可疑的事情，内阁非常厚颜无耻地利用目前的繁荣所引起的政治冷淡。所以它有时在自己的刊物上用这样的话来警告内阁：

“很难预测，民主派（请读作：资产阶级）会多么长久地保持自己现在这种英明的忍耐，保持对自身的力量和别人的权利的尊重，而不打算利用当时贵族所使用的那些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贵族不应当从民主派的一般行为中得出结论说，民主派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温和态度。”（伦敦的“经济学家”）

对此，得比回答说：难道你们把我当成一个傻瓜，以为我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你们给吓住？难道在随着经济风暴和营业停滞时期的到来你们无暇认真过问政治的时候我会袖手等待？

托利党人的活动计划日益清楚地暴露出来。

他们首先是阻挠召开露天群众大会；在爱尔兰他们迫害刊登对他们不利的文章的报纸；现在他们对那些散发小册子反对在民军中使用体罚的和平协会²⁶⁹的活动家提出控诉，说他们造谣惑众，煽动骚乱。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不声不响地镇压那些在大街上和报刊上进行活动的孤立的反对党。

然而他们却逃避同自己的反对者作任何重大的公开的争论，延迟议会的召开，并且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以便在议会的会议开幕之后，正如一家激进派报纸^①所说的，为“死去的公爵^②的葬礼，而不是为活着的人民的利益”奔忙。议会将在11月的第一周召开，但是毫无疑问，严重的辩论不会在1月以前开始。

托利党人用什么来填补剩下的这段时间呢？用选民登记运动和建立民军来填补。

选民登记运动的目的是把反对托利党的人从明年的议会选举的新名单中删除，或者阻挠把他们列入这些名单；为此就提出这样或那样的反对意见，以便为阻挠把某人列入选民名单提供法律依据。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律师作为代表，并由自己开支有关诉讼手续的一切费用。关于因未被列入名单而提出的申诉或对某人列入名单而提出的异议二者孰是孰非的问题，须由皇家法院²⁷⁰的首席法官所任命的资格审查律师加以裁决。这个运动的主要活动场所一直是郎卡郡和密多塞克斯。为了获得在北部郎卡郡开展运动的经费，托利党人发出了认捐签名簿，上面有得比勋爵本人的签名，他慷慨地捐献了五百英镑。在郎卡郡反对选民登记的意见非常多，甚

① 即“人民报”。——编者注

② 即威灵顿。——编者注

至达到六千七百四十九条，其中南郎卡郡四千六百五十条，北郎卡郡二千零九十九条。在南方，三千五百五十七条反对登记的意见是由托利党人方面提出的，一千零九十三条是由自由党人方面提出的；在北方，一千三百三十四条反对意见是由托利党人方面提出的，七百六十五条是由自由党人方面提出的（当然，这里所谈的只是农村选民，而不涉及本郡的城市选民）。托利党人在郎卡郡成了胜利者。在密多塞克斯郡有三百五十三个激进主义者和一百四十个保守分子被从选民名单上除名，这样一来，后者就赢得了二百多票。

在这场斗争中一方是托利党人，另一方是辉格党人和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大家知道，后者成立了一些自由农土地协会，即制造新选民的机构。托利党人不去触犯这个机构，而是破坏它的产品。根据密多塞克斯的资格审查律师沙德维尔先生的判决，许多属于上述自由农土地协会的选民被剥夺了选举权；他宣布，凡是土地的价值不足五十英镑的土地占有者不得享有选举权。因为这里所涉及的是事实问题，而不是权利问题，所以对于这个判决不能向普通法院²⁷¹提出上诉。大家都很清楚，对事实问题和权利问题所作的这种区分，就会使始终为现存内阁所左右的资格审查律师在编制新的选民名单方面握有极大的权力。

托利党人在进行选民登记运动上所花费的巨大努力以及他们的领袖对这个运动的直接干涉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得比伯爵对于新议会的长久存在没有寄以特别的希望，如果议会不俯首听命，他就会解散它，而现在，他企图借助资格审查律师来保证保守党人在新的大选中获得多数。

因此，托利党人一方面想掌握住他们通过选民登记运动所操纵的选举机器以备不时之需，另一方面他们通过民军法案来支配

刺刀，而刺刀是实施最反动的议会法令和沉着地对付和平协会的威胁所必需的。

宪章派的机关刊物^①喊道：“只要反动派控制了赋予它以合法外表的议会和作为常备军事力量的武装民军，它在英国什么都干得出来！”

正在这个特别危急的时刻，“铁公爵”这位平淡无奇的滑铁卢英雄之死使贵族摆脱了讨厌的守护天使，这位天使在军事上是颇有经验的，他往往为了掩护得很好的退却而牺牲表面的胜利，为了及时的妥协而牺牲十分顺利的进攻。威灵顿是上院的安抚者；在决定关头，他可以全权代表六十个或更多的人发表意见；他阻止了托利党人向资产阶级和社会舆论公开宣战。但是现在，由于存在着一个以争论的爱好者^②为首的、渴求冲突的托利党内阁，上院

“不再像在公爵领导时那样，作为一个压舱物来稳定这艘国家的船，它可能成为危及这艘船的安全的多余的索具”。

上述关于作为压舱物的上院对于国家的安全是必要的意见，当然不是我们的意见，而是自由派的伦敦报纸“每日新闻”的意见。曾经被称作杜埃罗侯爵的新威灵顿公爵，立即从皮尔派阵营转到了托利党人阵营。所以，现有的一切迹象都说明，贵族准备作最冒险的尝试来重新占领失去了的阵地，重温 1815—1830 年的黄金时代。而目前资产阶级既没有时间进行鼓动，也没有时间造反，甚至没有时间适当表达自己的不满。

卡·马克思写于 1852 年 10 月 12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2 年 11 月 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602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① 即“人民报”。——编者注

② 即得比。——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

亲爱的先生！

我们请您注意普鲁士报界，甚至包括像“新普鲁士报”这样一些最反动的报纸对于正在审判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所持的立场，以及在目前，当法庭还没有来得及把三分之一的证词审查完毕，对所提出的任何一个文件的可靠性都还没有加以证实，辩护人还一言未发的时候，这些报纸所表现出的那种值得赞扬的审慎态度。这些报纸最坏也不过是配合着国家起诉人的说法把科伦的被告和我们这些在伦敦的朋友描写成“对近四年来欧洲的整体历史以及1848年和1849年所有革命震荡要负完全责任的危险的阴谋家”，而在伦敦却有两家公开的机关报“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竟出言不逊地把科伦的被告和我们几个人描写成“一帮游手好闲的无赖”、骗子手等等。我们也向英国公众提出被告辩护人曾向德国公众所提出的同样请求——在案件审理完毕以前，不要忙于作出自己的判断。如果他们现在就作进一步的说明，就会使普鲁士政府有可能阻碍揭发警察局所干的违反誓约、伪造文件、篡改日期、窃盗等一切骗人勾当，这些勾当甚至在普鲁士政治司法史册上都是没有先例的。当所有这一切在当前的审理过程中被揭露出来时，英国的社会舆论，对于扮演最下流最卑鄙的政府密探的辩护人

和喉舌的“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的匿名作者，将作出公正的评价。

您的顺从的仆人

弗·恩格斯 斐·弗莱里格拉特

卡·马克思 威·沃尔弗

1852年10月28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

载于1852年10月28日“旁观者”
第1270号、1852年10月30日“人
民报”第26号、1852年10月30日
“晨报”、1852年10月30日“先驱”
和1852年10月30日“观察家”
第2335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并
根据其他报纸校对过

卡·马克思 致“晨报”编辑的声明

亲爱的先生！

请接受我真诚的谢意，感谢您对我的朋友，科伦被告人的案件所给予的慷慨援助^①。为了使被告的辩护人能够揭露普鲁士警探甚至在审讯过程中所干的一系列卑鄙行为，我想告诉您他们在最近为了证明我和科伦的被告之间存在着罪恶关系这一点而干出的骗人勾当。据 10 月 29 日“科伦日报”报道，警务顾问施梯伯先生造出了他的一个新文件——一封似乎出于我的手笔的令人可笑的信，说什么我在信中委托我的一个虚构的代理人“把五十份‘红色问答书’从门缝里塞给克雷弗尔得的某些民主主义者，执行这一任务的时间选定在 1852 年 6 月 5 日午夜时分”。

为了我的被控告的朋友，我特作如下声明：

- (1) 我未曾写过上述的信件；
- (2) 我只是从本月 29 日的“科伦日报”上才知道有这封信；
- (3) 我从未见过所谓的“红色问答书”；
- (4) 我从未以任何方式帮助散发过这种“红色问答书”。

这个声明我也向马尔波罗街治安法官陈述过，因而它等于经

^① 指“晨报”发表为科伦的被告辩护的声明（见本卷第 429—430 页）。——编者注

过宣誓所作的证词,我已把它寄往科伦。如蒙贵报予以披露,我将非常感激,因为这是防止普鲁士警察局截留这个文件的最有效的方法。

亲爱的先生,我始终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博士

1852年10月30日于伦敦

索荷广场第恩街28号

载于1852年11月2日“晨报”
和1852年11月6日“人民报”
第27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晨报”,并根据
“人民报”校对过

卡·马克思 各个政党和政局展望

1852年11月2日星期二于伦敦

让我们来继续考察从当前的工商业繁荣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各种政治后果。

在工业普遍活跃、商业周转加速以及人们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气氛下，摆脱了一切外来压力的各个议会政党十分平静地完成着它们自己的解体过程。

“目前皮尔派和罗素派彼此具有极其强烈的吸引力。皮尔派——这些单靠自己的力量什么也做不出来的、不可缺少的‘国家活动家’，现在竭力想同当权派攀亲。例如，大家可以看看他们的机关报‘纪事晨报’对约翰·罗素勋爵在佩特发表的那篇十分平庸的演说作了多么热烈的称赞！”

这是政府的半官方报纸“先驱晨报”²⁷²的话。

“卫报”²⁷³反驳说，相反，只要听听商业大臣汉利先生在班伯里的制曲厂中对自己的朋友们——农场主们谈论皮尔派的那番话就够了。

汉利先生说：“这个党派有自己的原则，并且始终忠实于这些原则。贸易自由还是保护关税的问题，本来是一个可以商榷的问题，只是已故的罗伯特·皮尔爵士把它变成了党派的问题。”

“卫报”写道，汉利先生在谈论皮尔派时是怀着敬意的，他并且

断言：“目前，在恢复伟大的保守党的统一方面已不再有什么严重的障碍。”完全正确，——“卫报”喊道——让我们把保护关税政策放在一边吧，让我们来恢复保守党吧！换言之，“卫报”预料，既然谷物法问题已不再是争论的对象，皮尔派现在是愿意同托利党结成反动的联盟的。而“每日新闻”是把一部分皮尔派转到得比阵营这一点作为既成事实而加以报道的。可是，人们怀疑许多辉格党人也都做了这种不体面的事，而只要注意到他们的贵族核心是由一伙贪图私利的人组成的，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就拿达尔豪西勋爵来说吧，这位大人在皮尔执政的自由主义时期，是皮尔内阁的大臣。在皮尔倒台以后，罗素又在自己的新闻中给他安排了一个位子。他同纽卡斯尔公爵、圣日耳曼兹勋爵以及前政府的其他成员一起在上院中支持辉格党人玩弄的手腕，从而获得了奖赏，补到了印度总督这样一个肥缺——这是寡头政权的奖券中的头奖。他从这里大大地捞了一把。辉格党人曾经由于他们作出的这种“空前的”牺牲——没有让自己的心腹去担任这个大家都看着眼红的职位——而自吹自擂。现在，又有一个诱饵摆在达尔豪西勋爵面前——五港总督之职，这是一个年进万金的闲差事²⁷⁴。据说，这位可敬的大人并不嫌遗产过多，因此他认为甚至在得比内阁时期保有这个职位不出任何意外，也是他的爱国的天职。

我们可以从本星期的自由派报刊上的 *chronique scandaleuse* (丑事奇闻) 中找到几十则这样的趣事，找到许多关于某某辉格党人就他投到托利党人方面去的最低价格进行谈判的丑闻。这一切说明辉格党已经极端腐败；可是，这些事情如果同该党的两个主要领袖——罗素和帕麦斯顿之间的分裂比较起来，就得退居次要地位了。关于同最近的竞选有关的一些事件，我们已经早有所闻；帕

麦斯顿勋爵在这次竞选中对内阁阵营的候选人所给予的支持，——按照自由派报纸自己的说法，——看来是十分令人不解的。可是现在，帕麦斯顿本人的报纸“晨邮报”²⁷⁵居然也在一篇社论中透露说，帕麦斯顿打算或者以大臣和下院领袖的身分参加内阁，或者，——如果得比内阁很快倒台的话，——就用旧内阁遗留下来的那些不太“难以接受的人”组织一个新的内阁。“晨邮报”认为整个说来这些传闻是非常令人愉快的，同时它又声明它不是以帕麦斯顿勋爵的名义讲话，而是以它自己的名义讲话。但是，帕麦斯顿却不顾辉格党报刊和自由派报刊的所有这些刨根问底的、甚至是令人讨厌的探询，还是认为不需要反驳上述这种有损他的名誉的报道。皮尔派的“纪事晨报”在谈到这些传闻时的口吻清楚地表明，上述这种合并的思想，在格莱斯顿及其伙伴们那里并不会引起什么 *horror vacui* (对死的恐惧)^①。曼彻斯特学派的报纸“每日新闻”揭露了这一事实，并且慷慨激昂地要求辉格党和皮尔派中间的变节者公开地转到得比那边去。这样，我们看到，议会中的这些迄今为止总是你上我下、轮流执政的党派，它们每一个都既不信任所有其他党派，也不信任自己的成员；他们彼此都以临阵脱逃、贪污行贿、妥协主义相责难，然而它们又毫无例外地全都承认：如果把谷物法问题撇开不谈，那末，除了私仇和个人虚荣心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妨碍它们同得比派联合起来。它们对得比采取的态度，同去年12月2日前夕秩序党各个派别对波拿巴采取的态度几乎一模一样。

不难理解，反对党在展望即将到来的议会竞选运动时是相当

^① 直译是：害怕空虚。——编者注

胆怯的。

小约翰·罗素被授予了装在一个小盒子里的、佩特城荣誉公民证书，于是在盛大的午宴以后，他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演说作为答谢，下面就是这篇演说最重要的部分：

“我认为，正如理智在提醒我们一样，正义感也责成我们等待采取措施，这些措施将使农业、殖民活动和航运的利益得到以往曾遭到无理拒绝给予的那种满足（笑声）；这些良好的措施的使命就是结束长期的斗争。”

现在还归罗素支配的唯一的一家报纸“地球报”（晚报）²⁷⁶对这些话作了如下的评述：“任何一个像 1835 年反对罗·皮尔爵士的那样的反对党，都必然会因各个自由派领袖之间的竞争而遭到失败。”这就是说，利用联合的反对党一致投票的办法在会议开幕后立即推翻得比内阁的企图已经完全打消了，而约翰·罗素勋爵仍旧扮演了他那第一个发出退却信号的角色。关于议会反对党的整个前途，它的领袖约·休谟先生在致“赫尔报”的一封信中作了如下的自白：

“我与过去出席下院的爱尔兰议员接触的经验说明，爱尔兰议员绝不是那种能够在这个或那个领袖的影响下站在一定的立场上并且坚持这种立场的人。爱尔兰议员过于乖僻，过于急躁，过分注意爱尔兰的屈辱和灾难。直到现在，据我所知，还没有做任何努力去促使那些对得比政府的行动抱不信任态度的自由派联合起来。当我听到得比勋爵的前任（辉格党人）发表空洞的声明，并看到他们准备洗手不干，而不愿意捍卫人民的事业、号召改革的拥护者同他们联合起来的时候，我对他们在政党的联合方面所能做的一切也就不能寄予很大的信任了。我担心，也许得比派会听任这些人翻来复去地重弹他们的老调，而同时得比派自己却照旧任意利用他们的权力来保证自己的事业获得成功，使自己的支持者得到好处。在建立人民政党的某种可能性产生以前，这种状况还将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

尽管曼彻斯特学派的现在的领袖约翰·布莱特在特设的午宴

胆怯的。

小约翰·罗素被授予了装在一个小盒子里的、佩特城荣誉公民证书，于是在盛大的午宴以后，他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演说作为答谢，下面就是这篇演说最重要的部分：

“我认为，正如理智在提醒我们一样，正义感也责成我们等待采取措施，这些措施将使农业、殖民活动和航运的利益得到以往曾遭到无理拒绝给予的那种满足（笑声）；这些良好的措施的使命就是结束长期的斗争。”

现在还归罗素支配的唯一的一家报纸“地球报”（晚报）²⁷⁶对这些话作了如下的评述：“任何一个像 1835 年反对罗·皮尔爵士的那样的反对党，都必然会因各个自由派领袖之间的竞争而遭到失败。”这就是说，利用联合的反对党一致投票的办法在会议开幕后立即推翻得比内阁的企图已经完全打消了，而约翰·罗素勋爵仍旧扮演了他那第一个发出退却信号的角色。关于议会反对党的整个前途，它的领袖约·休谟先生在致“赫尔报”的一封信中作了如下的自白：

“我与过去出席下院的爱尔兰议员接触的经验说明，爱尔兰议员绝不是那种能够在这个或那个领袖的影响下站在一定的立场上并且坚持这种立场的人。爱尔兰议员过于乖僻，过于急躁，过分注意爱尔兰的屈辱和灾难。直到现在，据我所知，还没有做任何努力去促使那些对得比政府的行动抱不信任态度的自由派联合起来。当我听到得比勋爵的前任（辉格党人）发表空洞的声明，并看到他们准备洗手不干，而不愿意捍卫人民的事业、号召改革的拥护者同他们联合起来的时候，我对他们在政党的联合方面所能做的一切也就不能寄予很大的信任了。我担心，也许得比派会听任这些人翻来复去地重弹他们的老调，而同时得比派自己却照旧任意利用他们的权力来保证自己的事业获得成功，使自己的支持者得到好处。在建立人民政党的某种可能性产生以前，这种状况还将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

尽管曼彻斯特学派的现在的领袖约翰·布莱特在特设的午宴

卡·马克思 建立新反对党的尝试²⁷⁸

1852年11月9日星期二于伦敦

随着至今占统治地位的各个政党的解体以及它们的特征的消失，愈来愈感到需要一个新的反对党，这是很自然的。这种要求正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

约翰·罗素勋爵在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演说中第一个提出了这个问题^①。他宣称，得比勋爵发出的警报部分地是由于妄加在他约翰·罗素勋爵头上的那些谣言——所谓他持有“极端民主的观点”——而引起的。“当然，关于这个问题，我没有必要再指出，这些谣言是毫无根据的，是荒唐无稽的。”但是他宣布自己的确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接着，他就从毫无害外的意义上阐明了这个词。

“一个国家的民主，换句话说也就是指这个国家的人民。毫无疑问，民主也像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一样有权享有自己的各种权利。民主并不打算侵犯王室的任何特权。民主也不想废除上院的任何合法的特权。这种民主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财富的增长、智力的增长，就是那些更加开明的和更加适合于以开明的方法统治世界的观点的形成。但是我想说的还不止这些。我想说，在民主的阵地日益巩固的情况下，不能再求助于连我过去也非常熟悉的那种以旧的强制办法为基础的作法了。相反，民主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必须使它有

^① 见本卷第436页。——编者注

一个法律所认可的合法机构来表现它的力量 and 影响。”

对此，“先驱晨报”慷慨激昂地说道：

“约翰·罗素勋爵有两套原则，在他执政的时候使用一套，在他是反对党的时候则使用另外一套。在他执政的时候，他的原则是什么也不做，而在他不执政的时候，他却庄重地许诺一切。”

如果“先驱晨报”竟把我们在上面援引的约翰·罗素的那些胡诌叫做是“一切！”，如果它以弗罗斯特、威廉斯以及其他人的命运来警告小约翰·罗素是由于他的那种爱戴国王、尊重贵族和保护天主教的“民主”，那我们倒很想知道，“先驱晨报”所说的“什么也不”是指的什么了。而整个这件事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得比勋爵在上院宣称自己是“民主”的公开反对者，并且把民主说成是唯一的一个必须与之进行斗争的党派。于是，不可避免的约翰·罗素出场了，他出来研究这种民主的实质，即财富的增长，这种财富的智力的增长，以及它们通过舆论和法律所认可的机构来影响政府的愿望的增长。由此可见，民主正是资产阶级即工商业中等阶级的愿望的体现。得比勋爵以这种民主的反对者的姿态出现，而约翰·罗素则自告奋勇地充当这种民主的旗手。两人都一致默认这样一件事实：他们本阶级内部即贵族阶级内部的旧的内讧已经不能引起国内的任何兴趣。因此，罗素已经准备抛弃“辉格党人”这个称号而改名“民主主义者”，——如果这是打倒他的对手的一个 *conditio sine qua non* (必要的条件) 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辉格党实际上将继续扮演过去的角色，正式充当资产阶级的奴仆。由此可见，罗素所提出的改组党的计划，归结起来不过是要给党起一个新的名称。

约瑟夫·休谟也认为必须组织一个新的“人民政党”。然而，

按照他的意见,不能根据保障租佃者权利的要求和类似的建议来组织这样的党。“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在六百五十四个代表中,您甚至连一百个也联合不起来。”那末,他究竟有什么可以获得专利权的新发明呢?

“人员同盟——或人民政党,或人民联盟——应当在一点上,譬如说,在秘密投票这样一个要求上达成协议;达到这一点之后,就能够一步一步地过渡到其他各点。尽管这个运动只能由下院中为数不多的一批代表发起,但是运动要获得成功就必须使议会外的人民和选民相信他们必须参加,并支持议会中的那个不大的人民政党。”

这个休谟曾经是人民宪章²⁷⁹的起草人之一。后来他抛弃了由六点构成的人民宪章而转向财政改革和议会改革派的那个仅仅由三点构成的“小宪章”。而现在我们看到,他已经满足于秘密投票这一点了。从他给“赫尔报”的一封信的结尾可以看出,他本人对于自己的新发明也只寄托多么小的希望:

“请告诉我,有多少编辑会冒险去支持在议会保持目前这样的成分的情况下永远不可能执政的政党呢?”

因此,既然这个新的政党不打算在目前多少改变一下议会的成分,而只限于要求秘密投票,那末连它自己也承认,它是永远不可能执政的。建立这样一个软弱的政党(而且已经公开承认是软弱的政党)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除了约瑟夫·休谟的尝试之外,还有一个创立新政党的尝试。这就是所谓的民族政党。这个党不要人民宪章,而想以普选权作为自己唯一的口号,于是它就恰好丢掉了那些能够把争取普选权的运动变为全民运动并使这个运动得到人民支持的条件。下面我还有机会谈到这个民族政党。它是由那些力图跻身于体面的上流社

会的过去的宪章派,以及那些企图使宪章运动听从自己支配的激进派、资产阶级思想家组成的。站在他们后面的——不管“民族主义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是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派,是曼彻斯特学派的信徒,这些人驱使和利用他们为自己打先锋。

因此,任何人都很清楚,所有这些卑鄙的妥协和叛变行为,所有这种追逐蝇头小利的行为,所有这些动摇不定和欺骗手段都只能证明:卡提利纳已经站在大门口;有决定意义的斗争即将到来;反对党意识到自己不受欢迎和无力反抗;一切建立新的防御中心的企图仅仅在所谓“后退政策”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民族政党”从宪章后退到普选权;约·休谟从普选权后退到秘密投票;其他的人从秘密投票后退到平均分配选区,如此等等,最后一直到小约翰·罗素为止,在他那里,除了民主这样一个空洞的字眼之外,已经找不到任何可以作为口号的东西。约翰·罗素勋爵的民主,实际上就是民族政党的最终目标,也是休谟的“人民政党”和其他一切有名无实的政党(就假定它们之中有那么一个党具有某些类似生命力的东西)的最临目标。

一方面由于进入物质繁荣时期而产生了政治上的萎靡不振和冷淡态度,而同时却不能不担心托利党仍然怀有某种不良意图;一方面资产阶级的领袖看到他们很快就会需要人民的支持,而同时某些有声望的领袖又清楚地意识到人民过于冷淡,因而不可能在目前发动一个独立的运动,——所有这些情况促使各个政党做了相互靠近的尝试,反对党的各个派别,从最激进的到最不激进的,力图在议会之外通过互相让步结成联盟,最后一直到全都回到罗素勋爵所乐于称之为民主的东西上来。

关于建立一个所谓的“民族政党”的企图,厄内斯特·琼斯发

表了以下的公正的见解：

“人民宪章是政治改革方面所能采取的措施中的一种最全面的措施，宪章派是大不列颠的唯一的真正的民族政党，只有它极力主张政治的和社会的改革。”

而宪章派执行委员会²⁸⁰的委员之一罗·乔·盖米季是这样告诉人民的：

“你们拒绝资产阶级的合作吗？当然不，如果这种合作是根据公正的、光荣的条件提出的话。什么条件呢？普通的和可以接受的条件。要承认宪章，而在承认之后就同它的为了实现它而已经组织起来的朋友联合起来。如果你们拒绝这样做，那末你们不是反对宪章本身，就是因自己的阶级优势而自傲，以为它可以给你们领导权。在第一种情况下，没有一个忠实的宪章主义者会同你们结成同盟；在第二种情况下，没有一个工人会这样损害自己的尊严而崇拜你们的阶级偏见。工人只能依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同时也接受真诚的帮助，不论这种帮助来自谁。但是他们在自己的行动中所要遵循的方针是：他们要想得救，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

目前，宪章派的群众也被物质生产吸引住了。但是党的核心到处都在重新组织起来，在英格兰和苏格兰重新建立了联系。一旦商业和政治的危机到来，目前宪章运动的总参谋部毫不声张地进行的活动就会在整个大不列颠显示出它的作用。

卡·马克思写于 1852 年 10 月 16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2 年 11 月 2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622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 科苏特、马志尼和路易—拿破仑

致“纽约论坛报”编辑

亲爱的先生！

我在 9 月 28 日写的那篇文章报道了一些事实，说明科苏特和马志尼的活动真相^①，现在我发现那篇文章引起了许多非难，造成了民主派报刊广泛进行空泛的辩驳、咒骂和大声威胁的口实。

我确实知道科苏特并没有跟着叫嚷。如果他本人出来反驳我的报道，那我就会重新来谈谈这些报道，并且举出可以确凿证明上述事实确实可靠的证据来加以证实。

可是，我写那篇文章与其说是想反对科苏特，不如说是想给他一个警告。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

至于说到根据权威材料反驳我的那位先生，那末我要提醒他一句古老的谚语：A micus incommodus ab inimico non differt。（愚友和敌人没有两样）^②。

民主派报刊、尤其是德国的民主派报刊方面的先生们，照例是叫嚷得最响亮的；我要告诉这些先生，他们心里全是狂热的保皇党

① 见本卷第 412—415 页。——编者注

② 和俄国的谚语“殷勤的傻瓜比敌人更危险”差不多。——编者注

人。这些先生离开了国王、神明和教皇是不行的。他们刚一脱离旧的统治者的监护,就已经给自己制造了新的统治者,并且对“异教徒和谋叛者”暴跳如雷。这些人非常令人讨厌:他们揭露了令人不快的真相和公布了有损名誉的事实,因而侮辱了新出现的民主主义之王的尊严,亵渎了新出现的民主主义之神的圣明。

您的特约通讯员

1852年11月16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

载于1852年12月1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3627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关于最近的科伦案件的最后声明

致“晨报”编辑

亲爱的先生！

为了对自己和对现已在科伦被判罪的朋友们负责，我们认为有必要向英国公众介绍一下同最近的一个巨大案件有关的如下一些事实。这一案件发生在科伦，在英国的报刊上没有得到足够的说明。

仅仅为了弄到这一案件所需要的证据，就花了十八个月的时间。在这一整段时间里，我们的朋友们一直被单独监禁着，在那里，什么事情也不许他们干，甚至连书都不许他们看，病了也得不到必要的治疗，就是得到了治疗，那也是已经病入膏肓，无法医治了。甚至在递交了“起诉书”之后还是禁止他们同自己的辩护人交换意见，这是一种直接破坏法律的行为。而把他们监禁得这样长久、这样严酷的借口究竟是什么呢？当头九个月已经过去的时候，“检察厅”宣布：缺乏起诉的根据，因此需要重新开始侦查。于是重新开始侦查。过了三个月，当陪审法庭开庭的时候，国家起诉人推托说，证据太多，他至今还无法把它们弄清楚。接着又过了三个月，由于原告方面的一个主要证人生病，于是审讯又拖延下来了。

这样一再拖延的真实原因，是普鲁士政府当局心虚，它害怕它

所大肆渲染的“闻所未闻的揭发”在如此贫乏的事实面前经不起考验。最后，政府总算物色到了一批从来没有在莱茵省露过面的陪审员：其中有六个是反动贵族、四个是 haute finance（金融贵族）的代表、两个是高级官员。

向这个陪审法庭提出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证据呢？不过是一小撮想当阴谋家的不学无术的幻想家（这帮家伙是一个叫舍尔瓦尔的公开的警探的同谋者和工具）瞎造乱编的一些宣言和信件。在这以前，这些文件中的绝大部分都在伦敦的一个叫做奥斯渥特·迪茨的人的手里。在国际博览会²⁸¹期间，普鲁士警察当局乘迪茨不在家，砸开了他的写字台的抽屉，这样，就用平常的盗窃办法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文件。这些文件首先被用来揭发所谓巴黎的德法密谋²⁸²。现在科伦的法庭辩论已经证明，这些阴谋家及其在巴黎的代理人舍尔瓦尔正好都是被告们和我们这几个在伦敦的朋友们的政敌。但是国家起诉人硬说，只是某些纯私人的纠葛才阻碍了被告们和我们这几个在伦敦的朋友们参加舍尔瓦尔及其同谋者的密谋。有人指望用这类论据来证明科伦的被告们在道义上参与了巴黎的密谋。当人们要科伦的被告们对他们的公开敌人的行动负责时，舍尔瓦尔的真正的朋友们和他的同谋者就被政府当局传到法庭，但他们并不是以被告的身分坐在被告席上——不，他们是坐在证人席上提供反对被告的证词。其实，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卑鄙的。由于舆论的压力，政府当局不得不去寻找比较不令人怀疑的证据。在一个叫做施梯伯的人——科伦原告方面的主要证人、王室警务顾问、柏林刑事警察局长的领导下，全部警察机器都开动起来了。在10月23日的法庭上，施梯伯声称，有一个特别信使从伦敦给他带来了一批特别重要的文件，说什么这些文件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被

告们同我们几个人一起参与了他所控告的密谋。“除其他许多文件外，信使给他送来了在被告们与之保持通信关系的马克思博士主持下举行的秘密协会会议的原本记录。”可是施梯伯在他那矛盾百出的证词中竟把他的信使到达他那里的日期弄错了。而当被告的主要辩护人施奈德尔博士当面指责施梯伯的证词不真实的时候，施梯伯除了摆出一副他是负有国家最高当局所委托的最重要使命的国王代表的臭架子以外，不敢作任何别的回答。至于记录本，施梯伯曾两次发誓作证说，它是“伦敦共产主义协会的原本记录”，可是后来，他被辩护人弄得无可奈何，终于不得不承认这可能只是他手下的一个暗探所获得的一个笔记本。最后，从他本人的证词中也可以看出，记录本是别有用心捏造的，它出自施梯伯在伦敦的三个代理人——格莱夫、弗略里和希尔施之手。希尔施本人后来也承认，记录本是在弗略里和格莱夫的指使下编造出来的。这一点在科伦已经十分清楚地得到了证明，甚至连国家起诉人也说施梯伯的这一个如此重要的文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倒霉的本子”，纯粹是捏造。这个人否认原告方面提出来作为一种证据的那封模仿马克思博士笔迹的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这个文件也是一种明显而粗糙的捏造的证据，同样，用来证明被告不是有革命意图、而是实际参与某一个哪怕是稍微有点像是密谋的活动的其他一切文件，都变成了警察当局所干的捏造勾当的明证。政府当局生怕被揭露，因而它不但迫使邮局扣压寄给辩护人的一切文件，而且还指使施梯伯用威胁手段去吓唬辩护人，说要控告他们同我们几个人有“罪恶的通信关系”。

如果令人信服的证据一件也拿不出来，而硬要宣判有罪，那末，能够这样做（即使这一类陪审员也是不能够这样做的）只是由

于把新刑法典当做似乎具有追究既往的力量的法律来应用；在这样应用法律时，就连“泰晤士报”与和平协会也随时有可能被扣上叛国的可怕罪名而被告发。此外，科伦案件由于长期拖延，由于原告方面采取了种种不寻常的手段，已成了一起尽人皆知的案件，因而宣判被告们无罪就无异于宣判政府当局有罪，而莱茵省普遍认为，宣判无罪的后果将是陪审法庭这个制度本身立即被废除。

亲爱的先生，我们始终是您顺从的仆人

弗·恩格斯

斐·弗莱里格拉特

卡·马克思

威·沃尔弗

1852年11月20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

载于1852年11月29日

“晨报”第1916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晨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最近的科伦案件²⁸³

1852年12月1日星期三于伦敦

你们也许已经从欧洲报刊上看到许多关于迫害普鲁士共产党人的科伦的巨大案件及其结局的报道。但是，鉴于这些报道没有一个哪怕是比较真实地说明了事实，鉴于这些事实能够揭穿使欧洲大陆受到束缚的各种政治手段，我认为有必要回头来谈谈这一案件。

由于结社权和集会权的废除，共产主义的或无产阶级的政党，同其他政党一样，都失去了在大陆上建立合法组织的可能性。更何况共产主义的或无产阶级的政党的领袖们都已被逐出自己的国境。但是，任何政党没有组织都是无法存在的；如果说在自由资产阶级以及民主派小资产阶级那里，它们的社会地位、它们的物质优势以及它们的成员之间早已建立起来的日常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能代替这类组织的话，那末，没有这种社会地位和资财的无产阶级，便不得不在各种秘密的联合中寻求这种组织。正因为如此，无论在法国或者在德国都出现了许多秘密团体，这些团体从1849年起就被警察当局一个个地破获了，并且被扣上阴谋家组织的罪名而遭到迫害。这些团体中，有许多的确是阴谋家的组织，的确是为了推翻现存政府而建立起来的，——谁在一定的条件下不动手组

织密谋，那他就是胆小鬼，同样地，在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那就是胡闹。但是，另外还有一些团体，它们抱有更远大更崇高的目的，它们懂得：推翻现存政府只不过是即将来临的伟大斗争中的过渡阶段，它们竭力把以它们为核心的党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训练党去进行最后的决战。这一决战或迟或早将必然在欧洲不仅永远消灭“暴君”、“专制君主”和“王位追求者”的统治，而且永远消灭无比强大的极端可怕的权力：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权。

德国先进的共产主义政党²⁸⁴的组织就是这样。这个政党根据它的“宣言”（发表于1848年）的原则以及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连载的题为“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①这组文章中所阐明的原理，从来不抱这样的幻想：似乎它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随心所欲地进行那种必须在实践中实现它的思想的革命。它研究了1848年革命运动的起因及其失败的原因。它认为，阶级间的社会对抗是一切政治斗争的基础，因此它去探究这样的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上，一个社会阶级能够而且必然要担负起代表民族的全部利益的使命，也就是担负起在政治上领导该民族的使命。历史向共产主义政党表明：继中世纪的土地贵族之后，后来也夺取了政权的最初一批资本家的金融实力怎样成长起来；这个金融资本家集团的社会影响和政治统治怎样被工业资本家的日益增长（从使用蒸汽时起）的威力所排挤；另外两个阶级即小资产者阶级和工业工人阶级目前在怎样要求统治权。1848—1849年的实际革命经验证实了一种理论观点，从这种观点得出的结论是：共产主义的工人阶级首先必须让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去当政，然后它才能指望在不断的斗争中

① 见本卷第3—115页。——编者注

建立自己的政权并消灭使它处于资产阶级压迫之下的雇佣奴隶制。由此可见，共产党人的秘密组织不能抱有推翻德国现存各邦政府的直接目的。它建立这种秘密组织不是为了推翻这些政府，而是为了推翻迟早必将取它们而代之的那个叛乱政府，该组织的每一个成员当时都能给予并且无疑地会给予反对 status quo (现状) 的革命运动以积极的支持。但是，在给这种运动作准备的时候，除了在群众中秘密地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是不能有其他方法列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任务的。这个团体的大多数成员对它的这些基本原则都是十分明了的，因此，当它的某些成员为虚荣心和个人野心所驱使，企图把同盟变成 ex tempore (即兴地) 进行革命的阴谋家组织时，他们很快就被开除出盟。

世界上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提出理由把这样的同盟叫做阴谋家组织，叫做为策划叛乱而建立的秘密团体。如果这也算是密谋的话，那也不是反对现存政府的密谋，而是反对它的可能的继承者的密谋。这一点普鲁士政府当局也是知道的。当局之所以把十一名被告单独监禁了十八个月，利用这段时间来干最惊人的法律勾当，原因也就在这里。在八个月的监禁之后，“由于缺乏证明他们犯罪的证据”，竟又把被告们关了好几个月来继续进行侦查，简直岂有此理！最后，当被告们终于出现在陪审法庭上的时候，竟没有办法给他们扣上某种带有叛国性的预谋勾当的罪名。但是他们毕竟被判了罪，现在不妨来看一看他们究竟是怎样被判罪的。

1851年5月，同盟的一个特派员^①被捕，根据从他那里查获的文件逮捕了其他一些人。一个叫施梯伯的普鲁士警官很快就接到

^① 即诺特荣克。——编者注

一项命令，要他监视莫须有的密谋在伦敦的据点。他终于从上述一些被开除出盟以后真的在巴黎和伦敦组织了密谋的叛徒们那里获得了若干文件。这些文件是通过双重的罪行获得的。收买了一个叫罗伊特的人，砸开了该协会秘书^①的写字台，从抽屉里偷走了文件。但是这还仅仅是开始。这种盗窃行为的结果是揭发出所谓巴黎的德法密谋，并给密谋的参加者判了罪，但是仍然没有提供出共产主义者大同盟的线索。顺便提一下，巴黎的密谋的领导人是住在伦敦的几个爱虚荣的傻瓜和政治 *chevaliers d'industrie* (骗子) 以及一个过去曾经因伪造行为被判了罪但目前已在巴黎当上了警探的人^②。受他们愚弄的一些糊涂虫老是用狂暴的豪言壮语和杀气腾腾的浮夸辞藻来弥补他们在政治上的极端微不足道。

因此，普鲁士警察当局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发现。它在普鲁士驻伦敦的大使馆里设立了一个真正的秘密警察分署。一个叫格莱夫的警探以大使馆随员的头衔为掩护进行他的卑鄙活动——老实说，这种作法足以把普鲁士的所有大使馆都置于国际法之外，甚至连奥地利人也还不敢这样做。在格莱夫的带领下工作的，有一个叫弗略里的伦敦西蒂区的商人，这个人在上流社会中有一定的地位和联系，是一个天生下贱专干卑鄙勾当的下流坯；另一个暗探是店员，名叫希尔施，不过，他在伦敦时就已经有人怀疑他是一个密探。他曾经混入流亡伦敦的一些德国共产主义者中间。他们为了查明他到底是个什么人，曾容忍他在自己人中间混了一个时期。他勾结警察当局的罪证不久就被发现，这位希尔施先生从

① 即奥·迪茨。——编者注

② 即舍尔瓦尔。——编者注

此也就隐藏起来了。这样一来，他虽然已经没有任何可能获得可供出卖的情报，但他毕竟还不是无事可干。当他幽居在肯辛顿时，虽然从来没有碰见过一个上述的共产主义者，但是他每周都要编造一些关于普鲁士警察当局根本无法破获的那个阴谋家组织的虚构中央委员会的虚构会议的虚构报告。这些报告的内容是最荒唐不过的。没有一个名字是确实的，没有一个姓是真有的，强加在这个或那个人身上的话，没有一句是多少有点像这个人可能说出的话。希尔施在伪造这些假货时曾得到他的老师弗略里的帮助，而且也绝不能证明“随员”格莱夫没有亲自动手干这一卑鄙的勾当。尽管这些东西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普鲁士政府当局还是把这些荒谬绝伦、胡说八道的东西当做神圣的真理，可以想像，把这类证据当作提交给陪审法庭的诉讼材料，已经造成了什么样的混乱。案件开始审讯时，上述的警官施梯伯先生亲自出马坐在证人席上，发誓证明所有这些荒谬的捏造材料都是真实的，并洋洋自得地硬说什么他手下的一个密探和在伦敦的那些应当被看作这一可怕密谋的主要组织者的人们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这个密探的确处于极端秘密的状态，因为八个月中他在肯辛顿一直没有露过面，生怕真的碰到密谋的某一个参加者。但是他似乎每周都在报告这些人的最秘密的思想、言论和活动。

然而，希尔施和弗略里这两位先生还留了一手，他们还有一个杰作。他们把他们所捏造的全部报告改编成秘密的最高委员会（普鲁士警察当局硬说有这么一个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而施梯伯先生发现，这个本子竟同他过去从这两个人那里得到的报告一模一样，所以他立刻把它交给陪审员，并再一次发誓说，经过一番慎重的研究之后，他坚信这个本子是真实的。就在那个时候，希

尔施所报告的那绝大部分荒谬的捏造材料公布了。当这个秘密委员会的虚构成员听到了他们在此之前甚至想都没有想到过的关于他们的报道时，他们的惊奇是可想而知的。洗礼时本来命名为威廉的人，在这里却被改名为路德维希或卡尔；一些人硬被说成在伦敦发表演说，其实当时他们在英国的另一个地方；一些人被报告说他们读过某些信件，其实这些信件他们从来没有收到过；报告中还说什么他们每星期四都举行例会，其实他们只不过是每星期三照例举行一次友谊聚会；一个刚会写字的工人竟成了记录之一，并且以记录的身分签了名；他们所有的人发表意见时都被迫一律用也许是普鲁士警察派出所的语言，但决不用多半是由在本国享有盛名的作家组成的那个协会的语言发表意见。除了这一切，还捏造了一张伪造者们为收买记录本而向臆造的中央委员会的虚构的秘书付款的收据。但是这个虚构的秘书的存在，其根据只不过是某个诡谲的共产党人用来愚弄不幸的希尔施的一个迷阵而已。

这种拙劣的捏造是太糟糕了，结果竟弄得事与愿违。虽然被告的在伦敦的朋友们根本不可能向陪审员说明事实真相，虽然他们寄给辩护人的信件在邮局里被没收了，虽然文件和发誓写成的书面证词（它们毕竟被交到这些律师的手里了）不允许作为证据，但是由于激起了公愤，甚至连国家起诉人，以及曾发誓担保这个记录本的真实性的施梯伯先生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它是捏造的。

但是，这种伪造并不是警察当局所干出来的唯一的伪造行为。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还发生了两三件这样的事情。警察当局在罗伊特伦来的文件上加油添醋，借以歪曲文件的原意。有一个满纸荒唐

的文件是模仿马克思博士的笔迹写成的，这个文件直到最后起诉人方面不得不承认是捏造的以前，有一个时候硬被说成是马克思写的。但是，在警察当局的每一种无耻勾当被揭穿之后，又于出五六种无法立刻揭穿的新的无耻勾当，因为当局千方百计地要把辩护人弄得措手不及，不得不在伦敦弄证据，而辩护人同流亡在伦敦的共产主义者的每一次通信在法庭上都被说成是参与假定的密谋的一种行为！

格莱夫和弗略里这两个人的真面目就如上面所描述的那样，这是连施梯伯先生本人在他的证词中也已经表明了。至于说到希尔施，他在伦敦治安法官面前曾经供认，他在弗略里的指使和协助下伪造了“记录本”，后来他为了逃避刑事处分而逃离了英国。

在审判过程中所进行的这样可耻的揭露，使政府当局狼狈不堪。它为这个案件物色的陪审员都是过去没有在莱茵省露过面的人物：六个贵族——十足的反动分子、四个金融巨头、两个政府官员。这帮人毕竟不很愿意去细心地分析一大堆杂乱无章的证据；这些证据竟在他们的面前堆了六个星期之久，而这时经常在他们的耳边发出这样的叫喊声：被告们是可怕的共产主义密谋的头子，这个密谋的目的是要消灭一切神圣的东西：财产、家庭、宗教、秩序、政府和法律！可是，如果政府当局在当时不向特权阶级暗示：在这个案件中宣判被告无罪，这将成为废除陪审法庭的信号，并将被人理解为直接的政治示威，理解为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准备甚至同极端革命派结成同盟的证据，那末终归是会宣判无罪的。不管怎样，政府当局最终还是把普鲁士的新刑法典当做似乎具有追究既往的力量的法律，给七名被捕者判了罪，而只有四人被宣判无罪。

被判罪者分别被判处三年到六年的监禁²⁸⁵。毫无疑问,当你们得到这个消息时,你们一定会及时地把它报道出去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52 年 11 月 29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2 年 12 月 22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3645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²⁸⁶

卡·马克思写于 1852 年 10 月
底—12 月初
1853 年以小册子“揭露科伦
共产党人案件”发行于巴塞尔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 1885 年版本,并
根据 1853 年和 1875 年版
本校对过

卡·马克思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ss

zu Köln.

Basel,

Buchdruckerei von Gbr. Rrüf.

1853.

卡·馬克思的“揭露科倫共產黨人案件”一書
第一版的扉頁

卡·马克思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
第一版的扉页

前 言

1851年5月10日,诺特荣克在莱比锡被捕;不久以后,毕尔格尔斯、勒泽尔、丹尼尔斯、贝克尔等人也被捕了。1852年10月4日,科伦陪审法庭开始审讯被捕者,他们被控犯了反对普鲁士国家的“图谋叛国”罪。这样,审前羁押(单独监禁)竟拖了将近一年半之久。

在诺特荣克和毕尔格尔斯被捕时,查获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主义宣传协会)章程”、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告同盟书²⁸⁷,以及一些人名住址和印刷品。诺特荣克被捕的消息已经传出八天以后,科伦才开始搜查和逮捕。可见,如果当时还能发现一些东西的话,那末现在,无疑一切都已经无影无踪了。实际上,被查获的只不过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信件。过了一年半之久,当陪审法庭终于审讯被捕者的时候,原告方面所掌握的 *bona fide* (可信)材料一份也没有增加。可是,据检察机关(以冯·泽肯多尔夫和泽特为代表)断言:普鲁士的整个国家机构曾进行了极其紧张的多方面的活动。它们究竟干了些什么勾当呢? *Nous verrons!* (让我们来看一看吧!)

审前羁押一再拖延的理由被说得奥妙无穷。最初,说什么萨克森政府不愿把毕尔格尔斯和诺特荣克引渡给普鲁士。科伦的司法机关曾向柏林的内阁要求过引渡,但是没有结果;柏林的内阁也向

萨克森当局要求过引渡,但是也没有结果。其实,萨克森政府已经同意了。毕尔格尔斯和诺特荣克已经被引渡。最后,到了1851年10月,事情有了一些进展,材料终于交给科伦上诉法院的检察院。检察院作了决定,认为“缺乏起诉所必需的客观的犯罪构成,因此必须重新开始侦查”。司法机关的这一股忠于职守的热情,是由前不久刚颁布的纪律法鼓起来的,这一法律规定:普鲁士政府有权清除不称它心的任何一个司法官。这一次,审判由于缺乏犯罪的证明材料而宣告改期。而当陪审法庭在下一个季度审判庭开庭时,审判则不得不由于材料太多而延期。据说,文件太多了,起诉人来不及细心研究。起诉人慢吞吞地细心研究了材料,把起诉书交给了被告,并规定在7月28日对案件进行审理。但是这时,政府当局的主要审判台柱警察厅长舒耳茨病倒了。由于舒耳茨的健康欠佳,被告们不得不再坐三个月的牢。好在舒耳茨死了,公众也已经迫不及待,于是政府当局才不得不把幕布拉开。

在这整个时期里,科伦警察厅、柏林警察总局、司法部和内务部经常对侦查的过程进行干涉,同样,后来它们的可尊敬的代表施梯伯也经常以证人身分对科伦举行的公开审讯进行干涉。政府物色了一批在莱茵省的编年史上空前未有的陪审员。其中除了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黑尔什塔德、来丁、约斯特),城市贵族的代表(冯·比安卡、冯·拉特),顽固守旧的容克的代表(海布林·冯·兰岑瑙尔、菲尔施坦堡男爵等人),还有两个普鲁士的政府顾问:一个是王室侍卫官(冯·明希-贝林豪森),一个是普鲁士教授(克罗伊斯勒尔)。由此可见,在这个陪审法庭中,德国统治阶级中的一切阶层都有代表,而且也只有它们才有代表。

有了这样一批陪审员,普鲁士政府当局似乎可以选择一条直

路，可以组织一次完全有倾向的审判了。毕尔格尔斯和诺特荣克等人承认属实的文件以及那些直接从他们那里查获的文件的确丝毫不能证明有什么密谋；这些文件根本不能证实 Code pénal²⁸⁸所规定的任何行为的存在，而只是不容置辩地证明了被告们对现存政府和现存社会的敌对态度。但是，立法者的理性所没有预料到的东西是可以由陪审员的良心来加以补充的。被告们把他们对现存社会的敌对行为弄得不违犯法典的任何一个条文，这难道不是他们的一种奸计吗？没有列入治安卫生条例的病名录的病难道就不是传染病了吗？如果普鲁士政府仅仅根据实有的材料就想证明被告们是一些有害的人，而陪审员又认为判决被告“有罪”就足以使他们不致为害，那末谁能攻击陪审员和政府当局呢？除了那些目光短浅的幻想家以外，谁也不能这样做。原来这些幻想家认为，普鲁士政府和普鲁士的统治阶级非常强大，只要它们的敌人不越出辩论和宣传的范围，就能给他们以自由活动的场所。

然而，普鲁士政府自己把政治审判的康庄大道堵塞了。审判一拖再拖，内阁对侦查的过程进行直接干涉，暗中指示进行不可思议的恐怖活动，大肆吹嘘什么全欧洲性的密谋已被揭穿，令人发指地虐待被捕者，这就使案件扩大成为 *procès monstre*（巨大案件），成了全欧洲报刊注意的中心，而使公众的猜疑的好奇心达到了顶点。普鲁士政府已经使自己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地：原告方面为了面子不得不提出证据，而法庭为了面子也不能不要求证据。法庭本身已经站在另一个法庭——社会舆论的法庭面前。

政府为了补救第一次失策，必然又再一次失策。在侦查时执行法院侦查员职务的警察，在审讯时不得不以证人的身分出面。除了平常的起诉人以外，政府还得挑选一个不平常的起诉人；除了检察

机关以外，还得叫警察出面；除了泽特和泽肯多尔夫以外，还得派出施梯伯和他的维尔穆特、他的鸟儿格莱夫以及他的小玩艺儿戈德海姆^①。为了用特效的警察手段不断向法律上的原告方面提供该方面所白费力气、捕风捉影地寻找的种种事实，第三种国家力量对法庭的干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法庭很了解这种情况，所以庭长、法官和检察官一个个都毕恭毕敬地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让给警务顾问兼证人施梯伯，并经常躲在他的背后。在阐明检察院无法找到的“客观的犯罪构成”所依据的那些警察启示以前，我们还要再说几句开场白。

从人们在被告那里查获的文件以及他们本人的供词中发现：曾经有过一个德国共产主义协会，它的中央委员会最初设在伦敦。1850年9月15日，这个中央委员会分裂了。多数派——起诉书称它为“马克思派”——把中央委员会迁往科伦。少数派——他们后来被科伦人开除出同盟——在伦敦组织了独立的中央委员会，并在伦敦和大陆上建立了宗得崩德²⁸⁹。起诉书把这个少数派及其应声虫叫做“维利希—沙佩尔派”。

泽特和泽肯多尔夫硬说，伦敦中央委员会的分裂是由某些纯私人的纠葛引起的。早在泽特和泽肯多尔夫说这种话以前，“侠义的维利希”就已经在伦敦流亡者中间散布了种种关于分裂的原因的卑鄙无耻的流言蜚语。维利希利用阿尔诺德·卢格先生欧洲民主主义者中央²⁹⁰这辆马车的第五个轮子及其他同他类似的人作为工具在德国和美国报刊上大肆散播这类流言蜚语。民主派曾经认

^① 俏皮话：Wermuth, Greif和Goldheim（小称是Goldheimchen）都是警官的姓，同时《Wermut》又有“苦痛”、“苦艾”、“苦艾酒”的意思，《Greif》有“兀鹰”的意思，《Goldheimchen》有“金黄色的蟋蟀”的意思。——编者注

为，只要尽快地把“侠义的维利希”描绘成共产党人的代表人物，他们就能轻而易举地战胜共产党人。“侠义的维利希”本人也认为，“马克思派”如果不出卖德国的秘密协会，特别是如果不让科伦中央委员会去接受普鲁士警察当局的慈父般的监护，就不可能揭露分裂的原因。现在这些情况再也不存在了，因此，我们不妨从1850年9月15日举行的伦敦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的记录^①中引证几小段话。

马克思在说明他的关于分离的建议时，曾经说过以下的一段话，他说：“少数派用教条主义观点代替批判观点，用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唯物主义观点。少数派不是把现实关系、而仅仅把意志看做革命的动力。我们对工人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而你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我们特别向德国工人指出德国无产阶级不够成熟，而你们却非常粗劣地向德国手工业者的民族感情和等级偏见阿谀逢迎，当然这样做是比较受欢迎的。正像民主派把人民这个词变成圣物一样，你们则用无产阶级这个词来玩这套把戏。你们像民主派一样，用关于革命的空话代替革命的发展”如此等等。

沙佩尔先生作了回答，他的原话是这样的：

“我发表了在这里遭到抨击的见解，因为我对这件事情总是很热情的。问题在于，是我们自己动手去砍掉别人的脑袋，还是让人家来砍掉我们的脑袋。（沙佩尔甚至保证说，一年以后，即1851年9月15日，有人将要把他的脑袋

^① 见本卷第635—641页。——编者注

砍掉。)在法国快要轮到工人的头上了,因而在德国也快要轮到我们的头上了。如果不是这样,我当然就会寻求安静去了,那时我的物质状况就会不同了。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会采取一些保证无产阶级获得统治的措施。我是这种见解的狂热的拥护者。而中央委员会却喜欢相反的见解”如此等等。

由此可见,中央委员会的分裂并不是由私人原因引起的。但是,如果说是原则性分歧,那也是不对的。沙佩尔—维利希派从来不以具有自己的思想为荣。他们只有别出心裁地曲解别人的思想的本领,他们把别人的思想奉为信条,并且认为他们已经把这些思想连同词句都掌握了。如果指责维利希—沙佩尔派是“行动派”,也同样是错误的,除非把行动理解为在下流的叫嚣、臆想的密谋和毫无结果的表面的联系掩盖下的那种无所作为。

二 迪茨的档案

在被告那里查获的“共产党宣言”是二月革命前出版的，几年来一直公开出售；这本书无论从它的形式或者从它的使命来说，都不可能是“密谋”的纲领。被查获的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告同盟书**只谈到共产党人对未来的民主派政府的态度，因而根本没有涉及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政府。此外，章程是秘密的宣传协会的章程，但是，在 Code pénal (刑法典) 里并没有明文规定要惩罚秘密的协会。这种宣传以破坏现存社会为最终目的，但是普鲁士国家已经灭亡过一次，以后还可能灭亡十次，以至最终灭亡，而现存社会决不会因此掉一根毛。共产党人能够加速资产阶级社会瓦解的过程，但是可以让资产阶级社会去瓦解普鲁士国家。如果有人把推翻普鲁士国家作为自己的直接目的，并且宣布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破坏社会，那末，他无异就是一个为了清除道路上的粪堆而打算炸毁地球的疯狂的工程师。

但是，既然同盟的最终目的是**推翻社会**，那末它的手段必然是**政治革命**，而推翻社会要以推翻普鲁士国家为前提，就像地震要以破坏鸡窝为前提一样。然而被告们是从这样一种罪恶观点出发的：没有他们，当前的普鲁士政府也会垮台。因此，他们并没有组织过目的在于推翻现在的普鲁士政府的同盟，也不曾犯过任何“图谋叛国”罪。

什么时候曾经有人控告过把打倒任何一个顽固守旧的罗马地方官当作自己目的的第一批基督徒呢？普鲁士的国家哲学家们，从莱布尼茨到黑格尔，都致力于推翻神，可是，如果我要推翻神，那我也同样要推翻神所恩赐的国王。难道曾经有人以危害霍亨索伦王朝的罪名追究过他们吗？

这样看来，事情可以任意翻转和颠倒，已发现的 *corpus delicti* (犯罪构成) 已经在光天化日之下像幽灵一样消失了。事情依然没有进展，检察院诉苦^①说：“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而“马克思派”也真够狡猾的了，侦查了一年半还根本没有使缺乏的犯罪构成增加任何一点东西。

这样的苦差是需要帮助解除的。而维利希一沙佩尔派就和警察当局共同完成了这项工作。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派的接生婆施梯伯先生是怎样把他们拖进科伦案件中去的。（见施梯伯 1852 年 10 月 18 日在法庭上的证词。）

1851 年春季，当施梯伯以保护工业博览会的参观者不受坏蛋和小偷^②之害为名而逗留在伦敦时，柏林警官总局寄给他一份从诺特荣克那里查获的文件的复制品，同时

施梯伯发誓作证说：“我特别注意密谋的档案，根据从诺特荣克那里查获的文件来看，这个档案一定是在伦敦的一个名叫奥斯渥特·迪茨的人手里，档案里面一定有同盟盟员的全部来往信件。”

密谋的档案？同盟盟员的全部来往信件？但是迪茨是维利希

① 在原文中是双关语：《Klage des Anklagesenats》也有“检察院起诉”的意思。——编者注

② 双关语：原文是《Stiebern und Diebern》，这两个词是由施梯伯这个姓的同音词《Stieber》（警犬，转意是坏蛋，到处找人的密探）和《Diebe》（小偷）这个词构成的。——编者注

一沙佩尔派中央委员会的秘书。因此,如果说他手头有密谋的档案,那就是维利希—沙佩尔派的密谋的档案。如果说迪茨手头有同盟的来往信件,那只能是敌视科伦被告们的宗得崩德的来往信件。但是,只要查阅一下从诺特荣克那里查获的文件就可以发现一个大漏洞,即这些文件中根本没有提到奥斯渥特·迪茨这样一个档案保管人。在莱比锡的诺特荣克怎么能知道在伦敦的“马克思派”本身所不知道的事情。

施梯伯不能直截了当地说:陪审员先生们请注意!我在伦敦有了一个闻所未闻的发现。很遗憾,这一发现所涉及的密谋,同科伦的被告们毫不相干,科伦的陪审员无权根据它作出判决;但是它能够提供把被告们单独监禁一年半的理由。施梯伯是不能这样说的。为了把在伦敦发现的线索和偷来的文件同科伦案件似是而非地扯在一起,就有必要把诺特荣克牵连到这个案件里去。

于是,施梯伯发誓作证说,有人建议他用现金去买奥斯渥特·迪茨手中的档案。然而这不过是这样一回事:有一个叫做罗伊特的普鲁士密探,从来没有参加过共产主义协会,和迪茨同住在一幢房子里。他乘迪茨不在家,砸开他的写字台,偷走了文件。施梯伯先生很可能为这种偷窃行为而赏给罗伊特一笔钱,但是,如果这一勾当在施梯伯逗留伦敦时被人发觉,那末他就难免要到凡迪门岛²⁹¹去旅行一趟。

1851年8月5日,施梯伯在柏林收到了从伦敦寄来的一个“用结实的油布包起来的包裹”,里面包的是迪茨的档案,即一大包文件,共有“六十种之多”。这是施梯伯发誓证实的,同时他还发誓作证说,他在1851年8月5日收到的包裹里面,除了其他许多信件以外,还有柏林总区部1851年8月20日的一封信。如果有人一

定要说，施梯伯在作伪誓，他竟担保他在1851年8月5日收到了1851年8月20日的信，那末他会振振有词地回答说，普鲁士王室顾问和福音书作者马太有同样的权利，例如拥有创造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的奇迹的权利。

En passant (顺便提一下)。从在维利希—沙佩尔派那里偷走的文件的清单和这些文件的日期上可以看出，维利希—沙佩尔派对罗伊特的破门行窃的行径虽然有所防备，但后来还是让别人偷走了文件，并让文件落到普鲁士警察当局手里。

当施梯伯得到了用结实的油布包起来的这个宝贝时，他简直高兴得心花怒放。他发誓说：“全部线索都已经暴露在我的眼前了。”但是，有关“马克思派”和科伦被告们的这个宝贝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呢？施梯伯本人供认，什么也没有，根本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

“标有‘9月17日于伦敦’字样的、显然是构成马克思派核心的几个中央委员关于因1850年9月15日发生的著名分裂而退出共产主义协会的原声声明。”

施梯伯本人是这样说的，但是，即使是在提出这个不伤人的证词时，他也不能限于简简单单地叙述一下事实。他不得不把它提高到一定的高度，使它带有警察当局的威风。上述的原声声明除了提到前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成员及其朋友们退出大磨坊街的公开的工人协会²⁹²、但决不退出“共产主义协会”这几行字以外，别无任何内容。

施梯伯可以为他的通信者省下油布，为他的上司省下邮资。施梯伯只要翻阅一下^①1850年9月份的几家德国报纸，他就会发现

① 双关语：《Stieber》（施梯伯）是姓《durchstiebern》的意思则是“乱翻”、“搜查”、“探察”。——编者注

黑字印在白纸上的“马克思派核心”的一项声明，他们在声明中宣布同时退出流亡者委员会²⁹³和大磨坊街的工人协会。

可见，施梯伯之流在搜查证据的工作中获得的直接成果，就是“马克思派核心”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大磨坊街的公开的协会这一闻所未闻的发现。“科伦密谋的全部线索都已经暴露在他的眼前了。”但是公众并不相信他的眼睛。

三 舍尔瓦尔的密谋

然而，施梯伯很善于从偷来的宝物中得到好处。他在1851年8月5日收到的文件，给他提供了一条发现所谓“巴黎的德法密谋”的线索。这些文件中有维利希—沙佩尔派的特派员**阿道夫·迈尔**的六份报告（上面标有“巴黎”的字样）和巴黎总区部给维利希—沙佩尔派中央委员会的五份报告。（施梯伯于10月18日在法庭上作的证词。）施梯伯到巴黎作了一次愉快的外交旅行，并且在那里亲自结识了伟大的卡尔利埃；这个人刚刚在臭名远扬的金条彩票事件²⁹⁴中证明他虽然是共产党人的大敌，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外国私有财产的挚友。

“因此，我在1851年9月前往巴黎。当时的巴黎警察局长卡尔利埃给了我极其热情的支持……在法国警探的帮助下，敏捷而准确地查出了在伦敦的信件上发现的线索。确实探查到了密谋的各个首领的住所，并对他们的一举一动，特别是他们的一切会议和他们的全部来往信件都进行了监视。在那里发现了非常危险的东西……我当时不得不向卡尔利埃局长所提出的要求让步，于是在9月4日午夜采取了果断的行动。”（施梯伯在10月18日所作的证词。）

施梯伯是在9月份离开柏林的。我们假定他是在9月1日离开柏林的。他到达巴黎最早也得在9月2日晚间。9月4日夜里采取了果断的行动。这样，跟卡尔利埃谈判和采取必要措施的时间，只剩下三十六个小时了。而在这三十六个小时之内，不仅“探查到

了”密谋的各个首領的住所，而且还对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的一切会议、他们的全部来往信件都进行了“监视”，当然，这一切都只能在“探查到了他们的住所”之后进行。施梯伯的到达巴黎，不仅激起了“法国警探们”的奇效的“敏捷性和准确性”，而且还迫使专搞秘密活动的首領们变得“殷勤”起来，迫使他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进行了那么多的活动，举行了那么多的会议，写了那么多的信件，以致在第二天晚间就可以对他们采取果断的行动。

在9月3日这一天探查到密谋的各个首領的住所并且对他们的一举一动，一切会议和全部信件都进行了监视，但是这还不够。

施梯伯还发誓作证说：“法国警探们有机会出席了阴谋家的许多次会议，并获悉他们关于在未来革命中的活动方式的决议。”

这样看来，警探们刚刚对会议进行监视，他们就能通过监视出席了会议，他们刚刚出席了一次会议，会议就变成许多次会议，刚刚举行了几次会议，事情就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竟通过了关于在未来革命中的活动方式的决议——而这一切都是在同一天发生的呵！就在施梯伯结识卡尔利埃的那一天，卡尔利埃的警察局人员打听到密谋的各个首領的住所，首領们结识了卡尔利埃的警察局人员，在当天请他出席自己的会议，并在当天举行了许多次会议来迎合他，一直到急急忙忙地通过关于在最近革命中的活动方式的决议，才同他分手。

不管卡尔利埃怎样献殷勤，——当然谁也不会怀疑他在政变前三个月内破获共产主义密谋的殷切心情，——施梯伯期望于他的东西要比他所能办到的多。施梯伯要求警察的奇迹，他不仅要求这种奇迹，而且还相信这种奇迹，他不仅相信这种奇迹，而且还发誓证实这种奇迹。

“当开始行动时”，即当采取果断的行动时，“我亲自跟一位法国警官一起首先逮捕了法国共产党人的主脑——危险的舍尔瓦尔。他猛烈地反抗，于是同他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格斗”。

这就是施梯伯在 10 月 18 日作的证词。

“舍尔瓦尔在巴黎曾经谋害过我，而且是在我的住宅里进行的，他在夜里潜入了我的住宅；当我们俩人格斗时，我的妻子赶来帮我，结果受了伤。”

这就是施梯伯在 10 月 27 日作的另一个证词。

4 日午夜，施梯伯对舍尔瓦尔采取了果断的行动，他们之间发生了格斗，在格斗中舍尔瓦尔进行了顽抗。3 日午夜，舍尔瓦尔对施梯伯采取了果断的行动，他们之间发生了格斗，在格斗中施梯伯进行了顽抗。但是，就在 3 日这一天，阴谋家和警探之间还有着 *entente cordiale*（诚意协商），正因为如此，才可能在一天之内做了那么多的事情。而现在已经表明，不仅施梯伯已在 3 日发觉了阴谋家的意图，而且阴谋家也已在 3 日发觉了施梯伯的意图。当卡尔利埃的警探们发现阴谋家的住所时，阴谋家也发现了施梯伯的住所。当施梯伯对阴谋家扮演“监视者”的角色时，阴谋家对他扮演了采取行动的角色。当施梯伯梦见阴谋家的反政府密谋时，阴谋家正在组织对他本人的谋害。

施梯伯在他的 10 月 18 日的证词中继续说道：

“在这次格斗中（当时施梯伯是进攻的一方），我发现舍尔瓦尔竭力要把一片纸塞进嘴里并要把它吞下去。我好不容易抢救出半片纸来，另外半片已被他咽下去了。”

可见，当时这一片纸是被舍尔瓦尔在嘴里用牙齿咬住了，因为只抢救出半片纸来，而另外半片已被他咽下去了。施梯伯和他的同谋者——警官或其他什么人——只有把手伸进“危险的舍尔瓦尔”

的嘴里去，才能抢救出另外半片纸来。舍尔瓦尔在这种进攻面前能够进行自卫的最好办法就是咬人，据巴黎的一些报纸报道，舍尔瓦尔真的把施梯伯夫人咬伤了。但是在演这场戏时，跟施梯伯一起在场的并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一位警官。施梯伯明明说，施梯伯夫人是舍尔瓦尔在施梯伯的住所进行谋害时由于赶来帮他才受伤的。如果把施梯伯的证词同巴黎报纸的报道对照一下，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舍尔瓦尔为了夺回施梯伯先生在4日午夜从他嘴里撕下的纸片而在3日午夜咬伤了施梯伯夫人。施梯伯将会这样回答我们：巴黎是个奇迹的城市，拉罗施夫柯早就说过，在法国一切都是可能的。

如果我们暂时撇开对奇迹的信仰，那就会明白：前一个奇迹的发生是由于施梯伯把许许多多和时间上彼此毫无联系的活动硬凑在一起，并把它们硬塞在9月3日这一天里；而后一个奇迹的产生则是由于他把在同一个晚间、同一个地方发生的各种不同事件安排到两个不同的晚间和两个不同的地方去。现在让我们来把实际情况同他从“一千零一夜”里学来的那一套胡吹瞎说比较一下吧。但首先我们还要谈一谈一种奇迹般的情况，虽然它并不是奇迹。施梯伯把舍尔瓦尔正要咽下去的纸片撕下了一半。在这半片抢救出来的纸上究竟有些什么东西呢？有施梯伯所要寻找的一切。

他发誓作证说：“在这片纸上有给驻斯特拉斯堡的特派员吉佩里希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指示以及他的详细地址。”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事实。

我们从施梯伯那里得知，他是在1851年8月5日收到用结实的油布包起来的迪茨的档案的。1851年8月8日或9日，在巴黎出现了一个叫施米特的人。看来，施米特这个姓对化名旅行的普

鲁士警探来说是一个最理想的姓。1845—1846年，施梯伯曾化名施米特完成了西里西亚山区的旅行，1851年，他在伦敦的走卒弗略里也化名施米特完成了巴黎的旅行。他在巴黎侦察了维利希—沙佩尔派密谋的各个头子，而首先发现了舍尔瓦尔。他大吹大擂，说什么他是从科伦逃出来的，曾经给地方同盟储金部捐助了五百塔勒。他用德勒斯顿和其他各个地方的委任状来证明自己的身分，他谈到了同盟的改组情况，谈到了各个派别的联合情况，说什么分裂纯粹是由某些私人纠葛引起的，——当时警察当局已经在宣传团结与和睦了，他并且保证要用上述的五百塔勒来重新把同盟引向繁荣。施米特在巴黎逐渐地认识了维利希—沙佩尔派的同盟支部的各个头子。他不但知道他们的住址，而且还拜记他们，侦查他们的来往信件，监视他们的活动，钻进他们的会议，并且充当 agent provocateur (奸细) 向他们进行煽动。施米特把舍尔瓦尔吹捧得愈厉害，愈是把他誉为同盟中的一个尚被埋没的伟人，一个至今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作用 (就像许多伟大人物所经历的那样) 的“主脑”，舍尔瓦尔就愈是飘飘然地自鸣得意起来。有一天晚上，施米特和舍尔瓦尔一起去参加同盟的会议，舍尔瓦尔把他写给吉佩里希的一封著名的信在寄出之前念给施米特听了。这样，施米特才知道有吉佩里希这么一个人。施米特说，“既然吉佩里希已经回到斯特拉斯堡，那末我们就应当马上把领取存放在斯特拉斯堡的五百塔勒的那份委托书寄给他。现在我把保存这笔款项的那个人的住址给您，请您把吉佩里希的住址给我，我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证件寄给吉佩里希准备找的那个人。”施米特就这样弄到了吉佩里希的住址。当天晚上，舍尔瓦尔把写给吉佩里希的信寄出了，过了一刻钟，按照来电指示，逮捕了吉佩里希；在他的住所进行了搜查，那封

著名的信被截获了。吉佩里希是在舍尔瓦尔被捕以前被捕的。

此后不久，施米特告诉舍尔瓦尔说，一个名叫施梯伯的普鲁士密探已到达巴黎。他施米特不仅已打听到了他的住所，而且据他住所对面的一个咖啡馆的招待说，施梯伯居然商量好要逮捕他施米特。他说，舍尔瓦尔准行，他一定能把这个卑鄙的普鲁士警察好好教训一顿。舍尔瓦尔回答说：“我要把他扔到塞纳河里去。”他们约定了第二天闯进施梯伯的住所，就说他在家里，并且要记住他的特征。第二天晚上，我们的这两位英雄真的出动了。在路上，施米特认为，最好舍尔瓦尔进房子去，而他留在门外放哨。他还说：“你可以问一下看门人，施梯伯在不在家，如果看门人让你进去，你就对施梯伯说，你打算跟施彼尔林先生谈谈，打算问他一下，他是否从科伦带来了急需的期票。还有，你的白帽子太惹人注意，民主气味太重。真的！把我的黑帽子戴走吧！”他们交换了帽子。施米特留在外面看守，舍尔瓦尔拉了一下铃，走进施梯伯住的房子。看门人说施梯伯可能不在家，舍尔瓦尔刚想走开，忽然从楼梯上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叫声：“呵，施梯伯在家。”舍尔瓦尔顺声走去，走到了一个戴绿色眼镜、自称是施梯伯的人的面前。舍尔瓦尔把早就商量好的关于期票和施彼尔林的那一番话说了一遍。施梯伯急忙打断他的话：“这可不行，您跑进这所房子里来打听我，等有人把住所告诉了您，然后您就准备离开，……我看这是非常可疑的。”舍尔瓦尔很不客气地作了回答。施梯伯按了按铃，马上出来几个小娄罗把舍尔瓦尔包围起来；施梯伯一把抓住他那装着一封信的上衣口袋。虽然这不是舍尔瓦尔给吉佩里希的指示，但毕竟是吉佩里希给舍尔瓦尔的信。舍尔瓦尔竭力想把信咽下去，施梯伯把手伸进他的嘴里。舍尔瓦尔连咬带推，又动手打人。当施梯伯拚命抢救

信的这一半的时候，他的爱妻则在拚命抢救信的另一半，而且由于她对丈夫的忠心而受了伤。这一场面所掀起的喧闹声惊动了许多邻居，他们纷纷从自己的房间里走出来。这时，施梯伯手下的一个小娄罗穿过楼梯栏杆扔下一块金表来，当舍尔瓦尔高喊《Mouchard!》（“密探!”）的时候，施梯伯及其同伙就一齐高喊《Au voleur!》（“捉贼!”）。看门人把金表送来，这时《Au voleur!》的喊声四起。舍尔瓦尔被逮住了，他在门外已找不到他的朋友施米特了，而在那里发现了四五个来押解他的士兵。

在事实面前，施梯伯所宣誓证实的一切奇迹都云消雾散了。他的走卒弗略里活动了三个多星期；他不仅发现了密谋的线索，而且还帮助捏造了这些线索；施梯伯只要从柏林来一趟，并且高喊：Veni, vidi, vici!（我来到了，我看到了，我胜利了!）就行了。他可以把现成的密谋当做一件礼物赠给卡尔利埃。而要求卡尔利埃的只是采取果断行动的“殷切心情”。施梯伯夫人没有必要在3日被舍尔瓦尔咬伤，因为施梯伯先生是在4日才把手伸进舍尔瓦尔的嘴里去的。在吉佩里希的地址和重要指示被咽下一半之后，它们无须像从鲸鱼的肚子里爬出来的约拿^①那样完全从“危险的舍尔瓦尔”的大嘴里爬出来。真正算得上奇迹的，不过是陪审员对奇迹的信仰，施梯伯竟敢郑重其事地向他们和盘托出他臆造的谎言。他们真不愧是“顺民的愚昧”^②的不折不扣的体现者！

施梯伯在10月18日的法庭上发誓作证说：“在监狱里，我把舍尔瓦尔寄到伦敦去的一切原本报告那给他看了，结果使他大吃一惊，他发觉我已了解

① 亚米太的儿子约拿为躲避耶和华，乘船逃跑。耶和华命海风大作，约拿被抛入海中，耶和华又安排一条大鱼把他吞没。约拿向耶和华祷告求饶，耶和华吩咐鱼把他吐到陆地上。（见旧约全书约拿书第二章）——译者注

② 这是普鲁士大臣冯·罗霍夫说的一句话。——编者注

一切,于是他就全都向我交代了。”

施梯伯最初拿给舍尔瓦尔看的东西,决不是舍尔瓦尔寄到伦敦去的那些原本报告,这些原本报告不过是施梯伯后来在柏林跟其他文件一起从迪茨的档案上抄下来的。他最初拿给舍尔瓦尔看的是舍尔瓦尔刚刚收到的由奥斯渥特·迪茨署名的一封通知信以及维利希最近写的几封信。施梯伯究竟是怎样弄到这些信的呢?原来当舍尔瓦尔同施梯伯及其夫人又咬又打的时候,勇敢的施米特—弗略里跑到舍尔瓦尔的太太(一个英国女人)那里去;他告诉她,——当然,这一位伦敦的德国商人弗略里是用英语跟她讲的,——她的丈夫被捕了,危险得很,她可以把舍尔瓦尔的文件交给他,以免它们给舍尔瓦尔带来更大的危害,舍尔瓦尔委托他把文件转交给第三者。为了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使者,他拿出一顶白帽子来,这顶白帽子是他从舍尔瓦尔那里拿过去的,因为它的民主气味太重。弗略里从舍尔瓦尔的太太那里弄到了这些信件,而施梯伯又从弗略里那里得到了它们。

不管怎样,施梯伯现在已拥有比以往在伦敦时更为有利的作战基地了。他偷到了迪茨的文件,同时还捏造了舍尔瓦尔的口供。这样,他就迫使他的舍尔瓦尔(在10月18日的法庭上)供出“他同德国的联系”:

“据他说,他长期住在莱茵地区,在这中间,1848年住在科伦。在那里,他结识了马克思,并被马克思接收入盟。后来他在巴黎,在那里现有的一些人的基础上积极协助扩大同盟。”

舍尔瓦尔是1846年在伦敦由沙佩尔介绍并接收入盟的,而马克思当时在布鲁塞尔,根本不是同盟²⁹⁵的盟员。可见,舍尔瓦尔不可能是1848年在科伦被马克思接收加入该盟的。

三月革命爆发时，舍尔瓦尔到莱茵普鲁士呆了几个星期，但后来他又从那里回到伦敦，从 1848 年春末到 1850 年夏天他一直呆在伦敦。这样看来，他在这一时期不可能“在巴黎积极协助扩大同盟”；也许能创造发生事件的时间顺序的奇迹的施梯伯还能创造空间的奇迹，甚至还能使第三者有一种分身的本领。

马克思只是在 1849 年 9 月间离开巴黎之后，当他在伦敦加入了大磨坊街工人协会时，才同包括舍尔瓦尔在内的几百名工人有了一面之交。由此可见，马克思不可能在 1848 年在科伦认识他。

舍尔瓦尔起初向施梯伯真实地交代了所有这些问题。施梯伯企图迫使他招假口供。他是否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呢？只有施梯伯本人的证词才能说明这一点，因而，回答是否定的。当然，对施梯伯来说，全部问题就在于使舍尔瓦尔同马克思之间有一种虚构的联系，从而在科伦被告人和巴黎密谋之间制造一种人为的联系。

施梯伯刚刚需要 *en détail*（详尽地）述说舍尔瓦尔及其同志跟德国的联系和通信的问题的时候，他甚至连提也不提一下科伦，可是却洋洋自得地大谈特谈不伦瑞克的赫克、柏林的劳贝、美因兹的莱宁格尔和汉堡的提茨等等，等等，一句话，大谈特谈维利希—沙佩尔派。施梯伯说，这一派“手里”有“同盟的档案”。由于粗心大意，档案已从该派的手里转到了他的手里。在这个档案里，他并没有发现舍尔瓦尔在 1850 年 9 月 15 日伦敦中央委员会分裂以前写给伦敦或者只写给马克思个人的只言片语。

他通过施米特—弗略里从舍尔瓦尔太太那里骗取了她丈夫的文件。但是，他仍然没有发现舍尔瓦尔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只言片语。为了帮助解除这种苦楚，施梯伯就口授而强迫舍尔瓦尔笔录：

“他和马克思的关系很紧张，原因是，虽然中央委员会在科伦，但是马克

思还是要求同他通信。”

如果施梯伯没能发现马克思同舍尔瓦尔之间在 1850 年 9 月 15 日以前的来往信件，那不过是由于在 1850 年 9 月 15 日以后舍尔瓦尔同马克思完全断绝了通信联系。Pends— toi, Figaro, tu n’ aurais pas inventé cela! (上吊吧, 费加罗! 你再不要想到这一点了!)^①

普鲁士政府侦查了一年半所搜集到的对付被告们的材料(一部分是由施梯伯本人提供的), 否定了被告们同巴黎支部、同德法密谋的任何联系。

1850 年 6 月的伦敦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证明: 巴黎支部在中央委员会分裂以前就已经解散了。迪茨的档案中的六封信证明: 巴黎各支部是在中央委员会迁到科伦以后由维利希—沙佩尔派的特派员阿·迈尔重新组织起来的。该档案中的巴黎总区部的信件证明: 这个区部极端敌视科伦中央委员会。最后, 法国的起诉书也证明: 据以控告舍尔瓦尔及其同志的一切事件只是在 1851 年才发生的。因此, 泽特(在 11 月 8 日的法庭上)竟不顾施梯伯的种种揭露, 认为最好稍微暗示一下, 马克思派可能于某年某月通过某种方式参与了巴黎的某种密谋, 但是他声称, 他泽特根据上级指示, 认为这是可能的, 至于这个密谋的时间和密谋本身一概不知。那种纵谈泽特有洞察力的德国报刊, 它的迟钝是可以想见的!

普鲁士警察当局 de longue main (老早) 就企图在公众面前把马克思并通过马克思把科伦被告们说成是参与德法密谋的一伙人。在审讯舍尔瓦尔的案件时, 警探贝克曼给“科伦日报”寄去下面这样一个标有“1852 年 2 月 25 日于巴黎”字样的简讯:

^① 博马舍“疯狂的日子, 或费加罗的婚礼”。——编者注

“有些被告已经潜逃，其中一个名叫阿·迈尔的人，据说是马克思及其同伙的代理人。”

在这以后，“科伦日报”刊登了马克思的一个声明，声明说：“阿·迈尔是沙佩尔先生和前普鲁士陆军中尉维利希的一个密友，他同马克思毫不相干。”^①现在，就连施梯伯本人在他的1852年10月18日的证词中也声称：“1850年9月15日在伦敦被马克思派开除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们派遣阿·迈尔到法国去”云云，甚至还引证了阿·迈尔同沙佩尔—维利希的来往信件。

“马克思派”的成员之一——康拉德·施拉姆在外国人受迫害的情况下，于1851年9月间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和其他五六十个顾客一起被捕了：他被控犯有参与爱尔兰人舍尔瓦尔所领导的密谋罪，把他监禁了将近两个月。10月16日，一个德国人在警察局的监狱里访问了他，向他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我是普鲁士官员。您知道，在德国各地，特别是在科伦，由于共产主义协会的被破获，已经有许多人被逮捕。只要信上一提到什么人的名字，他就要遭到逮捕。目前，政府当局的处境相当尴尬，因为它逮捕了許多人，但不知道他们是否同这个案子有某种关系。我们知道，您并没有参加过 *complot franco-allemand* (法德密谋)，相反地，您很熟悉马克思和恩格斯，您无疑很了解德国共产主义联合会的一切详情。假如您能给我们提供有关这一方面的必要情报，并愿意比较准确地指出哪些人是有罪的，哪些人是无罪的，那我们将感激不尽。这样，您就能帮助许多人获得释放。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把您的话写成正式记录。您不必为这种话担心”等等。

当然，施拉姆向普鲁士国家的这一位笑里藏刀的官员下了逐客令，并向法国内阁提出抗议，抗议这类访问，于是，施拉姆在10月底被驱逐出法国。

^① 见本卷第257页。——编者注

关于施拉姆是“马克思派”的成员，这一点是普鲁士警察当局从迪茨那里发现的关于退出工人协会的一项声明中了解到的。关于“马克思派”同舍尔瓦尔的密谋毫无关系，这一点是普鲁士警察当局自己向施拉姆承认过的。如果“马克思派”同舍尔瓦尔的密谋之间的联系能够得到证实，那末，这不可能是在科伦发生，而只能是在巴黎发生，因为该派的一个成员跟舍尔瓦尔同时在那里坐牢。但是，普鲁士政府最怕舍尔瓦尔和施拉姆之间的对质，因为这种对质事先会把政府当局希望从巴黎案件中得到的、用以对付科伦被告们的全部结果统统推翻。法国的法院侦查员在释放施拉姆时作出的判决，承认科伦案件和巴黎密谋毫无关系。

施梯伯还作了最后的尝试：

“至于上述的法国共产党人的头子——舍尔瓦尔，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千方百计地四处打听这个舍尔瓦尔到底是谁，但是毫无结果。最后，从马克思本人向一个警探所作的一项秘密声明中才弄清楚，原来此人曾因伪造期票被关进亚琛监狱，1845年越狱潜逃，1848年，在当时的一片混乱情况下被马克思接收入盟，并以同盟特派员的身分被派往巴黎。”

马克思不可能告诉这位 *spiritus familiaris* (家神)——施梯伯的警探：他于1848年在科伦把早在1846年就被沙佩尔在伦敦接收入盟的舍尔瓦尔接收入盟；或者他曾迫使舍尔瓦尔住在伦敦，并迫使他在同一个时期内在巴黎亲自进行宣传；同样，马克思也不能在施梯伯提供证词之前告诉施梯伯的 *alter ego* (第二个“我”)——老牌警探：舍尔瓦尔于1845年在亚琛坐过牢并伪造过期票，因为这一点他恰好是从施梯伯的证词中知道的。也许这一类 *hysteron proteron* (逆序法)^①是只允许施梯伯应用的。古代世界

^① 这是一种错误的方法，它把后面的、以后的 (*hysteron*) 当作最初的、前面的 (*proteron*)，把实际的顺序颠倒过来。——编者注

留下了垂死的角斗士，普鲁士国家会留下发誓的施梯伯^①。

很久很久以来，人们就一直在千方百计地四处打听，这个舍尔瓦尔到底是谁，但是毫无结果。9月2日晚上施梯伯到了巴黎。4日晚上舍尔瓦尔被捕，5日晚上他被从他的牢房押到一个灯光暗淡的房间里去。施梯伯在那里，跟施梯伯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法国警官、亚尔萨斯人，他的德语虽然说得结结巴巴，但是精通德语，并具有警察的记忆力；这个人对虚情假意的、卑躬屈节的柏林警务顾问并没有特别的好感。于是，在这个法国官员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了如下的谈话：

施梯伯用德语说：“您听着，舍尔瓦尔先生，您的法国姓和爱尔兰护照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我们很清楚。我们知道您是莱茵普鲁士的居民。您的名字叫K.，您能否避免一切后果，这完全取决于您自己；您如果老老实实地把一切都向我们坦白出来，那就能达到这一点”如此等等。

舍尔瓦尔表示拒绝。

施梯伯说：“有这么一个人，他伪造了期票并从普鲁士监狱越狱潜逃，现已被法国当局引渡给普鲁士，因此我再一次提醒您，您得考虑考虑，这是一个关系到十二年单独监禁的问题。”

法国警官说：“我们给这个人时间，让他到自己的牢房里去好好想一想。”

舍尔瓦尔被押回他的牢房。

当然，施梯伯不能把话说穿，他不能向公众承认：他企图用引渡和十二年单独监禁的威胁手段来吓唬舍尔瓦尔，逼他招出假口供来。

但是，施梯伯仍然没有打听到，这个舍尔瓦尔到底是谁。他在陪审员面前仍然叫他舍尔瓦尔，而不是叫K.。不仅如此，施梯

^① 双关语：《Stieber》（施梯伯）是姓，又有“侦探”、“暗探”的意思。——编者注

伯也不知道舍尔瓦尔到底在哪里。在10月23日的法庭上,他仍然推测那个人是在巴黎。辩护人施奈德尔第二在10月27日的法庭上质问说:“曾经再三提到的舍尔瓦尔现在不是在伦敦吗?”施梯伯理屈词穷、狼狈不堪,只好回答说,“他不能透露有关这一方面的任何消息,而只能重复那种说什么舍尔瓦尔躲在巴黎的谣传”。

普鲁士政府经常遭到厄运:它总是被愚弄。法国政府允许它从火中取出德法密谋之栗,但是不允许它把栗子吃掉。舍尔瓦尔竟能博得法国政府的好感,它使他有可能在巴黎陪审法庭结束案件的审理工作以后,过几天就跟吉佩里希一起逃到伦敦去。普鲁士政府曾指望用舍尔瓦尔作为科伦案件的工具,但是这个工具只不过为法国政府又物色了一个间谍²⁹⁶。

在舍尔瓦尔假逃跑的前一天,有一个普鲁士的 faquin (无赖汉)来到他那里;这个人身穿黑礼服,镶着袖头,留着一撮向上翘的黑胡子,短短的头发稀稀落落,而且已经斑白了,总之,这是一个挺体面的男人。后来,据介绍,这个人是普鲁士的警监格莱夫,随后他还作了自我介绍,也说他是格莱夫。格莱夫是凭他那个未经警察局长而直接从警务总长那里得到的通行证去会见舍尔瓦尔的。警务总长对哄骗他所心爱的普鲁士人的那种主意大为开心。

格莱夫说:“我是普鲁士官员,是奉命前来同您谈判的;没有我们,您永远出不去。我向您建议。您应当向法国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它把您引渡给普鲁士;它早就答应我们这样做了。我们需要您在那里作科伦的证人。当您完成自己的使命和将来案件结束时,我们一定会把您释放,决不食言。”

舍尔瓦尔说:“我没有你们也能出去。”

格莱夫确有把握地说:“这不可能!”

格莱夫还召来了吉佩里希,建议他以共产党特派员的身分到

汉诺威去五天。而这个建议也没有奏效。第二天，舍尔瓦尔和吉佩里希就溜之大吉了。法国官员们洋洋得意，笑逐颜开，关于这一不幸事件的紧急情报已经发到柏林，而施梯伯在10月23日仍然发誓证明说，舍尔瓦尔是在巴黎；甚至在10月27日，他还是不能提供出任何情报，而只是从谣传中得知舍尔瓦尔藏“在巴黎”。同时，警监格莱夫在科伦审讯期间曾三次到伦敦去访问舍尔瓦尔，以期顺便从他那里打听打听奈特在巴黎的住址，指望从他手里收买到对付科伦人的证词。但是一无所获。

施梯伯有理由把他同舍尔瓦尔的关系隐瞒起来。因此，K·仍然是舍尔瓦尔，普鲁士人仍然是爱尔兰人，施梯伯直到现在还不知道，舍尔瓦尔在哪里，也不知道“舍尔瓦尔到底是谁”^①。

在舍尔瓦尔同吉佩里希的来往信件中，泽肯多尔夫—泽特—施梯伯的三人合唱队终于得到了它所需要的东西。

“卡尔·穆尔是吸血鬼，
我把他当作榜样。”²⁹⁸

① 甚至在“黑书”²⁹⁷里，施梯伯还是不知道舍尔瓦尔到底是谁。在第2册的第38页上，在№111下面提到了“舍尔瓦尔”，同时标出：“见克列美尔”，而在№116下面则说：“正如从№111中所看到的，克列美尔曾化名舍尔瓦尔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展开了极其广泛的活动。他也用过弗兰克这个盟内代号。1853年（应当是1852年）2月，他（当时所用的名字是舍尔瓦尔）被巴黎陪审法庭判处八年监禁，但很快就逃出监狱，到伦敦去了。”在该书第2册里，载有嫌疑分子的履历表（按字母顺序排列并依次编号），但施梯伯在这一册里对舍尔瓦尔还是一无所知。他已经忘记了，他在第1册的第81页上曾这样承认过：“舍尔瓦尔原来就是一个名叫约瑟夫·克列美尔的莱茵官员的儿子，他（好一个他！老子还是儿子？）竟滥用自己石版匠的手艺伪造票据，因而被捕，但在1844年他从科伦的（不对，从亚琛的！）监狱逃了出来，先到英国，后来又到巴黎。”大家不妨把这一点同上面引证过的施梯伯在陪审员面前所提出的证词比较一下。警察局在任何时候都绝对不能说真话的。（恩格斯在1885年版上加的注）

为了使舍尔瓦尔给吉佩里希的信深深地印在代表陪审法庭的三百名主要纳税者的顽固头脑里去，这封信被荣幸地宣读了三遍。凡是熟悉内情的人，透过它那种天真的、吉卜赛人的热情，一眼就能识破这是一套企图吓唬自己和小丑把戏。

其次，舍尔瓦尔及其同志跟民主派对 1852 年 5 月第二个星期日²⁹⁹的那种能奏奇效的力量抱有共同的希望；他们决定在这一天参加革命事变。施米特—弗略里妄图使这种固定观念具有计划的形式。这样一来，舍尔瓦尔及其同志就陷入了密谋的法律范畴。因此，通过他们就获得了一项证据：即使科伦的被告们没有组织反对普鲁士政府的密谋，那末，显然舍尔瓦尔派无论如何曾组织过反对法国的密谋。

普鲁士政府企图通过施米特—弗略里来制造施梯伯发誓证实的、巴黎密谋和科伦被告们之间的虚构的联系。施梯伯—格莱夫—弗略里，这种三位一体在舍尔瓦尔的密谋中起了主要作用。下面我们还会看到这种三位一体的工作情形。

我们可以把上述的一切概括如下：

甲是共和主义者，乙也自称是共和主义者。甲和乙的关系是敌对的。乙受警察局的委托制造定时炸弹。甲因此被告发。如果制造定时炸弹的不是甲，而是乙，那末，甲的罪过就在于他同乙的关系是敌对的。为了揭发甲，乙被召去作反对他的证人。这就是舍尔瓦尔密谋的可笑的一面。

当然，这类逻辑在公众面前已站不住脚了。施梯伯的“事实的”揭发已化为一股熏天臭气；检察院只是诉苦说“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需要新的警察奇迹。

四 原本记录

在10月23日的法庭上,庭长^①指出:“正像警务顾问施梯伯向他宣布的那样,施梯伯还要提供新的重要证据”,为此,他要再一次把上述的证人召来。施梯伯向前蹦了一下,开始新的演出。

在这以前,施梯伯所描述的是维利希—沙佩尔派的活动,或者简言之,舍尔瓦尔派的活动,即这一派在科伦被告们被捕以前和以后的活动。不论在被告们被捕以前或被捕以后,施梯伯关于他们本身都只字不提。舍尔瓦尔的密谋是发生在这些被告被捕以后,而施梯伯现在却说:

“在这以前,我在我的证词中所描述的,只不过是这些被告被捕以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内部情况及其盟员的活动。”

这样说来,他承认舍尔瓦尔的密谋“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内部情况及其盟员的活动”并没有任何关系。他承认他在这以前所提供的证词是毫无用处的。他对他在10月18日提供的证词太漠不关心,竟认为继续把舍尔瓦尔和“马克思派”混为一谈简直是多此一举。

他说:“首先还存在着维利希派,在这以前,只抓到了该派中在巴黎的舍尔瓦尔,等等。”

^① 即哥贝尔。——编者注

啊哈！这就是说，主要的首领舍尔瓦尔就是维利希派的首领。

但是，施梯伯现在应当提供**最重要的**报告，不仅是**最新的**，而且是**最重要的**。最新的和最重要的呵！如果不强调在这以前所提供的证词的不重要性，那末这些最重要的报告就会失去它们的重要性。施梯伯暗示，在这以前，其实我什么也没有报告，而只是现在我才开始。注意！在这以前，我报告的是被告们敌对的舍尔瓦尔派的情况，老实说，这同案件毫不相干。现在我来报告一下“马克思派”的情况，所谈的也只是该派在这次案件中的情况。可是，施梯伯不可能说得那么简单明了。因此他这样说：“在这以前，我所描述的是被告们被捕**以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现在，我要描述一下被告们被捕**以后**的同盟。”他甚至能够用他的那一套特技使纯粹修辞上的词句具有伪誓的性质。

科伦的被告们被捕以后，马克思似乎组织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

“这一点，可以从已故警察厅长舒耳茨悄悄地派进伦敦同盟并跟马克思有直接来往的一个警探的证词中看出来。”

这个新的中央委员会作过记录，而这个“**原本记录**”目前在施梯伯手里。原本记录证实了在莱茵省、在科伦，甚至就在法庭里的可怕的阴谋活动。记录中载有被告们从监狱中跟马克思通信的证据。一句话，迪茨的档案是旧约全书，而原本记录则是新约全书。旧约全书是用结实的油布包装的，而新约全书则是用绯红的皮面精装的。红的皮面在任何情况下都是 *demonstratio ad oculos*（明显的证据），然而，现今的世界比多马时代更不信神了；它甚至不相信亲眼看到的東西。自从摩门教 300 被发现以来，现在谁还相信旧约或新约全书呢？可是，同摩门教并非毫不相干的施梯伯却要规定这

样做。

“当然，”——摩门教徒施梯伯说，——“当然有人会反驳我说：这一切只不过是可鄙的警探们的胡说八道，但是，”——施梯伯发誓作证说，——“但是我有充分的证据，能证明他们所提出的报告是正确的、可靠的。”

说得多么好啊！正确的证据和可靠的证据！而且还是充分的证据！充分的证据！而这是一些什么样的证据呢？

施梯伯早就知道：

“马克思同审前羁押的被告们进行秘密通信，但是我没能发现他们通信的线索。而在上个星期日，一位伦敦来的特别信使给我带来了一份报告说，进行这种通信的秘密地址终于发现了；这是一个住在旧市场的当地商人德·科特斯的地址。这位信使还交给我一份伦敦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原本记录；这个本子是用钱从一个同盟盟员那里买到的。”

原来，施梯伯同警察厅长盖格尔和邮政总局勾结在一起了。

“好在曾经采取了必要的预防措施，要不然，再过两天，晚班的邮政人员就把寄给科特斯的信从伦敦运走了。根据最高检察机关的命令，把信没收并把它拆开。在信里发现了马克思亲笔写给律师施奈德尔第二的一个长达七页的指示。信中指出应该怎样进行辩护……在信纸背面还写着一个大拉丁字母B。照信抄了一份，把容易分开的一部分原信同原信封一起保存起来。然后把信装入信封；外勤警官接到的是这个样子的一封信，该警官是被派去会见科特斯并向他介绍自己是马克思的特派员的”等等。

接着，施梯伯描绘了一出卑鄙的、警察狗腿子式的喜剧：外勤警官怎样扮演马克思的特派员，等等。10月18日，科特斯被捕，二十四小时以后，他声明说：标在信中收信人位置上的拉丁字母B指的是贝尔姆巴赫。10月19日，贝尔姆巴赫被捕，并在他的家里进行了搜查。10月21日，科特斯和贝尔姆巴赫又被释放了。

这个证词是施梯伯在10月23日星期六提供的。“在上星期

天”，也就是10月17日的那个星期天，特别信使带着科特斯的地址和原本记录到来了；信使到达后两天，即10月19日，接到了寄给科特斯的信。可是，科特斯早在10月18日就由于外勤警官在10月17日转交给他的那一封信而被捕了。可见，信到达科特斯手里要比带来科特斯的地址的那个信使早两天，或者说，科特斯10月18日被捕是由于他在10月19日才接到的那一封信。这难道不是时间顺序的奇迹吗？

后来，施梯伯被律师们追问得狼狈不堪，只好说，带来科特斯的地址和原本记录的那个信使是10月10日到达的。为什么是10月10日呢？因为10月10日也是星期天，同时对10月23日来说，也正好是“上”星期天，因此，以往关于上星期天的最初的说法仍然有效，从这一方面来说，伪誓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信就不是信使到达后两天接到的，而是过了整整一个星期才接到的。现在，伪誓的对象已变成信，而不是信使了。施梯伯的誓言简直就跟路德心目中的农民一模一样。如果帮助他从这一边爬上马背，他就会从另一边滚下马去。³⁰¹

最后，在11月3日的法庭上，从柏林来的警监戈德海姆这样说：10月11日，即星期一，从伦敦来的警监格莱夫已当着他 and 警察厅长维尔穆特的面把记录本转交给施梯伯了。这样，戈德海姆就是指控施梯伯犯有双重伪誓罪。

盖有伦敦邮局邮戳的原信封证明，马克思是在10月14日星期四把写给科特斯的信交给邮局的。这样，信就应当在10月15日星期五晚上到达。因此，在接到信前两天带来科特斯的地址和原本记录的那个信使，应当在10月13日星期三出现。但是他既不可能在10月17日到达，也不可能于10日或11日到达。

不管怎样，格莱夫这个信使毕竟已把他的原本记录从伦敦带给施梯伯了。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本子呢？施梯伯和他的同事格莱夫一样，也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因此，他没有马上把它提交给法庭，因为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已经不是在马扎斯³⁰²的监狱铁窗后面所获得的口供。在这个时候，恰好收到了马克思写的信。这帮了施梯伯的大忙。科特斯只起了姓名地址的作用，因为信本身并不是写给科特斯的，而是写给标在装在信封里的信纸背面上的那个拉丁字母 B 的。可见，科特斯实际上至多只是一个地址。不过，我们暂且假定这是一个秘密的地址。其次，暂且假定这是马克思同科伦被告们通信的那个秘密地址。最后，暂且假定我们的伦敦警探们已委托同一个信使把原本记录 and 这个秘密地址同时带走，信是在信使以及地址和记录本到达后两天接到的。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一箭双雕。一则，我们证明了同马克思秘密通信这一事实是存在的，二则，我们证明了原本记录的确实性。原本记录的确实性为地址的正确性所证实，地址的正确性又为信件所证实。我们的警探们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为地址和信件所证实，原本记录的确实性又为我们的警探们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所证实。Quod erat demonstrandum. (这就是需要证明的。)接着是外勤警官演出的愉快的喜剧；后来又是秘密逮捕——公众、陪审员和被告本身都大为震惊。

但是施梯伯为什么不叫他的特别信使在 10 月 13 日到达呢，这不是轻而易举的吗？因为不然的话，他便不成其为特别的了；因为，正像我们所看到的，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是普鲁士警务顾问的弱点，而翻阅普通的日历在他看来则是失尊严的。除此之外，原来的信封是保存在他自己手里的；因此，谁能够弄清楚这件事呢？

可是，施梯伯在他的证词中由于对某一事实讳莫如深，早就弄得声名狼籍了。如果他的警探知道科特斯的地址，那末，他们也就知道用装在信封里的信纸背面上的暗号 B 作为掩护的那个人了。施梯伯对拉丁字母 B 的秘密一无所知，因此竟在 10 月 17 日下令在监狱里搜查贝克尔，以便从他那里找到马克思的信。他只是从科特斯的供词中才知道字母 B 指的是贝尔姆巴赫。

可是，马克思的信是怎样落到普鲁士政府手里的呢？原因很简单。普鲁士政府经常把委托给它的邮局的信件拆开，而在科伦案件审理期间，它特别爱干这种勾当。亚琛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能提许许多多有关这一方面的情况。哪一封信能从政府当局手里溜过去，哪一封信要落到政府当局手里，这全靠碰运气。

同真正的信使一起，原本记录也无影无踪了。可是，当然，在 10 月 23 日的法庭上，当施梯伯洋洋得意地谈他的新约全书，即红皮书的内容的启示时，他还没有怀疑这一点。他的证词的直接结果，就是以证人身分出席法庭的那个贝尔姆巴赫第二次遭到逮捕。

贝尔姆巴赫为什么第二次被捕呢？

因为从他那里查获了文件吗？不是的，因为在他那里搜查之后又把他释放了。他是在科特斯被捕以后二十四小时被捕的。可见，如果他那里有对他不利的文件，那末它们必定会不见了。究竟为什么要把证人贝尔姆巴赫逮捕起来，而让已被确定为不是了解同盟活动情况，就是参加同盟的那些证人——亨策、黑特采尔和施泰因根斯，安然无恙地坐在证人席上呢？

贝尔姆巴赫接到了马克思的信，信中除了对起诉这件事情进行批评以外，并没有谈到别的东西。施梯伯承认这一事实，因为信就摆在陪审员的面前。他不过是用警察式的夸张手法来叙述这一

事实的：“马克思本人经常从伦敦对目前的案件予以影响。”同时，陪审员们给自己提出了像基佐曾向他的选民们提出过的问题：ESt-ce que vous vous sentez corrompus? (你们是否感到自己被收买了呢?) 那末，究竟为什么要把贝尔姆巴赫逮捕起来呢? 普鲁士政府从侦查一开始就力图在原则上系统地剥夺被告们进行辩护的种种手段。律师们由于直接同法律发生抵触，甚至在递上最后的起诉书之后，仍然被禁止同被告们进行联系，这一点他们曾经在公开审判时申诉过。根据施梯伯本人的证词，从1851年8月5日起他手头就已经有迪茨的档案了。但是迪茨的档案并没有附入起诉书内。只是在1852年10月18日举行的公开审判的进程中才把它宣布了一下，同时也只是在有利于施梯伯的限度内宣布的。必需把陪审员、被告和公众弄得惊慌失措，措手不及；必需把律师们弄得在警察式的意外行动面前束手无策。

而在提出原本记录之后是怎样变得热心起来的呵！普鲁士政府生怕揭穿。但贝尔姆巴赫从马克思那里收到的是辩护材料：不难设想，他可能收到有关记录本的说明。通过对他的逮捕，宣布了一项同马克思通信的新罪行，并确定这种罪行应受到监禁的惩罚。这就必然要妨碍每个普鲁士公民交出他的姓名地址来。A bon entendeur demi mot. (对懂得的人来说，半句话就够了。) 贝尔姆巴赫的被监禁是为了排除辩护材料。贝尔姆巴赫要坐五个星期的牢。如果审判一结束就马上把他释放，那末，普鲁士法庭无异就公开承认它是俯首贴耳、卑躬屈节地服从于普鲁士警察当局的。贝尔姆巴赫是 ad (为了) 普鲁士法官的 majoren gloriam (莫大的光荣) 而坐牢的。

施梯伯发誓作证说：

“在科伦被告们被捕之后，马克思又在伦敦纠集了他的党的残余分子，组织了一个大约由十八个人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等等。

这些残余分子从来没有散过伙，一直是纠集在一起的，因此他们从1850年9月起就经常组织 private society (私人团体)。施梯伯用一道最高当局的命令迫使它们消失，以便在科伦被告被捕之后用另一道最高当局的命令又使它们复活，并以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形式出现。

10月25日星期一，在伦敦收到一份“科伦日报”，上面刊载了关于施梯伯在10月23日所作的证词的报告。

“马克思派”既没有建立过新的中央委员会，也没有作过自己的会议的记录。它很快就了解到，新约全书主要是由**汉堡的威廉·希尔施**捏造出来的。

1851年12月初，希尔施以共产主义流亡者的身分参加了“马克思的协会”。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汉堡方面的来信揭发他是一个密探。可是当时决定允许他在协会里留一个时期，以便对他进行考察，获得他究竟有罪还是无罪的证据。在1852年1月15日的集会上，曾宣读了一封科伦来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的一位朋友告诉他说，审判照例延期，并说甚至亲人也很难同被捕者见面。同时信中还提到了丹尼斯博士夫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集会以后，无论是在“近在咫尺的地方”或者是在远方都不见希尔施了。1852年2月2日，马克思从科伦接到通知说，根据警察当局的秘密报告，曾在丹尼斯博士夫人那里进行了搜查；据这个秘密报告称，丹尼斯夫人写给马克思的信似乎在伦敦共产主义协会里宣读，并且委托马克思给丹尼斯博士夫人写回信，说他，即马克思，正在进行德国的同盟的改组工作等等。这个秘密报告被逐字逐句

地照抄在原本记录的第一页上。——马克思立即回信说，因为丹尼尔斯夫人从来没有给他写过信，所以他不可能宣读她写给他的信。整个秘密报告是由一个叫希尔施的不正直的青年人捏造出来的；此人为了捞到钱，毫不费力气地给普鲁士警察当局编造它所必需的种种谎言。

从1月15日起，希尔施不见了，他不参加会议了：现在他已被最后开除出协会。同时还决定转移协会的集会地点和改变开会日期。在这以前，照例是每星期四在西蒂区的法林顿街商场内约·威·马斯特尔斯家里集会的。现在，会议日期改在星期三，地点改在索荷区王冠街上的“玫瑰和王冠”小酒店。“警察厅长舒耳茨能够使希尔施不声不响地直接接近马克思”，尽管有了这种“接近”，但是希尔施过了八个月还是不知道协会的集会地点和开会日期。不论在2月以前或以后，他在编造“原本记录”时，老是硬把会议编在星期四，并把会议标上“星期四”的字样。只要翻开“科伦日报”，我们就会发现：1月15日（星期四）的记录，以及1月29日（星期四）的记录、3月4日（星期四）的记录、5月13日（星期四）的记录、5月20日（星期四）的记录、7月22日（星期四）的记录、7月29日（星期四）的记录、9月23日（星期四）的记录、9月30日（星期四）的记录。

“玫瑰和王冠”小酒店老板向马尔波罗街的治安法官作了如下的声明：“马克思博士的协会”从1852年2月起每逢星期三都在他的店里集会。希尔施硬说李卜克内西和林格斯是他的原本记录的记录员，他们在上述的治安法官面前出示了自己的签名。最后，还弄到了希尔施在施泰翰工人协会³⁰³里所作的记录，因此，就可以把他的笔迹同原本记录上的笔迹加以比较。

可见，原本记录已证明是捏造的，甚至在这里没有必要对它的内容进行批判，因为它的内容由于本身矛盾百出已不攻自破了。

困难在于把文件送给律师。普鲁士邮局只不过是普鲁士国境一直布置到科伦的一种前哨^①，其目的在于切断对辩护人的武器供应。

人们不得不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进行这项工作，以致 10 月 25 日寄出的第一批文件，直到 10 月 30 日才能到达科伦。

因此，律师们一开始就只好使用在科伦能够得到的一点点辩护材料。施梯伯受到了第一次打击，这种打击是来自他根本没有料想到的方面的。法律顾问、丹尼尔斯博士的岳父、可敬的法学家、因思想保守而著称的市民弥勒，10 月 26 日在“科伦日报”上发表声明说，他的女儿从来没有同马克思通过信，施梯伯的原本记录是一种“欺骗”。1852 年 2 月 3 寄往科伦的信——信中马克思说希尔施是个警探，是伪造警察情报的人——是偶尔被发现并交给了辩护人的。在“马克思派”关于退出大磨坊街协会的声明（该声明存放在迪茨的档案里）中，发现了 W·李卜克内西的真正笔迹。最后，律师施奈德尔第二从科伦济贫所的秘书比恩包姆那里收到了李卜克内西的亲笔原信，从私人文书施米茨那里收到了林格斯的亲笔原信。在法庭秘书外，律师们一方面把记录本同退出协会的声明中的李卜克内西的笔迹作了比较，另一方面又把记录本同林格斯和李卜克内西的信件作了比较。

已被法律顾问弥勒的声明弄得心慌意乱的施梯伯，得到了有不祥之兆的研究笔迹的消息。为了预防带有威胁性的打击，他在

^① 双关语：《Post》是“邮局”；《Vorposten》是“前哨”。——编者注

10月27日的法庭上又插嘴进来，声明说：

“李卜克内西在记录本上的签名同已经在其他各种文件上碰到的他的各次签名迥然不同，他认为这种情况很值得怀疑。因此，他作了一番较为详细的调查以后，才发现该记录的签名人原来叫做H·李卜克内西，而在其他各种文件上碰到的李卜克内西这个姓的前面，写的是字母——W。”

律师施奈德尔第二质问道：“谁告诉他还有一个H·李卜克内西”，施梯伯拒绝回答。施奈德尔第二又问他，林格斯和乌尔麦尔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他们这两个记录的姓是跟李卜克内西的姓同时在记录本上出现的。施梯伯感到面临着新的威胁。他三次假装没有听见别人提出的问题，竭力掩饰自己的慌张，又拚命保持镇定，一连三次毫无理由地唠叨什么他是怎样得到记录本的。最后，他支吾其词，喃喃自语地说，林格斯和乌尔麦尔也许不是真名，而只不过是“盟内代号”。对于记录本上经常提到丹尼尔斯夫人是马克思的通信人一事，施梯伯这样解释说，可能需要**读作**：丹尼尔斯博士夫人，而需要把这**理解为**公证人贝尔姆巴赫的助手。律师冯·洪特海姆问他希尔施是个什么样的人。施梯伯发誓作证说：

“他**也不认识**这个希尔施。但是据传这个人并不是普鲁士警探，原因是普鲁士方面曾经对这个希尔施本人进行过监视。”

施梯伯作了一下手势，于是戈德海姆就急忙地发出尖叫：“1851年10月，他曾经被派到汉堡去捉拿希尔施。”我们将要看到，同是这一个戈德海姆，就在第二天又被派到伦敦去捉拿同一个希尔施。由此可见，硬说什么用现款向流亡者收买过迪茨的档案和原本记录的同一个施梯伯，现在又硬说希尔施不可能是普鲁士警探，因为他是一个流亡者！对他说来成为流亡者已经足够了，因为施梯伯保证他的绝对受贿或者绝对清廉是以需要为转移的。但是，

施梯伯本人在 11 月 3 日的法庭上宣布弗略里是警探，难道这一个弗略里不是政治流亡者吗？

在已发现施梯伯的原本记录漏洞百出以后，他在 10 月 27 日还恬不知耻地说，“他对原本记录的真实性比任何时候都更深信不疑”。

在 10 月 29 日的法庭上，鉴定人把由比恩包姆和施米茨转交来的李卜克内西和林格斯两人的信件同记录本作了一番比较以后，声称，记录本上的签字是捏造的。

检察长泽肯多尔夫在起诉词中说：

“在记录本上发现的材料是同通过别的途径获得的材料相吻合的。但是检察机关根本没有办法证明记录本是真实的。”

这个本子是真实的，可就是缺乏证明其真实性的证据。新约全书呵！泽肯多尔夫继续说道：

“不过，辩护词本身已经证明，记录本里至少包含有许多真实的东西，因为里面有关于在那里提到的林格斯的¹活动情报，而这一点至今还没有一个人知道。”

如果至今还没有一个人知道有关林格斯的¹活动情况，那末记录本也不会提供有关这方面的任何情报。因此，在记录本里谈到的有关林格斯的¹活动的一切，不可能证明记录本的内容，而就其形式来说，倒能够证明“马克思派”的一个成员在记录本上的签字确系捏造。可见，用泽肯多尔夫的话来说，这一切证明了：“记录本里至少包含有许多真实的东西”，——也就是真正的捏造。检察长（泽特—泽肯多尔夫）和邮政总局同施梯伯一道拆开了寄给科特斯的信。可见他们知道信件到达的日期；因此他们知道，当施梯伯最初发誓作证说信使是 17 日到达的，后来又说是 10 月 10 日到达

的，最初是在 19 日接到信的，后来又说是在 12 日接到的时候，他是在违反誓约。他们都是他的同谋者。

在 10 月 27 日的法庭上，施梯伯妄图保持镇定。他担心有朝一日可能从伦敦收到揭发性的文件。施梯伯感到情况不妙，同样，由他所体现出来的普鲁士国家也感到情况不妙。已经到了被当众揭露的地步。因此，10 月 28 日警监戈德海姆被派往伦敦去拯救祖国。戈德海姆在伦敦干了些什么呢？他企图在格莱夫和弗略里的协助下驱使希尔施到科伦去，以 H·李卜克内西的名义发誓证明记录本的真实性。给予希尔施固定的国家津贴。但是希尔施的警察本性发展得并不亚于戈德海姆。希尔施知道，他既不是检察官，也不是警监，也不是警务顾问，因此他没有违反誓约的特权。希尔施已预感到，一旦事情搞糟了，他就会孤立无援。希尔施不愿变成羊^①，尤其不愿变成替罪羊。希尔施断然拒绝了。但是光荣仍然留给普鲁士的基督教德意志政府，因为它曾企图在关系到它的那些被告同胞的脑袋这样一个刑事案件中雇用假证人。

这样一来，戈德海姆就毫无结果地回到了科伦。

在 11 月 3 日的法庭上，在起诉词结束之后和辩护词开始之前，施梯伯迫不及待地又一次地突然插嘴进来：

施梯伯发誓作证说：“他应对记录本作进一步的调查。他已派警监戈德海姆从科伦到伦敦去，委托他去进行这一调查工作。戈德海姆是 10 月 28 日离开的，而是在 11 月 2 日回来的。戈德海姆现在就在这里。”

戈德海姆按照他的上司的手势，慢吞吞地走了出来，发誓作证说：

^① 双关语：《Hirsch》（希尔施）是姓，但也有“鹿”的意思。——编者注

“他到伦敦以后，首先去执警监格莱夫，格莱夫把他带到城区肯辛顿去找警探弗略里，即把记录本转交给格莱夫的那个警探。弗略里向他——证人戈德海姆承认了这一点，并证实他的确是从一个名叫H·李卜克内西的马克思派成员那里得到记录本的。弗略里毫不犹豫地承认了H·李卜克内西出卖记录本的收款条属实。证人在伦敦未能抓到这个李卜克内西，据弗略里断定，因为后者害怕公开露面。他这个证人在伦敦确信：除了某些错误以外，记录本的内容是**完全靠得住的**。尤其是，几个曾参加过马克思召集的许多次会议的可靠警探向他证实了这一点，但这个本子并不是原本记录，而只是载有马克思召集的许多次会议的开会情况的**笔记本**。这样看来，要解释还没有完全弄清楚的本子来源问题，只有以下两个办法：或者是像警探坚决保证的那样，它真的出自李卜克内西之手，他为了掩盖自己的叛变行为，因而不用自己的笔迹书写；或者是警探弗略里从马克思的其他两个朋友、即流亡者德朗克和伊曼特那里得到记录本的札记，同时为了抬高自己的货物的价格，而使这个札记具有原本记录的形式。要知道，通过警监格莱夫已经正式确定，德朗克和伊曼特同弗略里来往频繁…… 证人戈德海姆断言：他在伦敦确信，以往关于马克思召集的秘密会议、伦敦同科伦之间的联系、秘密通信等等的一切情报都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为了证明伦敦的普鲁士警探们就在目前消息还是怎样灵通，证人戈德海姆报告说，10月27日在马克思那里召开了一次绝密的会议；会上讨论了对付记录本所必须采取的措施，特别是对付那个对伦敦党来说最头痛的警务顾问施梯伯所必须采取的措施。把有关的决议和文件绝密地寄给了律师施奈德尔第二。就在寄给施奈德尔第二的文件中还有一封私人信件。这封信是施梯伯本人在1848年写给在科伦的马克思的，马克思把它保管得极其严密，因为他希望用这封信来败坏证人施梯伯的声誉。”

证人施梯伯插嘴说，他当时由于遭到无耻的诽谤而写信给马克思，说要控告他，等等。

“除了我和马克思，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这件事情，当然，这是来自伦敦的种种情报的可靠性的最好的证明。”

这样一来，按照戈德海姆的意见，原本记录除了不正确的部分

以外，是“完全靠得住的”。戈德海姆之所以确信它的可靠性，主要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原本记录根本不是什么原本记录，而只不过是“笔记本”。而施梯伯呢？施梯伯决不会感到自己是从极乐世界中跌了下来，相反地，他倒觉得一块石头从他的心上落了地。在最后一瞬间，原告方面的最后一句话刚说完，而辩护人的第一句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出，施梯伯就通过他的戈德海姆一下子把原本记录变成了笔记本。如果两个警察彼此揭露对方的谎言，那末，这不是表明他们两个人都献身于真理呢？施梯伯利用戈德海姆来掩护他的退却。

戈德海姆发誓作证说，“他到伦敦以后，首先去找警监格莱夫，格莱夫把他带到城区肯辛顿去找警探弗略里”。在这以后，谁不会发誓作证说，可怜的戈德海姆和警监格莱夫在一道到达住在老远的城区肯辛顿的弗略里那儿以前，简直就已经弄得精疲力竭了！但是警监格莱夫是住在警探弗略里的家里的，而且正好是住在弗略里家的楼上的，所以，事实上并不是格莱夫带戈德海姆去找弗略里，相反地，是弗略里带戈德海姆去找格莱夫。

“住在城区肯辛顿的警探弗略里”！多么准确呀！普鲁士政府把自己的间谍也揭露出来了，指出了他们的姓名和住址，把他们全都暴露了，这样，你们还能怀疑它的真实性吗！如果记录本是伪造的，那只好请你们去找“住在肯辛顿的警探弗略里”了。真妙！去找十三区的私人文书比埃尔。要知道，如果人们想要准确地指明这个或那个人，那末，就不但要叫出他的姓，而且要叫出他的名。不是弗略里，而是**查理·弗略里**。人们要指出这个人公开进行的某种活动，而不是他秘密从事的职业。可见，这是**商人查理·弗略里**，而不是警探弗略里。而当人们想要说出这个人的住址时，就不但要

指明本身就是一个城市的伦敦的一个区，而且要指明区、街、门牌号码。因此，并不是肯辛顿的警探弗略里，而是肯辛顿区**维多利亚路 17 号的商人查理·弗略里**。

可是，“**警监格莱夫**”，这至少是一种直截了当的说法。但是，如果警监格莱夫在伦敦把自己列入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之内，并从警监变成 attaché (随员)，这是跟审判毫无关系的多么 attachement (令人依恋的人物)。心的意向就是命运的声音。

因此，正像警监戈德海姆所保证的一样，警探弗略里也保证，他是从一个真的保证自己是 H·李卜克内西而且甚至把收款条交给弗略里的人那里得到记录本的。戈德海姆在伦敦只是未能“逮住”这个 H·李卜克内西。这样一来，戈德海姆就可以泰然自若地留在科伦，因为警务顾问施梯伯的保证由于下列情况而变得不太有分量了：他的这些保证只不过表现为由警监格莱夫所保证的警监戈德海姆的那些保证，而警探弗略里又为格莱夫效劳，保证了他的保证。

戈德海姆并不以自己的那一套聊以自慰的伦敦经历而感到难堪，同时他还以他所固有的那种巨大自信力（它必然要代替他的判断力）“完全”相信，施梯伯关于“马克思派”、关于它同科伦的联系等等所发誓作证的“一切都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而在现在，当他的部下戈德海姆把 testimonium paupertatis (赤贫证明书) 交给他的时候，难道警务顾问施梯伯还没有被掩护起来吗？施梯伯通过他那一套发誓作证的伎俩获得了这样一种结果：他把普鲁士的教阶制头脚颠倒过来了。你们不相信警务顾问吗？好。他已败坏了自己的声誉。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就会相信警监。你们不相信警监吗？更好。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至少会相信警探， alias

mouchardus vulgaris (换言之,即普通的密探),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就是发誓的施梯伯所制造的异教徒的概念混乱。

戈德海姆直到现在还证明说,正如他在伦敦所确信的那样,原本记录是不存在的,而关于H·李卜克内西的存在,他只能肯定说,在伦敦没有能“逮住”他;正因为这样,他就确信施梯伯关于“马克思派”的“一切”证词都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在这以后,除了这些否定的论据(按照泽肯多尔夫说法,其中包含“许多真实的东西”)之外,他最终还是不得不提供肯定的论据,来证明“伦敦的普鲁士警探们就在目前消息还是怎样灵通”。他引用了下列情报作为典型例子:10月27日“在马克思那里召开了一次绝密的会议”。在这次绝密的会议上,讨论了对付记录本和“最令人头痛的”警务顾问施梯伯所必须采取的措施。把有关的命令和指示“绝密地寄给了律师施奈德尔第二”。

虽然普鲁士警探们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是这些信件的发送路线对他们来说还是“绝密的”,因此,尽管邮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扣押这些信件。不妨听一听蟋蟀^①是怎样在断垣残壁的窟窿里忧郁地唧唧叫的:“把有关的信件和文件绝密地寄给了律师施奈德尔第二”。对戈德海姆的密探们来说是绝密的。

关于记录本的无中生有的决议不可能是在10月27日在马克思那里召开的绝密会议上通过的,因为马克思在10月25日就已经把证明记录本是捏造的那些基本材料寄走了,虽然不是寄给施奈德尔第二,而是寄给冯·洪特海姆先生。

文件毕竟寄到了科伦,这向警察当局暗示的不仅是它的良心

^① 双关语:《Heimchen》——“蟋蟀”,这个词和Goldheim(戈德海姆)这个姓谐音。——编者注

的不纯洁。10月29日，戈德海姆到达伦敦。10月30日，他在“晨报”、“旁观者”、“观察家”、“先驱报”以及“人民”上发现了一项由恩格斯、弗莱里格拉特、马克思和沃尔弗署名的声明^①；这些人在声明中要求英国公众注意辩护人对 *forgery, perjury, falsification of documents* (捏造、违反誓言、伪造文件)，总之对普鲁士警察当局所干的卑劣行径所进行的揭发。发送文件是如此“绝密”，以致“马克思派”把这件事公开地告知英国公众，诚然，这只是在10月30日，即戈德海姆到达伦敦和科伦收到文件以后的事。

然而，就是在10月27日，也曾往科伦寄过文件。无所不知的普鲁士警察当局是从哪里了解到这件事情的呢？

普鲁士警察当局的活动并不像“马克思派”那样绝密。相反地，它在这以前的几个星期里就已完全公开地在马克思的住宅前面安排了两名密探，他们 *du soir jusqu'au matin, du matin jusqu'au soir* (从晚到早、从早到晚) 都在街上监视他，跟踪他。于是，马克思于10月27日在马尔波罗街的完全公开的治安法庭上当着英国各报的采访记者正式确证绝密的文件，在这些文件上有李卜克内西和林格斯的亲手笔迹以及“王冠”小酒店老板关于会议日期的证词。普鲁士的守护天使们跟踪他，从他的住所跟到马尔波罗街，从马尔波罗街跟到他的住所，又从他的住所跟到邮局。他们只是在马克思绝密地到区的治安法官那里去，要求他下令逮捕这两名“盯梢”时才溜之大吉。

但是，普鲁士政府还有一条门路。这就是，马克思直接通过邮局把10月27日确证过并标有“10月27日”字样的文件寄到科

^① 见本卷第429—430页。——编者注

伦，以防普鲁士之鹰的利爪抓走这些文件的**绝密地**寄出的**副本**。所以，科伦邮局和警察当局知道标有“10月27日”字样的文件是由马克思寄出的，而戈德海姆就大可不必前往伦敦去揭露这个秘密。

最后，戈德海姆感到，他必须从“10月27日召开的绝密会议”上“**特别**”决定寄给施奈德尔第二的那些东西中“特别”指出某种东西来，而他**举出了**施梯伯写给马克思的信。但遗憾的是，马克思寄这封信的日子并不是在10月27日，而是10月25日，而且并不是寄给施奈德尔第二，而是寄给冯·洪特海姆先生。可是，警察当局是从哪里知道马克思还把施梯伯的信保存起来并准备把它寄给辩护人呢？还是让施梯伯再出面来谈一谈。

施梯伯打算采取 *praevénire* (先发制人的行动) 来阻止施奈德尔第二把对他来说如此“令人头痛的信件”公开出去。假如戈德海姆说，我的信是在施奈德尔第二那里，据施梯伯的估计，而且还是由于“同马克思有罪恶的联系”而得到信的，那末，施奈德尔第二就会把这封信隐藏起来，借以证明戈德海姆的密探们的消息不确实，证明他本人同马克思并没有罪恶的联系。因此，施梯伯插了嘴，歪曲信的内容，最后还以盛气凌人的叫喊声结束他的话：“除了我和马克思，任何人都可能知道这件事情，当然，这是来自伦敦的种种情报的**可靠性的最好的证明**。”

施梯伯有一套别出心裁的手法，用以掩盖那种使他感到头痛的秘密。当他不说话的时候，所有的人也必须保持沉默。因此，除了他和一位上了年纪的贵夫人之外，“任何人都可能知道”：他曾经作为她的 *homme entretenu* (面首) 住在魏玛附近。但是，如果施梯伯有种种理由力求使马克思以外的任何人都不知道信的内容，那末马克思就有种种理由力求使施梯伯以外的一切人都知道这封

信的内容。现在我们知道了来自伦敦的种种情报的可靠性的最好的证明。那末施梯伯的最坏的证明究竟是怎样的呢？

但是，当施梯伯发誓作证，说什么“除了我和马克思，任何人都不能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又在有意识地违背誓言。他知道，并不是马克思，而是“新莱茵报”的另一位编辑给他回信的³⁰⁴。无论如何这还是“除了他和马克思之外的一个人”。我们不妨在这里引证一下这封信：以便使更多的人了解它的内容。

在“新莱茵报”第 77 号上刊登了一篇 12 月 21 日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发出的通讯报道，通讯中无耻地捏造说，我以警探的身分到法兰克福去，以一个有民主主义思想方式的人的姿态去侦查杀害利希诺夫斯基公爵和奥尔苏瓦特将军的罪犯的。您可以从附件中看出，21 日我的确是在法兰克福，我在那里总共只呆了一天，唯一的目的是调解当地居民冯·施韦茨勒尔夫人的私事；我早已回到了柏林，而且我在这里恢复我的律师活动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此外，我不妨介绍您去看一下 12 月 12 日的“法兰克福总邮报”第 338 号和这里的“国民报”第 248 号对此所发表的正式辟谣。我相信，由于您热爱真理，我能指望您会马上把所附的辟谣刊登在贵报上，并代我正告那个假报道的作者，正如您理应做的那样，因为我不能让这类造谣中伤的行为不受到惩罚，否则，非常遗憾，我本人将不得不对最可敬的编辑部采取措施。

我认为，近来我对民主所作的贡献比任何人都要大。正是我，使成百的民主派被告摆脱了刑事法的法网。正是我，甚至在这里实行戒严的情况下，当胆小鬼和无耻小人（所谓民主派）早已从战场上逃之夭夭的时候，英勇无畏始终不倦地反对当局并且一直继续到现在。如果民主派的机关报这样对待我，这就难以鼓励我作进一步的努力。

可是，在这一件事情上真正是最好的一点，就是民主派机关报所表现的迟钝。关于我以警探的身分到法兰克福去的谣言，最初是由“新普鲁士报”这家声名狼籍的反动派机关报放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暗中破坏我的妨碍这家报纸的律师活动。柏林的其他报纸早已驳斥了这一点。但是，民主派的报纸却如此平庸无能，竟重复这类愚蠢的谎言。如果我想以密探的身分到法兰克福去，当然所有的报纸事先就不会报道这件事情了；法兰克福有足够的高明官

员，普鲁士何必要派警官到那里去呢？愚蠢是民主派的老毛病，而它的敌人却因狡猾获得了胜利。

同样，有人硬说什么我很多年以前曾在西里西亚当过密探，这也是一种卑鄙的谎言。我当时是被正式任命的警官，并作为警官履行自己的职责。有人到处散布关于我的卑鄙的谎言。哪怕让一个人出来证明，我企图对他阿谀奉迎而取得信任，那也行。扯谎和妄下断语每个人都会。因此，我期待您（我认为您是正直而可敬的人）立即给我满意的答复。我们的民主派报纸由于大肆造谣而弄得威信扫地，您切不可追求这样的目的。

忠于您的

法学等等博士施梯伯

1848年12月26日于柏林骑士大街65号

施梯伯从哪里知道，马克思是在10月27日把他的信寄给施奈德尔第二的呢？但是，信不是在10月27日，而是在10月25日寄的；不是寄给施奈德尔第二，而是寄给冯·洪特海姆的。可见，施梯伯只知道这封信还存在，并推测马克思将把信告诉辩护人中的某一个。可是，这类推测有什么根据呢？当载有施梯伯10月18日提供的关于舍尔瓦尔的证词的“科伦日报”到达伦敦时，马克思给“科伦日报”、柏林“国民报”和“法兰克福报”写了一个声明（载于10月21日），他在声明的结尾用他的还保存着的信威胁施梯伯。为了把信保守“绝对秘密”，马克思亲自在报纸上发表有关信的声明。由于德国的报纸胆小怕事，他遭到了失败，但从此普鲁士邮局便闻名了，而同普鲁士邮局一道，它的施梯伯也闻名了。

这样，唧唧叫的戈德海姆从伦敦究竟带来了什么呢？

这就是：希尔施并不发誓作伪证；H·李卜克内西的存在并不是“可感触到的”；原本记录根本不是原本记录；消息灵通的伦敦密探们知道“马克思派”在伦敦报刊上所发表的一切。为了挽回普鲁士密探们的名誉，戈德海姆把用拆信和偷信的办法探出的①一点

点消息说了出来。

在 11 月 4 日的法庭上,在施奈德尔第二推翻了施梯伯和他的记录本,揭穿了他的借口和违反誓约的勾当之后,施梯伯最后一次插嘴进去,并且大发雷霆。他气愤地喊道,大家甚至竟敢指责维尔穆特先生、警察厅长维尔穆特先生违背誓言。可见,施梯伯又回到正统的教阶制的上升阶梯上来了。在过去,他是按照异端的、按照下降阶梯移动的。如果大家不愿相信他——警务顾问,那就必须相信他的警监;如果不愿相信警监,那就必须相信这位警监的警探;如果不愿相信警探弗略里,那终究要相信下级警探希尔施。而现在则相反。他这位**警务顾问**似乎可以提供假誓言;而**警察厅长**维尔穆特呢?难以想像!在他愤慨时,他就用愈来愈痛苦的心情去颂扬维尔穆特^②,他就用最纯洁的维尔穆特、作为人的维尔穆特、作为律师的维尔穆特、作为家长的维尔穆特、作为警察厅长的维尔穆特、for ever (不朽的)维尔穆特来款待公众。

甚至在现在公开审判时,施梯伯还是千方百计地把被告们 au secret (完全隔离)^③,并在辩护人和辩护材料之间竖起一道屏障。他指控施奈德尔第二跟马克思有“罪恶的联系”。说什么施奈德尔侵害了以他为代表的普鲁士最高当局。就速陪审法庭庭长哥贝尔、就连哥贝尔本人也感到了施梯伯的沉重压力。他无法摆脱这样一种必然性:尽管他谨小慎微、卑躬屈节,他也要在施梯伯背上抽几鞭

① 双关语:《aufgestieberte》——“探出的”这个形容词是与 Stieber (施梯伯) 这个姓谐音。——编者注

② 双关语:《W ermut》(维尔穆特)也有“痛苦”、“苦艾”、“苦艾酒”的意思。——编者注

③ 直译是:单独监禁。——编者注

子。不过施梯伯自持正确。因为弄得臭名远扬的不光是他一个人，还有检察机关、法庭、邮局、政府、柏林警察总局、内阁、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一句话，整个普鲁士国家及其手中的原本记录。

现在施梯伯先生允许刊登“新莱茵报”给他的回信。

可是，让我们跟戈德海姆一起再一次回头来谈谈伦敦。

施梯伯仍然不知道舍尔瓦尔在哪里，舍尔瓦尔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同样，根据戈德海姆的证词（在 11 月 3 日的法庭上），记录本的来源也还没有弄清楚。戈德海姆为了说明记录本的来源，作了两个假定。

他说：“要解释还没有完全弄清楚的本子来源问题，只有以下两个办法：或者是像密探所坚决保证的那样，它真的出自李卜克内西之手，他为了掩盖自己的叛变行为，因而不用自己的笔迹书写。”

大家知道，W·李卜克内西是属于“马克思派”的。但是大家也知道，记录本上李卜克内西的签名并不是 W·李卜克内西。因此，施梯伯在 10 月 27 日的法庭上发誓作证说，这一签名并不是这个 W·李卜克内西的，而是另一个李卜克内西的，即一个叫做 H·李卜克内西的人。他知道有这样一个同姓的人，但是他不能指出自己的消息的来源。戈德海姆发誓作证说：“弗略里证实他的确是从一个叫做 H·李卜克内西的马克思派成员那里得到记录本的。”接着，戈德海姆还发誓作证说，“他在伦敦未能抓到这个 H·李卜克内西”。那末，直到目前为止，施梯伯所发现的 H·李卜克内西究竟给世界，特别是给警监戈德海姆提供了什么样的存在标志呢？除了他在原本记录上的笔迹之外，没有提供任何存在标志；但是，戈德海姆现在声明：“李卜克内西不用自己的笔迹书写”。

到目前为止，H·李卜克内西只是作为笔迹而存在。但是现

在，H·李卜克内西什么也没有留下，甚至连笔迹也没有留下，甚至连一个字母也没有留下。可是，戈德海姆从哪儿知道H·李卜克内西（戈德海姆只是根据记录本上的笔迹才知道他的存在的）是用与记录本上的笔迹不同的另一种笔迹书写的，这一点直到现在仍然是戈德海姆的一个秘密。如果施梯伯能创造自己的奇迹，那末戈德海姆为什么就不能创造自己的奇迹呢？

戈德海姆忘记了他的上司施梯伯已经发誓保证过H·李卜克内西确有其人，忘记了他自己刚刚也发过这种誓。但是就在他发誓作证说什么H·李卜克内西确有其人的同时，他想起了H·李卜克内西是施梯伯不得不采用的一种遁词，是不得不散布的一种谎言，而情急就不顾法律了。他想起了只有一个真的李卜克内西，即W·李卜克内西，如果说W·李卜克内西是真的，那末记录本上的签名便是伪造的。他不敢承认，弗略里的下属希尔施，除伪造了原本记录以外还伪造了签名。因此，他作了一个假定：“李卜克内西不用自己的笔迹书写”。我们也不妨来作一假定：戈德海姆过去一度伪造过钞票。他受到了法庭审判，经查明，钞票上面的签字并不是银行经理的签字。戈德海姆会这样说，先生们，请不要曲解我的话，请不要曲解我的话！钞票是真的。它出自银行经理本人之手。如果他的姓不是他本人签上的，而是别人伪造的，那末这同事情有什么关系呢？“原来他不用自己的笔迹书写”。

戈德海姆继续说道，如果关于李卜克内西的假定是不成立的，那末，或者：

“或者是警探弗略里从马克思的其他两个朋友，即流亡者德朗克和伊曼特那里得到了记录本的札记，同时为了抬高自己的货物的价格，而使这个札记具有原本记录的形式。要知道，通过警监格莱夫已经正式确定，德朗克和

伊曼特同弗略里来往频繁。”

或者？从哪里来的“或者”呢？如果类似原本记录的记录本是由李卜克内西、林格斯和乌尔麦尔三个人签署的，那末，谁也不会从这里得出结论说，“它出自李卜克内西之手”，或者出自德朗克和伊曼特之手，而所有的人都会说，它出自李卜克内西之手，或者出自林格斯和乌尔麦尔之手。不幸的戈德海姆一下子就提高到分开的判断——或者，或者，——难道他还要说“林格斯和乌尔麦尔不用自己的笔迹书写”吗？就连戈德海姆也认为有必要换个别的说法。

正像密探弗略里所断言的那样，如果原本记录不是出自李卜克内西之手，那末，它就是弗略里本人编造的，但他是从德朗克和伊曼特那里得到记录本的札记的。关于他们，警监格莱夫已经正式确定，他们同弗略里来往频繁。

戈德海姆说，“为了抬高自己的货物的价格”，弗略里使这个札记具有原本记录的形式。他不仅进行欺骗，而且他还伪造签名。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货物的价格”。像这位普鲁士密探这样安分守己的人，（他由于贪图私利而编造假记录并伪造签名），无论如何都不会编造假札记。这就是戈德海姆的结论。

德朗克和伊曼特是在 1852 年 4 月间，即在 they 被瑞士当局驱逐出境之后才到伦敦的。但是原本记录的三分之一是由 1852 年 1 月、2 月和 3 月的记录组成的。可见，原本记录中有三分之一无论如何是弗略里在**没有**德朗克和伊曼特在场的情况下编造出来的，虽然戈德海姆也发誓说，或者记录本是由李卜克内西编出来的，或者是由弗略里编出来的，然而**是**根据德朗克和伊曼特的札记编出来的。戈德海姆对此发誓，而戈德海姆虽然不是布鲁士斯，但毕竟

是戈德海姆。

可是，还是这样假定，德朗克和伊曼特是从4月以来就已经把札记交给弗略里了，因为戈德海姆发誓说，“通过警监格莱夫已经正式确定，德朗克和伊曼特同弗略里来往频繁”。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这种来往。

如上所述，弗略里并不是作为普鲁士警探在伦敦出名，而是作为西蒂区的商人、而且还是作为民主派商人在伦敦出名的。他是阿尔坦堡人，作为政治流亡者来到了伦敦，后来跟一个出身于很有声望很富裕的家庭的英国女人结了婚，外表上跟他的妻子和岳父——老企业家、教友派信徒过着俭朴的生活。10月8日或9日，伊曼特以教员的身分同弗略里开始了“私人来往”。但是，根据施梯伯提出的详细证词，科伦是在10日收到原本记录的，而根据戈德海姆的最后一次证词，科伦则是在10月11日收到原本记录的。可见，当弗略里素不相识的那个伊曼特在家里给他上第一课法文课时，他就不仅已经把原本记录装订成红皮精装本，而且已经把本子交给特别信使带到科伦去了。弗略里原来就是这样根据伊曼特的札记创造了自己的记录本。弗略里只是在伊曼特那里偶尔见过一次德朗克，而且那是在10月30日，当时原本记录早已回到它那原来就不存在的状态了。

这样看来，基督教德意志政府并不满足于砸破写字台，偷走别人的文件，诈取假证词，制造臆想的密谋，伪造文件，发伪誓，企图购买假证人，一句话，不满足于为了判科伦被告们的罪所能利用的一切手段。政府当局还竭力给被告们的伦敦朋友扣上肮脏的嫌疑犯的帽子，以便袒护自己的希尔施，对于他，施梯伯发誓作证说，他并不认识他，而戈德海姆则作证说，他不是密探。

11月5日星期五，伦敦收到了一份“科伦日报”，上面刊载了有关陪审法庭于11月3日的开庭情况的报告，庭上听取了戈德海姆的证词。人们马上打听起格莱夫来了，就在同一天查明，他是住在弗略里那里的。与此同时，德朗克和伊曼特带着“科伦日报”到弗略里那里去。他们硬要他读一读戈德海姆的证词。弗略里面色苍白，竭力控制住自己，他假装惊奇的样子，说什么他时刻准备在英国治安法官面前提供驳斥戈德海姆的证词。不过，他事先还必须跟他的律师商量一下。约好在第二天，即11月6日星期六下午见面。弗略里答应在这次见面时把他的已经官方证明的现成的证词带来。当然，他没有露面。因此，伊曼特和德朗克在星期六晚上到他家里去，在这里他们发现了写给伊曼特的这样一个便条：

“在律师的帮助下，一切都已办妥，一旦把人查明，就可进行下一步的工作。今天律师还寄来这件东西。我有事要到西蒂区去一趟，请明天到我这儿来，明天从午饭后到五点钟我都在家。弗·”

在便条的背面还附着这样几句话：

“我刚刚回到家里，但我又不得不跟威纳尔先生和我的妻子一道出去，这一点你们明天**就会相信**。你们准备什么时候来，请写信给我。”

伊曼特留下了如下的答复：

“我十分惊奇，我现在竟没有在您家里碰见您，因为您又没来赴下午的约会。我要老实对您说，由于上述种种情况，我已经对您有意见了。如果您感到有必要说服我的话，那就请您到我那儿来，而且最迟明天早晨就去，因为我不能向您担保，您这个普鲁士间谍的活动不会成为英国报纸上的议题。伊曼特”

弗略里星期天早晨也没有去。因此，德朗克和伊曼特在星期天晚上又到 he 那里去了一趟（他们装作对他的信任只是在最初一瞬

间发生过动摇),以便从他那里获得声明。不管怎样踌躇和动摇,声明还是写成了。当对弗略里说,他不但要在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姓,而且还要签上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他动摇得特别厉害。声明的全文是:

致“科伦日报”编辑部

本人认识伊曼特先生大约有一个月之久,在这期间,他教我法文课,至于德朗克先生,我是在今年10月30日星期六才初次见到的;

他们两个人谁也没有给我提供过同科伦案件中出现的记录本有关的任何情报;

我并不认识任何叫李卜克内西的人,而且同这个人毫无联系。特此声明。

查理·弗略里

1852年11月8日于伦敦肯辛顿

当然,德朗克和伊曼特深信,弗略里会指令“科伦日报”不要接受有他的署名的任何声明的。因此,他们没有把他的声明寄给“科伦日报”,而把它寄给了律师施奈德尔第二,可是,施奈德尔第二是在案件即将结束时才收到声明的,他已经无法加以利用了。

弗略里虽然不是警察娼妓中的玛丽花[Fleur de Marie]³⁰⁵,但他毕竟是一枝花^①,它将要开放,哪怕仅仅是一枝Fleurs-de-lys(百合花)^②。

记录本的历史到此还没有结束。

11月6日星期六,汉堡的威·希尔施向伦敦弯街的治安法官作了声明,它无异发誓作证说,他本人在格莱夫和弗略里的指使下

① 双关语:《fleur》是“花”,Fleury(弗略里)是姓。——编者注

② 在法国土语中,把在犯人身上所烙的字母/T.F.(travaux forcés,即苦役)称之为Fleurs-de-lys(百合花)。马克思究竟如何正确地描绘了这个人物,可以从附录(见下面第八章³⁰⁶)中看出。(恩格斯在1885年版上加的注)

编造了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出现的原本记录。

这样一来,最初是“马克思派”的原本记录,接着是密探弗略里的笔记本,最后又成了普鲁士警察当局的作品,单纯的警察作品, sans phrase (毫无粉饰的)警察作品。

就在希尔施向弯街的英国治安法官泄露原本记录的秘密的那一天,另一个普鲁士国家代表在肯辛顿弗略里家里大忙了一阵子,这一次却不是把偷来的文件,也不是把伪造的文件和其他各种文件,而是把自己的家私什物包上了结实的油布。这只鸟儿不是别人,正是格莱夫^①,这是一位全巴黎都熟悉的人物,科伦的特别信使、伦敦的普鲁士警探头子、演出神秘剧的官方指挥者、被派到普鲁士大使馆里去当随员的警监。格莱夫接到了普鲁士政府的立即离开伦敦的命令。一分钟也不得耽误。

在歌剧演出结束时,一直被侧面布景掩盖着的、被布置成半圆形逐级上升的后台布景,突然被五色灯光照得通明,它的光耀夺目的轮廓展现在观众的面前;同样,在这出普鲁士警察的悲喜剧演出结束时,被掩盖着的、被布置成半圆形逐级上升的这一个伪造原本记录的小作坊也展现在观众的面前了。站在最低一个台阶上的是那个不幸的、按件取酬的警探希尔施;站在第二个台阶上的是那个资产者密探和 agent provocateur (奸细)、西蒂区的商人——弗略里;站在第三个台阶上的是那个外交警监格莱夫;站在最高一个台阶上的则是格莱夫被派到那里去充当随员的那个普鲁士大使馆本身。在六个到八个月当中,希尔施一直按时地、逐周地在弗略里的监督之下在工作室里伪造他的原本记录。但是,在弗略里的上面

^① 双关语:《Greið》(格莱夫)也有“兀鹰”的意思。——编者注

一层住的是普鲁士警监格莱夫，他监视弗略里并指导他。格莱夫本人照例地在普鲁士大使馆里度过一天的一部分时间，在那里也有人监视他并指导他。可见，普鲁士大使馆是原本记录赖以生长的原来的温室^①。因此，格莱夫必然溜之大吉。他是在 1852 年 11 月 6 日溜走的。

原本记录再也不能死死抓住不放了，即使是笔记本也是如此。检察官泽特在他回答律师们的辩护词时已把这个记录本埋葬了。

这样一来，人们又回到了上诉法院的检察院鉴于“**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而发布的需要重新开始侦查的命令所由产生的那个出发点去了。

① 在巴塞尔出版的 1853 年版本上，在这几个字后面还有其他版本上所没有的两句话：“因此，格莱夫必然溜之大吉。在伦敦等待他的耻辱也落到了普鲁士大使馆的身上了。”——编者注

五 “红色问答书”的附函

在 10 月 27 日的法庭上，克雷弗尔得的警局督察员荣克尔曼提供了如下的证词：

“他没收了一个包有几本‘红色问答书’的小包裹，是寄给克雷弗尔得的一家旅馆的招待员的，上面盖有杜塞尔多夫邮局的邮戳，其中有一个附函。发信人不详。”“据检察机关说，看来附函是出自马克思之手。”

在 10 月 28 日的法庭上，鉴定人(???)莱纳德认为，附函是马克思写的。这一附函是这样写的：

公民！

因为我们完全信任您，所以我们现在把五十本“红色问答书”寄给您，您务必在 6 月 5 日星期六晚上十一点钟把它们悄悄地塞进被公认为有革命信念的公民们、最好是工人们的家门里去。我们满怀信心地指望您的那种公民的英勇行为，因此我们等待您完成这一指示。革命比某些人所想像的更迫近了。革命万岁！

致以

敬礼和兄弟般的情谊

革命委员会

1852 年 5 月于柏林

证人荣克尔曼还说，“上面提到的包裹是寄给证人基安奈拉的”。

在科伦被告们的审前羁押期间，柏林的警察总监辛凯尔迪充当了总指挥，他领导着耍了种种手腕。他不让莫帕专美于前。

在法庭辩论时，到场的有两个警察厅长——一个活的，一个死的；一个警务顾问——而这就是施梯伯；两个警监，其中一个经常从伦敦跑科伦，另一个则经常从科伦跑伦敦；许许多多警探和下级警探，他们有时用真名，有时又匿名，有时用五花八门的名字，有时又用化名，带尾巴的和不带尾巴的；另外还有一个警局督察员。

载有 10 月 27 日和 28 日的证人证词的那份“科伦日报”一到伦敦，马克思就到马尔波罗街的治安法官那里，把“科伦日报”上引证的附函全文转抄了下来，并请求予以证实；同时，他作了相当于誓词的如下的声明：

- (1) 他未曾写过上述的附函；
- (2) 他只是从“科伦日报”上才知道有这封附函；
- (3) 他从未见过所谓的“红色问答书”；
- (4) 他从未以任何方式帮助散发过这种“红色问答书”。

应当顺便指出，这个声明 (declaration) 是向治安法官提出的，如果它是假的，那末，在英国就会招致违背誓言的种种后果。

上述文件已经寄给施奈德尔第二，同时还发表在伦敦“晨报”上^①，因为在案件审理期间可以确信：普鲁士邮局把邮局有责任将委托给它的信件对收信人保守秘密这样一种奇怪的想法同遵守通信秘密扯在一起了。最高检察机关反对审查这个文件，即使只是为了对照一下。最高检察机关知道，只要稍微浏览一下附函原件，然后再看一下马克思的经官方证明的抄件，就足以使有意伪造马克思笔迹这件事甚至连我们的陪审员的锐利目光也蒙混不过去。因此，为了维护普鲁士国家的道义上的声誉，它反对作任何对照。

^① 见本卷第 431—432 页。——编者注

施奈德尔第二指出，

“情愿给警察当局提供有关假想的发信人的情报并以密探身分直接为警察当局效劳的收信人基安奈拉，根本不是指马克思”。

即使只读过马克思写的一行字的人，都不会断言，这一封充满戏剧性的附函是马克思写的。在6月5日的夏夜里，在半夜三更的睡梦中，把“红色问答书”悄悄地塞到革命庸人们的家门里去这样一种讨厌的显然受人指使的行动，很能表明金克尔的性格，就像“公民的英勇行为”以及“指望”用来在军事上“完成”这一“指示”的“满怀信心”很能表明维利希的想像力一样。但是金克尔—维利希怎么能做到用马克思的笔迹写他们的革命处方呢？

如果能够提出关于这封用假笔迹写的附函手稿的“尚未完全查明的来历”的假定，那末这种假定看来就是这样：警察当局在克雷弗尔得发现了五十本“红色问答书”，其中附有一个夸大其辞的、完全是答复质问的附函。警察当局命令——在柏林或科伦，*qu'importe?*（不都是一样吗？）——把附函的原文改成马克思的语气。为了什么目的呢？“为了抬高自己的货物的价格。”

可是，就连最高检察机关在它的堪称反对卡提利纳的演说^①的那个演说中也不敢引用这一附函。检察机关拒绝使用附函。这样一来，该附函对于确定所缺乏的“客观的犯罪构成”并没有提供任何东西。

^① 指西塞罗反对卡提利纳的演说。——编者注

六 维利希—沙佩尔集团

从 1848—1849 年革命失败以来，无产阶级政党在大陆上失去了在这个短短时期中例外地享有的东西：报刊、言论自由和结社权，换句话说，失去了党组织的种种合法手段。尽管在反动时期，资产阶级自由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党都还是能在它们所代表的阶级的社会地位中找到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联合起来并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捍卫自己的共同利益所必需的种种条件。1849 年以后，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如同 1848 年以前一样，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秘密联合**的道路。因此，从 1849 年以来，大陆上出现了一系列秘密的无产阶级联合会；警察当局破获它们，法庭迫害它们，监狱冲散它们的队伍；而形势又经常使它们重新恢复起来。

在这些秘密团体中的一部分是把推翻现存国家政权作为自己的直接目的的。这在法国是正当的，因为在那里，无产阶级已被资产阶级打败，在那里，攻击现存政府是同攻击资产阶级完全一致的。另一部分秘密团体则把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作为自己的目的，而不考虑现存政府的命运。这在像德国这样一些国家里是必要的，因为在那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处于本国半封建政府的压迫之下，因而在那里，对现存政府的胜利攻击并不是破坏资产阶级或所谓中间等级的政权，相反地，必须首先协助它建立统治权。不容置疑，就是这里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也将会再次参加反对

status quo (现存秩序)的革命,但是,为这一革命做准备工作,为它进行宣传鼓动、为它进行秘密活动和组织密谋,都不是他们的任务。他们可以把这种准备工作交给总的形势和直接有关的各个阶级去进行。如果他们不打算放弃自己的党的立场和由无产阶级生存的总条件所直接产生的历史任务,那他们就必须把这种准备工作交给它们去进行。对他们来说,目前的政府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现象,而 status quo 不过是一个短暂的过渡环节,同时,即使跟它搞得筋疲力尽,也只能得到一点点有限的民主。

因此,“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不是一个阴谋家团体,而是一个秘密地进行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团体,因为德国无产阶级被公开地剥夺了 igni et aqua (必需的生活条件)^①,被剥夺了出版、言论相结社的自由。如果这样的团体也进行秘密活动,那末,这只有在蒸汽和电进行反对 status quo 的秘密活动的意义上才会发生。

不言而喻,这种不是把组织未来的执政党,而是把组织未来的反对党作为自己的目的的秘密团体,对于下面这样一些人来说,吸引力是不大的:这些人一方面在秘密活动的那种庄严的、带有戏剧性的斗篷下面竭力掩盖自身的渺小,另一方面又打算在最近革命到来时满足自己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功名心,但是首先千方百计地试图在目前就成为显要人物,在蛊惑宣传的成果中捞到自己的一份,博得那些民主主义的爱吵吵嚷嚷的饶舌者们的拥戴。

因此,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已分离出了一个集团,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已被分离出一个集团,这个集团所要求的即使不是真正的密谋,至少也是密谋的外表,因而坚持同当代的民主主义英雄结成

^① 直译是:火和水。——编者注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ß

zu

Röln.

1853.

卡·馬克思的“揭露科倫共產黨人案件”一書的
1853年波士頓版的扉頁

卡·马克思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
1853年波士顿版的扉页

直接的联盟，——这个集团就是维利希—沙佩尔集团。这一集团的特征就是：维利希跟金克尔一道，在德美革命贷款的活动中是以 entrepreneur [承揽人] 的身分出现的。

关于这一集团对科伦人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多数派的态度，刚才已经说过了；毕尔格尔斯和勒泽尔在科伦陪审法庭开庭时已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白而详尽的阐述。

在结束我们的叙述之前，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过去的情况，看一看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在科伦案件审理期间的所作所为。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施梯伯从该集团那里窃取的文件日期证明，即使在罗伊特干了盗窃勾当之后，该集团的文件还是继续通过某种途径落到了警察当局的手里。到现在为止，该集团仍然没有澄清这个莫名其妙的现实。

沙佩尔最了解舍尔瓦尔的过去。他知道，舍尔瓦尔是在 1846 年由他接受人盟的，而不是在 1848 年由马克思接受人盟的，等等。他对施梯伯的谎言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该集团知道，威胁证人豪普特的信是该集团的成员哈克写的，但是它竟容忍把嫌疑的罪名继续加在被告们的党的头上。

该集团的成员莫泽斯·赫斯，即“共产党宣言”的这个倒霉的拙劣可笑的摹本“红色问答书”的作者³⁰⁷，这个莫泽斯·赫斯不仅亲手写自己的大作，而且亲自把它散发出去，所以他确切地知道，他究竟是把自已的一批批“红色问答书”送给谁的。他知道他自己储存的大批“红色问答书”，马克思一本也没有动过。莫泽斯若无其事地使被告们沉重地背着嫌疑的罪名，说他们的党在莱茵省散发了他那附有戏剧性的附函的“红色问答书”。

该集团一方面采取沉默的办法，另一方面又通过自己的言论跟

普鲁士警察当局狼狈为奸。在审讯期间，该集团并不在被告席上出现，而是以“王室证人”的身分出现的。

亨策，维利希的朋友和恩人，自认曾参加过同盟活动，在伦敦维利希那里呆了几个星期，然后回到了科伦，以便提供反对贝克尔的假证词，其实反对贝克尔的证据要比反对他自己的证据少得多；他证明什么贝克尔在 1848 年是同盟的成员。

黑特采尔从迪茨的档案可以看出，他参加过该集团、从它那里得到了金钱支持、并因参加同盟而一度受到柏林陪审法庭审讯，现在竟以证人的身分出来反对被告们。他提供了假证词，竟把在革命时期偶然发生的柏林无产阶级的武装跟同盟的章程胡扯在一起。

施泰因根斯因自己的信件（见 10 月 18 日的法庭）暴露了：原来他曾经是该集团在布鲁塞尔的主要代理人，现在他在科伦并不是以被告的身分，而是以证人的身分出现的。

在科伦陪审法庭开庭前不久，维利希和金克尔委派了一个裁缝的帮工^①充当特派员前往德国。金克尔虽然并不是该集团的成员，但维利希曾是德美革命贷款的头目之一。

后来突如其来的那种危险当时就已威胁着金克尔：伦敦的委托者们不让他和维利希掌管贷款，尽管他们表示愤怒抗议，那笔钱还是寄回美国去了。因此，金克尔正是在那个时候需要到德国去的摆摆样子的使命和跟德国的摆摆样子的通信，一方面是为了证明在那里总还有革命活动的场所，能使他和美元在活动中得到使用，另一方面是为了寻找金克尔和他的朋友维利希在财务报告（见

^① 即奥·格贝尔特。——编者注

奥·赖辛巴赫伯爵的石印通告)中所记载的那种大量通信的借口、邮资开支的借口,等等。正如金克尔自己供认的,他在德国不论同资产阶级自由派还是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没有什么联系。因此,他也就认错了人,竟把该派的特派员当做德美革命同盟的特派员。这个特派员的唯一任务就是在工人中间进行旨在反对科伦被告们的党的活动。应当承认,时机选得很好,给在最后一瞬间恢复审讯提供了新的借口。普鲁士警察当局完全了解特派员的为人、动身日期和行程。是从哪里了解到的呢?这一点我们就会看到。警察局的密探们出席了他在马格德堡召开的几次秘密会议,并报道了会议上进行讨论的情况。科伦被告在德国和伦敦的朋友们对此简直不寒而栗。

如上所说,11月6日,希尔施向弯街的治安法官供认,他在格莱夫和弗略里的指使下伪造了原本记录。这一步是维利希驱使他走的。维利希和旅馆老板谢特奈尔曾陪他到治安法官那里去。希尔施的供词抄了三个不同的副本,并邮寄给科伦的不同的收信人。

在希尔施刚跨出法庭的门坎回家的时候,就应当立即把他逮捕起来,这是极其重要的。根据在他身上的经官方证实的证词,在科伦遭到了失败的案件有可能在伦敦取得胜利,即使不能使被告们取胜,那至少也是对政府的胜利。但是,相反地,维利希却千方百计地阻挠这一步的实现。关于这一点,他不仅对直接有关的“马克思派”,而且对他自己的同伙,甚至对沙佩尔都守口如瓶。只有谢特奈尔一个人知道他的秘密。谢特奈尔声明,他和维利希一道把希尔施送上了轮船。这就是,按照维利希的打算,希尔施本来应当在科伦提出反对他自身的证词的。

维利希告诉希尔施用什么方法把文件寄出去,希尔施把这一

点转告普鲁士大使馆，普鲁士大使馆又把这一点通知邮局。文件没有到达指定地点，它们就不翼而飞了。过了一些时候，本来无影无踪的希尔施又在伦敦悠然出现了，并在民主派的公开大会上声称，维利希是他的同谋者。

维利希在答复就这件事情向他提出的质问时承认，他从 1852 年 8 月初起又跟希尔施保持了联系，原来根据他的提议，希尔施已在 1851 年被当做密探开除出大磨坊街协会。正是希尔施向维利希泄露了弗略里是个普鲁士间谍，后来又把写给弗略里的和弗略里寄出的全部信件都告诉了维利希。据说，他——维利希曾利用这一手段来监视普鲁士警察当局。

大家知道，维利希近一年来已成了弗略里的密友，并且得到了他的支持。但是，如果维利希从 1852 年 8 月起就知道弗略里是普鲁士间谍，并且深知他的那一套阴谋诡计，那末，他怎么不知道原本记录呢？

他怎么只是在普鲁士政府本身**暴露**了自己的间谍弗略里之后才出面干预呢？

他怎么采取这种干预方式呢？这种方式至多只能使他的同盟者希尔施也从英国溜走，而使经官方证实的弗略里的罪证从“马克思派”手边溜掉。

他怎么继续得到弗略里的支持呢？这个弗略里曾吹嘘从他那里弄到了十五英镑的收据。

弗略里怎么继续在德美革命贷款中进行活动呢？

他怎么把自己的秘密协会的住所和开会地点告诉弗略里，致使普鲁士密探能在隔壁房间把讨论情况记录下来呢？

他怎么把上述的特派员、裁缝的帮工的行程告诉弗略里，甚至

从弗略里那里弄到钱来组织这次负有特殊使命的旅行呢？

最后，他怎么对弗略里说，他指示住在他那里的亨策，叫他应当如何在科伦陪审法庭上作证反对贝克尔^①呢？应当承认，que tout cela n'est pas bien clair（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很清楚的）。

① 维利希和贝克尔的关系是这样的：

“维利希给我写了几封非常有趣的信；我没有回信；但是他情不自禁地向我陈述了自己的新的革命计划。他指定我去使科伦的卫戍部队革命化!!! 不久前我们曾对此捧腹大笑。他的这种蠢举还会使许许多多的人倒霉，因为光是这样一封信就足以保证成百个蛊惑民心的法官³⁰⁸能得到三年的薪俸。如果我在科伦发动了革命，他是不会拒绝担负下一步行动的领导责任的。真够朋友！”（引自 1851 年 1 月 27 日贝克尔给马克思的信）

七 判 决

随着警察当局的秘密一步步地被揭穿，舆论就愈来愈支持被告。当原本记录的骗局被揭穿的时候，大家都在等待宣判无罪。“科伦日报”已经认为自己已不得不向舆论低头，转过身来攻击政府。在这以前，它的各栏一直都只是为警察当局进行诽谤开放的，现在却突然发表有利于被告和怀疑施梯伯的种种短评了。普鲁士政府自知事情弄糟了。它的“泰晤士报”和“纪事晨报”的通讯员们突然开始让国外舆论对不利的结局作好准备。不管被告们的学说怎样有害和骇人听闻，也不管在他们那里发现的文件怎样令人厌恶，但是密谋的事实根据是不存在的，因而他们未必能被判罪。“泰晤士报”的柏林通记员竟那样虚伪地、俯首听命地写报道，这是一种奴才的回声，它反映了普遍存在于斯普界河旁的这个城市的上层分子中间的恐惧心理。当电报闪电般地把陪审员作出的那种“有罪”的宣判从科伦传到柏林的时候，拜占庭宫廷和它的宦官们的那种欢天喜地的心情更是无法压制了。

随着记录本的真相大白，案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陪审员们已无法承认被告有罪还是无罪了；现在他们必须承认的是：被告有罪，还是政府有罪。宣判被告无罪就等于判决政府有罪。

在答复律师们的辩护词时，检察官泽特抛开了记录本。说什

么他不希望使用上面沾有这种污点的文件，他本人认为它是“不可靠的”，这是一个“倒霉的”记录本，它在时间上造成了巨大的无益的浪费，而对案件却毫无裨益；施梯伯受骗是出于值得赞扬的忠于职守，等等。

但是，检察机关本身在自己的起诉书中硬说，记录本里包含有“许多真实的东西”。它绝口不谈记录本是不可靠的，而只是对不能证明它是真的这一点表示遗憾。由施梯伯发誓证实的记录本已失去了真实性，在这同时，由施梯伯发誓证实的舍尔瓦尔在巴黎的那个证词（泽特在自己的答复中曾经不止一次地引证过这个证词）也失去了真实性；普鲁士国家的各有关当局由于在一年半当中进行了极其紧张的活动而拼凑起来的种种事实也随之失去效力。陪审法庭原定在7月28日进行的案件审理工作，竟拖延了三个月之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警察厅长舒耳茨生病。这个舒耳茨是个什么人呢？就是第一个发现原本记录的那个人。但是我们不妨稍微回顾一下以前的情况。在1852年1月和2月间，曾在丹尼斯博士夫人的家里进行了搜查。根据什么？就是根据弗略里转寄给舒耳茨、舒耳茨转交给科伦警察厅、而科伦警察厅又转交给法院侦查员的那个原本记录的头几页；就是原本记录的头几页把法院侦查员引进了丹尼斯博士夫人的房间里去。

尽管有舍尔瓦尔的密谋，检察院在1851年10月还是没有获得所缺乏的犯罪构成，因此，它就根据内阁的命令，下指示开始新的侦查。这次侦查是谁进行的呢？是警察厅长舒耳茨。所以，舒耳茨应当找到犯罪构成。那末舒耳茨究竟找到了什么东西呢？找到了原本记录。他所弄到的全部新材料只不过是记录本上的几页，施梯伯后来下令把它们加以补充和装订成册。为了使原本记录的

产生和成长有必要的时间，被告们被单独监禁了十二个月。鸡毛蒜皮！——泽特大声喊道，他已经在下面这件事情中发现了罪证：辩护人和被告花了八天的时间去清除普鲁士国家的各有关当局不辞劳苦地工作了一年半才填满的那个奥吉亚斯的牛圈^①，为此被告们坐了一年半的监牢。原本记录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情节；它是政府活动的种种线索，即来自大使馆和警察当局、内阁和各地方当局、检察机关和邮政局、伦敦、柏林和科伦等等方面的种种线索的集结点。原本记录对案件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以致把它发明出来，完全是为了制造案件。派信使、发快信、扣留信件、逮捕、违背誓言，无非都是为了使原本记录保持有效，falsa（伪造），无非是为了制造原本记录；企图收买，无非是为了证明原本记录是真的。原本记录的秘密被揭穿就等于巨大案件的秘密被揭穿。

最初，需要警察当局进行创造奇迹的干涉，为的是掩盖案件的那种纯粹的倾向性。“即将进行的揭发将向你们陪审员先生们表明：这一案件并不是具有倾向性的案件”，——泽特用这句话宣告法庭辩论开始。而现在他更强调倾向性，以便把警察当局所进行的揭发置诸脑后。在进行了一年半的审前侦查之后，陪审员们需要能够证明犯罪的客观材料，以期在舆论面前洗刷自己。在演了五个星期的警察喜剧之后，陪审员们又需要“纯粹的倾向”，以期洗清实际材料的污秽。因此，泽特并不满足于迫使检察院作出“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这样一个判决的材料。他还更进了一步。他还企图证明，反对密谋的法律根本不要求什么犯罪构成，而纯粹是倾向性的法律，可见，密谋的概念只不过是合法手续烧死

^① 希腊神话中说奥吉亚斯王的牛圈极其肮脏，转意为藏污纳垢之所。这里指普鲁士政府当局所捏造的全部伪证。——译者注

政治异教徒的一种借口而已。由于应用被告们被捕以后颁布的新的普鲁士刑法典去对付他们，他的企图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个法典似乎包括有减轻惩罚的条款，奴颜婢膝的法庭就以此为借口，允许把它当做似乎具有追究既往的力量的法律来加以应用。

可是，如果案件是具有纯粹倾向性的案件，那为什么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来进行审前侦查呢？这是由于倾向。

因此，如果问题仅仅在于倾向，那末，我们是否应当跟泽特—施梯伯—泽肯多尔夫之流、跟哥贝尔之流、跟普鲁士政府、跟科伦行政区的三百名主要纳税人、跟王室侍卫官冯·明希—贝林豪森和菲尔施坦堡男爵进行一场关于倾向的原则性争论呢？*Pas si bête.*（我们并不那样愚蠢。）

泽特承认（在11月8日的法庭上）：

“几个月以前，当他被委任，即被检察长委任同他一道代表检察机关干预这一案件时，当他因此开始审阅材料时，在他的头脑中首先出现了这样的念头：稍微熟悉一下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因此，他感到自己更应当同陪审员们分享这些研究成果，因为在他看来，他必须从这样一种假定出发：陪审员中间有许多人也许都跟他一样，还很少研究过这类问题。”

所以，泽特买了一本施泰因的著名指南³⁰⁹。

“他今天学到的东西，
明天就想教给别人。”³¹⁰

可是，检察机关遭到了特别的不幸。它去找反对马克思的客观材料，而找到的却是反对舍尔瓦尔的客观材料。它去找被告们所宣传的共产主义，而找到的却是他们与之进行斗争的那种共产主义。在施泰因的指南里虽有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然而就是没有泽特所要找的那种共产主义。施泰因还没有把德国的批判的共产

主义登记上。不错，泽特手中有被告们承认是自己的党的宣言的那个“共产党宣言”。而在这个“宣言”中有一章是专门批判先前所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从而专门批判施泰因登记过的所有大智大慧的。从这一章里想必能清楚地看出被控告的那种共产主义派别同过去所有共产主义派别之间的区别，从而能清楚地看出泽特所反对的那种学说的独特内容和**独特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施泰因都帮不了绊脚石的忙^①。在这里应当懂得，即使仅仅是为了提出控告。现在被施泰因所遗弃的泽特究竟怎样摆脱窘境呢？他肯定地说：

“‘宣言’共分**三章**。第一章的内容是用共产主义观点阐明各类市民(!)的社会地位的历史发展的。(Very fine. (妙极了。))……在第二章里分析了共产党人对无产者的态度……末了，在最后一章里探讨了各国共产党人的态度……”(!) (在11月6日的法庭上)

虽然“宣言”共分**四章**，而不是分**三章**，但是凡是我不知道的东西，我就干脆不去想它。因此，泽特硬说，“宣言”共分**三章**，而不是**四章**。对他来说不存在的那一章正好是倒霉透顶的一章，它的内容是批判施泰因记录过的共产主义的，就是说，它的内容包括被控告的那种共产主义的**独特倾向**。可怜的泽特！最初他缺乏**犯罪构成**，现在他又缺乏**倾向**。

然而，我的朋友，理论在任何地方都是灰色的³¹¹。泽特指出，“所谓的社会问题和它的解决，在最近既已被号召者忙了起来，也已使不被号召者忙了起来。”泽特无论如何是属于被号召者之列的，因为检察长泽肯多尔夫在三个月以前已正式“号召”他研究社

^① 俏皮话：《Stein》(施泰因)是姓，又有“石头”的意思。——编者注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泽特们早就一致地认为：伽利略“并没有被号召”研究天体运动，而只有那些把他说成是异教徒的宗教裁判者才“被号召”研究天体运动！E pur si muove！（而地球依然在运转！）^①

被告们所体现的手无寸铁的革命无产阶级站在由陪审法庭所代表的统治阶级面前；因此，这些被告的罪是老早判定了的，因为他们是站在这样一种陪审法庭面前。如果有某种东西能像动摇舆论那样动摇一下陪审员们的资产阶级良心，那就是暴露无遗的政府的阴谋、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普鲁士政府的腐败。陪审员们自言自语地说，但是，如果普鲁士政府对被告采取如此无耻的、同时又是如此冒险的手段，如果它——比如说——把自己在欧洲的声誉孤注一掷，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们，无论他们的党怎样弱小，想必还是非常危险的，他们的学说无论如何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政府为了使我们免受这个罪恶的怪物之害，它破坏了刑法典的一切法律。为了挽回政府的荣誉，我们也来破坏我们的一点点微不足道的 point d'honneur（荣誉）。让我们来感谢，让我们来判罪。

莱茵的贵族和莱茵的资产阶级用自己的判决：“有罪”来应和法国资产阶级在 12 月 2 日以后所发出的狂吠：“只有盗贼还能拯救财产；只有违背誓言还能拯救宗教；只有私生子还能拯救家庭；只有混乱还能拯救秩序！”

法国的整个国家机构都已经出卖了灵魂。可是毕竟还没有一

① 原来泽特不止一次“被号召”。而在后来他又继续“被号召”——为的是表彰他在这一案件中的功绩——即“被号召”担任莱茵省总检察官之职；在担任这一官职时在任期内拿到了退休的养老金，后来，他接受了临终的圣餐，于是就安安静静地归天了。（恩格斯在 1885 年版上加的注）

个机关像法国的法庭和陪审员那样彻底地出卖灵魂。科伦的陪审员和法庭喊道，让我们胜过法国的陪审员和法官吧。政变后不久，在舍尔瓦尔的案件中，巴黎的陪审员竟宣判罪证比任何一个被告都要多得多的奈特无罪。让我们胜过12月2日政变的陪审员吧。让我们补判勒泽尔、毕尔格尔斯以及其他人所体现的奈特的罪吧。

这样一来，在莱茵普鲁士还存在的那种对陪审法庭的迷信就一扫而光了。显而易见，陪审法庭是特权阶级的等级法庭，建立这种法庭的目的是为了用资产阶级良心的宽广来填补法律的空白。

耶拿!³¹²…… 这就是给需要这类手段来维持生存的政府和需要这种政府来保护的社会所作的最后结论。这就是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最后结论…… **耶拿!**

卡·马克思
议会。——11月26日的表决。
——迪斯累里的预算案

1852年12月10日星期五于伦敦

我关于各个政党在议会中重新掀起的斗争的重要结果所作的预言已经应验了^①。在会议开幕时，反对党对内阁获得了否定的多数；但从那时起，构成这一多数的各个互相竞争的派别彼此削弱了对方。11月26日下院没有通过维利尔斯先生提出的关于贸易自由的“激进的”决议案，而通过了帕麦斯顿勋爵提出的那个模棱两可的修正案，这就表明了议会里各个旧政党之间的普遍的尔虞我诈和它们的普通的分崩离析。

把1846年的法令³¹³说成是一项“英明而公正的”法令的维利尔斯先生的决议案，是背着科布顿和布莱特这些 *par excellence*（最道地的）自由贸易派而拟定的。辉格党决定按自由贸易派的利益行事，可是既不让他们有主动精神，也不让他们在获得预期的胜利以后参加政府。最先建议使用“英明而公正的”这种使内阁感到侮辱的字眼的罗素，表示赞同格莱安的修正案。得到内阁拥护者赞助的皮尔派提出了一项提案，这项提案承认贸易自由在将来是适

^① 见本卷第433—442页。——编者注

宜的,而否认它在过去是适宜的;这一提案使托利党有可能补偿由于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法令而给自己造成的损失。可是,同是这些皮尔派却不赞成迪斯累里的修正案,他们收回了自己的提案,而准备支持最初那个主张贸易自由的决议案。本来已经快要取得胜利的辉格党,由于帕麦斯顿的出场而遭到了失败,后者维护格莱安的修正案,从而在皮尔派的帮助下使内阁拥护者获得了胜利。最后,保护关税派内阁所获得的这一胜利,本身却是承认贸易自由的,因而它激起了至少五十三名最坚决的执政党本身拥护者的反对。形形色色的虚假论据、政党倾轧、议会手腕、相互背叛等等,就是 11 月 26 日辩论的总结,在辩论期间,自由贸易政策被正式承认,不过它是以保护关税派作为解释者,以保护关税派作为代表者,以保护关税派作为未来的执行者。

我在会议召开前写的一篇文章中已经指出:在竞选演说中已拒绝恢复谷物法的迪斯累里,打算通过税收改革来补偿大地主的损失,这种改革使租佃农场主有可能缴纳同过去保护关税政策时期同样的地租^①。迪斯累里解除了农场主目前的一部分税负,把它转嫁给人民群众,于是他就能这样安慰自己:他给日益感到拮据的大地主找到了一个新的手段,它比那种意味着直接拿群众的胃进行投机的旧的不可靠的保护关税制度更有效得多。迪斯累里先生的计划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它是拿他们的钱袋进行投机;这一计划目前体现在他本月 3 日提交给下院的预算案中。而今晚的辩论大概就要决定这个预算案的命运了。

高谈“改善劳动阶级的状况的措施”(Massregeln zur Hebung

^① 见本卷第 424 页。——编者注

der arbeitenden Klassen)已成了德国各邦政府和德国慈善家们的习惯。而迪斯累里先生的预算案则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之为一系列“改善有闲阶级的状况的措施”。可是,就像这类措施在我们的德国各邦政府和慈善家们那里总是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江湖骗术一样,英国财政大臣目前为了有闲阶级的利益而想出来的这个计划也纯粹是一场欺骗,他指望用这种欺骗来促使农场主更加心甘情愿地缴纳现行的高额地租,而答应他们表面上减轻他们的税负;迪斯累里只有借助于某种显然带有真正掠夺城市居民的性质的措施,才有可能用这种幻想来愚弄他们。

迪斯累里早就故作神秘地宣布了自己的预算案,向所有人保证创造出世界第八奇迹。据说他的预算案可以“结束各个阶级之间的利害之争,制止它们之间的殊死的战争”,“使所有的人都得到满足,而不使任何人受到侵犯”,“把各种各样的利益融合成为一个繁荣的整体”,“通过确立”会在将来出现的“新原则来第一次建立起我们的贸易和财政体系之间的和谐”。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已不再在将来出现,而在一星期以前就向英国议会和全世界宣布了的启示吧。像在作这种神秘的启示时所应做的那样,迪斯累里十分庄严地按照一切应有的仪式把它交付审议。1842年,皮尔在阐明自己的财政草案时曾花了两个钟头。迪斯累里则至少讲了五个钟头。他第一个钟头用来详细地证明:“受害者”根本没有受害;第二个钟头他用来说明哪些事情是他不打算为受害者干的,他的这些话同沃尔波尔、帕金顿、马姆兹伯里的声明以及他自己过去的声明是相矛盾的;其余三个钟头则用来说明预算案,列举种种情节来描绘爱尔兰的状况,说明国防问题,说明预定的行政改革以及其他一些有趣的题目。

预算案的要点如下：

(1) **航运**。部分地降低灯塔税，一年中降低的总额约为十万英镑。这就是说，每吨在一年中所减轻的负担不到六便士，而且同时这要到第二年的下半年才能对航运发生某种影响。完全停止征收过境运输税。海军部的某些触犯商船利益的权力被取消了；例如，海军军官在外国港口召募海员时不应当要求立即付给海员薪水，他们应当对遇险的海船予以无报酬的帮助，在港口里不应当把非军事船只从最适合于停泊的地方赶走。最后，应当委派下院的一个委员会来处理领港和船上装载压舱物等项事宜。这就是全部有利于航运的措施。可是，为了使自由贸易派不致由于这些规定对他们作了某种实际的让步而夸口，输入造船用的木材的关税的残余仍然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了。

(2) **殖民地**。允许在缴纳关税以前对砂糖加以精制，这样，今后就要根据为出售而生产的精制砂糖的数量征收关税，而不再按原糖征税。此外，准备鼓励中国人移入西印度，以保证种植场主有足够数量的廉价劳动力。砂糖的级差关税不予取消。

(3) **麦曲税和蛇麻草税**。麦曲税应当降低一半，据迪斯累里说，这将使收入减少二百五十万英镑。同时，蛇麻草税也要降低一半，这又将使收入减少约三十万英镑。这种降低税收的措施应从 1853 年 10 月 10 日起实行。取消现行的禁止外国麦曲输入的规定和现行的外国蛇麻草的进口税，应当规定新的税率，其数额应相当于这些商品所应缴纳的消费税。

(4) **茶叶**。把现在对各种茶叶所征的税从每磅两先令两个半便士降低到一先令；可是这种降低税收的措施应当在六年之中逐步实行：1853 年降低四个半便士，以后每年降低两便士，一直到 1858

年为止。就 1853 年来说,这将使收入减少四十万英镑。

(5) **财产税和所得税**。这种税原定只实施到 1853 年 8 月 5 日为止,现在规定延长三年;这种税的税额照旧,但它的分配应加以改变。对能提供收入的财产的税额和对各种职业的收入税额应当有所区别。不动产和有价证券的税额不变,即每英镑征税七便士,各种职业(农业、商业、自由职业、领薪水的工作)的收入税额则由百分之三降低到百分之二。以后这些收入每英镑将只征收五又四分之一便士。另一方面,免税的收入的最高额,从一年收入一百五十英镑降低到一百英镑,对不动产和有价证券,则降低到一年五十英镑。为了使农场主不致因这些准备实行的改变而遭到某种损失,向他们征税时将不是像现在这样根据地租的一半来征收,而是根据地租的三分之一来征收,这样一来,在改变以后,凡是一年缴纳的地租不到三百英镑的农场主都可以免税。为了对教会表示照顾,凡是一年收入一百英镑的牧师都继续免于纳税。最后,所得税第一次被推广到爱尔兰,但这决不涉及大地主,而仅仅适用于有价证券的收入和薪金。

(6) **房屋税**。规定凡是每年付房租在十英镑以上的租户都要缴纳房屋税,——到现在为止,只是每年付房租在二十英镑以上的租户才缴纳这种税。此外,房屋税数额本身也增加一倍;例如,小店铺应缴的税额由每英镑六便士增加为一先令,住房应交的税额则由每英镑九便士增加为一先令六便士。

总起来说,这一预算案意味着:

一方面,把英国的所得税扩展到那些过去免税的城市居民阶级身上去,并且向爱尔兰的有价证券的持有者和国家官员征收这种税;房屋税则被推广到那些过去不缴纳这种税的城市居民阶级

身上,并把这种税的数额增加一倍。另一方面——把由农业负担的麦曲税和蛇麻草税减少二百八十万英镑;把由航运负担的税额减少十多万英镑,把茶叶税减少四十万英镑。

由于增加所得税、扩大房屋税的缴纳者的范围、把房屋税的税额增加一倍,城市居民的税负加重了;这样做是为了使农村居民的税负减轻二百八十万英镑。因此,小店铺老板、工资收入较高的机械工人和商业职员都成了房屋税的纳税人,并且第一次成了征收所得税的对象。与此相适应,地皮每英镑缴税七便士,住房则每英镑缴税两先令一便士。降低茶叶税并不会改变这种对比关系,因为这一数目同增加的直接税比较起来是微乎其微的,而且从降低茶叶税得到的好处,对农村和城市都是一样的。

免除爱尔兰的大地主的一切所得税,并使英国的农场主和僧侣不受扩大所得税范围的影响,这显然是靠牺牲城市的利益来向农村表示仁慈。可是,从降低麦曲税得到好处的究竟是谁呢?是大地主,是农场主,还是消费者呢?把税降低意味着减少生产方面的风险。按照政治经济学规律,减少生产费用必然会使价格降低,因此得到好处的既不是大地主,也不是农场主,而仅仅是消费者。

可是,这就应当注意以下两种情况。第一,能生长头等大麦的土地,在英国是独占的领地,适合种大麦的土壤只是在诺定昂郡、诺福克等地才有,而外国麦曲的供应,是有自然界限的,因为不论大麦或者麦曲都经不住长途的海洋运输。第二,英国的大啤酒酿造者实际上握有那种主要以现行的进出口贸易许可证制度为基础的垄断权。因此,甚至谷物法的废除也没有使烈性黑啤酒和烈性白啤酒的价格下降。

所以,从降低麦曲税得到好处的既不是农场主,也不是消费

者,这些好处将为大地主和大啤酒酿造者所瓜分。既然消费税征收局仍然对农业进行可恶的干涉,那末,征收以往各种税的半数所需要的行政开支,将同过去征收全数时所需要的相等。现在,为征收一千四百四十万英镑的消费税所需的开支,每一百英镑是五英镑六先令。而把税收减少三百万英镑以后,每一百英镑的开支则为六英镑到六英镑四先令。总而言之,收入愈是减少,非生产开支就愈是增加。

因此,迪斯累里的预算案可以说就是给大地主赔偿损失,而且是“十分慷慨地赔偿”。

可是,这一预算案还有另外一个同样奇特的地方。

如果你们想实行自由贸易派的贸易制度,那末,你们首先就得改变财政制度。“你们应当从间接税回到直接税”,——迪斯累里这样说,而迪斯累里是正确的。

直接税,作为一种最简单的征税形式,同时也是一种最原始最古老的形式,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那个社会制度的时代产物。后来,城市实行了间接税制度;可是,久而久之,由于现代分工,由于大工业生产,由于国内贸易直接依赖于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间接税制度就同社会消费发生了双重的冲突。在国境上,这种制度体现为保护关税政策,它破坏或阻碍同其他国家进行自由交换。在国内,这种制度就像国库干涉生产一样,破坏各种商品价值的对比关系,损害自由竞争和交换。鉴于上述两种原因,消灭间接税制度就愈来愈有必要了。直接税制度应当恢复。可是,直接税不容许进行任何欺骗,每个阶级都精确地知道它负担着多大一份国家开支。因此,在英国,再没有什么比所得税、财产税和房屋税等直接税更不受人欢迎的了。现在不妨问一下:由于自由贸易而

不得不转向直接税制度的英国工业阶级，究竟用什么办法能够实行直接税制度，而不致激起社会的不满，同时也不致增加自己的负担呢？

这只有通过下列三种办法：

向国债进攻。可是，这将是破坏国家信用，是没收，是革命的措施。

把地租变成征税的主要对象。但这也是对财产的侵犯，也是没收，也是革命的措施。

收回教会掌握的财产。但这仍然是对财产的进一步侵犯，仍然是没收，仍然是革命的措施。

科布顿大声喊道：“决不能这样做，我们只应当缩减国家开支，这样，我们也能减轻我们目前的税负。”

这是一种空想。首先，英国和大陆之间的关系要求不断地增加国家开支；其次，科布顿所代表的工业阶级的胜利也要求这样做，因为由于它的胜利，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会变得更加残酷，用于镇压方面的开支也会愈来愈多。换言之，预算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缩减。

综上所述，贸易自由促使转向直接税制度。直接税制度则包含着反对教会、大地主和国家有价证券持有者的革命措施。这些革命措施迫切要求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而这种联盟将使英国资产阶级丧失它可以从贸易自由中得到的主要利益，即资本对劳动的无限统治。

卡·马克思写于 1852 年 12 月 10 日前后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2 年 12 月 2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650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 答科苏特的“秘书”

致“纽约论坛报”编辑

1852年12月14日星期二于伦敦

亲爱的先生！

不久前我写的一篇报道科苏特和马志尼的活动的通讯^①在美国报刊上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应。因此，最近我曾寄给您一篇关于该通讯的说明^②。在那篇说明里（在那里我曾经顺便指出，科苏特本人和那些由于我的通讯而引起的无数文章是毫无关系的，而且我与其说是想反对科苏特等，不如说是想给他们一个警告，等等），我谈了我认为当时必须谈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但是我收到了最近几号的美国报纸，在那里我发现了好像是出自科苏特先生的秘书之手的、对我的报道所做的类似官方辟谣的东西。由于这个“文件”，我必须通知您，科苏特经我询问，已向我肯定地作了如下的说明：

- (1) 目前他根本就没有秘书；
- (2) 上述“辟谣”并未得到他的认可；
- (3) 他在接到我的通知前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

① 见本卷第443—444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12—415页。——编者注

既然有了这样一个“权威的”声明,我就不预备再谈这个问题了。让那些不请自来、不适当地表现殷勤的辩护士去自寻安慰吧。

您的特约通讯员

卡·马克思写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3 年 1 月 4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3656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内阁的失败

1852年12月17日星期五于伦敦

我要赶快告诉你们昨天晚上使内阁失败的一场辩论的结果。

在内阁大臣们遭到这次总的失败之前，他们那位最勇敢的战士军务大臣阿基里斯·贝雷斯福德³¹⁴的单独作战就已经遭到可耻的失败。得比选举审查委员会提出了自己的报告。这个报告确认了自由党人提出的选举抗议书中所列举的各种事实，并在结论中认为证人的供词已经证实：在得比的选举期间普遍采用了贿赂手段。但是委员会并没有进一步审查罪证，它没有直接控告贝雷斯福德的贿赂行为，而只限于对他的“态度轻率和目光短浅”进行严厉的指责。且看议会是否同意这个可尊敬的委员会的意见，是否容许贝雷斯福德先生继续保留他在议院里的席位吧。如果这样，议会本身就等于是同意贝雷斯福德大臣先生关于“英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可憎的贱民”这一著名的格言。不管怎样，贝雷斯福德的大臣的官职是难保了。

在谈了这一小段题外话以后，让我们回到正题上来吧。

下院的议员们一连花了四个晚上零大半个晚上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是应当审查整个预算案还是应当审查整个决议，是研究总的原则还是研究与某一点有关的具体材料。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

是：议院目前只应当研究提高房屋税和扩大**直接税征收**范围的问题。

迪斯累里先生的预算案中的这一重要提案遭到了议院的否决，表决的结果是：

二百八十六票赞成，三百零五票反对。

内阁的反对者获得了十九票的多数。在此以后，议院决定把下次会议延迟到下星期一举行。由于时间不够，我不可能对这次辩论进行详细的分析，虽然我很希望这样做。我只能谈谈迪斯累里先生最后一次发言里的一些最重要的地方，而他的发言无疑是所有发言中最值得注意的。

前财政大臣查理·伍德爵士和詹姆斯·格莱安爵士集中火力攻击了迪斯累里关于动用借来的社会福利基金（每年四十万英镑）来弥补由于降低航运税而造成的赤字的提案。詹姆斯·格莱安爵士非常起劲地论证了这笔基金的良好作用。迪斯累里先生对这一点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想向委员会指出过去曾经有过多么令人吃惊的滥用国家资金的行为，指出实际上曾经不经议会的同意、不受议会的监督而浪费了多少金钱，而且这还仅限于通过主管这项借来的社会福利基金的机关所浪费的金钱。”

接着他就详细地揭露了辉格党政府在这笔基金上面玩弄的卑鄙的财政手腕。然后，迪斯累里说明了他的预算案所依据的原则。

“在决定我们第一步究竟应当怎样走之前，需要解决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在规定直接税的数目的时候，我们可以向国家提出多大的要求，而这笔款项是任何想走上财政改革道路的内阁所必不可少的。（喊声：“对呀！”）哈里法克斯的代表（查理·伍德爵士）指责我的提案是轻率地增加国家的直接税。（喊声：“听啊，听啊！”）卡赖尔的代表（詹姆斯·格莱安爵士）责备我随便地把直接税增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首先，我以政府的名义提出的这个提案不但

不是轻率地增加直接税的税额，而且在实际执行这个提案的时候，直接税也不会达到这位可敬的绅士、哈里法克斯的代表掌管财政时期所达到的数额，因为他不仅征收财产税和所得税，甚至还征收窗口税；在实行窗口税的最后一年，他从这种税得到的收入将近二百万英镑。（掌声）这位警告我们不要轻率地提高直接税额的可敬的绅士，在掌管财政的最后一年减少了窗口税的数额，满足于由于用另一种税代替窗口税而保留下来的七十万英镑这样一个小小的数字。但是我不会忘记，轻率地责备我提高直接税额的这位可敬的绅士，起初提出的、代替窗口税的另一种税的税额是如此庞大，如果真的实行，他的房屋税就会比我任何时候提出的都要高。（热烈的掌声）但是，就只这些吗？这位责备我轻率地提高国家直接税的可敬的绅士所做的就只这些吗？正是这位征收了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其确切数额的财产税的财政大臣，正是这位征收了近二百万英镑的窗口税的大臣，有一次曾经来到下院，提出了一个使会议大吃一惊的提案：把财产税和所得税增加将近一倍。（热烈的掌声）我认为这种行为才真可以说是一种毫不考虑后果的轻率态度……向我们提出要把房屋税增加一倍。这实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数目啊！但是，如果这位可敬的绅士真的把财产税和所得税增加一倍，那末我看，指责他轻率地提高国家的直接税倒是很公平的。（热烈的掌声）有人在叫嚷什么轻率态度，难道在财政史上还有什么可以和这位可敬的绅士所表现的轻率态度相比吗？（热烈的掌声）究竟他有什么根据提出这样一个奇怪的不可思议的提案，一个只有在关系到国家安危的情况下才应该提出的提案呢？当他遭到抵制、遭到失败和备受嘲笑的时候，他又声明说收入已经够用，没有他的这个提案也过得去了。（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假如将来有一位历史家叙述说，有一个大臣提议把所得税增加将近一倍，而第二天他又声明，预算的收入已经完全够用，大家一定不会相信这位历史家，一定会怀疑他是在撒谎吧。（又爆发一阵掌声）”

迪斯累里这样向查理·伍德爵士进行报复之后，继续说道：

“我们应当说明，在财产和收入之间，在不固定的收入和固定的收入之间是有差别的。因此我们应该坚持我们过去认为、现在也仍然认为是唯一正确的原则，这个原则即使现在不被承认和通过，它将来也一定会被承认和通过，这个原则就是**直接税的基础应当扩大**。（执政党议席上发出赞同的喊声）……”

假如有人想使这样的状况，也就是使拥有政权的阶级靠社会上的一部分更富有的人担负过重的直接税而靠工人负担过重的间接税来维持自己的情况成为我们社会制度的永恒的原则，那我不能设想有什么东西会比这样做对我们国家更为危险和更能引起毁灭性的后果了。（掌声）不过，我深信，特权阶级将会首先由于这种毁灭性的后果而受害。”

迪斯累里把话题转向自由贸易派，他说：

“我们看到，殖民地关税的伟大的反对者们异口同声地拥护对生产者课以重税；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好像是故意要嘲笑我们似的，竟利用了我们后来终于有勇气正当地放弃了的那些错误论点。（热烈欢呼）你们对我说，保护关税政策已经死亡，你们对我们说，保护关税派的政党已不存在！不！这个政党还健在，这个政党就在这里。（用手指反对党议席）他们不仅坐在我们原来的席位上，而且把我们的原则也据为己有，不过，我相信他们也同样不会做出多大的成绩。（掌声）”

最后迪斯累里对查理·伍德爵士劝他收回自己的预算案的忠告作了如下的回答：

“有人劝我收回自己的预算案。有人对我说，皮特先生收回了自己的预算案，而且不久前其他一些人（辉格党人，其中包括查理·伍德爵士）也这样做了。（笑声）我并不羡慕皮特先生的荣誉，但也不想降低到其他一些人那样的水平。（热烈的掌声）不，先生们，我已经看到，无力实行自己措施的政府将会得到什么结果，这种结果既不会给政府带来荣誉，也不会给国家带来好处，照我看来，这种结果同我认为最珍贵的东西同对议院的尊严是不相容的。（热烈的掌声）我想起了一个预算案，这个预算案曾经在1848年提出又收回，重新提出又重新收回。（笑声）这个只是在人们忍耐的情况下才勉强存在的政府的活动造成了什么结果呢？在这个国家的财政上究竟造成了什么结果呢？结果不正是我现在必须努力加以纠正的那种以房屋税代替窗口税的可耻行为吗？（掌声）不满的原因绝不仅仅在于某些政党的利益……是的，我很清楚谁将反对我。我遇到的将是一个联盟。（掌声）妥协也可能会得到成功。过去也曾经有过得到成功的联盟。不过，即使是得到成功的联盟，其胜利也总是很短暂的。我也知道，英国不喜欢联盟。（掌声）我不愿意求助于联盟，我要

诉诸支配着国家的社会舆论。由于自己那种英明的不可抗拒的影响，社会舆论甚至足以使议会的决议受它的控制，没有它的支持，最庄严最古老的机构也不过是没有根基的幻想的产物。（可敬的绅士在震耳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今天各报对于内阁这次失败的后果的看法如何呢？

“纪事晨报”（皮尔派的机关报）和“晨报”（激进派的机关报）认为内阁一定会辞职。“泰晤士报”也同样认为大臣们会提出辞职，不过它怀疑反对党是否能像它推倒旧政府一样容易地建立起新政府。“每日新闻”（曼彻斯特派的机关报）认为倒台的内阁可能和帕麦斯顿勋爵联合起来重新组阁。“晨邮报”（帕麦斯顿的机关报）认为这种重新组阁是一种当然的事情。最后，“先驱晨报”（得比一迪斯累里）认为如果大臣们今天辞职，女王^①明天就会被迫把他们重新召回。

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大臣们由于自由贸易派的扩大直接税的决议案而遭到了失败。但是他们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如果说他们曾经以放弃自己的原则为代价胜利地击退了议会的第一次攻击，那末反对党所以能在第二次战役中战胜他们，也正是由于反对党放弃了他们自己的原则。

这样，这些辩论完全证实了我以前谈到的议会中各个政党的状况^②。联合起来的反对党和二百八十六名紧密团结的托利党人相比，仅仅获得十九票的优势。如果反对党组织新政府，那末这个政府很快就会被推翻。如果反对派组成的新政府解散下院，那末，将在原来的条件下进行的新的选举，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也就是

① 即维多利亚。——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433—442 页。——编者注

说,当在新的下院中重新开始旧的角逐的时候,各政党又会照旧相互削弱,英国的政治又会重新陷入 *cercle vicieux* (兜圈子的境地)。

因此我认为,现在还是同过去一样必须在二者之间作出抉择:或者是让托利党政府继续存在下去,或者是实行议会改革。

卡·马克思写于 1852 年 12 月 17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3 年 1 月 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659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 衰老的政府。——联合内阁的 前途及其他

1853年1月11日星期二于伦敦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政治千年王国³¹⁵的开始，在这个王国中，派系纷争的风气将从地面消失，只有天才、经验、勤劳和爱国主义才会成为有权担任官职的唯一品质。现在内阁成立了，在我们看来，它得到各派人士的赞同和支持，它的原则也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持。”

“泰晤士报”首先用这些话热情洋溢地颂扬了阿伯丁政府的成立。根据该报的语调，人们会以为，从今以后为英国造福的将是一个完全由年轻有为的新人物所组成的内阁。所以，当全世界发现在大不列颠的历史上开辟新纪元的几乎全是些年逾八十精力衰弱的老头时，无疑都会感到惊奇。阿伯丁年近八十；兰斯唐已经入土半截；帕麦斯顿和罗素也近乎如此；格莱安是从上世纪末以来就差不多在历届政府里供职的官僚；内阁的其他成员，由于年老体衰已经死过两次，只是又被人人为地复活了。一句话，十个百岁的老头——这就是“泰晤士报”的政论家用来组成（看来是用简单合成的方法）新的“千年王国”的材料。

他们向我们保证说，在这个“千年王国”里，任何派系纷争，甚至党派本身，都必将消失。“泰晤士报”想以此来说明什么呢？从

前一直享有使自己表面上成为民族政党或议会党的特权的某些贵族集团，现在已经认识到继续扮演这种滑稽剧已经不可能了，这些贵族集团由于这种认识和近来他们所取得的惨痛教训决定停止小小的内讧，并且为了保卫他们的共同特权而联合成一个紧密的总体，——难道仅仅因为这种原因从这个时刻起一切党派就该不再存在了吗？组成这类“联合”的事实本身难道不正是确定无疑地象征着那两个真正在成长壮大但又局部地丧失代表资格的现代社会的基本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准备保卫自己成为全国仅有的两个政党的权利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吗？

在得比勋爵执政时期，托利党人永远地放弃了自己的旧的保护关税理论，并宣称自己是贸易自由的拥护者。当得比伯爵宣布自己的内阁辞职时，他说：

“诸位先生，我记起了——而你们，诸位先生，大概也会记得——高贵的伯爵（阿伯丁）在本议院曾不止一次地宣称，除了贸易自由问题以外，他同现政府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没有什么分歧。”

阿伯丁勋爵在证实这种说法时又进了一步，他指出，“为了抵抗民主派的侵害，他准备联合高贵的伯爵（得比），但是，他难于指出，哪儿有这种民主派”。根据两方面的承认，在皮尔派和托利党人之间不再存在任何分歧。但这还不是全部。关于外交政策，阿伯丁伯爵指出：

“三十年来，我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没有改变，尽管在执行过程中有过某些差别。”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从 1830 年到 1850 年一直在阿伯丁和帕麦斯顿之间进行的整个斗争，即前者力求与北方强国结成同盟，而后者坚持国法国建立《entente cordiale》（“诚意协商”）一个是赞成

路易—菲力浦，而另一个是反对路易—菲力浦；一个是反对干涉，而另一个是赞成干涉等等这两者之间的斗争，总之，他们所有的纠纷和争论，甚至不久以前由于马姆兹伯里勋爵“可耻的”外交政策而引起的普遍愤怒——所有这一切都被认为是“纯粹的错觉”。可是，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还能找到比它的外交政策遭到更彻底的改变的其他东西吗？1830年前同北方强国同盟；从1830年起同法国同盟（四国同盟）³¹⁶；从1848年起英国同整个大陆隔绝而陷于完全的孤立。

首先，得比勋爵向我们保证说，托利党人同皮尔派之间没有任何分歧；随后，阿伯丁伯爵又向我们保证说，皮尔派同辉格党人、保守党人同自由党人之间也同样没有分歧。按照他的意见：

“国家就是由于这些毫无意义的、对政治活动家的行动或原则没有实际影响的差别而弄得疲惫不堪了。除了保守党政府以外，任何别的政府都是不可想像的，——同样正确的是，除了自由党政府以外，任何别的政府也是不可想像的。”

“这些术语的涵义不是十分确切的。这些毫无意义的差别已使国家感到厌倦。”

这样一来，三个贵族党派——托利党人、皮尔派和辉格党人一致认为：他们彼此之间实际上没有任何区别。此外，在另外一点上他们也都是一致的。迪斯累里申明，他打算实行贸易自由的原则。阿伯丁勋爵说：

“女王陛下的现任务部大臣的伟人目的和他们执政的主要特点，必须是保护和合理地扩大自由贸易。这是特别委托给他们的使命。”

总而言之，整个贵族阶级都同意，政府应该使资产阶级得到好处，实行有利于它的政策，但同时他们又决定不让资产阶级直接领

导这方面的事务。为了这个目的，旧的寡头政体使尽全力去搜罗它那里的有才干、有影响和有威望的人，组成一个政府，这个政府的任务就是尽可能长久地阻止资产阶级直接掌管国家大权。联合起来的英国贵族打算按照拿破仑主张对人民采用的原则来对待资产阶级，这个原则就是：《Tout pour le peuple, rien par le peuple》（“一切为了人民，但什么也不通过人民”）。

厄内斯特·琼斯在“人民报”上指出：

“显然，排除资产阶级的明显意图，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加以伪装，而他们（大臣们）为了毫不费力地做到这一点，就把一些次要的和影响不大的职位让给如威廉·摩耳斯沃恩爵士、贝尔纳·奥斯本等这些自由派的贵族。但他们不该设想，梅费尔区³¹⁷的这个讲究穿戴的自由派会满足曼彻斯特派的那些严肃的先生们。后者所感兴趣的除了市场交易，别无所求。他们所想的就是英镑、先令和便士，是职务和地位，是世界上最大帝国的巨额收入，这个帝国连同它的一切资源都应该专为他们的阶级利益服务。”

而实际上，只要浏览一下“每日新闻”、“晨报”特别是“曼彻斯特时报”³¹⁸，即布莱特先生的直属机关报，就足以使人相信，曼彻斯特派的信徒在答应给联合政府以临时支持时，所遵循的只是皮尔派和辉格党人对上一届得比内阁所实行的政策：他们想使大臣们有可能把自己考验一下。至于这种“考验”的意义是什么，迪斯累里不久以前已经有机会领教过了。

因为托利党内阁的失败是由爱尔兰旅决定的，所以新的联合政府自然认为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来保证自己在议会中得到这个党团的支持。他们用财政部部务委员的职位很快地引诱上了爱尔兰旅的经纪人萨德勒先生，使克奥先生得到了爱尔兰总检察长的官职，让蒙塞耳先生当了军械局秘书。

“先驱晨报”写道：“他们指望用这三项收买来争取到爱尔兰旅。”

然而，我们有足够的根据怀疑，这三项收买是否能保证得到整个爱尔兰旅的支持。我们现在就已经在爱尔兰的“自由人报”³¹⁹上读到了这样的话：

“目前已经到了解决租佃者权利问题和宗教自由问题的决定性时刻。这些问题的成败，现在不取决于大臣们，而取决于爱尔兰的议员。得比内阁是被十九票推翻的。如果有十个人转向另一方，那就会改变事件的进程。在各党派的情况下，爱尔兰议员是万能的。”

在前一篇文章的末尾，我表示了这样的意见：或者是托利党政府，或者是议会改革，二者必居其一^①。读者如果了解一下阿伯丁勋爵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那将是很有趣的。他说：

“改善人民的状况，并不排斥（这样！）消除代议制的缺点，因为在最近一次选举中发生的事件，未必能唤起人们对这种制度的热爱。”

阿伯丁勋爵的同僚在他们担任政府要职之后进行的选举中异口同声地宣布，代议制的改革是必要的。但同时，他们每次都要自己的听众了解，这样的改革必须是“温和的、合理的，改革要深思熟虑，谨慎从事，不应操之过急”。可见，现在的代议制暴露的缺陷愈多，人们愈是公开地承认这一点，那就愈加表明不愿迅速和彻底地改变这种制度。

最近这次大臣的改选，对一个新的发明作了首先试验，由于这个发明，各个政治活动家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不管能否进入内阁，都能够保持自己的威望。这个发明就是使用至今尚未在实际中运用过的“尚待商榷的问题”这个概念。奥斯本和维利尔斯过去曾当众保证赞成秘密投票，可是现在他们又说这是一个尚待商榷的问

^① 见本卷第 552 页。——编者注

题；摩耳斯沃思曾保证为殖民地的改革而斗争，而现在，这又是一个尚待商榷的问题；克奥、萨德勒等人曾保证维护租佃者的权利，而现在，这也是一个尚待商榷的问题。总之，他们作为议员时经常谈到的自己认为已经解决了一切问题，在他们当了大臣之后，都变成了尚待商榷的问题。

最后，我还必须指出由于皮尔派、辉格党人、激进派和爱尔兰人的联合而出现的另一个新奇的情况。这些党团的每一个著名的活动家，都被调离他们被认为能够发挥某种才能或运用某种知识的那些部门，而被委派到对他们很不恰当的岗位上去。帕麦斯顿这位著名的外交大臣被委派到内务部，而在内务部干了一辈子的罗素却被调去掌管外交；格莱斯顿这个皮由兹教派³²⁰的埃斯科巴尔被任命为财政大臣；作为威克菲尔德先生的荒谬的殖民主义制度³²¹的模仿者或拥护者而获得一定声望的摩耳斯沃思，当了公共工程大臣；在任财政大臣时经常被财政赤字或盈余而弄得到处碰壁的查理·伍德爵士，现在当了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连来复枪和火枪的区别都分辨不清的蒙塞耳被任命为军械局秘书；唯一没有调离原职的一个人是詹姆斯·格莱安，他在任海军首席大臣时很早就由于第一个把腐烂的蛆虫带进不列颠舰队而博得了极大的荣誉。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1 月 11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3 年 1 月 2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677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
政局展望。——商业繁荣。
——饿死事件

1853年1月14日星期五于伦敦

约翰·罗素勋爵在外交部接受外交官衔证章时宣称，他只打算临时担负这个部门的工作，在不久的将来，外交事务将转变克拉伦登伯爵掌管。的确，罗素勋爵在外交部始够是个真正的外国人；如果把出版枯燥的汇编（大概是关于从尼姆韦根和约以来所签订的各个条约的历史的汇编）这一工作除外，那他就没有任何特殊表现了，而这本书老实说充其量不过是像罗素曾一度用来震惊世界的那本“悲剧”³²²一样地引人入胜。约翰勋爵既然保住了在内阁的地位，他很可能成为下院的首领，看来，他在内阁里将集中全副精力来制定新改革法案。要知道，自从1831年为了实行自己的措施，而在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之间十分巧妙地分配“腐朽的市镇”³²³以来，议会改革一直就是他的专业。

我曾预言：内阁为了把整个“爱尔兰旅”争取到联合政府方面而对三位爱尔兰议员所采用的收买手段^①，是无济于事的。现在这个预言完全被证实了。“自由人报”和“记事报”的立场，鲁卡斯、穆尔和达菲先生的书信和声明的语调以及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³²⁴的

① 见本卷第556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政局展望。——商业繁荣。
——饿死事件

1853年1月14日星期五于伦敦

约翰·罗素勋爵在外交部接受外交官衔证章时宣称，他只打算临时担负这个部门的工作，在不久的将来，外交事务将转变克拉伦登伯爵掌管。的确，罗素勋爵在外交部始够是个真正的外国人；如果把出版枯燥的汇编（大概是关于从尼姆韦根和约以来所签订的各个条约的历史的汇编）这一工作除外，那他就没有任何特殊表现了，而这本书老实说充其量不过是像罗素曾一度用来震惊世界的那本“悲剧”³²²一样地引人入胜。约翰勋爵既然保住了在内阁的地位，他很可能成为下院的首领，看来，他在内阁里将集中全副精力来制定新改革法案。要知道，自从1831年为了实行自己的措施，而在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之间十分巧妙地分配“腐朽的市镇”³²³以来，议会改革一直就是他的专业。

我曾预言：内阁为了把整个“爱尔兰旅”争取到联合政府方面而对三位爱尔兰议员所采用的收买手段^①，是无济于事的。现在这个预言完全被证实了。“自由人报”和“记事报”的立场，鲁卡斯、穆尔和达菲先生的书信和声明的语调以及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³²⁴的

① 见本卷第556页。——编者注

表明上层阶级财富增加的**财产税**为：

1851—1852 年度 5304923 英镑

1852—1853 年度 5509637 英镑

商业部关于截至 1852 年 12 月 5 日为止的一个月和十一个月的报告表明：

	1852 年	1851 年	1850 年
出口价值 (按英镑计算)			
至 12 月 5 日为止的一个月	6102694	5138216	5362319
至 12 月 5 日为止的十一个	65349798	63314272	60400525

可见，上述一个月的出口价值几乎增加了一百万英镑，而十一个月的出口价值才增加了二百多万英镑。至于出口价值的增长是否与进口价值的增长相平衡或者被出口价值所超过，由于缺乏进口价值的任何资料，我们无法知道。

再来看看工厂视察员的报告。郎卡郡地区工厂视察员霍纳先生在他刚发表不久的包括截至 1852 年 10 月 31 日为止的资料的半年报告中写道：

“至于谈到毛纺、精梳毛织和丝织厂的情况，一年来在我负责的地区变化不大，亚麻厂仍处于 1851 年 11 月 1 日以前那样的状况。但棉织厂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甚至从中减去目前停工的厂（其中很多厂大约很快就可以复工，特别是保全了机器设备的厂），那末近两年来投入生产的新厂也有 129 个，总设备能力达 4023 匹马力。53 处现有工厂的设备能力共增加 2090 匹马力，因此，设备能力总共增加 6113 匹马力。看来，这至少使棉织工业增添 24000 名工人。但问题还不止于此，因为目前还有许多新的工厂正在兴建。在包括埃士顿、斯泰里布雷芝、奥尔丹和利斯等城市在内的一个不大的地区，就有 11 个工厂在兴建，其设备能力估计共达 620 匹马力。据说，机器制造业由于定货过多简直忙得喘不过气来。不久前一位十分明智的、善于观察的工厂主对我说，现在许多正在建筑的工厂，由于缺乏机器设备，大约最快也要到 1854 年后才

能开工生产。尽管上述材料以及我的同行在他们今年的报告中引用的材料能够说明生产的巨大增长,然而,这些材料还不能反映这种增长的全貌。因为目前存在着生产增长的十分广泛而丰富的源泉,关于这方面还很难得到什么资料。我所指的就是蒸汽机方面的现代化的革新,由于这种革新,旧的、甚至新的发动机能够发挥大大超过其正常的、过去认为不可能达到的能力”。

接着,霍纳先生引用一位杰出的建筑工程师奈斯密斯先生从北明翰寄来的一封信。这封信指出,如果加速机器的运转和给它们装上伍尔夫的高压双重汽缸,这会使生产率得到多么大的提高;采用这种汽缸,就可以使现在使用的机器的生产率比革新以前至少提高 50%。

从所有工厂视察员的报告的总结材料中可以看出,到 1852 年 10 月 31 日为止的一年中,开工生产的新厂共有 229 个,它们共拥有 4771 匹马力的蒸汽发动机和 586 匹马力的水力发动机;扩建现有工厂 69 个,拥有 1532 匹马力的蒸汽发动机和 28 匹马力的水力发动机;两项总计达 6917 匹马力。

往下,再来看看商业年报,我们发现所有这些年报都充满了像“泰晤士报”颂扬政治“千年王国”时的那种激情,不过,无论如何,这些年报总比这家报纸要好些,因为它们所依据的是事实(至少在涉及到过去一年的情况时),而不是愿望。

农业也没有抱怨的理由。年初,小麦的每周平均价格是 37 先令 2 便士,年底就达到了 45 先令 11 便士。由于谷物价格的上涨,牲畜、肉类、油类和干酪的价格也提高了。

1851 年 8 月,某些食品,主要是糖和咖啡的价格空前下跌,并且一直继续到 1851 年年底,因为明辛街³²⁵的混乱在 1852 年 1 月才达到了顶点。现在年报指出大部分外国产品,特别是从殖民地输入的产品,如糖、咖啡等等的价格大大上涨。

至于原料的情况，我们可以根据下列材料来加以判断。

休斯和罗纳德先生在年报中说道：

“羊毛贸易状况在去年整个一年中非常令人满意……国内市场对羊毛的需求量空前巨大……毛织品和精梳毛织品的出口达到最高水平，甚至超过了 1851 年的出口额，而 1851 年的出口指标曾是这几年中最高的……价格不断上涨，但是暴涨只是在最近一个月内发生的，因此目前可以认为，这些产品的价格与去年同期比较平均超过 15—20%。”

邱吉尔和西姆先生报道：

“木材贸易在 1852 年国内商业繁荣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伦敦的输入量是 1200 船货物，相当于 1851 年的数字。两年来比以往各年的 800 船货物左右的平均指标增加了 50%。如果说建筑木材的数量仍然是过去几年的平均水平，那末对松木薄板、条板或锯过的木料等的需求量在 1852 年却空前地增加了，年平均数达到 680 万块，而过去是 490 万块。”

关于皮革制品，波威尔公司作了如下的报道：

“无疑，去年几乎对所有制革工业部门的工厂主都是有利的。在年初原料很便宜，但是后来的情况却是：皮革制品的价值比往年提高了很多。”

特别繁荣的是冶金工业。铁的价格由每吨 5 英镑涨到每吨 10 英镑 10 先令，不久之前又涨到每吨 12 英镑；以后涨到每吨 15 英镑是可能的。有愈来愈多的高炉投入生产。

关于航运业，奥弗尔和加门先生作了如下的报道：

“去年的特点是不列颠的航运业异常景气，主要原因是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对实业活动的刺激……货船载运量普遍增加了。”

造船业也是同样活跃的。利物浦的汤季、卡里等先生的年报中关于这个生产部门谈到以下情况：

“我们还从来没有机会在我们的年度报告中报道过关于本港在出售船只的吨数和成交价格方面的如此有利的材料。殖民地船舶的价格整整上涨了

17%，且有进一步上涨的趋势。尚未售出的船舶的数量已减至 48 只，而 1852 年是 76 只，1851 年为 82 只，预计最近不会增加…… 一年来开到利物浦和出售的船舶数是 120 只，总载重量为 50000 吨；1852 年在本港下水和正在建造的船舶数是 39 只，总载重量为 15000 吨，而 1851 年是 23 只，总载重量为 9200 吨。在这里已经造成和正在建造的轮船数是 13 只，总载重量为 4050 吨…… 至于说到铁制帆船，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些船只愈来愈受到欢迎。现在，无论是这里，或者克莱德、新堡以及各地的造船工人那在以空前的规模建造这样的船只。”

关于**铁路**的情况，伍德斯和斯塔布斯先生写道：

“报告给我们提供了最美好的希望的根据，并且远远赶过了一切过去的计算。上周的报告指出线路长度比 1851 年增加了 348 哩，即 5.5%；货运收入增加了 41426 英镑，即 14%。”

最后，杜菲公司（曼彻斯特）的通报指出，1852 年 12 月份同印度和中国的贸易是十分广泛的。剩余货币被看作是这样一种情况，它有利于国外市场的企业家的活动，并能使他们在年初所受到的商品和产品方面的损失得到补偿。

“目前，开垦新地、开采矿山以及其他方面的各种方案正吸引着投机商人和资本家。”

根据工厂视察员的报告，就可以看到一般工业地区，特别是棉织工业区的繁荣情况。关于棉织生产的情况，约翰·里格利父子公司（利物浦）作了如下的报道：

“过去一年的棉花贸易的发展成了国家普遍繁荣的标志，它导致了非常好的结果…… 同时也表露了一系列的好现象，但是最惊人和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美国空前丰收的三百多万捆棉花都非常顺利地销售出去…… 在很多地区，对进一步增加工业企业的设备能力已经做了准备工作，因此，我们可以预料，明年将加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棉花。”

其他许多工业部门的情况也是如此。

麦克奈尔、格林毫和厄尔文（曼彻斯特）先生说：“我们要指出格拉斯哥的

棉织工业和冶金工业,哈得兹菲尔德、里子、哈里法克斯、布莱得弗德、诺定昂、莱斯特、设菲尔德、北明翰和乌尔未汉普顿的各种工业部门——所有这些工业看来都处在非常繁荣的状况。”

普遍繁荣中唯一例外的是约克郡的丝织工业和梳毛工业。关于工商业的总的前景,可以用曼彻斯特的一个通报的话归纳如下:

“我们预感到的与其说是交易停顿和货币不足,不如说是投机过剩。”

在这种普遍繁荣极盛的时候,不久前英格兰银行所采取的措施,引起了商业界的普遍不安。1852年4月22日,英格兰银行把贴现率降到了2%。而1853年1月6日早上宣布,贴现率由2%提高到2.5%,也就是说,增加25%。有人企图把这次提高说成是由于最近某些承包铁路的大企业家得到巨额贷款造成的,如众所知,他们的一笔为数很大的期票仍在流通。另外一些人认为(见伦敦“太阳报”),英格兰银行之所以提高贴现牌价,是想从普遍繁荣中获取自己的一份利益。而总的说来,这种行动被指责为“不妥当”。为了使读者对此作出正确的评价,我在这里引用“经济学家”的一份资料:

英 格 兰 银 行			
	黄 金	有价证券	最低贴现率
1852年			
4月22日……	19 587 670 英磅	23 782 000 英磅	降低到 2%
7月24日……	22 065 349 英磅	24 013 728 英磅	2%
12月18日……	21 165 224 英磅	26 765 724 英磅	2%
12月24日……	20 794 190 英磅	27 545 640 英磅	2%
1853年			
1月1日……	20 527 662 英磅	29 284 447 英磅	2%,但从1月6日起提高到2.5%

由此可见,银行的现有黄金储备比贴现率降到2%的1852年

4月多100万英镑,但在这两个时期中间有显著的差别,因为黄金的周转是从流入转为流出。这种流出表现得特别猛烈,它超过了上月份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黄金转入量。此外,1852年4月有价证券比现在少550万英镑。因而,在1852年4月,借贷资本供过于求,而现在正好相反。

与黄金输出的同时,外汇牌价显著下跌,这种现象部分是由于大多数进口货价格的大大提高,部分是由于对进口货的广泛投机所致。与此有关的还有对农场主不利的秋冬两季的影响,由此而产生的对今年收成的疑虑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外谷物和面粉的巨额交易。最后,英国资本家广泛入股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挪威、丹麦、德国和比利时建立铁路和其他公司,并且在不小程度上参与了现在以巴黎交易所为活动中心的普遍欺诈。因此,现在充斥于所有欧洲市场的伦敦期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得多,这就引起了外汇牌价的继续下跌。7月24日一英镑在巴黎换25法郎30生丁,而1月1日就只能换25法郎,某些生意甚至按低于25法郎的行市成交。

由于资本的需求与资本的供应成正比地增加,英格兰银行最近采取的措施看来是完全有根据的。但是,指望通过此项措施来消除投机和防止资本外流,我敢预言,这是丝毫无济于事的。

在读者们随我浏览了证明英国不断繁荣的一系列资料之后,我再请他们稍微注意一下一个名叫亨利·摩尔根的不幸的制针工人为了出外谋生而在由伦敦到北明翰的路途上的遭遇。为了避免夸大之嫌,我特从北安普顿的报纸^①上逐字地转抄了这篇报道。

^① 即“北安普顿信使报”。——编者注

死于贫穷

科斯格罗夫。“星期一早晨 9 时左右，有两个工人在科斯格罗夫教区斯雷德先生的破烂的草棚里避雨，他们听到人的呻吟声，接着就发现一个不幸的人躺在牲口棚里，已经奄奄一息。他们和他谈话并友好地请他共进早餐，但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他们摸了他一下：发觉他的身体冰凉，于是就去叫住在附近的斯雷德先生。过了一会儿，这位绅士打发一个小孩将这个不幸的人搁在小车上，用干草垫盖着，送往约一哩以外的亚德利—哥比昂的收容所，他到达那里正好下午一时整，但是过了一刻钟就死了。他的枯瘦的、脏污的、穿着破烂衣衫的身躯，令人不忍目睹。后来查明事情是这样的：2 日星期四晚上，这个不幸的人得到斯托尼—斯特腊特福德济贫所所长发给穷人去亚德利收容所的一张路宿证，然后，他步行三哩多到达亚德利，被收留在收容所。他狼吞虎咽地吃完了发给他的饭食，并请求允许他再呆一昼夜。他的请求被允许了。星期六清晨，他吃完早饭（可能，这就是他在这人世上的最后一餐）就离开收容所，返回斯特腊特福德，由于身体衰弱，两脚又被磨破（他的脚后跟已经磨破），看来他乐意呆在这个第一次碰到的安身之处，这是属于某农场的野外建筑物的一个离公路有四哩远的敞棚。6 日星期一的中午，在那里有人发现他躺在干草里，因为主人不愿生人留在这里，遂命令他离开，他请求允许他再稍微呆一会儿，到下午 4 时左右他走了，以便在天黑前能在附近找个休息和过夜的地方，这地方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个缺少半间房顶、没有门窗的破烂的草棚。就在这个难以想像的寒冷的住处，他钻进牲口棚，在那里滴水未进地躺了七天多，正如上面所叙述的，直到 13 日早上他才被发现。这个不幸的人叫亨利·摩尔根，是个制针工人；大约三、四十岁，看样子是个身体结实的人。”

很难想像有比这更骇人听闻的事件了。一个身强力壮、精力充沛的人，由伦敦到斯托尼—斯特腊特福德的漫长而痛苦的旅途，向周围“文明”求援的绝望哀求，他的七日断食，迫使他听命运摆布的那些人们的残酷无情，寻找容身之所的四处奔波，从收容所的屡被驱逐，最后，一个名叫斯雷德的人的惨无人道和一个奄奄一息的人的默默惨死——这是一幅足以令人震惊而又发人深

思的景象。

当他在敞棚里和破烂的草棚里寻找一个容身之处时，无疑，他侵害了所有权!!!

如果把这个在高度繁荣时期发生的饿死事件告诉西蒂的养尊处优的资本家，那他会用 1 月 8 日伦敦“经济学家”上的话来回答你们：

“令人高兴的是现在可以看到，在贸易自由时期，一切阶级是如何繁荣昌盛；成功的希望增强着他们的力量；他们都在改善自己的生产，整个社会和每一个人都从中得到好处。”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1 月 14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3 年 2 月 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681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
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
公爵夫人和奴隶制³²⁶

1853年1月21日星期五于伦敦

作为内阁新措施的结果的改选已告结束。内阁遭到了失败。一直被认为是“爱尔兰旅”领袖的财政部部务委员萨德勒先生，被亚历山大先生所战胜；亚历山大先生以六票的优势当选。亚历山大先生的当选应归功于奥伦治派³²⁷和天主教徒的联合。另一方面，内阁在牛津大学取得了胜利，那里的投票继续了十五天之久，斗争达到了极端紧张的程度。格莱斯顿以一百二十四票的优势战胜了高教会派³²⁸拥护者的候选人达德利·派西沃。我们建议古迪布腊斯逻辑³²⁹的崇拜者读一读在这次斗争中相互敌对的两家报纸——“纪事晨报”和“先驱晨报”的社论。

昨天，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英格兰银行的经理们又将最低贴现率从2.5%提高到3%，这种情况很快地就影响到了巴黎交易所，那里的各种有价证券又下跌了。即使英格兰银行能够制止住巴黎的投机，但仍然会有使现存黄金外流的另一途径——输入谷物。无论是在英国，或在大陆，去年的收成估计要比常年减产三分之一。此外，到下一季收成时，到底能有多少粮食，人们也还存在着某些怀疑，因为庄稼由于土壤潮湿而播种晚了。所以正在签定输

入大量谷物的合同,结果,外汇牌价还是对英国不利。用海船从澳大利亚运来的黄金也不足以补偿突然增加的谷物入口。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曾提到关于铁的投机买卖^①。英格兰银行第一次将贴现率由2%提高到2.5%就已经影响了这个商业部门。近两周售价七十八先令的苏格兰生铁,本月19日跌至六十一先令。在铁路股票的交易中,大概从利率提高的那一瞬间起,也就可以预料到由于强制出售至今作为贷款抵押的股票而会出现停滞现象,强制出售股票的业务已经开始办理。但是,在我看来,黄金外流不仅仅是由黄金输出引起的,国内贸易的活跃,特别是工业区的国内贸易的活跃也充分助长了黄金的外流。

在目前政治生活暂时平静的情况下,斯泰福宫的妇女大会关于黑人奴隶制告美国姐妹书和“美国千百万妇女关于白人奴隶制给自己的英国姐妹们的充满热情和基督教情感的信”,对新闻界来说是很宝贵的材料。但是,没有一家英国报纸注意到斯泰福宫会议是在萨特伦德公爵夫人主持下在宫里举行的这个情况。而根据斯泰福和萨特伦德这两个名字是足以公正地评价英国贵族的仁爱的,这种仁爱就是,尽可能远离故乡,而且最好不在大西洋此岸而到彼岸去为自己寻找目标。

萨特伦德家族致富的历史,就是苏格兰—盖尔居民破产和被剥夺的历史,是把他们从世代生息的土地上赶走的历史。远在十世纪时,丹麦人就在苏格兰登陆并侵占了凯特涅斯平原,将原住居民赶到山里。按盖尔语叫做“萨特伦德大人”的Mor-Fear-Chattaibh,经常可以找到这样的战友,他们甘愿冒生命危险保卫他,反对他的敌

^① 见本卷第563页。——编者注

人，即丹麦人或苏格兰人，外地人或当地人。斯图亚特被逐出不列颠的那次革命³³⁰之后，苏格兰的小克兰首领间的私人纠纷日益减少，因而希望在这边远地区至少表面上保持自己的权力的英国国王们就鼓励克兰首领建立本族军队；通过这种制度，勒尔德，即这些首领们，就把现代的军事组织和古代的克兰制度结合起来，从而使前者成了后者的支柱。

为了正确地理解随后发生的篡夺，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克兰。克兰是社会生活的这样一种形式，它在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比封建制度低一整个阶段。换言之，它是属于家长制社会制度的。《K laen》按盖尔语的意思就是“子女”。苏格兰盖尔人的一切风俗和传统都基于一个前提，即克兰的所有成员都属于同一亲系。“大人”——克兰的首领，一方面握有无上的权力，而另一方面他只限于在血缘亲属之内行使自己的权利，任何一个民族[Family]的首领都是如此。某一克兰，即氏族，所居住的地区就属于该氏族，正如俄国的农民公社所占用的土地不属于个别农民而属于整个公社一样。可见，所在地区是氏族的公有财产。在这种制度下，现代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是谈不上的，同样，克兰成员的社会地位同生活在我们现代社会条件下的个人的地位也是无法相比的。土地是按克兰各个成员的军事职能来划分和分配的。首领依据各个人的军事能力赐给他们一定的份地，他可以自行决定增加或削减族长的封地，而这些族长也可以在自己的大小家臣之间分配地段。但是，整个地区永远是克兰的财产，无论个人的奢望多么容易起变化，封地的条件是固定不变的；同样，战争贡税或向首领缴纳的贡税同样也是永不增加的，首领是战时的指挥官，同时又是平时的最高统治者。一般说来，每一块地段是由交纳固定贡税的同一个家族世

世代耕种的。这种贡税不大，这与其说是现代意义上的地租或一般的收入来源，还不如说是表示承认“大人”和从属于他的族长的最高权力而缴纳的贡物。直接从属于“大人”的族长称为“塔克斯緬”[《taksmen》]，委托他们管理的土地叫“塔克”[《tak》]。“塔克斯緬”则管辖充当各村头目人的下级仆役，而这些仆役又管辖农民。

由此可见，克兰不外是按军队方式组织起来的氏族，同任何氏族一样，它很少用法律来规定什么，而是受着各种传统的强烈约束。在任何情况下，土地都是**氏族的财产**，在氏族内部，尽管有血缘关系，但是人们之间也有地位上的差别，正像所有古代亚洲的氏族公社一样。

最初的篡夺是在驱逐斯图亚特之后由于建立氏族军队而发生的，从这时候起，贡税成了“大人”（Mor-Fear-Chattaibh）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于感染了伦敦宫廷的挥霍无度的风气，他就想方设法地从自己的仆役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钱，而仆役们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对待他们的下属。最初的贡物变成了固定的货币代役租，实行这种代役租一方面是一种进步，因为它会使传统贡税明确地固定下来，但另一方面：它却意味着篡夺，因为现在“大人”对“塔克斯緬”说来是处于领主的地位，而“塔克斯緬”对农民说来则以农场主的身分出现。由于现在“大人”也同“塔克斯緬”一样需要货币，因此，必然使生产不仅是为了直接消费，而同时也是为了输出和交换。所以，国民生产制度必然会发生变化，由于这种变化而造成的多余人手也要摆脱掉。居民人数由此而开始减少。但在十八世纪时，居民多少还安然无恙，人们还没有明显地成为赤裸裸的暴利的牺牲品，这点可以从苏格兰经济学家斯图亚特的著作中看到，他的著作是在亚当·斯密的著作前十年发表的。斯图亚特（第一卷第

十六章)说:

“这些地段交纳的地租,与地段的面积相比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如果把它同这个经济单位所供养的人数相比,那就会发现,苏格兰高地的一个地段比最富饶地区的同样面积的经济单位所供养的人数要多十倍。”³³¹

萨特伦德伯爵夫人的管家、指导她的领地改善工作的洛克先生的著作(1820年)³³²证明,即使在十九世纪初期,土地贡税还是很低的。例如,他举出了金特腊多埃耳领地1811年土地贡税的清单,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这个时候以前,每家每年至多须要缴纳几先令的现款、供给少许家禽和服几天的劳役。

只是在1811年以后,才实现了彻底的和真正的篡夺,民族的财产被强行变成了**首领的私有财产**,即现代意义的私有财产。这次经济革命中的**首领人物**,是一位精通**马尔萨斯学说**的女性——**穆罕默德-阿利**,也就是**萨特伦德伯爵夫人**,或者说,是**斯泰福侯爵夫人**。

首先,必须指出,斯泰福侯爵夫人的祖先是差不多拥有萨特伦德领地四分之三的苏格兰最北部的“大人”。这块伯爵领地比法国的许多省或德国的小公国还要大。萨特伦德伯爵夫人继承了这些领地,随后当作嫁妆带给了自己的丈夫斯泰福侯爵,以后又带给了萨特伦德公爵,这时,居住在这些领地上的居民已减少到一万五千人,高贵的伯爵夫人决定进行根本的经济改革,将整个领土变为牧场。从1814年至1820年,这一万五千居民(约三千户)不断地遭到驱逐和灭绝。他们居住的所有村庄都被破坏和烧毁,所有的田地都被变为牧场。不列颠的士兵被派来执行这种暴行,结果他们竟同当地居民发生了直接的搏斗。一个老太太因拒绝离开自己的茅舍而被烧死在里面。高贵的伯爵夫人就是经过这种方式把自古以来属

于氏族的七十九万四千英亩的土地攫为己有。在极为慷慨之时，她退还给被赶走的居民约六千英亩，每户二英亩。而这六千英亩土地在退还以前一直是荒地，不能给所有者带来任何收益。伯爵夫人是如此的宽宏大量，她只以平均每英亩二先令六便士的租金把土地出租给那些几百年来一直为伯爵家流血流汗的氏族成员，她把从氏族那里非法霸占来的全部土地划分为二十九个大牧羊场，每个牧羊场只住一家人，大部分都是英格兰的租佃雇农。到1821年，一万五千个盖尔人已被十三万一千头羊所代替。

一部分被赶至沿海地区的原任居民试图以捕鱼为生，他们变成了两栖动物，按一位英国作家的说法是一半生活在陆地上，一半生活在水中，但是，陆地和水合起来也只能使他们过半饱的生活。

西斯蒙第在其“社会概论”这部著作中关于对萨特伦德领地的盖尔人的这种剥夺（而这种剥夺还成了苏格兰其他“大人”仿效的榜样）作了如下的评论：

“大规模的占有领地不单单是英国一国特有的现象，在查理大帝的整个帝国，在整个西方，军事首领们都是篡夺整个整个的省份，并利用被征服的居民，有时甚至利用自己的战友的劳动来为自己耕种土地。在九世纪和十世纪时，曼恩、昂茹和普瓦图这三个地方，对它们的伯爵来说，与其说是公国，不如说是三块辽阔的领地。在很多方面与苏格兰相似的瑞士，在当时就被划分为几块领地。如果基堡、伦茨堡、哈布斯堡和格鲁尔等伯爵处于不列颠法律的保护之下，他们也会达到像萨特伦德伯爵这样的地位。可能，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会表现出同样的改良倾向（像斯泰福侯爵夫人那样），那时，为了给羊群让出地方，阿尔卑斯山上就会是不止一个共和国应该消灭了。甚至德国最专制的君主也不会让自己干出这类事情来。”³³³

洛克先生在为萨特伦德伯爵夫人辩护时（1820年）对这一点作了如下的回答：

“为什么正是在这个别的场合下必须有与其他一切场合所采用的原则不同的例外呢？为什么土地占有者必须为了社会的利益以及为了只是同社会本身有关的那些原因而牺牲他们对自己的土地的绝对权力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美国南部各州的奴隶主就应当为了萨特伦德公爵夫人殿下的虚假的慈善行为而牺牲自己的私利呢？

到处以牛羊来代替人的不列颠贵族阶级，在不久的将来也同样会被这些有益的动物所代替。

我们刚才所叙述的苏格兰“圈地”的过程，在英国是在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发生的。还在十六世纪时，托马斯·莫尔就曾对这一点大鸣不平。在苏格兰，这个过程是在十九世纪初叶完成的；而在爱尔兰，当时正是高潮。高贵的子爵帕麦斯顿本人不过是几年以前才把人们从自己的爱尔兰领地上“圈出去”，并且用的就是上述的方法。

如果说把哪一种财产称为**盗窃**更确切的话，那末不列颠贵族的财产就是名副其实的盗窃。掠夺教會的财产，掠夺公社的土地，通过欺诈和消灭兼施的办法把封建的宗法的财产变为私人财产，——这就是不列颠贵族占有领地的法律根据。在这不久以前发生的过程中，奴颜婢膝的法学家阶级为贵族卖了多大力气，这从上世纪一位英国法学家达尔林普尔那儿就可以看到，他在自己的著作“封建所有制”³³⁴中以极其坦率的态度证明：在为所有权进行的诉讼中，在资产阶级大发横财时期的英国，法学家对于有关财产的每一条法律和每一份文件就作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解释；在贵族阶级发财致富的苏格兰，则作有利于**贵族阶级的**解释，而在两种场合下，都充满着敌视人民的精神。

上述的萨特伦德伯爵夫人的土耳其式的改革，至少可以从马

尔萨斯主义的观点来证明是对的。但是,其他的苏格兰贵族还更进了一步。在以羊代替人以后,他们紧接着又以野兽代替羊,而以狩猎区代替牧场。在这方面起主导作用的是阿托尔公爵。

“在征服英国以后,诺曼诸王把英国的大片土地改变成森林;现在这里的领主也是这样对付苏格兰高地的。”(罗·萨默斯“苏格兰高地的来信”1848年版)³³⁵

为了要给阿托尔公爵的野兽和萨特伦德伯爵夫人的羊腾出地方而被赶走的那群人的情况究竟如何呢?他们被迫逃往何方呢?他们在哪里找到了容身之处呢?

在北美利坚合众国。

英国雇佣奴隶制的反对者有权谴责黑人奴隶制:但是萨特伦德公爵夫人、阿托尔公爵、曼彻斯特的棉纺大王们——决不可能!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1 月 21 日

载于 1853 年 2 月 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687 号,并摘要载于 1853 年 3 月 12 日“人民报”第 45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并根据“人民报”校对过

卡·马克思
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
——英格兰银行的措施³³⁶

1853年1月28日星期五于伦敦

1月26日“泰晤士报”上有一篇题为“自杀成风”的文章，发表了如下见解：

“常常可以看到，在我国每当公开执行绞刑之后通常会立即发生许多自杀事件，或不幸事故；这是处死某一著名罪犯对神经过敏患者和神经衰弱的人的强烈影响的结果。”

“泰晤士报”列举了一些事件来证实这种论断。其中一个事件是：在设菲尔德有一个疯子，当他同另一些疯子谈过关于巴尔布尔被处死的情形之后，就上吊自杀了。另一事件发生在一个十四岁的男孩身上，他也是上吊自杀的。

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大概也不会认为所举事实可以作为哪一种说法的论据。这里简直是在公开歌颂刽子手，因为死刑被称赞为社会的 *ultima ratio* (最后的手段)，而这一切居然登载在一家“指导性的报纸”的社论上。

“晨报”对“泰晤士报”的酷爱绞架和该报的血腥逻辑提出非常尖锐而又恰当的批评，并附有下面一个在1849年四十三天内发生的事件的很有趣的日志：

死 刑		杀人和自杀	
米尔兰·····	3月20日	汉纳·桑德耳斯·····	3月22日
		莫·乔·牛顿·····	3月22日
普利·····	3月26日	约·乔·格利森——在利 物浦四次杀人·····	3月27日
斯密·····	3月27日		
豪·····	3月31日	在莱斯特杀人和自杀·····	4月2日
		在巴特毒杀事件·····	4月7日
		威·贝利·····	4月8日
兰迪奇·····	4月9日	约·华德杀死了自己的 母亲·····	4月13日
萨位·托马斯·····	4月13日	亚德利·····	4月14日
		道克西杀死了父亲·····	4月14日
		约·贝利杀死了自己的 两个孩子之后自杀了·····	4月17日
约·格里菲思·····	4月18日	查理·奥弗顿·····	4月18日
约·拉什·····	4月21日	丹尼尔·霍姆斯登·····	5月2日

这个统计表证明（“泰晤士报”也不得不承认这点），不仅自杀而且连最残暴的杀人行为都是在处死罪犯之后立即发生的。奇怪的是，上述文章甚至没有拿出任何一个论据和前提来阐明它所宣扬的野蛮理论。的确，想找出一个原则，可以用来论证在以文明自负的社会里死刑是公正的或适宜的，那是很困难的，也许是根本不可能的。一般说来，刑罚应该是一种感化或恫吓的手段。可是，有什么权利利用惩罚一个人来感化或恫吓其他的人呢？况且历史和统计科学非常清楚地证明，从该隐以来，利用刑罚来感化或恫吓世界就从来没有成功过。适得其反！从抽象权利的观点看，只有一种刑罚理论是抽象地承认人的尊严的，这就是康德的理论，特别是当黑格尔用了一个更严谨的定义来表述它的时候。黑格尔说：

“刑罚是罪犯的**权利**。它是罪犯本身意志的行为。罪犯把违法说成是自己的权利。他的犯罪是对法的否定。刑罚是这种否定之否定，因而又是对法的肯定；这种法是罪犯自己要求的，并且是他强加于自身的。”³³⁷

毫无疑问，这种说法有些地方好像是正确的，因为黑格尔不是把罪犯看成是单纯的客体，即司法的奴隶，而是把罪犯提高到一个自由的、自我决定的人的地位。但是，只要我们稍微深入些观察问题的本质，就会发现，德国唯心主义只是通过神秘的形式赞同了现存社会的法律；在这里是如此，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也是如此。如果用“自由意志”这个抽象概念来顶替有着行为的现实动机和受着各种社会条件影响的一定的人，如果只用人的许多特性的一个特性来顶替人本身，难道这不是荒谬的吗？这种把刑罚看成是罪犯个人意志的结果的理论只不过是古代《jus talionis》（“报复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思辨表现罢了。直截了当地说：刑罚不外是社会对付违犯它的生存条件（不管这是些什么样的条件）的行为的一种自卫手段。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比刽子手更好的自卫手段，并通过“世界指导性的报纸”把自己的残酷宣称为“永恒的法律”，这样的社会也实在是太美妙了。

阿·凯特勒先生在他的高超的科学著作“人和人的能力”³³⁸一书中写道：

“有一种预算，是我们根据它有规律地进行开支的，这就是监狱费、拘留所费、断头台费…… 我们甚至可以用我们预计每年出生和死亡人数的方法来预算出将会有多少人用自己亲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双手，将有多少人进行欺诈，将有多少人进行毒杀。”

凯特勒先生在 1829 年发表的对可能出现的罪行的估计，不仅仅以惊人的准确性预算出了后来 1830 年在法国发生的犯罪行为的总数，而且预算出了罪行的种类。凯特勒引用的下面这个

1822—1824年间的统计数字证明,社会的这一或那一部分国民犯罪行为的平均数与其说决定于该国的特殊政治制度,不如说决定于整个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基本条件。美国和法国的一百个被判刑的罪犯的情况是这样的:

年 龄	费拉得尔菲亚	法 国
21岁以下.....	19	19
21岁到30岁.....	44	35
30岁到40岁.....	23	23
40岁以上.....	14	23
合 计	100	100

这样,如果说大量的犯罪行为从其数量和种类就会揭示出像自然现象那样的规律性,或者如果说,照凯特勒的说法,“在两个领域(物理世界或社会生活)的哪一领域中动因非常合乎规律地导致一定结果,这是很难断定的”,那末,应不应该认真考虑一下改变产生这些罪行的制度,而不是去颂扬那些处死相当数目的罪犯来为新的罪犯腾出位置的刽子手呢?

理查·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1793年和1853年,三封信”(140页)³³⁹的出版是轰动一时的事件之一。这本小册子的第一部分考察了1793年革命时期和革命以前的时期,由于作者公开和大力地抨击了英国人对这个时代的陈旧的偏见,这一部分是值得称赞的。科布顿先生证明,在革命战争中英国曾是侵略的一方。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并没有独创的见解,实质上他只是重复英国过去的最伟大的小品文作家、已故的威廉·科贝特下过的结论,而且要逊色得多。另一部分虽然用经济学观点写成,却多少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科布顿先生极力证明:关于路易—拿破仑企图入侵英国的臆测是完全荒谬的,关于英国未设防的流言并没有现实的根据,而且

这些流言只是希望增加国家开支的人散布出来的。他根据什么来证明路易—拿破仑对英国不怀一点敌意呢？他根据的就是拿破仑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跟英国翻脸。他又根据什么来证明敌人不可能侵入英国呢？照科布顿先生的说法，就是根据英国在八百年间没有遭受过侵犯这一点。最后，他根据什么理由来证明关于国防情况令人不满的叫嚷是纯粹自私自利的欺人之谈呢？他根据的就是最高军事当局的声明：他们感到非常安全！

路易—拿破仑甚至在立法会议上还从来没有遇到哪一个崇拜者是如此地轻信他的真诚意愿与和平意愿，而现在他却十分意外地发现以理查·科布顿先生就是这样的崇拜者。拿破仑的一贯维护者——“先驱晨报”——发表了（在昨日那一号）一封信，这封信是给科布顿先生的，而且大家确信是在波拿巴本人直接唆使下写成的；萨托里的至高无上的英雄³⁴⁰在信中向我们担保，只有在女王^①遭到起来暴动的民主派的威胁因而需要他的二十万名 *décembraillards*，或呐喊者^②的时候，他才会光临英国。但是，按“先驱报”的意思，这个民主派不是别人，正是科布顿一伙人！

必须承认，仔细读过上述的小册子之后，我们自己也开始担心，是不是会发生像侵犯大不列颠这样的事。科布顿先生不能算是幸运的预言家。在废除谷物法之后，他旅行了大陆，甚至访问了俄国；回国后他说，一切都很正常，暴力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各国人民都一心一意地致力于商业和工业活动，现在都给自己选择了一条平静的、没有政治风暴、爆发和震荡的纯业务的发展道路。他的预

① 即维多利亚。——编者注

② *décembraillards* (*décembre*+*braillards*)直译是：“十二月会的呐喊者”；指波拿巴的十二月十日会的成员。——编者注

言还未来得及传到大陆，整个欧洲就爆发了 1848 年革命，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科布顿先生简短的预言的讽刺性的回答。在根本没有和平的地方，他却说那里有和平。

如果认为曼彻斯特派的和平论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那就大错特错了。它只是把问题说成应当用商业方法代替打仗这种封建方法，应当用资本代替大炮。和平协会昨天在曼彻斯特开了会，会上几乎一致宣称，只要报刊停止它们对路易·拿破仑的统治进行的令人讨厌的攻击而沉默下来，就不会有任何理由怀疑他有什么侵犯英国安全的意图。在注意这篇声明的时候，使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下院通过了增加陆海军费用，竟没有遭到任何反对，而且没有一个出席和平会议³⁴¹的议员讲一句反对扩军提案的话。

在因议会延期召开而出现的政治沉寂的时期，报刊的注意力集中在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当前的改革方案和英格兰银行最近关于贴现率的规定。

本月 24 日“泰晤士报”向公众报道说，新的改革方案正在草拟中。关于改革方案的性质，从查理·伍德先生在哈里法克斯的竞选演说中就可以看出，他在演说中表示反对各选区一律平等的原则；其次，从詹姆斯·格莱安在卡赖尔的演说也可以看出，他在演说中反对秘密投票；最后，根据下面流传的一种看法也可以看出，这种看法就是：甚至约翰·罗素³⁴²在 1852 年 2 月开的极小的改良主义药丸也是过于强烈和过于危险的。但是，还有一些迹象使人产生了更大的怀疑。联合内阁的喉舌“经济学家”在 1 月 22 日的这一期中不仅肯定：

“我们的代议制的改革被列为最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才是不久以前的事情”，而且硬说“我们还没有从事立法活动的初步材料。选举权的扩大、

平等化、调整、修改、保护和重新分配，这就是问题的各个方面，而其中每一方面都需要深入考虑和认真研究……不能说我们有一部分国家活动家对所有这些问题或其中若干问题缺乏应有的有用知识，不过他们的知识是偶然获得的而不是经过一番功夫得来的，因而这些知识很杂乱、片面和不完全……显然，唯一的出路就是选出一个问题研究委员会来研究同这个问题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全部问题。”

这样，coram publico（当着全体人民，当着公众）研究政治的任务又摆在我们的玛士撒拉的内阁³⁴³面前了。皮尔的同僚、墨尔本的同僚、坎宁的助手、老格雷的副手以及在利物浦勋爵手下或在格伦维耳勋爵内阁里供职的人们，原来所有这些半个世纪前才开始自己的活动的新手，都因为经验不足而不能向议会提出什么有关选举改革的彻底的建议。看来，“经验随年岁而增加”这个旧谚语也得被推翻了。“每日新闻”惊叫道：“各派老将的联盟的这种谦虚态度可笑到了难以形容的地步！”同时它质问道：“你们的改革方案又在哪儿呢？”“晨报”回答说：

“我们的意见是，现在这次会议根本不会讨论任何改革法案。也许会试着采用一些立法措施来防止贿选和惩罚贿选，对其他一些次要问题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也许会努力去清除在国内议会代表名额的分配中产生的缺点，不过这种立法措施是不能称为新改革法案的。”

至于英格兰银行最近关于贴现率的规定，那末初期由于这些规定而引起的混乱，现在已经平息了。实业家也和理论家们一样相信，目前的繁荣景象不会再有大的中断或根本中止。但是，请读一读“经济学家”的下面这段话吧：

“今年我国种植小麦的广大地区什么东西也没有长出来。在我国土壤肥沃的广大区域有许多用来种植小麦的地方至今没有播种，某些已经播种的地方情况也不妙，因为麦苗不是死了就是很不茁壮，要不就是遭了严重的虫灾，以致这些地区的所有者的前景未必会比根本没有下种的好。要把全部用来种

植小麦的面积重新翻耕现在已经几乎不可能了。”

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市场和矿井的开发而暂时推迟了的危机无疑地将在歉收时发生。银行关于贴现率的规定只不过是第一个不祥之兆罢了。1847年，英格兰银行曾十三次变更贴现率。1853年这种措施将会有几十次。最后，我想向英国经济学家们提个问题：现代政治经济学在反对重商主义时曾证明：黄金的流入和流出对国家没有什么意义，产品只是同产品交换，黄金像其他产品一样也是产品，可是现在，同一个政治经济学在其生命终结的时候又以极其恐慌的心情注视着黄金的流入和流出，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经济学家”说：“银行必须通过自己的业务来达到的实际目的，就是阻止资本输出。”但是，“经济学家”是否打算阻止棉织品、生铁、毛织品和衣料的输出这样的资本输出呢？难道黄金不是像其他产品一样也是产品吗？“经济学家”是不是在晚年也变成了重商主义者呢？它是不是打算让外国资本自由输入而禁止英国资本输出呢？它是不是希望废除文明的保护关税政策而恢复土耳其式的保护关税政策呢？

当我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得到一个消息说政界里广泛流传着一种说法，好像格莱斯顿先生与阿伯丁内阁的许多领导人物在所得税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并且这位可尊敬的绅士的辞职可能会是这些分歧的结果。如果是这样，墨尔本勋爵政府的前任财政大臣弗兰西斯·贝林先生也许就是格莱斯顿的继承人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1 月 28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3 年 2 月 1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695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
国防。—— 财政。—— 贵族的
死绝。—— 政局

1853年2月8日星期二于伦敦

“每日新闻”断言，政府现在正在认真地研究设立海防民军的问题。

银行的报告说明，黄金的数量又减少了 362084 英镑。最近两个星期内支出的黄金约 1000000 英镑，其中一部分运往大陆，另一部分铸成货币运往澳大利亚。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储备也在继续减少（尽管英国的黄金大量流入法国），这表明私人已经开始在储藏黄金，而这一点又清楚地说明：人们都不相信拿破仑政权能够持久。

现在工人普遍要求提高工资，特别是造船工人、采煤工人、工厂工人和机械工人。这种要求是由普遍的繁荣引起的，而这种要求不能看做是一种十分异常的现象。更加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农业工人的组织得井井有条的罢工——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件。南威尔特郡的农业工人举行了罢工，要求提高工资 2 先令，现在他们一周的工资只有 7 先令。

根据中央户籍局局长的季度报告，去年从大不列颠迁往国外的每天有 1000 人；人口的增长数略有下降。与此同时，结婚的人数

却有显著的增加。

在最近两周内,由于墨尔本子爵和梯尔科奈尔伯爵以及牛津伯爵的亡故,贵族中又有三家死绝。如果说有什么阶级是马尔萨斯关于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规律的例外的话,那末这就是世袭贵族阶级。就拿大不列颠的贵族和从男爵为例来说吧。目前,诺曼贵族已经是绝无仅有;最初的詹姆斯一世时代的从男爵留下的也不多了。上院的绝大部分议员是在1760年被册封为贵族的。从男爵的称号始于1611年詹姆斯一世在位时期。当时获得从男爵这个称号的贵族,现今只剩下13家了;在1625年被封为这个爵位的贵族,现在只剩下了39家。这个规律的作用的另一个证明就是威尼斯贵族的异常迅速的死绝,尽管威尼斯贵族的所有的子孙,一降生就被列为贵族。据阿姆洛的计算,在他那个时候,在威尼斯议会享有表决权的贵族有2500人³⁴⁴。到十八世纪初这种贵族只剩下1500人,而其中还包括了在这段时期补充进来的一些新的贵族。伯尔尼最高评议会在1583年到1654年这段时间里曾经把487家列入世袭贵族;其中在两个世纪之内死绝的有399家,到1783年,剩下的只有108家。如果看看更占一些的历史时期,那末塔西伦告诉我们,克罗狄乌斯帝王册封了整整新一代贵族,《*exhaustis etiam quas dictator Caesar lege Cassia et princeps Augustus lege Saenia sublegere*》(“因为甚至执政官凯撒根据卡西乌斯法和元首奥古斯都根据谢尼法补充册封的那些贵族也都死绝了”)①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大自然并不珍惜世袭贵族,同时,可以大胆地断言,如果不是经常注入新的血液,如果不是有人为地加以维持的

① 塔西伦“编年史”。——编者注

制度，那末英国的上院恐怕早已因自然死亡而绝灭了。现代生理学认为，在高级动物中间，生殖力同神经系统的发展，特别是同脑髓的增加成反比例。但是，谁也不敢说，英国贵族的死绝同脑髓的过多有任何联系。

看来，那些预言“千年王国”的到来并且为它奠定了基础的政党，现在，即还在下院开会之前，就认为它已经不存在了。2月4日的“泰晤士报”说道：

“曼彻斯特派对阿伯丁勋爵的政府大发雷霆……而爱尔兰天主教和爱尔兰社会主义^(?)则把他们值得怀疑的热烈的赞扬献给得比勋爵和迪斯累里先生。”

“泰晤士报”使用的“爱尔兰社会主义”一词，显然是指关于保障租佃者权利的宣传。我打算在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再来说明，现代所有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同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³⁴⁵。其他报纸很少赞同刚刚引用的“泰晤士报”的这篇文章的见解，这一点我们从“晨报”的下面这句话可以看出来：

“假如我们认为爱尔兰人能够背叛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的原则，我们就是轻视了他们。”

阿伯丁的报纸的盛怒，是由于“千年”内阁的希望完全破灭的事实引起的。萨德勒先生和克奥先生是爱尔兰旅的公认的领袖，——一个是在内阁中，另一个是在战场上。萨德勒先生是指导者和操纵者，克奥先生是发言人。收买了这两个人，就可以指望控制他们全体。但是，爱尔兰旅的成员被派到议会来担负着一项义务，这就是：充当反对派，对任何一个不确立宗教上的完全平等和不实现舍尔曼·克罗弗德关于爱尔兰租佃专权利法案³⁴⁶原则的政

府保持独立。由此可见，“泰晤士报”所以对这些人发怒，是因为这些人不愿意毁弃自己的诺言。克耳斯（密斯郡）的集会和宴会使它发怒的直接原因。分发出去的通知号召所有收到通知的人对“不久前爱尔兰议会党团队伍中的逃跑现象”表示自己的不满；同时还根据这个精神起草了决议。

内阁在爱尔兰旅身上打的主意落空了，这是事前就可以预料到的；但是，爱尔兰各个党派的性质和立场现在正在发生变化，看来不论是这些政党本身还是英国报刊，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些变化的深刻意义。主教们和绝大多数僧侣都赞同参加政府的天主教议员的行为。卡尔洛的僧侣完全支持萨德勒先生，假如不是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的成员齐心协力的话，他是不会遭到失败的。真正的天主教政党对这个分裂的看法，可以从法国的耶稣会全欧机关报“宗教、哲学、政治、科学和文学界”的一篇文章看出来。这篇文章说：

“能够有充分根据地对克奥先生和萨德勒先生提出的唯一的指责，就是他们让人家把他们同两个团体（即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和宗教平等拥护者协会）牵扯在一起，这两个团体只有一个目的——使毁灭爱尔兰的无政府状态合法化。”

“宗教、哲学、政治、科学和文学界”在激怒中泄露了自己的秘密：

“我们深感遗憾的是，这两个团体公开同主教和僧侣作对，而且这是发生在主教和高级僧侣过去一向是人民和国民组织的最能得到信赖的领导者的国家里。”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假如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的拥护者偶尔出现在法国的话，那末“宗教、哲学、政治、科学和

文学界”是会想尽办法把他们放逐到凯恩^①去的。合并取消派³⁴⁷的鼓动纯粹是政治运动，因此天主教僧侣能够利用这个鼓动从英国政府那里争取到一些让步，在这里爱尔兰人民只是神甫手中的工具。保障租佃者权利的鼓动则是具有深刻的根源的社会运动，这个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会使教会和爱尔兰革命政党之间发生彻底的破裂，从而把人民从几百年以来使他们所做的全部努力和牺牲以及他们的全部斗争化为乌有的宗教奴役下解放出来。

现在，我们来谈谈郎卡郡改革运动的领导者们和该郡的代表本月3日在曼彻斯特举行的“聚会”。大会主席是乔治·威尔逊先生。他只谈到商业和工业区的代表名额同农业区的代表名额不平等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他说：

“在巴金汉、多尔塞特、威尔特、北安普顿和塞洛普这5个郡里，52921名选民选出了63名议员，而拥有89669名农村选民和84612名城市选民即共计174281名选民的郎卡郡和约克郡也只选出同样数目的议员。假如仅仅根据选民数字按比例地选举议员的话，那末这5个郡只能得到19个席位，而郎卡郡按同样的代表比例，则有权得到207个席位。12个大城市或城市选区（把伦敦算作两个城市选区）拥有192000名选民、3268218名居民和383000家住户，共选举24名议员。同时，安多佛尔、巴金汉、契珀楠、考克茅斯、托特涅斯、哈里季、洪尼顿、泰特福德、利明顿、马尔波罗、大马尔波罗和里士满共有3569名选民、67434名居民和1373家住户也同样选举24名议员……即使是最胆怯的改革家和最温和的人，大概也不会反对剥夺居民在5000人以下的小地方的代表权而给大选民区增加20个以上的席位。”

议员米尔纳·基卜生先生谈论了国民教育和知识税的问题。关于改革法案，在他的演说中只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他关

^① 凯恩是南美法属圭那亚的行政中心。过去法国反动统治者经常把政治犯流放到这里。——译者注

于平等的选区这一条的声明：

“这一条也许会成为一一个重大的阶级问题。”

另一位议员布拉瑟顿先生说：

“目前，任何一个不规定平等分配代表名额的改革法案都不能令人满意。”

但是，最值得注意的还是议员布莱特先生、这位“曼彻斯特大人物”中间的真正大人物的演说。他说：

“政府是由辉格党和皮尔派组成的联合政府…… 我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理由可以庆幸，以为我们的政府里已经有了能够致力于新的原则、执行新的政策的人，有了广泛地开创事业而不需要全国各地所有的改革拥护者推动他们的人。（喊声：“对！”）”

关于议会改革，布莱特发表了如下的意见：

“假如路易一拿破仑在法国实行像我们这样的代议制，假如他把所有的代表席位都给了最拥戴波拿巴王朝的农村地区，而不允许巴黎、里昂、马赛选举代表，那末所有的英国报刊都会对他在法国实行的这种虚伪的代表制度加以谴责。（喊声：“对，对！”）…… 这里，郎卡郡，人口占英国的八分之一，征税的财产占英国的十分之一，住户也占英国住户总数的十分之一…… 我们开始懂得了我们是处在什么样的地位。（热烈的掌声）…… 还有一个小障碍，这就是秘密投票碰到的障碍。（喊声：“听啊，听啊！”）我读了约翰·罗素勋爵在他竞选时发表的演说；大概，伦敦的选民们当时的情绪特别好，否则他们是不会不反对他所说的‘反对任何秘密’的。看完这个演说后，我自言自语地说：‘好，假如我是你的一个拥护者，我就会建议你带上“泰晤士报”编辑部的记者参加内阁的最近一次会议。’（喊声：“对！”笑声）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詹姆斯·格莱安爵士的论据，他声明说，‘他不认为，可以把秘密投票变成一种必要的制度’。为什么不能把秘密投票变成一种必要的制度呢？既然公开投票变成了一种必要的制度，那末秘密投票也同样可以变成一种必要的制度。至少，秘密投票在马萨诸塞州（或许也在美国其他州里）已经变成一种必要的制度；同时，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很了解，他在卡赖

尔两三千居民面前讲的话是多么缺乏根据。那一天下着雨，我猜想，听众们在雨伞底下是不能十分仔细地斟酌他所提出的论据的。

布莱特先生在结束他的演说时说：“我们不应当忘记，英国从 1688 年革命以来，特别是在最近几年内获得的一切成果，都是在工业和商业阶级反对这个国家的贵族阶级和特权阶级的勇敢的斗争中取得的。我们应当继续这种冲突，伟大的事业还有待于完成。（掌声，喊声：“对，对！”）”

一致通过的决议写道：

“大会号召同郎卡郡有联系的自由派代表们把自己看成一个以促进有利于议会改革的任何措施为己任的委员会，以便保证郎卡郡的代表名额能够增加得同该郡的人口、工业、财产和文化相适应。”

在这个大会上，曼彻斯特派又重复了他们的战斗口号：“工业资产阶级反对贵族阶级”。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泄露了他们的政策的秘密。这秘密就是：他们力图剥夺人民在国家事务中的代表权，并且严格维护他们自己的特殊的阶级利益。所有有关秘密投票、国民教育、知识税等等的议论都不过是修辞性质的点缀。他们认真提出的唯一的目标就是**选区的平等**，至少这是作为通过决议的基础和加给代表们以相应的义务的唯一的一条。为什么？在选区平等的情况下，城市的利益就会压倒农村的利益，资产阶级就能把下院控制在自己手里。如果曼彻斯特派能够获得选区的平等，而又能避免对宪章派作重大的让步，那末后者碰到的就将不再是两个互相竞争的、双方都争先恐后地力图把他们拉到自己方面去的敌人，而是一支紧密团结的大军，他们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以抵制人民的要求。这样，就会在一个时期内不仅在工业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建立起资本的无限统治。

对于联合内阁来说，那些在克耳斯和曼彻斯特对上届政府所作的热烈的赞扬可以说是一个不吉之兆。议员鲁卡斯先生在克耳

斯声称说：

“在租佃者权利的反对者当中，没有比兰斯唐侯爵、帕麦斯顿勋爵、悉尼·赫伯特等人更坚决的了……辉格党的内阁和格莱安的支持者不是对租佃者问题经常发表敌意的怨言吗？另一方面，我们再来看看托利党的官方代表；让每一个读过由各个党派提出的提案的人说句良心话：得比内阁在这个问题上的行为是不是比辉格党更诚实一千倍？”

米尔纳·基卜生在曼彻斯特的大会上发表声明说：

“即使上届内阁的预算案整个说来非常糟糕，它在将来的政策方面总还有一些好的迹象。（喊声：“对，对！”）上届财政大臣至少是打开了局面。我指的是茶叶税。据我听到的可靠的消息说，上届政府曾经打算废除广告税。”

布莱特先生的赞扬更进一步：

“在所得税问题上，上届政府做的是很大胆的。从占有英国很大一部分不动产和地产的农村贵族方面提出和支持一个规定不动产的税率和商业收入以及其他非固定收入的税率不同的草案，这是一个我们不当加以忽略的步骤，在我们的地区是应当欢迎这个步骤的。而迪斯累里先生还提到了一点，应当说，为此我向他表示感谢。在他报告预算案的前言中，在使他遭到最终失败的那天夜里同所有联合起来反对他的力量进行了三个小时的舌战的演说中，他谈到了遗产税（而所谓遗产税，按我们的理解，包括动产继承税和遗产印花税），他认为这些税是需要加以整顿的。（热烈的掌声）”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2 月 8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3 年 2 月 2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699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 意大利起义。——不列颠的政策

1853年2月11日星期五于伦敦

从意大利传来的革命消息，突然打破了伦敦很久以来普遍存在的、在天然的浓雾复盖下的政治上的消沉气氛。根据电报得知：本月6日在米兰爆发了起义；散发了两份传单，一份由马志尼署名，另一份由科苏特署名，传单号召奥地利军队中的匈牙利人站到革命者方面来；起初起义曾经被镇压下去，但随后又重新爆发起来；驻守军火库的奥地利人被全部歼灭，等等；米兰的城门已经关闭。不错，法国政府的报纸发表了本月8日来自伯尔尼和本月9日来自都灵的两则补充消息，消息说起义在7日已被彻底镇压下去。但是意大利的朋友们却认为，英国外交部接连两天都没有获得任何直接的情报，这是一个吉兆。

巴黎传说皮萨、鲁卡和其他一些城市都处在巨大的骚动中。

在都灵，内阁在接到奥地利领事的通知以后，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伦巴第的局势。最早的消息传到伦敦是2月9日，这一天恰好是1849年罗马共和国宣告成立的纪念日³⁴⁸，是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死的日子，也是1689年詹姆斯二世被推翻的日子，这真是一个巧合。

假如不能有几个奥地利团的兵力转到革命方面来，那末目前

的米兰起义成功的希望是不大的。最近我会接到一些从都灵寄来的私人信件,也许,这些信件会使我有可能对所发生的一切作详细的报告。

关于不久前路易一拿破仑恩赐的大赦的性质,报刊上发表了法国流亡者的一些评论。维克多·福萨德(过去的军官)在布鲁塞尔的“民族报”³⁴⁹上声明说,他在赦免的名单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感到惊奇;其实,当五个月之前从阿尔及利亚逃跑的时候,他就已经自己赦免了自己。

“通报”最初报道说,有三千名流放者被赦免,只有大约一千二百名公民不受法律保护。但是过了几天之后,这同一家有威望的报纸又报道说,被赦免的有四千三百一十二人;这就是说,路易一拿破仑实际上赦免的人数比过去被他判罪的全部人数还多一百人!仅巴黎和塞纳省被流放的人就达四千人,其中获赦免的只有二百二十六人。埃罗省被流放的有二千六百一十一人,其中被赦免的有二百二十九人。涅夫勒被流放的有一千四百七十八人,其中有一千一百人是平均有三个孩子的家庭的家长,他们被赦免的有一百八十人。在瓦尔省的二千一百八十一名流放者中被放回的有六百八十七人。在被流放到凯恩去的一千二百名共和党人当中,被赦免的人数不多,而且大部分是已经从这个服苦役的移民区逃跑的人。流放到阿尔及利亚而现在被放回的人倒是不少,但是这个数目是根本没有办法同被押解到整个非洲去的大批人的人数相比的。这个数字据估计共达一万二千人。现在居住在英国、比利时、瑞士和西班牙的流亡者,除了极少数之外,几乎全部都没有获得赦免。另一方面,被赦免的名单上包括很多从来没有离开法国或者在很久以前已经被允许回国的人;不但如此,甚至有些人的名字,在名

单上出现好几次。而最荒唐的是，名单上还有很多谁都知道已经在12月的血腥 battues (围剿) 中被杀害的人的名字。

昨天，议会又召开了会议。在上院演出了一场戏，这可以算是“千年”内阁的未来活动的一个应有的序幕。得比伯爵质问阿伯丁伯爵，政府打算提出什么措施提交议会审议。后者回答说，他早先已经说明过自己的原则，再重复一遍是不必要的，而在向下院宣布这些原则之前，在这里再作进一步的说明是过早的。接着是一场十分奇妙的对话，在这场对话中，得比伯爵的话一句接一句，而阿伯丁伯爵只是意味深长地不住地点头。

得比伯爵：“我想请问勋爵阁下：在这次会议期间，他打算向上院提出什么样的措施？”

哑场几秒钟；勋爵阁下并未起座。

得比伯爵：“也许，沉默就意味着没有措施？”（笑声）

阿伯丁伯爵嘟囔了一句什么，谁也没有听清。

得比伯爵：“我是否可以请问一下，向上院将要提出什么样的措施？”

没有任何回答。

议长提议休会，上院通过了休会的决定。

假如我们从上院转到“忠于女王陛下的下院”的话，那末我们也许不能不同意：阿伯丁伯爵用他的沉默阐述内阁的纲领，比约翰·罗素勋爵昨天晚上用冗长而费解的演说阐述得要清楚得多。罗素的演说可以简单地归纳如下：“重要的不是措施而是人”；把所有应由议会审议的问题的解决推迟一年，而在此期间，女王陛下的大臣们的薪俸将按时发给。约翰·罗素勋爵大致用下面的话表达了政府的这个意图：

“至于应当加以确定的陆军、海军和炮兵的人员数目，那将不会超过圣诞节前所确定的数字。至于预算中各个支出项目的数额，它们将比去年的预算

大大增加…… 将提出一项法案,根据这项法案加拿大立法机关将有权使用加拿大的后备教会基金…… 商业大臣将提出关于领港员问题的法案……

对女王陛下的犹太臣民的权利限制将要废除…… 将提出有关教育的提案。我还不能肯定,我将以女王陛下政府的名义在这方面提出的草案的范围究竟有多么广泛。这个草案包括有关贫苦阶级的教育的措施,以及关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建议…… 流放到澳大利亚去的制度将要废除…… 将提出有关减轻对犯罪行为的惩罚的制度的法律草案…… 在复活节之后,财政大臣将立即或尽快地提出本年度的财政草案…… 最近几天,上议院院长将说明他准备提出的有关修正法律的措施…… 爱尔兰事务大臣准备几天后提出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的提案,该委员会将负责研究关于爱尔兰的大地主和租佃者的一个法律草案…… 大臣们将尽全力来重新规定今年的所得税,而不必再进行任何讨论和辩论。”

关于议会改革,约翰·罗素勋爵声明说,它可能成为下届会议的讨论题目。这就是说,目前不会提出任何改革法案。并且,小约翰还竭尽全力否定这样一种设想:似乎他曾在什么时候答应提出比他在上届会议期间提出的法案³⁵⁰更带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代议制的草案。他甚至由于把这种诺言硬加在他的身上感到生气。他从未说过这样的话,也从未想到过这一点。他甚至不能担保,他打算在下届会议上提出的法案能像1852年的法案那样全面。关于贿赂和舞弊行为,他说:

“关于进一步制止贿赂和舞弊行为的措施是否必要,我认为最好等一等再发表自己的意见。我只想指出一点: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简直无法形容下院对顶点约翰³⁵¹的这篇演说的反应多么冷淡和多么感到惊奇,很难断定,究竟是他的朋友大惑不解还是他的敌人的幸灾乐祸占主要地位。但是,看来所有的人都认为这篇演说彻底推翻了卢克莱修的关于《nil de nihilo fit》(“无中不能生

有”)^①的学说。至少约翰勋爵是从无中生出了一种东西，这就是一篇冗长的、枯燥无味的演说。

原来以为，内阁是把自己的生存同新的所得税税额和新的改革法案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的。但结果是：关于所得税，建议以现有的形式继续保留一年。关于改革法案（甚至是在辉格党所规定的限度内的改革法案）则宣布说，大臣们只有在他们继任一年的条件下才准备提出。总的来说，除了改革法案以外，这些都是上届罗素内阁的纲领的再版。甚至预算草案的讨论都要推到复活节以后，这样，大臣们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领到一季的薪俸。

关于部分改革的提案几乎完全是从迪斯累里先生的纲领中抄来的。例如，修正法律、废除流放到澳大利亚去的制度、关于领港员问题的法案、设立租佃者权利问题委员会等等。属于现任内阁自己的条款只有设想中的教育改革（这个改革的规模，根据约翰勋爵自己告诉我们的话来看，不会比他本人更大）和废除对于拉约涅尔·路特希尔德男爵的法律限制。赋予这个犹太高利贷者（大家都知道，他是波拿巴所发动的政变的同谋者之一）以选举权，是否就能使英国人民得到很大的满足，那是值得怀疑的。

由在最近的大选中遭到完全失败的两个政党的代表组成的内阁的这种无耻行径，除了下面这个原因之外，是很难用别的理由来解释的，这就是：任何新的改革法案都会要求解散现在的下院，而下院的大多数却牢牢抓住他们的议员席位不放，因为这些席位是他们高价买来的，是靠微不足道的多数选票获得的。

“泰晤士报”试图用来安慰读者的办法可以说是最妙不过的

^① 卢克莱修：“论物性”。——编者注

了：

“下届会议，——这个期限比明天要更肯定得多，因为明天不仅取决于意志，而且取决于办事拖拉的人的生命。而只要世界不毁灭，下届会议却一定会到来。既然如此，我们就把整个议会改革问题推迟到下届会议召开时再谈，而让内阁安静一年吧！”

至于谈到我的看法，我认为，在目前社会舆论消极冷淡的情况下，“在贵族联合内阁的冰冷气氛的笼罩下”，改革法案不由大臣们赏赐给人民，这对人民来说倒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不应当忘记，阿伯丁勋爵曾经是托利党内阁的成员，这个内阁在 1830 年曾经拒绝同意改革方面的任何一个步骤。全国性的改革必须通过全国性的宣传运动来实现，而不能依靠阿伯丁阁下的恩赐。

最后，我还想提到一件事：上星期一，**全国保护不列颠工业和资本协会**³⁵²的总委员会在里士满公爵主持下在南海公司大厦召开了一个专门会议，会上该协会通过了解散协会的明智的决议。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2 月 11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3 年 2 月 25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3701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
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
弗兰茨·约瑟夫遇刺。——米兰
起义。——不列颠的政策。
——迪斯累里的演说。
——拿破仑的遗嘱

1853年2月22日星期二于伦敦

来自施土尔威森堡^①的电报报告了如下的消息：

“本月18日下午一时，沿维也纳城堡散步的奥皇弗兰茨·约瑟夫突然遇刺，行刺者是一个名叫拉斯洛·李伯尼的匈牙利的裁缝帮工、原维也纳的骠骑兵。行刺者用短剑刺伤了皇帝。侍卫官奥当奈尔伯爵拦住了行刺者。弗兰茨·约瑟夫脑后被刺伤。这个二十一岁的匈牙利人被侍卫官用马刀砍倒在地上，并当场被捕。”

据另外一种传说，行刺者使用的武器是火枪。

在匈牙利，最近刚刚揭发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旨在推翻奥地利的统治的密谋案。

“维也纳日报”发表了几份军事法庭关于三十九人案件的判决书，这些人的主要罪名就是他们曾经同汉堡的科苏特和卢施萨克共同策划密谋。

^① 匈牙利称作：塞克希费黑伐尔。——编者注

米兰的革命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拉德茨基立即颁布命令断绝同皮蒙特和瑞士的一切来往。也许在收到这封信之前，你们已经得到从意大利传到英国来的点滴消息。我希望你们能注意到米兰事件的一个特征。

拉德茨基元帅的助手斯特拉索尔多伯爵在他本月 6 日发布的第一道命令中坦率地承认，大多数的居民完全没有参加这次起义，虽然如此，这并不妨碍他宣布米兰实行特别戒严。在随后发布的、带有“2 月 9 日于维罗那”字样的公告中，拉德茨基推翻了他的部下的声明，力图利用起义的事捏造一些借口来捞一笔钱。除了显然属于奥地利党的人之外，他对所有的人都外以大量罚款，把这些钱拿来给卫戍部队用。他在本月 11 日的公告中说，“大多数居民，除了少数值得赞扬的例外，都不愿服从帝国政府”，他命令所有的司法机关即军事法庭没收所有同谋者的财产，而他给同谋下的定义是：

《Che tale complicità consista semplicemente nella omissione della denuncia a cui ognuno è tenuto》. (“拒绝告密本身就是同谋，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告密的义务。”)

根据这个理由，他可以拿 6 日发生起义，而 5 日居民没有告密为借口，立即把整个米兰没收。谁不愿作哈布斯堡王朝的间谍和密探，克罗地亚兵³⁵³就可以依法加以外置。一句话，拉德茨基宣布了一个新的进行大规模掠夺的制度。

米兰起义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它是整个欧洲大陆革命危机逼近的信号。这次起义是值得钦佩的，它是少数无产者的一次英勇的行动。这些手中只有短刀作为武器的少数无产者，竟敢于向卫戍部队和驻扎在四周的四万名欧洲精锐之师这样的强敌发动进攻；

而与此同时，意大利的财神的子孙们却在自己的民族饱受凌辱和蹂躏、流着鲜血和眼泪的时刻，沉缅于歌舞升平、灯红酒绿的生活。但是，把这次起义当作马志尼的种种不朽的密谋的最后结局来看，当作他针对着法国人民而发表的种种言过其实的宣言和盛气凌人的说教的最后结局来看，其结果却未免太可怜了。不过，我们只希望这种像法国人所说的 *révolutions improvisées* (即兴的革命) 能够从此结束。有谁听说过，伟大的即兴作者同时也是伟大的诗人呢？在政治方面，道理也同诗歌方面一样。任何时候革命都不能按照命令制造出来。在有了 1848 年和 1849 年的可怕的经历之后，要唤起民族的革命，只是身在远方的领袖的纸上的号召已经不够了。科苏特利用一个机会，公开地完全否认自己同起义的联系以及以他的名义发表的宣言。但是，他在事后要求大家承认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比他的朋友马志尼高明，这一点看来是十分令人怀疑的。“先驱”就这一点写道：

“我们认为有必要预先告诉我们的读者，这件事所涉及的完全是科苏特先生和马志尼先生的相互关系，而后者目前不在英国。”

马志尼的朋友德拉·罗科在给“每日新闻”的信中，就科苏特先生和阿哥斯提尼先生的种种否认写道：

“有人怀疑他们是在坐观起义的成败，准备或者分沾成功的荣誉，或者推脱失败的责任。”

前匈牙利大臣贝·瑟美列在致“纪事晨报”编辑的信中抗议“科苏特非法盗用匈牙利的名义”，他说：

“谁想要对作为国家活动家的科苏特作出自己的评价，他就应当仔细研究一下最近一次匈牙利革命的历史；谁想要了解他作为一个密谋家的才能，他就应当回顾一下去年的不幸的汉堡远征。”

革命虽败犹胜。这一点，从米兰的 *échauffourée* (盲目举动；有勇无谋的行动) 在大陆各国的统治者中间引起的恐怖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事件使他们大为震惊。只要读一读下面这封发表在官方的“法兰克福总邮报”上的信就可以知道了：

“柏林 2 月 15 日讯：米兰事件在这里造成了深刻的印象。关于这个消息的电报是本月 9 日传到国王那里的，那时正是宫廷舞会进行得最热烈的时候。当时国王立即宣布说，运动是同一个有深刻根源的密谋相联系的，这个密谋的枝桠遍布各地。他说，面对着这个革命运动，普鲁士和奥地利必须建立紧密的联盟……一位高级官员喊道：‘也许，我们不得不在波河上保卫普鲁士王国了’。”

一开始就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以至于在柏林逮捕了大约二十个居民，对米兰事件的“深刻的印象”就是这次逮捕的唯一理由。极端保皇主义的报纸“新普鲁士报”就因刊登了科苏特所写的一份文件而被没收。13 日，大臣冯·威斯特华伦向上院提出了一个匆匆拟定的法案，这个法案授权政府没收所有一切不是在普鲁士出版的报纸和书刊。在维也纳，逮捕和家宅搜查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立即开始了会谈，以便就政治流亡者问题向英国政府提出共同的抗议。请看，所谓的欧洲“列强”是多么脆弱，多么无力！革命地震的预报刚刚发出，他们就感到欧洲所有的王位都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虽然他们在自己周围布满了军队、绞架和监狱，他们却在被他们称之为“少数被人收买的恶棍的暴乱”面前发抖了。

“已经恢复平静”。是的，是恢复平静了。但这是在暴风雨的第一次爆发之后和它的第二次强劲的冲击之前出现的不祥的、可怕的平静。

让我们从大陆上的暴风骤雨的场面转到风平浪静的英国来

吧。看来，似乎小顶点约翰的精神主宰着官方世界的一切领域；似乎整个民族也像统治它的那些人一样变得麻木不仁了。甚至“泰晤士报”也发出了这样的悲叹：

“这也许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这也许是大火之前的烟雾……目前时期的特点就是阴郁沉闷。”

议会恢复活动了。不过，到目前为止，联合内阁的最富有戏剧性的和唯一引人注意的行动，还是阿伯丁勋爵的三鞠躬。关于约翰勋爵的纲领给他的敌人留下的印象，可以根据他的朋友的议论作出最好的判断。

“泰晤士报”说：“约翰·罗素勋爵发表了演说：他的演说还不如一个普通的拍卖商在拍卖旧家具、残货或小店铺用品之前的那一套兜揽生意的活动听……对约翰·罗素勋爵的演说的反应十分冷淡。”

众所周知，由于有更迫切地需要立法者处理的更加紧要的实际改革，新的改革法案被搁置下来了。目前，已经有实例可以说明，在实现改革的工具即议会本身尚未进行改革的时候，这些改革会具有什么样的性质。

2月14日，克兰沃斯勋爵在上院说明了他的法律改革的纲领。他的冗长的、枯燥无味的、含糊不清的演说的一大部分，是列举了人们期待他做而他还不准备做的那些事情。他为自己辩解说，他在羊毛口袋³⁵⁴上总共才坐了七个星期。但是，正如“泰晤士报”指出的，“克兰沃斯勋爵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活了六十三年，在六十三年中他当了三十七年律师”。依据道地的辉格党精神，他从以往的细小的法律改革所获得的比较大的成就当中得出一个结论：如果继续以过去同样的热忱实行改革，就会违反一切谦虚的规则。按照道地的贵族精神，他避免涉及教会法，因为“这会同

正当的利益完全相违背”。这些利益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使社会蒙受损失。在克兰沃斯勋爵所准备的措施中只有下面两项多少还有点意义。第一是“关于简化转卖土地的手续的法案”，这个法案的主要特点是，它使转卖土地更加困难，它增加了这方面的费用和技术上的障碍，而同时却并不减少拖延现象和简化转卖财产的复杂手续。第二是关于成立整理规章法³⁵⁵的委员会的提案，该委员会的全部功绩将是编纂出全部四十大本规章的索引。一个可怜的少女可以在忏悔神甫面前为自己辩护说，她虽然的确是生了一个孩子，但这个孩子非常小。毫无疑问，克兰沃斯勋爵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为自己的措施辩护，以抵御法律改革的最顽固的反对者的攻击。

由本月 18 日迪斯累里先生就英法关系问题向内阁提出的质询而引起的辩论，是到现在为止下院中唯一有趣的辩论。迪斯累里从普瓦提埃和阿津库尔³⁵⁶讲起，一直讲到卡赖尔的竞选运动和在哈里法克斯的圣职大厅里的演说。他的目的是要指责对拿破仑第三作无礼的批评的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和查理·伍德爵士。迪斯累里竟然出面为他所领导的政治派别的世仇波拿巴分子辩护，这就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老托利党的彻底的瓦解。他不可能再用比为法国现在的制度辩护更恰当的方式来开始自己的反对党活动了。我们只要对他的演说的这一部分作一个简单的分析，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它的软弱性。

当他企图说明公众对于英法关系的现状感到不安的原因时，他不得不承认，正是他本人执政时开始的大规模的军备活动，是这种不安的主要来源。尽管如此，他还是力图证明，增加和改进大不列颠的国防手段的唯一理由是由于现代科学运用于军事艺术而引起的那些巨大变化。他宣称，权威人士很久以前就已经承认必

须采取这种措施。1840年在梯也尔先生内阁时期，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政府曾经作了一些努力，其目的是至少为在国防方面实行新的制度打下基础，但是这些努力都白费了。在1848年大陆上爆发革命的时候，当时的政府得有机会又把社会舆论引向它所希望的有关国防的问题上去。但这次还是没有得到结果。只是在他和他的同僚应召领导政府的时候，国防的问题才最终成熟。他们当时所采取的措施可以归纳如下：

- (1)成立了民军。
- (2)整编了炮兵。
- (3)采取了充分巩固国家的军火库和沿海某些重要据点的措施。
- (4)提出了为海军补征五千名水兵和一千五百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的提案。
- (5)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恢复原有的实力；建立一支由十五到二十艘战列舰以及相当数量的巡航舰和较小的船只组成的拉芒什海峡舰队。

从所有这些来看，迪斯累里所证明的和他所想要证明的恰好相反。当叙利亚问题和塔希提岛问题使同路易—菲力浦的 *entente cordiale* (诚意协商) 有遭到破坏的危险的时候³⁵⁷，政府没有能够增加军备，当革命在整个大陆蔓延开来并且似乎已经威胁到不列颠的最根本的利益的时候，政府也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为什么这一点直到现在才成为可能，为什么恰好是迪斯累里先生的政府做了这件事呢？这是因为拿破仑第三的行动使人们有理由比过去，比1815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担心英国的安危。此外，科布顿先生说得很对：

“所计划的海军力量的增加不在于增加蒸汽机的数量，而在于增加人员；但从帆力舰过渡到蒸汽舰并不需要增加水手的数量，而是恰恰相反。”

迪斯累里说：

“法国存在着一个军人政府，这是所以设想同法国的关系可能破裂的第二个原因。但是，如果军队渴望战争，那末这是因为它们在自己国家中的地位不巩固。而法国现在所以为军队所控制，并不是因为军事野心家掌握了军队，而是因为公民担心自己的安全。”

迪斯累里先生似乎完全没有看到，问题是在于：军队感到在自己国家中的地位巩固这种情况将维持多久；整个民族被迫对一个人数不多的公民阶级的利己主义的不安情绪让步，对军事专制（它归根到底不过是狭隘的阶级利益的工具）的现代恐怖制度屈服，这种情况将维持多久。

迪斯累里举出的第三个原因是：

“我们国家里对今天法国的统治者的极大的成见……人们抱定这样一种见解：他取得政权后已经取消了在我国受到极大尊重的议会宪法，取缔了出版自由。”

但是，迪斯累里并没有能够举出什么理由来反驳这种成见。他自己也说：“要对法国政治作出自己的评价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即使英国人民不像迪斯累里先生那样深知法国政治的秘密，他们的单纯而健全的思想也会告诉他们，当自己的国库因为疯狂的浪费和挥霍而枯竭的时候，那个既不受议会管辖、也不受报刊监督的肆无忌惮的冒险家，也就正是可能对英国实行海盗式袭击的人。

其次，迪斯累里先生举例证明波拿巴和前届政府之间的诚意协商对于维护和平起了多么大的促进作用，他举了下列一些例子：在法国和瑞士之间可能爆发冲突的问题上、在开放南美河流自由通航问题上、在普鲁士—纽沙特尔问题上，在强迫美国参加签订不侵入古巴的三边协定时期，在就向埃及推行坦吉马特政策的问题

在近东采取联合行动时期，在改变关于希腊王位继承次序的条约时期，以及在突尼斯问题上实行友好合作时期，等等。³⁵⁸这使我不禁想起法国秩序党的一个代表在 1851 年 11 月底关于拿破仑和议会多数派之间的诚意协商的演说，据说这种协定使议会有可能很容易地解决关于选举权、联合和出版等问题。但两天之后却发生了改变。

迪斯累里演说的这一部分软弱无力，矛盾百出，但是他演说的末尾对联合内阁所作的攻击却十分精彩。

他在演说的末尾说道：“还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使我现在不能不作这样的分析。这个理由我是在这个议院的各政党的现状中发现的。目前的状况是十分特殊的。现在有一个保守的内阁，同时我们又有一个保守的反对党。（掌声）关于伟大的自由党，我怎么也找不到。（掌声）辉格党和它们伟大的传统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没有一个人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又一次掌声）我想问问，激进派的青春的活力，它那过分乐观的期待，它那巨大的希望又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我担心，当它一从青年时代所常有的那种由于热情奔放和阅历太少而形成的梦幻中苏醒过来时，它会发现自己是一个已被利用过并且已被抛弃的无用之物。（掌声）利用时毫不留情，抛弃时毫不客气。（掌声）激进派在哪里？在这个议院里是否还有一个人自称为激进派呢？（喊声：“听啊，听啊！”）一个人也没有。他害怕人们会抓住他，把他变成保守党的大臣。（哄然大笑）怎么会产生这样一种可笑的情况呢？造成这种非常不幸的政治局面的奥妙何在呢？我认为，为了说明目前的事态，我有必要去求助于那个取之不尽的政治手腕的武库，这个武库就是海军首席大臣（格莱安）。也许议院还记得这样一件事：大约两年前，海军首席大臣曾经按照他的习惯奉送给我们一个政治信条（他的演说中是有很多这种信条的）。他声明说：‘我是站在进步的基础上的。’先生们，当时我就想：如果进步可以站在上面，那它该是一种多么奇妙的东西啊！（大笑和掌声）当时我想，这大概是演说者一时的失言。但是，请原谅我这一度在我头脑中闪过的怀疑吧。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在目前已经施行起来的制度。因为我们现在的内阁是一个进步的内阁，所以一切就都站在那里没有动。（掌声）‘改革’这个词我们

已经再也听不到了，已经再也没有改革内阁，而只有进步内阁了，在这个内阁里，每一位阁员都决定什么事情也不做，一切困难问题都被搁置一旁，一切不能达成协议的问题都被变成了尚待商榷的问题。”

迪斯累里的对手们是没有很多话可以反驳的。只有“取之不尽的政治手腕的武库”詹姆斯·格莱安爵士是一个例外，因为他至少在这样一个方面还保持了体面：他没有完全收回那些被说成是他的过失的、对路易一拿破仑的侮辱性的言词。

约翰·罗素勋爵指责迪斯累里把国家的对外政策变成了党派之争，并劝导反对党说，

“在去年的种种纠纷和冲突之后，如果能有一个哪怕是短期的和平进步而避免各种重大的激烈的党派之争，那将是国家之大幸。”

辩论的结果，用于海军的全部开支将被议院通过。但可以使拿破仑放心的是：这一切不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而只是满足科学上的需要。Suaviter in modo, fortiter in re (方式温和，实质强硬)^①。

在上星期四上午，皇家律师出席了大主教法庭，以外交大臣的名义要求约·多德森爵士把档案中的拿破仑·波拿巴的遗嘱的原本及补充指令交给法国政府。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如果路易一拿破仑愿意打开这个遗嘱，并打算实现它，那末这个遗嘱很可能成为现代的潘多拉的盒子³⁵⁹。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2 月 22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3 年 3 月 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10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① 同俄国谚语：“嘴甜手辣”差不多。——编者注

卡·马克思
议会辩论。——僧侣和争取十小时
工作日的斗争。——饿死³⁶⁰

1853年2月25日星期五于伦敦

本周的议会辩论是不大令人感觉兴趣的。22日在下院，斯普纳先生提出一项取消梅努特神学院津贴³⁶¹的议案，斯科菲尔德先生又提出一项“废除由国家负担教会或宗教事宜的任何开支的全部现行条例”的修正案。斯普纳的提案以一百九十二票对一百六十二票被否决。斯科菲尔德的修正案要等到下星期三才讨论；可是这个修正案也有可能根本撤回。在关于梅努特的所有讨论中，值得注意的只有“爱尔兰旅”的达菲先生的发言，他说，在他看来，

“要说美国总统或法国新皇帝会乐于恢复他们的国家同爱尔兰僧侣之间的联系，这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昨晚的会议上，约翰·罗素勋爵向下院提出了他的“废除对女王陛下的犹太臣民的某些法律限制”的提案。这一提案以二十九票的多数被通过。于是，这个问题又一次在下院获得了解决，但是毫无疑问，它在上院还是要成为悬案的。

高利贷精神早已统治了不列颠议会，而犹太人却不准进入下院，这当然是很荒谬的，尤其是当犹太人已经有资格被选举担任一切地方公职的时候，不准他们进入下院就更加荒谬了。但是，“顶

点约翰”没有提出他曾经向英国广大人民许诺的那个消除他们的无权状态的改革法案,而只是提出废除对拉约涅尔·路特希尔德男爵的权利限制的议案,这件事倒是完全符合他这个人和他的时代的特点的。从以下的事实就可以看出广大群众对这件事情多么不感兴趣:在整个大不列颠,没有一个地方向议会提出一封要求准许犹太人进入议会的请愿书。小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演说揭穿了这场可怜的改革滑稽剧的全部秘密:

“说实在的,议会管的只是勋爵阁下的私事。(高声喝采)勋爵阁下是同一位犹太人一起被选为伦敦的代表的,(喝采声)他并且起誓每年要提出一个有利于犹太人的法案。(喊声:“对!”)毫无疑问;路特希尔德男爵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但这丝毫也不能使他有权利格外受到人们的尊敬,特别是当人们想到他这些财产是如何得来的时候。(政府党席位上发出“对,对!”和“哦,哦!”的喊声)昨天我刚刚从报上读到,路特希尔德银行同意在有可靠保证的条件下以百分之九的利息贷给希腊一笔款项。(喊声:“听啊!”)利息这样高,难怪路特希尔德银行大发横财。(喊声:“听啊!”)商业大臣曾经谈到压制报刊的问题。其实,谁也没有像路特希尔德银行这样厉害地、用贷款帮助专制国家的手段来压制欧洲的自由了。(喊声:“对,对!”)可是,即使男爵具有的美德像他的财产一样多,我们也还是有理由期望在下院中代表由一切反对前任内阁的政派领袖组成的政府讲话的勋爵阁下,能够提出比今天所讨论的更重要的措施。”

对选举抗议书的审查工作已经开始了。坎特布里和郎卡斯特的选举,已被宣布无效,因为情况证实了某一阶级选民的习以为常的受贿行为。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大部分案件都将通过妥协暗中了结。

“每日新闻”写道:“很明显,那些使改革法案的意图化为乌有并在本届议会中重新取得优势的特权阶级,是非常害怕完全的彻底的揭发的。”

本月 21 日,约翰·罗素勋爵辞去了外交大臣的职务,他的继

任人克拉伦登勋爵宣誓就职。约翰勋爵是第一个没有任何官职而参加内阁的下院议员。他现在只是一个享有特权的幕僚，没有官职，也没有薪俸。可是，凯利先生已经宣布，对于可怜的约翰没有薪俸这种不愉快的情况，将提出一项提案来加以补救。外交大臣一职在目前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德意志联邦议会突然决定要求大不列颠把一切政治流亡者驱逐出境，而奥地利人则提议把我们全部装上轮船，送到太平洋南部的一个荒岛上去。

在以前的一篇文章里，我已经指出过，保障爱尔兰租佃者权利的运动，不管它现在的领袖们的观点和意愿如何，很可能有一天会变成反对教权主义的运动^①。我指出了上层僧侣已经开始对同盟^②采取敌对的立场。从那时起，舞台上又出现了一种把运动朝这个方向推进的力量。北爱尔兰的地主竭力要使他们的租佃者相信，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和保卫天主教徒协会是同样的东西，他们正假借反对天主教的传播为名，努力组织力量来对付这个同盟。

爱尔兰地主就是这样号召他们的租佃者反对天主教僧侣的，而另一方面，英国新教僧侣则号召工人阶级反对工厂老板。英国工业无产阶级以双倍的力量重新展开了长期以来的争取十小时工作日、废除厂内店铺和实物工资制[truck and shoppage system]的斗争。这样的要求必然会在已经接到许多有关这方面的请愿书的下院提出来，因此，在以后的文章里，我将有机会详细地谈谈那些惯于把报纸和议会讲坛变成散布他们的自由主义的花言巧语的传声筒的暴虐的工厂主所使用的种种残酷而卑鄙的手段。这里我们只需提起这样一件事情：从1802年起，英国工人就不断地为争取

① 见本卷第589页。——编者注

② 指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译者注

从法律上限制工厂工作日而斗争,直到 1847 年通过了有名的约翰·菲尔登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这个法案禁止工厂中强迫女工和童工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但是自由主义的大工厂主们很快就看出这一法案为在工厂实行轮班工作制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1849 年,有人向高等控诉院提出控诉,法官的判决是:实行童工两班轮流工作而成年工人在机器转动的全部时间内不停地工作的轮班制 [《relay or shift-system》] 是完全合法的。问题又提到议会里;于是,在 1850 年,轮班制被宣布为非法,可是在这同时,十小时法案却变成了十小时半工作日法案。目前工人阶级要求 *in integrum* (不折不扣地) 恢复原来的十小时法案,而为了使这一法律更加有效,工人们又加上了一条要求:限制机器转动时间。

简单说来,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公开的历史就是如此。至于这个历史的内幕则如下述:资产阶级以通过 1831 年的改革法案打击了土地贵族,工厂主因要求自由贸易和废除谷物法而侵犯了土地贵族的“最神圣的利益”;因此土地贵族就决心把自己装扮成工人的利益和要求的保护人,支持工人反对厂主的斗争,特别是支持他们的限制工厂中的工作日的要求,以此来反击资产阶级。这些所谓的慈善家老爷们当时在一切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会议上都是打先锋的。艾释黎勋爵甚至由于他在这个运动中的言论而获得了某种“声誉”。土地贵族由于 1846 年谷物法的真正被废除而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于是他们在 1847 年就迫使议会通过十小时法案作为报复。可是,工业资产阶级通过司法权又取回了议会立法使他们丧失的东西。1850 年,地主老爷们的怒气渐渐平息了,他们和厂主老爷们取得了妥协,即一方面宣布轮班制非法,另一方面则给工人阶级每天加上半小时的额外劳动,作为老板们被迫遵守这项法

律而对工人阶级的一种惩罚。而目前，贵族们感到同曼彻斯特派决斗的时候迫近了，所以又想来操纵争取缩短工作时间的运动；可是，他们又不敢亲自出面，于是就通过国教会的教士来鼓动人民群众反对棉纺大王，企图用这种手段来拆后者的台。这些神父怎样毫不留情地对工厂主进行十字军征讨，从以下的几个例子中就可以看出来。在克兰普顿曾举行过一次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集会，主持会议的是圣布拉梅尔博士（国教会的代表）。在这个会上，斯泰里布雷芝的教区牧师圣约·雷·斯提芬斯宣称：

“曾经有过这样的时代，那时各民族是受神权政体统治的……这种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是法律的精神依然如故……劳动者应当首先分享他亲手生产出来的大地的果实。工厂法被肆无忌惮地破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这里的工厂区的首席视察员莱昂纳德·霍纳先生不得不亲自写信给内务大臣说，没有警察的保护，他不敢派也决不派他手下的任何视察员到某些区里去……要防的是谁呢？防的是工厂主！防的是区里最有钱有势的人，防的是区里的地方官，防的是女王陛下的治安法官，防的是以王室代表的身分出席地方审判庭的人……可是老板们犯法受到过处罚没有呢？……在我那个区里，星期日睡到九十点钟甚至十一点钟已成了工厂男工和大部分女工的习惯，因为一星期的劳动已经把他们累得精疲力竭了。星期日是他们疲乏的躯体能获得休息的唯一的一天……而且，一般总是工作时间愈长，工资愈少……我宁愿在南卡罗莱纳当奴隶，也不愿在英国工厂里当工人。”

在贝恩利举行的争取十小时工作日大会上，哈伯翰—伊夫斯的教区牧师圣埃·阿·维利提向听众发表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

“当郎卡那的人民受尽压迫的时候，科布顿先生、布莱特先生以及其余的曼彻斯特派的先生们在做什么呢？……富翁们暗地里在打什么主意呢？他们在盘算怎样更好地通过欺骗的办法从工人那里再夺取一两个钟点。这就是所谓的曼彻斯特派的代表们所抱的目的。这就使他们成了如此无耻的伪君子，如此狡猾的流氓。我以英国国教会牧师的身分对这种行为提出抗议。”

这些可敬的国教会的教士们所以会摇身一变成了保护工人权利的游侠骑士,而且是如此见义勇为的骑士,其原因我们已经指出过了。他们不仅要笼络人心,以防苦难的日子、民主主义胜利的日子来临,他们不仅意识到国教会实质上是一个和地主寡头政权共存亡的贵族机构,而且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曼彻斯特派的信徒都是国教的敌人,他们都是非国教徒³⁶²,而光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国教会每年就要从他们腰包里掏去一千三百万英镑,这首先就使他们非常心痛,他们决心要让这些世俗的金钱和僧侣阶层断绝关系,以便使这阶层的人更不愧为上帝的使徒。这就是说,这些虔诚的教士进行斗争是 *pro aris et focis* (为了他们自己切身的利益)。对曼彻斯特派的代表们来说,这次攻击则应当促使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除非他们决心——不管他们怎样不乐意——把人民所应当享有的一份权力完全给予人民,他们就不可能把政权从贵族手中夺过来。

在大陆上,绞刑、枪决和流放已经被提到日程上来了。可是,这些把他们的行为深深印入整个文明世界人们的意识中的刽子手们,本身就是可以捕捉和可以绞杀的东西。而在英国,却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的魔王在逞凶肆虐;有时它甚至把人们判处一种最残酷的死刑,他像手执火剑的天使把亚当驱逐出天堂一样,日复一日地不声不响地把整个整个的部族和阶级驱逐出他们祖先的土地。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个无形的社会魔王的行为就叫做**强迫移民**,而在前一种情况下就叫做**饿死**。

本月在伦敦又发生了一些饿死的事件。我只指出其中的一件:玛丽·安·桑德利,年四十三岁,死于伦敦市沙德威尔的煤巷。参加验尸的医生托马斯·皮恩指出,她是因虚弱和寒冷致死的。死者

躺在一小堆干草上，身上什么也没有盖。屋子里面用的、烧的、吃的什么也没有。五个小孩子坐在靠近母亲尸体的光秃秃的地板上，由于饥寒而不住地号哭。

关于“**强迫移民**”的问题，我将在下一篇文章里加以论述。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2 月 25 日

载于 1853 年 3 月 15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3716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

论坛报”

卡·马克思
 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
 ——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
 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³⁶³

1853年3月4日星期五于伦敦

从2月份公布的关于1851年和1852年贸易和航运的报告中我们看到,通过海关宣布的出口总值,1851年为68531601英镑,而1852年为71429548英镑;在1852年的出口总值中,棉织品、毛织品、麻织品和丝织品占47209000英镑。1852年进口的数额比1851年小。由于供国内消费的进口的比重没有减少,甚至有所增加,所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英国有若干数量的金银代替通常数量的殖民地产品而成为再输出口。

殖民地移民局公布了1847年1月1日至1852年6月30日期间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向世界各地移民的报告:

	自英格兰	自苏格兰	自爱尔兰	总 数
1847年	34685	8616	214969	258270
1848年	58865	11505	177719	248089
1849年	73613	17127	208758	299498
1850年	57843	15154	207852	280849
1851年	69557	18646	247763	335966
1852年(到6月止)	40767	11562	143375	195704
总计	335330	82610	1200436	1618376

报告指出：“据估计，从利物浦迁出的移民十分之九是爱尔兰人，而从苏格兰迁出的移民四分之三是苏格兰高地的赛尔特人或经格拉斯哥出境的爱尔兰的赛尔特人。”

由此可见，在全部移民中，将近五分之四是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地以及苏格兰附近岛屿上的赛尔特人。伦敦“经济学家”杂志就这个问题发表评论说：

“移民是以租佃小块土地和种植马铃薯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崩溃的结果。”该杂志接着又说：“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地的过剩人口的迁出，是实行任何一种改良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无论是 1846—1847 年的饥荒或是随之而来的移民，都没有使爱尔兰的收入受到影响。相反，它的纯收入在 1851 年达到 4281999 英镑，即比 1843 年增加 184000 英镑。”

首先是把本国居民弄到赤贫的境地，而当从这些一贫如洗的人的身上再也榨不出任何利润的时候，当他们成为妨碍收入增长的一种负担的时候，就把他们赶走，然后来结算自己的纯收入！这就是李嘉图在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原理”³⁶⁴中所阐明的学说。李嘉图说，我们假定，一个资本家每年获得 2000 英镑的利润。对他来说，雇用 100 个工人还是雇用 1000 个工人不是一样吗？李嘉图问道：“就一个国家的实际收入来说不也是这样吗？”如果一个国家的实际纯收入——地租和利润——始终维持在原来的水平上，那末不管这些收入是来自 1000 万居民还是来自 1200 万居民，归根到底是一样的。西斯蒙第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³⁶⁵一书中针对这种说法指出，根据这种观点，即使英国全部人口都消失了，岛上只剩下一个国王（当时统治英国的是国王^①，而不是女王），只要有一种自动机器能使他获得和今天 1200 万居民所创造的同样多的

① 即乔治三世。——编者注

纯收入，那末这对英国来说也会是完全一样的了。的确，在这种情况下，“国民财富”（这个词在这里只是一个文法上的概念）是一点也不会减少的。

我在先前写的一篇文章中曾经举过在苏格兰高地“圈地”的例子^①。下面这段引自“高尔威信使报”的话告诉我们，到现在，这个过程在爱尔兰还是造成强迫移民现象的根源：

“在爱尔兰西部，居民几乎已经从地面上消失。康诺特的大地主们悄悄地商议好赶走所有的小土地租佃者，对他们进行经常的歼灭战……在这个省里，每天都发生骇人听闻的残暴行为，对此，公众是丝毫也不了解的。”

但是，不仅一贫如洗的绿色艾林^②和苏格兰高地的居民由于农业的改良和“过时的社会制度的崩溃”而被赶走，也不仅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平原的强壮的农业工人被赶走（他们的迁移费是由移民局代办发给的），而且另一个阶级——英格兰最稳定的阶级，现在也被卷入这个“改良”过程。在英格兰的小农场主中间，特别是在那些租赁粘性重的土地的小农场主中间也发生了惊人的移民运动。这些小农场主眼看收成很坏，又缺乏必需的资本来大力改良土质以便偿付欠租，他们就只好远涉重洋去寻找新的家园和新的土地，此外别无出路。我这里所谈的不是由淘金狂引起的移民，而是由于大地主占有制和土地的集中，由于使用机器耕种土地和大规模采用现代农业耕作法而引起的强迫移民。

在古代国家，在希腊和罗马，采取周期性地建立殖民地形式的强迫移民是社会制度的一个固定的环节。这两个国家的整个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的一定限度上的，超过这个限度，古代文明就有毁灭

① 见本卷第 570—576 页。——编者注

② 即爱尔兰的古称。——编者注

灭的危险。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这些国家完全不知道在物质生产方面运用科学。为了保存自己的文明，它们就只能有为数不多的公民，否则，它们就得遭受那种把自由民变为奴隶的沉重体力劳动的折磨。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公民权要由一种不可违反的一定的数量对比关系来决定。那时，唯一的出路就是强迫移民。

也就是这种过剩人口对生产力的压力，迫使野蛮人从亚洲高原侵入古代世界各国。在这里，仍旧是同一个原因在起作用，虽然它的表现形式不同。为了继续作野蛮人，它们就只能有为数不多的人口。这是一些从事游牧、狩猎和战争的部落，它们的生产方式使部落的每一个成员都需要有大片的土地，到现在，北美的印第安部落的情况也还是这样。这些部落的人口的增长，使它们彼此削减生产所必需的地盘。因此，过剩人口就不得不进行那种为古代和现代欧洲各民族的形成奠定基础的、充满危险的大迁徙。

现代的强迫移民，情况则完全不同。现在，人口的过剩完全不是由于生产力的不足而造成的；相反，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

我既不同意李嘉图的见解，也不同意西斯蒙第的意见。李嘉图把“纯收入”看做摩洛赫^①，认为大批大批的居民应该心甘情愿地做它的牺牲品；西斯蒙第则从他那悲天悯人的慈善心肠出发，企图用强力来保持已经过时的农业经营方法，并把科学从工业中驱逐出去，就像柏拉图把诗人从他的共和国³⁶⁶中驱逐出去一样。社会上正在进行着无声的革命，这种革命使一切都得服从它，它不考虑成

① 古腓尼基人所奉的火神，以人特别是儿童作祭品。——译者注

为它的牺牲品的人的生命，正像地震毫不考虑被它破坏的房屋一样。无力适应新的生活条件的阶级和民族，只有遭到灭亡。但是，有一些经济学家竟当真以为，这种悲惨的过渡状态的意义就只是要使社会适应资本家（地主和金融巨头）的食欲，还有什么能比这种看法更幼稚更浅薄的呢？在大不列颠，这一过程表现得最为明显。由于在生产中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居民被从农业地区驱逐出去，同时人口在工业城市集中起来。

“经济学家”写道：“移民局代办除了给斯比脱菲尔兹和佩斯里的少数手工织工以补助之外，是不会给工业工人以补助的，自己花钱移居海外的更是寥寥无几，甚至没有。”

“经济学家”清楚地知道，工人是不可能自己出钱移居海外的，而工业资产阶级又不会在这方面帮助他们。这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农业人口这种现代社会中最稳定最保守的因素正在消失，同时工业无产阶级，正是由于现代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在聚集着巨大生产力的大城市集中起来，而这些巨大的生产力的创造史到现在为止总是劳动者的殉难史。谁能阻挡他们再前进一步去支配这些到现在还支配着他们的力量呢？有什么力量能抗拒他们呢？没有这种力量！到那时，乞灵于“所有权”是没有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自己也承认，目前生产方式中的变化摧毁了过时的社会制度及其占有方式。这些变化剥夺了苏格兰的氏施的成员，爱尔兰的短工和佃农，英格兰的自耕农、手工织工、无数的手工业者以及整代整代的工厂童工和女工；总有一天他们也将剥夺地主和棉纺大王。

现在，大陆的上空还只是电光闪闪，但在英国已经是地动山摇。在英国已经兴起了改造现代社会的真正的风暴。

我在3月1日的文章中曾经说，马志尼打算公开反驳科苏特³⁶⁷。果然，在3月2日的“晨报”、“晨邮报”和“每日新闻”上出现了马志尼的信。既然现在马志尼本人已经打破沉默，那末我也可以告诉大家，科苏特在他巴黎的朋友们的压力下已经否认了他自己发表过的文件。在科苏特以往的活动中我们就看到过许多这种优柔寡断、极端矛盾和模棱两可的表现。他具有一切令人喜欢的优良品格，但同时也具有一切典型的女性的缺点，即所谓“演员的”气质。en paroles (就言词方面来说) 他的确是一个大演员。谁要不愿意为流行的偏见所左右，而希望有自己的以事实作为根据的见解，那我就介绍他读一下不久前出版的、瑟美列先生所写的一本路德维希·鲍蒂提尼、阿尔都尔·戈尔盖和路德维希·科苏特的传记³⁶⁸。

如果说马志尼在伦巴第没有能够把意大利资产阶级吸引到运动中来，那末可以确信，拉德茨基在这方面是完全能够做出很大成绩的。目前他打算没收所有迁居国外的人的财产，甚至连那些奥地利当局允许出境而在其他国家里获得公民权的人的财产也包括在内——如果他们不能证明他们同最近的起义毫无联系的话。据奥地利报纸的估计，应当没收的财产，价值约1200万英镑。

在3月1日的下院会议上，帕麦斯顿勋爵对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提出的问题作了如下的回答：

“大陆国家并没有提出任何从英国驱逐政治流亡者的要求；而如果他们提出这种要求，他们就将遭到断然的、坚决的拒绝。不列颠政府从来不愿意为其他国家的内部安全操心。”

不过，从交易所商人的报纸“通报”以及“辩论日报”上可以看出，这样的要求已经准备提出；“辩论日报”在最近的一号上推测

说，英国已经同意接受奥地利、俄国、普鲁士和法国的联合要求。关于这一点该报接着说：

“如果瑞士联邦拒绝奥地利在其边境各州实行监视，那末奥地利就可能破坏瑞士领土的不可侵犯性而占领德森州；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为了保持政治均势，便会把军队开进与它的国境毗连的瑞士各州。”

“辩论日报”实际上是建议用 1770 年普鲁士的亨利希亲王以玩笑方式向叶卡特林娜女皇建议的解决波兰问题的简单方法³⁶⁹来解决瑞士的问题。与此同时，自称为德意志联邦议会³⁷⁰的那个可敬的机关，正在郑重其事地讨论关于“应当向英国提出的要求”的问题，在这个庄严的问题上，从肺部呼出了如此多的空气，简直可以鼓起德国舰队的所有的篷帆。

在 3 月 1 日的下院会议上，发生了一件很有意味的事情。有人宣布黎纪诺特和布莱克本的代表是通过贿赂手段选举出来的，因此他们的当选是不合法的。当时约·雪莱爵士提议，把向这两个区的委员会提出的证据转交议院审查，并建议最早于 4 月 4 日发出重选的指令。关于这个问题，可敬的从男爵约·特罗洛普爵士指出，“已经委派了十四个委员会来调查各小选区的舞弊情况，现在还要再委派五十个新的委员会”，所以已经很难找出足够的议员来成立对是否合法有所争论的那些选举做出决定的仲裁委员会以及成立处理议院日常事务的委员会。如果更深刻地考察一下议院本身所依据的基础，那末必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等待着它的是崩溃，议会机器将完全停止转动。

科布顿先生在他最近的一篇评论中，以及他在曼彻斯特和平大会³⁷¹上和许多争取教育改革的大会上所作的庄严的演说中，都不愿放弃享受抨击报刊的乐趣。所有的报刊对他也以牙还牙，其中

对他攻击得最厉害的是“一个英国人”^①，这个人写的一些评论路易-拿破仑的文章在 coup d'état (政变) 时期曾经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应³⁷²，此后他就把自己的矛头转向丝织业巨子棉纺大王们。他用给这位西区^②的圣哲所下的刻薄的评语结束了致科布顿的信：

“一点小小的成功就使他洋洋得意，冲昏头脑，他已经准备充当万民归心的独裁者了。这个小行帮的先知，整日喋喋不休；贪求荣誉，他不容异见，刚愎自用，不讲逻辑，耽于空想，有了一个念头就顽固不化，对人态度傲慢不逊，他是一个爱吵架的和平鼓吹者，好发脾气的博爱的劝化者，高唱‘自由’的专制教条的信奉者；当报纸不怕他的恫吓和不受他的欺骗时，他便暴跳如雷；他想阉割报纸，剥夺它的影响、精神力量和独立；他想把有高度教养的绅士们的职业降低为一伙雇佣的帮闲文人的行业，以使自己能够成为他们的唯一的领袖。”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3 月 4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3 年 3 月 2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22 号，并摘要载于 1858 年 4 月 16 日“人民报”第 50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并根据“人民报”校对过

署名：卡尔·马克思

① 即理查兹。——编者注

② 约克郡分为东西北三区。——译者注

卡·马克思
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
政府的诡计。——奥地利和
普鲁士的通商条约。——
“泰晤士报”和流亡者³⁷³

1853年3月18日星期五于伦敦

今天议会因复活节而休会到4月4日。

在先前写的一篇文章中我根据流行的说法报道了李伯尼的妻子在佩斯遭到奥地利人的鞭挞³⁷⁴。后来我查明，李伯尼根本就没有结过婚；在伦敦报刊上流传着的另一谣言，说什么他是替他的受了奥地利人凌辱的父亲报仇，这同样是毫无根据的。他的行动纯粹是受政治动机的支配，直到最后一分钟他都保持了不屈不挠的精神并且像一个英雄一样地行动。

你们在看到这篇文章之前就能在英国报纸上看到科苏特对马志尼的声明的答复。我以为，科苏特把他的本来就很糟糕的情况弄得更糟了。他的最初的声明和最近的声明之间的矛盾异常明显，甚至不用我再来详细证明了。此外，这两个文件所使用的语言的差别也引起一种令人厌恶的感觉：第一个是用东方算命先生的夸张语言写的，第二个是用律师在法庭上用的诡辩文体写的。

马志尼的朋友们现在异口同声地说，米兰起义是他和他的同

志们所无能为力的客观形势造成的。但是，从一方面来说，密谋的本质决定了起义的特点，即过早地爆发，其原因不是由于叛变，就是由于偶然事件。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你们在三年的时间里老是叫喊**行动，行动，行动**，而你们的整本革命词典又只有“起义”一个词，那末要想在任何时候都能有足够的威信来命令：**不要举行起义**，那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奥地利人的残酷已经使米兰的失败变成了民族革命的真正的开端。例如，请看帕麦斯顿勋爵的消息灵通的机关报“晨邮报”今天的报道：

“那不勒斯人民期待着在奥地利帝国中必将爆发的运动。那时从皮蒙特边境到西西里岛，整个意大利都将奋起，可怕的灾祸就要发生。意大利的军队将溃散，从1848年革命以来募集的所谓瑞士士兵也拯救不了意大利的君主们。意大利正在走向**难以想像的共和国**。毫无疑问，在1848年开场的戏剧的下一幕就是这样。在拯救意大利君主的斗争中外交手腕已失去任何作用。”

在马志尼宣言上署名并在起义前游遍了意大利的阿乌利奥·萨菲在给“每日新闻”的信中公开承认：“**上层阶级已陷入淡漠和绝望**”，只有“米兰人民”，无产阶级，

“没有领导而全凭本能的无产阶级面对着奥地利总督的专制政治和军事法庭的杀人勾当而对祖国的未来保持着信心，并一致地决心要复仇”。

马志尼的政党终于相信，甚至在反抗异族人的专制政治的民族起义中，阶级差别这种东西也起着作用，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能期待上层阶级的革命运动，这是马志尼的政党的一大进步。也许马志尼的拥护者还会前进一步，深深意识到，如果他们希望他们的口号《Dio e popolo》（“上帝和人民”）能得到响应，那末他们自己就必须认真地研究意大利农村居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我打算将来详细地阐述一下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农村居民生活的物质条件，这些物

质条件直到现在还使他们不是变得反动,就至少是对意大利的民族斗争漠不关心。

不久前我在巴塞尔出版的题为“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ölnen Kommunisten-Prozess》)^①的二千本小册子在巴登边境被没收,并按普鲁士政府的要求焚毁了。巴塞尔政府也没收了还在发行者那里的少数几本,企图引用大陆列强强加于瑞士联邦的新出版法,对发行者沙贝利茨先生、他的儿子^②,以及印刷所所有者加以迫害。这将是瑞士的第一桩这类审判案件,而且这件事情已经成为激进派和保守派争论的题目。普鲁士政府由于要对舆论掩盖它在科伦审判时期的卑鄙行为而如何焦虑不安,这你们只要从下面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外交大臣通令,无论在什么地方,发现了这本小册子便一律没收(Fahndebriefe),但是他竟不敢指明这本小册子的真名。为了迷惑公众,他把它称为“共产主义学说”,可是这本小册子除了揭露普鲁士国家的秘密之外,毫无其他内容。

1848年后德国当局唯一的“进步”就是订立了奥普通商条约。et encore! (此外!)这个条约还附加了许多 clausulae(保留条件),参插了许多例外,并把许多极重要的问题留待将来由还没有成立的各种委员会去解决,同时,规定的税率的减低实际上微乎其微,所以整个条约不过是幻想真正在商业上统一德国而已,是毫无意义的。该条约最显著的特点是:奥地利又战胜了普鲁士。这个阴险、卑鄙、怯懦、动摇的假强国这次又屈服于比它残酷、但是比它坦白的对手。奥地利不仅迫使普鲁士勉强同意接受条约,而且普鲁士还

① 见本卷第457—536页。——编者注

② 即雅科布·沙贝利茨。——编者注

被迫恢复实行旧税率的旧“关税同盟”³⁷⁵，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十二年内，不经关税同盟内部各小邦一致同意，也就是不经奥地利（德意志南部各邦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商业方面都是奥地利的附庸，因而也就是普鲁士的敌人）允许，不得更改自己的商业政策。普鲁士自从“蒙上帝恩赐”恢复君主政体以来，便日益衰落。大概，普鲁士的国王，“当代贤人”认为，他的人民可以把他的政府在国外被迫忍受的屈辱看做对他们服从残无人道的专制政治的慰借和奖励。

流亡者问题还没有解决。半官方的“奥地利通讯”驳斥了这种武断之说：奥地利当时向英国政府发出了新的照会，因为“鉴于最近各种事件表明帕麦斯顿勋爵重又得势，故帝国政府不能曝自身于尊严受辱之危地”。我已经向你们报道了帕麦斯顿勋爵在下院的声明^①。现在你们在英国报纸上可以看到阿伯丁在上院所做的亲奥的声明，照此声明来看，英国政府决心充当奥地利的密探和大审判官。帕麦斯顿的报纸^②现在这样评论他的同僚的声明：

“即使是显然有意对阿伯丁勋爵做出的一些比较温和的让步，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很相信它们能够实现……没有谁敢建议不列颠政府作充当外国政治工具和政治陷阱的尝试。”

你们看，在玛士撒拉^③的内阁这个最高评议会里的“老朽无能者和自由主义少壮派”之间是多么地和谐一致。伦敦的一切报刊都同声斥责阿伯丁和上院。“泰晤士报”是唯一可耻的例外。

① 见本卷第 621 页。——编者注

② 即“晨邮报”。——编者注

③ 旧约全书中传说活到九百六十九岁的最长寿的老人；这里指由老头组成的内阁。——译者注

你们记得，首先告发流亡者并挑唆外国列强要求驱逐他们出境的就是“泰晤士报”。当它确信关于恢复外侨管理法³⁷⁶的提案将在下院遭到否决而使内阁蒙受耻辱的时候，它便突然花言巧语地高唱为了保护避难权它（当然罗！）决心作任何牺牲。最后，在上院的议员大人们彼此亲切地交换了意见之后，它为了犒劳它的崇高的公民道德，便在3月5日的社论中迸发出恶毒的攻击：

“在许多大陆国家中，人们都认为，我们很高兴我国有一个豢养流亡者、豢养什么罪恶勾当都干得出的各国暴徒的场所……那些对英国有他们的不受法律保护的同胞这一点表示抗议的外国作家是不是以为，在我国流亡者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我们要消除他们的误解。这一类可怜的人大部分过着贫困和悲惨的生活，吃的是异乡的含着苦味的面包，而且被这个大城市的混浊浪涛所吞没的他们能得到这种面包还算是好的……对他们的惩罚是一种最残酷的放逐。”

最后一点“泰晤士报”说得很对：英国是个出色的国家，问题是要不住在那儿。

但丁在“火星天”上遇见了他的祖先卡却基达·迪·亚利基利，后者用下面的话预告他将被逐出佛罗伦萨：

《Tu proverai sì come sa di sale
Lo pane altrui, e com'è duro calle
Lo scendere, e'l salir per l'altrui scale》.

“你将懂得
别人家的面包是多么含着苦味，
别人家的楼梯是多么升降艰难。”³⁷⁷

幸运的但丁！他也是“属于被称为政治流亡者的可怜的一类的人”，但是他没有受到敌人的像“泰晤士报”的无谓社论这样的攻击！“泰晤士报”则更幸运了！它逃脱了但丁在“地狱”里给它“预备

下的席位”。

如果照“泰晤士报”所说，流亡者不得不吃异乡的含着苦味的面包（它还忘了加一句：就是这种面包还使他们花费了极大的代价），那末“泰晤士报”本身难道不是靠外国人的血汗养肥的吗？这家报纸的那些匿名的皮蒂娅^①利用法国革命、德国起义、意大利暴动和匈牙利战争，利用法国的枪杀和奥地利的绞刑，利用被没收了的头颅和被砍掉了头颅的财产^②制造出多少篇社论和弄到了多少金镑啊！如果大陆没有“暴徒”，那它就只好每天靠斯密斯菲尔德市场的劣等货色、伦敦烟囱的煤烟、泥泞、粗暴的马车夫、泰晤士河上的六座桥梁、市区内的出殡、感染鼠疫的墓地、肮脏的饮水、铁路上的灾祸、伪造的尺子和天秤以及其他在大陆平静无事的时候成为这家报纸的经常货品的有趣题材来勉强度日了，那时，“泰晤士报”将多么地不幸啊！“泰晤士报”自从它要求英国政府处死拿破仑第一以来一点也没有改变。

这家报纸在1815年7月27日那一号上曾写道：“人们是否考虑到，关于这个人还活着的消息必然会对欧洲各地的不满者产生什么影响？他们会（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联盟国的君主们害怕杀害这个有如此众多的崇拜者和拥护者的人。”

这家报纸曾鼓吹对美利坚合众国发动十字军征讨：

“不消除这个民主主义叛乱得胜的恶例，决不同美国媾和。”

“泰晤士报”编辑部里没有从大陆来的“暴”徒。恰恰相反，那里有一个可怜的人物，一个名叫奥托·冯·文克施特恩的普鲁士人，

① 古希腊迭尔非地方阿波罗神殿的女巫。——译者注

② 马克思的俏皮话，意思是：被砍掉了头颅的革命者和被没收了的革命者的财产。——译者注

他从前是一家德国小报的发行人，后来在瑞士陷入了贫困和悲惨的生活之中，因而不得不向弗莱里格拉特和其他流亡者告贷，直到最后投效伦敦的普鲁士大使即颇有点名气的本生，并成为印刷所广场³⁷⁸的预言者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为止。“泰晤士报”编辑部有不少其他类似的从大陆来的温顺人物，他们成了联系大陆警察和英国的指导性的报纸的环节。

下面这件事可以作为说明英国的出版自由的例子。住在滨河街的特鲁劳先生由于国内税务部门的全权代表根据威廉四世统治时期第六和第七年的法令第七十六章提出控告而受到伦敦弯街治安法庭的审判；他被控出售没有付足印花税便出版的、名叫“陶工自由报”的报纸。这家报纸在特伦特河畔的斯托克城出了四号。它的名义上的所有者是争取废除知识税协会的秘书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他“按照印花税局的实际作法”出版报纸，这就是说“印花税局曾许可‘文艺论坛’、‘建筑师’、‘笨拙’、‘赛马新闻’³⁷⁹及其他刊物免付印花税刊登有关当前事件的报道和评论”；他显然打算引起政府方面的追究，以便达到由法庭决定什么样的报道应免交一便士印花税的目的。法官亨利先生还没有做出决定。不过这个决定不会有多大意义，因为该报的出版本来就不是打算向印花税法挑战，而只是想利用该法律文字上至今还存在的两重含意而已。

今天的英国报纸刊登了君士坦丁堡3月6日来电，根据来电，利法特—帕沙将接替傅阿德—埃芬蒂的外交大臣之职。这个让步是俄国特命大使缅施科夫公爵迫使土耳其政府作出的。俄国、法国和土耳其政府之间关于圣地的纠纷³⁸⁰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因为路易—拿破仑恨透了俄国和奥地利阻挠他受教皇加冕的阴谋，他打算

靠牺牲土耳其人的利益来进行报复。在下一篇文章中我想谈谈这个老是不断出现的东方问题，这个欧洲外交上的 pons asini (傻瓜的绊脚石)^①。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3 月 18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3 年 4 月 4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3733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
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① 直译是：驴桥（人们这样称呼初学者很难解的欧几里德第五定理）。——编者注

附 录

附 录

附 录

1850年9月15日的 中央委员会会议³⁸¹

出席会议的有马克思、恩格斯、施拉姆、普芬德、鲍威尔、埃卡留斯、沙佩尔、维利希、列曼。

弗伦克尔因事缺席。

由于本次会议是非常会议，上次会议的记录不在手头；因此记录无法宣读。

马克思：这次会议星期五未能召开，因为跟协会³⁸²委员会会议时固有冲突。既然维利希^①召集了区部会议，——我不想提出这个会议是否合法的问题——这次会议必须今天举行。

我提出下列三点意见：

1. 中央委员会从伦敦迁到科伦；它的职权在今天的会议结束之后立即移交给该地的区部委员会。这项决议应通知在巴黎、比利时和瑞士的盟员。在德国，由新的中央委员会自己去通知。

理由：我曾经反对沙佩尔提出的关于在科伦建立全德区部委员会的建议，因为我不想破坏中央权力的统一。现在，既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情况，所以在我们的建议中这一点就不提了。无论在上次会议进行谴责投票的时候和现在在区部召开全会的问题上以及

^① 在星期一（在这里和后面的脚注中引有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记录的两个不同手稿副本之间的重要出入。——编者注）

在协会和流亡者委员会³⁸³里，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都公开起来反对多数派。因此，在这里中央委员会无法继续存在下去。如果中央委员会的统一不能继续保持，它必然会陷于分裂并形成两个同盟。但是，因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我才提出这个出路。

2. 现行的同盟章程应当废除，责成新的中央委员会草拟新盟章。

理由：1847年代表大会通过的盟章，曾于1848年由伦敦中央委员会做了修改。现在情况又有所变化。在最后的伦敦盟章中，原则性的条款软弱无力。在一些地方两个盟章都发生效力，在另一些地方则一个盟章也没有，或者采用完全是擅自^①制定的盟章。可见，在盟内完全是无政府状态。况且，最后的盟章已经公布，因而现行的盟章不能再继续生效。所以，我的建议实际上就是要以真正的盟章³⁸⁴来改变没有盟章的局面。

3. 在伦敦组织两个区部，这两个区部彼此丝毫不发生任何关系，其唯一的联系就是双方都属于同盟，都与同一个中央委员会通信。

理由：正是为了同盟的统一，才需要在这里建立两个区部。除了私人的矛盾之外，甚至在协会里也出现了原则性的矛盾。恰恰在最近一次关于“德国无产阶级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的立场”问题的辩论当中，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发表了一些跟上次的^②通知信，甚至跟宣言³⁸⁵直接相抵触的观点。他们用逢迎德国手工业者民族情感的德意志民族观点代替宣言的全面的观点。他们提出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宣言的唯物主义观点。他们不是把现实关系、而是把意志

① 独立

② 中央委员会的

描绘成革命中的主要东西。我们对工人们说：为了改变现存条件和使自己有进行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而他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他们现在使用的“无产阶级”这个词正像民主派使用的“人民”这个词一样是一句空话。为了实现这句话^①，他们不得不把一切小资者说成是无产者，这就是说，他们 de facto (实际上) 是代表小资者，而不是无产者。他们不得不用革命的空话代替实际的革命发展。这次辩论最后^②说明，私人决裂的内幕是一些什么样的原则性分歧，而现在已经到了采取措施的时候了。正是这些对立的见解成了两派各自的战斗口号；某些盟员把宣言的维护者称为反动分子，企图以这种办法使他们威信扫地，但是，这对他们来说是完全无所谓的，因为他们并不追求威信。由于这一切，多数派有权解散伦敦区部并把少数派^③作为不同意同盟原则的人开除出去。我不想提这样的意见，因为这样可能引起无益的争吵，因为尽管这些人目前所发表的观点是反共产主义的，至多不过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但就其信仰来说他们还是共产主义者。但是不言而喻，留在一起则纯粹是浪费时间。沙佩尔常常说要分裂——那就分裂吧，我对待分裂是严肃的。我以为，我找到了我们既可以分道扬镳而又不致引起党的分裂的途径。

我在这里声明一下，依我看来愿意加入我们的区部的最多有十二个人，也可能少一些，我情愿把所有其余的人交给少数派。如

① 这种观点

② 最后明显地

③ 中央委员会少数派

果这个建议将被通过，我们当然也就不能留在^①协会里了；我和多数派将退出大磨坊街协会。归根到底，问题不在于两派之间存在敌对关系，相反地是在于停止纷争，为此要中断一切关系。我们一起留在同盟和党内，但是我们要停止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关系。

沙佩尔：正像在法国无产阶级跟出岳党³⁸⁶和“新闻报”决裂一样，在这里一些代表党的原则的人跟组织无产阶级的人正在决裂。我赞成中央委员会迁移^②和修改盟章。科伦人了解德国的情况。我还认为，在新的革命中将会出现一批比所有在1848年享有声誉的人更善于行动^③的人。至于原则性的分歧，埃卡留斯提出了一个引起今天的辩论的问题。我发表了在这里遭到抨击的见解，因为我对这件事情总是很热情的。问题在于，是我们自己动手去砍掉别人的脑袋，还是让人家来砍掉我们的脑袋。在法国快要轮到工人的头上了，因而在德国也快要轮到我们的头上了。如果不是这样，我当然就会寻求安静去了，那时我的物质状况就会不同了。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会采取一些保证无产阶级获得统治的措施。我是这种见解的狂热的拥护者。而中央委员会却喜欢相反的见解。但是，如果你们不想再跟我们打交道，好吧——我们就分道扬镳。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我一定会被送上断头台，但是我要回德国。如果你们想要组织两个区部——那就组织好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同盟就会垮台，以后我们再在德国相逢，也许那时我们又走上一条道路。我是马克思个人的朋友，如果你们想要

① 同一个
② 到科伦
③ 领导革命

分裂,好吧——那我们走我们的,而我们走我们的^①。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得组织两个同盟。一个是为那些靠笔杆活动的人而组织的,另一个则是为那些用其他方式活动的人而组织的。我不赞成那种认为资产阶级将会在德国掌握政权和我在这一方面是个盲目的狂热者的说法;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根本没有做过这种事情。但是,在伦敦这里有两个区部,两个协会,两个流亡者委员会,那还不如组织两个同盟,完全决裂。

马克思:沙佩尔误解了我的意见。只要我的意见被通过,我们就各走各的路,两个区部彼此互不相干,同时双方的人也停止相互之间的一切关系。但是,它们是在同一个同盟之内,受同一个委员会^②的领导。甚至你们可以给自己留下绝大多数的盟员。至于说个人的牺牲,我为阶级,而不是为个人作的牺牲不比其他任何人少。说到热情,为了加入你认为眼看就会取得政权的党,这种热情却不太需要。我一向反对无产阶级的反复无常的意见。我们为之献身的党,幸运的恰恰是还不能取得政权。无产阶级即使取得政权,它推行的不会直接是无产阶级的措施,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措施。我们的党只有在条件允许实现它的观点的时候,才能取得政权。路易·勃朗便是一个说明取得政权为时过早会得到什么结果的很好例证³⁸⁷。况且,在法国无产阶级将不是单独地,而是跟农民和小资产者一起取得政权,因此必须推行的不是自己的,而是它们的措施。巴黎公社³⁸⁸证明,为了实现某种东西,并不需要参加政府。可是,当时一致同意告同盟书的少数派其他成员,譬如公民维利希,为什么不发言呢?我们不能也不想拆散同盟,我们只是想将伦敦区

① 你们走你们的

② 中央委员会

部分为两个区部。

埃卡留斯: 问题是我提出的,我确实想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至于沙佩尔的意见,我在协会里已经解释过,为什么我认为是一种幻想,为什么我不相信我们的党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之后能立即取得政权。那时,我们的党更需要的是在俱乐部里活动,而不是在政府里。

公民列曼一言不发就退出会场。公民维利希也采取同样的作法。

第一点全体通过。沙佩尔弃权。

第二点全体通过。沙佩尔又弃权。

第三点也全体通过。沙佩尔又弃权。

沙佩尔声明对我们大家提出抗议。“现在我们完全分开了。在科伦我有熟人和朋友,他们宁肯跟着我走,而不会跟你们走。”

马克思: 我们是按照盟章办事的,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具有法律效力。

在宣读记录之后,马克思和沙佩尔声明,他们在科伦没有就这件事写过文章^①。

有人问沙佩尔,他对记录是否有反对意见。他说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因为他认为任何反对意见都是多余的。

埃卡留斯提议大家在记录上签名。这个意见被通过。沙佩尔声明他不签名。

1850年9月15日写于伦敦。

经过宣读,表决和签名^②。

① 在第二个记录副本上没有这句话。——编者注

② 在第二个副本上没有这几个字。——编者注

签名的有：中央委员会主席 卡·马克思
书记 弗·恩格斯
亨利希·鲍威尔 康·施拉姆
约·格·埃卡留斯 卡·普芬德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1956年的
“社会历史国际评论”第1卷
第2部分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手稿的翻版照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关于救济科伦被判罪者的呼吁书³⁸⁹

我们收到了如下的一封信和附在下面的一份呼吁书。根据作者们的请求,我们把收到的信和呼吁书一并发表。

致“加利福尼亚国家报”

1853年1月14日于华盛顿

告德国—美国公众书!

随着科伦巨大案件的发生,德国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摆脱了狭隘的、狂热的宗派运动对它的束缚,从而公开地登上了政治舞台。同官僚警察国家的检察官相对抗的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家。莱茵省的贵族和莱茵省的资产阶级成立了本等级的法庭作为陪审法庭,并且判决对他们的特权采取反对立场的劳动者是“有罪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我们应尽的光荣义务是:提醒公众注意下面的呼吁书,这是呼吁书签名人为了在美国散发而寄给我们同盟的成员的;同时尽我们的力量把我们可能收到的那一小部捐款转寄伦敦,并提出这笔捐款的用途报告。

各联合会(不论你们是什么名称)!

现在你们的成员正在举办许多热闹的联欢晚会。请支持我们祖国的这些坚强的朋友们并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将这些晚会中的一次收入捐给他们。捐款请寄到:华盛顿艾恩大厦亚当斯运输

办事处“救济事务所”阿道夫·克路斯收。

主席 秘书

约·格尔哈特 阿·克路斯

1853年1月10日于华盛顿

呼吁书！

救济我们的科伦被判罪的先进战士，特别是关怀他们的无依无靠的家属，是工人政党的义务。我们相信，美国工人也不会把自己置于党的这项义务之外。为被捕者和他们的家属捐献的款项，请寄交伦敦哈克尼区赛顿广场3号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约翰·贝尔 威·李卜克内西

恩·德朗克 弗·明克斯

约·格·埃卡留斯 卡·普芬德

约·弗·埃卡留斯 威·皮佩尔

弗·恩格斯 勒·弗·林格斯

斐·弗莱里格拉特 艾·卢普夫

伊曼特 约·乌尔麦尔

厄内斯特·琼斯 斐·沃尔弗

格·罗赫纳 威·沃尔弗

卡·马克思 明克斯第二

1852年12月7日于伦敦

请德国—美国各报转载这份呼吁书。

载于1853年1月“加利福尼亚国家报”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加利福尼亚国家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关于救济科伦被判罪的无产阶级 代表及其家属的呼吁书

救济那些由于坚持先进的立场并为之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以致最后落于敌人手中的人们是各个政党及其成员的不可推卸的首要义务。对于无产阶级的工人的政党说来，德国科伦被判罪者的遭遇就是如此。他们所以被判罪并不是因为犯了强加于他们头上的罪名——令人可笑地制造革命，而是因为他们致力于组织工人的政党。审判他们的是属于金融贵族和封建贵族的法官，仅仅由于这一点，就足以肯定这些人的判决是不会公平的，至于普鲁士政府会利用最无耻的捏造来强使这些人昧着他们也许可能有的良心而保持缄默，那就更不用说了。

这些被判罪者都是每天靠自己的双手或笔墨来挣钱糊口的穷苦的工人和著作家，现在他们被囚在狱中，因此他们没有任何可能继续照顾自己的亲属。他们本人在监狱也遭受着各种苦难和折磨，如果不采取一切办法来救济他们和消除他们对自己家庭的深重忧虑，他们势必会有丧失他们今天在党内赖以取得杰出地位的那种智慧的鲜明性和灵活性的危险。

不久前在伦敦成立了委员会。委员会推选无产阶级诗人斐·弗莱里格拉特担任会计，委员会的成员包括英国宪章派的领袖厄内斯特·琼斯。委员会向旅居美国的德国工人发出了呼吁书，我

们立即表示响应。

“救济我们的科伦被判罪的先进战士，特别是关怀他们的无依无靠的家属，是工人政党的义务。我们相信，美国工人也不会把自己置于党的这项义务之外。”

为被捕者和他们的家属捐献的款项，请寄交伦敦哈克尼区赛顿广场3号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签名者：约·贝尔 恩·德朗克

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约·弗·埃卡留斯 弗·恩格斯

斐·弗莱里格拉特 伊曼特

厄内斯特·琼斯 威·李卜克内西

格·罗赫纳 弗·明克斯

明克斯第二 卡·马克思

卡·普芬德 威·皮佩尔

弗·林格斯 艾·卢普夫

约·乌尔麦尔 斐·沃尔弗

威·沃尔弗

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³⁹⁰委托它的理事会组织被判罪者救济工作，并为此成立了由下面签署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他们呼吁所有侨居纽约的那些珍惜自由事业和爱护祖国自由事业的保卫者的德国人把救济捐款寄给委员会。体操联合会将及时提出关于这些捐款的使用报告。我们相信，和我们属于同一党派的各团体一定会愿意积极参加这项救济工作。

主席团已经向美国各体操联合会发出了相应的建议。

最后，还要指出一点：在3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社会主义体

操联合会确定举办一次公众抽彩,我们相信这次抽彩会提供大量的捐款,因为在类似的情况下,德国的妇女和姑娘们不止一次地表现了慷慨解囊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她们同情自由及其先进战士的表现。

认捐现金和物品的募捐单盖有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的印章,认捐者可到下列地址索取:运河街 38 号本协会;北威廉街 12 号莱歇尔泽尔和海茵处,以及寄居约·弥勒家的凯克——艾伦街 21 号。

代表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理事会

救济委员会

莱歇尔泽尔 舒勒尔 贝克尔

凯克 莱斯特尔

1853 年 1 月 16 日于纽约

载于 1853 年 1 月“纽约刑法报”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纽约刑法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 释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注 释

注 释

- 1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个著作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最重要问题的观点。1851年8月初，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之一查理·德纳要求马克思为该报写稿，这是写这本书的直接原因。马克思当时忙于经济研究工作，于是他请求恩格斯写一些关于德国革命的文章。恩格斯在写这些文章时利用了“新莱茵报”合订本作为主要的资料，此外，恩格斯还利用了马克思向他提供的一些补充材料，并且经常同马克思交换意见。同时，这些文章在寄给报纸之前，马克思也都看过。“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从1851年10月25日到1852年10月23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署名是马克思；直到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书信发表之后，才知道这个著作是恩格斯写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没有重新出版过。这本著作的英文单行本第一版是在1896年由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出版的；同年出版了该书的德文译本；1900年由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翻译的该书法文版出版。1899年在柏林出版了该书前三章的俄文译本，从英文翻译的本书俄文版全文第一次是在1900年于伦敦出版的，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本书在俄国曾多次出版，后来，本书又多次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以俄文再版。

这一组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时没有标题；在1896年的英文版中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给它们加上了标题，本版中仍旧保留了这些标题。——第3页。

- 2 “论坛报”（《Tribune》）是美国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的简称，1841年至1924年出版。这份由著名的美国记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创办的报纸，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

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成为共和党的机关报。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采取了进步的立场,反对奴隶占有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记者,从四十年代末起,曾经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理·德纳是该报的编辑之一。马克思从1851年8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共达十年以上;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大量文章,都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而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包括了国际和国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等最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的反动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家销路很广的美国进步报纸,通过具体材料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以及它所固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常常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采取为所欲为的态度,有些文章被删去作者的署名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发表,有时编辑部还对文章加以篡改。马克思曾经对编辑部的这种做法不止一次地提出抗议。从1857年秋天起,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经济状况也因此受到影响,这时马克思不得不减少自己给该报写稿的数量。在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完全停止了给该报写稿;“纽约每日论坛报”同马克思的决裂,主要是由于编辑部中主张与实行奴隶占有制的各州妥协的人数增多以及该报离开了进步立场而引起的。——第7页。

3 大陆体系 是指1806年拿破仑宣布的大陆封锁政策,这个政策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同英国进行贸易。——第8页。

4 1818年的保护关税条例 废除了普鲁士境内的国内税并且为建立关税同盟创造了条件。

确定了共同税界的德意志各邦的关税同盟,是在1834年由普鲁士主持成立的。后来,这个同盟包括了除奥地利和一些小邦以外的德意志所有各邦。由于必须建立全德意志市场而成立的关税同盟,后来也促进了德意志政治上的统一。——第9页。

5 指1844年6月4—6日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这是德国无产阶级

和资产阶级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搏斗)和 1844 年 6 月下半月捷克工人的起义。这种捣毁工厂、破坏机器的工人运动遭到政府军队的残酷镇压。——第 12 页。

- 6 德意志联邦 是 1815 年 6 月 8 日在维也纳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德意志分成三十六个邦,它们各自保持着封建专制制度,这就加深了德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分散状态,阻碍了德国的进一步发展。

联邦议会 是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它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联邦议会是德意志各邦政府实行反动政策的工具。——第 13 页。

- 7 在 1834 年 5 月成立了所谓“税务同盟”(Steuerverein),这个同盟的成员是愿意同英国进行贸易的德意志各邦——汉诺威、不伦瑞克、奥登堡和绍姆堡—利珀。到 1854 年,这个单独的同盟瓦解了,该同盟的参加者并入了关税同盟。——第 13 页。

- 8 在 1814—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奥地利、英国和沙皇俄国,不顾各国人民的民族统一和独立的利益,为了使各个正统王朝复辟而改划了欧洲地图。——第 15 页。

- 9 指 1830 年的法国七月革命以及继七月革命之后在比利时、波兰、德国和意大利等一系列欧洲国家发生的起义。——第 16 页。

- 10 “青年德意志” 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产生于德国的一个文学团体,它受海涅和白尔尼的影响。“青年德意志”的作家(谷兹科夫、文巴尔克和蒙特等)在他们的文艺作品和政论中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情绪,他们起来捍卫信仰自由和出版自由。青年德意志派的观点的特点是思想上不成熟和政治上不坚定。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堕落成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第 16 页。

- 11 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821 年柏林版(G.W.F.Hegel.《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Berlin, 1821。——第 16 页。

- 12 “柏林政治周刊”（《Berliner politisches Wochenblatt》）是极端反动的刊物，1831年至1841年在许多法的历史学派的代表参加下出版，受到皇太子弗里德里希—威廉（1840年起即位为德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支持和保护。

法的历史学派 是十八世纪末产生于德意志的历史学和法学中的一个反动流派。该派以胡果、萨维尼等为自己的著名代表人物，反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关于这一学派的特征，见卡·马克思“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97—106页和第452—467页）两篇文章。

正统派 是法国1792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的拥护者。1830年，在这个王朝第二次被推翻之后，正统派组成了政党。——第18页。

- 13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自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该报是莱茵省一些反对普鲁士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人士创立的。该报曾吸收几个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年4月卡·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日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日报”也发表了弗·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对“莱茵日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封闭了。——第20页。

- 14 海外贸易公司（Seehandlung）是1772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了政府的银行老板的作用。1904年正式成为普鲁士国家银行。——第21页。

- 15 指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主要在德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广泛流行的一种反动思潮。“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卡·格律恩、莫·赫斯、海·克利盖等用仁爱 and 友情的温情宣传冒充社会主义思想，否认在德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卡·马

克思和弗·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反克利盖的通告”、“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33—640页,第4卷第3—20页、第223—275页、第461—504页)中批判了这种思潮。——第23页。

- 16 “德国天主教”是1844年在德国的许多邦中发生的、有中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参加的宗教运动。这个运动反对天主教会中的各种极端的神秘主义和伪善行为。“德国天主教徒”反对罗马教皇的最高权位以及天主教会的许多教条和仪式,他们竭力使天主教适应于德国资产阶级的需要。

“自由公理会”是1846年在“光明之友”运动的影响下从官方新教中分化出来的。“光明之友”运动是一种反对在新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主义和伪善行为为特征的虔诚主义的宗教派别。这个宗教反对派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不满的一种表现形式。

1859年“自由公理会”和“德国天主教徒”协会合并。——第27页。

- 17 一神论派 或反三神论派是反对“神的三位一体”的教条的宗教派别。一神论派运动产生于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时期,是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激进派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教会的斗争的反映。在英国和美国,一神论派出现于十七世纪。十九世纪一神论派的教义反对宗教的表面的仪式,而把宗教中的道德伦理因素提到首位。——第27页。
- 18 拿破仑在德国的胜利导致了所谓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崩溃。1806年8月奥皇弗兰茨一世取消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这个在十世纪建立起来的帝国并不是中央集权国家,而是各个承认皇帝的最高权利的封建公国和自由市的联合。——第28页。
- 19 “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这一口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前夕提出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50页)。这个口号在1848年3月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拟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页)中,被提出作为第一条要求。——第28页。

- 20 指所谓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即开始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英国侵华战争。战争结束后中国被迫签定的南京条约中有一条规定中国开放五个港口与外国通商,这就使外国人更加方便地侵入中国。——第30页。
- 21 1846年2—3月,与克拉科夫的民族解放起义的同时,加里西亚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奥地利当局利用阶级矛盾,在加里西亚起义农民和企图支援克拉科夫的波兰小贵族之间挑起了冲突。从解除小贵族起义部队的武装开始的农民起义,具有大规模毁坏地主庄园的性质。奥地利政府在制服了小贵族的起义运动之后,也镇压了加里西亚的农民起义。——第30页。
- 22 指1848—1849年意大利人民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这次战争是在人民起义在奥地利统治下的伦巴第和威尼斯地区取得胜利后于1848年3月开始的。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以皮蒙特为首的意大利各君主国也参加了反对奥地利的战争。害怕意大利通过革命手段实行统一的意大利统治阶级的叛变行为,使同奥地利的斗争遭到了失败。——第39页。
- 23 引自海涅的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七章。——集50页。
- 24 指1848年8月26日丹麦和普鲁士签订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的停战协定。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起义开始的反对丹麦的战争,是德国人民争取德国统一的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德国各邦政府,其中包括普鲁士政府,在人员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参战。但是,普鲁士的统治集团实际上在作战中实行怠工,并于1848年8月在马尔摩签订了可耻的休战条约。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1848年9月批准这个休战条约的决定,引起了抗议的怒潮并导致法兰克福的人民起义。1849年春天,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事再起,但是,1850年7月普鲁士和丹麦签订了和约,这就使丹麦有可能击败国内的起义者。——第50页。
- 25 关于恩格斯在本文中所阐发的关于加入奥地利帝国的斯拉夫民族的历史命运的观点,见本卷说明第Ⅻ页。——第51页。

- 26 胡斯战争 是 1419—1434 年间以伟大的捷克爱国者、捷克宗教改革的领袖杨·胡斯(1369—1415 年)的名字命名的、捷克人民反对德国封建主和天主教会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次战争期间,以农民和平民的部队为主力的胡斯派的军队,击退了由神父和德国皇帝组织的五次反对捷克的十字军征讨。只是由于捷克的贵族和市民阶级分子同国外的封建反动势力实行叛变性的妥协,人民起义才遭到失败。胡斯派的运动对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 54 页。
- 27 斯拉夫人代表大会 于 1848 年 6 月 2 日在布拉格举行。在代表大会上,受哈布斯堡王朝压迫的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中的两个派别展开了斗争。温和的自由主义右派(属于该派的有代表大会的领导者帕拉茨基、沙法里克)企图以维护和巩固哈布斯堡王朝的办法来解决周族问题。民主主义左派(萨宾纳、弗利契、里别尔特等)坚决反对这一点,竭力主和同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民主力量一致行动。代表大会中属于激进派和积极参加 1848 年 6 月布拉格起义的那一部分代表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布拉格其余的代表即温和的自由派代表 6 月 16 日宣布代表大会会议无限期休会。——第 57 页。
- 28 见海涅“夜巡逻来到巴黎”(诗集“现代的诗”)。——第 59 页。
- 29 宪章派原定于 1848 年 4 月 10 日在伦敦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示威者要前往议会大厦,递交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政府当局禁止这次游行示威,为了阻挠游行示威的进行,在伦敦集结了大批军警。宪章派的领导人(其中有许多人表现了动摇)决定放弃游行示威并且劝说游行的群众解散。反动势力利用游行示威的失败向工人进攻和迫害宪章派。——第 61 页。
- 30 1848 年 4 月 16 日巴黎工人举行和平示威,向临时政府提出关于“劳动组织”和“消灭人对人的剥削”的请愿书,示威被专门为了对付这次示威而动员起来的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所阻止。1848 年 5 月 15 日,在举行人民示威时,巴黎工人和手工业者拥进了制宪议会的会议大厅,宣布解散制宪议会,建立革命政府。但是示威者很快就被及时赶来的国民自卫军和军队所驱散。工人领袖布朗基等被捕。——第 61 页。

- 31 1848年5月15日,因1848年1月炮轰墨西哥而被称为炮弹国王的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镇压了人民起义,解散了国民自卫军,解散了议会,取消了1848年2月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实行的改革。——第61页。
- 32 1848年4月1日奥地利政府公布的出版暂行条例规定必须交纳大量保证金才能取得出版报纸的权利。由于保留书报检查制度和“出版方面犯罪”的人交由行政法庭(而不是陪审法庭)审判的制度,政府官吏就有可能禁止任何一本著作的出版。
- 1848年4月25日宪法规定了在选举议会方面的苛刻的财产资格限制和居住资格限制,建立了两院——下院和上院,并且保留了各省的等级代议机关。宪法将执行权和军权交给皇帝并授予皇帝否决两院通过的法律的权力。
- 1848年5月11日选举法剥夺了工人、日工和仆役的选举权。一部分上院议员由皇帝任命,另一部分上院议员则按照两级选举制从纳税数目最多的人中间选举。下院的选举也是两级制。——第65页。
- 33 1849年8月13日匈牙利军队在背叛了革命事业的戈尔盖率领下在维拉戈什向派来镇压匈牙利起义的沙皇军队投降。——第75页。
- 34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 《(Neue Rheinische Zeitung.Organ der Demokratie)》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天在科伦出版,总编辑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工作的还有恩格斯以及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

民主派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育者的作用,号召他们起来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国和欧洲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

该报的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普鲁士政府以及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这一切使得“新莱茵报”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且受到政府的迫害,而这种迫害在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之后更

变本加厉了。

尽管遭到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阻挠，“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马克思的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的被迫害，使该报停刊。1849年5月19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新莱茵报”，即第301号。报纸的编辑在致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第75页。

- 35 朗卡斯特学校 是以英国教育家约瑟夫·朗卡斯特(1778—1831)的名字命名的贫民子弟小学，在这些学校中实行学习互助制度。年龄较大的和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帮助其他学生学习，以弥补师资的不足。十九世纪前半期，英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曾经广泛建立朗卡斯特学校。——第77页。

- 36 1636年约翰·汉普敦(后来他成了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之一)拒绝向皇家收税官缴纳一种未经下院批准的捐税——“造船费”。就汉普敦拒绝纳税一事举行的审判案在英国社会中激起了对专制制度的反抗情绪的高涨。

美国人反对英国政府在殖民地征收捐税的斗争，是英国北美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1775—1783)的序幕。1766年英国议会在抗议下不得不取消前一年开始征收的印花税；后来美国人宣布抵制缴纳间接税的英国商品。1773年想通过暴力向美国输入缴纳高额消费税的茶叶的企图，以货物在波士顿港口被销毁而告终。这一切冲突导致了纠纷的尖锐化和加速了美洲殖民地反对英国的起义的爆发。——第81页。

- 37 1848年3月21日在力图恢复国王权威的普鲁士资产阶级阁员们的倡议下，在柏林举行了国王出巡的盛典，同时举行了要求德国统一的游行示威。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沿柏林的街道巡视，臂上戴着黑红黄三色臂章——德国统一的象征——并且发表了假爱国主义的演说，把自己装成“德国自由和统一”的捍卫者。——第95页。

- 38 1849年5月17日在柏林召开了有普鲁士、萨克森、汉诺威、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参加的代表会议，会议的目的是修改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拟定的所谓帝国宪法。1849年5月26日代表会议结束时，普鲁士、萨克森和汉诺威的国王缔结了协定（“三个国王的联合”），到1849年8月共有二十九个德意志邦加入了这个协定。按照协定，帝国宪法被修改得符合于君主制的利益，规定帝国的摄政由普鲁士国王充任，并规定议会由两院组成。“联合”是一种使普鲁士君主制在德国取得霸权的尝试。但是，在奥地利和俄国的压力下，普鲁士不得不退却，并且在1850年11月退出了“联合”。——第98页。
- 39 1848年5月18日到1849年5月30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举行了全德国民议会的会议。——第112页。
- 40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的最后一篇，“纽约每日论坛报”没有发表。在1896年的英文版以及后来的许多版本中都把恩格斯的“最近的科伦案件”（见本卷第449—456页）一文载入作为最后一篇，而这一篇文章并不属于“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第115页。
- 41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反动的日报，1798年创刊，1810年至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第116页。
- 42 指在科伦逮捕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家（毕尔格尔斯、勒泽尔、丹尼斯等人）的事件，这次逮捕是普鲁士警察当局于1851年5月间继萨克森当局在莱比锡逮捕同盟的特派员诺特荣克以后进行的。普鲁士政府企图通过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挑拨性审判来破坏无产阶级的独立运动。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本卷第457—536页）揭示了科伦案件的作用。——第116页。
- 43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之一。在这个著作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分析法国1848—1851年的革命事件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里，马克思首次提出了关于胜利的无产阶级打碎

资产阶级国农机器的必要性的论点。马克思及时地将 1851 年 12 月到 1852 年 3 月这个时期的事件写成了书。在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过程中，马克思经常同恩格斯交换关于法国事件的意见。除了报刊和官方的资料外，马克思还利用了一些寄自巴黎的个人通讯作为资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本来是准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约·魏德迈在美国筹办的“革命”周刊上以文丛的形式发表的，但是这个杂志魏德迈只出了两期（1852 年 1 月），以后就由于经济困难而停刊了。马克思的文章到的太晚，所以在这两期中没有来得及发表。根据马克思的建议，魏德迈于 1852 年 5 月把这个著作以单行本出版，作为“不定期杂志”“革命”的第 1 期（也是唯一的一期）。魏德迈将书名改为“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没有用路易·波拿巴）。由于经济窘迫，这个第一版的大部分魏德迈都没有能够从印刷厂主那里买回，运到欧洲去的册数不多。在德国或英国（用英文）再版的企图也没有成功。书的第二版到 1869 年才出版。在这次出版时，马克思将著作的原文又重新审阅了一遍。在 1869 年版的序言中，马克思将对原文的校订作了如下的说明：“这本书如果加以修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色彩。因此，我只是改正了一些刊误，并且删掉了一些现在已经看不懂的暗喻。”1885 年由恩格斯编辑出版的第三版，全文与 1869 年版一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法文译本最先于 1891 年 1—11 月载于法国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同年该书又在利尔以单行本出版。1894 年在日内瓦第一次出版了本书的俄文版。此后这本书曾多次以俄文重版，其中很多次是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负责出版的。这次出版时是根据 1869 年德文版的原文。——第 117 页。

- 44 雾月十八日（1799 年 11 月 9 日）是在法国完成资产阶级反革命过程的一次政变；改变的结果，建立了拿破仑·波拿巴的军事专政。——第 121 页。
- 45 贝德勒姆是伦敦的疯人院。——第 123 页。
- 46 1848 年 12 月 10 日，路易·波拿巴经大选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第 123 页。

- 47 据圣经故事,当被俘的犹太人从埃及逃跑时,其中一些胆怯的人由于道路的艰难和饥饿,开始惋惜他们做奴隶的日子,因为那时他们至少还可以吃饱肚子。于是,“惋惜埃及的肉锅”就成了一句谚语。——第 124 页。
- 48 Hic Rhodus, hic salta!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转意:这里就是最主要的,你就在这里证明吧!)——这是对一个说大话的人讲的话,他硬说自己曾在罗陀斯岛跳得很远很远(引自伊索寓言中的“说大话的人”)。
-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是上述引文的代用语 Ρόδος 在希腊文中是一个岛名,也作“玫瑰花”讲),这是黑格尔在“法哲学”一书的序言中使用的。——第 125 页。
- 49 1852 年 5 月,路易·波拿巴的总统任期届满。根据法国 1848 年宪法,每四年一次的新总统的选举应该在 5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举行。——第 125 页。
- 50 见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第 126 页。
- 51 在 1869 年的德文版以及 1852 年版和 1885 年版中,都将立法会议的召开日期错写为 1849 年 5 月 29 日。——第 126 页。
- 52 王朝反对派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众议院中的一个以奥迪隆·巴罗为首的议员集团。这个集团中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情绪的人们,主张实行温和的选举改革,认为这是避免革命和保存奥尔良王朝的方法。——第 127 页。
- 53 克拉普林斯基是海涅的“两个骑士”一诗中的主人公,一个破落的贵族;克拉普林斯基这个姓是由法文字 crapule(贪食、饕餮、酗酒以及懒汉、败类的意思)形成的。
- 马克思用克拉普林斯基来暗指路易·波拿巴。——第 131 页。
- 54 “国民报”(《Le National》)是 1830 年至 1851 年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法国日报,是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第 132 页。
- 55 “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是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政治和文学辩

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的简称，1789年创刊于巴黎。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该报反映了反革命资产阶级，即所谓秩序党的观点。——第132页。

- 56 洗国 1830年资产阶级革命后所通过的宪章，是七月王朝的根本法。宪章在表面上宣布了国民的自主权并对国王的权力作了某些限制，但是，那些反对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警察官僚机构和苛刻的法律仍然原封未动。——第134页。
- 57 《Frère, il faut mourir!》（“兄弟，要准备牺牲！”）——是特拉普天主教修道会的成员在见面时的互相问候词。特拉普修道会成立于1664年，以严格的规章及其成员的禁欲主义生活方式而出名。——第136页。
- 58 克利希是1826—1867年巴黎的债务监狱。——第137页。
- 59 指1849年5—7月那不勒斯王国参加对罗马共和国的武装干涉的事。
1849年2月9日在罗马由全民投票产生的制宪议会，废除了教皇的世俗权力并宣布成立共和国。罗马共和国的行政权集中在以马志尼为首的三执政的手里。在共和国存在的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但是，在土地政策中表现出了共和国的阶级局限性；由于拒绝把地主的土地转交农民所有，共和国失去了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的同盟者。由于法国、奥地利和那不勒斯的武装干涉，罗马共和国于1849年7月3日被推翻。——第139页。
- 60 马克思指的是路易·波拿巴的生平中的以下一些事实：1832年路易·波拿巴曾在土尔高州加入瑞士国籍；1848年在英国的時候，路易·波拿巴曾志愿充当特别警察（特别警察是英国的一种由公民组成的警察后备力量），与警察当局一起反对1848年4月10日由宪章派组织的工人示威。——第139页。
- 61 指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对1848年12月10日选举的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9—51页）。——第139页。

- 62 罗马皇帝卡利古拉(37—41)是由于御用军的拥戴而即皇位的。——第143页。
- 63 1849年4月法国政府在援助皮蒙特抗击奥地利和保卫罗马共和国的借口下,从制宪议会那里得到一笔装备去意大利的远征军的拨款。而远征的真正目的却是干涉罗马共和国和恢复教皇的世俗权力。——第143页。
- 64 指1851年11月6日保皇党人勒夫洛、巴兹和帕纳及立法议会的议会总务官(议会负责经济、财政及安全保卫事务的特派员)提出的法案,法案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在11月17日被否决。在表决时山岳党人将保皇党人看成是主要危险而支持波拿巴主义者。——第144页。
- 65 彼得·施莱米尔是夏米索的中篇小说“彼得·施莱米尔奇遇记”中的主人公,他用自己的影子换来一个神奇的钱袋。——第147页。
- 66 爱姆斯是德国的疗养地。1849年8月正统派曾在这里召开会议,法国王位追求者、自封为亨利五世的尚博尔伯爵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克勒蒙特是伦敦附近的一个城堡,路易-菲力浦从法国逃出后住在这里。——第150页。
- 67 第V条属于1848年法国宪法的序言部分;宪法正文的条文是以阿拉伯数字编号的。——第153页。
- 68 暗指路易·波拿巴想从罗马教皇庇护九世手中接受法国王位的阴谋。据圣经故事,古犹太皇帝大卫是由先知撒母耳主持涂油仪式而登极的。——第158页。
- 69 暗指1839年在巴黎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拿破仑观念”(Napoléon—Louis Bonaparte.《Des idées napoléoniennes》.Paris, 1839)一书。——第164页。
- 70 加入立法议会新选举法起草委员会的十七个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首领,由于他们贪图权力和抱有反动意图而被称之为城官。这个绰号是从维克多·雨果根据中世纪德国的生活而写的同名的历史剧中借用的。在德国,城官是被皇帝指派的城和区的统治者。——第168页。

- 71 按照 1850 年 7 月立法议会通过的出版法的规定,报纸出版者应当交付的保证金数额大大增加,并且开始征收印花税,小册子也在征收范围之内。这个新的法律是在法国实际上取缔出版自由的一些反动措施的继续。——第 170 页。
- 72 “新闻报”(《La Presse》)是从 1836 年起在巴黎出版的资产阶级日报;在 1848—1849 年,它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后来又是波拿巴主义者的机关报。——第 170 页。
- 73 “通报”(《Moniteur》)是法国日报“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的简称,它是政府的官方机关报,1789 年至 1869 年用这个名称在巴黎出版。——第 173 页。
- 74 指七月王朝时期路易·波拿巴通过武装叛乱实行政变的企图。1838 年 9 月 30 日他在一些赞成波拿巴主义的军官的帮助下发动了斯特拉斯堡驻防军的两个炮兵团,但只经过几小时叛乱分子就被解除了武装。路易·波拿巴本人被捕并被流放到美洲。1840 年 8 月 6 日他利用法国波拿巴主义抬头的机会,和一小撮密谋家一起在布伦登陆,企图在当地驻防军队中发动叛乱。这个企图也遭到了完全的失败。路易·波拿巴被判终身监禁,但他 1846 年就逃往英国去了。——第 174 页。
- 75 麦克·波顿是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马克思这里引用的是第一幕第二场的情节。——第 174 页。
- 76 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勒勃是席勒的话剧“强盗”中的人物,是丧失一切道德观念的盗匪和凶手的形象。——第 175 页。
- 77 指波拿巴派的报纸;这个名称是由路易·波拿巴任总统期间在巴黎的官邸爱丽舍宫而去。——第 177 页。
- 78 马克思在这里是用席勒的诗“欢乐颂”中的一行而写的双关语。在这首诗中诗人歌颂了欢乐——来自爱丽舍乌姆或来自爱丽舍园的女儿(在古代作者的笔下爱丽舍园是天堂的同义语)。爱丽舍园也是巴黎街名,路易·波拿巴的官邸就在这里。——第 181 页。
- 79 议会是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前法国的最高司法机关。许多城市都有

议会，作用最大的是巴黎的议会，它办理国王敕令的登记并具有所谓谏疏的权力，即对不合习惯及国家法律的敕令提出反对意见的权力。但议会的反对立场并没有实际的力量，因为只要国王亲自出席会议，敕令就一定要被登记下来。——第 185 页。

- 80 贝耳岛是比斯开湾的一个岛。1849—1857 年是监禁政治犯的地方；参加 1848 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工人也被囚禁在这里。——第 188 页。
- 81 马克思在这里运用了古希腊作家阿泰纳奥斯（二至三世纪）的著作“学者们之宴会”（《Deipnosophistae》）中的一个情节。他转述得不完全确切。埃及法老泰俄斯以隐喻的方式讥笑带兵前去帮助他的斯巴达皇帝阿革西拉乌斯的矮小身材说：“山怀孕了，宙斯很吃惊，但山生了个老鼠”。阿革西拉乌斯回答说：“你把我看作老鼠，但总有一天，你会把我看成狮子的”。——第 190 页。
- 82 威尼所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正统派的法国王位追求者尚博尔伯爵的驻在地。——第 194 页。
- 83 指复辟时期正统派阵营中在策略上的意见分歧。路易十八和维莱尔主张比较小心地采取反动的措施，而达尔图尔伯爵（从 1824 年起为国王查理十世）和波林尼雅克却完全忽视法国的局势；主张完全恢复革命前的秩序。
- 巴黎的土伊勒里宫是路易十八的皇宫；马松阁是宫里的建筑之一，在复辟时期是达尔图尔伯爵的官邸。——第 196 页。
- 84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是英国经济、政治方面的周刊，1843 年起在伦敦出版，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第 198 页。
- 85 伦敦工业展览会是第一次全世界工商业展览会，于 1851 年 5—10 月展出。——第 203 页。
- 86 “国民议会通报”（《Le Messager de l'Assemblée》）是法国反波拿巴派的日报，于 1851 年 2 月 16 日至 12 月 2 日在巴黎出版。——第 205 页。
- 87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五场。——第 215 页。

- 88 塞文是法国朗基多克省的一个山区,1702—1705年整个这个地区爆发了被称为“卡米扎尔”(“穿衬衫的人”)起义的农民起义。由于对新教徒的迫害而爆发的起义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性质,个别地方一直到1715年还有起义爆发。
- 万第是法国西部的一个省,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万第省曾经发生贵族和僧侣领导的农民反革命暴动。——第218页。
- 89 在1852年的版本中没有本段最后两句,作为本段的结束的是:“打碎国家机器丝毫也不会危及中央集权制。官僚政治不过是中央集权制还受其对立物即封建制度累赘时的低级和粗糙形态。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时,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奠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第223页。
- 90 君士坦士宗教会议(1414—1418)是在宗教改革运动开始的情况下为巩固天主教会的已经动摇的地位而召开的。会上谴责了宗教改革运动的首领约翰·威克利夫和杨·胡斯的教理。会议消除了天主教会的分裂状态,选出了新的教会首脑以代替三个互相争夺教皇王位的人。——第224页。
- 91 见注15。——第224页。
- 92 是指1715—1723年法国奥尔良王室的菲利浦摄政时期,当时路易十五还处于童年。——第227页。
- 93 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是保存在特利尔教堂里的天主教圣物,据说是耶稣在受刑时脱下的圣衣。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是朝圣者的崇拜物。——第227页。
- 94 恩格斯的关于英国的这两篇文章是为魏德迈在纽约出版的“革命”周刊写的。恩格斯在1851年12月至1852年1月期间共写了四篇文章,魏德迈只收到了其中的两篇,另外两篇在途中遗失了。然而魏德迈收到的两篇也因杂志停刊而未能发表。在保留下来的这两篇文章的手稿上都有

恩格斯亲手写的“英国”这一篇名。第二篇上的篇名看样子是被魏德迈划掉了，文章的罗马字母编号显然也是他加上的。——第 228 页。

- 95 在 1846—1853 年英国在开普兰进行了第五次反对科萨族的“卡弗尔战争”。(卡弗尔人是对东南非的一些部族的不正确的统称)。战争的头几年,当地居民不止一次的打败过英国军队。但是根据 1853 年的和约科萨族却被迫把自己的一部分土地割让给英国人。

1851 年英国殖民主义者企图侵占奴隶海岸(西非),并且为此目的,对居住在这里的约鲁布族的内讧进行干涉。虽然在 1851 年 12 月英国人袭击了拉格斯城,但是他们仍然没有能够征服当地居民,而不得不只限于在这里建立他们的傀儡政权。只是在 1861 年“购买”了拉格斯城以后,英国人才在奴隶海岸站住脚并为自己尼日利亚的殖民地打下基础。——第 229 页。

- 96 指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军队。——第 229 页。

- 97 贝朗热在他的“米尔米东人或阿基里斯的葬礼”(《Les mirmidons ou les funérailles d'Achille》)这个歌曲中讽刺了复辟时期法国的渺小的和无能的统治者。歌曲的标题中带有双关语:les mirmidons——米尔米东人,据传说这是南特萨利亚的一个部落,在特洛伊战争中,这个部落的战士曾在阿基里斯的率领下作过战;mirmidon(米尔米东)同时还有小胖子、矮子的意思,而转意是渺小的、无能的人。——第 230 页。

- 98 见注 29。——第 230 页。

- 99 这里和下面指的是布匿战争(公元前 264—241, 218—201, 149—146 年),这个战争是古代两个最大的奴隶制国家——罗马和迦太基为了在地中海西部建立统治,为了争夺新的领土和奴隶而进行的战争。战争以迦太基的灭亡而告终。——第 231 页。

- 100 在反对第一次反法联盟的战争(1792—1797)中,在拿破仑率领下同奥军作战的法国军队于 1797 年 5—6 月占领了中立的威尼斯共和国。根据同年 10 月在康波福米奥签订的法奥和约,威尼斯共和国领土的一部

分包括威尼斯城划归奥地利,作为交换条件的是,后者在莱茵河边界上作出让步;另外一部分划归南阿尔卑斯共和国,该共和国是拿破仑在他所夺取的意大利北部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伊奥尼亚群岛和威尼斯共和国在阿尔巴尼亚沿岸的领土划归法国。——第 232 页。

- 101 指停泊在葡萄牙塔霍河河口的英国舰队。十九世纪,英国地中海舰队曾利用塔霍河河口作为中间基地。——第 232 页。
- 102 指 1803—1805 年拿破仑第一在布伦地区建立的军事基地,他打算从这里越过拉芒什海峡侵入英国。在这里集中了约二千五百只小运输船和十二万登陆部队。法国舰队在英法战争中的失败,以及在俄国和奥地利参加下在欧洲建立起来的新的反法联盟,迫使拿破仑放弃了他的计划。——第 234 页。
- 103 指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见注 24)的一个战役。1849 年 4 月 5 日,由十只船组成的丹麦分舰队,从海上向什列斯维希的濒临海湾的城市埃克恩弗尔德发起攻击,以便登陆兵登陆。分舰队被海岸炮兵的交叉射击击溃。——第 235 页。
- 104 和平协会是教友会派于 1816 年在伦敦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协会得到了自由贸易派的积极支持。自由贸易派认为,在和平条件下,英国通过自由贸易可以更充分地利用自己在工业上的优势进而达到经济上政治上的统治。——第 236 页。
- 105 此处在手稿上有下面这样一个编者注:“讨论帕麦斯顿被撤职的文章,我们没有收到。显然它是从英国寄来的时候在途中遗失了。”这个编者注看样子是魏德迈加的。——第 237 页。
- 106 “每日新闻” (《The Daily News》)是英国的自由派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从 1846 年至 1930 年以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 237 页。
- 107 包括了宪章派的各项要求的人民宪章,1838 年 5 月 8 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法案公布。宪章包括六点:普选权(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

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第 238 页。

- 108 现在发表的这封信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写的,而由马克思寄给“泰晤士报”编辑部。恩格斯还给“每日新闻”的编辑部寄去了一封类似的信。但是,因为这些报纸的编辑部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家采取极端敌视的态度,所以这两封信未能发表。给“泰晤士报”的这封信是根据恩格斯在 1852 年 1 月 28 日给马克思的信的背面所写的该信的草稿刊印的。

“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保守派最大的一家报纸,1785 年创办于伦敦。——第 241 页。

- 109 大陪审团 是 1933 年之前存在于英国的一种陪审团,由郡长从郡中选拔十二到二十三个“善良的和诚实的人”组成。陪审团的职能是对案件进行预先审查,并对是否将被告提交刑事法庭审判的问题作出决定。——第 242 页。

- 110 “每周快讯”（《The Weekly Dispatch》）是英国的一家报纸,1801 年至 1928 年以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五十年代该报具有激进的倾向。——第 244 页。

- 111 指 1851—1852 年在伦敦出版的宪章派的周刊“寄语人民”（《Notes to the People》）,它的主编是厄·琼斯。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支持这个杂志,参加该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并且从 1851 年 6 月到 1852 年 4 月间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第 245 页。

- 112 指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通过的(1848 年 8 月 9—11 日,1849 年 7 月 27 日,1850 年 7 月)一系列有关出版物的法律。这些法律规定出版报刊要缴纳很高的押金,对书报征收印花税,并且规定对攻击“所有制原则和家族权利”,以及“煽动内战”的出版物要严加惩处。这些法律实际上是取消了法国的出版和言论自由。

恩格斯把这些法律叫作“禁口律”,以此来和 1819 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六项反动法令作类比,这些法令取消了人身不受侵犯的自由和出版、集会自由。——第 245 页。

-
- 113 在 1853 年底和 1854 年,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生了尖锐的危机现象。市场商品滞销现象(首先是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使英国纺织业和制铁业生产缩减。在法国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同样,美国的工业也遭受到严重的困难。——第 255 页。
- 114 贝尔格莱夫广场 是伦敦西头上流社会人士居住区的一个邸园,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住宅都集中这一带。——第 255 页。
- 115 指 1852 年 1 月 22 日路易·波拿巴颁布的没收奥尔良王室财产的命令。——第 256 页。
- 116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是一家德国日报,自 1802 年起即以此名在科伦出版。在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和在此之后的反动统治时期,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和背叛的政策,并且激烈地反对“新莱茵报”。——第 257 页。
- 117 1851 年 9 月法国逮捕了在 1850 年 9 月脱离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地方支部的一些盟员。这个集团采取小资产阶级的密谋性策略,忽视现实状况,指望立即组织起义,致使法国和普鲁士警察当局能够靠领导巴黎的一个地方支部的奸细舍尔瓦尔捏造了所谓德法密谋。在 1852 年 2 月,被捕者根据图谋叛国的罪名被判罪。奸细舍尔瓦尔被安排越狱逃跑。普鲁士警察当局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了德法密谋的企图就完全破产。1851 年 9 月在巴黎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康拉德·施拉姆,也因缺乏证据而很快就被释放。施梯伯在科伦案件中所能捏造的用以证明被告参加了德法密谋的伪证都被马克思揭穿了(见本卷第 472—487 页)。——第 257 页。
- 118 1849 年 9 月马克思被选入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该委员会附设于当地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中。为了消除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把伦敦流亡者中的无产阶级分子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的企图,委员会根据马克思和其他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者的建议改组成了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1850 年 9 月中旬马克思和恩格斯声明退出流亡者委员会。因为该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受到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影响。——第 257 页。

- 119 “流亡中的大人物” 是抨击 1848—1849 年的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活动家的小册子,这些小资产阶级活动家在革命失败后便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目的是给这种进攻以应有的反击,并揭露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玩弄革命阴谋的有害活动。这本著作写于 1852 年 5—6 月,一部分写于伦敦,一部分写于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马克思是 5 月底到他那里的。这一著作利用了靠朋友们的帮助事先收集起来的大量的实际材料:流亡者发行的各种出版物(文件、报纸、回忆录),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报刊等等。参加选材和手稿整理工作的除马克思夫人外,还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恩斯特·德朗克。7 月初手稿就委托给一个自愿效劳的匈牙利流亡者班迪亚在德国出版。后来发现这个人 是警察局的暗探,他把小册子卖给了普鲁士警察局。马克思不久便在 1853 年 4 月写的、发表在美国报纸“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的文章“希尔施的自供”中公开揭露了这个曾一时迷惑了他的班迪亚的行为。

作者在世的时候,小册子一直没有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保存的手稿本(前几页是德朗克执笔,以后都是恩格斯执笔由马克思作补充)后来落到了爱·伯恩施坦手里,他不仅不设法出版,而且在 1913 年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集的时候,竟尽数地删去了所有涉及马克思就“流亡中的大人物”这本小册子同班迪亚谈判的地方。直到 1924 年,保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库才从伯恩施坦那里得到了手稿。1930 年这一著作第一次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译成俄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中。和以前的版本不同,本版考虑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校阅中所做的修改,凡手稿中删去的地方都没有再刊印出来。——第 259 页。

- 120 克洛普什托克“救世主”第一首歌。——第 261 页。
- 121 《Gottfried Kinkel. Wahrheit ohne Dichtung》. Biographisches Skizzenbuch von Adolf Strodtmann. Bd. I — II, Hamburg, Hoffmann und Campe, 1850—1851. ——第 261 页。
- 122 指德国文学中的感伤派,十八世纪末曾风行一时的密勒的小说“济格瓦

- 特。修道院的历史”(1776年出版)是这一派的代表作。——第261页。
- 123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的书斋”)。——第262页。
- 124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的书斋”)。——第262页。
- 125 纳尔苏修斯——古代希腊神话中爱恋自己的影像的美少年;转意是妄自尊大的人。——第266页。
- 126 瓦格纳——歌德“浮士德”中的人物,浮士德的学生,伪学者、经院哲学家的典型。——第266页。
- 127 指文学杂志“德国缪斯年鉴”(《Deutscher Musenalmanach》)和“基督徒的娱乐”(《Der Christoterpe》)。前者由阿·夏米索和古·施瓦布于1832—1838年在莱比锡出版,后者由阿·克纳普于1833—1853年在杜宾根出版。——第268页。
- 128 马哈德伐 即“伟大的神”,是印度主神之一湿婆的别名。印度姑娘们都是自己制作湿婆的形象,作为她们崇拜的偶像。——第268页。
- 129 “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 是德国作家诺瓦利斯的未完成的小说,德国反动浪漫主义的典型作品之一。小说的主人公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是一个诗人,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用于寻找“蓝色花朵”——理想的诗篇的象征。——第270页。
- 130 歌德“温和的讽刺诗”。——第271页。
- 131 指霍夫曼的中篇小说“约翰奈斯·瓦赫特师傅”中的一段情节。小说中的主人公木匠约翰奈斯·瓦赫特,由于不久前死了妻子和儿子而非常悲痛,但他在创作中找到了安慰并创造出独特的建筑设计图案。——第272页。
- 132 “恨世和懊悔” 是德国反动作家奥·科采布的剧作的名称。——第273页。
- 133 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1807年班堡和维尔茨堡版(G.W.F. Hegel.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Bamberg und Würzburg,

- 1807)。——第 274 页。
- 134 指作家荣克—施梯林的自传体小说“亨利希·施梯林的青年时代”（1778 年版）中的主人公，这本小说是伪善的虔诚的文学作品的典型。——第 276 页。
- 135 “林苑协会”是 1772 年在哥丁根大学里成立的青年诗人小组（约·福斯、亨·毕尔格尔斯、路·哥尔蒂等人）。克洛普什托克是小组在思想上的鼓舞者。小组倾向于不久之后获得“狂飚”（《Sturm und Drang》）之称的思潮，这种思潮表达了德国市民阶层对德国现存制度的不满。哥丁根小组成员的特点是写抒情诗，在这些诗里有抗议的主题，同时也夹杂着对德国市民的简单的生活方式及其庸俗道德的伤感的歌颂。——第 280 页。
- 136 罗累莱是德国诗人广泛引用的民间传说中的女主人公；也是致人于死命的、冷酷无情的美人的象征。亨·海涅“罗累莱”这首诗在艺术上最出色地体现了这个形象。——第 281 页。
- 137 歌德“亲和力”（Goethe. 《Die Verwandtschaften》）。——第 281 页。
- 138 大·弗·施特劳斯“耶稣传”1835—1836 年杜宾根版第 1—2 卷（D. F. Strauß. 《Das Leben Jesu》. Bd. 1—2, Tübingen, 1835—1836）。——第 283 页。
- 139 哥·金克尔“手工业，救救自己吧！或德国手工业者为了改善自己的状况应当要求什么和做些什么？”1848 年波恩版（G. Kinkel. 《Handwerk, errette Dich! oder Was soll der deutsche Handwerker fordern und thun, um seinen Stand zu bessern?》，Bonn, 1848）。——第 286 页。
- 140 “文克布莱希哀歌”（德国经济学家卡·格·文克布莱希，他发表了恢复行会制度的反动理论）在这里是用来讽刺地称呼 1848 年在许多德国城市里召集的手工业者代表大会的，在这些大会上提出了恢复行会的反动、空想的纲领。1848 年 7 月 15 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集了全德手

工业者代表会议，制定共同纲领。由于师傅们不愿让帮工平等地参加代表会议，后者便自己组织了一个代表会议，并且吸收南德各城市的工人参加。但是这个代表会议的纲领也是根据亲自参加了这两个会议的文克布莱希的反动学说制定的。——第 287 页。

- 141 普鲁士议会的第二议院是 1849 年 2 月 5 日根据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 1848 年 12 月 5 日在普鲁士反革命政变之后钦定的宪法而召集的。尽管该院的选举是根据极不完备的选举法进行的，但是第二议院里仍然形成了强有力的左翼反对派。到 4 月 28 日第二议院就被政府解散了。——第 290 页。
- 142 普法尔茨并没有海岸线。——第 291 页。
- 143 1849 年 6 月 29—30 日巴登革命军和普鲁士军队在拉施塔特城下展开了最后一次激战。被围困在拉施塔特要塞里的巴登军残部在 7 月 23 日投降。——第 291 页。
- 144 金克尔 1849 年 4 月 4 日在拉施塔特军事法庭上的辩护词曾登载在 1850 年 4 月 6—7 日的柏林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晚邮报”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尖锐地批评了金克尔的这个辩护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351—354 页）。——第 293 页。
- 145 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Goeth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第 296 页。
- 146 指英国国王狮心理查从囚禁中逃脱一事，他是在第三次十字军远征（1190—1192 年）的归途中被奥地利大公列奥波特一世囚禁的。他是被法国的吟游抒情诗人布朗德尔解救出来的，据传说后来弗朗德尔成了狮心理查的宫廷诗人。——第 296 页。
- 147 “家常话”（《Household Words》）——英国的一种文艺周刊；由查理·狄更斯于 1850—1859 年在伦敦出版。

“新闻画报”（《Illustrated News》）——英国的一种画报（周刊）“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的简称；1842 年开始出

- 版。——第 298 页。
- 148 水晶宫,用金属和玻璃构成,是为 1851 年在伦敦举办的首届世界工商业展览会建造的。——第 299 页。
- 149 “宇宙”(《Der Kosmos》)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的机关报(周刊);由恩斯特·豪格于 1851 年在伦敦出版;参加周刊工作的有金克尔、卢格、隆格、奥本海姆、陶森瑙。共出了六期。——第 299 页。
- 150 1852 年 5 月,在法国按照宪法应当改选共和国总统。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人士,尤其是流亡者希望民主党派通过这次改选上台执政。——第 300 页。
- 151 指维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 1849 年 3 月 28 日通过的帝国宪法的运动。宪法遭到了德意志各邦多数的否决。5—6 月在巴登和普法尔茨爆发了支持宪法的起义。但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对起义者丝毫不加援助。恩格斯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127—235 页)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本卷第 91—104 页)这两本著作中评述了这一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第 300 页。
- 152 成立全体德国流亡者中央局的企图是为了反对这个时期由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见注 118),其目的是阻挠无产阶级成立独立的组织。——第 301 页。
- 153 德·狄德罗“拉摩的侄子”。摘自“狄德罗铁文集”1821 年巴黎版(D. Diderot. 《Le neveu de Rameau》. In: 《Oeuvres inédites de Diderot》. Paris, 1821)。——第 301 页。
- 154 “坚决前进俱乐部”是 1849 年 6 月 5 日在卡尔斯卢厄成立的,它联合了对布伦坦诺政府采取投降政策和在政府中加强右派分子的活动表示不满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的比较激进的一派(司徒卢威、契尔奈尔、海因岑等等)。俱乐部建议布伦坦诺把革命推向巴登和普法尔茨境外,在政府中增加激进分子。俱乐部的委员接到否定的回答后,于 6 月 6 日试图以武装示威游行来威胁政府。但是政府得到了市民

自卫团和其他武装部队的援助,迫使他们缴械投降。于是“坚决前进俱乐部”被封闭了。——第 302 页。

- 155 见注 6。——第 303 页。
- 156 见注 16。——第 303 页。
- 157 德国大学里的普通的四系是神学系、法学系、医学系和哲学系。——第 303 页。
- 158 “德国旁观者”(《Deutscher Zuschauer》)是德国激进派的周报,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司徒卢威自 1846 年 12 月至 1848 年 4 月在曼海姆出版,1848 年 7—9 月在巴塞尔出版。该报于 1848 年 7—12 月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弗·默尔德斯继续以此名称在曼海姆出版,只是加了个小标题:“续刊”(《Neue Folge》),并重新编号。——第 303 页。
- 159 指卡·罗泰克“从古代到 1831 年一切等级的世界史”,1831—1833 年斯图加特版第 1—4 卷(K. Rotteck. 《Allgemeine Weltgeschichte für alle Stände, von den frühesten Zeiten bis zum Jahre 1831》. Bd. 1—4, Stuttgart, 1831—1833),和卡·罗泰克同卡·韦尔凯尔“政治词典。一切等级的政治科学大百科全书”1845—1848 年阿尔托纳版第 1—12 卷(K. Rotteck und K. Welcker. 《Das Staats-Lexikon. Encyclopädie der sämtlichen Staatswissenschaften für alle Stände》. Bd. 1—12, Altona, 1845—1848)。——第 303 页。
- 160 古·司徒卢威“政治科学原理”第 1—4 卷(G. Struve. 《Grundzüge der Staatswissenschaft》. Bd. 1—4)。头两卷于 1847 年在曼海姆出版,第 3—4 卷于 1848 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 303 页。
- 161 指古·司徒卢威“巴登三次人民起义的历史”1849 年伯尔尼版(G. Struve. 《Geschichte der drei Volkserhebungen in Baden》. Bern, 1849)。——第 303 页。

- 162 指“共和国政府报”（《Republikanisches Regierungs-Blatt》），该报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由古·司徒卢威和卡·布林德于1848年9月第二次巴登起义时期在寥拉赫出版。“德意志共和国！富强、教化、人人自由！”（《Deutsche Republik! Wohlstand, Bildung, Freiheit für Alle!》）这个口号被当作副标题刊印在该报上。——第304页。
- 163 指河·戈克匿名出版的书“从德国的现状回顾巴登的革命。巴登制宪议会一委员写”1850年巴黎版（A. F. G. v. a. 《Rückblick auf die Badische Revolution unter Hinweisung auf die gegenwärtige Lage Deutschlands. Von einem Mitgliede der Badischen constituirenden Versammlung》. Paris, 1850）。——第304页。
- 164 “德意志伦敦报”（《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是伦敦德国流亡者办的周报，自1845年4月出版到1851年2月该报在物质方面受失去权位的不伦瑞克的卡尔公爵支持。主编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路易·班贝尔格。自1849年至1850年该报主要刊登卡·海因岑、古·司徒卢威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论文；此外，它转载了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3月）、卡·马克思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第一章（1850年4月）、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国际述评（三）”的一部分（1851年2月）以及许多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签名的声明。——第305页。
- 165 指在德国摆脱了拿破仑的压迫以后，德国知识分子举行的反政府运动。还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已产生的大学生体操协会的许多成员，在维也纳代表会议（见注8）之后便起来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了政治性的示威游行，在游行时提出了统一德国的要求。1819年大学生桑得暗杀神圣同盟的拥护者和国王的走狗科采布一事成了镇压“蛊惑者”的借口。在1819年8月德意志各邦大臣的卡尔斯巴德代表会议上所通过各项决议中，把这一反政府运动的参加者叫做“蛊惑者”。——第306页。
- 166 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1817年海得尔堡版（G. W. F.

Hegel. 《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Heidelberg, 1817). —— 第 306 页。

- 167 “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 《Deutsche Jahrbücher》）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文艺哲学杂志的简称，该杂志自 1838 年 1 月至 1841 年 6 月用小型日报的形式以“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的名称在莱比锡出版，自 1841 年 7 月至 1843 年 1 月以“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的名称出版。该杂志在 1841 年 6 月以前由阿·卢林和泰·艾希特迈耶尔在哈雷主编，从 1841 年 7 月起由阿·卢格在德勒斯顿编辑。1843 年 1 月，萨克森政府查封了“德国年鉴”，联邦议会则决定禁止它在全德境内出版。—— 第 306 页。
- 168 “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是德国启蒙派的机关刊物；于 1783—1811 年出版。该杂志曾几度改变名称，在 1799—1811 年间弗·尼古拉参加了它的出版工作。—— 第 307 页。
- 169 指乔·威·弗·黑格尔“美学讲演录”第 1—3 卷；“黑格尔全集”1835 年、1837—1838 年柏林版第 10 卷第 1—3 册（G.W.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Aesthetik》，Bd. I—III；Werke, Bd. X, Abt. 1—3, Berlin, 1835, 1837—1838）及亨·海涅“浪漫主义学派”1836 年汉堡版（H. Heine. 《Die romantische Schule》. Hamburg, 1836）。—— 第 307 页。
- 170 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1807 年班堡和维尔茨堡版（G.W.F. Hegel.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Bamberg und Würzburg, 1807》）。—— 第 309 页。
- 171 指亨·海涅的讽刺诗“阿塔·特洛尔”，诗中以一只博学的熊阿塔·特洛尔的形象来嘲笑德国的哲学家。—— 第 310 页。
- 172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卡·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 1844 年 2 月出版过一

- 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卡·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弗·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所·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9—451、452—467、596—625、626—63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地转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第311页。
- 173 皇宫是巴黎的一座宫殿，属于奥尔良王族。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在宫里设置了表演场和娱乐场；皇宫里的花园和走廊是游乐的场所。——第311页。
- 174 指索西萨尔——保尔·德·科克的轻浮小说“拜月者”中的人物；老滑头和酒鬼的典型。——第311页。
- 175 关于“光明之友”，见注16。——第312页。
- 176 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莱比锡版（M .Stirner .《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hum》.Leipzig, 1845）。——第312页。
- 177 从卢格起草的“德国激进改良派竞选宣言”（1848年4月）中借用的话，在这个宣言中，全德国议会的主要任务被宣布为“对事件的合理性加以审查”。——第312页。
- 178 “改革报。民主派的机关报”（《Die Reform.Organ der demokratischen Parte》）是德国一家报纸，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从1848年4月起主编是爱·梅因，由阿·卢格和亨·伯·奥本海姆在莱比锡出版；1848年夏天到五十年代初该报在柏林出版。——第313页。
- 179 “改革报”（《La Réform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党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1843年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1847年10月至1848年1月恩格斯在该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第313页。
- 180 指1848年10月26—30日在柏林举行的第二次民主派代表会议。出席

代表会议的有德国各城市的二百六十个民主派组织和工人组织的代表。但是由于代表的成分复杂,在极重要的问题上引起了争执和分歧。代表会议不是采取实际措施来动员群众同反革命进行斗争,而是限于制定毫无结果的矛盾百出的决议。例如代表会议在10月29日根据卢格的建议而通过的保卫维也纳的呼吁书中,要求德意志各君主邦政府援助革命的维也纳。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对这个呼吁书作了尖锐的批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527—530页)。——第314页。

- 181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ßische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6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宫廷权奸和普鲁士容克地主的喉舌。这个报又名“十字报”(《Kreuz-Zeitung》),因为在它的报头上印有十字。——第314页。
- 182 关于消极抵抗的策略,见本卷第80—84页。——第314页。
- 183 “卡尔斯卢厄日报”(《Karlsruher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日报,1757年创刊,是巴登政府以及1849年布伦坦诺政府的官方报纸——第315页。
- 184 指卢格未加署名发表在1850年12月21日和28日的英国自由派周报“先驱”上的一篇名为“德国民主党”的文章。——第315页。
- 185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1794年在伦敦创刊;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激进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316页。
- 186 阿尔诺德·文克里特是半传说的瑞士战士,反对普鲁士压迫的解放战争的参加者;相传在1386年6月9日,当瑞士人同奥地利公爵列奥波特三世的军队在森帕赫(琉森州)城下作战的时候,他舍身杀敌决定了瑞士人的胜利。——第316页。
- 187 马克思和恩格斯用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中的一个主人公的名字罗多芒特来称呼海因岑,罗多芒特的特点是善于大吹大擂,胡说八道。——第317页。

- 188 指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在德国流行的德国作家约·提·海尔梅斯的说教的和感伤的小说“索菲亚从默麦尔到萨克森的旅行”。——第 317 页。
- 189 阿利曼是古代波斯神安赫腊曼纽的希腊名称,是众恶之神在世上的化身。安赫腊曼纽同众善之神阿胡腊玛士达(希腊名称是奥尔穆兹德)永远处于不调和的敌对地位。——第 319 页。
- 190 引自格林兄弟的童话“端饭的桌子,吐金的驴子和袋子里的小棍子”。小棍子按照主人的命令从袋子里跳出来痛打敌人。——第 319 页。
- 191 比林格斯盖特是伦敦的鱼市场,以粗野的吵骂而恶名昭著,这种吵骂已成为该市场商贩的生活习惯。——第 320 页。
- 192 指海因岑的喜剧“奈贝尔博士,或学问和生活”1841 年科伦版(《Doktor Nebel, oder: Gelehrsamkeit und Leben》.K öln, 1841)。——第 320 页。
- 193 指卡·海因岑“普鲁士的官僚制度”1845 年达姆斯塔德版(K .Heinzen .《Die Preußische Bürokratie》.Darmstadt, 1845),和雅·费奈迭“普鲁士和普鲁士制度”1839 年曼海姆版(J. V enedey .《Preussen und Preussenthum》.M annheim, 1839)。——第 320 页。
- 194 1811 年在德国的法国占领区内实行法国的诉讼程序。莱茵省在 1815 年归并于普鲁士后,仍保存了这个诉讼程序;而法国的诉讼程序在这里逐渐地被普鲁士人所排斥。——第 329 页。
- 195 指卡·海因岑“逮捕令”1845 年施哈尔贝版(K .Heinzen .《Ein Steckbrief》.Schaerbeek, 1845)。——第 320 页。
- 196 “快邮报”(《Schnellpost》)是“关于欧洲形势、德国公众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德意志快邮报”(《Deutsche Schnellpost für Europäische Zustände, öffentliches und sociales Leben Deutschlands》)的简称,是在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的机关报,于 1843—1851 年在纽约出版,半周刊。1848 年和 1851 年该报的主编是卡·海因岑,1851 年阿·卢格也加入了编辑部。该报还有一份附刊“德意志快邮周报”(《W ochenblatt der Deutschen

Schnellpost》)。——第 321 页。

- 197 “曼海姆晚报”(《Mannheimer Abendzeitung》)是德国一家激进派的日报,1842年由卡·格律恩创办,他不久便成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见注 15)。该报于 1848 年底停刊。——第 321 页。
- 198 指 1848 年出版的小册子:卡·海因岑“法国‘和德国的兄弟同盟’”莱茵斐尔顿版(K. Heinzen. 《Frankreichs 《Brüderlicher Bund mit Deutschland》. Rheinfelden)。——第 321 页。
- 199 阿耳契娜是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中的人物;凶恶的女巫。——第 324 页。
- 200 教友派信徒(正式名称是“教友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派,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产生于英国,在北美也流传很广。教友派信徒反对官方教会和它的教义,鼓吹和平主义思想。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产生的主张革新教友派信条的拥护者被称为“湿的”教友派信徒(区别于信奉正统教义的教友派成员——“乾的”教友派信徒)。——第 324 页。
- 201 欧洲中央委员会(全名是欧洲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是根据马志尼的倡议于 1850 年 6 月在伦敦成立的。委员会是个联合各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组织。这个组织在其成员和思想观点方面都极其复杂,因此它并没有存在多久;由于意大利的和法国的民主主义流亡者之间的关系恶化,欧洲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到 1852 年 3 月实际上就已经瓦解了。——第 325 页。
- 202 “流亡者”(《Proscrit》)是欧洲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刊物(月刊)“流亡者,世界共和国的杂志”(《Le Proscrit, journal de la république universelle》)的简称;于 1850 年在巴黎出版。共出两期。参加杂志编辑部的有赖德律—罗兰、马志尼、豪格、埃·阿拉戈、达拉什、德勒克吕兹、沃尔策耳。从 1850 年 10 月底起,改组成周刊“流亡者之声”(《La Voix du Proscrit》),在圣阿曼(法国)出版到 1851 年 9 月。——第 325 页。

- 203 “不来梅每日纪事”(《Bremer Tages-Chronik》)是德国民主派报纸,于1849—1851年出版;1850年3月起,该报主编是鲁·杜朗。——第325页。
- 204 “为巴黎做弥撒是值得的”(《Paris vaut bien une messe》)是亨利四世的话,1593年由于巴黎人答应承认他为国王,条件是他应由新教改宗天主教,这时他便说了这句话。——第326页。
- 205 布隆采尔城下的大战在这里是对1850年11月8日在库尔黑森的起义时期普鲁士先头部队和奥地利先头部队之间的一次小冲突的讽刺称呼;为争夺德国的统治权而交战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彼此争夺干涉库尔黑森内政的权利,目的是镇压起义。奥地利得到了俄国在外交上的支援,普鲁士在这次冲突中不得不作了让步。——第327页。
- 206 约卜西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卡·阿·科尔图姆的极受欢迎的讽刺长诗“约卜西之歌”中的主人公。——第327页。
- 207 马克思和恩格斯借以进行讽刺的这些词句摘自欧洲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告德国人书”(该文刊载在1850年11月的“流亡者之声”杂志上),在摘引时作了改写。——第327页。
- 208 指1850年8月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在美国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起显著作用的人物是美国资产阶级博爱家艾利修·巴里特,英国自由贸易派的领袖科布顿,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日拉丹,德国自由主义者、黑森—达姆斯塔德的前自由派政府首脑尧普,参加代表大会的还有教友会派的代表,以及一个印第安部落的领袖。代表大会上所发表的演说都是伪善的和假仁假义的。——第327页。
- 209 指哈·哈林“关于工人联合会的产生及其陷入共产主义投机事业的历史片断”1852年伦敦版(H.Harring,《Historisches Fragment über die Entstehung der Arbeiter-Vereine und ihren Verfall in Communistische Speculationen》.London, 1852)。——第329页。

- 210 汉巴赫大典于 1832 年 5 月 27 日在巴伐利亚邦普法尔茨地方的一个城堡汉巴赫附近举行,这是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激进派代表组织的一次政治性示威。参加大典的人发言号召全体德国人团结一致,反对德意志各邦君主,为争取资产阶级自由和制宪改革而斗争。——第 330 页。
- 211 指“德意志”(《Deutschland》)(民主派机关报,从 1831 年 12 月到 1832 年 3 月在斯特拉斯堡出版,主编是哈罗·哈林),以及这位作者的下列著作:“各族人民。诗剧。光荣。自由。祖国”1832 年斯特拉斯堡版(《Die Völker. Ein dramatisches Gedicht. Ehre. Freiheit. Vaterland》.Straßburg,) 1832;“血滴。德国诗”1832 年斯特拉斯堡版(《Blutstropfen. Deutsche Gedichte》.Straßburg, 1832);“君主政体,或扫罗王的历史”1832 年斯特拉斯堡版(《Die Monarchie, oder die Geschichte vom König Saul》.Straßburg, 1832);“大人物之声。论德国的统一,德国诗”1832 年斯特拉斯堡版(《Männer-Stimmen. zu Deutschland's Einheit. Deutsche Gedichte》.Straßburg, 1832)。——第 330 页。
- 212 硫黄党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耶拿大学的学生联合会最初的名称,这个联合会由于它的成员捣乱生事而恶名昭著;后来“硫黄党”成了一个普通的用语。——第 332 页。
- 213 指 1834 年资产阶级民主派马志尼组织的革命流亡者的进军。由各种民族的流亡者组成的起义者部队在拉莫里诺的指挥下由瑞士攻入了萨瓦,但是被皮蒙特的军队击溃了。——第 332 页。
- 214 “青年欧洲”是政治流亡者各个革命组织的国际联合会,根据马志尼的倡议于 1834 年在瑞士成立,存在到 1836 年。“青年欧洲”由下列的民族组织组成:“青年意大利”、“青年波兰”、“青年德意志”等等。联合会的宗旨是在欧洲各国建立共和制度。——第 333 页。
- 215 邦迪埃拉兄弟,密谋者组织的成员,于 1844 年 6 月带领着一支不大的意大利爱国者队伍在卡拉布里亚登陆。起义者的目的是要在意大利掀起起义,反对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和奥地利的统治。由于队伍中一个成员

- 的叛变，当局俘虏了远征的参加者，邦迪埃拉兄弟被枪杀了。——第334页。
- 216 指德国奥古斯滕堡王朝的拥护者，该王朝向丹麦国王争夺占有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权利。——第335页。
- 217 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会议，根据俄国的倡议于1850年10月在华沙举行，目的是对普鲁士施加压力，并迫使它放弃把德国统一在自己的保护下的计划。——第339页。
- 218 “祖国报”（《La Patrie》）法国的一家日报，1841年创刊，1850年该报反映联合保皇派、即所谓秩序党的利益，成为他们的选举联盟的机关报。后来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339页。
- 219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是资产阶级的一家日报，1831年在布鲁塞尔创刊；是自由派的机关报。——第339页。
- 220 引自汉泽曼于1847年6月8日在柏林的联合省议会的会议上的演说。——第340页。
- 221 指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后成立的政府工人问题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巴黎的卢森堡宫召开。这个所谓卢森堡委员会是资产阶级为了引诱工人群众放弃革命发动而成立的，它没有资金，也没有任何权力。路易·勃朗领导下的这个委员会的实际活动，是在工人和企业主之间起调停作用。1848年5月15日人民群众发动以后（见注30），政府便撤销了委员会。——第340页。
- 222 1851年2月24日在群众大会（所谓“平等者宴会”）的组织者企图隐瞒布朗基的献词，不使社会舆论得知，但是这篇献词的全文在许多法国报纸上都登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篇献词译成了德文和英文，并加上了按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30—632页）。德译文出版的份数很多，并且流传在德国和英国。——第341页。
- 223 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圣经上的先知耶利米这个名字称呼金克尔。因耶路撒冷的被毁而引起的“耶利米哀歌”在文学中作为悲叹和诉苦的例子（从此得出耶利米哀歌这个用语）。——第343页。

- 224 “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是英国资产阶级的一家日报，1770年到1862年在伦敦出版；是辉格党的机关报，五十年代初是皮尔派的机关报，后来是保守党的机关报。——第344页。
- 225 指1851年12月2日法国路易·波拿巴的政变。——第344页。
- 226 “启示录”是收在新约中的早期基督教著作之一。该书被认为是圣徒约翰所著。“启示录”中关于“世界末日”和“基督再临”的神秘预言，在中世纪异教徒的人民运动中经常被利用。后来“启示录”中的预言被牧师用来吓唬人民群众。——第345页。
- 227 见注93。——第345页。
- 228 见注33。——第346页。
- 229 “纽约国家报”（《New-Yorker Staatszeitung》）是德国民主派的一家日报，1834年出版；后来成为美国民主党的机关报之一。——第350页。
- 230 马克思和恩格斯用锡仑这个名字称呼谢特奈尔。根据希腊神话，锡仑是酒神狄奥尼苏斯的同伴。——第353页。
- 231 歌德“评‘拉摩的侄子’对话中提及的人物和主题”（Goethe. 《Anmerkungen über Personen und Gegenstände, deren in dem Dialog: 《Rameau's Nefte》 erwähnt wird》）。——第354页。
- 232 毕斯托——莎士比亚的一些著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的一生”）中的一个人物；他是个二流子、吹牛家和撒谎者。——第356页。
- 233 见注90。——第358页。
- 234 预备议会是指1848年3月31日至4月4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德国各邦社会人士会议。预备议会的绝大多数代表属于君主立宪派。预备议会作出了召开全德国民议会的决定，并制定了“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要求”的草案，这个草案只是一纸空文，它仅仅在口头上宣布了一些资产阶级自由，但是没有触及当时德国半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第358页。

- 235 马克思和恩格斯用雅努斯这个名字称呼海因岑。雅努斯是古罗马的一个神,它被描绘成具有前后两副面孔;雅努斯的转意是两面派的人。海因岑于1851—1852年在美国出版的一份报纸也叫“雅努斯”(《Janus》),他在该报上攻击马克思。——第359页。
- 236 圣杯——按照中世纪的传说,是一只具有奇异力量的宝杯。——第361页。
- 237 指古希腊的一首诙谐叙事诗“老鼠与青蛙之战”(“巴特拉霍米奥马希亚”),荷马的叙事诗的模拟诗,作者不详。——第361页。
- 238 指维利森在“关于1831年俄波之战中运用的大规模战争的理论”1840年柏林版1—3册(《Theorie des großen Krieges angewendet auf den russisch-polnischen Feldzug von 1831》.In zwei Theilen.Berlin, 1840)这部书中所叙述的观点。维利森的理论所根据的不是军事艺术史的实际材料,而是抽象的哲学原理。——第363页。
- 239 指维利希于1848年11月在伯桑松(法国)组织的由德国流亡者——工人和手工业者组成的一支队伍。队伍的成员从法国政府那里得到津贴,但是在1849年初津贴便停止了。后来该队伍编入了所谓的维利希军团,该军团参加了1849年5—6月的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第365页。
- 240 指阿里欧斯托的诗“疯狂的罗兰”中的第三十四首歌。阿里欧斯托把这首诗当作博雅多的诗“恋爱中的罗兰”的续篇。——第366页。
- 241 这是西塞罗在“论预言”(《De divinatione》)这本书中引用的老卡托的一句话;肠卜者是古罗马的查看祭神牺牲的内藏而卜神意的预言者。——第369页。
- 242 指“匈奴人之战”——德国艺术家考尔巴赫的一幅名画。画中描绘了许多阵亡战士的灵魂的战斗,这场战斗是在战场的上空进行的。——第374页。
- 243 帕威法耳——许多中世纪诗歌的主人公;他是出去寻找圣杯(见注236)

的骑士；树立了许多功勋。帕威法耳成了圣杯的守护者。——第379页。

- 244 马克思本人为“纽约每日论坛报”（见注2）撰稿实际上是从“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这篇文章开始的。在这以前，他寄给该报的文章只是恩格斯写的“德国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本文和“宪章派”一文是一个整篇，最初马克思是用德文写的，写后于1852年8月2日寄给了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由他译成英文。马克思在这以后写的一些文章，也是这样由恩格斯译成英文的，这种做法一直继续到1853年1月底，那时马克思已经精通英文的文学语言，他本人已能用英文写通讯了。在翻译当中，恩格斯有时把长篇文章分为两篇，然后马克思就把它们作为单篇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例如，这一次恩格斯就是把马克思寄来的文章分成了两篇：“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和“宪章派”。

“人民报”在1852年10月以“大不列颠的大选”为标题连续转载了上述文章以及“选举中的舞弊”和“选举的结果”这两篇文章。“人民报”发表“宪章派”一文时，删掉了马克思从这份报纸上引用的某些材料。

“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是宪章派的周报，1852年5月由宪章派的左翼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厄·琼斯在伦敦创办。1852年10月至1856年5月，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为该报撰稿，同时还对该报的编辑工作给以帮助。该报除了转载“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马克思的重要文章以外，还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为该报撰写的一些文章。在这个时期，该报始终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琼斯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接近，曾经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为“人民报”撰稿并使他们和琼斯的关系一度破裂。1858年6月该报转到了资产阶级实业家的手中。——第381页。

- 245 曼彻斯特学派是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的一个派别。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派坚持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得干涉经济生活。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1838年组织反谷物法同盟的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自由贸易派是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则成为自由党的左翼。——第381页。

- 246 高教会派是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它的信仰者多半是贵族，它保持了古老的豪华的仪式，强调与天主教的传统联系。与高教会派相对立的，是英国国教会中的另一派——低教会派，它主要是传播在资产阶级和下层神甫中间，这一派着重宣扬资产阶级基督教的道德。——第381页。
- 247 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是在1846年6月通过的。英国的旨在限制和禁止谷物输入的所谓谷物法，是为了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而实行的。1846年法案的通过，标志着在贸易自由口号下为反对谷物法而斗争的工业资产阶级的胜利。——第382页。
- 248 辉格党——美国政党名，该党主要是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以及同他们相联系的部分种植场主的利益。辉格党存在于1834年至1852年，当时奴隶制问题上的斗争的尖锐化，引起了国内各个政党的分裂和改组。大多数辉格党人同部分民主党和部分反奴隶制度党人（freesoiler）一起于1854年组织了主张反对奴隶制度的共和党。其余的辉格党人则加入保护种植场主—奴隶占有者利益的民主党。——第383页。
- 249 乔·温·库克“政党史，从查理二世时期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成立起到改革法案的通过”1836—1837年伦敦版第1—3卷（G.W. Cooke,《The History of Party, from the Rise of the Whig and Tory Factions, in the Reign of Charles II, to the Passing of the Reform Bill》. Vol. 1—3, London, 1836—1837）。——第383页。
- 250 这里是暗指辉格党领袖约翰·罗素的绰号“顶点约翰”。当罗素在1837年发表了演说之后激进派就给他起了这么一个讽刺性的绰号，因为他在演说中说，1832年的议会改革已经是英国宪制发展的顶点。——第384页。
- 251 英国资产阶级历史著作都把1688年的政变称之为“光荣革命”。在这次政变之后，建立在土地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的妥协的基础上的君主立

宪制在英国得到确立。——第384页。

- 252 指1831年为英国下院所通过、1832年6月为上院最后批准的选举法改革。这次改革旨在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打开了进入议会的大门。为实现改革而斗争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受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欺骗而没有获得选举权。——第385页。
- 253 大法官法庭，或称正义洗院，是英国的最高法院之一，在1873年司法改革后成为最高法院的分院。这个法院由大法官领导，其权限是审理有关继承、契约义务、股份公司等方面的案件。这个法院的权限在许多场合下同其他最高法院的权限分不清。同其他法院所应用的英国普通法相反，大法官法庭的诉讼程序是根据所谓“正义法”进行的。——第389页。
- 254 自由农是英国小土地所有者的一种，这个名称起源于中世纪。——第391页。
- 255 指的是选举改革法案，罗素曾在1852年2月做了预示即将实行该法案的声明；可是法案后来并没有提交议会讨论。关于这个法案，恩格斯在论英国的各篇文章中做了分析（见本卷第237—240页）。——第393页。
- 256 指的是英国议会在1846年发给梅努特（爱尔兰）神学院津贴用以修建新校舍，并为该学院拨发经费的事。这些措施的目的是把爱尔兰的天主教僧侣笼络到英国统治阶级方面来，从而削弱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
非国教徒——在某种程度上不遵奉国教教会信条的各宗教教派的教徒。——第397页。
- 257 三十九信条是1571年由英国议会通过的英国国教会的信条。——第398页。
- 258 见注244。——第399页。
- 259 指1852年6月29—30日一群狂热的英国新教徒在地方当局和警察的纵容下在斯托克波特城（英国柴郡）蹂躏爱尔兰人的暴行。占全城居民

- 三分之一的爱尔兰天主教徒的住房被捣毁,有些爱尔兰人被打死,数十人受伤;而当时警察却把一百多名无辜的爱尔兰人拘禁起来,拘禁的借口是他们参加了骚动。斯托克波尔特事件使英格兰和爱尔兰之间的民族纠纷重新加剧起来。——第400页。
- 260 据希腊神话,库列特在克里特岛上保护了婴儿宙斯(至高无上的天神,相当于古罗马神话中的丘必特)。宙斯的父亲害怕自己的孩子篡夺自己的王位,想把他吃掉,他的母亲女神蕾娅把他藏起来。康列特用矛击盾牌发出的一片响声盖住了新生的宙斯的哭声。——第403页。
- 261 根据英国议会沿用的议事程序,在讨论某些重大问题时,下院可以宣布自己为全院委员会(Committee of the whole House)开会;在这种会议上,执行主席(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s)的职务由下院议长专门指定主席名单上的一个人担任。——第407页。
- 262 航海法令是英国议会在十七世纪后半期(从1651年起)通过的各种保护关税法的名称,其目的在于扶持英国的航海事业;这些法令于1849年被废除。——第408页。
- 263 “集中”是1836年成立的波兰民主协会的领导执行机关,民主协会于1832年在法国成立,是波兰流亡者中左派贵族资产阶级的组织。协会的纲领中规定取消封建义务和等级的不平等,规定将份地无偿地转归农民,以及一系列其他的进步措施。民主协会积极地参加了1846年争取波兰民族解放的克拉科夫起义的准备工作。1849年夏波兰民主协会在法国被禁止活动以后,“集中”便迁至伦敦,但是协会的大部分会员仍旧留在法国。在五十年代,民主协会内部发生了思想上的分裂。1862年,由于波兰建立了准备起义的全国中央委员会,民主协会便决定解散。——第413页。
- 264 1834年通过的济贫法只允许用一种办法去救济贫民,那就是把他们安置到实行监狱苦役制的习艺所,人民把这种习艺所叫作“穷人的巴士底狱”。——第417页。
- 265 马克思摘自1852年9月22日“泰晤士报”。——第420页。

- 266 这里指的是托·图克的著作：“价格史和1793年到1837年的流通状况”1838年伦敦版第1—2卷（《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from 1793 to 1837》.Vol. I — II, London, 1838）、“价格史和1838年、1839年的流通状况”1840年伦敦版（《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in 1838 and 1839》.London, 1840）和“价格史和从1839年到1847年为止的流通状况”1848年伦敦版（《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from 1839 to 1847 inclusive》.London, 1848）。——第422页。
- 267 “劳埃德氏伦敦新闻周刊”（《Lloyd's Weekly London Newspaper》）——英国自由派报纸，1843—1918年以这个名称出版。——第424页。
- 268 “赫尔报”（《The Hull Advertiser》）——英国报纸，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机关报；1799—1867年出版。——第425页。
- 269 见注104。——第426页。
- 270 皇家法院是英国的高等法院之一，1873年改革后成为高等法院的分院。皇家法院审理刑事的和民事的案件，它有权重新审理下级法院的判决。——第426页。
- 271 指的是民事法院，是英国的高等法院之一（1873年改革后成为高等法院的分院），在这里诉讼程序根据英国普通法进行。民事法院的职权范围是，除了其他问题外，还可以审理对资格审查律师就选举人名单所作的决定提出的上诉。根据英国的普通法，上诉法院只审理法律问题，即有关破坏法律的和诉讼程序的准则问题；至于事实问题，即有关案件的实际情况问题，根据普通法，则归陪审员审理。——第427页。
- 272 “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是英国一家具有保守倾向的日报，1780—1869年在伦敦出版。——第433页。
- 273 “卫报”（《The Guardian》）是英国的一家日报，英国教会的机关报；1846年创刊于伦敦。——第433页。

- 274 五港 (Cinque ports) 是英国东南部在中世纪建立起来的几个沿海城市的联合组织, 由最初加入这个组织的港口的数目而得名。这个联合组织享有海洋贸易和捕鱼方面的种种特权, 同时它也担负给国王提供战船和军事装备的义务。五港总督在中世纪时曾经握有广泛的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 但随着常备的皇家海军的建立, 五港总督已逐步变成了英国君主政体中的一个领高薪的闲差事之一。——第434页。
- 275 “晨邮报” (《The Morning Post》) 是英国的一家保守派报纸; 1772—1937年在伦敦出版。——第435页。
- 276 “地球报” (《The Globe》) 是英国一家日报“地球和旅行家” (《The Globe and Traveller》) 的简称, 1803年在伦敦出版, 辉格党机关报, 在该党执政的时期是政府的官方报纸; 1866年起成为保守党的机关报。——第436页。
- 277 奈斯托尔——根据希腊神话, 奈斯托尔是参加特洛伊之战的希腊英雄中的一个最老最贤明的英雄; 在文学传统中, 他经常被当作饱经世故的聪明的长者的典型。——第437页。
- 278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438页。
- 279 见注107。——第440页。
- 280 这里指的是1840年7月成立的宪章派全国协会的执行委员会。这个协会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 在宪章运动高涨的年代它的成员曾达到四万名。在协会的活动中表现出它的成员之间缺乏思想上和策略上的统一, 也表现出宪章运动的大多数领导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1848年宪章运动失败后, 这个协会也随之蹶不振, 到五十年代完全停止了自己的活动。——第442页。
- 281 见注85。——第446页。
- 282 见注117。——第446页。
- 283 “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后来, 这篇文章被收集在经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整理并于

1896年出版的单行本“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论文集里，以代替恩格斯答应过但未见报的这个文集的最后一篇文章。——第449页。

- 284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曾经进行了巨大的工作。为此，1846年年初，他们在布鲁塞尔组织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反对魏特林的粗俗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对正义者同盟（即工人和手工业者的阴谋组织，德国、法国、瑞士和英国都有它的支部）的成员特别有影响的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的顽强斗争中，捍卫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在伦敦的正义者同盟领导机构深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于1847年1月底建议他们加入同盟，参加同盟的改组工作并根据他们所宣布的原则草拟同盟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同意这样做。

1847年6月初，在伦敦召开了正义者同盟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载入史册。恩格斯和威·沃尔弗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大会决定把组织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用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性的国际主义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模糊不清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大会还审查了恩格斯积极参加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新的盟章明确规定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删除了某些使组织带有阴谋性质的条款；民主原则成为同盟组织的基础。最后，这个章程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批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72—577页）。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在伦敦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他们在许多天的论战中捍卫了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大会委托起草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即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到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

会的所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中央委员会组织了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于1848年4月初返抵德国，他们坚信，由于德国落后、德国工人四分五裂和政治觉悟不高等情况，分散在全民各地的两三百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难以对广大人民群众产生显著的影响。鉴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参加民主运动的极左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侧翼。他们加入了科伦的民主协会并介绍他们的拥护者参加民主派组织，以便在那里坚守革命无产阶级的立场，批判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推动他们采取坚决的行动。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示他们的拥护者注意组织工人协会，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为组织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创造条件。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见注34）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领导中心。1848年年底，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试图恢复中断的联系，派约瑟夫·莫尔作为特派员去德国整顿同盟组织。伦敦中央委员会曾修改了1847年的盟章，削弱了这个文件的原则意义。譬如，不提推翻资产阶级、确立无产阶级的统治和建立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宣布同盟的宗旨是建立社会共和国。1848到1849年的冬天莫尔在德国的使命并没有完成。

1849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退出了民主协会。工人群众已经有了政治经验，他们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大失所望，这一切使当时已经有可能在实践中提出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能够实现这一计划。不久德国西南部爆发了起义。这次起义的失败成为德国革命的终结。

革命的进程表明，“共产党宣言”中所阐明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同盟是革命活动的一所很好的学校：它的成员坚决果断地参加了各地的运动，他们在报刊、街垒和战场上坚守着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阵地。

革命的失败沉重地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的许多盟员不是被关进监狱，就是逃亡国外，地址丢失了，联系中断了，各地支部的活动停顿了。德国国外的同盟组织也遭到了巨大的损失。

1849年秋天，同盟的多数领导人聚集于伦敦。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领导的经过改组的新中央委员会的努力，到1850年春天，以前的组织已经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也日益活跃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3月所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中，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并提出了建立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告同盟书”中第一次阐明了不断革命的思想。1850年3月，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新机关刊物“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

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提出的宗派主义的冒险策略，它无视客观规律和欧洲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与此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强调，在反动派进攻的情况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宣传科学共产主义和为未来的革命战斗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1850年9月中旬，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与该集团的分裂。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见本卷第635—641页）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把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移交给科伦支部委员会。德国各地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一致拥护伦敦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决定。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科伦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于1850年12月起草了新的盟章（马克思加了标记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页）。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第450页。

285 根据1852年11月12日科伦陪审法庭的判决，被告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亨·毕尔格尔斯、彼·诺特荣克和彼·勒泽尔三人被判处六年徒刑，海·贝克尔、卡·奥托和威·赖夫三人被判处五年徒刑，弗·列斯纳被判处三年徒刑。罗·丹尼尔斯、约·克莱因、约·埃尔哈特和阿·雅科比四人被宣判无罪。罗·丹尼尔斯因在监狱中得了肺病，获释后过了几年就死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被告斐·弗莱里格拉特为躲避逮捕和审判而逃亡伦敦。——第456页。

- 286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一著作是马克思痛斥普鲁士警察国家用来对付共产主义运动的种种无耻手段的一个战斗性的小册子。1852年10月底，当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审判还在科伦进行的时候，马克思就已经着手写这一著作。虽然条件极其艰难——马克思和他的家庭极端贫困，但马克思仍然在12月初写完了这一著作。12月6日，手稿寄给了瑞士的出版商小沙贝利茨。另一份手稿在第二天寄给了在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阿·克路斯，以便在那里出版。1853年1月，小册子在瑞士的巴塞尔出版，但是，3月间在巴登边境的一个小村子威尔几乎全部（发行数是二千册）被警察没收。在美国，这一著作最初在波士顿的民主报纸“新英格兰报”上陆续发表，到1853年4月底，该报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波士顿出版的小册子也没有能够在德国流传。这本书只是在1875年在德国再版以后才在那里得到流传。这一版和1853年匿名出版的版本不同，它标上了作者的名字。马克思给这一版写了一个专门的结束语：马克思于1860年写的小册子“福格特先生”的第四篇附录（“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不加标题补充到这本书里面。1885年，这本书经过恩格斯的编辑出了第三版，恩格斯还写了一篇引言“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和前几版不同的是，恩格斯把1850年3月和6月写成的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第359—366页）加进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一个俄译本是在1906年出版的。——第457页。

- 287 马克思指的是在1850年3月和6月发表的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第359—366页）。从起诉书可以看出，在诺特荣克被捕时落入警察手里的，还

有下面两个在审判时当作罪证的文件：1850年9月同盟分裂后在科伦的中央委员会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草拟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页）和1850年12月1日科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宣言。——第461页。

- 288 Code pénal 是1811年在法国以及被法国人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实施的刑法典；在1815年莱茵省归并普鲁士以后，它在该省和民法典同时有效。——第463页。
- 289 宗得崩德原来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瑞士的反动天主教诸州的单独联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一名称来讽刺1850年9月15日以后脱离共产主义者同盟并成立了独立的组织和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活动使普鲁士警察当局易于破获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德国地下支部，而且帮助制造了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著名活动家的1852年的科伦案件。——第464页。
- 290 见注201。——第464页。
- 291 凡迪门岛是欧洲人对塔斯马尼亚岛的最初的称呼，在1853年以前一直是英国苦役犯的流放地。——第469页。
- 292 指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在1840年2月成立的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着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和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84页）。从五十年代未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这个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在二十世纪，许多俄国政治流亡者曾访问过这个协会。——第470页。
- 293 关于马克思及其拥护者退出流亡者委员会一事，见注118。——第471页。

- 294 关于金条彩票的事,见本卷第181—183页。——第472页。
- 295 见注284。——第479页。
- 296 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这一小册子、它的附录以及“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1875年版的跋中,引用了补充的真实材料,揭露舍尔瓦尔是个密探和奸细。根据这些材料,舍尔瓦尔是普鲁士驻巴黎公使的间谍,同时也是法国的密探;他的越狱潜逃是在法国和普鲁士警察当局的同意之下进行的。他1852年5月到达伦敦时被接受加入沙佩尔所领导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但是,由于他在所谓德法密谋(见注117)的案件中的奸细作用被人揭发,不久便被清除出协会。——第485页。
- 297 指警官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合著的一本书:“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853年柏林版第1册、1854年柏林版第2册(《Die Communisten-Verschwörun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Berlin, Erster Theil 1853, Zweiter Theil 1854)。该书的第一册叙述了工人运动的“历史”(它是警察的指南),在它的附录中转载了若干落到警察手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第二册的全文是一份同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有联系的人的“黑名单”以及他们的履历表。——第486页。
- 298 引自海涅的诗“我从残暴的女神那里逃脱”。——第486页。
- 299 见注150。——第487页。
- 300 摩门教徒是1830年在美国成立的宗教教派的成员。该派的创始人约瑟夫·斯密特(1805—1844)由于得到所谓的神的启示而写了一本“摩门经”。在这本充满荒诞无稽的臆想的书里,以先知摩门的名义讲述了仿佛古代曾经发生过以色列部落向美洲迁移的故事。——第489页。
- 301 路德在一次“席间演说”中曾把世界比作骑不稳马的醉熏熏的农夫。——第491页。
- 302 马扎斯是巴黎的监狱。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因所谓德法密谋案(见注117)而被监禁的人们所提供的口供。——第492页。

- 303 指在马克思支持下1852年1月在伦敦成立的工人协会,该协会的主席是汉诺威的流亡者施泰翰。加入该协会的是脱离了受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影响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工人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密友、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工人罗赫纳也曾积极参加协会的筹建工作。后来,该协会的许多成员,其中包括施泰翰本人在内,都受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影响,都归附于先前的组织了。——第496页。
- 304 在马克思的手稿中,保存下来一份马克思亲笔写的、但不是他签字的寄给施梯伯的一封信草稿。信中对这个警探进行了尖锐的驳斥。看来,这封信是在寄给施梯伯之前由“新莱茵报”编辑部的某个人签字的,很可能是由威·沃尔弗签字的,因为他可能了解施梯伯在西里西亚的活动。——第507页。
- 305 玛丽花是欧仁·苏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中的女主人公,她是一个在罪犯当中长大、但依然保持着高尚人格和心地纯洁的姑娘;作者给她冠上了一个虽生长于污泥之中而仍然保持着夺目的白色花瓣的百合花花名。——第515页。
- 306 恩格斯指“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一著作的1875年版和1885年版上所加的第一个补遗。在这个补遗里重刊了马克思写的“福格特先生”一书的第四篇附录(“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但没有加标题。附录中指出,科伦案件发生后不久,弗略里便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了几年苦役。——第515页。
- 307 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一著作的1875年德文版的跋中指出,“红色问答书”的作者原来并不是赫斯,而是一个姓列维的人。后来查明,马克思当时是弄错了。马克思当时所不知道的种种文件,特别是赫斯本人在1850年7月21日写给魏德迈的信件,都证明了“红色问答书”还是出于赫斯之手。——第525页。
- 308 见注165。——第529页。
- 309 这里指的是罗·施泰因的著作“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842年莱比锡版(L. Stein. 《Der Socialismus und Communismus des heuti-

- gen Frankreichs》.Leipzig, 1842)。——第533页。
- 310 席勒的短诗“天之骄子”(《Die Sonntagskinder》)中的一句的改写。——第533页。
- 311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的书斋”)。——第534页。
- 312 暗示普鲁士1806年10月14日在耶拿城下遭到的失败;由于这次失败,普鲁士向拿破仑法国屈膝投降,这证明霍亨索伦封建君主政体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全部腐朽性。——第536页。
- 313 指谷物法的废除(见注247)。——第537页。
- 314 马克思把贝雷斯福德讽喻为希腊神话特洛伊战争中最勇敢的英雄阿基里斯。——第547页。
- 315 据宗教关于“千年王国”的教义,在“世界的末日”到来之前,绝对的正义将在大地上确立。——第553页。
- 316 七月革命后,英法之间建立了名为“诚意协商”(《entente cordiale》)的同盟关系,这种同盟关系到1834年4月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的签订所谓四国同盟时才完成了正式的条约手续。但是,在签订这个条约的时候,英法利益的矛盾就已经暴露出来了,这种矛盾后来使英法之间的关系尖锐化。这个条约在形式上是反对专制政体的“北方列强”(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实际上它使英国得以在对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提供军事援助以对付葡萄牙的王位追求者唐·米格尔和西班牙的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的借口下,加强自己在这两国中的地位。——第555页。
- 317 格费尔是伦敦的一个区,许多英国贵族的私邸都在这里。——第556页。
- 318 马克思指的是在曼彻斯特出版的英国自由派报纸“观察家时报”(《Examiner and Times》)。它是在1848年由“曼彻斯特时报”和“曼彻斯特观察家”两报合并而成的。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支持自由贸易派;该报曾用各种不同的名称出版到1894年。——第556页。

- 319 “自由人报”（《The Freeman's Journal》）——爱尔兰日报，于1763—1924年在都柏林出版；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支持取消同英国合并的要求，维护爱尔兰租佃者的权利。——第557页。
- 320 皮由兹教派是十九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英国国教会中的一个流派。以它的创始人之一皮由兹的名字得名。皮由兹是牛津大学的一个神学家，他号召在英国国教内恢复天主教仪式及天主教的某些教理。皮由兹教派是英国贵族反对工业资产阶级的斗争在宗教上的反映，当时英国贵族力图保持自己在国内的影响，抵制大部分属于各个新教教派的工业资产阶级。——第558页。
- 321 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五章中批判了威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第558页。
- 322 指罗素“乌得勒支和约以来欧洲事务札记”1824—1829年伦敦版第1—2卷（《Memoirs of the Affairs of Europe from the Peace of Utrecht》, Vol. 1—2, London, 1824—1829）一书和他的1822年出版的悲剧“唐·卡洛斯”。——第559页。
- 323 “腐朽的市镇”是英国十八至十九世纪对一些居民稀少或根本无人居住的小市镇和乡村的称呼，这些市镇和乡村，从中世纪时起享有选举代表到议会中去的权利。“腐朽的市镇”的代表，实际上是由支配着当地居民的大土地贵族指派的。“腐朽的市镇”的这种特权被1832、1867和1884年的改革所取消。——第559页。
- 324 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是1850年8月由一些爱尔兰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创立的。同盟的目的是废除阻碍爱尔兰资本主义发展的、对爱尔兰农民的半封建的和殖民主义的剥削方式。尽管这个同盟的领导过于温和，但它还是反映了为反对大地主和土地投机者而斗争的爱尔兰租佃者的利益。同盟的纲领归结起来就是要求禁止大地主任意废除佃约，在停止租佃时赔偿租佃者在改良土壤方面的开支，确定公平合理的租金，确认租佃者有通过自由买卖转让租佃的权利。在1852年的议会大选期间，同盟的宣传起了很大的作用。同盟的要求得到了爱尔兰广大租佃者（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包括在内）的拥护。在1853年1月的改选中，同盟宣传反对

那些奉行妥协政策而成为政府成员的爱尔兰议员。害怕国内民主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爱尔兰大地主天主教和新教的高级僧侣联合起来对付同盟。不久同盟就解散了。——第560页。

- 325 明辛街——伦敦一条街，是殖民地商品批发交易的中心地。——第562页。
- 326 本文中引用的关于萨特伦德家族剥夺农村居民土地的材料，以后被马克思运用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中。——第569页。
- 327 奥伦治派协会是大地主和新教僧侣为对付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于1795年建立的反动恐怖组织。这个组织经常指使新教徒迫害爱尔兰天主教徒。它在新教徒居住的北爱尔兰势力最大。在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进行宣传时期（见注324），在爱尔兰，违背着大地主和天主教及新教的高级僧侣的意志，建立了奥伦治派新教僧侣和天主教徒的一般联合组织。——第569页。
- 328 见注246。——第569页。
- 329 古迪布腊斯是英国诗人巴特勒的同名讽刺长诗中的主人公，他的特点是喜好无意义的谈论和争辩，并善于用不切实际的一般性论断证明最荒谬的论点。巴特勒的长诗写于1663—1678年，它的用意是揭露英国资产阶级的虚假道德和宗教上的伪善行为。——第569页。
- 330 指1688年的政变（见注251）。这次政变驱逐了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二世，宣布尼德兰总督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为英王。——第571页。
- 331 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两卷集1767年伦敦版第1卷第104页（J.Steuart.《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economy》. In two volumes.Vol.I, London, 1767, p.104）。——第573页。
- 332 詹·洛克“关于斯泰福和塞洛普省斯泰福侯爵夫人领地和萨特伦德领地的改良情况的报告”1820年伦敦版（J.Loch.《An Account of the Improvements on the Estates of the Marquess of Stafford, in the Counties of Stafford and Salop and on the Estate of Sutherland》. London,

- 1820)。——第573页。
- 333 马克思引自让·沙·列·西藏·德·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1837年巴黎版第1卷第230—231、237页(J.—C.—L.Simonde de Sismondi.《Etudes sur l' économie politique》. T. I, Paris 1837, pp. 230— 231、237)。——第574页。
- 334 约·达尔林普尔“大不列颠封建所有制通史概论”1759年伦敦版(J.Dalrymple.《An Essay towards a General History of Feudal Property in Great Britain》.London, 1759)。——第575页。
- 335 罗·萨默斯“苏格兰高地的来信;或1847年的饥荒”1848年伦敦—爱丁堡—格拉斯哥版第27页(R.Somers.《Letters from the Highlands; or, the Famine of 1847》.London—Edinburgh—Glasgow, 1848, p. 27)。——第576页。
- 336 本文是马克思用英文写的第一篇论文(见注244)。——第577页。
- 337 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821年柏林版(G.W.F.Hegel.《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Berlin, 1821)。——第579页。
- 338 阿·凯特勒“论人和人的能力之发展,或社会物理学的经验”1835年巴黎版第1—2卷(A.Quetelet.《Sur l' homme et le développement de ses facultés, ou Essai de physique sociale》.Tomes I— II, Paris, 1835), 马克思曾引用的是本书的英译本(1842年爱丁堡版)。——第579页。
- 339 理·科布顿“1793年和1853年,三封信”1853年曼彻斯特版(R.Cobden.《1793 and 1853. In three letters》.Manchester, 1853)。——第580页。
- 340 指在萨托里阅兵的路易·波拿巴(见本卷第176页)。——第581页。
- 341 指1853年1月底和平协会(见注104)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国际和平大会。

- 自由贸易派在大会上表现得十分活跃，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反对在英国进行的反法战争宣传和反对扩充军备的决议；然而这些决议没有起什么实际作用。——第582页。
- 342 见注255。——第582页。
- 343 暗指阿伯丁联合政府成员的老迈的年龄。玛土撒拉是圣经故事中的大主教，传说他活到九百六十九岁。成语“玛土撒拉之年”是长寿的同义语。——第583页。
- 344 阿姆洛·德·拉·乌赛“威尼斯政府的历史”1676年巴黎版第48页 (A melot de la Houssaie. 《Histoire du G ouvernement de V enise》. Paris, 1676, p. 48)。——第586页。
- 345 马克思在1853年6月写的“印度问题。——爱尔兰租佃权”一文中实现了他的这个意图。——第587页。
- 346 指的是爱尔兰激进主义者舍尔曼·克罗弗德1835年第一次向下院提出的法案。这个法案规定由于在土地上进行改良而废除原来合同时给租佃者以赔偿，1836年法案被下院否决。后来，该法案又曾数次被重新提出讨论（1847、1852和1856年），但是每一次都被下院否决。——第587页。
- 347 合并取消派（来自 Repeal of Union，即取消合并），主张废除1801年英国同爱尔兰的合并。英国政府在镇压了1798年爱尔兰起义以后加强给爱尔兰的这个合并，彻底消灭了爱尔兰的自治权，取消了爱尔兰议会。废除这个合并的要求，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在爱尔兰成为最普遍的口号。但是领导民族运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奥康奈尔等人）把鼓吹废除合并的宣传运动仅仅看成是争取使英国政府对爱尔兰资产阶级作某些小的让步的手段。1835年，奥康奈尔同英国辉格党达成了妥协，完全停止了宣传运动。但是在群众运动的推动下，爱尔兰自由派不得不在1840年建立了合并取消派协会，并力图把它引上同英国统治阶级妥协的道路。——第589页。
- 348 见注59。——第593页。

- 349 “民族报.民主社会党机关报”(《La Nation, organe quotidien démocrate socialiste》)是比利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1848—1856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第594页。
- 350 见注255。——第596页。
- 351 见注250。——第596页。
- 352 指保护农业和不列颠工业协会,该会最初的名称是保护农业协会。它是在1845年为同自由贸易派作斗争而建立的。该协会代表大地主的利益,反对废除谷物法(见注247)。——第598页。
- 353 克罗地亚兵——是奥地利军队中的装备轻武器的军队,主要是从克罗地亚人和某些其他斯拉夫人以及匈牙利人中募集来的。——第600页。
- 354 根据英国议会的传统,上院院长(Lord-Councilor)的座位用一个羊毛口袋作为座垫,它曾经是英国国民财富的主要来源的象征。——第603页。
- 355 规章法是英国的以议会法令——规章为根据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第604页。
- 356 指英国和法国在百年战争(1337—1453)时期中的两次大会战。1358年在普瓦提埃和1415年在阿津库尔,英国步兵打败了法国骑兵。——第604页。
- 357 1839年土耳其和埃及因叙利亚问题又起冲突(叙利亚1833年被埃及军队强占)。法国对埃及帕沙(总督)穆罕默德—阿利的支持使这个时期英法在近东的关系恶化。英国为了竭力不让法国的影响在这个位子通向它的亚洲殖民地的要冲的重要地区得到加强,给土耳其以军事援助来反对埃及,并且在俄国、奥地利和土耳其的支持下对法国施加外交压力,迫使法国放弃对埃及的援助。
- 1844年由于英国代办3月间被从塔希提岛驱逐(塔希提岛在此不久以前被宣布为法国保护国),英法关系又告紧张。塔希提岛事件是英国和法国在太平洋区域的殖民竞争加剧的结果。——第605页。
- 358 法国和瑞士的冲突发生于1851年12月—1852年1月,它是由于路易·波

拿巴要求瑞士把法国的共和党人流亡者驱逐出瑞士国境而引起的。

在1845—1849年期间,英国和法国对阿根廷施加压力,要求开放巴拉那河和巴拉圭河,让英法商船通过。由于沿海遭到英法海军的长期封锁,阿根廷最后被迫让步,于1852年签订了开放上述河流让外国船只通行的条约。

纽沙特尔(诺恩堡的德国叫法)是瑞士的一个州,同时又隶属于普鲁士。由于1848年的2月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纽沙特尔宣布脱离普鲁士而成为独立的共和国。欧洲列强(其中包括英国和法国)的外交干涉阻止了普鲁士采取武力。一直到1857年普鲁士才最后放弃对纽沙特尔的要求。

1852年,英国和法国由于害怕美国强占隶属于西班牙的岛屿古巴,建议同美国政府签订关于不侵入古巴的三边协定。由于美国的拒绝,协定没有签订。

1851年土耳其借口向埃及推行坦吉马特政策(坦吉马特政策是1839年起在土耳其实行的一种改革政策,其目的是通过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妥协来巩固君主政体),要求埃及统治者实行一系列“改革”,实行这些“改革”就会使这个国家重新归属于土耳其。由于英国和法国施加压力,埃及被迫部分地接受了土耳其的要求。

1852年11月,英国、法国、俄国、巴伐利亚和希腊在伦敦签订了一个议定书,根据这个议定书,指定没有子女的希腊国王奥托的弟弟巴伐利亚的阿德尔贝特代替巴伐利亚王室的另一个拒绝接受正教的亲王为王位的继承人。

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英国和法国一直阻碍突尼斯的独立,干涉它的对外政策并支持土耳其统治突尼斯的野心。——第607页。

- 359 潘多拉的盒子是装满罪恶和纠纷的盒子。这是一个文学典故,源出于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故事。潘多拉由于好奇打开了关着各种各样祸害的盒子,把这些祸害散布出来。——第608页。
- 360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对本文的标题作了修改。“纽约每日论

坛报”发表这篇文章时使用了一个与内容不符的标题：“议会辩论。——反对社会主义的僧侣。——饿死”。——第609页。

- 361 见注256。——第609页。
- 362 非国教徒 (dissident), 见注256。——第614页。
- 363 在“人民报”上, 本文中题名为“强迫移民”的部分是单独作为一篇发表的; 其余四部分即用“美国报刊和欧洲的运动”这个总标题发表。——第616页。
- 364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租税的原理” (D. Ricardo.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第一版于1817年在伦敦出版。——第617页。
- 365 让·沙·列·西蒙·德·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1819年巴黎版第1—2卷 (J. - C. - L. Simonde de Sismondi. 《Nouveaux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De la richess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population》. Tomes I - II, Paris, 1819)。——第617页。
- 366 指柏拉图的对话集“理想国”, 其中描写一个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理想国家; 柏拉图认为, 应该把诗人从这个国家中驱逐出去, 因为他们一点用处也没有。——第619页。
- 367 马克思所提到的这篇文章没有登载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我们也没有得到该文的手稿。——第621页。
- 368 指贝·瑟美列“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匈牙利解放战争中的活动家的政治概述”1853年汉堡版 (B. Szemere. 《Graf Ludwig Batthyány, Arthur Görgei, Ludwig Kossuth. Politische Charakterskizzen aus dem Ungarischen Freiheitskriege》. Hamburg, 1853)。——第621页。
- 369 指1770年普鲁士的亨利希在访问彼得堡时所作的关于瓜分波兰的建议。——第622页。
- 370 见注6。——第622页。
- 371 见注341。——第622页。

- 372 指1851年12月到1852年11月间英国记者理查兹用笔名“一个英国人”发表在“泰晤士报”上的文章。——第623页。
- 373 本文的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624页。
- 374 马克思所引的事实大约在马克思提到的1853年3月1日写的那篇文章中引用过,这篇文章我们没有找到(见注367)。——第624页。
- 375 见注4。——第627页。
- 376 1848年的外侨管理法是英国议会由于大陆上的革命事件和4月10日宪章派的游行示威而通过的。根据这个法令,政府任何时候都可以下令把外国人驱逐出英国。该法令的有效期定为一年。——第628页。
- 377 但丁“神曲”天堂篇第十七首歌。——第628页。
- 378 印刷所广场是伦敦的一个广场,“泰晤士报”的总社设在该处。——第630页。
- 379 “文艺论坛”(《Athenaeum》)是英国的一家文艺评论周刊“文艺论坛,文学、科学和艺术问题杂志”(《The Athenaeum Journal of Literature, Science and the Fine Arts》)的简称;1828—1921年在伦敦出版。
“建筑师”(《The Builder》)是英国一家建筑学问题周刊,1842年起在伦敦出版。
“笨拙”(《Punch》)是英国一家具有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笨拙,或伦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的简称,1841年起在伦敦出版。
“赛马新闻”(《Racing Times》)是英国一家运动周刊,1851年起在伦敦出版。——第630页。
- 380 希腊正教会和罗马教会之间由于争夺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圣地而引起了纠纷,这个老纠纷在1850年又因路易·波拿巴的发动而重新燃起,后者的目的是要加强法国在近东的阵地。关于圣地的纠纷发展成了外交上的大冲突,成了克里木战争的起因之一。——第630页。

- 381 在这次发表的1850年9月15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的记录当中,从前仅知道马克思在他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本卷第465—466页)一文中引证的摘录。此外,从1850年12月1日科伦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也知道了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15页)。这个记录最初全文发表在“社会历史国际评论”1956年第1卷第2部分(《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olume 1, part 2, 1956)上。为这次发表而写的序言中说道,这个记录全文是按不知姓名的人所摄制的副本刊印的,而与恩格斯写的记录底稿有出入的地方在脚注中注明。

但是,经过对社会历史国际研究院(阿姆斯特丹)提供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两个上述文件的摄影副本的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们断定,两个文件都只是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的副本。这两个副本之中的一个是出自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被中央委员会派到科伦去传达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的海·威·豪普特的手笔。第二个副本是谁摄制的,迄今还不能肯定。

本卷发表的记录全文是按照豪普特写的副本刊印的,记录的两个不同手稿副本之间的重要出入均在脚注中注明。——第635页。

- 382 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292)。——第635页。
- 383 指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协会(见注118)。——第636页。
- 384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72—577页)是1847年12月在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1848年下半年,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对盟章作了修改,从而削弱了这个文件的原则性。在新盟章的第一段,提出了建立社会共和国的含糊的要求来代替关于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明确规定——推翻资产阶级,确立无产阶级的统治和建立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莫尔在他1848—1849年冬天去德国时曾在德国各个支部当中广泛传达了 this 盟章。1849年3月,盟章全文在黑特采尔领导的柏林的一个支部的成员被捕时落入警察当局的手中,并在1850年8月审讯黑特采尔小组时作为一个证据。1850年12月,科伦中央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指示起草了新的盟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页)。——第636页。

- 385 指1850年3月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和“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和第4卷第461—504页)。——第636页。
- 386 山岳党是1848—1851年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的一派,它代表以赖德律—洛兰为首的结合在“改革报”周围的一群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主义者的政党;以路易·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们参加了这个党。——第633页。
- 387 指路易·勃朗作为“工人的代表”参加1848年2—5月间的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一事。以路易·勃朗为首的政府工人问题委员会的活动没有任何实际结果,同时路易·勃朗的妥协政策使一部分工人离开了革命斗争。——第639页。
- 388 指1789—1794年的巴黎公社。公社在形式上只是城市的自治机关,而实际上它从1792年起领导了巴黎群众为实施坚决的革命措施而进行的斗争。公社在推翻君主政体,在确立雅各宾专政、执行限价的政策、通过旨在镇压反革命的嫌疑犯处治法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在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的反革命政变后,公社组织被消灭。——第639页。
- 389 本篇和下一篇文章包括马克思以科伦共产党人被判罪者救济委员会的名义写的致在美国的德国工人的呼吁书。马克思把呼吁书寄给阿道夫·克路斯在德国和美国的报纸上发表。马克思在1852年12月7日给克路斯的信中指出,援助行动应当成为党的团结一致的表现。并建议在美国各地成立科伦被判罪者及其家属救济委员会。——第642页。
- 390 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是德国民主流亡者在美国的组织之一。该联合会于1850年10月5日在费拉得尔菲亚德国体操协会代表大会上成立。联合会联合了全国各个城市的数十个协会;在其成立初期同美国的德国工人运动保持联系,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魏德迈曾为该联合会的机关报“体操报”(《Turnzeitung》,1851—1861年出版)撰稿。在美国内战年代里,该联合会积极参加了反对奴隶主各州的斗争。1865年这个组织改称为北美体操联合会。——第645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1851年8月—1853年3月)

1 8 5 1

8月—11月

在欧洲反动势力猖獗和警察迫害加强的情况下，在伦敦的马克思和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竭尽全力保护未来无产阶级组织的基础——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核心，从思想上锻炼和教育无产阶级革命干部。

马克思认为探讨经济学说对于用经济发展规律的知识武装工人阶级具有巨大的意义，所以他继续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整天都在英国博物馆图书馆里研究土地所有制的历史、殖民问题、人口问题、信贷问题、银行体系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他从萨默斯、劳顿、威克菲尔德、普莱斯科特、霍吉斯金、凯特勒、唐森、马尔萨斯、休谟、格雷、达布耳德、威·巴·艾利生、阿·艾利生、哈德卡斯耳、普莱斯、孚赫、麦克库洛赫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中作了许多摘录，并作了评注。同时，马克思还研究农艺学和农业化学问题，为此他阅读了李比希和约翰斯顿的著作。

考虑到军事知识对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未来的革命战争的巨大意义，恩格斯继续研究军事史和军事理论。

8月上半月

马克思读了比·约·蒲鲁东的新著“十九世纪革命总论”，认为这是一本直接反对共产主义的论战性的著作。他打算在报刊上对这本书加以批判。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详细地转叙了蒲鲁东这部著作的内容，

并请恩格斯对这本书发表自己的意见。

- 8月2日前后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他在曼彻斯特经常受到警察的监视,他请马克思把党的文件放在安全的地方。
- 8月8日前后 马克思收到资产阶级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查理·德纳邀请他为该报撰稿的建议。马克思欣然接受了德纳的建议,他想利用给这个报纸写稿的机会影响社会舆论,从工人阶级立场上阐明一些最重要的问题。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共有十年以上。马克思是该报的正式撰稿人,但是,因为马克思忙于经济学说的研究工作,所以大部分的文章是马克思请恩格斯执笔的。
- 8月8日和14日 马克思请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一组关于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文章。
- 8月下半月—10月 恩格斯读了比·约·蒲鲁东的著作“十九世纪革命总论”,并写了一篇评论,揭露蒲鲁东的改良主义观点和无政府主义观点。恩格斯把这篇文章的手稿寄给马克思。马克思决定把它作为他准备写的一部反对蒲鲁东的著作的基础。
- 8月18以后 马克思收到了在科伦的一个通讯人贝尔姆巴赫的来信,信中报告了1851年5月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著名活动家案件的审讯的情况。
- 1851年8月21日—1852年9月24日 恩格斯撰写“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这些文章由马克思署名连续发表在1851年10月25日至1852年10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这些文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剖析了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提、性质和动力。
- 8月底 马克思收到琼斯的信,琼斯在信中告诉马克思说,在他主编的宪章派杂志“寄语人民”第16期上转载了

- 马克思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论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的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为该杂志撰稿，帮助琼斯写了一些文章，并在杂志的总的编辑工作方面协助他。马克思和恩格斯力求通过宪章派的刊物给英国无产阶级以思想影响，并支持琼斯和他的拥护者在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恢复宪章运动。他们赞同琼斯反对哈尼的言论，后者在宪章运动处于低潮时受了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影响，脱离了无产阶级的立场。
- 9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报纸上得知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成员在巴黎被捕的消息和所谓的德法密谋案开始审讯的消息。
- 9月11日 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中批评了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马志尼的政纲和策略，指出马志尼不了解从农民的利益出发解决土地问题对于胜利地进行意大利民族解放斗争的意义。
- 9月23日和26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读了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泰霍夫的宣言“未来战争概论”之后，在通信中对这个宣言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
- 9月底—10月 马克思为了研究机器生产对工人劳动的影响问题，阅读有关技术史方面的著作，从波佩、贝克曼和尤尔的著作中作了许多札记。
- 10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引诱工人阶级脱离革命运动的真正任务的企图，他们密切注视金克尔的活动，因为金克尔企图在美国进行“德美革命贷款”的冒险主义活动。马克思给在华盛顿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阿·克路斯许多关于同金克尔作斗争的指示。
- 1851年10月—
1852年 恩格斯继续研究俄语和其他斯拉夫语，并且研究各斯拉夫民族的历史和文学。他阅读了包林的“俄罗斯

诗文集”，并从这本书中作了许多关于罗蒙诺索夫、捷尔沙文、苏马罗科夫、波格丹诺维奇、赫拉斯科夫、卡拉姆津、茹柯夫斯基、克雷洛夫以及其他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的俄国作家的札记。恩格斯从原文阅读了一些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和“青铜骑士”，格利波也多夫的“聪明误”，并且把“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一章中的几节译成了散文。

- 10月2日以后 马克思收到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信中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出版家勒文塔尔已最后拒绝出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马克思在德国出版自己著作的其他尝试也都没有成功。
- 10月4日 1851年9月30日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了一篇就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被捕一事对马克思进行诽谤的报道。为此，马克思写了一篇声明，刊登在10月9日的“科伦日报”上，10月18日的“总汇报”摘要发表了这篇声明。
- 10月16日 马克思请迁居到美国的魏德迈想法把刊登在1850年宪章派杂志“红色共和党人”（《Red Republican》）上的“共产党宣言”英译文以单行本在美国出版。在美国出版“共产党宣言”的事未能实现。
- 10月31日 马克思建议魏德迈把马克思、恩格斯、威·沃尔弗和维尔特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一些文章，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的反对海因岑的文章编成一套袖珍丛书在美国出版。马克思并且打算以后把一些评论当前问题的小册子也收入这套丛书。出版丛书的事未能实现。
- 11月5日—15日
前后 马克思居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
- 11月下半月 马克思读了蒲鲁东的“无息贷款”一书，并给以否定的尖锐批评。

-
- 11月24日和27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就发表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的计划问题交换意见。
- 12月1日 为了组织一个抗议运动,反对普鲁士警察当局在科伦一手捏造的对共产主义者同盟著名活动家的审讯,并迫使报刊对科伦被告案件表示意见,马克思写信反对普鲁士当局,并将这些信寄到巴黎,以便在法国报纸上发表。同时他还请威·沃尔弗给美国和瑞士写同样的信,并请恩格斯给英国写信。但是在报刊上组织抗议运动一事未能成功。
- 马克思同反对伦敦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的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德国工人施泰翰、居姆佩尔等人建立了联系。
- 12月1日以后 马克思从弗莱里格拉特那儿得知,拉萨尔为了出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计划在德国创办一个股份公司,马克思不同意这个建议。
- 12月3日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深刻地分析了1851年12月2日在法国发生的路易·波拿巴反革命政变。这封信里的一些思想在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得到发展。
- 1851年12月9日前
后—1852年1月初 马克思收到海涅的秘书莱茵哈特从巴黎寄来的许多关于12月2日政变前后法国的政治局势的详细报告。马克思在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时利用了信中提供的许多材料。
- 12月下半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魏德迈的信中得知他准备在纽约出版“革命”周刊(《Die Revolution》)以及这个周刊的纲领。魏德迈请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该杂志寄稿,并告诉他们,他准备在该杂志上转载他们和他们的战友过去的文章。

- 12月16日 恩格斯建议马克思为“革命”杂志写一篇关于法国12月2日政变的文章。
- 12月19日前后 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威·沃尔弗、斐·沃尔弗、维尔特、弗莱里格拉特、埃卡留斯商谈为“革命”杂志写文章的事。
- 1851年12月19日前后—1852年3月25日前后 马克思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深刻地总结了1848—1849年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在发展自己的革命学说方面做了新的贡献。马克思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第一次表述了工人阶级必须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这个重要原理。
- 1851年12月20日前后—1852年1月3日前后 恩格斯居住在伦敦马克思处。
- 12月27日 马克思请弗莱里格拉特为“革命”杂志写一篇新年献诗。

1 8 5 2

- 1852年1月—1853年3月 恩格斯研究军事艺术史,他特别注意1848—1849年革命时期的各次战争,尤其是匈牙利的和意大利的战争,他打算撰写这些战争的历史。他请了克劳塞维茨、若米尼、维利森、霍夫施泰特尔、金策耳、戈尔盖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著作。
- 1月1日 马克思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第一章寄给魏德迈发表。
- 1月2日—24日 马克思患重病,他很吃力地继续写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 1月6日 “革命”杂志第一期在纽约出版。这一期转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的

- “国际述评(三)”的一部分,同时,预告即将发表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社会主义的最新启示,或比·约·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总论’”,后一著作因“革命”杂志在第2期后停刊,马克思未写成。
- 1月9日 燕妮·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中转述了马克思的请求,马克思希望在“革命”杂志上说明科伦被告案件的真相,因为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在英国的刊物在金克尔的指使下,有意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
- 1月中旬 在马克思的支持下,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工人,在伦敦另外成立了一个新的德国工人协会,由施泰翰担任主席。
- 1月15日 马克思出席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支部会议,会上宣读了从科伦寄来的关于延期审讯科伦被告案件的信。
- 1月23日 恩格斯为“革命”杂志写了一篇论英国的文章,文中阐述了他对大陆各国军队侵入不列颠群岛的可能性问题的研究成果。由于杂志停刊,这篇文章没有发表。
- 1月28日 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要求,写信给“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编辑部,揭露普鲁士政府对待科伦被告的横暴行为。其中一封寄给了马克思。1月29日马克思将这封信寄给“泰晤士报”编辑部,署名“普鲁士人”。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国报刊上发表关于科伦被告的境况的材料的尝试未能成功。
- 1月30日 马克思询问魏德迈能不能在美国出版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
- 2月 马克思在经济上遇到严重的困难,他不得不把衣服送进当铺,因此他不能到图书馆去。由于每夜辛苦地从事写作,马克思的眼睛开始疼痛。

- 2月—4月初 恩格斯写作“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一文。文章发表在1852年2月21日、3月27日和4月10日的“寄语人民”上。
- 2月4日 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他打算吸收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的参加者瑟美列和佩尔采尔为“革命”杂志撰稿。
- 2月中旬 恩格斯在“欧门—恩格斯”公司办事处的工作十分繁忙，他在百忙中勉强抽时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和“寄语人民”写稿。
- 2月18日 马克思寄给恩格斯关于“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的补充材料，并建议他严厉批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左派。
- 2月19日前后 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的定期会议将威·希尔施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为他是普鲁士警察局的奸细。根据这种情况，会议通过了改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每周会议的地点和日期的决议。
- 2月20日 马克思知道“革命”杂志被禁止出版之后，请魏德迈设法在美国出版“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单行本。
- 2月24日 马克思接到参加庆祝1848年二月革命四周年的宴会的邀请，这次宴会是由伦敦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们发起举行的。马克思没有出席这次宴会。
- 2月27日 恩格斯经常注意英国经济的发展和英国的政治事件。他在给魏德迈的信中分析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并答应以这个题目写一篇论文寄给他。但是，恩格斯的愿望未能实现，因为没有地方发表这篇论文。
- 3月3日 马克思写给“科伦日报”一篇声明，驳斥了这家报纸

关于他和所谓德法密谋案件的被告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成员阿·迈尔有联系的断言。声明发表在3月6日“科伦日报”上。

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请他注意，他们的书信遭到警察的秘密检查。

- 3月5日 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中表述了他在对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理解方面所作的一些完全新的结论。这些结论就是：“(1)阶级的存在仅仅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2)阶级斗争必然要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向消灭任何阶级和向没有阶级的社会的过渡。”
- 3月下半月 马克思收到克路斯寄来的关于在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活动情况的报告。
- 3月18日 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他希望关闭“欧门—恩格斯”公司到利物浦去。在那里他将少管一些父亲的商业事务，而能够更多地从事科学工作和党的活动。他在信中还谈到他研究俄语语法和词汇的成绩。
- 3月24日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的定期会议上，马克思报告了克路斯和魏德迈在美国的活动，特别是他们反对海因岑、金克尔的活动。会议赞同克路斯和魏德迈的活动。
- 3月25日 马克思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最后一部分寄给魏德迈。
马克思通知魏德迈说，琼斯打算出版一份新的宪章派的报纸，为此，他正在宪章派工人中间募集经费。
- 4月13日前后 在伦敦马克思处住了几天之后，恩格斯从伦敦回到曼彻斯特。
- 4月14日 马克思的小女儿马克思·弗兰契斯卡病死。他不得

- 不向邻居——一个法国流亡者借钱埋葬女儿。
- 4月16日 马克思接到魏德迈来信说,由于缺乏必要的钱,在美国出版“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单行本一事,不得不推迟。
- 4月24日前后 马克思从魏德迈给他的信中得知,由于一个德国工人流亡者捐献了自己的积蓄四十美元,他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将在美国出版。
- 4月30日 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他计划和恩格斯共同写几篇描绘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活动家们的“政治面貌”的文章。马克思写道,瑟美列和佩尔采尔的熟人匈牙利流亡者班迪亚在为出版这本小册子奔走。(后来发现班迪亚是警察局的密探)马克思请恩格斯把流亡者活动家们引用他给恩格斯的信和其他材料所作的评述的综合评论寄给他,并请恩格斯写一些关于维利希的评述。
- 5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收集关于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活动家们的小册子的材料。马克思和恩格斯请德朗克、威·沃尔弗、克路斯、弗莱里格拉特、魏德迈等人寄给他们有关这些活动家当中的一些人的传记材料,并着手写作“流亡中的大人物”一书。
- 5月4日于英 国目前状况的论于英国目前状况的论文。
- 5月19日前后 “革命”杂志以不定期刊物的形式复刊,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作为该杂志的一期在纽约出版。
- 5月21日 恩格斯在“欧门—恩格斯”公司工作的物质待遇在该公司的股东们签订的合同中明文规定下来,因此恩格斯就有可能更多地帮助马克思的家庭。
- 5月底—6月下旬 马克思居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他们共同写作“流

- 亡中的大人物”一书。
- 6月18日 马克思委托妻子把一些材料转交给琼斯，以便在1852年5月开始出版的新的宪章派报纸“人民报”上发表。马克思在总的编辑工作方面，特别是在国外通讯专栏方面给了琼斯许多帮助，并且还协助他管理该报的财务。后来，马克思一直继续帮助了这个宪章派机关报。由于马克思的帮助，该报的订户数目增加，报纸得到了巩固。
- 6月25日—28日
前后 马克思从曼彻斯特回来以后，就向他的妻子和德朗克口授“流亡中的大人物”一书，然后把一份交给班迪亚，另一份自己保存。
- 6月底 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到魏德迈来信说，他在纽约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魏德迈请求按期寄送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以便使支部的成员能够及时阅读。
- 7月—8月 马克思恢复他在英国博物馆图书馆的研究工作。他研究了世界通史、国家机构史、艺术史、各个不同时代的妇女的状况等方面的大量著作。马克思从马基雅弗利、休里曼、瓦克斯穆特、西斯蒙第、艾希霍恩、布特维尔克、荣克、赛居尔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中作了摘要。
- 7月初—8月 恩格斯研究匈牙利军事家戈尔盖的著作“我在1848—1849年时期的生活和活动”，在书的空白处作了批注。同时还研究了有关1848—1849年匈牙利战争的其他著作。
- 8月—10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留心观察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之间围绕金克尔通过“德美革命贷款”募集来的款项而进行的斗争。
- 8月初 马克思和恩格斯得知，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还要推延三个月。

- 8月2日 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关于英国政党的文章。这篇文章由恩格斯译成英文。马克思把该文分作独立的两篇文章于8月6日和10日寄往纽约，题目是：“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和“宪章派”。这两篇文章发表在8月21日和25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8月12日—22日 恩格斯写作“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的第十七篇，在这篇文章里，恩格斯根据各次战争和革命的历史经验，表述了科学共产主义关于武装起义的重要原理。
- 8月中—9月 马克思询问拉萨尔、艾布纳尔、施特列特、璠特是否有可能在德国出版“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德国出版此书的一切尝试都未成功。
- 8月16日前后 马克思著文揭露英国选举制度的反人民实质。文章由恩格斯译成英文。马克思把该文分作两个单篇于8月20日和27日寄往纽约，题目是：“选举中的舞弊”和“选举的结果”。这两篇文章发表在9月4日和1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8月19日前后 为了帮助恩格斯研究军事问题，马克思在英国博物馆图书馆里翻阅了许多有关军事问题的书籍，并写了一个资料目录寄给恩格斯。
- 8月19日 马克思收到贝尔姆巴赫的信，信中告诉马克思关于科伦被告的境况，信中还说，科伦正在向各方面的人物进行查问，目的就是寻找马克思的信件。
马克思向莱比锡出版商布罗克豪斯建议，为他的出版物“时代”写一篇“1830年至1852年的英国现代政治经济文献”的评论。布罗克豪斯拒绝了马克思的建议。
- 9月初 马克思经济极端困难，他没有钱为生病的妻子、女儿

- 燕妮和女仆海伦·德穆特请医买药。有一个星期，马克思全家只能吃到面包和马铃薯。
- 9月2日以后—21日前后 马克思希望用英文出版“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请求，校审由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皮佩尔翻译的第一章。
- 9月28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一文，目的是警告意大利和匈牙利流亡者的领袖们防止民族运动被波拿巴集团所利用的危险。该文发表在10月19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10月—11月12日 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朋友们关心地注视着由普鲁士政府一手制造的、10月4日在科伦开始的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著名活动家的审讯。他们竭尽全力帮助被告们的律师在法庭上证明起诉的虚伪，他们用各种方法把揭露普鲁士警察当局的阴谋的文件和材料寄往科伦。
- 10月2日—23日 宪章派报纸“人民报”转载了马克思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一组文章：“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宪章派”、“选举中的舞弊”和“选举的结果”。这一组文章以“大不列颠的大选”作为总标题。
- 10月上半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流亡中的大人物”这本小册子的迟迟没有出版感到不安，他们请求维尔特、德朗克等人调查下班迪亚和出版商们的人品，据班迪亚说，他们表示愿意出版这本小册子。
- 10月12日 马克思写了一篇关于英国经济和政治状况的文章。这篇文章由恩格斯译成英文。马克思把文章分作两个单篇于10月15日和19日寄往纽约，题目是：“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和“商业

- 繁荣的政治后果”。文章发表在11月1日和2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10月16日 马克思写了一篇关于英国政党状况的文章。这篇文章由恩格斯译成英文。马克思把这篇文章分作两个单篇于11月2日和9日寄往纽约。第一篇文章发表在11月29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题目是：“各个政党和政局展望”。第二篇发表于11月25日该报，发表时没有标题。
- 10月20日前后 马克思收到克路斯寄来的、由魏德迈在纽约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百三十本。
- 10月23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了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的第十九篇。恩格斯答应写的最后一篇——第二十篇没有见报。
- 10月25日 马克思约请恩格斯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结束后共同写一篇“告公众书”，以揭露普鲁士政府的勾当。
马克思告诉恩格斯，他在伦敦受到警察的监视。
- 10月26以后 马克思从维尔特那里获得出版商敦克尔从柏林发来的消息说，班迪亚所说的那个所谓预定出版“流亡中的大人物”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商根本不存在。
- 10月28日 马克思写了一篇声明，揭露“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对科伦的被告和他们在伦敦的朋友们所作的诽谤和攻击。这篇由弗·恩格斯、斐·弗莱里格拉特、卡·马克思、威·沃尔弗签名的声明，发表在10月28日的“旁观者”和10月30日的“人民报”、“晨报”、“观察家”和“先驱”上。
- 10月底—12月初 马克思写了“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本小册子。
- 11月12日以后 马克思恩格斯从报纸上得知，陪审法庭对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判决：七人被判决三年到六年有期徒刑，

只有四人被无罪开释。

- 11月16日 马克思写了一篇声明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回答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刊物就马克思的“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一文进行的诬蔑宣传。该报12月1日刊登了这个声明。
- 11月17日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会议上，马克思提议解散共产主义者同盟，因为在欧洲反动势力猖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著名活动家遭到逮捕的情况下，同盟实际上已不存在。马克思的提议被通过。
- 11月20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寄给“晨报”编辑部“关于最近的科伦案件的最后声明”。这篇由弗·恩格斯、斐·弗莱里格拉特、卡·马克思和威·沃尔弗签名的声明发表在11月29日的“晨报”上。
- 11月29日 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要求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该文由马克思署名，发表在12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11月底—12月 普鲁士警察局的首脑得悉马克思准备出版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策划者的小册子之后，发布命令说，小册子一出现就立即没收。同时，还向其他国家的警察局特别是比利时警察局提出同样的要求。
- 12月3日 马克思严厉要求班迪亚回答“流亡中的大人物”一书长期拖延出版的原因，并要求他对于他所说的那些出版商根本不存在一事作出解释。
- 12月6日和7日 马克思为了出版“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将这本小册子的手稿寄给在瑞士的沙贝利茨和在美国的克路斯。
- 12月7日 马克思寄给在美国的克路斯一份关于救济科伦被判

罪者和他们的家属的呼吁书,并提议组织救济委员会。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有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内西、弗莱里格拉特、德朗克、威·沃尔弗、斐·沃尔弗、琼斯、约·格·埃卡留斯、罗赫纳、普芬德、皮佩尔等人。呼吁书发表在1853年1月的“加利福尼亚国家报”和“纽约刑法报”上。

马克思在给克路斯的信中,批评了比·约·蒲鲁东关于路易·波拿巴政变的著作。

- 12月10日前后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议会。——11月26日的表决。——迪斯累里的预算案”一文。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揭露了英国税收制度的阶级实质。该文由皮佩尔译成英文,发表于12月28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12月14日前后 马克思接到出版家沙贝利茨的通知说,“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已开始 in 巴塞尔印刷。
- 1852年12月17日和
1853年1月11日 马克思写“内阁的失败”和“衰老的政府。——联合内阁的前途及其他”一文,论述得比—迪斯累里的托利党内阁和代替它的阿伯丁联合内阁的反动政策。该文发表在1月7日和28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1852年12月下半月
—1853年1月10日 恩格斯居住在伦敦马克思处。
- 12月27日以后 马克思得知班迪亚和普鲁士警察局有联系,他大概已把“流亡中的大人物”的手稿交给普鲁士警察当局。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一有机会马上在报刊上揭露班迪亚。
- 1 8 5 3
- 1月—3月 马克思研究货币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其他一些问

- 题,同时还研究文化史和斯拉夫人历史。他从加利阿尼、瓦克斯穆特、考尔福斯等人的著作中作了许多摘录。马克思和克路斯通信谈在美国出版“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事。
- 1月下半月 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在巴塞尔出版。
- 1月21 马克思写“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一文,论述苏格兰高地大地主剥夺农民的问题。文章由恩格斯译成英文,发表在2月9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并摘要发表在3月12日的“人民报”上。
- 1月28日 马克思第一次自己用英文写文章,题目是:“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这篇文章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犯罪行为增多的社会原因。该文发表在2月18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2月11日和22日 马克思写“意大利人起义。——不列颠的政策”和“弗兰茨-约瑟夫遇刺。——米兰起义。——不列颠的政策。——迪斯累里的演说。——拿破仑的遗嘱”,这两篇文章发表在2月25日和3月8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2月12日 宪章派全国协会执行委员会通过琼斯邀请马克思参加2月22日的宪章派公开群众大会。
- 3月4日 马克思写“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一文。该文发表在3月22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并摘要发表在4月16日的“人民报”上。
- 3月7日—10日前后 马克思患严重的肝炎。
- 3月9日 马克思从沙贝利茨那里得知,运往德国的两千册“揭

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在巴登的一个靠边境的村子里被警察没收了。

3月18日

马克思写“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计。——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通商条约。——‘泰晤士报’和流亡者”一文。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谈到在瑞士出版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全部被警察没收和销毁。该文发表在4月4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3月25日

马克思从克路斯那里得知，“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分节在波士顿的“新英格兰报”上发表，马克思建议他想办法出版这部著作的单行本。马克思的这部著作在4月24日前后由“新英格兰报”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在巴登的一个靠边境的村子里被警察没收了。

3月18日

马克思写“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计。——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通商条约。——‘泰晤士报’和流亡者”一文。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谈到在瑞士出版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全部被警察没收和销毁。该文发表在4月4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3月25日

马克思从克路斯那里得知，“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分节在波士顿的“新英格兰报”上发表，马克思建议他想办法出版这部著作的单行本。马克思的这部著作在4月24日前后由“新英格兰报”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 利革命的军事活动家，匈牙利军队总司令(1849年4—6月)；曾依靠反动军官和资产阶级中的反革命派，对革命战争实行怠工。——第75、346、621页。
- 戈德海姆(Goldheim)——普鲁士警官，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普鲁士警察局派在伦敦的密探之一。——第464、491、498—506、508—514页。
- 比约，奥古斯特·阿道夫·玛丽(Billault, Auguste-A dolphe-Marie 1805—1863)——法国政治活动家，律师，奥尔良派，制宪会议议员(1848—1849)；1849年后成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内务大臣(1854—1858)。——第189页。
- 比安卡(Bianca)——城市贵族代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陪审员。——第462页。
- 比恩包姆，威廉(Birnbaum, Wilhelm)——科伦济贫所的秘书，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人。——第497、499页。
- 巴伊，让·西尔万(Bailly, Jean Sylvain 1736—1793)——法国天文学家，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自由立宪资产阶级领导者之一。——第123页。
- 巴罗，奥迪隆(Barrot, Odilon 1791—1873)——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1848年2月以前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的首领；1848年12月至1849年10月领导为各个君主专制集团的反革命联盟所支持的内阁。——第141—143、147、161—163、172、186、189、196、205页。
- 巴兹，让·狄德埃(Baze, Jean-Didier 1800—1881)——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奥尔良派。——第195、209页。
-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俄国民主主义者，政论家，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参加者；后成为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之一；在第一国际里为马克思主义之歼敌；由于分裂活动于1872年在海牙会议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第108页。
- 巴罗什，比埃尔·茹尔(Baroche, Pierre Jules 1802—1870)——法国政治活动家，法学家，第二共和国时期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秩序党的代表人物；1849年为上诉法院的检察长；波拿巴主义者，1851年12月2日政变前后曾数度入阁。——第168、180、181、185、186、190页。
- 巴特勒，赛米尔(Butler, Samuel 1612—1680)——英国讽刺诗人，“古迪布腊斯”一诗的作者。——第702页。
- 巴拉盖·狄利埃，阿希尔(Baraguay d' Hilliers, Achille 1795—1878)——法国将军，从1854年起是元帅；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51年统率巴黎卫戍部队；波拿巴主义者。——第184、185、197页。
- 巴里特，艾利修(Burritt, Elihu 1810—1870)——美国语言学家，资产阶级慈善家和和平主义者，多次国际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的组织者。——第327页。
- 巴尔扎克，奥诺莱·德(Balzac, Honore' de 1799—1850)——伟大的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第227页。
- 巴塞尔蒙，弗里德里希·丹尼尔(Bassermann, Friedrich Daniel 1811—1855)——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 温和的自由派,巴登议会议员;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巴登政府在联邦议会中的代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第83页。
- 巴尔布尔,詹姆斯(Barbour, James 1831—1853)——罪犯,因在设菲尔德杀人被处死。——第577页。
- 巴尔贝斯,阿尔芒(Barbès, Armand 1809—1870)——法国革命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1848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制宪议会议员,因参加1848年5月15日事件被判无期徒刑,1854年被赦。——第340页。
- 巴特米,艾曼纽尔(Barthélemy, Emmanuel 约1820—1855)——法国工人,布朗基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和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为在伦敦的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团体的领导人之一,加入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5年因刑事罪被判处死刑。——第341、342页。
- 巴黎伯爵——见路易—菲力浦—阿尔伯,奥尔良公爵。
- 巴巴罗萨——见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
- 尤尔特,威廉(Ewart, William 1798—1869)——英国政治活动家,皮尔派,自由贸易派,议会议员。——第396、407页。
- 牛津伯爵,阿弗里德·哈里(Oxford, Alfred Harley 1809—1853)——英国贵族。——第586页。
- 邓达斯,戴维(Dundas, David 1799—1877)——英国自由主义政治活动家,法学家,检察长。——第407页。
- 扎克,卡尔·亨利希(Sack, Karl Heinrich 1789—1875)——德国新教神学家,波恩的教授。——第261页。
- 孔斯坦,本扎曼(Constant, Benjamin 1767—1830)——法国自由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和作家。——第122页。
- 不伦瑞克公爵,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威廉(Braunschweig, Karl Friedrich August Wilhelm 1804—1873)——从1823年起为不伦瑞克公爵,1830年9月初被推翻,流亡国外;曾企图在欧洲一些国家的帮助下复辟;在四十至五十年代与流亡者中间的民主派分子保持联系,曾出版“德意志伦敦报”。——第305、322、348页。
- 韦尔凯尔,卡尔·泰奥多尔(Welcker, Karl Theodor 1790—1869)——德国法学家,自由派政论家;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第15、25、77、303、325、330页。

五 画

- 加瓦齐,亚历山德罗(Gavazzi, Alessandro 1809—1889)——意大利教士,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宣传反对天主教会和教皇世俗权力;后成为加里波第的战友。——第346页。
- 加里波第,朱泽培(Garibaldi, Giuseppe 1807—188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1848年率领志愿兵团站在皮蒙特军队方面英勇地与奥国作战;1849年4—6月罗马共和国保卫战的主要组织者;五十年至六十年代领导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

- 解放和国内统一的斗争。——第334、340页。
- 尼茨施, 卡尔·伊曼努尔 (Nitzsch, Karl Immanuel 1787—1868)——德国新教神学家和传教士, 曾在波恩和柏林担任教授。——第261页。
- 尼古拉, 弗里德里希 (Nicolai, Christoph Friedrich 1733—1811)——德国作家, 出版家和书商; “开明专制制度”的拥护者。——第307、313页。
- 司徒卢威, 古斯塔夫 (Struve, Gustaw 1805—1870)——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职业是记者; 1848年4月和9月巴登起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领导者之一; 革命失败后逃离德国; 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 曾站在北军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301—306、316、317、322—325、329、339、343—345、348、349、362页。
- 司徒卢威, 阿马利亚 (Struve, A malie 死于1862年)——1848—1849年德国民主运动的参加者; 是古斯塔夫·司徒卢威的妻子。——第304、306、324、348页。
- 皮尔, 罗伯特 (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温和派 (皮尔派) 的领袖; 曾任内务大臣 (1822—1827 和 1828—1830), 首相 (1834—1835, 1841—1846), 在自由派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 (1846)。——第230、239、386、387、407、408、434、538、539、583、605页。
- 皮尔, 罗伯特 (Peel, Robert 1822—189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 皮尔派, 议会议员; 罗伯特·皮尔 (1788—1850) 的儿子。——第610页。
- 皮恩, 托马斯 (Peene, Thomas)——伦敦医生。——第614页。
- 皮佩尔, 威廉 (Pieper, Wilhelm 约生于1826年)——德国语言学家和记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流亡伦敦; 1850—1853年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第643、645页。
- 瓦尔德克, 贝奈狄克特·弗兰茨·利奥 (Waldeck, Benedichus Franz Leo 1802—1870)——德国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 职业是律师;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副议长和左派领导人之一; 后为进步党人。——第340页。
- 瓦提梅尼尔, 安都昂·弗朗斯瓦·昂利 (Vatimesnil, Antoine Francois Henri 1789—1860)——法国政治活动家, 正统主义者, 曾任教育大臣 (1828—1830), 立法议会议员 (1849—1851)。——第189页。
- 汉利, 约瑟夫·沃讷 (Henley, Joseph Warner 1793—1884)——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曾任商业大臣 (1852和185—1859)。——第416、433页。
- 汉普敦, 约翰 (Hampden, John 1594—1643)——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出色的活动家, 代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的利益。——第81页。
- 汉泽曼, 大卫 (Hansemann, David 1790—1864)——大资本家, 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 1848年3—9月任普鲁士财政大臣, 实施同反动派妥协的叛卖政策。——第42、46、54、80、840页。
- 卢格, 阿尔诺德 (Ruge, 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派, 资产阶级激进派, 1846年为法兰克福国

- 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五十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301、306—316、321、325—329、337—340、343—350、352、356、358、362、367—369、372—374、376、377、464页。
- 卢普夫(Rumpf E.)——德国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1年起流亡伦敦,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第643、645页。
- 卢克莱修,梯特·卡鲁斯(Lucretius, Titus Carus 约公元前99—55)——杰出的罗马哲学家和诗人,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第596、597页。
- 卢施萨克(Ruscak)——匈牙利裁缝,民主主义者,科苏特的战友。——第599页。
- 圣让·丹热利——见雷尼奥·德·圣让·丹热利,奥古斯特·米歇尔·埃蒂耶纳。
- 圣西门,昂利(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23页。
- 圣贝夫,比埃尔·昂利(Sainte-Beuve, Pierre-Henri 1819—1855)——法国厂主和地主,贸易自由的拥护者,秩序党的代表人物;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第199页。
- 圣茹斯特,路易·安都昂(Saint-Just, Louis Antoine 1767—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第122页。
- 圣阿尔诺,阿尔芒·雅克·勒卢阿·德(Saint-Arnaud, Armand-Jacques-Achille Leroy de 1801—1854)——法国将军,从1852年起是元帅,波拿巴主义者;曾任陆军部长(1851—1854),1851年12月2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1854年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第144页。
- 圣蒲利斯特,艾曼纽尔·路易·玛丽(Saint-Priest Emmanuel-Louis-Marie 1789—1881)——子爵,法国将军和外交家,正统主义者,立法会议员(1849—1851)。——第194页。
- 圣日耳曼兹伯爵,爱德华·格兰维厄·伊里奥特(Saint-Germans, Edward Granville Eliot 1798—1877)——英国国家活动家,皮尔派;曾任爱尔兰总督(1841—1845和1852—1855)。——第434页。
- 布尔,路德维希(Buhl, Ludwig 1814—180年代初)——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派。——第354页。
- 布林德,卡尔(Blind, Karl 1826—1907)——德国记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为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五十年代是伦敦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后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315页。
- 布莱特,约翰(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反谷物法同盟创立者之一;自六十年代末起为自由党领袖之一;曾多次担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第236、408、436、537、556、560、590—592页。
-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 Louis 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密谋活动的倡导者,秘密的“四季社”的领导人,1839年5月12日起义的组织者;1848年革命时期站在法国无产阶级民主运动极左翼的

- 立场；曾多次被判处徒刑。——第128、340—342页。
- 布赫尔，洛塔尔 (Bucher, Lothar 1817—1892)——普鲁士官吏，政论家；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后来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支持俾斯麦。——第339、343、370页。
- 布洛利，阿希尔·沙尔·莱昂·维克多 (Broglie, Achille Charles Léon Victor 1785—1870)——公爵，法国国家活动家，内阁总理 (1835—1836)，立法议会议员 (1849—1851)，奥尔良派。——第168、196页。
- 布列克，弗里德里希 (Bleek, Friedrich 1793—1859)——德国新教神学家，波恩大学神学教授。——第261页。
- 布鲁图斯 (马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 (Marcus Junius Brutus 约公元前85—42)——罗马政治活动家，是贵族共和国密谋反对尤利乌斯·凯撒的策划者之一。——第122、374、512页。
- 布拉瑟顿，约瑟夫 (Brotherton, Joseph 1783—1857)——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选举制改革的拥护者；议会议员。——第590页。
- 在伦坦诺，罗仑兹 (Brentano, Lorenz 1813—1891)——巴登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职业是律师；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领导巴登临时政府，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后来流亡美国。——第108、302、304、314、317、356、358、359、378页。
- 布拉梅尔 (Brammel)——英国教士。——第613页。
- 布朗德尔·德·涅尔 (Blondel de Neele)——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的法国流浪诗人；传说他是英王狮心理查的宫廷诗人，曾把被奥国俘虏的英王解救出来。——第296页。
- 弗略里，查理 (Fleury, Charles 生于1824年) (真名为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克劳泽)——伦敦商人，普鲁士的间谍和警探。——第447、452—455、476—480、487、499、500、502、503、509—517、527—529、531页。
- 弗兰克，古斯塔夫 (Franck, Gustav)——奥地利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流亡伦敦。——第372页。
- 弗伦克尔 (Fränkel)——在伦敦的德国工人，1847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和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积极活动家，1849—1850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并为这个集团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第635页。
- 弗罗斯特，约翰 (Frost, John 1784—1877)——英国小资产阶级激进派，1838年倾向于宪章运动；由于组织1839年威尔士的矿工起义，因此被判终身流放至澳洲；后来被赦免并在1856年回到英国。——第396、439页。
- 弗吕贝尔，尤利乌斯 (Fröbel, Julius 1805—1893)——德国政论家和进步书刊发行人，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参加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翼；后为自由派。——第78页。
- 弗兰格尔，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 (Wangel, Friedrich Heinrich Ernst

- 1784—1877)——将军,普鲁士反动军阀的主要代表之一;1848年11月参加普鲁士反革命政变和解散普鲁士国民议会。——第81、82、314页。
- 弗兰茨一世(Franz I 1768—1835)——奥地利皇帝(1804—1835),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1792—1806)。——第33、36页。
-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 1830—1916)——奥地利皇帝(1848—1916)——第87、599页。
- 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Friedrich I Barbarossa 约1123—1190)——从1152年起为德国国王,后为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1155—1190)。——第361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1840)——普鲁士国王(1797—1840)——第18—21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第18—22、27、37、42、43、81、83、87、93、95、96、279、467页。
-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Friedrich-August II 1797—1854)——萨克森国王(1836—1854)。——第101页。
-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德国诗人,开始活动时为浪漫主义者,后为革命诗人,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五十年代脱离革命斗争。——第285、430、445—448、505、630、642—644页。
- 本生,克利斯提安·卡尔·约西亚斯(Bunsen, Christian Karl Josias 1791—1860)——男爵,普鲁士外交家,政论家和神学家,接近普鲁士宫廷,曾任驻伦敦大使(1842—1854)。——第630页。
- 白尔尼,路德维希(Börne, Ludwig 1786—1837)——德国政论家和批评家,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卓越代表人物之一;晚年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第319页。
- 卡贝,埃蒂耶纳(Cabet, Etienne 1788—1856)——法国政论家,和平的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伊加利亚旅行记”一书的作者。——第340页。
- 卡佩隆(Caperon)——法国流亡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为在伦敦的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协会委员会的委员。——第339页。
- 卡利古拉(Caligula 12—41)——罗马皇帝(37—41)。——第143页。
-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Cavaignac, Louis Eugène 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侵略阿尔及利亚的参加者,1848年2月革命后是阿尔及利亚总督,以在战争中采取野蛮手段著称;从1848年5月起为法国陆军部长,极端残酷地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曾为政府首脑(1848年6—12月)。——第62、133、138、139、147、187、200、209、250页。
- 卡尔利埃,比埃尔(Carlier, Pierre 1799—1858)——巴黎警察局长(1849—1851),波拿巴主义者。——第163、175、182、206、472—474、478页。
- 卡德威尔,爱德华(Cardwell, Edward 1813—1886)——英国国家活动家,皮尔派领袖之一,后成为自由主义者;曾任商业大臣(1852—1855),爱尔兰事务大臣(1859—1861),殖民大臣(1864—1885)和陆军大臣(1868—1874)。——

第386、407页。

卡提利纳, 鲁齐乌斯·赛尔吉乌斯 (Catilina, Lucius Sergius 公元前约108—62)——罗马政治活动家, 贵族, 反对贵族共和国密谋的组织者。——第441、520页。

古泰 (Goute)——法国流亡者,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协会委员会的委员。——第339页。

叶卡特林娜二世 (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俄国女皇 (1762—1796)。——第622页。

兰斯唐侯爵, 亨利·配第一菲茨莫里斯 (Lansdowne, Henry Pettey Fitzmaurice 1780—1863)——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1806—1807年任财政大臣, 枢密院主席 (1830—1841, 1846—1852), 不管部大臣 (1852—1863)。——第553页。

兰次科隆斯基 (Lanckoroński)——伯爵, 波兰流亡者, 沙皇政府的密探。——第413页。

六 画

乔治三世 (Georg III 1738—1820)——英国国王 (1760—1820)。——第617页。

托林顿子爵, 乔治·宾恩 (Torrington, Georges Byng 1812—1884)——英国政治活动家, 辉格党人; 议会议员, 曾任锡兰岛的总督 (1847—1850)。——第396页。

托利尼, 比埃尔·弗朗斯瓦·伊丽莎白 (Thorigny, Pierre-Francois-Elisabeth 1798—1869)——法国法学家, 1834年审讯里昂四月起义者案件; 波拿巴主

义者, 曾任内务部长 (1851)。——第206页。

托克维尔, 阿列克西斯 (Tocqueville, Alexis 1805—1859)——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正统主义者和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 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曾任外交部长 (1849年6—10月)。——第196页。

多德森, 约翰 (Dodson, John 1780—1858)——英国法官。——第608页。

多布尔霍夫, 安东 (Dobhoff, Anton 1800—1872)——男爵, 奥地利国家活动家, 温和的自由派, 1848年任商业大臣 (5月) 和内务大臣 (7—10月)。——第67页。

迈尔, 阿道夫 (Majer, Adolph 约生于1819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年末至1851年为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驻法国的特派员; 1852年2月所谓巴黎德法密谋案的被告之一。——第257、339、472、481页。

迈尔霍弗 (Mayerhofer)——1849年为巴登临时政府国防部副部长, 曾采取背叛行动, 拒绝执行必要的军事措施。——第304页。

艾释黎, 安东尼·库伯, 1851年起为舍夫茨别利伯爵 (Ashley, Anthony Cooper 1801—1885)——英国政治活动家, 四十年代在议会里领导托利党慈善家集团, 1847年起为辉格党人。——第612页。

艾森曼, 哥特弗利德 (Eisenmann, Gottfried 1795—1867)——德国政论家, 医生; 1848年至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 后来属于左派。——第15页。

- 艾希霍恩, 约翰·阿尔勃莱希特·弗里德里希 (Eichhorn, Johann Albrecht Friedrich 1779—1856)——普鲁士国家活动家, 曾任普鲁士宗教、教育和卫生事务大臣 (1840—1848)。——第27页。
- 安都昂, 古斯塔夫 (Antoine, Gustav)——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法国流亡者; 奥古斯特·布朗基之妹夫。——第341页。
- 安内克, 弗里德里希 (Anneke, Friedrich 1818—1872)——普鲁士的炮兵军官; 1846年因政治信仰被革除军职; 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的成员; 1849年任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中校; 后站在北军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290页。
- 吉兹公爵——见洛林的昂利第二。
- 吉佩里希, 约瑟夫 (Gipperich, Joseph)——德国裁缝, 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一个支部的成员, 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1852年2月所谓巴黎德法密谋被告之一; 后来流亡英国。——第476、477、485、486页。
- 西蒙, 路德维希 (Simon, Ludwig 1810—1872)——特利尔的律师,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后流亡瑞士。——第377页。
- 西塞罗, 马可·土利乌斯 (Cicero, Marcus Tullius 公元前106—43)——杰出的罗马雄辩家和国家活动家, 折衷主义哲学家。——第369、520页。
- 西斯蒙第, 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 (Sismondi, Jean Charles-Léonard-Simon de 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 批评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家。——第574、617、619页。
- 伍德, 查理 (Wood, Charles 1800—1885)——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1846—1852年任财政大臣, 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 (1852—1855), 1855—1858年任海军大臣和印度事务大臣 (1859—1866)。——第393、396、397、548—550、558、582、604页。
- 伍尔夫, 阿瑟 (Woolf, Arthur 1766—1837)——英国工程师和发明家。——第562页。
- 亚历山大, 约翰 (Alexander, John)——爱尔兰政治活动家, 1853年是议会议员。——第569页。
- 亚历山大大帝 (公元前356—323)——古代卓越的战略家和国家活动家。——第176页。
- 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 公元前约571—497)——古希腊数学家, 唯心主义哲学家, 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第355页。
- 毕尔格尔斯, 亨利希 (Bürgers Heinrich 1820—1878)——德国激进政论家, “莱茵报”撰稿人 (1842—1843), 1848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成员, “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1850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因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被判处六年徒刑; 后成为进步党人。——第241、242、461、462、525、536页。
- 伊索 (Aisopos 公元前6世纪)——半神半人的古希腊寓言作家。——第125页。
- 伊雍 (Yon)——法国警官, 1850年掌管立法议会警卫队。——第175、180页。
- 伊曼特, 彼得 (Imandt, Peter)——德国教

- 师,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2年起流亡伦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第511—515、642、643、645页。
- 伊茨施太因,约翰·亚当(Itzstein, Johann Adam 1775—1855)——德国政治活动家,巴登议会中的自由主义反对派领袖之一,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第321页。
- 列曼,阿尔伯特(Lehmann, Albery)——在伦敦的德国工人,正义者同盟和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积极活动家,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是这个集团的中央委员。——第635、640页。
- 列奥波特(Leopold 1790—1852)——巴登大公(1830—1852)。——第101、108页。
- 列伐尔特,芬尼(Lewald, Fanny 1811—1889)——德国女作家,曾加入“青年德意志”派。——第312页。
- 列列韦尔,约阿希姆(Lelewel, Joachim 1786—1861)——杰出的波兰历史学家和革命活动家;1830—1831年参加波兰起义,为波兰流亡者民主派领袖之一,1847—1848年任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委员会委员。——第413页。
- 达姆(Damm)——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是巴登制宪议会主席;后来流亡英国。——第370页。
- 达菲,查理·加文(Duffy, Charles Gavan 1816—1903)——爱尔兰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青年爱尔兰”组织的领导人和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的创立者之一,议会议员;1855年流亡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曾历任国职。——第560、609页。
- 达拉什,阿尔伯特(Darasz, Albert 1808—1852)——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1830—1831年起义的参加者,波兰流亡者民主组织的积极活动家,欧洲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委员。——第325、344页。
- 达尔曼,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Dahlmann, Friedrich Christoph 1785—1860)——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派,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第25页。
- 达尔豪西侯爵,詹姆斯·安德鲁·拉姆西(Dalhousie James Andrew Ramsay 1812—1860)——英国国家活动家,皮尔派,曾任印度总督(1848—1856),执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第434页。
- 达尔林普尔,约翰(Dalrymple, John 1726—1810)——苏格兰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大不列颠封建所有制通史概论”一书的作者。——第575页。
- 达来朗—贝里戈尔,沙尔·莫里斯(Talleyrand — Périgord, Charles Maurice 1754—1838)——公爵,著名的法国外交家,曾任外交部长(1797—1799, 1799—1807, 1814—1815),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代表(1814—1815),以自私和政治上毫无原则著称。——第368页。
- 米尔纳·基卜生——见基卜生,托马斯·米尔纳。
- 尧普,亨利希·卡尔(Jaup, Heinrich Karl 1781—1860)——德国法学家,自由派,黑森—达姆斯塔特政府首脑(1848—1850),1850年8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主席。——第327页。

- 华德,亨利·乔治(Ward, Henry George 1797—1860)——英国殖民官吏,辉格党人;曾任伊奥尼亚群岛高级专员(1849—1855),锡兰总督(1855—1860)和马得拉斯总督(1860)。——第396页。
- 休谟,约瑟夫(Hume, Joseph 1777—1855)——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领袖之一,议会议员。——第396、425、436、439、441页。
- 伐伊斯,克劳德·马利乌斯(Vaisse, Claude-Marius 1799—1864)——法国国家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曾任内务部长(1851年1—4月)。——188、189页。
- 伏尔泰,弗朗斯瓦·玛丽(Voltaire, François Marie 1694—1778)(真姓为阿鲁埃)——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讽刺作家,历史学家,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卓越代表,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第355页。
- 考尔巴赫,威廉(Kaulbach, Wilhelm 1805—1874)——著名的德国艺术家。——第374页。
- ### 七 画
- 沙佩尔,卡尔(Schapper, Karl 约1812—187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1849年2—5月为科伦工人联合会主席;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期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1856年重新同马克思接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第257、339、341、464、465、468、470、472、476、479—481、483、488、521、525、527、635、637—640页。
- 沙德维尔(Shadwell)——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密多塞克斯资格审查律师。——第427页。
- 沙贝利茨(Schabelitz)——瑞士出版家和书商。——第626页。
- 沙贝利茨,雅科布(Schabelitz, Jakob 1827—1899)——瑞士出版家和书商,资产阶级激进派;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来往;是沙贝利茨的儿子。——第626页。
- 沙尔腊斯,让·巴蒂斯特·阿道夫(Charras, Jean-Baptiste-A dolphe 1810—1865)——法国军事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1848年曾参加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反对路易·波拿巴;1851年12月2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第209页。
- 狄更斯,查理(Dickens, Charles 1812—1870)——杰出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第298页。
- 狄德罗,德尼(Diderot, Denis 1713—1784)——杰出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家之一,启蒙运动者,百科全书派领袖。——第301页。
- 狄摩西尼(Demosthenes (Ἰνσοδοῦ ἐρησι) 公元前384—322)——古希腊的大演说家和政治活动家,雅典的反马其顿党的领袖,奴隶民主制的拥护者;雅典同盟反马其顿战争失败后(公元前338年)被驱逐出雅典。——第315页。
- 亨策(Hentze, A)——德国军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

- 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原告证人。——第493、526、529页。
- 亨利,托马斯(Henry Thomas 1807—1876)——英国法官。——第630页。
- 亨利希(Heinrich 1726—1802)——普鲁士王储,军事活动家和外交家,七年战争(1756—1763)的参加者。——第622页。
- 亨利四世(Heinrich IV 1553—1610)——法国国王(1589—1610)。——第326页。
- 亨利五世(Heinrich V)——见尚博尔,昂利·沙尔。
- 亨利六世(Heinrich VI 1421—1471)——英国国王(1422—1461)。——第193页。
- 沃尔弗,威廉(Wolff, Wilhelm 1809—1864)——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职业是教师,西里西亚农奴的儿子;学生运动的参加者,1834—1839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1848年3月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103、111、112、430、445—448、505、642、643、645页。
- 沃尔弗,斐迪南(Wolff, Ferdinand 1812—1895)——德国政论家,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1848—1849年革命后逃离德国;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期拥护马克思;后来脱离了政治活动。——第642、643、645页。
- 沃尔波尔,斯宾塞·霍雷修(Walpole, Spencer Horatio 1806—1898)——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52, 1858—1859和1866—1867)。——第539页。
- 沃尔弗拉姆·冯·埃申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 约1170—1220)——中世纪德国诗人,骑士诗“巴齐法尔”的作者。——第267页。
- 贝林,弗兰西斯(Baring, Francis 1796—1866)——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1839—1841年任财政大臣,1849—1852年任海军首席大臣。——第584页。
- 贝尔,约翰(Baer, John)——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是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第643、645页。
- 贝姆,约瑟夫(Bem, Joseph 1795—1850)——波兰将军,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1830—1831年起义的参加者;1848年参加维也纳革命斗争;匈牙利革命军领导者之一;后在土耳其军队中服务。——第72、346页。
- 贝留,理查·孟德斯鸠(Bellew, Richard Montesquieu)——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1846—1852年间为议会议员。——第407页。
- 贝多,玛丽·阿尔丰斯(Bedeau, Marie Alphonse 1804—1863)——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副议长。——第147、186页。
- 贝朗热,比埃尔·让(Beranger, Pierre—Jean 1780—1857)——法国最杰出的民主主义诗人,著有许多政治讽刺诗。——第230页。
- 贝诺瓦·达济,德尼(Benoit d'Azay, Denis

- 1796—1880)——法国政治活动家,金融家和工业家;立法议会副议长(1849—1851),正统主义者。——第189、194页。
- 贝尔纳(Bernard)——法国上校,领导军事委员会镇压巴黎1848年六月起义的参加者,1851年12月2日政变后是对反波拿巴主义的共和派的审判的组织者之一。——第139页。
- 贝尔纳,拉尔夫(Bernal, Ralph 死于1854年)——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1830—1850年间任议院委员会主席。——第407页。
- 贝尔纳·奥斯本,拉尔夫(Bernal Osborne, Ralph 1808—1882)——英国自由派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海军部秘书长(1852—1858)。——第556、557页。
- 贝克莱,弗兰西斯·亨利·菲茨哈丁(Berkeley, Francis Henry Fitzhardinge 1794—1870)——英国自由主义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第396页。
- 贝利耶,比埃尔·安都昂(Berryer, Pierre Antoine 1790—1868)——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正统主义者。——第151、168、187、194、196、198、202页。
- 贝克尔(Becker, B.)——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是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成员。——第646页。
- 贝克尔,海尔曼·亨利希(Becker, Hermann Heinrich 1820—1885)——德国法学家和政论家,1850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五年有期徒刑;后来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241、242、461、493、526、529页。
- 贝克曼(Beckmann)——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是巴黎的普鲁士警探:“科伦日报”驻巴黎记者。——第481页。
- 贝里尼,文钦佐(Bellini, Vincenzo 1801—1835)——著名的意大利作曲家。——第269页。
- 贝凯拉特,海尔曼(Beckerath, Hermann 1801—1870)——德国银行家,莱茵省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1848年8—9月任帝国政府的财政大臣。——第350页。
- 贝尔姆巴赫,阿道夫(Bermbach, Adolf 1821—1875)——科伦的法学家,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证人,与马克思有通信来往;后来成为自由派。——第490、493、494、498页。
- 贝雷斯福德,威廉(Beresford, William 生于1798年)——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军务大臣(1852年3—12月)。——第392、400、547页。
- 杜朗,鲁道夫(Dulon, Rudolph 1807—1870)——德国牧师,反官方教会的“光明之友”运动的拥护者;1853年流亡美国。——第312、325、326页。
- 杜班,安得列·玛丽·让·雅克(Dupin, André Marie Jean Jacques 1783—1865)——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派,制宪议会议员(1848—1849)和立法议会议长(1849—1851),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175、180页。
- 杜普拉,巴斯噶(Duprat, Pascal 1815—1885)——法国政治活动家,记者,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反对路易·波拿巴。——第181、182页。

- 杜沙特尔, 沙尔 (Duchâtel, Charles 1803—1867)——法国国家活动家, 奥尔良派, 警任内务大臣 (1839—1840, 1840—1848年2月)。——第195、311页。
- 克奥, 威廉·尼古拉斯 (Keogh, William Nicolas 1817—1878)——爱尔兰的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属于皮尔派; 议会中爱尔兰集团的领袖之一, 多次担任爱尔兰最高司法职务。——第556、558、560、587页。
- 克鲁格, 威廉·特劳戈特 (Krug, Wilhelm Traugott 1770—184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第346页。
- 克鲁马赫, 弗里德里希·威廉 (Krummacher, Friedrich Wilhelm 1796—1868)——德国传教士, 加尔文教派牧师, 乌培河谷的虔诚派首领。——第278页。
- 克雷通, 尼古拉·约瑟夫 (Creton, Nicolas-Joseph 1798—1864)——法国律师;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奥尔良派。——第193页。
- 克雷格, 威廉·基卜生 (Craig, William Gibson 1797—1878)——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曾任财政部部务委员 (1846—1852)。——第407页。
- 克雷门特, 克努特·荣克博恩 (Clement, Knut Jungbohn 1803—1878)——德国历史学家和语言学者, 基尔大学教授。——第330页。
- 克纳普, 阿尔伯特 (Knapp Albert 1798—1864)——德国诗人。著有许多教会颂歌和圣歌, 虔诚主义者。——第268、290页。
- 克鲁斯, 阿道夫 (Cluß, Adolph 死于1889年之后)——德国工程师,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年是美因兹工人教育协会的书记, 1849年流亡美国; 在五十年代和马克思、恩格斯经常通信, 曾为德国、英国和美国的许多民主报纸撰稿。——第643页。
- 克莱因, 约翰·雅科布 (Klein, Johann Jakob 约生于1818年)——科伦医生,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之一; 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第241页。
- 克莱因, 尤利乌斯·列奥波特 (Klein, Julius Leopold 1810—1876)——德国剧作家和戏剧批评家, 青年黑格尔派。——第354页。
- 克劳伦, 亨利希 (Clauren, Heinrich 1771—1854) (卡尔·霍伊恩的笔名)——德国作家, 著有一些感伤主义的小说。——第270、278页。
- 克劳塞维茨, 卡尔 (Clausewitz, Karl 1780—1831)——普鲁士将军和资产阶级最大的军事理论家; 1812—1814年在俄国陆军服务。——第323页。
- 克拉伦登伯爵, 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韦利尔斯 (Clarendon,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 1800—1870)——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后成为自由派; 曾任爱尔兰总督 (1847—1852), 残酷地镇压1848年爱尔兰起义; 外交大臣 (1853—1858、1865—1866和1868—1870)。——第559、611页。
- 克拉麦尔, 卡尔·哥特洛普 (Cramer, Karl Gottlob 1758—1817)——德国作家, 著有一些冒险小说。——第270页。
- 克伦威尔, 奥利弗 (Cromwell, Oliver 1599—1658)——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领袖, 从1653年起为英格兰、苏格

- 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第122、209、364页。
- 克兰沃斯男爵, 罗伯特·蒙西·罗尔夫 (Cranworth, Robert Monsey Rolfe 1790—1868)——英国国家活动家和法学家, 辉格党人, 曾任大法官 (1852—1858和1865—1866)。——第603页。
- 克罗弗德, 威廉·舍尔曼 (Crawford, William Sherman 1781—1861)——爱尔兰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 支持宪章派; 曾参与创办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 议会议员。——第587页。
- 克罗斯利, 弗兰西斯 (Crossley, Francis 1817—1872)——英国厂主, 资产阶级激进派, 议会议员。——第393、397页。
- 克罗狄乌斯 (Claudius 公元前10—公元前54)——罗马皇帝 (41—54)。——第586页。
- 克罗斯勒 (Krausler)——普鲁士教授,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陪审员。——第462页。
- 克洛普什托克, 弗里德里希·哥特利勃 (Klopstock, Friedrich Gottlieb 1724—1808)——德国诗人, 德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初期的代表人物之一。——第261页。
- 希尔施, 威廉 (Hirsch, Wilhelm)——汉堡的店员,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伦敦的普鲁士警探。——第447、452—455、495—500、508—511、513、515、516、527、528页。
- 利奥, 亨利希 (Leo, Heinrich 1799—1878)——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 极端反动的政治和宗教观点的维护者, 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思想家之一。——第326页。
- 利物浦伯爵, 罗伯特·班克斯·詹金森 (Liverpool, Robert Banks Jenkinson 1770—1828)——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领袖之一, 多次担任内阁职务, 曾任首相 (1812—1827)。——第583页。
- 利法特—帕沙 (Rifaat—Pascha 1798—1855)——土耳其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1853年任外交大臣。——第630页。
- 李嘉图, 大卫 (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之一。——第617、619页。
- 李伯尼, 亚诺什 (Libényi, János 约1832—1853)——匈牙利的裁缝帮工, 曾于1853年谋刺奥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第599、624页。
- 李卜克内西, 威廉 (Liebknecht, Wilhelm 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造人和领袖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496—499、505、510、511、642、643、645页。
- 庇护九世 (Pius IX 1792—1875)——罗马教皇 (1846—1878)。——第158、161页。
- 辛凯尔迪, 卡尔·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 (Hinckeldey, Karl Ludwig Friedrich 1805—1856)——普鲁士政府官员, 从1848年起为柏林警察总监。——第518页。
- 孚赫, 茹尔 (尤利乌斯) (Faucher, Julius 1820—1878)——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派; 贸易自由派的拥护者, 五十年

- 代初叶宣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观点,1850—1861年流亡英国;后成为进步党人。——第354—356页。
- 伽利略,伽利莱(Galilei, Galileo 1564—1642)——伟大的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力学原理的创造人,为先进的世界观而斗争的战士。——第535页。
- 穷汉瓦尔特(或穷汉高蒂耶)(死于1096年)——法国骑士,第一次十字军远征(1096—1099)时法国农民支队中的统率者之一。——第364页。
- 邦迪埃拉兄弟,阿提利奥(1810—1844)和埃米利奥(1819—1844)(Bandiera, Attilio and Emilio)——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奥地利舰队的军官,“青年意大利社”的成员;因企图在卡拉布里亚发动起义被处死(1844)。——第334页。
- 坎宁,乔治(Canning, George 1770—1827)——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托利党领袖之一;曾任外交大臣(1807—1809, 1822—1827),首相(1827)。——第230、583页。
- 但丁·阿利格埃里(Dante Alighieri 1265—1321)——伟大的意大利诗人。——第628页。
- 里士满公爵,查理·伦诺克斯-戈登(Richmond, Charles Gordon-Lennox 1791—1860)——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保护关税派。——第598页。
- 劳贝,赛米尔(Laube Samuel)——德国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第480页。
- 苏,欧仁(Sue, Eugene 1804—1857)——法国作家,著有一些小市民的感伤的社会小说,为立法会议员(1850—1851)。——第169、515页。
- 苏路克,法斯廷(Soulouque, Faustin 约1782—1867)——黑人的海地共和国总统,1849年自封为皇帝,号称法斯廷一世。——第226页。
- 苏格拉底(Sokrates 公元前约469—399)——古希腊哲学家,奴隶主贵族思想家。——第304页。
- 来丁,科斯莫斯·达米安(Leiden, Kosmos Damian)——科伦商人,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第462页。

八 画

- 佩罗,本扎曼·比埃尔(Perrot, Benjamin Pierre 1791—1865)——法国将军,1848年参加镇压六月起义,1849年统率巴黎国民自卫军。——第185页。
- 佩吉特,克拉伦斯·爱德华(Paget, Clarence Edward 1811—1895)——英国军事和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1852年为军械总长秘书。——第407页。
- 佩尔采尔,摩里茨(Perczel, Moritz 1811—1899)——匈牙利将军,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1851年流亡英国。——第68、71、74页。
- 帕金顿,约翰·索美塞特(Pakington, John Somerset 1799—1880)——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保守党人;陆军和殖民大臣(1852),海军首席大臣(1858—1859和1866—1867)和陆军大臣(1867—1868)。——第539页。
- 帕麦尔,朗德尔(Palmer, Roundell 1812—1895)——英国国家活动家,皮

- 尔派,后成为自由派;曾任大法官(1872—1874和1880—1885)。——第407页。
- 帕拉茨基,弗兰蒂舍克(Palacký, František 1798—1876)——捷克大历史学家,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派;1848年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主席;执行保护哈布斯堡王朝的政策。——第54页。
-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1784—1865)——英国国家活动家,最初是托利党人,1830年起为辉格党的领袖之一,依靠该党右派;曾任外交大臣(1830—1834, 1835—1841和1846—1851),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和1859—1865)。——第228、237、412、414、434、435、537、538、551—554、558、575、621、625、627页。
- 金,彼得·约翰·洛克(King, Peter John Locke 1811—1885)——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议会议员。——第238、396页。
- 金克尔,约翰娜(Kinkel, Johanna 1810—1858)(父姓为莫克尔)——德国女作家,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之妻。——第264、271、275、277、279—283、290、293—295、299、349—351页。
- 金克尔,哥特弗利德(Kinkel, Gottfried 1815—1882)——德国诗人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被普鲁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后越狱逃跑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第261—300、316、329、337—340、343—352、355、362、367—377、379、380、520、525、526页。
- 波拿巴,路易——见拿破仑第三。
- 波拿巴,日罗姆(Bonaparte, Jérôme 1784—1860)——拿破仑第一之弟,威斯特伐里亚国王(1807—1813),1850年起任元帅。——第413页。
- 波拿巴,比埃尔(Bonaparte, Pierre 1815—1881)——拿破仑第三之堂弟;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属共和派。——第413页。
- 波拿巴王朝——法国帝国王朝(1804—1814, 1815, 1852—1870)。——第216—219、604页。
- 波旁王朝——法国的王朝(1589—1792, 1814—1815和1815—1880)。——第140、149、191、192、194、195、197、216页。
- 波林尼雅克,奥古斯特·茹尔·阿尔芒·玛丽(Polignac, Auguste-Jules-Armand-Marie 1780—1847)——公爵,法国复辟时期的国家活动家,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曾任外交部长和内阁总理(1829—1830)。——第196页。
- 迪茨,奥斯渥特(Dietz, Oswald 约1824—1864)——维斯巴登的德国建筑师,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曾流亡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是这个集团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后来参加美国内战。——第339、446、452、467—469、475、479、481、483、489、494、497、498、526页。
- 迪斯累里,本杰明,贝肯斯菲尔德伯爵(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后成为保守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 1858—1859和1866—1868),内阁首相(1868和

- 1874—1880)。——第406、424、537—540、543、548—551、555、556、597、599、604—608页。
- 罗素, 约翰 (Russell, John 1792—1878) ——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领袖, 曾任首相 (1846—1852和1865—1866), 外交大臣 (1852—1853和1859—1865)。——第237—240、386、393、407、434—439、441、537、553、558、559、582、595—597、603、608—611页。
- 罗泰克, 卡尔 (Rotteck, Karl 1775—1840) ——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派。——第15—16、25、303—305、325、348页。
- 罗伊特, 麦克斯 (Reuter, Max)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普鲁士在伦敦的警探。——第452、454、469、525页。
- 罗赫纳, 格奥尔格 (Lochner, Georg 约生于1824年) ——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职业是木工;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支持者。——第642、643、645页。
- 罗霍夫, 古斯塔夫·阿道夫 (Rochow Gustav Adolf 1792—1847) ——反动的普鲁士容克地主的代表人物; 普鲁士的内务大臣 (1834—1842)。——第478页。
- 罗宾逊, 弗雷德里克·约翰, 葛德里奇子爵 (Robinson, Frederick John, Viscount Goderich 1782—1859)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23—1827年任财政大臣和首相 (1827—1828)。——第423页。
- 罗伊希林, 约翰 (Reuchlin, Johann 1455—1522) ——德国学者, 语言学家和法学家, 人文主义的著名代表。——第312页。
- 罗森勃鲁姆, 爱德华 (Rosenblum, Edward) ——德国大学生,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起义失败后逃离德国。——第324页。
- 罗伯斯比尔, 马克西米利安 (Robespierre, Maximilien 1758—1794)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的活动家, 雅各宾派领袖, 革命政府的首脑 (1793—1794)。——第121、122、340页。
- 拉特 (Rath) ——科伦厂主,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陪审员。——第462页。
- 拉沃, 弗兰茨 (Raveaux, Franz 1810—1851) ——德国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是科伦出席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中间派左翼; 驻瑞士的帝国专员, 1849年6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 巴登临时政府委员, 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逃离德国。——第377、379页。
- 拉托, 让·比埃尔 (Reteau, Jean Pierre 1800—1887) ——法国律师,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波拿巴主义者。——第142页。
- 拉伊特, 让·厄内斯特 (La Hitte, Jean Ernest 1789—1878) ——法国将军, 波拿巴主义者, 立法议会议员 (1850—1851), 曾任外交部长 (1849—1851)。——第168页。
- 拉图尔, 泰奥多尔 (Latour, Theodor 1780—1848) ——伯爵, 奥地利国家活动家, 君主专制的拥护者; 1848年任陆军大臣; 1848年10月为维也纳起义者所杀。——第68页。

- 拉马丁, 阿尔丰斯 (Lamartine, Alphonse 1790—1869)——法国诗人, 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四十年代为资产阶级共和派; 1848任外交部长, 是临时政府的实际上的首脑。——第189、296、321页。
- 拉德茨基, 约瑟夫 (Radetzky, Joseph 1766—1858)——伯爵, 奥地利元帅, 1831年起指挥在意大利北部的奥地利军队, 1648—1849年残酷镇压意大利的革命民族解放运动; 1850—1856年任伦巴第—威尼斯王国总督。——第59、66、67、70、600、621页。
- 拉多维茨, 约瑟夫 (Radowitz, Joseph 1797—1853)——普鲁士将军和国家活动家, 权奸的代表人物; 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右派的领导人之一。——第347页。
- 拉莫里诺, 吉罗拉莫 (Ramorino, Gerolamo 1792—1849)——意大利将军, 1834年领导由马志尼组织的流亡革命者向萨瓦的进攻; 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时期指挥皮蒙特军队, 采取判变的策略, 使反革命的奥地利军队获得了胜利。——第332页。
- 拉摩里西尔, 克利斯托夫·路易·莱昂 (Lamoricière, Christophe—Louis—Léon 1806—1865)——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 1848年积极参加镇压六月起义, 后来是卡芬雅克政府的陆军部长 (6—12月),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第147、209页。
- 拉罗施夫柯: 弗朗斯瓦 (La Rochefoucauld, François 1613—1680)——公爵, 法国道德主义作家, 弗伦特党的活动家之一。——第475页。
- 拉罗什雅克兰, 昂利·奥古斯特·若尔日 (La Rochejaquelein, Henri Auguste George 1805—1867)——侯爵, 法国政治活动家, 贵族院议员, 正统派领袖之一,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宪会议员; 后为第二帝国的参议员。——第196页。
- 阿勒, 路易·比埃尔·孔斯坦 (Allais, Louis—Pierre—Constant 约生于1821年)——法国警探。——第175、180页。
- 阿伊, 比埃尔·德 (Ailly, Pierre d' 1350—1420或1425)——法国红衣主教, 著名的神学家; 是君士坦士宗教会议的重要人物。——第224页。
- 阿姆洛·德·拉·乌赛, 尼古拉 (Amelot de la Houssaye, Nicolas 1634—1706)——法国政论家, “威尼斯政府分史”一书的作者。——第586页。
- 阿尔宁, 蓓蒂娜 (Arnim, Bettina 1785—1859)——德国浪漫派女作家, 在四十年代迷醉于自由主义思想。——第276页。
- 阿托尔公爵, 乔治·奥古斯特·弗雷德里克·约翰·马利 (Atholl, George Augustus Frederic John Murray 1814—1864)——苏格兰的大地主。——第576页。
- 阿伯丁伯爵, 乔治·戈登 (Aberdeen, George Gordon 1784—1860)——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从1850年起为皮尔派领袖, 曾任外交大臣 (1828—1830, 1841—1846) 和联合内阁首相 (1852—1855)。——第553—557、560、584、587、595、598、603、627页。
- 阿伯拉罕·圣克拉 (Abraham a Santa Clara 1644—1709) (乌尔利希·梅格勒 Ulrich Megerle 的笔名)——奥地利天主教传教士和通俗滑稽作品作家。

- 第369—371页。
- 阿尔康纳蒂·维斯康蒂, 康斯坦扎 (Arconati Visconti, Constanca 约1801—1870)——侯爵夫人,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女活动家。——第414页。
- 阿里欧斯托, 洛多维科 (Ariosto, Lodovico 1474—1533)——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杰出的诗人, “疯狂的罗兰”一诗的作者。——第317、318、324、349、350、366、377页。
- 阿哥斯提尼, 切扎列 (Agostini, Cesar 1803—1855)——意大利革命家, 马志尼的信徒; 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 后来脱离马志尼。——第601页。
- 阿革西拉乌斯 (Agesilaus 约公元前442—358)——斯巴达皇帝(约公元前399—358)。——第190页。
- 舍尔曼·克罗弗德——见克罗弗德, 威廉·舍尔曼。
- 舍尔瓦尔, 茹利安 (Cherval, Julien) (真名约瑟夫·克列美尔)——普鲁士警察局奸细, 曾钻进共产主义者同盟队伍, 同盟分裂后曾领导一个巴黎支部。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为1852年2月所谓的巴黎德法密谋案的被告之一, 在警察当局帮助下被放出监狱。——第452、472、474—489、508、510、525、531、533、536页。
- 奈, 埃德加尔 (Ney, Edgar 1812—1882)——法国军官, 波拿巴主义者, 路易·波拿巴总统的侍卫官, 立法议会的议员(1850—1851)。——第161页。
- 奈特, 路德维希·亨利希 (Nette, Ludwig Heinrich 约生于1819年)——汉诺威的裁缝, 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支部之一
- 的成员, 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1852年2月所谓巴黎德法密谋案的被告之一。——第486、536页。
- 奈斯密斯, 詹姆斯 (Nasmyth, James 1808—1890)——英国工程师和发明家。——第562页。
- 法农 (Fanon)——法国流亡者,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协会委员会委员。——第339页。
- 法济, 让·雅克 (詹姆斯) (Fazy, Jean—Jacques (James) 1794—1878)——瑞士国家活动家和政论家, 激进派, 曾任日内瓦州政府首脑(1846—1853和1855—1861)。——第305页。
- 法卢, 阿尔弗勒德 (Falloux, Alfred 1811—1886)——法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 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 1848年解散国家工厂的发起者和镇压巴黎六月起义的鼓吹者,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曾任教育部长(1848—1849)。——第147、161、162、196、198页。
- 明克斯, 弗·(Münks, F.)——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伦敦的德国流亡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第642、643、645页。
- 明克斯第二 (Münks II)——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伦敦的德国流亡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第642、643、645页。
- 明希—贝林豪森, 弗兰茨·泰奥多尔 (Munch—Bellinghausen, Franz Teodor 生于1787年)——男爵, 普鲁士官吏,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第462、533页。
- 尚博尔, 昂利·沙尔 (Chambord, Henri

- Charles 1820—1883)——伯爵,波旁王室长系的最后代表,查理十世之孙,法国王位追求者,自封亨利五世。——第151、173、194、198页。
- 尚加尔涅,尼古拉·安·德奥杜尔(Changarnier, Nicolas Anne Théodule 1793—1877)——法国将军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保皇派;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年6月以后为巴黎卫戍部队和国民自卫军司令,曾参加驱散巴黎1849年6月13日的示威游行。——第54、142—144、147、153、158、159、175—177、180、183—187、190、196、199、205、208、209页。
- 弥勒,弗兰茨·约瑟夫(Müller, Franz Joseph)——科伦法律顾问,保守党人,是罗兰特·丹尼尔斯的岳父。——第497页。
- 昂格勒斯,弗朗斯瓦·厄内斯特(Anglès, François Ernest 1807—1861)——法国地主,立法会议员(1850—1851),秩序党的代表人物。——第199页。
- 雨果,维克多(Hugo, Victor 1802—1885)——伟大的法国作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的议员。——第162页。
- 林格斯(Rings)——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流亡伦敦,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第496—499、505、512、642、643、645页。
- 图克,托马斯(Tooke, Thomas 1774—1858)——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倾向于古典学派,曾抨击李嘉图的货币论。——第422页。
- 叔尔茨,卡尔(Schurz Karl 1829—1906)——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曾流亡瑞士,后为美国国家活动家。——第279、296、337、338、362、367—373、379页。

九 画

- 施皮斯,克利斯提安·亨利希(Spieß, Christian Heinrich 1755—1799)——德国作家,著有一些消遣小说。——第270页。
- 施米茨(Schmitz)——科伦私人文书,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人。——第497、499页。
- 施拉姆,让·保尔·亚当(Schramm Jean—Paul—Adam 1789—1884)——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曾任陆军部长(1850—1851)。——第177页。
- 施拉姆,康拉德(Schramm, Konrad 约1822—1858)——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从1849年起流亡伦敦,“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发行人,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期支持马克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482、483、635、641页。
- 施拉姆,鲁道夫(Schramm, Rudolph 1813—1882)——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普鲁士国民会议员,属于左派,革命后流亡英国;反对马克思;六十年代时拥护俾斯麦。——第301、302、306、316、339、343、373、377页。
- 施瓦策,恩斯特(Schwarzer, Ernst 1808—1860)——奥地利官员和政论

- 家,曾任公共工程大臣(1848年7—9月)。——第67页。
- 施泰因,罗仑兹(Stein, Lorenz 1815—1890)——德国法学家,普鲁士政府的密探,“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的作者。——第533、534页。
- 施泰翰,哥特利勃·路德维希(Stechan, Gottlieb Ludwig 约生于1814年)——汉诺威的细木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从1851年12月起又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从1852年1月起领导伦敦工人协会。——第496页。
- 施塔耳,阿道夫·威廉·泰奥多尔(Stahr Adolf Wilhelm Theodor 1805—1876)——德国作家,著有一些历史小说和一些有关文学艺术史问题的学术著作。——第295页。
- 施蒂纳,麦克斯(卡斯巴尔·施米特的笔名)(Stirner, Max 1806—1856)——德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之一。——第312页。
- 施梯伯,威廉(Stieber, Wilhelm 1818—1882)——普鲁士警官,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伦案件的组织者之一,并且是这个案件(1852)的主要证人;与维尔穆特合编“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后为普鲁士政治警察局长。——第431、446、447、451、453、454、462—464、468—511、513、519、525、530—533页。
- 施梯维,约翰·卡尔·贝尔特拉姆(Stüve, Johann Karl Bertram 1798—1872)——德国政治活动家,自由派,曾任汉诺威内务大臣(1848—1850)。——第15页。
- 施伦巴赫,卡尔·阿尔诺德(Schlönbach, Carl Arnold 1807—1866)——德国诗人,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朋友。——第280页。
- 施塔迪昂·弗兰茨(Stadion, Franz 1806—1853)——伯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反对加里西亚和捷克民族解放运动斗争的组织者之一,曾任内务大臣(1848—1849)。——第78页。
- 施瑙费尔,卡尔·亨利希(Schnaufer, Karl Heinrich 1823—1854)——德国诗人和记者,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逃离德国。——第324页。
-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Strauß, David Friedrich 1808—1874)——德国哲学家和政论家,著名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子之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283、306页。
- 施特罗特曼,阿道夫(Strodtmann, Adolf 1829—1879)——德国作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50年逃离德国。——第261、276—279、281、285、295、337、338、362页。
- 施瓦尔岑堡,费里克斯(Schwarzenberg, Felix 1800—1852)——公爵,奥地利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1848年10月维也纳革命被镇压后担任首相和外交大臣职务。——第40页。
- 施泰因根斯,祖伊特倍尔特·亨利希·海耳曼(Steingens, Suitbert Heinrich Herman 约生于1817年)——德国工人,油漆匠,布鲁塞尔德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

- 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原告证人。——第493、526页。
- 施奈德尔第二,卡尔(Schneider II, Karl)——德国法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科伦民主协会主席和民主主义者莱茵区部委员会委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9年2月7日“新莱茵报”案件的被告人;1849年2月8日民主主义者莱茵区部委员会案的被告;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派;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辩护人。——第447、485、497、504、506、508、509、515、519页。
- 威尔逊,乔治(Wilson, George 1808—1870)——英国厂主和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反谷物法同盟的主席(1841—1846)。——第589页。
- 威廉斯,泽芬奈阿(Williams, Zephaniah 约1794—1874)——宪章派,1839年威尔士矿工起义的组织者之一;被判终身流放澳大利亚。——第396、439页。
- 威廉一世(Wilhelm I 1781—1864)——维尔腾堡国王(1816—1864)。——第101页。
- 威廉一世(Wilhelm I 1797—1888)——普鲁士王储,普鲁士国王(1861—1888),德国皇帝(1871—1888)。——第376页。
- 威廉四世(Wilhelm IV 1765—1837)——英国国王(1830—1837)。——第630页。
- 威灵顿公爵,阿瑟·威尔斯里(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1769—1852)——英国统帅,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首相(1828—1830),外交大臣(1834年12月—1835年4月)。——第228、426、428页。
- 威灵顿公爵,阿瑟·理查·威尔斯里,杜埃罗侯爵(Wellington, Arthur Richard Wellesley, Marquis of Douro 1807—1884)——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前者之子。——第428页。
- 威克菲尔德,爱德华·吉本(Wakefield, Edward Gibbon 1796—1862)——英国国家活动家,经济学家,曾制定资产阶级的殖民理论。——第558页。
- 威斯特华伦,斐迪南·冯(Westphalen, Ferdinand von 1799—1876)——普鲁士国家活动家,曾任内务大臣(1850—1858),反动派;马克思夫人(燕妮·马克思)的异母哥哥。——第602页。
- 济格尔,弗兰茨(Sigel, Franz 1824—1902)——巴登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曾任总司令,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期为巴登革命军副总司令;后流亡瑞士和英国;1852年迁居美国,站在北军方面积极参加美国内战;是济格尔,阿尔伯特之兄。——第108、354、356—359、362、367、369、372、373、376—378页。
- 济格尔,阿尔伯特(Sigel, Albert 1827—1884)——巴登军官,记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53年流亡美国,曾站在北军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373、377、378页。
- 哈克,约翰·卡尔(Haacke, Johann Carl 约生于1820年)——德国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第525页。
- 哈林,哈罗(Harring, Harro 1798—1870)

- 德国作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从1828年起曾间断地流亡各国。——第328—336页。
- 哈赛，利奥 (Hasse, Leo)——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朋友，酷爱诗文。——第280页。
- 哈贝克 (Habbegg)——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流亡英国。——第324页。
- 哈奇尔，约翰 (Hatchell, John 生于1788年)——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爱尔兰首席检察官 (1851—1852)。——第407页。
- 哈布斯堡王朝——指所谓神圣罗马帝国 (1273—1806年其间曾有间断) 皇帝、奥地利帝国 (1804年起) 皇帝和奥匈帝国 (1867—1918) 皇帝的王朝。——第600页。
- 查理一世 (Charles I 1600—1649)——英国国王 (1625—1649)，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593页。
- 查理大帝 (Charles the Great 约742—814)——法国国王 (768—800) 和皇帝 (800—814)。——第52页。
- 约丹，西尔韦斯特 (Jordan, Sylrester 1792—1861)——德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三十年代库尔吉塞立宪民主运动的领袖之一；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议会议员。——第15页。
- 约翰 (Johann 1782—1859)——奥地利大公，1848年6月至1849年12月是德意志帝国摄政王。——第48、64、100、103、104、111—113页。
- 约斯特·卡尔 (Joest, Karl)——科伦厂主，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陪审员。——第462页。
- 约瑟夫二世 (Joseph II 1741—1790)——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1765—1790)。——第33、34页。
- 勃朗，路易 (Blanc Louis 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1848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1848年8月流亡英国，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导人之一。——第6、121、340—343、639页。
- 勃鲁姆，罗伯特 (Blum, Robert 1807—1848)——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职业是记者；领导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左派；1848年10月参加维也纳保卫战；在反革命军占领维也纳后被杀害。——第78、79、89、340页。
- 勃律盖曼，卡尔·亨利希 (Brüggemann, Karl Heinrich 1810—1887)——德国资产阶级政论家，自由派；1845—1855年为“科伦日报”主编。——第316页。
- 洛克·金 (Locke King)——见金，彼得·约翰·洛克。
- 洛克，约翰 (Locke John 1632—1704)——杰出的英国二元论哲学家，感觉论者；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122页。
- 洛克，詹姆斯 (Loch, James 1780—1855)——苏格兰经济学家和律师，萨特伦德女公爵的财产管理人。——第573、574页。
- 洛林的昂利第二，吉兹公爵 (Henri II Lorraine, Guise 1614—1664)——弗伦特党活动家之一。——第226页。
- 科克，保尔·德 (Kock, Paul de 约1794—1871)——法国资产阶级作家，著有一些轻浮的消遣小说。——第311页。
- 科布顿，理查 (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

- 动家, 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 反谷物法同盟的创立者之一; 议会议员。——第236、327、537、544、577、580、581、605、616、622页。
- 科采布, 奥古斯特 (Kotzebue, August 1761—1819)——德国反动作家和政论家。——第273页。
- 科贝特, 威廉 (Cobbett, William 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卓越代表人物, 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进行斗争。——第580页。
- 科苏特, 拉约什 (路德维希) (Kossuth, Louis 1802—1894)——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在1848—1849年革命中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 匈牙利革命政府的首脑; 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利; 五十年代初期曾向波拿巴主义者集团求援。——第317、319、340、380、412—414、443、545、593、599、601、602、616、621、624页。
- 科特斯 (Koths, D.)——科伦商人, 民主主义者;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人。——第490—493、499页。
- 科勒特, 科勒特·多布森 (Collet, Collet Dobson)——英国激进派记者和社会活动家。——第630页。
- 科尔图姆, 卡尔·阿尔诺德 (Kortum, Karl Arnold 1745—1824)——德国诗人和作家; 以“约卜西之歌”一书而著名。——第327页。
- 科西迪耶尔, 马尔克 (Caussidiere, Marc 1808—1861)——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34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 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组织者之一; 1848年二月革命后担任巴黎警察局
- 长, 制宪议会议员, 1848年6月流亡英国。——第121页。
- 洪特海姆, 理查 (Hontheim, Richard 死于1857年)——科伦律师,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辩护人。——第498、504、506、508页。
- 耶拉契奇, 约西普 (Јелачић, Jellacic 1801—1859)——伯爵, 奥地利将军, 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和斯拉沃尼亚省总督(1848—1859), 积极参加镇压匈牙利和奥地利的1848—1849年革命。——第66、68、69、71、73、74页。
- 英格索尔, 约瑟夫 (Ingersoll, Joseph 1786—1868)——美国政治活动家, 美国国会议员, 曾任驻英大使(1852—1853)。——第560页。
- 律斯勒, 古斯塔夫·阿道夫 (Roesler, Gustav Adolf 1818—1855)——德国教员和记者, 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派; 1850年起流亡美洲。——第113页。
- 欧几里得 (Eukleides 公元前4世纪末—3世纪初)——杰出的古希腊数学家。——第631页。
- 柏拉图 (Platon 约公元前427—347)——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 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第619页。
- 派克, 约翰 (Parker, John 1799—1881)——英国政治活动家, 辉格党人, 曾任海军部秘书长(1841和1849—1852)。——第407页。
- 派西沃, 达德利·蒙特鸠 (Perceval, Dudley 1801—1856)——英国社会活动家, 托利党人。——第569页。
- 保路斯, 亨利希·艾伯哈特·哥特洛普 (Paulus, Heinrich Eberhard Gottlob 1761—1851)——德国新教神学家, 唯理论者。——第346页。

荣克尔曼 (Junkermann)——克雷弗尔得的警局督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证人。——第518、519页。

荣克-施梯林,约翰·亨利希 (Jung-Stilling, Johann Heinrich 1740—1817)——德国作家,虔诚主义者。——第276页。

十 画

格雷,查理 (Grey, Charles 1764—1845)——伯爵,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袖之一,曾任内阁首相(1830—1834)。——第393、583页。

格雷,乔治 (Grey, George 1799—1882)——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46—1852, 1855—1858和1861—1866)和殖民大臣(1854—1855)。——第407页。

格林,托马斯 (Greene, Thomas)——英国政治活动家,皮尔派,1846—1852年任议会议员。——第407页。

格莱夫 (Greif)——普鲁士警官,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伦敦普鲁士谍报机关的领导人之一。——第447、452—455、464、485—487、491、500、502、503、512、513、515—517、527页。

格拉安,詹姆斯·罗伯特·乔治 (Graham, James Robert George 1792—1861)——英国国家活动家,皮尔派,曾任内务大臣(1841—1846),海军首席大臣(1830—1834, 1852—1855)。——第386、410、537、538、548、553、558、582、604、607、608页。

格林兄弟,威廉和雅科布 (Grimm, Wilhelm und Jakob 1786—1859和1785—1863)——德国语言学家,柏林大学教授,著名的德国民间童话和中世纪叙事

诗的编撰者。——第319页。

格拉古,提比利乌斯·赛姆普罗尼乌斯 (Gracchus, Tiberius Sempronius 公元前163—133)——古罗马的护民官(公元前133年),曾为农民利益进行过争取实现土地法的斗争。——第122页。

格拉古,凯尤斯·赛姆普罗尼乌斯 (Gracchus, Caius Sempronius 公元前153—121)——古罗马的护民官(公元前123—122),曾为农民利益进行过争取实现土地法的斗争;提比利乌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之弟。——第122页。

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阿道夫 (Granier de Cassagnac, Bernard - Adolphe 1806—1880)——法国记者,无原则的政客,1848年革命前是奥尔良派,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帝国时期为立法团的代表。——第227页。

格伦维耳,威廉 (Grenville, William 1759—1834)——男爵,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内阁首相(1806—1807)。——第583页。

格隆尼希 (Grunich)——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流亡伦敦。——第324页。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派,十九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之一;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5和1859—1866)和内阁首相(1868—1874, 1880—1885, 1886, 1892—1894)。——第386、410、435、558、569、584页。

格尔哈特,约 (Gerhardt, J.)——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

- 初流亡美国,曾担任科伦被判罪者及其家属救济委员会主席。——第642、643页。
- 格贝尔特,奥古斯特(Gebert, August)——梅克伦堡的木匠,在瑞士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迁往伦敦,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并为该集团的中央委员。——第339、526、528页。
- 马提,卡尔(Mathy, Karl 1807—1868)——巴登政论家,官吏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自由派;1848—1849年曾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第358页。
- 马洪子爵,菲力浦·亨利·斯坦霍普(Mahon, Philip Henry Stanhope 1805—187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皮尔派,议会议员。——第407页。
- 马尔滕(malten)——普鲁士在国外的间谍。——第330页。
- 马克思,卡尔(Marx, Karl 1818—1883)(传记材料)。——第75、116、139、160、198、243、257、311、381、387、391、405、422、424、429—432、443—448、450、455、461、464—468、470、479—483、488—499、501、504—510、516、518—520、525、527、533、534、537、538、545、551、557、559、570、611、614、618、621、624—627、631、635—643、645页。
- 马志尼,朱泽培(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之一,1849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1850年是伦敦欧洲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五十年代初曾向波拿巴主义者集团求援。——第325—329、332—334、337—340、343、344、347、348、350、359、374、377、412—414、443、545、593、601、616、621、624、625页。
- 马尼扬,贝尔纳·比埃尔(Magnan, Bernard—Pierre 1791—1865)——法国将军,从1851年12月起是元帅,波拿巴主义者;参加镇压里昂(1831和1849)、利尔和鲁贝(1845)的工人起义和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立法会议员(1849—1851)1851年12月2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第197、206、209页。
- 马赞尼洛(Masaniello 1620—1647)(托马佐·安尼洛的绰号)——渔民,1647年那不勒斯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人民起义的领袖。——第208页。
- 马尔维尔,莱昂(Maleville, Léon de 1803—1879)——法国政治活动家,奥尔良派,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曾任内务部长(1848年12月下半月)。——第189页。
- 马斯特曼,约翰(Masterman, John 1782—1862)——英国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第407页。
- 马拉斯特,阿尔芒(Marrast, Armand 1801—1852)——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领袖之一,“国民报”编辑,1848年为临时政府委员和巴黎市长,制宪议会议长(1848—1849)。——第6、123、133、143页。
-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教士,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族的思想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人,宣传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第386、573、586页。

- 马基雅弗利, 尼古洛 (Machiavelli, Niccolò 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 历史学家和作家, 资本主义关系产生时期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第368、371页。
- 马尔海奈凯, 菲利浦·康拉德 (Marheineke, Philipp Konrad 1780—1846)——德国新教神学家和基督教史学家, 黑格尔派右翼。——第262页。
- 马姆兹伯里伯爵, 詹姆斯·霍华德·哈里斯 (Malmesbury, James Howard Harris 1807—1889)——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成为保守党著名的活动家; 曾任外交大臣 (1852和1858—1859)。——第539、555页。
- 海茵 (Hein)——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的成员。——第646页。
- 海德, 约翰·哥特弗利德 (Herder, Johann Gottfried 1744—1803)——德国哲学家、作家和文学理论家, 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 进步的文学派别“狂飚”的创始人之一。——第312页。
- 海涅, 亨利希 (Heine, Heinrich 1797—1856)——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第50、59、131、307、310、486页。
- 海瑙, 尤利乌斯·雅科布 (Haynau, Julius Jakob 1786—1853)——奥国元帅, 残酷镇压1848—1849年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运动。——第54页。
- 海布林, 冯·兰岑瑙尔 (Häbbling von Lanzenauer)——德国地主,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陪审员。——第462页。
- 海因岑, 卡尔 (Heinzen, Karl 1809—1880)——德国激进派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 曾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后流亡瑞士, 后来又流亡英国; 1850年秋最后迁居美国。——第311、312、317—322、337、338、348—350、359、377页。
- 海爾梅斯, 约翰·提摩泰乌斯 (Hermes, Johann Timotheus 1738—1821)——德国神学家和作家, 长篇小说“索菲娅从默麦尔到萨克森旅行记”的作者。——第317页。
- 海爾維格, 格奧爾格 (Herwegh, George 1817—1875)——著名的德国诗人,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第306页。
- 哥贝尔 (Göbel)——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陪审法庭庭长。——第488、509、533页。
- 哥林盖尔, 卡尔 (Göringer, Karl 约生于1808年)——巴登小酒店主, 曾参加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 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尔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在伦敦开设小酒店, 酒店成为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聚会之地。——第347、353页。
- 哥若夫斯基, 塔杰乌什 (Gorzowski, Thaddäus)——波兰流亡者, 波兰民主协会会员。——第413页。
- 恩格斯 (Engels)——科伦的德国新教牧师。——第281、282页。
-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 (传记材料)。——第10、14、24、25、46、61、64、75、90、105、115、237、251、256、311、429、430、445—448、450、461、467、505、525、534、635、641—643、645页。
- 拿破仑第一·波拿巴 (Napoléon I Bo-

- 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第8、20、28、109、121—123、138、174、176、209、213、215、218、219—223、225、227、230—232、242、250、256、356—359、556、599、608、629页。
-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拿破仑第一的侄子,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第115、117、121、123、124、126、131、132、138—144、146—148、151、153、157—164、167—169、172—178、180—192、195—202、205—214、216—229、241、243—251、252—256、412—414、435、443、580—582、585、594、597、604、605—608、623、630页。
- 乌迪诺,尼古拉·沙尔·维克多(Oudinot, Nicolas Chales Victor 1791—1863)——法国将军,奥尔良派,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9年曾指挥侵犯罗马共和国的军队;曾企图组织力量抵抗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第143、157、162页。
- 乌尔麦尔,约翰(Ulmer, Johann)——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流亡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第498、512、642、643、645页。
- 库克,乔治·温格罗夫(Cooke, George W ingrove 1814—1865)——英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和记者。——第383、384页。
- 库辛,维克多(Cousin, Victor 1792—1867)——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折衷主义者。——第122页。
- 埃卡留斯,约翰·格奥尔格(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1889)——德国裁缝工人,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后来参加英国工联主义运动。——第635、637、641—643、645页。
- 埃卡留斯,约翰·弗里德里希(Eccarius, Johann Friedrich)——德国裁缝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1年起流亡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的兄弟。——第642、643、645页。
- 埃斯科巴尔·伊·门多萨,安东尼奥(Esco-bar y M endoza, Antonio 1589—1669)——西班牙传教士,耶稣会教徒。——第558页。
- 席勒,弗里德里希(Schiller, Friedrich 1759—1805)——伟大的德国作家。——第175、181、274、533页。
- 席梅尔普芬尼希,亚历山大(Schimmel-pfennig, Alexander 1824—1865)——普鲁士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国外,加入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曾站在北军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337、362、368、371页。
- 倍克,威尔海明娜(Beck, Wilhelmina 死于1851年)——奥地利女冒险家,曾假充男爵夫人和科苏特的政治情报员;奥地利和英国警察局的密探。——第116页。
- 纽卡斯尔公爵,亨利·佩勒姆·费恩斯·佩勒姆—克林顿(Newcastle, Henry Pelham Fiennes Pelham—Clinton

- 1811—1864)——英国国家活动家,皮尔派,陆军和殖民大臣(1852—1854),陆军大臣(1854—1855)和殖民大臣(1859—1864)。——第434页。
- 特罗洛普,约翰(Trollope, John 生于1800年)——英国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第622页。
- 索麦维尔,威廉(Somerville, William 1802—1873)——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847—1852)。——第407页。
- 桑德利,玛丽·安(Sandry, Mary Ann 约1810—1853)——英国女工。——第614页。
- 夏米索,阿德尔贝特·冯(Chamisso, Adelbert von 1781—1838)——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反对封建的反动势力。——第147、268、290页。
- 爱德华兹,亨利(Edwards, Henry)——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1847—1852)。——第393、397页。
- 朗道夫(Landolphe)——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流亡伦敦;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加入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第341页。
- 泰霍夫,古斯塔夫·阿道夫(Techow, Gustav Adolph 1813—1893)——普鲁士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柏林1848年革命事件的参加者,普法尔茨革命军总参谋长,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是瑞士流亡者联合会“革命的集中”的领导人之一;1852年迁居澳洲。——第337、362、368页。
- 茹安维尔亲王,弗朗斯瓦·斐迪南·菲力浦·路易·玛丽·奥尔良公爵(Joinville, François-Ferdinand-Philippe-Louis-Marie, duc d'Orléans, prince de 1818—1900)——路易·菲力浦之子,1848年二月革命胜利后流亡英国。——第195、205页。

十一画

- 梅因,爱德华(Mein, Edward 1812—187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派;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后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354—356、362、370、371、374、377页。
- 梅特涅,克雷门斯(Metternich, Clemens 1773—1859)——公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反动派;曾任外交大臣(1809—1821)和首相(1821—1848),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第17、30—37、39、42、58、65、368页。
- 梅森豪泽,凯撒·温采尔(Messenhauser, Caesar Wenzel 1813—1848)——奥地利军官和著作家,1848年十月起义期间是国民自卫军司令和维也纳卫戍司令;城陷后为反革命军队杀害。——第72页。
- 梅兰希通,菲力浦(Melanchton, Philipp 1497—1560)——德国神学家,路德最亲密的助手,和路德一起竭力使新教适合诸侯的利益。——第369页。
- 梅洛斯拉夫斯基,路德维克(Mieroslawski, Ludwig 1814—1878)——波兰政治和军事活动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曾参加1846年波兹南起义的准备工作;1848年三月革命把他从监狱释放出来;1848年领导波兹南起义,后来领导西西里岛起义者的斗争;1849年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期间指挥革命军;五

- 十年代曾向波拿巴主义者集团求援；1863年波兰起义期间被任命为执政，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第109页。
- 理查兹·阿弗里德·倍特 (Richards, Alfred Bate 1820—1876)——英国剧作家，记者，反对科布顿和曼彻斯特派的和平主义。——第623页。
- 理查一世 (狮心理查) (Richard I, Löwenherz 1157—1199)——英国国王 (1189—1199)。——第296页。
- 理查三世 (Richard III 1452—1485)——英国国王 (1483—1485)。——第193页。
- 康德, 伊曼努尔 (Kant, Immanuel 1724—1804)——杰出的德国哲学家，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的创始人。——第283、578页。
- 康海姆, 麦克斯 (Cohnheim, Max)——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逃离德国。——第324页。
- 康瓦尔·路易斯, 乔治——见路易斯, 乔治·康瓦尔。
- 康普豪森, 卢道夫 (Camphausen, Ludolph 1803—1890)——德国银行家，莱茵省资产阶级领袖之一；1848年3—6月任普鲁士首相，奉行与反动派妥协的叛卖政策。——第42、46、54、80、301页。
- 莫罗, 让·维克多 (Moreau, Jean Victor 1763—1813)——法国将军，历次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各国联盟的战争的参加者。——第357页。
- 莫尔, 托马斯 (More, Thomas 1478—1535)——英国政治活动家，曾任大法官；人道主义作家，空想共产主义的最早代表人物之一，“乌托邦”一书的作者。——第575页。
- 莫帕, 沙尔勒曼-艾米尔 (Maupas, Charlemagne - Emile de 1818—1888)——法国律师，波拿巴主义者，巴黎警察局长 (1851)，1851年12月2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曾任警务总长 (1852—1853)。——第206、518页。
- 莫克尔 (Möckel)——见金克尔, 约翰娜。
- 莫斯累, 约翰·路德维希 (Mosle, John Ludwig 1794—1877)——德国军官，联邦议会的奥登堡代表；1848年被派到维也纳充当帝国专员。——第77页。
- 莫尔尼伯爵, 沙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 (Morny, Charles - Auguste - Louis - Joseph 1811—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立法会议员 (1849—1851)，1851年12月2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曾任内务部长 (1851年12月—1852年1月)。——第226、255页。
- 基什, 米克洛什 (Kiss, Miklos 生于1820年)——匈牙利军官，民主主义者，流亡者，科苏特在法国和意大利的代办。——第413页。
- 基佐, 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 (Guizot, 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1787—1874)——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1840年至1848年二月革命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第122、136、195、196、214、227、494页。
- 基卜生, 托马斯·米尔纳 (Gibson, Thomas Milner 1806—1884)——英国国家活动家，自由贸易派，后成为自由主义者；曾任商业大臣 (1859—1865和1865—1866)。——第408、589、592页。
- 基安奈拉 (Chianella)——克雷弗尔得的

- 侍者,警察局谍报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见证人。——第518、519页。
- 勒麦,弗里德里希(Roemer, Friedrich 1794—1864)——维尔腾堡国家活动家,1848年前是第二议院的自由主义反对派的领袖之一,1848—1849年任维尔腾堡的司法大臣和首相,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第15、16、358页。
- 勒泽尔,彼得·格爾哈特(Röser, Peter Gorhardt 1814—1865)——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制雪茄烟工人;1848—1849年是科伦工人联合会副主席;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六年徒刑;后来倾向于拉萨尔派。——第461、525、536页。
- 勒夫洛,阿道夫·艾曼纽尔·沙尔(LeFlö, Adolphe-Emmanuel-Charles 1804—1887)——法国将军,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秩序党代表人物,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国防政府”的陆军部长(1870—1871)。——第144、209页。
-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曾任总理(1836, 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奥尔良派;共和国总统(1871—1873),摧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第144、151、153、168、187、195、196、199、202、205、208、209、605页。
- 梯尔科奈尔伯爵,约翰·德拉瓦尔·卡尔宾切尔(Tyrconnel, John Delaral Carpenter 约1790—1853)——英国贵族。——第586页。
- 荷马(Homerus)——传说中的古希腊叙事诗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第298页。
- 许茨(Schütz)——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巴登临时政府驻巴黎代表;后流亡英国。——第315页。
- 雪莱,约翰(Shelley, John 1808—1867)——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议会议员。——第622页。
- 密勒,约翰·马丁(Miller, Johan Martin 1750—1814)——德国诗人和作家,德国文学中的感伤主义的代表。——第261、265、270、276、277、295、296页。
- 陶森瑙,卡尔(Tausenau, Karl 1808—1873)——奥地利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左翼的卓越代表,1848年革命时期为维也纳民主联合会中央委员会首脑;1849年起流亡伦敦。——第343、369—372、375—377页。
-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伟大的英国作家。——第174、215、356页。
- 培尔西尼,让·日尔贝尔·维克多(Persigny, Jean-Gilbert-Victor 1808—1872)——伯爵,法国国家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立法会议员(1849—1851),1851年12月2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内务大臣(1852—1854和1860—1863)。——第190、205页。
- 曼托伊费尔,奥托·泰奥多尔(Manteuffel, Otto Theodor 1805—1882)——男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贵族官僚的代表;曾任内务大臣(1848—1850)和首相(1850—1858)。——第81、314页。
- 得比伯爵,爱德华·乔治·杰弗里·斯密斯·斯坦利(Derby, Edward George Geof-

- ferly Smith Stanley 1799—1869)——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领袖,后成为保守党领袖之一;曾任内阁首相(1852, 1858—1859 和 1866—1868)。——第 393、400、406、410、424—428、434—439、551、554—556、560、595页。
- 隐士彼得(或亚眠的彼得)(约 1050—1115)——法国僧侣和传教士,第一次十字军远征时(1096—1099)为农民自卫军的领袖之一。——第 364页。
- 盖格尔,威廉·阿尔诺德(Geiger, Wilhelm Arnold)——普鲁士警官,1848年任法院侦查员,后为科伦警察厅长。——第 490页。
- 盖米季,罗伯特·乔治(Gammage, Robert George 1815—1888)——宪章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鞍匠和皮鞋匠;“宪章运动史”一书的作者。——第 442页。
- 盖尔温努斯,格奥尔格·哥特弗利德(Gervinus, Georg Gottfried 1805—1871)——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自由派;1844年起在海得尔堡任教授;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第 26页。
- ## 十二画
- 舒耳茨(Schultz 死于 1852年)——科伦警察厅长,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伦案件的组织者之一。——第 462、496、519、531页。
- 舒勒尔(Schuler, J.L.)——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的会员。——第 645、646页。
- 凯撒(凯尤斯·尤利乌斯)(Caesar, Caius Julius 约公元前 100—44)——著名的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家。——第 122、304、329、374、586页。
- 凯克(Keck, V.)——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成员。——第 645、646页。
- 凯利,菲茨罗伊(Kelly, Fitzroy 1796—1880)——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第 611页。
- 凯特勒,阿道夫(Quetelet, Lambert-Adolphe-Jacques 1796—1874)——比利时资产阶级的大学者;统计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第 579、580页。
- 隆格,约翰奈斯(Ronge, Johannes 1813—1887)——德国教士,“德国天主教徒”运动的发起人之一,竭力利用天主教来为德国资产阶级服务;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第 312、343—346、349、369、372、373页。
- 隆加尔特,塞巴斯提安(Longard, Sebastian)——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之友,曾醉心于诗文;后为科伦律师。——第 280页。
- 菲尔登,约翰(Fielden, John 1784—1849)——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慈善家,工厂法的拥护者。——第 612页。
- 菲克勒尔,约瑟夫(Fickler, Joseph 1808—1865)——德国记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849年为巴登临时政府委员;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以后流亡英国。——第 354、356—358、369、372、373、375、377页。
- 菲尔施坦堡(Furstenberg)——男爵,普鲁士地主,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第 462、533页。

- 傅立叶, 沙尔 (Fourier, Charles 1772—1837)——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23页。
- 傅阿德—埃芬蒂 (Fuad-E ffendi 1814—1869)——土耳其国家活动家, 五十至六十年代曾多次任外交大臣和大维齐 (封建时代近东某些国家的高级官吏——译者注)。——第630页。
- 博雅多, 马提奥·马利阿 (Boiardo, Matteo Maria 1434—1494)——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诗人, “恋爱中的罗兰”一诗的作者。——第316、360、366、380页。
- 博马舍, 比埃尔·奥古斯丹 (Beaumarchais, Pierre Augustin 1732—1799)——杰出的法国剧作家。——第481页。
- 博布钦, 弗里德里希·亨利希·卡尔 (Bobzin, Friedrich Heinrich Karl 生于1826年)——德国手工业者, 1847年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会员,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流亡伦敦; 和司徒卢威一起领导伦敦德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协会。——第324页。
- 博纳德子爵, 路易·加布里埃尔·昂勃鲁阿兹 (Bonald, Louis Gabriel Ambroise 1754—1840)——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保皇派, 复辟时期的贵族反动派和教权主义反动派的思想家之一。——第18页。
-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代表, 客观唯心主义者, 最全面地探讨了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第16、121、125、262、274、279、306—310、320、328、346、468、578、579页。
- 黑克尔, 弗里德里希·卡尔 (Hecker, Friedrich Karl 1811—1881)——巴登的共和派,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年4月巴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 后又流亡美国, 曾站在北军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303页。
- 黑特采尔, 卡尔·约瑟夫·奥古斯特 (Haetzel, Karl Joseph August 约生于1815年)——德国皮鞋匠,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年8月柏林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小组案的被告之一, 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 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原告证人。——第493、526页。
- 黑尔特勒, 丹尼尔 (Hertle, Daniel 生于1824年)——德国记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1850年流亡美国。——第372页。
- 黑尔什塔德 (Herstadt)——科伦银行家,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陪审员。——第462页。
- 普芬德, 卡尔 (P fänder, Karl 约1818—1876)——德国工人, 小型精细画画家, 正义者同盟盟员,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积极活动家,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和朋友。——第635、641—643、645页。
- 普鲁茨, 罗伯特 (Prutz Robert 1816—1872)——德国诗人, 政论家和文学史家, 资产阶级自由派; 曾与青年黑格尔派有联系。——第310页。

- 普拉顿, 奥古斯特 (Platen, August 1796—1835)——德国诗人, 自由派。——第267页。
- 普卜利科拉 (普卜利乌斯·瓦列利乌斯·普卜利科拉) (Publicola (Publius Valerius Publicola) 约死于公元前50年)——罗马共和国半神话式的国家活动家。——第122页。
- 普鲁士亲王——见威廉一世。
- 费伦齐 (Ferenczi)——匈牙利女歌唱家。——第412页。
- 费特耳·冯·多根菲尔德, 安东 (Vetter von Doggenfeld, Anton 1803—1882)——匈牙利将军, 1848—1849年是科苏特的战友, 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利。——第412、413页。
- 费奈迭, 雅科布 (Venedey, Jakob 1805—1871)——德国激进政论家, 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1848—1849年革命后成为自由派。——第320页。
- 费尔巴哈, 路德维希 (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马克思以前德国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第283、306、312、315页。
- 斐迪南一世 (Ferdinand I 1793—1875)——奥地利皇帝 (1835—1848)。——第66—68、78页。
- 斐迪南二世 (Ferdinand II 1810—1859)——那不勒斯国王 (1830—1859), 由于1848年炮击墨西哥而得到“炮弹国王”的浑号。——第61页。
- 雅科比, 约翰 (Jacoby, Johann 1805—1877)——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左派的领导人之一; 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 属于极左派; 七十年代归属社会民主党。——第340页。
- 雅科比, 阿伯拉罕 (Jacobi, Abraham 生于1832年)——德国医生,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之一, 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 后流亡美国。——第241、242页。
- 斯密, 亚当 (Smith, 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大代表之一。——第572页。
- 斯普纳, 理查 (Spooner, Richard 1783—1864)——英国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议会议员。——第609页。
- 斯泰福侯爵, 乔治·格兰维耳·鲁森—高尔, 1833年起为萨特伦德公爵 (Stafford, Georges Granville Leveson-Gower 1758—1833)——苏格兰大地主。——第573页。
- 斯提芬斯, 约瑟夫·雷纳 (Stephens, Joseph Reiner 1805—1879)——英国教士, 1837—1839年曾积极参加郎卡郡的宪章运动。——第613页。
- 斯图亚特, 达德利勋爵 (Stuart, Lord Dudley 1803—1854)——英国政治活动家, 辉格党人, 议会议员; 曾与波兰君主制保守派流亡者集团有联系。——第621页。
- 斯图亚特, 詹姆斯 (Steuart, James 1712—178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重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第572页。
- 斯图亚特, 胡斯顿 (Stewart, Huston 1791—1875)——英国海军上将, 辉格党人, 曾任海军部常务委员 (1850—1852)。——第407页。
- 斯图亚特王朝 (Stuarts)——统治苏格兰 (1371年开始) 和英格兰 (1603—1649、

- 1660—1714) 的王朝。——第 571、572 页。
- 斯科菲尔德, 威廉 (Scholefield, William 1809—1867)——英国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 议会议员。——第 609 页。
- 斯特拉索尔多, 尤利乌斯·采萨尔 (Strassoldo, Julius Cäsar 1791—1855)——伯爵, 奥地利将军, 曾参加镇压 1848—1849 年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 1853 年是拉德茨基元帅助理。——第 600 页。
- 斯特拉斯堡的哥特弗利德 (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中世纪的德国诗人, 骑士诗“特里斯坦和伊卓尔达”的作者。——第 267、271 页。
- 莱纳德 (Renard)——科伦书法教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鉴定人。——第 518 页。
- 莱斯特尔 (Reistle)——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的成员。——第 645、646 页。
- 莱宁格尔, 约翰·格奥尔格 (Reininger, Johann Georg)——德国裁缝, 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支部之一的成员, 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1852 年 2 月是所谓巴黎德法密谋案的被告之一。——第 480 页。
- 莱布尼茨, 哥特弗利德·威廉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1646—1716)——伟大的德国数学家; 唯心主义哲学家。——第 468 页。
- 莱歇尔泽尔 (Reicherzer)——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的成员。——第 645、646 页。
- 提茨, 弗里德里希·威廉 (Tietz, Friedrich Wilhelm 约生于 1823 年)——德国裁缝,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 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第 480 页。
- 汤普逊, 托马斯·培伦涅特 (Thompson, Thomas Perronet 1783—1869)——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庸俗经济学家, 自由贸易派。——第 408 页。
- 富尔德, 阿希尔 (Fould, Achille 1800—1867)——法国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派, 后成为波拿巴主义者, 1849—1867 年曾多次任财政部长。——第 163、185、190、198 页。
- 琼斯, 威廉 (Jones, William 约 1808—1873)——英国钟表匠, 宪章主义者, 1839 年威尔士矿工起义的组织者之一; 被判终身流放澳大利亚。——第 396 页。
- 琼斯, 厄内斯特·查理 (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1869)——杰出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 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 “北极星报”编辑之一, “寄语人民”和“人民报”编辑;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393—397、399、441、556、642、643、645 页。

十三画

- 路德, 马丁 (Luther, Martin 1483—1546)——卓越的宗教改革活动家, 德国新教 (路德教) 的创始人, 德国市民阶级思想家, 在 1525 年农民战争时期, 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贫民。——第 121、369、491 页。
- 路易斯, 乔治·康瓦尔 (Lewis, George Cornewall 1806—1863)——英国国

- 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财政部秘书长 (1850—1852), 1855—1858年任财政大臣, 内务大臣 (1859—1861) 和陆军大臣 (1861—1863)。——第407页。
- 路易十四 (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 (1643—1715)。——第218页。
- 路易十五 (Louis XV 1710—1774)——法国国王 (1715—1774)。——第227页。
- 路易十六 (Louis XVI 1754—1793)——法国国王 (1774—1792),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18页。
- 路易十八 (Louis XVIII 1755—1824)——法国国王 (1814—1815 和 1815—1824)。——第122页。
- 路易-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 路易-菲力浦 (Louis Philippe 1773—1850)——奥尔良公爵, 法国国王 (1830—1848)。——第37、127、128、132—134、139、141、147、159、161、173、194、195、197、198、216、256、305、555、605页。
- 路易-菲力浦-阿尔伯, 奥尔良公爵, 巴黎伯爵 (Louis Philippe Albert)——国王路易-菲力浦的孙子, 法国王位追求者。——第193、194页。
- 路特希尔德, 安瑟伦 (Rothschild, Anselm 1773—1855)——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路特希尔德银行行长。——第22页。
- 路特希尔德, 拉约涅尔 (Rothschild, Lionel 1808—1879)——男爵, 伦敦路特希尔德银行行长; 辉格党人, 从1858年起为议会议员。——第597、610页。
- 奥托, 卡尔·乌尼巴特 (Otto, Karl W unibald 约生于1809年)——德国化学家, 1848—1849年为科伦工人取合会会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之一, 被判五年徒刑。——第241、242页。
- 奥斯本——见贝尔纳·奥斯本, 拉尔夫。
- 奥普尔, 阿尔丰斯·昂利 (Hautpoul, Alphonse Henri 1789—1865)——法国将军, 正统主义者, 立法会议员 (1849—1851), 陆军部长 (1849—1850)。——第163、168、176—178页。
- 奥古斯都 (Augustus, Gajus Cäsar Octavianus 公元前63年—公元14年)——罗马皇帝 (公元前27年—公元14年)。——第586页。
- 奥斯渥特, 欧根 (Oswald, Eugen 1826—1912)——德国记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逃离德国。——第324页。
- 奥康奈尔, 丹尼尔 (O'Connell, Daniel 1775—1847)——爱尔兰律师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民族解放运动自由派右翼领袖。——第320、410页。
- 奥本海姆, 亨利希·伯恩哈特 (Oppenheim, Heinrich Bernhard 1819—1880)——德国政治活动家, 经济学家和记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年是柏林“改革报”编辑之一, 1849—1850年流亡; 后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315、337、355、356、362、372、377页。
- 奥尔斯瓦特, 鲁道夫 (Auerswald, Rudolf 1795—1866)——普鲁士国家活动家, 与资产阶级相接近的自由贵族的代表, 曾任首相兼外交大臣 (1848年6—9月)。——第80页。

- 奥尔良王朝(Orléans)——法国王朝(1830—1848)。——第140、149、191、192、194、195、216、225、226页。
- 奥格斯滕堡家族——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公爵家族(1627—1852)。——第335页。
- 奥尔良公爵夫人叶列娜(父姓为梅克伦堡—施维林)(Orléans, d', (Hélène Louise Elisabeth) Duchesse 1814—1858)——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之长子斐迪南的孀妇,法国王位追求者巴黎伯爵的母亲。——第133、162页。
- 雷尼奥·德·圣让·丹热利,奥古斯特·米歇尔·埃蒂耶纳(Regnault de Saint-Jean d'Angély, Auguste-Michel-Etienne 1794—1870)——伯爵,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曾任陆军部长(1851年1月),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第185页。
- 雷缪扎,沙尔·弗朗斯瓦·玛丽(Rémusat, Charles-Francois Marie 1797—1875)——伯爵,法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奥尔良派,曾任内务部长(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外交部长(1871—1873)。——第186页。
- 詹姆斯一世(James I 1566—1625)——英国国王(1603—1625)。——第586页。
- 詹姆斯二世(James II 1633—1701)——英国国王(1685—1688)。——第593页。
- 塞万提斯·德·萨维德拉,米格尔(Cervantes de Saavedra, Miguel 1547—1616)——伟大的西班牙现实主义作家,——第19、77、332、336、366页。
- 瑟美列,贝尔塔兰(Szemere, Bertalan 1812—1869)——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曾任内务部长(1848)和革命政府首脑(1849);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利。——第601、621页。
- 塔西佗(普卜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Tacitus, Publius Cornelius 约55—120)——著名的罗马历史学家。——第327、586页。

十四画

- 维斯(Wiß, C.)——德国医生和记者,青年黑格尔派,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流亡美洲。——第351页。
- 维隆,路易·德吉烈(Véron, Louis-De-siré 1793—1867)——法国记者和政治活动家,1848年前是奥尔良派,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立宪主义者报”的所有主。——第227页。
- 维利提(Verity, E. A.)——英国教士。——第613页。
- 维莱尔,让·巴蒂斯特·赛拉芬·约瑟夫(Villèle Jean-Baptiste-Séraphin-Joseph 1773—1854)——伯爵,复辟时期的法国国家活动家,正统主义者,曾任内阁首相(1822—1828)。——第196页。
- 维迪尔,茹尔(Vidil, Jules)——法国军官,社会主义者,伦敦的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协会委员会委员;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发生联系。——第342页。
- 维利森,威廉(Willisen, Wilhelm 1790—1879)——普鲁士将军和军事理论家;1848年任王室驻波兹南专员,1850年统

- 率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军队对丹麦作战。——第363页。
- 维利希,奥古斯特(Willich, August 1810—1878)——普鲁士军官,因政治信仰退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是1850年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出来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1853年流亡美国,站在北军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257、291、339、340—343、347、351、362—368、372—377、379、464、466、468—470、472、476、479—481、488、520、521、525—528、635、639页。
- 维干德,奥托(Wigand, Otto 1795—1870)——德国的出版家和书商;在莱比锡开有书店,出版一些激进派作家的著作;1848—1849年曾参加萨克森的革命运动。——第312、314页。
- 维达尔,弗朗斯瓦(Vidal, François 1814—1872)——法国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1848年卢森堡委员会书记,立法会议员(1850—1851)。——第169页。
- 维尔穆特(Wermuth)——汉诺威警察厅长,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证人;与施梯伯合编“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第464、491、509、519页。
- 维埃伊拉(Vieyra)——法国上校,1851年任国民自卫军总部长官;波拿巴主义者,1851年12月2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第157页。
- 维多利亚(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第551、581页。
- 维尔利斯,查理(Villiers, Charles Pelham 1802—1898)——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家,自由贸易派,议会议员。——第537、557页。
- 维斯康蒂侯爵夫人——见阿尔康纳蒂·维斯康蒂,康斯坦扎。
- 福适,莱昂(Faucher, Léon 1803—1854)——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派,马尔萨斯派经济学家,曾任内务部长(1848年12月—1849年5月,1851),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169、190、195页。
- 福伦,奥古斯特·阿道夫·路德维希(Follen, August Adolf Ludwig 1794—1855)——德国政论家和诗人,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15年后参加反政府的学生运动;1821年流亡瑞士。——第321、326页。
- 福格特,卡尔(Vogt, Karl 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6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1849年逃离德国;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这本小册子(1860)中揭露他是路易·波拿巴的代理人。——第103页。
- 福克斯,威廉·约翰逊(Fox, William Johnson 1786—1864)——英国政治活动家,传教士,政论家,自由贸易派,后来属于自由党,议会议员。——第408页。
- 福隆德,维克多(Frond, Victor)——法国军官,1851年12月2日政变后被流放阿尔及利亚,后流亡比利时。——第594页。
- 赫斯,莫泽斯(Heß, Moses 1812—1875)——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四十年代

- 中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加入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六十年代是拉萨尔的拥护者。——第525页。
- 赫克，路德维希 (Heck, Ludwig 约生于1822年)——不伦瑞克的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第480页。
- 赫德，弗兰西斯 (Head, Francis 1793—1875)——英国殖民地的行政官，旅行家和作家。——第228页。
- 赫伯特，悉尼 (Herbert, Sidney 1810—1861)——英国国家活动家，初期是托利党人，后为皮尔派；曾任海军部秘书长 (1841—1845)，军务大臣 (1845—1848 和 1852—1855) 和陆军大臣 (1859—1860)。——第410页。
-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 (Proudhon, Pierre 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1848年为制宪议会议员。——第157页。
- 歌德，约翰·沃尔弗干格 (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126、262、265、266、271—273、281、296、354、534页。
- 蒙克，乔治 (Monk, George 1608—1670)——英国将军和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1660年曾积极促进英国恢复君主制。——第176页。
- 蒙塞耳，威廉 (Monseil, William 1812—1894)——爱尔兰政治活动家，自由派，议会中爱尔兰党团的领袖之一；1852—1857年为军械局秘书。——第556、558页。
- 蒙塔郎贝尔，沙尔 (Montalembert, Charles 1810—1870)——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奥尔良派，天主教党的首领；在1851年12月2日政变时支持路易·波拿巴。——第186、196、222页。
- 豪格，恩斯特 (Haug, Ernst)——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奥地利军官，1848—1849年意大利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宇宙”周报的编辑之一。——第325、343—350、372、373页。
- 豪克，路德维希 (Hauk Ludwig 1799—1850)——奥地利军官，民主主义者，1848年维也纳起义和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被杀害。——第346页。
- 豪普特，海尔曼·威廉 (Haupt, Hermann Wilhelm 约生于1831年)——德国店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被捕者之一，在审讯期间作了叛卖性的供述，审判前即被释放，逃往巴西。——第525页。
- 察贝尔，弗里德里希 (Zabel, Friedrich 1802—1875)——德国自由主义政论家，柏林“国民报”的编辑 (1848—1875)。——第354页。

十五画

- 摩莱，路易·马蒂约 (Molé, Louis-Mathieu 1781—1855)——伯爵，法国国家活动家，奥尔良派，曾任总理 (1836—1837, 1837—1839)，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第168、196页。

- 摩干, 弗朗斯瓦 (Mauguin, François 1785—1854)——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1848年革命前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的领袖之一;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倾向于右翼议员。——第179、180页。
- 摩尔根, 亨利 (Organ, Henry 死于1853年)——英国制针工人。——第566、567页。
- 摩耳斯沃思, 威廉 (Molesworth, William 1810—1855)——英国国家活动家, 自由派, 议会议员, 曾任公共工程大臣 (1853) 和殖民大臣 (1855)。——第556—558页。
- 鲁艾, 欧仁 (Rouher, Eugène 1814—1884)——法国国家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曾任司法部长 (1849—1852年间断地); 第二帝国时期担任过许多国家职务。——第179、180、190页。
- 鲁卡斯, 弗雷德里克 (Lucas, Frederick 1812—1855)——爱尔兰记者和政治活动家, 保障租佃者权利运动的领袖之一, 议会议员。——第559、591页。
- 鲁瓦埃—科拉尔, 比埃尔·保尔 (Royer-Collard, Pierre Paul 1763—1845)——法国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第122页。
- 德·梅斯特尔, 约瑟夫 (De Maistre, Joseph 1753—1821)——法国作家, 保皇派, 贵族的和教权主义反动派的思想家之一,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死敌。——第18页。
- 德拉·罗科 (Della Rocca)——意大利流亡者, 马志尼的战友。——第601页。
- 德穆兰, 卡米尔 (Desmoulins, Camille 1760—1794)——法国政论家, 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 右翼雅各宾党人。——第122页。
- 德朗克, 恩斯特 (Dronke, Ernst 1822—1891)——德国政论家, 最初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英国;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期间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 后来脱离政治活动。——第511—515、643、645页。
- 德弗洛特, 保尔 (De Flotte, Paul 1817—1860)——法国海军军官, 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布朗基主义者, 巴黎1848年5月15日事件和六月起义的积极参加者, 立法会议员 (1850—1851)。——第168页。
- 缅施科夫, 亚历山大·谢尔盖也维奇 (Менши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1787—1869)——公爵, 俄国军事和国家活动家, 1853年任驻土耳其特命全权大使, 曾任俄国克里木陆海军总司令。——第630页。
- 剑桥公爵, 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查理 (Cambridge,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Charles 1819—1904)——英国将军, 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 英国陆军总司令 (1858—1895)。——第397页。
- 赖德律—洛兰, 亚历山大·奥古斯特 (Ledru-Rollin, Alexandre Auguste 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领袖之一, “改革报”编辑; 1848年是临时政府成员, 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 1849年6月13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第6、54、133、

148、153、156、250、315、325、326、337—340、343、347、361—362、377页。

赖辛巴赫, 奥斯卡 (Reichenbach, Oskar 生于1815年)——伯爵, 西里西亚的地主,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 从1850年起流亡英国, 后来流亡美洲。——第343、362、368、371、379、527页。

墨尔本子爵, 威廉·拉姆 (Melbourne, William Lamb 1779—1848)——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曾任首相 (1834和1835—1841)。——第583、584页。

墨尔本子爵, 弗雷德里克·詹姆斯·拉姆 (Melbourne, Frederick James Lamb 1782—1853)——英国外交家。——第586页。

十六画

鲍威尔, 亨利希 (Bauer, Heinrich)——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职业是鞋匠; 1851年流亡澳大利亚。——第635、641页。

鲍威尔, 布鲁诺 (Bauer, Bruno 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最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 资产阶级激进派; 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278、306、309、315、326、327页。

鲍蒂扬尼, 拉约什 (路德维希) (Batthyany, Ludwig 1809—1849)——伯爵, 匈牙利国家活动家, 匈牙利贵族自由派集团的代表人物; 曾领导匈牙利政府 (1848年3—9月), 执行与奥地利君主制妥协的政策; 革命遭到镇压后被杀害。——第621页。

穆尔, 乔治·亨利 (Moore, George Henry

1811—1870)——爱尔兰政治活动家, 保障租佃者权利运动的领袖之一, 议会议员。——第560页。

穆罕默德—阿利 (Mohammed Ali 1769—1849)——埃及的统治者, 曾实行过许多次有利于埃及地主和商人的改革。——第573页。

霍纳, 莱昂纳德 (Horner, Leonard 1785—1864)——英国地质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曾任工厂视察员 (1833—1856), 维护工人利益。——第420、561、562页。

霍夫曼, 恩斯特·泰奥多尔·亚马多 (Hoffmann, Ernst Theodor Amadeus 1776—1822)——德国作家, 反动的浪漫主义者, 在他的作品中, 现实的因素和幻想、神秘主义以及对认识的不合理性的宣传纠缠在一起。——第272页。

霍亨索伦王朝 (Hohenzollern)——勃兰登堡选帝侯 (1415—1701)、普鲁士国王 (1701—1918) 和德国皇帝 (1871—1918) 的王朝。——第468页。

诺马耶, 马克西米利安·若尔日·约瑟夫 (Neumayer, Maximilian George Joseph 1789—1866)——法国将军, 秩序党的拥护者, 巴黎部队的司令 (1848—1850)。——第176页。

诺瓦利斯 (Novalis 1772—1801) (弗里德里希·冯·哈丁堡的笔名)——德国作家, 德国浪漫主义中反动流派的著名代表人物。——第270、274、277、279、282、285、293页。

诺特荣克, 彼得 (Nothjung, Peter 约1823—1866)——德国裁缝, 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之一, 被判六年徒刑。——第451、461、462、468、469页。

- 泽特, 奥托·约瑟夫·阿尔诺德 (Saedt, Otto Joseph Arnold 1816—1886)——普鲁士法官, 从1848年起任科伦检察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起诉人。——第461、464、481、486、499、517、530—534页。
- 泽肯多尔夫, 奥古斯特·亨利希·爱德华·弗里德里希 (Seckendorf, August Heinrich Eduard Friedrich 1807—1885)——男爵, 普鲁士法学家, 大法官; 1849年是第二议院的议员, 属于中间派;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起诉人。——第461、464、486、499、504、533、534页。
- ### 十七画
- 缪格, 泰奥多尔 (Mügge, Theodor 1806—1861)——德国作家和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派。——第354页。
- 缪拉特, 拿破仑·律西安·沙尔 (Murat, Napoleon-Lucien-Charles 1803—1878)——亲王, 法国政治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拿破仑第三的堂兄。——第414页。
- 谢特奈尔, 奥古斯特 (Schärtner, August)——海瑙的制桶匠, 1848年革命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流亡伦敦, 开设小酒店, 酒店成为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聚会之地;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为该集团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第339、353、527页。
- ### 十八画
- 魏斯, 约翰·哥特利勃·克利斯提安 (Weiß, Johann Gottlieb Christians 1790—1853)——德国演员和导演。——第267页。
- 萨菲, 阿乌利奥 (Saffi, Aurelio 1819—1890)——意大利革命家和作家, 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 马志尼的战友; 1848—1849年意大利革命的参加者; 1851年流亡英国, 从1872年起领导意大利共和党。——第625页。
- 萨伊, 让·巴蒂斯特 (Say, Jean Baptiste 1767—1832)——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第122页。
- 萨德勒, 约翰 (Sadleir, John 1814—1856)——爱尔兰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 议会中爱尔兰集团的领袖之一, 1853年任财政副大臣。——第556、558、560、569、587页。
- 萨默斯, 罗伯特 (Somers, Robert 1822—1891)——英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记者。——第576页。
- 萨尔万迪, 纳尔西斯·阿希尔 (Salvandy, Narcisse Achille 1795—1856)——伯爵, 法国作家和国家活动家, 奥尔良派, 曾任教育部长 (1837—1839和1845—1848)。——第194页。
- 萨兰德鲁兹, 沙尔·让 (Sallandrouze de Lamornais, Charles-Jean 1808—1867)——法国工业家, 制宪会议议员 (1848—1849); 1851年12月2日政变时支持路易·波拿巴。——第209页。
- 萨特伦德公爵夫人, 哈利埃特·伊丽莎白·乔治亚娜·鲁森—高尔 (Sutherland, Harriet Elisabeth Georgina Leveson-Gower 1806—1868)——苏格兰的大地主, 辉格党的活动家。——第569、570、575、576页。

- 萨特伦德伯爵夫人, 伊丽莎白·鲁森-高尔, 斯泰福侯爵夫人, 1833年起为公爵夫人 (Sutherland, Elisabeth Leveson-Gower, Marquise Stafford, Countess 1765—1839)——侯爵夫人, 1833年起为公爵夫人, 苏格兰的大地主; 斯泰福侯爵之妻, 是哈利埃特·伊丽莎白·乔治亚娜·鲁森-高尔·萨特伦德的婆婆。——第573—576页。
- 萨克森的摩里茨 (Moritz von Sachsen 1696—1750)——法国元帅, 原籍德国, 争夺奥地利王位继承权的战争 (1741—1748) 的参加者; 写过一些军事理论著作。——第308页。

期 刊 索 引

二 画

“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伦敦出版。——第387、397、399、404、411、426—428、430、432、505、556、576、623页。

三 画

“卫报”(《The Guardian》)——伦敦出版。——第433、434页。

“小金虫,文人雅士的杂志”(《Der M aikäfer, eine Zeitschrift für Nicht-Philister》)——波恩出版。——第279页。

“太阳报”(《The Sun》)——伦敦出版。——第565页。

四 画

“手术刀”(《The Lancet》)——伦敦出版。——第418页。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布鲁塞尔出版。——第339页。

“不来梅每日纪事”(《Bremer Tages-Chronik》)——第325、337、338页。

“巴尔的摩警钟报”(《Baltimore W ecker》)——第361、377页。

“文艺论坛,文学、科学和艺术问题杂志”(《The Athenaem, Journal of Literature, Science and the Fine Arts》)——

伦敦出版。——第630页。

五 画

“印度之友”(《The Friend of India》)——塞腊姆普尔出版。——第421页。

“布勒斯劳报”(《Breslauer Zeitung》)——第356页。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巴黎出版。——第227页。

“卡尔斯卢厄日报”(《Karlsruher Zeitung》)——第315、317页。

“北安普顿信使报”(《Northampton Mercury》)——第566页。

“加利福尼亚国家报”(《California Staats-Zeitung》)——旧金山出版。——第642、643页。

“民族报,民主社会党机关报”(《La Nation, organe quotidien démocrate socialiste》)——布鲁塞尔出版。——第594页。

六 画

“年鉴”(《Jahrbücher》)——见“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和“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

“宇宙”(《Der Kosmos》)——伦敦出版。——第299、347—349、352页。

“观察家”(《The Examiner》)——伦敦出版。——第411、430、505页。

“观察家时报”(《Examiner and Times》)——曼彻斯特出版。——第556页。

“先驱”(《The Leader》)——伦敦出版。
——第315、430、505、601页。

“先驱报”(《Herald》)——见“先驱晨报”。

“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
伦敦出版。——第433、439、551、556、
569、581页。

“西美周刊”(《Westamerikanische
Blätter》)——第359页。

“自由人报”(《The Freeman's Journal》)
——都柏林出版。——第557、559页。

“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
ler》)——伦敦出版。——第436页。

“关于欧洲形势、德国公众生活和社会生
活的德意志快邮报”(《Deutsche
Schnellpost für Europäische Zustände,
öffentliches und soziales
Leben Deutschlands》)——纽约出版。
——第321、337、338、348—351、361、
367、377、379页。

七 画

“快邮报”(《Schnellpost》)——见“关于欧
洲形势、德国公众生活和社会生活的
德意志快邮报”。

“改革报”(《La Réforme》)——巴黎出版。
——第313页。

“改革报。民主派的机关报”(《Die Re-
form, Organ der demokratischen
Partei》)——柏林出版。——第313、
314页。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伦敦
出版。——第237、239、411、428—430、
434、435、551、556、583、585、601、610、
621、625页。

“每周快讯”(《The Weekly Dispatch》)
——伦敦出版。——第244页。

“劳埃德氏伦敦新闻周刊”(《Lloyd's
Weekly London Newspaper》)——第
424页。

八 画

“国家报”(《Staatszeitung》)——见“纽约
国家报”。

“国民报”(《Le National》)——巴黎出版。
——第132、133、140、141、170页。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柏林
出版。——第508页。

“国民议会报”(《L'Assemblée nationale》)
——巴黎出版。——第194页。

“国民议会通报”(《Le Messager de
l'Assemblée》)——巴黎出版。——第
205页。

“波恩报”(《Bonner Zeitung》)——第286
页。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
——第508页。

“法兰克福总邮报”(《Frankfurter Ober-
postamts-Zeitung》)——第602页。

“宗教、哲学、政治、科学和文学界”
(《L'Univers religieux,
philosophique, politique, scientifique
et littéraire》)——巴黎出版。——第
588页。

九 画

“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
——伦敦出版。——第344、411、435、
530、551、569、601页。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奥
格斯堡出版。——第116、311页。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
——巴黎出版。——第143、173、184、
185、188、210、594、621页。

“革命”(《Die Revolution》)——纽约出版。
——第117页。

“建筑师”(《The Builder》)——伦敦出版。
——第630页。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第

- 116、257、316、320、349、350、431、481、495—497、508、514—515、519、530页。
- “柏林月刊”(《Berliner Monatschrift》)——第307页。
- “柏林政治周刊”(《Berliner politisches Wochenblatt》)——第18页。
-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巴黎出版。——第132、208、621页。
- ### 十 画
- “祖国报”(《La Patrie》)——巴黎出版。——第339—342页。
- “记事报”(《The Tablet》)——伦敦出版。——第559页。
- “旁观者”(《The Spectator》)——伦敦出版。——第411、430、505页。
- “通讯员”(《Correspondent》)——见“德国通讯员”。
- “家常话”(《Household Words》)——伦敦出版。——第298页。
- “泰晤士报”(《The Times》)——伦敦出版。——第241、244、341、403、411、429、430、448、530、551、553、560、562、577—579、582、587、597、603、628—629页。
- “高尔威信使报”(《The Galway Mercury》)——第618页。
- “纽约国家报”(《New-Yorker Staatszeitung》)——第350、361页。
- “纽约刑法报”(《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第646页。
- “纽约德文周报”(《Wochenblatt der New-Yorker Deutschen Zeitung》)——第367页。
-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第3、7、64、387、397、404、411、415、423、428、437、442—444、450、456、544、545—546、552、558、568、576、584、592、598、608、615、623、631页。
- “纽约德文报, 进步之友出版的报纸”(《New-Yorker Deutsche Zeitung, herausgegeben von Freunden des Fortschritts》)——第361、377、379页。
- “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第298、355页。
- “流亡者, 世界共和国的杂志”(《Le Proscrit, journal de la république universelle》)——巴黎出版。——第325页。
- ### 十一 画
-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伦敦出版。——第316、430—432、445、448、505、519、551、556、577、583、587、621页。
-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伦敦出版。——第435、551、621、625、627页。
- “寄语人民”(《Notes to the People》)——伦敦出版。——第245、253页。
- “陶工自由报”(《Potteries Free Press》)——特伦特河畔的斯托克出版。——第630页。
- “曼海姆晚报”(《Mannheimer Abendzeitung》)——第321、354页。
- “曼彻斯特时报”(《Manchester Times》)——见“观察家时报”。
- “笨拙, 或伦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第630页。
- ### 十二 画
- “晚邮报”(《Abend-Post》)——柏林出版。——第293、356页。
- “湖滨小报”(《Seebblätter》)——君士坦士

出版。——第358页。

“普鲁士石印通讯”(《Preussische Lithografische Correspondenz》)——柏林出版。——第370页。

“普尔和多尔塞特郡公报”(《Poole and Dorsetshire Herald》)——第400页。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科伦出版。——第20页。

十三画

“新闻报”(《La Presse》)——巴黎出版。——第170、638页。

“新普鲁士报”(《NeuePreussischeZeitung》)——柏林出版。——第314、356、429、602页。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科伦出版。——第75、103、111、507、510页。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伦敦出版。——第198、202、399、401、408、416、417、425、565、568、582—584、617、620页。

“奥地利通讯”(《Oesterreichische Correspondenz》)——维也纳出版。——第627页。

十四画

“赫尔报”(《The Hull Advertiser》)——第425、436、440页。

“维也纳日报”(《Wiener Zeitung》)——第68、599页。

十五画

“论坛报”(《Tribu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德意志”(《Deutschland》)——斯特拉斯堡出版。——第330页。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巴黎出版。——第311页。

“德国旁观者”(《Deutscher Zuschauer》)——最初在曼海姆,后来在巴塞尔出版。——第303—306、324、325、339、344、348页。

“德国旁观者。续刊”(《Deutscher Zuschauer. Neue Folge》)——曼海姆出版。——第303页。

“德国通讯员”(《Der Deutsche Correspondent》)——巴尔的摩出版。——第361、378、379页。

“德意志总汇报”(《Allgemeine Deutsche Zeitung》)——纽约出版。——第361页。

“德意志伦敦报”(《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第305、322、348页。

“德意志快邮周报”(《Wochenblatt der Deutschen Schnellpost》)——纽约出版。——第351、370页。

“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莱比锡出版。——第306、307、310页。

“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第306、307页。

十七画

“赛马新闻”(《Racing Times》)——伦敦出版。——第630页。

二十画

“警钟报”(《Wacker》)——见“巴尔的摩警钟报”。

译 后 记

本卷所载“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是在柯伯年同志的译文的基础上根据俄文版并参照英文版重新校订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在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文版译文的基础上根据俄文版并参照德文原著重新校订的；这篇著作的标题《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旧译为“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或“路易·波拿巴政变记”。我们根据原著标题译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因为：第一，原著标题如此，第二，法国共和历的雾月十八日（1799年11月9日）是拿破仑·波拿巴（即拿破仑第一）举行行政变的日子，而路易·波拿巴（即拿破仑第三）举行行政变的日期是1851年12月2日，马克思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个标题是为了表示这次政变不过是拿破仑·波拿巴政变的拙劣的翻版；为了便于读者查阅，我们在本卷目录中附上了旧译的标题。本卷附录中的“1850年9月15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曾根据年代顺序移到第七卷的附录中，但因这份会议记录与本卷内容也有直接联系，所以在本卷附录中仍旧保留下来。

本卷在译校过程中，承北京大学张俊彦同志提了很多宝贵意见，谨向他表示感谢。